

陕甘边根据地研究

《陕甘边根据地研究》编辑委员会 编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在院甘北根据地与中国革命学术研讨会上演讲



中共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小波在院甘北根据地与中国革命学术研讨会上演讲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苏博胜在院甘北根据地与中国革命学术研讨会上宣读李铁映同志的贺信



拍摄于河北固安碑林的南宋革命烈士纪念碑

《陕甘边根据地研究》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李志杰	顾小捷				
主	编	霍海丹	张智全	周 强			
副	主	董建棋	李 蓉				
编	委	王新生	刘宋斌	白 涛	王晋林		
		王勤贵	蔡森贵	卢连钧	王剑林		
		徐振伟	马启昕	李占年	安世厚		
		李 军					
审	校	白树军	赵 萍	杨懿琦			

目 录

在陕甘边根据地与中国革命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代序） （2009年9月20日）	李忠杰	1
革命的硕果 光辉的旗帜 ——试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	李 蓉	16
论党中央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 历史必然性	秦 生	29
西北红军与根据地的历史贡献和特点	姚文琦	41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奠定了基础	王晋林	56
陕甘边根据地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及贡献	王亚民	66
论陕甘边根据地在民主革命中的历史地位	叶晖南	75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及贡献	熊美杰	86
试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几个特点	王新生	92
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模式 ——陕甘边根据地的特点研究	占善敏	104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特点	李慧芬	118
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 创造性实践	张 复	127
试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历史必然性	李庆勇	137
从中国革命的道路看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冯建霞	144
论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赵晓红	156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历史经验

及其历史意义	王晋林	165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迎接长征红军概述	曲 涛	174
寺村塬根据地的性质和地位	程有文 王昭仁	186
陕甘边南区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立	张邦英	196
红二十六军建军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两个会议	张秀山	206
试论“七月决议”的产生及其历史意义	李占年	215
试论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及其对 中国革命的贡献	贾 杰	224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问题初探	刘家斌	232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历史功勋	徐振伟	245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研究	岳峰伟	256
浅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与陕甘省 苏维埃政府的衔接问题	朱春宁 杨 斌 朱瑞华	263
试谈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廉政建设	祝晓东	269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	黄正林	278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经济政策评析	戴引凡	286
陕甘边根据地货币考	姚 杰	295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的经验教训及现实启示	刘秉政	306
浅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文教事业的历史地位	崔彩霞	317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宣传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 and 意义	樊为之	325
陇东剧团的建立与贡献	陈晓贵	333
陇东优秀革命民歌在中国革命音乐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以《军民大生产》、《绣金匾》、《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为例	左 健	342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民族工作的实践及历史作用	郭 林	361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及其特点	何登科	372
论红军西征在宁夏回民聚居区开展民族统战工作的历史 经验及其深远影响	郭全忠	377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有

阶段的杰出代表及其时代意蕴	于伟霖 陈敬根 王佳斌	390
建立以庆阳洪德为中心的新的根据地		
——毛泽东关于西征战役的战略选择	李红喜	402
周恩来与红军西征战役	王凯捷	412
整军经武 枕戈待命		
——西安事变前后彭德怀和任弼时在庆阳	宋毅军	422
刘志丹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军事贡献	胥 胡	434
试论刘志丹、谢子长的兵运工作	任学岭 王保存	444
谢子长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雷 鸣	452
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坚守党的		
政治本色的理论思考	王 钢	474
试论习仲勋在陕甘边区的群众工作	李 赫	486
浅析习仲勋对陕甘边区的革命贡献	官丽珍	493
马文瑞在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活动	曹建平	499
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文化意义	朱鸿召	506
黄子文与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	黄军政	519
曹力如与陕甘边区革命斗争	曹东林 张孟钦	531
试论王观澜对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贡献	王荣福	536
王维舟在庆阳老区的革命活动	王庆生	549
贾拓夫与陕甘边	贾虹生	553
庆阳老区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贡献	耿 莹	560
庆阳老区对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贡献	刘秉义 袁志刚	564
庆阳老区人民拥军支前活动述评	王兰元	577
在陕甘边根据地与中国革命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		
（2009年9月20日）	霍海舟	591
附：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研究有关的文献资料和著作目录		600
后 记		605

在陕甘边根据地与中国革命学术 研讨会上的讲话（代序）

（2009年9月20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李志杰

今天，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庆阳市委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合举办的“陕甘边根据地与中国革命学术研讨会”在革命老区庆阳隆重举行，我首先代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对这次会议的举行表示祝贺，对甘肃省委宣传部、庆阳市委市政府所做的大量准备工作，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踊跃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并参会交流，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次会议的内容非常丰富。李铁映给会议发了贺信，陆小捷部长作为会议主持人，也会发表重要讲话，各位专家学者将围绕会议主题展开认真的研讨。我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我先讲四点意见，以抛砖引玉。

第一点意见，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 以多种方式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我们这次会议，恰好是在十七届四中全会刚刚闭幕这样一个重要时刻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全面总结了我们党执政60年来的宝贵经验，对进一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出了新的部署。我们要开好这次会议，首先要以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好四中全

会的精神。各地领导同志，特别是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回到各地之后，都会对全会的主要精神进行全面的传达。按照惯例，会议结束一周之后，全会的决定就会正式发表。现在已经发表的公报，概括了全会的主要内容和精神。我们这次会议，首先应该注意学习好四中全会的精神，以全会的精神指导我们开好这次会议，并指导我们开展好陕甘边根据地的历史研究。

与党史工作和这次会议相联系，我们需要注意全会的哪些精神呢？

首先，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党的历史方位、执政地位以及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建设。

今年，是我们党成立 88 年，执政 60 年，领导改革开放 30 多年。这三个时间段，如果采取拟人化的方法，就一个自然人来说，似乎刚好是老年、中年、青年。60 年前，毛泽东就曾做过这样的比喻，把我们党比做一个人，有他的幼年、青年、壮年。那年是党成立 28 年，所以毛泽东说我们党已经长大成人了。那么，现在党成立 88 年，是不是可以算老年了呢？当然不能算。因为党是一个历史现象，不同于一个自然人。所以好几次我在会见外国记者的时候，他们都问到共产党能执政多长时间？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力到底有多长？我说，中国共产党的生命周期应该是非常长的，不到历史使命和任务完结之时，不会退出历史舞台。他们问，那为什么世界上很多政党只存在几年、十几年、多的几十年，就退出历史舞台了呢？我说，这是由很多客观和主观的因素决定的。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是主观上自己建设得如何，自身的健康状况如何。客观上，我们党，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生命周期当然不会是 88 年，可能还会有几个、几十个 88 年，都有可能。但是我们自身能不能始终保持健康的状态呢？能不能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呢？这就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党始终非常重视自身的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几乎每五年，也就是每一届中央委员会，都要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专题研究党的建设。十二大之后的二中全会，十三大之后的六中全会，十四大之后的四中全会，然后，十五届六中全会，十六届四中全会，这次十七届四中全会，都是研究党的建设问题。这样一种举措，表明了我们党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始终抓好自身建设的决心。我们研究历史，首先要从这样的眼光，深刻把握党的历史发展进程，深刻认识党的历史方位，深刻认识党的

执政地位，从而进一步增强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执政能力建设的自觉性。

第二，要结合党的历史进程，深刻领会执政党建设的基本经验。

我们党注重历史，为的是从历史中汲取营养，总结经验，使自己变得更加成熟起来。所以很多次党代会和中央全会都曾经先后研究过，总结过我们党的历史经验。这次中央全会作出的决定，有一个部分专门总结了执政党建设的基本经验。标题就是“总结运用和丰富发展执政党建设的基本经验”。然后，提炼和概括了六条经验：第一条是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第二条是坚持把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作和推进党领导的伟大事业紧密结合起来，保证党始终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第三条是坚持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保证党始终走在时代前面；第四条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第五条是坚持改革创新，增强党的生机活力；第六条是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提高管党治党水平。这六条基本经验，都是从总结党的历史进程当中提炼出来的。反过来，我们学习领会全会精神，也可以结合党的历史进程，包括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的经验，来加以研究、学习和认识。

第三，还要注意运用历史资源，推动党的建设布局、措施的贯彻和落实。

党的历史是宝贵财富，也是历史资源，对于推动党的各方面建设，包括思想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都能够发挥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次四中全会的决定，在很多方面提出的任务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党的历史。特别是在建设学习型政党部分，明确要求全党学习党的历史。这样一个重要任务，全会之后，是会采取适当的方式加以贯彻落实的。我经常讲，一个共产党员，最起码要知道我们共产党是从哪里来的。你入党，连党从哪里来的都不知道，这恐怕就很成问题了。尤其是领导干部，更要深入掌握党的历史，了解党的历史经验，只有这样，才能把现实的工作干得更好。所以，我们党的历史，当然也包括陕甘边根据地的历史及其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推进党的建设，对于各方面事业的发展，都是宝贵的资源，应该充分利用好、发挥好。

第二点意见，充分肯定陕甘边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认真总结我们党创建红色政权并局部执政的历史经验

我们党到今天执政60年。这个60年是指掌握全国政权的60年。但其实并不止60年。因为在1949年之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就已经在很多地区局部执政了。甚至当年中央苏区建立的政权，就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至少是名义上的全国性政权，虽然实际上当时不可能真正在全国执政。这样一种历史现象，是与独特的中国革命道路联系在一起。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探索有自己特色的革命道路。经过千辛万苦，这条道路走出来了，并且取得了成就，获得了胜利。这个道路的一个重要构件、元素或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建立局部的红色政权。我们党不仅需要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自己的人民武装，也需要有自己的根据地。创建根据地的过程就是创建红色政权的过程，也是我们党开始执政的过程。这样一些局部执政的政权，虽然时间比较短，但积累的经验非常宝贵，为我们掌握全国政权之后更好地全面执政打下了重要基础。陕甘边根据地和当时全国其他十多个革命根据地以及后来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一样，都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

围绕这个主要之点，我想说三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充分肯定陕甘边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

陕甘边根据地与全国其他根据地比较起来，有共性，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但同时也有个性，有它的特点。它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这个作用不是仅仅从陕甘边根据地本身就能完全看清楚，而是要放到当时中国革命的全局当中考察，看看它对这样的全局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从这样的视角出发，陕甘边根据地一个非常重要的、必须加以注意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全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而具有重要的地位。专家学者们写的论文，很多都涉及这一点，并且从不同的角度做了概括。我认为，这种地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陕甘边根据地作为当年硕果仅存的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重心北

移并构建新的战略布局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种种原因，中国革命的区域性特点是非常明显的。30年代中期之前，主要的重心在南方。革命力量、根据地多数集中在南方。当然，北方，在我们党的领导和组织之下，也发展了很多力量，逐步建立了一些根据地。陕甘边根据地就是在北方建立的为数不多的根据地之一。但它的作用又并不仅仅局限在北方，而是在于，30年代中期，当我们党在南方遇到重大挫折的时候，在我们面临抗日救国重大历史任务的时候，在我们党和红军队伍实行战略转移的时候，陕甘边根据地发挥了非常重要和特殊的作用，从而使我们党在客观、主观因素的作用之下，实际上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了北方，进入到抗日的最前线，据此谋划和布局了整个新的战略格局。

第二，陕甘边根据地作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队伍的落脚点，为革命队伍休养生息、整合力量，实现新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落脚点问题。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是被迫无奈和自身谋划相结合的一个产物。客观条件是由于犯了“左”倾错误，丢失了根据地，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但是转移到哪个地方去，具体落脚到什么地方呢？这有一个研究和决策的过程，是随着对战略格局和敌我形势的分析而逐步确定的。总的目标是向北方，便于走到抗日最前线，承担起抗日救国的历史使命，也便于保存力量。共产国际当时也希望我们到北方打通国际通道。虽然也曾经考虑过建立川陕根据地，但到北方是一个大方向。具体怎么落脚？走到哪里？这取决于很多情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中央得知了北方的陕甘根据地保存得比较好，基础比较好，所以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这样一个落脚点。客观上来说，陕甘边根据地、陕北根据地等等，在当时来说，确实打了一个重要的基础。虽然也有曲折，有危险，有不足，但总体上来说，在当时那样的战略形势之下，有这样一块根据地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各路红军尤其是中央红军到达了这里，它为红军休养生息、整合力量、编制队伍，为新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某种程度上，通过找到这样一个落脚点，我们革命力量经历了、渡过了最低谷。由于反“围剿”的失败，从盛转衰；但是有了这个落脚点之后，就开始了由衰向盛。

第三，陕甘边根据地作为八路军挺进抗日的出发点，为推动实现国共合作，实施抗日武装的战略展开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就是出发点的问题。到达陕北，还不是我们党和革命队伍的最终目的。到了陕北，到了陕甘宁，我

们整合力量，目的是进一步承担起抗日救国的使命，进一步扩大我们的力量，包括我们的根据地。所以，从这样一个落脚点出发，进一步向东、向南、向其他地方实施战略展开。对此，陕甘边根据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地。当时的八路军经过整编之后，纷纷开赴各个方面的抗日前线，创建了更多的新的根据地。

这里还需要提到一个国共合作问题。面对国家危亡的紧迫形势，全体中华儿女都应该团结起来，实行坚决的抗战。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如何实现国共的第二次合作，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或者说任务。而当时国共两方的军队，首先在陕甘边、陕甘宁地区进行了沟通，开始了某种程度的合作，从而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发生和和平解决。所以，在推进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方面，陕甘边根据地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四，陕甘边根据地作为重要的后方保障基地，为发展边区经济、支援抗日前线，渡过根据地的困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研究历史，往往比较侧重于政治斗争的变化、军事斗争的发展，但有时候会忽略经济、忽略后方的建设及其地位作用。但如果我们全面地认识一个地区一个根据地的作用，就不能不注意到，当时整个陕甘宁地区，包括陕甘边、陕北等等地区，为我们的革命和抗日力量提供了强大的后方支持，包括经济上的支持。根据地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大力发展经济。边区人民用各种方式支援前线，特别是省出自己的粮食保证军队的供给。当时的陕甘边地区包括庆阳地区虽然也有自己的困难，但是，广大人民群众还是为整个陕甘宁地区的发展、对我们抗日军队的后勤保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点是需要注意的。

第五，在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基础上形成的陕甘宁边区，作为党中央13年的驻在地，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基础之上，我们党进一步形成了整个陕甘宁边区。党的驻地是延安，但整个战略依托点是陕甘宁边区。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前后一共坚持了13年。在这13年中，培养干部、组织群众、提高素质、积蓄力量。在这块土地上，总揽全国，面向世界，运筹帷幄，指导中国革命的整个进程，克服困难，转弱到强，最终走向全面胜利。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延安的作用是历史性的，扩大大之，陕甘宁边区的作用也是历史性的，其中，当然也包括陕甘边地区的作用。

第二层意思，陕甘边根据地的建设，提供了开展革命斗争和在局部地区执政的宝贵经验

这些经验，很丰富，很有特点。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概括。我觉得有这么几条很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坚持从实际出发，采用最适当的斗争形式和战略策略，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我们党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这个道路，在不同的地区也有不同的特点。陕甘边根据地与南方的一些根据地相比，有一些不同之处。比如说：环境条件比较艰苦。当时党的革命重心、战略重心在南方，所以，大部分领导干部被派往南方。但是，北方的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文瑞等同志能够坚强地承担起历史重任。注意从北方地区，从当地的实际出发，采用最合适的形式开展革命斗争。总的是要学毛泽东，走井冈山道路，但具体又有很多不同的形式。譬如：组织开展了好多次兵变；在根据地的布局方面也有一些重要的特点；特别是很注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当时南方在这方面还恰恰出了不少问题。陕甘边地区坚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所以在南方遇到失败的时候还能有很大发展。这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坚持以大局为重，加强团结合作，妥善处理党内的不同意见乃至分歧。这方面，有经验，也有教训。当年曾经有一段，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个错误也影响到陕甘边根据地，甚至造成了严重后果。很自然的，党内就会发生一些矛盾、分歧，“左”倾错误执行者用错误的方式对待这种分歧，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和巨大的损失。这是很令人痛心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陕甘边根据地的领导者们，总体上都能够以革命的大局为重。特别是刘志丹、习仲勋，在蒙受委屈、受到伤害的时候，革命的意志从来不动摇，而且，能够以大局为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忍辱负重，维护党和革命队伍的团结，坚持革命斗争。对于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在某些具体政策和措施上，当然可能有不同意见。因为不是搞本本主义，不是照抄书本，是探索，就会有不同意见、不同理解。但他们都能以大局为重。陕甘边根据地在这方面的经验是比较突出的，值得我们研究。

第三，坚持统一战线的法宝，努力赢得人心，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陕甘边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与统一战线联系在一起

的，这一点是非常宝贵的。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在当时南方的很多根据地，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了。在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待不同的社会阶层，乃至一些上层人士，也没有很好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所以毛泽东后来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强调要运用好统一战线的法宝。这是一个宝贵的经验。这方面，陕甘边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经验，这对于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四，坚持革命为民、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执政为民是我们现在的语言。当时根据地的红色政权，其宗旨、原则实际上都体现了执政为民。除执政为民，还有革命为民。共产党闹革命为了谁？为了人民。所以陕甘边的各级干部，始终保持良好的作风，保持着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美国友人李敦白，曾经在中国待了很多年。他跟习仲勋见过面。他回忆说，他当年在陕甘边的时候，跟习仲勋在一块，走到哪儿老百姓都会亲热地喊“仲勋啊”，亲密无间。习仲勋也很熟悉这些老百姓家中的情况。这点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与老百姓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们的力量在哪里？当然就在群众基础当中。这种执政为民、革命为民的宗旨、精神、作风，是非常宝贵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要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执政为民、立党为公，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决难事。这样一种精神，是非常需要我们坚持、研究和弘扬的。

第三层意思，对陕甘边根据地历史地位和宝贵经验的研究，可能还要注意解决一些思想方法问题

如何用科学的态度研究陕甘边根据地？总的来说要实事求是。具体来说，陕甘边根据地、西北根据地以及后来的西北局，有些历史情况比较复杂。当年对一些问题就有不同看法和分歧，后人在研究的时候，也有一些不同看法。这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甚至妨碍了对陕甘边、西北根据地的研究。对这些问题，我觉得恐怕要注意几点：

第一，要看到这些不同意见，总体上都是革命队伍内部的问题，是革命队伍内部的分歧，是总的探索过程中的不同看法。中国革命和建设没有一条现成的道路可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探索。既然是探索，谁能保证每一个

人的想法，抉择都百分之百正确？谁能保证所有人的看法都百分之百地一致？可能吗？不可能的。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要看得太玄乎，不要看得太严重。总的来说都是探索过程中一些不同的看法而已。针对这些不同的看法，像当年“左”倾错误那样用极端的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当然是错误的。如果把内部的分歧置于大局之上也是不合适的。总的来说，要维护大局、服从大局，大家要从政治上着眼，坚持团结合作。要从这样的基点和视角看问题。

第二，对当时历史的研究，无论对事、对人，都要注重肯定历史功绩，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持求大同、存小异。历史上的事情可能确实是比较复杂的。你要把它完全说清楚，而且一定要说清谁错谁对，有时是有很大难度的。所以，我们的重点，不是要纠缠于某个有分歧的问题和观点，而是要从总体上肯定历史功绩，从总体上总结经验教训，求大同存小异，大家一起共同合作，深入研究好这段历史，弘扬好当年的革命传统和精神。

第三，我们研究历史，不是当法官，不可能对所有的历史问题都作一个判决。很多地区都有一些历史问题比较复杂，因而都有一些不同看法。这本书，这一章、这一节、这个事，怎么写呀？都来找我，希望我给一个答复，给一个说法，这样他们就很好写了。能够搞清楚的，当然要尽量搞清楚。但是我经常说，写历史不是当法官，不可能对所有的历史问题都作一个判决。有些事情，到底谁是谁非，连当事人自己都搞不清楚。后人，也许能搞清楚，因为没有了利害关系；但也可能更搞不清楚，因为不了解历史真实。所以，我们可能要改变多年来写历史书的做法。不要把我们自己当成法官，把写历史书当作写判决书，指望把所有的事情都说清楚，一定要分一个是非，下一个永久性的、政治性的、绝对性的结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处理这类问题，就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模式。在国外学校里，老师往往是给学生提供材料，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教师并不一定给你下结论，很多东西并没有标准答案。而我们往往习惯于找一个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就不行。但是事实上，很多探索，无论是自然科学的探索还是对人类社会的探索，都很难有一个绝对的标准答案。所以，我们写历史，有时不妨把具体事实摆出来，放在那儿，甚至把不同看法、不同观点都摆出来，但是不一定非给它下个结论不可。如果对这段历史有不同观点，就把两种观点都写上，介绍一种观点认为怎么样，另一种观点认为怎么样，放

在那儿，让后人继续去研究。这样，历史就好写了。在这方面，我们的思路可以更开阔一点，思想可以更解放一点，处理问题的办法可以更灵活一点。

第四，对不同人物的历史命运，要历史地看待。那么多根据地的历史，那么多当年的人物，连同后来的发展变化过程，确实是丰富多样的。前不久在上海一大会址纪念馆开了一个纪念袁振英的研讨会。说起袁振英，不要说干部群众，就连95%以上的党史专家，也不一定知道袁振英是何许人也。他是一个特殊的人物，是当年上海早期党组织的重要成员，参加过党的创建工作，在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之间沟通联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建党后，他又出国留学去了，脱党了。他在历史上有诸多特殊的贡献，但“文革”期间也坐过我们的牢。他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过，但曾经是蒋介石的座上宾。对这样一个人物怎么看？当时我就讲了一个道理：我们党的历史，是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在这幅恢弘的画卷上，既有大事件，也有小事件；既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或者时大时小、不大不小的人物；既有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或者很难界定正面还是反面的人物；既有贯穿始终的人物，也有在某一时段参与其中、发挥了作用的人物。我们的历史，当然要坚持以主旋律、主色调，但也不能简单地只写那些大人物、正面人物，不写反面人物、小人物，那样来写历史，肯定是不完整的。所以，对历史上曾经做出过贡献的人物，或者说后来有各种各样变化的人物，都要客观地研究他。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不要简单地用整齐划一的、非此即彼、不是白就是黑的模式对待他。对不同人物的历史命运，要历史地看待，要尊重历史，客观反映历史，而不要抹杀历史，随意改变历史。该肯定的就肯定，该否定的就否定，不要把人物脸谱化。这也是研究陕甘边根据地历史当中要注意的思想方法问题。

第三点意见，不断推进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研究

这里面又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这次研讨会是一个标志性的会议

大家知道，西北问题、西北根据地问题比较复杂。多年来，可能客观上不愿触及，或者不便触及，所以研究得不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对很多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方面的研究也在

一步一步推进。所以甘肃也好、庆阳也好，在推动陕甘边根据地的研究方面，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在自身地域的范围之内开展过一些研究，组织过一些研讨会，都很好。对这次研讨会，甘肃和庆阳的领导非常重视，精心谋划、细致研究。陆部长还专门到北京去，和我们一块商量会议的内容、安排问题。这次研讨会一个很大的特点，是向全国征集了论文，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和有关部门的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一共收到来自17个省区市的180多篇论文。庆阳方面进行了初审，然后专程赶到北京与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的同志进行了终审，最后确定了入选的论文和交流的名单。这样一个过程，有助于吸引和组织全国党史工作者参与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研究。最后入选的论文，质量比较高，涉及领域比较宽，成果的面也很广。这次研讨会，是第一次带有全国性质的研讨会。通过会议的交流，我们把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研究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因此，这次会议是对陕甘边根据地进行研究的一次标志性的会议。

第二层意思，这次研讨会很有意义

有哪些意义呢？简单概括，一是有利于推进对陕甘边根据地本身的研究；二是有利于推进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研究；三是有利于发扬革命传统、促进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的发展；四是有利于充分利用红色资源，促进老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所以，召开这样一次研讨会有很重要的意义。我这里只简单地提一下，不展开了。

第三层意思，要继续推动和深化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研究

这次会议取得了很大成果，但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研究并没有结束。今后还可以继续召开类似的会议，把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研究推向深入。

第一，我希望全国有关的党史研究室和有兴趣的党史工作者继续关注这一课题。

有关的党史研究室，可以做一点适当的组织工作。像甘肃、宁夏、陕西、西北的其他一些地区以及西北以外相关地区的党史部门，可以把这样的课题适当地放在自己的工作日程上，注意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第二，要注意抢救、收集有关的历史资料。

过去由于种种客观的、主观的原因，对当时的很多历史资料，保存得可能不太好，流失的可能比较大，加上当年的老同志相继过世，很多历史情况可能永远也搞不清楚了，这是很遗憾的。但是无论如何，既然我们推动开展这项工作，就要注意资料问题。要尽量地，千方百计地搜集、挖掘可能找到的任何资料，妥善地加以保存。包括领导干部家里保存，老同志亲属保存的，当事人口述的，当事人后来回忆的，都需要注意搜集。革命遗址也要妥善地加以保护。

第三，要进一步深化研究，提高研究水平。

对历史经验的研究，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对执政问题的研究，都可以进一步展开和深化。不仅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研究可以继续，而且对整个西北根据地的研究，对西北局的研究，包括解放后的西北局的研究，都可以适当开展。这些历史都比较复杂，但是复杂不等于不要保存、不要研究。复杂的历史至少也需要客观地加以记录。在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我们党的认识水平和执政能力都有很大提高的情况下，适当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是可以考虑的。

关于中央局问题，我在有关会议上，已经要求全国各省党史研究室注意加强对中央局的研究。对中央局的研究，目前在党史研究中还是一个薄弱环节。各个中央局，都曾经对组织、领导各个区域的革命、建设起到重大的作用。但是，我们的党史著作很少提到中央局。各个省比较注意的是本省党组织的历史，但对于跨省的中央局怎么研究，还没有正式启动起来。所以我已经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作了初步的布置。当然还要进一步落实。西北局也是一个重要的局，党史工作者也要适当加以关注。

当然，在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时，都一定要从政治上坚持正确方向，把握好分寸，掌握好尺度，注意维护大局，服从大局。

第四点意见，继承和弘扬革命传统，推动老区现代化建设

庆阳是甘肃唯一的革命老区。对全国来说，老区还有很多。我们的老区，对中国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推进这些地区的现代化建设，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某种程度也是一个难题。为什么呢？因为老区有它自身的优点，但也有它的缺点。所谓缺点，

就是自然条件普遍较差。当年建立根据地，不会到大城市去建。条件好的，交通便利的地方，也不可能。所以寻找几个省交界的地方、谁也管不着的地方、交通通讯非常落后的地方建根据地。这是由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这么落后的自然条件，对我们今天的经济发展就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全国多数老区长期以来的发展速度都比较慢。主要原因就是自然条件比较差。当然，也要看到另外一面。就是从现在的角度看，这些老区可能有着丰富的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环境资源、人文资源。如果把这些资源及时、妥善地加以转化，就可能产生巨大的发展能量。

所以，如何从历史出发，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推进现实中的老区进一步发展，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我们研究历史，不能停留于历史，也不能局限于历史，而是要让历史告诉未来，让历史服务未来，让历史走向未来。党史工作者要自觉服从和服务于这样一个大局。我们各地的领导干部也要善于把历史的资源转化为现实的能量，现实的资源，现实的财富，推动各个地区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第一，要高度重视革命老区的建设。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老前辈革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关注老区的发展。看到老区贫困落后的面貌时，很多人都掉下了眼泪，觉得对不起老区人民。当然，并不是国家做得不好，国家还是做了，我们党还是努力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老区还没有脱掉贫困的帽子。党和政府有责任抓好老区建设。多年来，已经出台了很政策，采取了很多措施。十七大报告对革命老区建设也提出了很重要的要求。在实际工作中，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强老区基础设施建设，制订了很多政策，做了很多努力。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政策落实好，努力把老区建设得更好。

第二，要紧紧抓住第一要义，着眼长远，努力实现跨越式的科学发展。

老区要改变面貌，关键当然是发展。发展是基础，发展是关键。发展了，很多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所以，我们要按照党中央的要求，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始终抓好第一要义，落实好第一要义。当然，我们现在所说的发展，是科学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老区一般是后发，后发就要注意吸取前发、先发的经验教训。先发地区由于经验不足，或者当时思想上的片面性，可能不注重环境，不注重环保，不注重发展的质量。老区后发，看问题就可以尽量全面一点，既充分利用资源，加快发展速

度，但又少走或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弯路，争取一开始就把环境等问题解决得好一点。

老区发展，还有一个跨越式发展问题。老区起步比较慢，但不等于就赶不上，某些条件下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比如人类的通讯手段，过去工业化时期用铜缆传输信号，但后来采用了光纤。我们发展通讯设施，就没有必要走人家老路，先把铜缆布局搞完整了，再来换光纤。而是可以一步到位，直接使用光纤。这就是跨越式发展。革命老区虽然是后发，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实现跨越。延安现在发展的速度就很快，甚至人均超过了西安。所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跨越式发展是可能的。

第三，要从实际出发，制定和实施好科学的发展战略。

要实现科学发展，有一个好的发展战略很重要。从我了解的情况看，全国很多革命老区都根据自身特点，综合各方面条件，制定了长远的发展战略。各个地方的资源不太一样，环境不太一样，人文地理不太一样，那就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选择最合适的发展战略，争取取得明显的效益。相信庆阳地区也有自己的发展战略，希望能够把这样的战略制定好，实施好。

第四，要弘扬艰苦奋斗和开拓创新的精神，拓展发展视野，提高发展能力。

我们老区有艰苦奋斗的精神。革命战争年代，坚持了这种精神；新的历史时期，也坚持了这种精神。这是一个财富。“两个务必”，其中一个就是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党如此，革命老区如此，我们党史工作者也要如此。与此同时，还需要有开拓创新的精神。我们党讲民族精神，都是讲两个，一个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一个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革命老区与外部世界接触比较少，遇到的事物不像东部沿海地区那么多。思路怎么进一步拓展？如果安于现状，发展就可能不会很快。所以，必须提高领导干部的素质，增强开拓进取的精神。为此要加强学习，提高能力。这次中央全会部署党的建设，第一个内容，就是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我们并不陌生。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都一再强调学习。今天依然需要强调学习。今年年初，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习近平讲话的主题就是读书问题，也就是强调学习。加强学习，是我们长期不懈的任务。

我这里说的老区建设，主要不是说庆阳。对庆阳，我的任务是来学习

的，不是信手画脚的。当然，我们党史工作是面向全国，全国有大片老区，党史部门对老区的发展要做一些促进工作。实际上也做了一些促进工作。比如对广东、福建，我们推动了它们的革命遗址建设，还认定了一些中央苏区县。按照中央有关政策，中央苏区县是享受一些优惠的。从党史的角度做一些促进工作，有可能，也有需要。

好了，占用大家时间，就陕甘边根据地研究问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谈了一些看法，供大家参考。祝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祝愿陕甘边根据地的研究取得更大成果，也祝愿甘肃包括庆阳地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革命的硕果 光辉的旗帜

——试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

李 蕊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史册中熠熠生辉，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其创建和发展，是艰苦奋斗的结果，也是革命的硕果。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高举着鲜艳的革命旗帜，具有鲜明的特色。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是党和人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艰苦的斗争、革命的硕果——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经过几年的浴血奋战，在艰苦的斗争中创建的一块十分重要的革命根据地。这个根据地的基本历史定位是：

时间——始于20世纪30年代；

地点——在陕西和甘肃陇东的结合地区，包括陕西保安（今志丹）、安塞、甘泉、富县、中部（今黄陵）、宜君、旬邑、淳化、耀县和甘肃庆阳、华池、合水、宁县、正宁等县的部分农村；

地位——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发动广大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创建地方

工农红军，建立起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地，是八路军挺进前线抗战的出发点，全国解放区的指挥地，解放大西北的战略基地。总之，这块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占有独特而极为重要的位置。

1.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有着深厚的政治和组织、群众基础

陕甘边区，很早就受到革命的影响。1925年10月，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刘郁芬师进驻甘肃，共产党员宣侠父、钱清泉受中共北方区执委和李大钊之托，随国民军到达兰州。宣侠父、钱清泉到兰州后，很快与张一悟等人取得联系，同年底建立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活动至1927年2月，因为国民党右派的破坏，钱清泉等人离甘，支部停止活动。在此前的1926年6月，在中共绥德特支的基础上组建中共绥德地方执行委员会，受北方区执委领导；后改归中共陕甘区执委，党员发展到190余名。1927年3月中共陕甘区委成立时，下属7个地执委、4个部委和直属的16个特别支部、4个支部、党员388名。中共陕甘区委确定党的工作原则是：工作集中，人才集中，工作重点首先致力于农民运动。在地域上，首先集中于陕西，渐及甘肃。中共陕甘区执委积极开展群众工作，统一领导陕甘地区（包括陕北）的群众组织，包括青年团陕甘区执行委员会、陕西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省学生联合会、省青年社等。同时大力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在集中开展陕西工作的同时，中共陕甘区执委决定派人到甘肃秘密重建党的组织。1927年3月，兰州、导河（即甘肃临夏）、平凉、宁夏特别支部成立。6月，中共陕甘区执委的党员达到2117名。在中共陕甘区执委的直接领导和组织下，广大群众开展反军阀、反帝国主义斗争，支援国民军联军出关参加北伐战争，镇压土豪劣绅与贪官污吏，严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6月底，仅陕西省的农协组织即遍及60余县，会员达37万余人，农民自卫武装人数在10万以上，陕西的农民运动成为北方农民运动最高涨的省份之一。在中共兰州特支的领导下，兰州青年社等青年组织积极开展活动，创办刊物，宣传共产主义，抨击国民党右派，先后发展青年社员约300人。中共陕甘区执委还创办机关刊物《西北人民》，宣传革命主张。工人运动与农民、妇女、青年学生运动互相配合，促进了陕甘地区革命运

动的蓬勃发展。

1927年4月、7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反革命政变后，陕西反动当局也大力清党反共，解散革命团体，镇压群众运动。西安面临一片恐怖。为了适应突然变化的形势，中共陕甘区执委决定紧急通知各级党组织尽快由半公开活动转入完全秘密状态，重要干部秘密离开西安。7月，中共陕甘区执委撤销，组建中共陕西省委。

从1927年冬起，中共陕西省委遵照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组织领导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及其反动统治。10月12日，唐谢、李象九、谢子长等领导发动了清涧起义；1928年5月1日发动清华起义；5月7日发动旬邑起义；5月9日发动淳化起义，还有共产党员王泰吉等组织领导的麟游起义，三原、泾阳、礼泉围攻县城斗争，澄城农民驱逐反动驻军的斗争，永寿农民围攻县城斗争。这些斗争虽然最后都失败了，却动员和鼓舞了人民群众同反动派斗争，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积累了革命的经验教训，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这也为以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深厚的政治和组织、群众基础。

2. 陕甘边根据地经历了以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为中心的三个阶段

1928年3月，中共中央通过《陕西工作决议案》，提出实行工农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是革命发展的前途。同年下半年，中共陕西省委派刘志丹、谢子长等返回陕北，参加陕北特委领导工作。刘志丹、谢子长后被陕北特委派到陕西、甘肃两省交界一带开展兵运工作，实际上就是打入国民党部队，培植革命力量。1929年5月，刘志丹回到家乡保安县，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当上了县民团团总，他利用这一职务选派一批党、团员进入民团，将保安县民团改造成为革命武装。1930年1月，刘志丹赴南梁一带进行社会调查，深入了解哥老会和民间武装情况。以后，又和谢子长一起打入宁夏骑兵第4师苏雨生部，甘肃庆阳军阀谭世麟部开展兵运工作。1930年10月，刘志丹等在地处陕甘交界的大白镇发动起义，建立起一支100余人游击队，后又被称为南梁游击队。其后，部队遭到敌人袭击，刘志丹又和地方军阀谈判，使队伍得到休整和补充。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部

队中开展的兵运工作，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1) 以寺村塬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1932年2—9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立是一个非常艰苦和复杂的过程。以寺村塬为中心的时期是根据地的初创时期。1931年9月，刘志丹在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恢复建立了南梁游击队共300余人，刘志丹任总指挥。同月，中共山西特委领导的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到陕北，后改称陕北游击支队。10月下旬，两支游击队在林德庙、东华池一带会合。1932年1月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12日又在甘肃正宁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推动了西北地区革命武装斗争的发展。游击队在正宁南塬的寺村塬一带活动，组织农民群众开展抗粮抗捐斗争，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斗争纲领。4月，在寺村塬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以后，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陕甘边界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寺村塬也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历史见证。

(2) 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1932年9月—1933年10月）。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根据地的发展时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陕西省委决定创建陕甘边根据地，成立红二十六军。1932年9月中旬，陕甘游击队袭击陕西耀县照金镇，歼敌400余人，游击队在照金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拉开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序幕。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陕西省宜君县转角镇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是年12月26日，红二十六军挥师东进，和渭北游击队一起，和渭北群众革命斗争相结合，以耀县照金为中心，在周围各县开展游击活动，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发展了陕甘边根据地。

渭北游击队和渭北群众的革命斗争，是在中共渭北地区党组织领导下，以渭北苏区的创建为依托。1931年5月，中共武字区委恢复后，在各村建立赤卫队的基础上，组建了区游击大队，领导群众进行抗粮抗税斗争。1932年7月恢复中共三原县委，8月成立了渭北游击队，9月成立了渭北革命委员会，10月成立了中共渭北特委，在三原、富平、耀县、淳化、泾阳5县交界的广大地区，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农会和地方武装，打土豪分粮食，摧毁地主豪绅、国民党反动统治，基本形成了以三原的武字区、心字区为中心的

渭北苏区。渭北苏区东西横 30 公里，南北纵 25 公里，总面积约 750 平方公里，人口 4 万多。从 1932 年 11 月起，渭北苏区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围剿”，许多党、团员和革命群众牺牲。12 月，中共陕西省委决定撤销渭北地委，成立三原中心县委，领导渭北苏区的恢复工作，并领导渭北游击队配合红 26 军在照金等地作战。在敌人三面“围剿”之下，1933 年 3 月渭北苏区失陷了。由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也被迫撤离三原武、心两区，北上转移到照金。

1933 年 3 月 8 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成立。3 月中旬，成立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4 月 5 日，陕甘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耀县照金土儿梁（坪）召开，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雇农周冬至被选为主席，习仲勋被选为副主席兼党团书记。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肃反、粮食、经济等委员会，还颁布了各种法令。驻地薛家寨。基本上形成了以照金为中心，横跨耀县、淳化、旬邑等县边界的陕甘边根据地，先后建立了一批区、乡、村革命委员会。根据地面积达到 2000 平方公里。陕甘边区特委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1933 年 7 月，中共陕西省委被国民党当局破坏，陕甘边区特委在与省委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领导了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8 月在照金陈家坡召开的中共陕甘特委扩大会议上，决定把红四团、耀县游击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组织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会议还制定了集中主力红军深入陕甘边地区打击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的方针，并派人整顿省委组织。这些决定在当时对军事斗争和党的建设都具有积极意义。10 月，薛家寨失守后，照金苏区被敌人占领，边区主要领导成员转移到南梁地区开展活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以照金为中心期间，注意发动群众，争取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建立革命政权，建设根据地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以后的根据地建设积累了经验。

(3)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时期（1933 年 11 月—1935 年 2 月）。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根据地的鼎盛时期。照金苏区被敌人占领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转移到了华池的南梁。1934 年春，刘志丹率领红四十二师在南梁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革命武装，镇压反动势力，建立乡村政权，形成群众革命斗争高潮。2 月 25 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重建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5 月恢复边区特委，同时成立边区

革命军委员会。11月7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大会根据中华苏维埃选举法，选举产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设劳动、土地、财政、粮食、文化等委员会，机关驻寨子湾，机关刊物为《红色西北》，下辖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和赤安、华池、庆北等县苏维埃政府。至1935年2月，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先后建立陕甘边南区和12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统一战线、土地革命、经济建设、教育文化、干部教育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所以，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区再次成立，是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的标志。

3. 陕北的革命斗争及陕北革命根据地

陕甘边革命斗争在艰难中开展的同时，陕北革命根据地也得以创建。1928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陕北特别区委员会在绥德西川苗家坪南丰寨（今属子洲县）成立。1930年10月改属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12月划归中共河北省领导。1933年3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派孔原到天津主持北方地区工作。中共陕北临时特别委员会归其领导，马明方代理特委书记。在1933年3月至1935年2月期间，中共陕北特别区委设有同级的陕西省苏维埃政府及先后组建的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陕北红军第一、第二、第三团，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以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陕北特别区委员会，其下领导陕北12个县的党政军群组织。1933年12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谢子长、郭洪涛回陕北工作，谢子长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这一时期，陕北地区党的组织逐步恢复和发展。在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1934年陕北地区的武装斗争全面开展，农民群众抗粮、抗税、抗租、抗债、抗捐斗争不断高涨，乡村贫农会、赤卫队普遍成立。特别是在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军事“围剿”之后，安定、绥清、绥米、佳吴边等几块根据地（除神府以外）连成一片，形成纵横几百里的陕北根据地。截至1934年底，陕北特委下属府谷、神木、佳县、横山、米东、吴堡、绥德、绥清、清涧、安定、赤源、延川12个县委。

4. 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陕甘宁边区的建立 (1935年2月—1937年9月)

1934年秋，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在各自粉碎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军事“围剿”之后，红色区域都不断扩大。陕甘边的游击战争向东推进，陕北游击战争向南发展，两块根据地仅百里之隔，且日趋靠近。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惊慌，纠集了陕甘宁晋4省军阀部队约五六万人，向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严峻的斗争态势，迫切要求两个特委实现统一领导，迫切需要两支红军紧密配合、共同作战。

1935年1月，陕甘边区特委派刘志丹、惠子俊等率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第二团北上，到达陕北根据地的赤源县水晶沟。刘志丹、谢子长就成立西北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机构以及第二次反“围剿”作战方针等问题，进行磋商，取得完全一致意见。2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区委在赤源县周家刺儿圪塔（今属子长县）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陕甘边区特委保留。陕甘边区特委和原陕北特委所属各县（工）委均由西北工委领导。西北工委归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领导。1935年6月后改归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在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指挥下，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并肩战斗，于1935年夏相继解放延川、保安、靖边等6座县城，使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后称西北革命根据地。

1935年9月，中共鄂豫陕省委率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合并为中共陕甘晋省委员会，改组西北军委。陕甘晋省委归中央北方局领导。这一时期，由于实行“左”倾错误，发生了陕北错误的“肃反”事件，严重地削弱了根据地革命力量。加上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剿”尚未粉碎，西北根据地陷入严重的政治、军事危机。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西北根据地的靖边县吴起镇。中共中央得知陕北正在“肃反”，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同时，派王首道专程赴瓦窑堡查处“肃反”问题。11月初，中央又决定组成党务委员会，专门审查处理“肃反”事件。11月26日，陕北召开平反会议，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

工作的决定》，纠正肃反工作中的极“左”错误，及时释放了刘志丹等一批领导干部，并给他们重新分配工作，从而挽救了西北的党组织、红军和根据地。

1935年10月以后，各路主力红军陆续长征到达陕北。因为有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根据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热情迎接，党和红军有了落脚点。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西北地区安营扎寨，养精蓄锐，恢复了元气。随着红军西征的迅速推进，到1936年下半年，根据地扩大到陕甘宁3省交界一带，形成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西北革命根据地也得到巩固、扩大和发展。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战开始。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决议，确认陕甘宁边区为行政院直辖区。将陕西北部及甘肃、宁夏与陕北接壤地区共26个县划为八路军募补区，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直接管辖。陕甘宁边区辖区纵横约千里，跨有陕西、甘肃、宁夏三省，东起黄河，北越长城，西到宁夏东部，南达渭北高原。陕甘宁边区成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和人民抗日武装的后方基地和总指挥部，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鲜艳的旗帜，鲜明的特色——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特点

1.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想信念、坚持革命斗争的结果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始终高举革命的旗帜，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1933年7月，由于杜衡等人被捕叛变，中共陕西省委遭到国民党特务的严重破坏，陕甘边区特委与上级中断联系。10月，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及地方民团对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军事“围剿”，薛家寨失守。陕甘边区特委率党政军领导干部和一部分武装，逐渐转移到甘肃省华池县南梁堡一带，陕甘边党的工作和武装斗争一度陷入困难境地。11月3日至5日，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讨论部队改编、根据地重建等问题。会上，

刘志丹等总结了创建根据地的经验和教训，批判了杜衡推行的“左”倾错误。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下辖红四十二师，并建立第一、第二、第三路游击指挥部，开辟安定、南梁、照金3个游击区，以便互为依托，重建陕甘边根据地。会后，陕甘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赴西安寻找省委恢复关系未果，其他委员分散在党政军组织中活动。红四十二师党委代行陕甘边区特委职权。1934年5月，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健全了陕甘边区特委，张秀山任书记。同时成立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在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的领导下，1934年夏，陕甘边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红四十二师和陕甘游击队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基本形成以南梁为中心，纵横三四百里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特委还创办了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生活》。事实证明，包家寨会议的决定是基本正确的。以南梁为中心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也反映了共产党人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理想和信念，并不因革命遭受的挫折和个别叛徒的投降和出卖而泄气。当时的许多共产党员都是参加革命不久的热血青年，对于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缺乏经验。但是，尤为可贵的是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对革命理想信念的执著。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也非常关心和重视，不断发出指示，部署安排工作。虽然其中也包括一些不正确的、受到“左”倾错误影响的指示，但也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探索中国革命道路，逐渐积累起革命的经验，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坚实步伐。

2.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注意学习和吸取了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和教训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注意学习和借鉴了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和教训。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有合法斗争的条件与可能，武装斗争是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宝贵经验。湖北苏区是陕甘地区建立的第一个苏区。湖北的武字区、心字区，从大革命时期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武装斗争。湖北苏区的开辟，为红二十六军的创建，为照金和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培养了干部，输送了力量。湖北苏区的斗争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为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渭

北群众的领袖黄子文，是开创这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者之一。习仲勋后来回忆说：黄子文入党早，经验丰富，看问题全面而且很有见解。从1928年起，他就在湖北开始搞武装斗争，1932年成立的原富耀革命委员会，就是黄子文领导的。黄子文、黄子祥弟兄在湖北很有影响，全家为革命牺牲了好几个人。从习仲勋的回忆，可见黄子文领导武装斗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张秀山也曾被派到湖北游击队工作。湖北开展的革命武装斗争，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产生了重要影响。

习仲勋后来专门总结说：从湖北苏区长期的斗争中，可以看出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区是不能建立根据地的。湖北苏区在平原上四面都受敌人包围，对敌斗争要采取灵活的进攻政策，保守一隅是要失败的。而当时的“左”倾错误执行者迷信“城市中心论”，从夺取西安、三原等中心城市出发，反对所谓“上山逃跑主义”，在根据地内不顾实际情况强令分配土地，一再反对苏区同志的所谓“富家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这种“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实践证明是失败的路线。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刘志丹，十分重视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他深刻地总结大革命失败后在陕甘地区参与和领导多次兵变失败的教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刘志丹1932年9月间的这番话，充分表明他把井冈山作为学习的榜样。在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刘志丹等共产党人也注意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的紧密结合以及根据地的创建。正是有了这种善于学习，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开拓进取精神，刘志丹等共产党人才能克服革命过程中多次遭受的挫折，克服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领导的影响，最终在陕甘边把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

3.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注意了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政治思想等建设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建设，离不开革命的武装斗争和红色政权，更离不开党的领导。根据地领导人时刻不忘加强党的组织领导和对党的政治

思想等建设。1934年春，陕甘边第三路游击指挥部在陕西省的郿县、黄陵，宜君、耀县、旬邑、淳化和甘肃的正宁、宁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为加强党对该地区工作的领导，陕甘边区特委特意为1934年9月成立由张邦英担任书记的中共陕甘边南区委员会，下属耀县县委等，机关驻中部县小石崖。在根据地的建设中，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也注意加强党的组织领导和政治思想等建设。在照金时，刘志丹就按照古田会议精神，批判了部队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个人主义、流氓思想等错误思想；同时还对党员干部进行统一战线教育。他指出：革命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他身体力行，努力争取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他还奉行实事求是的原则，对一些同志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一定要打硬仗，去攻占敌人坚固的城镇据点；刚打下一块地方，还没有很好地把群众组织起来，就要马上平分土地，结果造成中农恐慌、富家逃跑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当游击运动发展过程中，一些游击队混进了坏人，组织严重不纯，屡次侵犯群众利益，遭到群众反对时，根据地领导人及时对各县游击队进行了整编，加强了党的领导，使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发展。所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发展和能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都和加强党的领导及党的政治思想等建设分不开。

4.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精心选择了比较理想的地区

在甘肃省地图册上，可以看到南梁位于华池县境内荔园堡川。南梁既是一个乡镇，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地域概念。从南梁地区的概念来说，它位于陕甘交界的桥山山脉中段的陇东境内，周围沟壑纵横，森林茂密，回旋余地大，方圆几百里的广大地区都便于红军的游击活动。同时，南梁地区的群众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使根据地的建立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再次，南梁还是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薄弱地区，当时陇东的地方军阀和陕西的地方军阀矛盾重重，南梁一带敌人兵力空虚，正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想之地。而且，这里还受到过革命的影响。1928年初，清涧起义的余部曾在这里进行过革命宣传；1930年至1931年间，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队曾在这里活动。1932年冬红军陕甘游击队也在这里休整过。所以，以南梁为中心，东西约

200 公里，南北约 150 公里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建立。

三、不朽的功绩，宝贵的财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贡献

1. 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民主革命的道路中，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坚持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和毛泽东后来概括总结的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是完全一致的。1928 年中共六大提出的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中心任务，也在根据地的创立和建设中得到贯彻和落实。虽然根据地建设中受到“左”倾错误的干扰，特别是 1935 年的肃反事件几乎使根据地毁于一旦，但因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及时赶到，西北革命根据地得到挽救，并为中国革命做出新的贡献。

2. 为党的事业培养了大批的优秀党员干部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工作，以后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是成为各条战线的领导人的比比皆是。除了刘志丹、谢子长英年早逝，习仲勋、马文瑞、汪锋、李翰福、张秀山、张邦英、张仲良、吴岱峰、王世泰、黄罗斌、刘盼范、高德纯、陈国栋、马锡五、贾进春、马明方等，许多人以后都成为党政军的高级干部或党和国家领导人。习仲勋、马文瑞、汪锋、李翰福、张秀山、张邦英、张仲良、吴岱峰、王世泰、黄罗斌、高德纯、陈国栋、马锡五、朱理治、郭洪涛、郭述申、唐洪澄、白茜、慕纯农等，还出席了 1945 年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大。

3. 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留下了许多的革命文物和遗址、遗迹，成为今天进行党的光辉历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仅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也留下了许多重要历史人物的足迹。如毛泽东、邓小平、周恩来、彭德怀、刘伯承、李富春以及著名的四八烈士之一王若飞

等，都在这片土地上战斗过，留下了他们的精神风貌和人格风范。革命前辈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奋斗精神，一往无前的革命气概，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已经永载史册，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诞生于陕甘边陇东老区的《军民大生产》、《绣金匾》、《咱们领袖毛泽东》三首民歌，不仅在中国革命音乐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也成为不朽的红色经典。

4. 为党留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深刻启示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广泛发动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也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创立和存在的宝贵经验。特别是在开辟根据地的时候，非常困难。但共产党员相信，“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他们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实行分土地、分粮食、分牛羊、戒烟、减赋、放足等等深得群众拥护的政策。由于他们和群众休戚相关，生死相依，许多青年要求参军，游击队得到发展，革命根据地也得以建立和巩固。

我们要永远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向往未来，继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真正做到执政为民，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作者：李蓉，女，重庆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论党中央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历史必然性

秦 生

遵义会议之后，党中央于甘肃、陕西长征途中，经过榜罗镇会议、铁边城会议和吴起镇会议，做出了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①的伟大战略决策，为千回百折的红军长征找到了良好的战略转移的落脚点，也为以后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发展建立了稳固的指挥中心。

党中央确定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是在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指引下，根据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可能做出的科学决策，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今天，深刻认识党中央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决策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对我们认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一、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及革命发展的有利条件，是党中央确定其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首要原因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在陕甘边、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到1935年7月，在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发动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之后，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58页。

形成了东至黄河，西达环江，北至长城，南到淳、耀，区域遍及陕甘两省30余县，具有一定规模的根据地。这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红色区域。

长征开始之前，贾拓夫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向党中央汇报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情况，党中央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有一定的了解。长征开始后，党中央同陕西党组织的联系陷于中断，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近况无从了解，所以在制定战略方针时，只把陕甘根据地作为构成总方针中的一个次要因素而考虑。

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原定的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已无法实现，党中央就将陕甘根据地作为制定新的方针的重要因素来考虑，在俄界会议上，就曾讨论在陕甘建立根据地问题。毛泽东指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不在江西，而在陕甘”，但是“在目前是较少可能”。

党中央到达甘肃哈达铺、榜罗镇等地后，随着离陕甘根据地的距离越来越远，了解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博古在榜罗镇出版的《前进报》第三期上撰文指出：“陕西的革命斗争发展的范围是很广大的；在陕北二十几县中，都多多少少地吸引运动之中，而延长等五六六个县城已经几个月保持在红二十六军手中。”此时党中央对陕甘根据地的了解，基本上符合根据地的实际状况。这样，陕甘根据地的存在就由党中央战略方针中的一个次要因素上升为主要因素，成了制定新的方针的主要依据。从俄界会议到吴起镇会议，党中央确定以陕甘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方针的形成过程可以看出，正是由于陕甘根据地的存在，使党中央在俄界会议所认为的陕甘建立根据地在目前较少可能的思想有了重大改变，看到了根据地不是可能不可能建立的问题，而是已经客观地存在着，“是继续的发展与深入到巩固”的问题，因而，作出了以此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决定。可见，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是党中央关于确定革命大本营战略决策形成过程中的首要因素。

党中央选择以陕甘根据地作为领导革命的大本营不仅是由于陕甘根据地的存在，使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有了立足之地，得以战胜危机，获得生机；而更重要的是从陕甘根据地所具有的有利的发展条件所考虑，是从推动中国革命重新走上高涨所出发的。

陕甘革命根据地所在的陕西、甘肃两省，历史上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剥

削和掠夺，人民生活极其贫困，阶级矛盾尖锐，不断举行自发的武装反抗斗争，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陕甘两省的党组织，领导这里的人民开展斗争，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举行的革命武装起义就达70余次，武装斗争的火炬燃遍了陕甘两省。陕甘边与陕北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在祖国的大西北举起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旗帜。经过数年的努力，在战胜了无数艰难与挫折之后，陕甘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形成了党的领导核心，建立了革命武装，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积累了宝贵的革命斗争的经验，使革命斗争继续发展有了坚实的政治条件和阶级基础。当时一些国民党统治区的报纸评论说：陕北共党，蔓延数载，宣传组织，深入民间，在社会上树立了深厚的根基。在实力上亦造成不能轻侮的势力。^①

陕甘革命根据地不仅有良好的革命基础与强大的革命力量，而且还有一个相对比较有利的革命环境。这里是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的地方，处于陕、甘、宁、晋、绥等省区的交汇处，敌人内部的矛盾和不统一，为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条件。陕甘革命根据地虽然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但由于承担进攻任务的主要是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及陕、甘、宁、绥等省区的地方军阀队伍，敌人内部矛盾重重，对红军的態度也各不相同，这就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党中央到达陕北后，与东北军、西北军等爱国军队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证明了这一点。

陕甘革命根据地还有着革命发展的有利的地理条件。它东临黄河天险，北有沙漠遮蔽，西以子午岭为屏障，南望关中，陕南，境内崇山峻岭，沟壑纵横，不利于敌大部队运动，有坚持工农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的优越地理条件。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条件下，指挥西北野战军取得了转战陕北的胜利，是与陕甘宁根据地有开展工农武装割据与游击战争的优越的地理条件分不开的。

陕甘革命根据地优越的地理条件，不仅在于提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有利条件，而且也对全国革命的发展十分有利。它东临华北，临近抗日前线，便于党领导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便于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对日作战；它北通外蒙，有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的条件；它西邻甘、宁，敌人统治薄弱，有广阔的发展余地；它南对关中，虽然是敌人盘踞的中心，但由于张、杨的友好态

① 《秦风周制》第2卷第4期。

度，后来成了进出革命根据地的通道和重要的物资补给线。

陕甘革命根据地横跨甘肃陇东和陕北，当时这里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农业生产虽不够发达，但也是西北地区主要粮棉产区之一。甘肃陇东是历史上有名的粮仓。陕北各县盛产小麦、杂粮，靖边等县“产量极多，据说每一堡寨均有粮食二、三千石”。安塞、清涧、吴堡、延川等地也是棉花产地。再加上这里畜牧业生产较为发达，人少地多，有发展农业生产的潜力，根据地军民的衣食需求有基本保证。陕甘根据地工业虽然比较落后，但由于这里盛产石油、煤炭、食盐等物资，有一些初具规模的工矿企业，这不仅保证了根据地的军需民用，而且，使根据地具有相当的自力更生的能力，对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具有重要的意义。1943年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就是极好的例证。

毛泽东在他提出的独创性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中，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不仅为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落脚点，而且在政治、经济、地理诸方面都有着革命发展的良好的基础，具备了工农武装割据的主客观条件。党中央选择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是在毛泽东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指导下作出的伟大决策，是这一理论的实践与发展。

二、共产国际援助思想和对西北与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认识，是党中央确定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外部原因

早在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之初，就密切关注中国革命运动的情况，支持和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中苏两国有着漫长的陆上边界，是中国革命发展的有利条件。20世纪20年代初期，孙中山曾提出由四川派部队前往内蒙或新疆，接运苏联的援助。1922年12月20日，孙中山在写给苏联外交代表越飞的信中说：“我现在可以调动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我们需要武器、军火、技术和专家的帮助”^①。大革命时期，冯玉祥在苏联进行考察，曾获得苏联的援助。返回西北后，率领国民联军举行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大革命后期，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等提出“西北学说”，认为武

① 《致越飞的信》（1922年12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1年第1期，第56页。

汉国民政府只要同冯玉祥联合讨奉，会师郑州，占领平津和张家口，就可以背靠西北，接通与苏联和外蒙古的联系，打通同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取得苏联的军事援助，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然后再回过头来东征讨蒋。提出：“中国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组建革命军队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① 这一计划曾得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赞同。“西北学说”后来虽然未曾实现，但打通同苏联的国际交通线的思想在中共党内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土地革命战争开始以后，共产国际及苏联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对中国革命进行援助。1929年，斯大林在帮助中共中央制定未来发展计划时，曾向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等人提出：将来红军如果能够向西发展，得到四川那样一块地方就好了。斯大林的考虑是，那样的话，中国红军就可以立足四川，接通西北，靠近苏联，取得援助。

1933年2月，从鄂豫皖根据地西进的红四方面军，到达川陕边，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川陕根据地的创建，使斯大林援助中国红军的设想有可能实现。共产国际执委会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出：“我们对四方面军主动转入四川的评价是肯定的。我们认为，在四川、陕南和有可能的话向新疆方向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具有很大意义。”^② 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表明了态度，希望中国红军向川陕甘甚至新疆发展，其意义就在于可以通过中苏边界，获得援助，壮大红军力量。这表明，共产国际执委会有通过西北陆上向中国红军提供援助的思想。

党的八七会议之后，谢子长、刘志丹等在陕西、甘肃开始发动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2年12月，组建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六军的活动引起了共产国际的关注，共产国际领导人曾多次告诉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希望中共中央大力发展陕甘根据地的军事和政治工作，打通川陕根据地和新疆的联系。为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和康生，于1934年9月16日致信中共中央，认为：据我们知道，陕北的游击运动很发展……同时在陕南的游击运动也有很大的发展，如果在这两方面都加强了领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4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88页。

② 黄春荣：《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页。

导，最近的将来是可能使这两方面的游击运动联系起来，这样就可以造成一种新局势，就是一方面川陕苏区有了广大的根据地及巩固的后方，另一方面可以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我们提议，中央与四川、陕西的党共同努力完成这个与中国革命有伟大意义的工作。^①

1934年夏，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军事代表弗雷德返回莫斯科，他向共产国际提交了关于中国红军未来发展方向的建议书。弗雷德认为：根据几年来斗争的经验，红军的发展极度需要来自国外的援助，而这种援助只能通过加强中共在西北的工作和红军向西北发展的战略来实现。他建议：开始调查通过新疆、外蒙援助的可能性，直接援助陕北的红二十六军，并通过他们接通四川红军。弗雷德还说：我们将来必须要为红军提供武器，包括飞机大炮等等。为此我们应该从俄罗斯向中亚细亚运送足够装备五万人的武器装备，并在那里建立武器库。^②

弗雷德的建议，受到了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的重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落实。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通过苏联红军情报局调查中国西北地区的情况，考虑具体援助中国红军的可能性，认为，红军“向西北发展的道路已经打通”^③，红军在西北发展以及接受援助是可能的。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准备了援助中国工农红军的军事物资，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准备了“1.5万—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当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④。这表明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不仅认识到了援助中国红军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已经开始向具体实施的层面发展。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通过陕甘革命根据地援助中国红军的思想和行动，必然对中国共产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成为后来制定的一系列战略方针中考虑的重要因素。

1934年10月，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开始战略转移。此后，各路红军也踏上了征途，逐渐向西北地区进军。1935年4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在一份关于中国红军行动的报告中认为：“今后红军向陕西、甘肃方向发展具有非常远大的前景，因为这些地方的游击队已经建立起一些重要的

① 《康生、王明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9月16日。

② 《弗雷德的建议》，1934年9月16日。

③ 杨春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8—1960）》，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第354页。

④ 杨春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8—1960）》，第227页。

根据地，并且建立起独立的苏维埃政权。”^①后来，苏联国防部、苏联红军情报局与共产国际联络局联合成立了一个三人组，专门研究中国红军未来在中国西北地区的发展计划及苏联援助问题，认为红军在西北发展与接受援助是可能的。1935年7月3日《真理报》发表的文章指出：“红军新的根据地因此应选在距离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军事中心较远的地方，同时新的根据地应该保证苏维埃革命的潮流能够广泛地向全国各地推广。选中的是四川、西康、陕西这样一个广袤的战略十分有利的地区。”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期间，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与中共代表团联系，要中共代表团选派一位重要干部秘密潜回中国西北地区，寻找正在北上的红军，转达共产国际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转告中共中央努力向西北发展，以便靠近苏联和外蒙。中共代表团决定派遣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林育英回国。行前，斯大林特别委托共产国际领导人转告中共代表团，要他们告诉林育英，务必向中共中央转达斯大林在红军战略发展方向的明确意见：红军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会后，林育英化装成小贩，经蒙古回国，于11月底到达陕甘根据地。后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派遣，闻红彦、刘长胜等人也先后到达陕甘根据地，恢复了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②。共产国际和苏联援助中国红军的行动，虽然有着苏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但也体现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世界人民互相支持和互相支援，推进无产阶级革命和共同抗击法西斯的思想。这不仅对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有利的，同样，对世界革命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也是有利的。共产国际和苏联援助中国红军的行动中，始终将西北地区特别是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实现陆上援助的重要地域和有利条件看待的，这必然对中共中央制定战略方针和红军的行动产生重要影响。

① 东方书记处：《中国红军前线的新形势》，1935年4月；《有关军事问题的报告》，1935年，转引自杨奎松：《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1928—1960）》，第30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1页。

三、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和党中央实现“北上抗日”政治路线的需要，是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政治原因

红军长征时期，也是中国国内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急剧变化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独占中国的狂妄野心，在制造九一八事变、强占东北全境后，于1935年又将魔爪伸向华北，妄图将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

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面前，蒋介石政府仍然坚持其卖国、内战、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妥协退让的同时，继续调动大批的国民党军队进攻红军，镇压人民的爱国抗日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与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的卖国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爆发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形成了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中国新的民族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

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处于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迅速结束流动状态，到达北方抗日前线，建立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担负起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在急剧变化的历史关头，不失时机地领导中国革命向前发展。

面对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表明了坚定不移的抗日立场。1935年6月，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际，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央军委联名发布《为反对日本吞并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重申北上抗日的政治方针。1935年9月，党中央就北上与南下战略方针问题同张国焘发生严重分歧后，始终将北上抗日作为制定战略方针根本指导思想，并不惜冒着孤军北进的巨大危险，为实现中央北上抗日的政治路线而斗争。党中央在9月10日发布的《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中指出：“同志们，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进入甘肃以后，党中央在制定战略方针时，始终坚持“北上抗日”的指导思想，不仅考虑了北上红军的安危和生存，同时也考虑到了革命向前发展和实现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指出：中央坚持

过去的方针，继续向北的基本方针。我们不应把自己变成瓮中之鳖，中央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在哈达铺和榜罗镇，党中央了解到北方抗日怒潮高涨和陕甘革命根据地存在和发展情况后，召开了榜罗镇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日本侵略北方的严重性，分析了北方可成为抗日新阵地的政治、经济条件和陕甘根据地及红军状况，看到了陕甘革命根据地有实现中央“北上抗日”政治路线的基础，具备党中央在这里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条件，做出了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伟大战略决策。对此，毛泽东后来曾经指出：到陕北来是政治路线问题。埃德加·斯诺指出：“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来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这种宣传上的巧妙手法必须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①

可以看出，党中央选择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基于民族危机加深与全国抗日民族运动高涨，党中央在抗日前线建立起领导中国革命中心的迫切要求，和党中央为实现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贯彻“北上抗日”的政治路线的需要而做出的。

四、党和红军为克服困难，战胜危机，争取革命发展有利条件，是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自身原因

1935年9月上旬，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进入甘肃时，由于张国焘率军南下，一、四方面军两支主力红军被雪山草地阻隔，失去了战略支援和配合的可能。党中央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只有一、三军团及军委直属纵队等部队，共七八千人，处于敌20多万兵力的围追堵截之中。北上红军孤军北进，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红一方面军新战士进入甘肃时已经战胜了雪山草地等严重的自然困难，长途跋涉二万余里，在征途上行进了将近一年。在严峻的战争环境和恶劣的自然条件折磨下，指战员体质虚弱，部队减员严重，迫切需要—个安定的环境进行休整，恢复体质和战斗力。毛泽东在俄界会议的

^①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80页。

讲话中曾说：休息我们需要的，可能对应争取休息。俄界会议通过的决定，也提出了“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的问题。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为党中央和长征红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党中央和长征红军到达这里后，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时机，壮大了部队战斗力，终于使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结束了艰难困苦的行军。对此，埃德加·斯诺认为：没有长征，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影响就不会那么大，没有陕甘革命根据地，红军长征也会更加艰难。

党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在中国西北部创造了中国新的苏维埃革命根据地与领导的中心”，“同时也将开始以中国工农红军为主力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的历史阶段”。^①在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党中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和“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三项军事方针。这迫切需要集中全国的主力红军，形成强大的对日作战的力量，使之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推动革命的发展。

这时，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还处于被敌分割的状态。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就为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指明了长征目的地。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各路红军胜利会合与开赴抗日前线的基地。在战胜了张国焘的分裂与破坏之后，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三支主力红军在甘肃境内胜利会师，汇合到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开始后，各路红军在陕甘宁根据地经过休整补充，改编为八路军，精神抖擞地开赴前线，开始了直接对日作战的新的伟大斗争。

可以看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为处于跋涉途中的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休整与恢复的环境，提供了汇合和走上抗日前线的基地，为党中央提供了一个良好的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后来，毛泽东曾经在中央党校干部大会上的一次讲话中指出：陕北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这正是对党中央确定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落脚点和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原因的高度概括。

^① 中共中央：《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1935年11月13日。

五、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具有的 科学精神与战略眼光，是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领导 中国革命大本营的主观条件

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一批经过革命斗争锻炼和培育出来的革命领袖。列宁指出：“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① 所以，一个成熟的、被全党所拥护和支持的领导集体，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事业健康胜利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基本保证。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也曾涌现出一些党的领导人。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正处于幼年，由于这些领导人存在着自身的不足与缺陷，他们承担不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使革命事业遭遇危难。正如邓小平所说：“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② 在中国革命屡遭失败，在党的领导成员频繁更迭的情况下，一代成熟的党的领导集体出现，领导革命事业健康顺利向前发展就成为全党的呼声和中国革命发展的时代要求。

《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遵义会议之后，刚刚开始形成的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肩负着全党的信任和委托，挑起了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但是，当时党和红军仍然处于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包围之中，面临着极大的危险。红军到达川北地区后，虽然暂时脱离了敌人的包围，由于这里地处偏僻，远离革命的中心，不具备党中央领导革命的必要条件，所以如何在新的指导方针下将战略退却变为战略进攻，使党中央在有利的环境中承担起领导革命的重任，使红军在有利的环境中得到恢复和发展，就成为第一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思考的重大问题。

党中央率领一、三军团进入陕甘地区后，先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召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7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页。

开了俄界会议、哈达铺会议、榜罗镇会议、铁边城会议、吴起镇会议等一系列会议，研究红军长征落脚点和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问题。毛泽东在吴起镇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日行动方针的报告说：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二千里，到达这一地区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指出：“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①至此，党中央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全国革命大本营的战略决策，基本得以实现。

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历史性转折。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转折关头，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敏锐的洞察力和超人的胆略，决定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终于使党和红军转危为安，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将革命推向了胜利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科学的决策，源于对客观实际的掌握与认识。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的伟大战略决策的形成，是由于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与革命发展的有利条件，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思想中对陕甘革命根据地认识，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与党中央为实现政治路线的方向，党和红军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具有的科学精神与战略眼光这些最基本的因素所决定的，是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科学的决策，无疑对中国革命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第一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历史转折关头作出的以陕甘革命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伟大战略决策，关系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领导中国革命13年的历史，验证了这一历史性决策的远见卓识和对中国革命发展的深远影响。

作者：廖生，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教授，中共甘肃省委决策咨询专家组成员，兰州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甘肃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西北红军与根据地的历史贡献和特点

姚文琦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高举土地革命的伟大旗帜，坚持武装斗争，在全国建立了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和 30 多支正规红军。作为十多块革命根据地之一，西北革命根据地〔1935 年 2 月建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党的组织和红二十六军（亦称陕甘红军）、二十七军（亦称陕北红军），因而称为西北根据地〕规模大、斗争艰苦、坚持时间长，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土地革命初期，共产党人在陕西及其边界地区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相继创建了渭北、陕甘边、陕北、鄂豫陕、川陕等数块革命根据地。1935 年 2 月周家硷联席会议后，在刘志丹等的正确领导下，西北红军粉碎了蒋介石集团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使陕甘边、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统一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并不断发展壮大。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十多块根据地中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一块根据地，是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在中国革命史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 75 周年之际，研究西北红军与根据地的历史贡献和特点，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西北红军与根据地的历史贡献

1. 西北红军是中国北方武装斗争的一面旗帜

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共产党人不畏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武装反抗蒋介石的反动统治。从1927年10月到1928年5月，中共陕西省委先后在陕北和关中组织发动了清涧、渭华、三原、旬邑、淳化、澄城、麟游、咸长等武装起义和交农运动，尤其是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更是意义重大，一个是打响了西北地区共产党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一个是规模最大，开了军队起义与农民起义相结合的先河，在西北地区首次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上述起义虽然坚持时间不长，都被反动派镇压下去，但是它们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陕西的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它们在西北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西北共产党人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同时为后来的武装斗争积累了经验，锻炼了一大批干部，刘志丹、谢子长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在中共陕西地方组织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曲折的兵运工作，1931年秋，刘志丹终在陕甘边界的南梁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亦称陕甘边界游击队），10月陕北游击支队（晋西游击队与保商武装）辗转来到南梁，与南梁游击队会合，次年初先后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先后担任总指挥。1932年底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后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相继为王泰吉、刘志丹、杨森，先后辖五个团。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及其前身创建了巩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相继建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别委员会（书记先后为金理科、秦武山、张秀山、惠子俊、李生华、李景林）、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先后为刘志丹、刘景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

1932年后，陕北的武装斗争已成燎原之势，在中共陕北特委的领导下，相继组建了十多支红军游击队。1934年7月建立了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9月在游击队总指挥部的基础上成立了红军陕北独立师，翌年1月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二师（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先后辖四个团。红二十七军八十二师及其前身创建了陕北革

命根据地，建立中共陕北特别委员会（书记先后为杜衡、吉国祯、赵伯平、马明方、崔田夫），陕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

1935年初，已经形成具有相当区域的陕甘边和陕北两个苏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下辖富西、富甘、赤安、华池、庆北、合水、安塞、赤漳、中宜、新宁、新正等11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和代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4个县的南区苏维埃政府。陕西省苏维埃政府先后下辖神木、佳县、吴堡、绥德、清涧、赤源、秀延、延川、延水等9个县级苏维埃政权。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原安定县，今子长县）周家峪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党、政、军组织。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建立，标志西北根据地的形成。1935年9月到10月，红二十五军、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先后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发展壮大了红军与根据地，其区域在鼎盛时期，东临黄河之滨，西到六盘山下，北起长城，南至桥山，曾经建立过陕甘边、陕西省、陕甘晋省、陕甘省、陕甘宁省、陕北东地区、神府特区、关中特区，先后领导53个县级苏维埃政权。西北根据地各级苏维埃政权或革命委员会中党的组织、政权组织、地方武装领导机关及下设机构完备，土地改革、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卓有成效，有力保障了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

西北红军是中国北方武装斗争的一面旗帜。从1927年开始进行武装斗争，几经曲折，1931年秋建立游击队，1932年底建成正规红军，不断发展壮大，到1935年9月，连同游击队数量达近万人（包括先期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一直战斗至全国抗战爆发。其创建的西北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十多块根据地中唯一保存完整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红军建立了一个稳固的落脚点，是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2. 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队，策应了南方红军的战略转移

参加长征的各路红军，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和战斗在西北根据地的红军，虽然没有直接参加长征，但也通过各自艰苦卓绝的斗争，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打乱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同样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1) 西北红军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策应了红军长征。中央红军长征后，蒋介石调陕、甘、宁、晋、绥5省军队，6个师、30个团的5万兵力，向西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根据地军民密切配合，在以刘志丹为主席的西北军委统一指挥下，采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略战术，历经十余战，解放了6座县城，歼敌8000余人（包括民团3000余人）。在2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将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主力红军（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和地方游击队扩大到成万人，将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大江南北红色区域遥相呼应，使蒋介石在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和“围剿”西北红军中南北不能相顾，兵力分散，客观上减轻了长征中红军的压力。

1935年7月，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有向西北转移落脚的意图后，又调集阎锡山、高桂滋、井岳秀、马鸿宾、马鸿逵、张学良、杨虎城等部队达10万之众，由其兼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向西北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妄图一举歼灭西北红军，使长征中的各路红军无立足之地。在刘志丹的指挥下，西北红军先后在慕家原、定仙娥、横山等战斗中获胜，给敌以重创，使晋军龟缩在黄河东岸，不敢西犯。此时，首先迎来了红二十五军从鄂豫陕根据地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与西北红军胜利会师。西北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和西北红军的英勇作战，震动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牵制了十万之众的国民党军队，减轻了南方各路红军的压力，策应了红军的长征。同时，拉开了红军会师西北苏区的序幕。

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先期长征到达西北苏区延川永坪镇。9月17日，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主持召开了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主要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撤销西北工委、鄂豫陕省委，建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改组西北军委，将三支红军改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十五军团建立后，在10月1日和12日在劳山、榆林桥先后发动两次重大战役取得胜利，重创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击毙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俘一一〇七师三二〇团团长高福源。劳山战役胜利后，在清理战利品时，从敌人文电中得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已到甘肃通渭的静宁地区，有进入陕北的迹象，中共陕甘晋省委和红十五军团即确定部队继续南下攻打富县、洛川，牵制敌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

(2) 西北红军的英勇作战，向中共中央告知了西北根据地存在的信息。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的存在中共中央早已知晓。根据地创建初期，中共陕西省委、陕北特委向中央就有报告，并不断得到指示。1933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被破坏后，与中央联系中断。时任省委委员贾拓夫到上海分别向中央驻北方代表、上海中央局汇报了情况。随后，贾拓夫到达江西瑞金，参加了中共中央六届五中全会，出席了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1934年6月，贾拓夫担任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部长。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贾拓夫随军出发。遵义会议后，贾拓夫任白区工作部部长。在此期间，贾拓夫也向有关方面介绍了陕西党组织和根据地的情况，由于时隔两年，信息不通，近况难以预料。1935年9月20日，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岷县哈达铺。21日，毛泽东从在哈达铺找到的《大公报》上得知，“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全陕北赤化人民七十万，编为赤卫队者二十万，赤军者二万”，“匪军长刘志丹辖三师，枪有万余”，“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这信息，使中共中央决定了红军的行动方针，伴攻天水，北渡渭河，避敌主力，迅速北上。《大公报》无意的报道，实际上告知了西北根据地的存在和红军力量的强大，成为中央红军落脚的向导。这些看来过时的消息，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极大重视，多次找贾拓夫询问情况。贾拓夫向毛泽东和中央汇报了1933年7月前陕西党组织和红军及根据地的情况，并建议中央去陕北。^①毛泽东兴奋地说，别说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9月22日，中央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的团以上干部大会上，毛泽东作了形势报告，强调“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并号召“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不远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抗日前进阵地”。^②9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通渭县籍罗小学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改变徽界会议的意见，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③这次会议所作的重大决策，不仅为红军找到了一个战略转移的落脚点，同时也确立了领导全国革命的根据地，对此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之，贾拓夫作为红军陕甘支队的向导，留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随时向中央提供陕甘地区的情况。10月19日，中共中央、中

① 《贾拓夫》，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8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编，《毛泽东的足迹》，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63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部编，《毛泽东的足迹》，第163页。

央红军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吴起镇。从此，西北根据地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入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发展新时期。

3. 壮大了红军力量，迎接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中央红军及中共中央机关到达吴起镇时仅余 8000 多人，西北红军（包括红二十五军）及地方游击队达一万人（游击队 4000 多人）。三支红军的会合，壮大了力量。11 月 6 日中共中央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的番号，下辖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全军 11000 余人。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粉碎蒋介石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①。

为了巩固和扩大红军与西北根据地，党中央于 1935 年 12 月后，陆续将西北根据地的地方游击队整编组成红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军和神府独立师、关中独立师。1936 年，中共中央先后组织的东征、西征战役，是将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两次重大军事行动，编入红一方面军的西北红军英勇作战，立下了赫赫战功。1936 年 10 月，在西北根据地军民的大力支持下，红一、二、四方面军终于在甘肃会宁、静宁胜利会师，为迎接全民族抗日高潮的到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西北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根据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创建的武装力量，在祖国大江南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左”倾错误和主观蛮干，使党在组织上和工作上都遭受严重损失，白区组织几乎损失 100%；苏区除西北根据地外，均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红军被迫先后撤出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正如毛泽东所说：“结果只剩了一个陕北。”^②西北根据地军民在刘志丹等的领导下正确领会毛泽东思想，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独立自主地领导军民不断粉碎蒋介石军队的“围剿”，使根据地不断巩

①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载《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130 页。

②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载《毛泽东文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97 页。

固、扩大，先后建立了几十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成了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唯一坚持下来的完整的红色区域。

中共中央到陕北后，在其直接领导下，西北根据地军民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支援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做出了重大贡献。根据地人民千方百计筹集军粮、军费，踊跃参军参战，各方动员做好战地勤务工作。节衣缩食，支援红军作战，成为根据地人民群众欢迎中央红军的实际行动。陕西省苏维埃政府在中央红军刚进入根据地时就完成 970 余石粮食的任务。赤源县在 1935 年 12 月 26 日前筹款 1600 元。为扩大红军，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苏维埃干部带头参军，父送子、妻送夫，兄弟相争参军的动人景象随处可见。富县组建了一个团，整建制编入红二十九军。直罗镇战役时，富县和中宜县苏维埃政府组织了数百副担架转送伤员和军用物资。中央红军到陕北时，已近初冬，缺衣少粮，根据地妇女做军鞋军袜取粮。截至 1936 年 3 月，陕西省群众做军鞋 8446 双，袜子 553 双。延川县在 4 天内赶制军服 3000 套。^①一些地方妇女还组织洗衣队、缝补班，为红军伤病员服务。西北根据地地处偏僻，地瘠人贫，人民生活十分艰难困苦，突然增加万余人的用度，困难是可以想象的。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和配合，保证了中央和红军的衣食用度，为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正如毛泽东 1945 年 4 月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所指出的，“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

5. 西北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策源地和八路军出师抗日的出发地

1935 年 12 月，中共中央在西北根据地，审时度势，正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及时提出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和扩大红军力量的方针，并经过与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的多次谈判，形成了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逼蒋抗日的合作局面。1936 年 12 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为中共代表，前往西安，

^① 中共陕西省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红军长征胜利到陕北》，陕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4 页。

积极协助张学良，杨虎城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进了国共两党实现二次合作。在此前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经过多次艰苦的谈判，终于实现了两党二次合作，结束了十年内战，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陆续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因此，西北根据地是国共二次合作的策源地、土地革命战争的终结地和八路军东征抗日的出发地，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从此西北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指导中心。毛泽东、中共中央在这里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矛盾与国内阶级矛盾，科学地、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形成了举世闻名的毛泽东思想和光芒四射的延安精神。

6. 长期革命实践，使西北根据地形成了坚强的领导集体，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一批著名的领导人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北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人，始终坚持武装斗争，高举土地革命的旗帜，正确运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开创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培养了一大批著名领导人。

西北根据地的探索阶段（1927年9月至1931年秋）。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先后发动和组织了渭河、渭华、渭北、旬邑等几次大的武装起义，并在地方军阀部队中开展艰苦卓绝的兵运工作，几经磨难，终归失败。但是，积累了经验、教训。刘志丹等不再依靠在国民党军队中当兵买马，而是逐步吸收党员和进步青年，改造非法武装，组织自己的游击队，1931年9月终于建立了南梁游击队。锻炼了谢子长、刘志丹、汪锋、阎揆要、潘自力、黄子文等一批领导人。

西北根据地的初创阶段（1931年秋至1932年9月）。刘志丹、马锡五等吸取教训，不等不靠，独立自主地在陕甘边界地区开展兵运，吸收党员和进步青年，在地方非法武装中进行建党建军，1931年9月终于建立了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亦称陕甘边境游击队）；同月，阎红彦、黄子文、拓

克宽、吴岱峰等领导的晋西游击队来到陕北，在陕北特委领导下，吸收保商武装和进步青年，组成陕北游击支队，于1931年10月下旬来到南梁与刘志丹领导的游击队汇合，并相继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和陕甘边游击队，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首次在陕甘边界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亦称寺村塬革命委员会），领导群众打土豪、分财物。后由于陕西省委受“左”倾错误干扰，盲目蛮干，急于求成，对游击队在政治上进行指责，追查所谓“机会主义领导问题”^①，随意撤换领导，军事上死拼硬守，导致王朗坡、五顷原、三嘉原三战皆败。严酷的现实，迫使根据地中心东移。但是在此阶段，形成了以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并不断成熟。期间，中共组织在陕甘边界，尤其是在陇东，发动了十多次武装起义。如：1932年4月习仲勋、刘林圃领导的两当起义，5月谢子长、焦维炽领导的靖远起义，7月杨林、高鹏飞发动的西华池起义，8月卢松轩、赵丕烈发动的定西靖口起义，10月李良、李华锋领导的平浪高店起义等。起义部队先后建立了陕甘游击队第五、第四、第一、第二、第三、第七游击支队及第三大队和人民革命军。这些起义虽然没有达到与陕甘游击队会合的目的，就被国民党当局打散，但它扩大了共产党和陕甘边红军的影响，为党锻炼了一批优秀干部。

西北根据地的发展阶段（1932年9月至1933年10月）。1932年9月，陕甘游击队袭击耀县照金获胜，派习仲勋、李妙斋在此发动群众，开辟地方工作。年底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次年先后建立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党政军机构设置完备，并积极开展各项工作。期间在刘志丹、金理科、秦武山、王世泰、李妙斋、习仲勋、黄子文、吴岱峰等的领导下，红军和游击队不断扩大，照金附近的区、乡、村革命委员会普遍建立，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集市贸易，设立医院、被服厂、枪械修理所及监狱。根据地范围不断扩大，横跨耀县、淳化、旬邑、宜君4县边界，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二十六军政委杜衡无视客观实际，拒绝刘志丹等的正确意见，强令部队南下渭华，导致兵败秦岭。在此危急时刻，王泰吉率领起义后改编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黄子祥、杨森率领由渭北游击大队改编的红二十六军第四团，陈学鼎、张邦英领导的耀县游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

击队来到照金，壮大了苏区的力量，缓解了危机。8月14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耀县陈家坡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建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领导上述三支武装转入外线作战，连获胜利。10月上旬，刘志丹等一批南下幸存指战员辗转回到照金（刘志丹到后任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随主力红军出征陕东。此时，国民党当局乘机攻陷照金。这一阶段，逐步形成以刘志丹、金理科、秦武山、王世泰、李妙斋、习仲勋、黄子文、吴岱峰、汪峰、王泰吉、高岗、黄子祥、杨森、陈学鼎、张邦英、高锦纯、刘约三、朱子修、王兆相、康健民、黄罗斌、牛刚等骨干和领导集体。

西北根据地的成熟阶段（1933年11月至1935年2月）。1933年11月，随军北上的陕甘边党政军领导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成立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后刘志丹、杨森接任），高岗为政委（杨森、张秀山、谢子长先后接任），刘志丹任参谋长，黄子文为政治部主任（后龚逢春接任），师党委书记先后为杨森、张秀山。全师先后辖五个团，王世泰、李映南、黄罗斌、黄子祥、陈国栋、张仲良、刘景范、胡彦英、赵国祥、高德纯、郭宝珊、任润花等任团长或者政委。并设立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习仲勋、吴岱峰兼任领导。杨琪、张明吾、王安民、朱志清等任地方武装领导。1934年2月，再次选举产生了边区革命委员会（11月改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任主席。5月恢复了边区特委，张秀山、惠子俊先后任书记，建立了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此期，陕甘边根据地在刘志丹的领导下，创造性地开展游击战争（1933年7月陕甘边根据地与上级联系中断），提出了一整套符合陕甘边苏区发展的军事、统战方针和土地分配、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的政策，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这一阶段，军事斗争不断胜利，根据地面积越来越大，建立了陕甘边南区及华池等十几个苏维埃县治。在苏区中心进行土地分配，边缘区域实行打土豪、分财物的政策。在经济建设中实行予民生息的政策，经营红军公田，军政人员实行供给制，待遇平等；开设集市，发行货币，开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创办红军干部学校，培养军政干部。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以刘志丹为核心的领导集体逐步形成，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得到锻炼，一批核心领导脱颖而出，刘志丹、高岗、习仲勋、张秀山、黄子文、王泰吉、杨森是其中的杰出

代表。

西北根据地的鼎盛阶段（1935年2月至1937年9月）。1935年2月，中共陕甘边特委、中共陕北特委在瓦窑堡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党政军组织。工委书记惠子俊，军委主席刘志丹（一说谢子长），副主席高岗。陕西省苏维埃政府与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仍然存在。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建立，标志着由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构成的西北根据地的形成。从1935年2月开始，到1937年9月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改建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历时两年8个月。其管辖区域东临黄河，西至六盘山下，北起古长城，南至黄龙山，先后建立有53个苏维埃县治。^①此两年8个月，因组织领导名称的不同，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西北工委领导时期（1935年2月至9月16日）；二是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与陕甘晋省委领导时期（1935年9月16日至11月）；三是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共陕甘宁边区区委领导时期（1935年11月至1937年9月）。

在西北工委领导时期，西北红军前敌总指挥刘志丹指挥红二十六军（师长杨森、政委张秀山）、红二十七军（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转战在陕北的广大区域，解放了六座县城，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使陕甘边、陕北两个苏区连成一片，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西北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经过长期革命实践，以刘志丹为核心的西北根据地领导集体形成，一批优秀的干部（习仲勋、崔田夫、马明方、高岗、杨森、张秀山、杨琪、张达志、张邦英、马文瑞、贺晋年）迅速成长起来，担负着根据地党政军主要领导职务。正当刘志丹组织力量应对蒋介石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并取得初步胜利之际，1935年9月16日，中共鄂豫陕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从鄂豫陕根据地来到西北根据地永坪镇，与西北红军会师。从此西北苏区进入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与陕甘晋省委领导时期。根据中共北方代表的指示，先期到达西北苏区的朱理治、聂洪钧即与程子华（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二十五军军长）组成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书记朱理治）。17日，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召开西北工委、中共鄂豫陕省委和军队主要领导人会议，决定撤销西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国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北工委、鄂豫陕省委，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改组西北军委（书记聂洪钧），三支红军组建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刘志丹）。这一时期，红十五军团先后发动了劳山和榆林桥两次战役，使进攻西北苏区的东北军遭受重创。但在此期间，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与陕甘晋省委在西北苏区开展了错误的肃反，刘志丹、高岗、杨森、张秀山、习仲勋、惠子俊、杨琪、刘景范、马文瑞、张仲良、黄罗斌、高锦纯、张策、郭宝珊、任浪花、张文舟、李启明、高朝亨、赵启明等一大批原陕甘边党政军领导干部被捕，200 多名党员和干部被当作“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而错杀。这是“左”倾错误和宗派主义在西北苏区恶性膨胀的产物，使根据地处于恐怖状态，军心不稳，民心不安，以致发生反水叛乱事件，而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日甚一日。西北根据地处于严重危机之中。在这危急存亡之际，10 月 19 日，中共中央带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在了解了情况后，迅速制止了错误肃反，释放了被捕干部。11 月初中央政治局在甘泉下寺湾召开会议，决定撤销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与陕甘晋省委、西北军委，设立中共西北中央局、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和新的西北军委，领导西北根据地党政军工作，直至 1937 年 9 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在第二个时期的两个月里，西北根据地的领导遭受到党内“左”倾错误的迫害，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们更加坚强，更加成熟。从此以后，他们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事业转战南北，血洒疆场；为新中国的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们中涌现出了刘志丹、谢子长、闫红彦等一批军事家，习仲勋、高岗、马文瑞、汪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二、西北根据地的特点

西北根据地从探索、初创、发展、成熟到鼎盛，经历了中国革命发展历史上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全过程，既有根据地建设的共性，也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

1. 在全国工农革命武装中最早设立政治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土地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随

即大江南北武装起义风起云涌，工农革命武装纷纷建立。但是，不论是1927年发动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还是1928年组织的弋（阳）横（峰）起义、黄麻起义、桑植起义、平江起义，在起义后普遍建立了工农革命军，沿袭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工作制度，设立党代表。唯独1928年5月在党领导的渭华起义中，建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学习苏联军队政治工作体制，设立了政治委员。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及早期红军中，政治委员的设立已到1929年9月后。^①因此，完全可以说，西北工农革命军开了人民军队设立政治委员的先河。

2. 发展革命武装的独特的陕甘模式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武装的方式多种多样，有依靠军队发动起义，建立革命武装的南昌起义，有依靠农民（也有极少数工人）和军队起义的秋收起义，也有军队、农民、工人联合起来的广州起义，还有单纯组织农民起义的弋（阳）横（峰）起义。同样，陕甘地区党的组织也领导了各种方式的起义，如，在军队中组织的渭华起义，有军队和农民参加的渭华起义，有单纯农民参加的三原和旬邑、淳化等起义，也有1932年陇东地区发生的军队起义。这些起义，有些由于事先没有做好准备，或者没有充分发动群众，客观条件不具备，结果归于失败；有些由于主观指导上失误，最后遭到挫折。经过这些起义，刘志丹、谢子长、马锡五、黄子文等开始认识到，依靠在旧军队中发动起义，招兵买马出路不大，要到农村、山区去，依靠扩大党员，发动群众，并改造非法武装，建设自己的力量，形成游击队，正规红军。在陕甘模式的指导下，1932年9月才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南梁游击队，并不断发展、壮大，形成强大的红军，创建了陕甘根据地，最后形成西北根据地。

3. 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坚持团结、包容的原则

在西北根据地和红军的发展过程中，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领导集体，始终以党的利益、革命的大局为重，坚持五湖四海、团结、包容的原则，不搞宗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78页。

源，不搞小团体，使革命队伍越来越强，根据地越来越大、越巩固。1932年秋，在陕东，南梁游击队迎来了从晋西、陕北辗转而来的陕北游击支队，并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1933年夏，在耀县又与陕北游击队一支队会合，帮助其发展，在干部、武器上给予配备，待其条件好后让其重返陕北；同年秋，渭北根据地丧失后，黄子祥带领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红四团），王泰吉率领受到严重挫折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来到照金苏区，受到根据地军民的欢迎。在陈家坡会议上，陕甘边特委、革命委员会的领导顾全大局，推举刚恢复党籍的王泰吉担任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刘志丹从秦岭山返回后担任参谋长，并没因为王在渭华起义时是自己的下级而有怨言。恢复四十二师时，刘仍然推举王任师长，直到王离任后才接替师长一职。1934年7月，谢子长等带领陕北游击队来到南梁，陕甘边区的领导没有因为隶属关系的不同不予支持，而是热烈欢迎，给予武器、给养装备。在阎家洼子会议上，陕甘边领导同志置北方局的错误指责不顾，让谢子长兼任四十二师政委，并带领红三团北上，协助陕北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11月，活动于黄龙山的地方武装鄂宝珊部起义，得到西北红军的欢迎和信任。1935年8月，西北工委得知红二十五军即将到西北苏区的消息，专门做出《为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委部的紧急通知》。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来到永坪镇，受到西北根据地军民的热烈欢迎。在永坪联席会议上，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成立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改组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参谋长戴季英），三支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刘志丹），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明方、崔田民、崔田夫、张秀山、黄子文等被排斥在主要领导岗位之外。但是，具有崇高理想和信念的刘志丹和他的战友们，不计个人地位、名誉，顾全大局，同外来干部合作共事，忘我工作。劳山战役后，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在“左”倾错误和宗派主义的干扰下，开展了错误的肃反，逮捕了刘志丹等一批原陕甘边苏区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错杀了军队营以上、地方县级以上干部200多人。直到中共中央长征到陕北后，刘志丹等一批未遭杀害的干部才得以恢复自由。刘志丹等获释后顾全大局，不计政治上未得到彻底平反、组织上职位安排过低的不公正待遇，仍然浴血奋战，辛勤工作，甚至付出生命。他们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坚持团结、包容的原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和高尚情操，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此外，西北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建立根据地时间最长的一个完整的根据地。西北根据地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经过全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虽然名称几经变化，但党政军机构一直完整地延续到新中国建立。

今天，我们纪念陕甘边根据地建立75周年，研究这段辉煌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就是要继承先辈们坚定的信念、崇高的理想，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学习先辈们尊重客观实际、敢为人先、实事求是的思想品德；就是要学习先辈们团结进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高尚情操，为建设文明、富裕的新西部而努力。

作者：姚文琦，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会长，研究员。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王晋林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工农武装割据的伟大斗争中，在陕甘边界地区创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在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与陕北革命根据地共同发展为西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经历了艰苦曲折的斗争，是党在西北地区建立最早的革命根据地，揭开了陕甘地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序幕，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并奠定了基础。

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开创了西北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1. 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开始了在陕甘地区建立党领导独立的革命武装，揭开了红色游击战争的序幕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坚持中国革命，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遵照党的指示先后在陕甘地区举行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两当起义等多次武装起义，积极开展兵运工作，但大都遭到了失败。失败的沉痛教训使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同强大的敌人作

斗争必须建立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搞工农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于是他们自1931年秋季开始了在陕甘边界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931年9月，刘志丹和马锡五到南梁地区，开展创建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实际工作，在合水县倒水湾汇聚当地的三支农民武装进行整编，集中进行革命纪律教育和军事训练，在陕甘边界地区正式建立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第一支人民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部队编为三个大队，共300余人，200余支枪。南梁游击队成立后，在刘志丹的指挥下，依托南梁一带子午岭山区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打土豪，抗粮抗税，先后多次粉碎国民党陈珪璋和反动地主民团的进攻，其影响迅速在陕甘两省传播开来。南梁游击队不仅在军事上站稳了脚跟，打开了游击战争的新局面，而且在政治上扩大了党在陕甘边地区的影响，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开展武装斗争的基础。

1931年9月，晋西游击大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与当地的几支烟商保卫武装汇合，组成陕北游击支队开展游击斗争。10月下旬，陕北游击支队经长途转战，到达陕北华池县林镇庙与南梁游击队会师。随后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来到游击队驻地，与刘志丹一起对队伍进行了统一整编。谢子长、刘志丹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并成立了中共队委会，全军800余人。1932年1月初，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部队在正宁县北梁桥子村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全军700余人。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全军下辖2个步兵大队、1个骑兵大队和1个警卫大队，共360余人。同时成立了中共队委会，各大队成立了党支部。陕甘红军游击队的建立，标志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地区正式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

1932年12月24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陕甘红军游击队在陕西省宜君县转角镇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杜衡任军政委兼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刘志丹任政治处长，全军下辖骑兵连、步兵连、少年先锋队、政治保卫队，共200余人。红二十六军的成立，标志着陕甘边革命斗争走上“工农武装割据”道路新的发展阶段，开创了陕甘边地区革命斗争的新局面。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从南梁游击队的建立到

西北反帝同盟军以及陕甘红军游击队的创建，发展到正规红军红二十六军的组建，开始了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走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道路，陕甘边地区的革命斗争由此进入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的发展时期。

2. 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是坚持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以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主要目标

陕甘红军游击队建立后，开始在子午岭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2年3月下旬，陕甘红军游击队在正宁县城以南寺村塬地区，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在队委会的指导下，召开了寺村塬等72个村有五六百农民参加的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正宁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李杰夫任主席，陕甘边区第一个红色政权由此诞生。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也标志着陕甘边区第一块游击根据地的建立，是陕甘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最初实践。正宁游击根据地建立后，陕甘红军游击队便依托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活动于陕甘两省边界地区。在此期间，由于陕西省委主要负责人杜衡的“左”倾错误领导和时任游击队政委李良的错误指挥，陕甘红军游击队几遭损失，被迫转入外线斗争，不久，初创的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丧失。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建立后，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在刘志丹和王世泰的指挥下，在陕甘边界地区积极开展了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的斗争，迅速开辟了照金根据地。1933年4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召开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肃反、经济、内务、文教等委员和赤卫军总指挥部，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正当游击战争蓬勃发展 and 照金根据地日益扩大之际，杜衡再次极力推行“左”倾冒险错误，6月下旬，不顾刘志丹等同志的反对，专断地强令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地区。在优势敌军的进攻下，红二十六军在终南山地区遭到了几乎全军覆没的惨重失败。后来照金根据地也被敌人占领。

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成功与挫折，为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甘边共产党人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与教训，他们更加明确了创建革命根据地对开展革命斗争重要性的认识。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举行联席会议，着重讨论了根据地的重建问题。会议决定组建红二十

六军第四十二师，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作为红二十六军的后方依托，开辟陕北、陇东、关中三个战略区域，建立一、二、三路游击队指挥部等。包家寨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确定了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对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按照包家寨会议的决定，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随后组成，全师下辖红三团、骑兵团两个团，500余人。在刘志丹的指挥下，兵分两路转战于南梁地区，拔除敌人据点，消灭反动武装，基本上肃清了根据地周围的敌人，同时积极开展地方工作，在各地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游击队，成立了农民联合会、贫农团、雇农团、赤卫军等大批基层群众组织。经过4个月的发展，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红色区域初步形成。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区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华池县四合台召开，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下设土地、劳动、财政、食粮、肃反、军事、文教等委员会和政治保卫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块以南梁为中心，东西约200公里，南北约150公里的革命根据地建立，为后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陕甘边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和红军力量的发展壮大，有力地推动着革命根据地的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包括淳化、耀县、中部、宜君、旬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保安、安塞、靖边、鄜县、甘泉等18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1934年11月1日至6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华池县荔园堡隆重举行，100多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等重要议案，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简称南梁政府），习仲勋任主席，下设土地、劳动、财政、食粮、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会议还选举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在此前后，根据地中心区基层苏维埃政权建设有了新的发展，华池、庆北、合水等县的革命政权先后建立。陕甘边南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也于10月成立，并在新正、新宁、赤水、淳耀、永红等县建立了革命政权。南梁政府的成立，宣告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正式完成，标志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巩固发展的新阶段。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在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的基础上创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实践充分证明，明确以建立和建设革命根据地为主要目

标，坚持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把开展游击战争与创建革命根据地结合起来，是陕甘边根据地创建和发展最根本的原因。

3.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有力地支援了陕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陕甘边、陕北两地的革命斗争遥相呼应，开创了西北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在陕甘边游击战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影响下，陕北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的斗争也逐步开展起来，到1934年3月，陕北先后建立5支游击支队，游击战争遍布11个县，形成了3小块游击根据地。5月，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师配合地方反动民团对陕北各游击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谢子长带领红军游击队展开了反“围剿”斗争，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但由于敌我力量众寡悬殊，斗争形势异常严重。7月下旬，谢子长率领陕北红军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来到陕甘边根据地，与红四十二师共同协调粉碎敌人“围剿”的行动。7月28日，陕甘边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与陕北特委、陕北红军总指挥部召开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应陕北特委的要求，派红二十六军主力第三团由谢子长率领北上陕北，与陕北游击队联合作战粉碎敌人的“围剿”，并拨给陕北游击队100支枪和数百枚银圆，支援陕北开展游击战争。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主力红三团从南梁到陕北战场后，与陕北红军游击队并肩作战，取得了四战四捷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推动了陕北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

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在陕甘边红军的支援下取得胜利后，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迅速发展，各地普遍建立了红军游击队、赤卫军，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为了配合陕北红军游击队的斗争，1934年10月初，红二十六军主力第三团再次转战陕北，支援陕北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1月中旬，陕甘边区特委派杨琪到陕北苏区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工作，协助开展陕北地区的武装斗争。1935年1月25日，陕北苏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陕西省苏维埃政府，陕北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1月30日，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下辖三个团，杨琪任师长。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红二十六军北上陕北，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

陕北的游击战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陕甘边、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斗争中密切配合，遥相呼应，在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中不断地发展壮大，西北人民的革命斗争在更广阔的范围更猛烈地展开，开创了西北革命斗争的新局面。

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在反“围剿”中创建的，在斗争中革命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军事基础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形成之际，1934年3月，国民党政府调集了陕甘两省军阀队伍共8个团，约1万人的兵力，对根据地发动了“围剿”。针对敌人的部署，在刘志丹等率领下，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转入外线，以灵活机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寻机歼灭敌人。各路游击队和赤卫军在当地坚持斗争，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3月初，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向敌后挺进，南下照金，东出宜君，北上保安，西进庆阳，转战千里，九战九捷，歼敌4个多营及5个民团。5月，受挫的敌人调整部署，再次向根据地夹进，红军主力重创敌军，多次获胜，迫使敌人退出了根据地，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在反“围剿”斗争中，红四十二师主力先后北上陕北，配合陕北红军游击队的反“围剿”斗争，对促进陕北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根据地的创建起了重要作用。在反“围剿”斗争中，红军和游击队也不断地发展壮大，到1934年底，红四十二师已发展到下辖4个团和抗日义勇军等部的近2000人的部队，游击队和赤卫军扩大到3000多人。

1935年2月，国民党反动派调动陕、甘、宁、晋、豫5省军阀部队共4万余人的兵力，发动了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当时两块苏区的红军主力部队不足4000人，红军游击队不到3000人，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为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陕北安定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惠子俊任书记，统一两块根据地的组织领导；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一说谢子长），统一指挥两块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的反“围剿”作战。西北军

委制定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作战方针，即集中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主力，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陕北先打北线之敌，后向西、南发展，打通两块苏区的联系，使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红二十六军一部和红军游击队在陕甘边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2月18日，刘志丹起草并发布西北军委反“围剿”的动员令和作战命令。

反“围剿”斗争开始后，红军和游击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破坏敌人的分割包围。在刘志丹的指挥下，红军主力兵团抓住有利战机，在陕北对北线之敌发起进攻，在运动中相机歼灭敌人。坚守在陕甘边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牵制着敌人3个师的兵力，拔除敌人据点50余处，配合了主力红军作战。经过5个月的反“围剿”斗争，歼敌5000余人，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6座县城，打通了两块苏区的联系，使根据地发展到有30余县的广大红色区域，西北革命根据地正在逐步形成。

在陕甘边、陕北苏区反“围剿”斗争中，根据地的军事力量得到迅速发展，西北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余人，红军游击队扩大到4000余人，武器装备、政治素质、军事技术、战术水平和作战技术都有较大的提高，红军主力的正规化建设也有了较快的发展，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形成和发展的军事基础。

2.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所进行的以铲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中心的土地改革，促进了土地革命斗争的发展，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可靠的群众基础

南梁政府成立之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就已经开展了以打土豪、分浮财、废除地主债权为内容的土地革命斗争。南梁政府建立后，领导根据地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以分配地主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改革运动。南梁政府成立后按照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决议案》精神，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开展土地改革的政策和法令，其主要内容是：没收地主的土地、牛羊、粮食等财产以及富农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和财产，分配给贫雇农和少地的农民，地主家庭参加劳动的成员也分给一份维持生活的土地和财产；废除地主与贫雇农的一切地契、租息和高利贷的债务，土地和青苗一起分配；红军家

属有分配好地的优先权。红军指战员和苏维埃政权脱产工作人员参加土地分配，白军士兵暂不分配土地，应分部分暂时留作公田；根据地中心区域实行土地分配政策，边缘地区暂不分配土地，随着苏区的扩大而扩大分配土地的区域等。

为了使土地改革的各项政策得到更好的贯彻执行，南梁政府及根据地各县、区苏维埃政府都建立了土地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执行各项土地改革的政策、法令，依靠农会和贫农团，调查农村土地占有情况，宣传土地分配政策，组织和领导贫困农民打土豪、分田地，丈量核实土地，领导群众分配土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南梁中心区域1934年春开始分配土地，整个苏区的土地分配从1935年全国展开。1936年，根据地依据农户经济情况，划分了阶级成分。陕甘边区的土地革命，消灭了千百年来存在的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为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可靠的群众基础。

3.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后，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促进苏区经济建设的政策和法令，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在深入进行土地改革的基础上，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活跃苏区经济，发展生产，南梁政府依照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议案的精神，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建设和发展苏区经济的政策法令，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进行一系列成功的经济建设。其主要做法是：

成立集市，发展贸易，保护小商贩，鼓励白区小商贩来苏区做生意，以促进苏区经济的繁荣，保障苏区群众日用品的供应。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荔园堡设立了集市，为当地农民提供了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市场，集市上生意兴隆。习仲勋等领导干部经常到集市上了解情况，鼓励群众发展生产，活跃经济。对白区来的商贩，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也采取了争取、欢迎和保护的政策，并采取各种办法鼓励他们来苏区做生意，还同白区比较开明的商人建立合作关系。苏维埃政府通过他们将苏区的山货和羊畜等卖出去，把苏

区缺少的布匹和其他物资想办法运进来。一些商人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逐渐变得同情革命，千方百计地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给苏区运进货物，疏通了白区与苏区的物资流通渠道，活跃了苏区经济。

发行苏区货币，流通金融。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还印制发行了自己的货币，群众称之为“苏票”。为活跃根据地贸易经济，方便白区的商贩来苏区做生意，边区政府财政委员会在荔园堡设立了“苏票”与银圆兑换处，一元“苏票”兑换一元银圆，使“苏票”获得了很高的信誉。

鼓励农民发展生产，保障军粮供应，保证人民生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采取子民生息方针，决定对农民不征粮、不派款，对红军家属、社会残废、孤寡者实行救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的经费开支，主要向豪绅地主索取，依靠打土豪作为主要财政来源。政府在各地设立了收购站，按市价收购上市的粮食，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备。没收豪绅地主的粮食、牛羊和财产，除分配一部分给贫苦农民外，留一部分作为政府、红军和游击队的公粮、公畜。政府办了一些小牧场，把留下来的牛羊集中牧养，以备军需。苏维埃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及红军、游击队一律实行供给制，经济待遇一律平等。所有费用都由政府财政委员会筹措，统一安排，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密切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陕甘边根据地进行的经济建设，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同时也取得了根据地经济建设的经验，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4.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后积极开展新文化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社会改造活动，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十分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根据地人民群众及子女的文化水平。当时，南梁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南梁地区没有一所学校。边区政府成立以后，首先在荔园堡办起了第一所列宁小学，在校学生六七十名，校舍是没收地主的一所房子，设备十分简陋。师生们自力更生，架木板当课桌，垒土台当凳子，用石板当黑板，扫锅黑当墨汁。教材是自编的油印或手抄本。文化委员长蔡子伟自己动手为学生编写课本。这些教材通俗易懂，完全是新的革命内容，多采用顺口溜的形

式，朗朗上口，好容易记，既是文化课，又是思想教育课。以后，苏维埃政府又在根据地相继办起了几所列宁小学。南梁政府还十分重视成人的文化教育，在一些村庄办起了成人扫盲识字班，通过文化教育宣传革命思想，提高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化素质。

南梁政府还结合根据地的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广泛开展了破除封建思想，解除陈规陋习，实行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造活动。建立了禁烟、禁赌、放足委员会，发布了相应的法规，并制定了反对封建包办婚姻、反对封建迷信等条例，广泛地向根据地人民宣传禁烟、禁赌、放足的优越性，开展了以“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脚、劝男子剪辫子”为内容的“六劝”活动，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影响群众，引导群众从封建思想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同时在根据地还开展了争取社会上的“二流子”参加生产劳动的活动，对他们进行社会改造，使他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些措施对于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在革命根据地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作者：王晋林，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图书馆馆长，教授。

陕甘边根据地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 历史地位及贡献

王亚民

陕甘边根据地是中国西北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是西北第一个红色革命政权的诞生地，是西北红军的摇篮，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八路军抗日的前进出发阵地和后方保障基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指挥中心。边区进行的政权建设为新中国国家政权的建立积累了经验，边区进行的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内进行的第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边区培育的艰苦奋斗精神是中国人民取之不竭、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还是解放战争西北战场的重要依托，老区人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历史地位十分突出。

一、陕甘边根据地是中国西北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

陕甘边地区地处中国偏僻的大西北。辛亥革命以后，这里陷入军阀混战之中，各派军阀互争军政大权，各自扩充势力，占地为王。在他们的残暴统治下，人民群众在政治上毫无民主权利可言，生命安全失去保障；在经济上备受盘剥，被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加之土匪散兵横行，烧

杀抢掠；地主豪绅肆虐，良田被占殆尽；十年九旱，自然灾害频繁。广大劳苦群众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铤而走险，曾自发地结成“红枪会”、“哥老会”等组织，以“围城”、“交农罢耕”等手段，与反动官府、地方豪绅进行斗争。虽然屡遭镇压，但斗争意识和反抗精神始终不沉。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陕甘人民的反抗斗争带来了胜利的希望。从1925年至1927年，陇东的王孝锡、王晓时等，陕北的李子洲和魏野畴等共产党人，就深入农村、学校，热情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道理，先后组建起了党、团支部或特支，领导人民群众走上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但陕甘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他们勇敢地连续组织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后又打入军阀部队开展“兵运”，锻炼和培养了大批革命军事干部。从1931年起，刘志丹、谢子长等走毛泽东井冈山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在陕甘边界、陕北组建革命武装，先后成立了陕甘边界游击队（亦称南梁游击队）、陕北游击支队。后来依次发展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其间，曾在正宁寺村塬地区尝试创建革命根据地，失败后进入陕西耀县，创建了以照全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又转甘肃华池地区，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使革命形势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在陕甘边根据地人民和红二十六军的大力支援下，陕北游击战争全面开展起来，根据地不断扩大，又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之后，两块地域隔地的根据地和两支红军主力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在反“围剿”斗争中实现了连片统一，形成了总面积1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万的中国西北第一块红色革命根据地。在20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红军主力发展到5000余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①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南方各革命根据地南北遥相呼应，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使蒋介石在“围剿”江西、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的同时，不得不抽出兵力来防范陕甘，这在客观上分散了敌人的兵力，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① 庆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走进根据地》，2006年，第85页。

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自1928年四五月间由清涧、渭华、旬邑三大起义始，到1935年春粉碎陕甘宁晋四省敌人第二次“围剿”止，已经形成了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的一大块根据地。蒋介石在对长征中的红军主力进行围追堵截的同时，对陕甘红军也发动了多次“围剿”，特别是1935年8月发动的第三次“围剿”，蒋介石动用了东北军第67军和陕甘晋绥地方军10多万人，企图在中央红军主力未到达之前，将陕甘苏区一举“剿”灭。但在根据地军民的英勇反击下，蒋介石又一次遭到了惨败。陕甘边根据地原有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到1935年9月，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也辗转到达陕北，使陕甘红军的实力进一步增强。蒋介石武力“剿共”的企图更难实现。1935年10月，陕甘红军又胜利地进行了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这些军事上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甘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军事条件。

陕甘边根据地成为红军长征落脚点，还因为其具备红军立足的经济条件和地形地理条件。陕甘边根据地虽然是一个比较贫穷，经济、文化、交通都比较落后的地区，但它当时已有13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和90多万人口，又地处西北黄土高原，可耕地多，发展农业潜力大，地下又有较丰富的煤矿资源，盐的储量也十分丰富。这些经济条件可以满足红军吃、穿、用的需要，对进一步发展也有一定基础和余地。在地理和地形条件方面，陕甘根据地北面和毛乌素沙漠相连，南面延伸到渭河流域，西面紧接着六盘山麓，东面则以黄河与山西分界。这一地理位置对红军来说，北望华北，南接关中，又处在抗日的前哨，回旋余地大；且北面的无垠沙漠，使敌难于用兵，东面的黄河天险隔断了华北之敌，使红军避开了四面受敌的窘境。根据地内山峦叠嶂，沟壑纵横，交通不便，国民党军队的机动性大受限制，而红军擅长的游击战、运动战却可大显身手。这无疑为红军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提供了有利的地形地理条件。

因此，红军长征入甘后，党中央明确作出把长征落脚点放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决定，这对于还在艰苦转战，寻找立足点的红军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陕甘边大片的苏区和众多红军的存在，使广大红军指战员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从另一方面来讲，红军长征已历时12个月，天上有飞机轰炸，地

上有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有说不尽的艰难险阻，长驱二万五千里，纵横 11 个省，其兵员补充，伤病员医治，武器弹药、粮秣补给都十分困难，部队也已十分疲劳，急需一个根据地使部队得到休整，而陕甘根据地就适应了红军的这一要求。所以，把陕甘边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党中央、毛泽东从当时实际出发的正确选择和英明决策，也是红军当时的迫切愿望。

此外，红军长征到达陕甘，正是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亡之时。红军走进陕甘边根据地，胜利结束了长征，保存了红军的骨干力量，使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转移到了抗日战争的前沿阵地，获得了战略转移的立足点和开创革命新局面的出发点。中共中央将革命大本营由江南移至西北，在接近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中坚力量，从而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迅速到来，推动了全民族抗战的爆发，中国革命从此转入了抗日战争的新阶段。

很显然，如果没有陕甘边根据地作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中国革命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转变到抗日战争的兴起就会非常困难，就很难有全国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力量的空前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过的，那个时候不到陕北就没有出路，不到陕北，抗日时期怎么到华北、华中，怎么搞那么多根据地……^①一句话，红军长征落脚陕甘边根据地，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危局，使中国革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并开创了胜利发展的新局面。

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指挥中心和后方保障基地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经历了陕甘苏区、陕甘宁苏区、陕甘宁边区等几个历史过程。1935 年 10 月党中央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苏区后，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苏区发动的“围剿”，巩固和发展根据地，迎接即将到来的二、四方面军，果断进行了西征战役，解放了陕甘宁三省交界地区的环县、豫旺、同心、盐池、定边、固原等县或其部分地区，开辟了纵横 400

^① 魏文耀：《把陕甘根据地作为长征落脚点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咸阳师范学院党史研究室编，《走进落脚点》，第 98 页。

多里的新苏区。先后建立曲子、环县、豫旺（定环）、豫海、固北、定边、盐池等县级苏维埃政权，使陕甘苏区扩大为陕甘宁苏区。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陕甘宁苏区便正式定名为陕甘宁边区。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建立，边区政府驻延安，辖陕西、甘肃、宁夏3省23县，人口150万，可耕地900多万亩。党中央的到来并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驻在陕甘宁边区，使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模范根据地、新民主主义建设的试验地，成为党领导的全国抗日武装力量的指挥中心。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它为团结抗战，巩固后方，发展经济，支援前线做了大量的工作。根据地军民在极其复杂的政治环境和相当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所进行的艰苦奋斗，使根据地成为直接对日作战的八路军休整、补充、接济的可靠战略后方基地。

在经济建设方面，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竭力限制和削弱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实行“不让一粒粮、一尺布进入边区”的严密经济封锁，使根据地军民一时陷入经济财政极端困难的境地。为了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尽快改变边区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支援抗日战争，毛泽东向边区人民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号召，党中央提出走生产自救的道路，整个陕甘宁边区（含陇东根据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根据地军民在各级民主政府领导下，充分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开展劳动竞赛，纺线织布，开荒种地，养猪烧炭，增加收入。陇东老区党政组织，根据各县人少地多，可开垦荒山较多的实际情况，积极动员群众帮助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各级党政机关干部、驻军、学校师生开垦荒地，种粮棉，种薯菜，很快实现了丰衣足食。一方面供养支持了边区政府，另一方面又给抗日前线提供了大批物资，使陇东成为党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特定困难时期物资的重要征集之地。1942年到1944年的3年中，陕甘宁边区共开垦荒地200多万亩，到1945年，边区农民大部做到“耕三余一”，即耕种三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一年吃的粮食。部分做到“耕一余一”，八路军第三五九旅，除吃用全部自给外，达到了“耕一余一”。根据地军民共同努力，战胜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普遍地解决了边区人民生活 and 部队军需问题，以实际行动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为支援前方抗战，巩固抗日后方，提供了物质条件，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政治建设方面，一是有效进行了政权建设。为了更好地贯彻党提出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一步团结各阶层人民和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抗日，以维护全国的政治民主化，加速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提出了在边区经过普选，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主张，即在执掌政权的人员结构组成中，代表无产阶级和贫雇农的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中间分子及其他人士占三分之一。广泛的普选活动的开展和“三三制”政权结构的组成，有效地增强了边区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意识，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同时，坚持“还政于民”，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参加政权管理，使抗日民主政权具有广泛和雄厚的群众基础，使政权的先进性和群众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政权扎根于群众之中，更加密切了各级抗日民主政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八年抗战中，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努力生产，积极交纳公粮，参军参战，支援抗日前线。正是在他们的大力支持下，边区政权稳如泰山，八路军大后方战略基地坚如磐石。二是有效地进行了党的建设。根据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和中共中央的要求，边区各级党组织先后在社会各阶层、各阶层发展了大批党员，他们绝大多数是各抗日民众团体的骨干分子和组织、宣传抗日的积极分子。就拿陇东来说，到1937年底，陇东地区党员数量由2000多名增加到6000多名。边区各级党组织还进行了组织整顿，开展了审查党员成分、纯洁党员队伍，审查支部、健全领导，开展支部教育，提高党员素质，反对官僚主义、改变工作作风等活动，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三是加强了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培养。1942年，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了整风运动，这是对党员、干部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根据地各级党组织按照党中央的安排部署，对党员、干部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政治教育工作。虽然运动后期，出现过“左”倾错误的失误，但正是通过整风运动，使根据地广大党员、干部普遍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觉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思想认识达到空前的统一，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对干部的需要，在延安开办了中共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院、鲁迅艺术学院等。在陇东根据地组建了多达5000人的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与此同时，党中央和边区政府还选调许多陇东地方干部参加多种培训学习。毛泽东还亲自为“陇东中学”题写校名，这些学习和培训对于提高干部的军事水平、思想理论水平、文化

素质、搞好抗日根据地建设、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许多干部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成长为我们的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

在军事斗争方面，进行了以保卫根据地、维护统一战线为中心的反摩擦斗争。1939年初，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有力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和军事挑衅，以民族利益为重，采取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取得了反摩擦斗争的胜利。特别是在1939年4月，国民党顽固派调兵遣将对驻守在镇原城内的八路军第七七零团三营和驻守宁县县城的八路军警七团一营实行包围，发起进攻，企图一举消灭。我军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勇反击，打破了敌人的包围。为了顾全大局，从团结愿望出发，在打退顽固派挑起的这次镇、宁事件之后，中共中央及时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制止冲突，谈判解决问题的建议。经过反复努力，签署了《镇、宁两县事件初步解决办法》。摩擦暂时平息，但顽固派的反共立场未曾改变，又于1939年12月在陇东发动了第二次武装冲突，也称第二次陇东摩擦事件。八路军针锋相对，将国民党合水县政府及庆阳县政府第三区区署“礼送”出境，端掉了盘踞在环县甜水堡赵老五（国民党环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的老巢。^①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等将领于1939年12月25日联名通电全国，要求南京政府以民族大义为重，主持公道，制止事态扩大。同时指示陇东驻军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顽固派的摩擦行动。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和政治压力下，国民党当局只得同意谈判，通过谈判平息了事件。边区政府正式在庆阳、合水城和镇原的马鬃建立起3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并成立陇东专员公署专管这3个县。同时在边区积极开展剿匪反特除奸斗争，保障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及社会秩序，保卫了根据地，维护了统一战线。

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违背人民的意愿，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在中国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1946年6月，蒋介石向

^① 中央苏区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军事斗争》，1993年，第16—24页。

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在军事上集中兵力，对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实行“重点进攻”。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率领下，转战陕北。在取得蟠龙大捷后，挺进陇东，于1947年五六月间，发起陇东战役，在华池县和环县等地给予国民党马鸿宾部整编第八十一师以歼灭性打击。进而乘胜北上，收复“三边”，取得了西北解放战场上的主动权。

陇东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在甘肃境内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也是陕北三战三捷后对国民党军队的又一次胜利作战。整个战役历时半个多月，歼灭敌军4380余人，缴获骡马近1000匹、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一大批，有效地补充了部队。这次作战的胜利，对陕甘宁边区尔后的反击作战产生了重要影响。基本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西线的包围与进攻，扩大了陇东党政军机关和地方部队、民兵游击队活动的区域，坚定了广大军民的胜利信心，为彻底战胜敌人打下了基础。

在人民解放战争中，陇东老区军民在中共中央、中共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下，积极配合野战部队就地打击敌人，参军参战，筹粮筹草，出人出畜，采取一切办法支援前线，收复被占领区。并与中共甘肃工委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为争取西北人民的解放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这三年中，陇东解放区的群众深明大义，克服重重困难，罄其所有，大力支援前线。他们为部队交送公粮9246.75万公斤，面粉3145.2万公斤，饲草720万公斤，饲料445万公斤。为前线赠送慰劳品、粮食1000万公斤，饲料600万公斤，瓜果蔬菜165万公斤，肉、蛋3万余公斤，羊1500多只，军鞋5000多双，袜子2000多双。在战争中，陇东老区人民怀着对子弟兵的无限深情厚意，收容失散掉队的解放军官兵，掩护医治大批伤病员。1947年，新正县林区群众先后奇养西北野战军伤病员467名；华池县有个乡仅有90多户人家，就养护伤员1000多名。1949年，陇东分区在交通大道上每30华里就设一供水站，日夜为解放大西北的过路部队供应开水和食物。组织10800人为担架队员，随军转运伤员、粮草；组织800多名战勤服务队员随军修桥补路，押送俘虏。陇东分区长期担架队5250人，跟随一野部队运转5000余里，参加了解放兰州、宁夏、青海等重大战役，直至1949年11月，才全部返回家园。大批队员成绩突出，立功受奖。

总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毛泽东曾对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地位及作用作过充分肯定，他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从1936年到1948年，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人民对全国人民是有伟大贡献的。”这足以表明陕甘宁边区及边区人民在中国革命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和重大历史贡献。

作者：王亚民，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编审处副处长。

论陕甘根据地在民主革命中的 历史地位

叶晖南

历史事件的一般运动规律都会经历发生、发展、转折、完结的过程。中间还可能出现挫折或反复。研究历史的进程，找出转折点，分析其发生的原因，就容易抓住问题的纲。正如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从幼年走向成熟的转折点是遵义会议一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战略态势上也有一个从挫折走向胜利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发生地在陕甘根据地，时间从1935年10月到1937年9月。

一、并非理想的落脚点

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创建红色政权起，走上了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第一步。毛泽东在1928年10月就总结出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要素。^①这只是一个基本的认识，随着斗争经验的不断积累，党对如何建设根据地的理论逐步深化。总结出除了红色政权得以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五条要素外，至少还有三大条件必须考虑：

第一，创建苏区在地理位置的选择上，应该找到一块党的一举一动都能

^①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49—50页。

够影响一省乃至数省的地域，而中央苏区则应能够影响全国。毛泽东在长征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过，“中央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同时它在地理上还应不易被敌人封锁和切断“我们与其他苏区红军与全国革命运动之联系”以致成为“瓮中之鳖”。^①也就是说在地理环境上，要便于向外发展，而不会受阻于敌情和高山大川等天然屏障。

第二，根据地应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使红军的作战地域，兵源补充，后勤供给不成为难以克服的困难。否则任何根据地都不可能长期生存和发展。1935年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联名给红四方面军的电报，在分析当前形势时，这一思想表达得特别明确，电文指出：“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西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敌如封锁岷江上游（敌正在进行此计划），则北出机动极感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②

第三，建立革命根据地还应考虑风土民情，一般地说，革命根据地应该建立在汉族居住的地区，在革命未形成全国高潮之前或不是以民族战争出现时，在少数民族的居住区不宜建根据地。长征途中，党中央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时明确指出，“估计到少数民族中阶级分化程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我们不能到处把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③。

长征出发后，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为寻找和创建一块理想的根据地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长征之初，中央红军曾打算从南线突破敌人之封锁线后，沿赣、粤、湘、桂边境到达湘西，与坚持在湘西的红二、六军团合兵一处。这是一个北上的方针，如果能够实现，自然可以使中央红军摆脱困境，开创出新的局面。但蒋介石在湘西先机布防，使我会合红二、六军团，落脚湘西的计划无法实现。此时，“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央领导不知敌变我变的道理，硬要往敌军重兵布防的口袋阵里撞，致使红军面临巨大的危险。紧急关头，军委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挥师急取敌之薄弱环节贵州。1934年12

① 邓颖：《红军东征战略方针的提出过程及其演变》，载《中共党史研究》1986年第3期，第32页。

② 《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页。

③ 《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载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卷，第184页。

月18日，在黎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移至遵义西北地区。^①以后的猴场会议和遵义会议都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设想。也就是说，根据敌情等因素的变化，红军的战略发展方向也相应起了变化，从北上改为西进。

应当说，把长征的战略方向放到北方是没有错的，北方远离国民党的统治中心，人口和物产条件都比较理想，更重要的是离抗日前线最近，便于发动和领导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壮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力量。但是，把一个好的战略方向的选择当成一个一成不变的教条则是错误的，复杂的战争环境要求党的领导者必须随时根据敌我双方的态势及时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

第一次提出向西发展的战略方针没有实现，当中央红军向西转兵之后，数十万敌军立即蜂拥而至，从四面八方压来，中央红军被迫放弃在遵义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为摆脱敌之围追堵截，在云贵川边境展开了大规模的运动战。在这个过程中，第三次修改战略计划，把着眼点放到了四川，力图在红四方面军的配合下，北渡长江，兵进川西北，进而赤化全川。也就是说中央红军再一次把目光放到了北面。

然而，这一计划也因战局的突变未能实现。蒋介石在洞悉了中央红军的企图后迅速将他的“中央军”和川、滇军合为一股，布防长江天险。加之1935年1月底的土城战斗失利，中央红军被迫放弃北上四川的计划。2月2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告全体红色战士书》中说，“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建立根据地”^②。这是第四次修改计划，这一计划也没有实现，经过四渡赤水等一系列的运动作战之后，军委最终还是选择了先跳出敌人的包围，再图根据地的创建的战略。

5月初，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敌军围追堵截圈子，6月中旬在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党中央审时度势，第五次改变计划，在给四方面军的电报中提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建立

① 《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载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卷，第139页。

② 《党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告全体红色战士书》，载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卷，第174页。

三省的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①从这一计划可以看出，中央把眼光再次放到了北方，并有意分兵经略新疆，以获得苏联的支持和帮助。

但这个设想也未能实现，红军的战略一方面要受敌情变化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受到张国焘错误的掣肘。两军会师后，中央的方针依然是向北发展。从1935年6月26日的两河口会议到8月4—6日召开的沙窝会议，中央一再重申北上的方针。在两河口会议上，周恩来作报告，在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后，指出，只有“向北发展”的方针。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②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提出了相反的意见，他说：“此战略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并消灭了他。向东打地势限制，松潘北边情况还没有确切调查。我们去甘南还是站不稳的，还是要移动地区。”^③由于张国焘的一再阻挠，红军坐失良机，错过了打下松潘，开辟直通北上道路的机会。针对张国焘向西逃跑的战略，毛泽东在8月20日召开的毛尔盖政治局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的行动方向，一是向东（陕西），一是向西（青海、新疆）。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向东还是向西是一个关键问题，应采取积极向东发展的方针。”^④

这是第一次提出向东发展的战略方针。不过这个向东是针对张国焘的向西而言的，与之前中央向北发展的战略并不矛盾。此后中央还多次重申向东发展的必要性，但张国焘置若罔闻，在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由中央红军之一部组成的左路军只得单独行动，坚持北上，并很快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红军长征，经历了千难万险，九死一生，最终在陕甘根据地找到了一个落脚点，其历史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它为处于极端困难中的队伍提供了唯一获得休整的“家”，中国革命的火种在这里汲取到宝贵的燃料。然而，初

①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四方面军电》，载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179页。

②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87页。

③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60页。

④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第467页。

到陕甘的中共中央高层很快发现这块唯一的根据地却不是一个理想的根据地。

其原因在于陕甘根据地的现实与原来的估计有较大的出入。还在毛尔盖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党中央曾对陕甘根据地有过较为乐观的估计，以为，该地区在政治上，有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的根据地和通南巴游击区的支持，再加上中央红军便能够在短期内打开局面；在敌情上，该地区多为杂牌军，战斗力和作战经验均较差；在居民条件上，连年灾荒和阶级压迫正在酝酿着革命，且主要居民是汉族；“在物质的条件上，这个区域是西北比较富庶的区域，能够保证我们现有及继续扩大之部队的物质供给的需求”^①。但陕甘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却与原来的估计有较大的出入。

首先从军事地理上看，陕甘苏区不是一块理想的根据地。

陕甘苏区正好位于黄河的大河曲之内，它的东、西和北面都被黄河天险所包，南面又横着一条战略公路——西兰大道。这地形犹如一个巨大的口袋，进去容易，出来难。这一地域东西宽 300 公里左右，南北长 600 公里。也就是说，连同大片的沙漠在内，黄河河曲内发展革命根据地，充其量只能赤化 2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其次，敌我双方的力量也对红军极为不利。

早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前，陕甘根据地内的红军已在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1935 年间，仅为了对付进入陕南的红二十五军三四千人的队伍，蒋介石就“调集东北军、二十六军萧之楚部和十七路军共四十一个团的兵力”^②。

9 月间，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合成立红十五军团，中央红军此时正在抵近陕甘，蒋介石也差不多与此同时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同年 11 月正式成立），蒋介石自兼总司令职务。此时环绕苏区之敌竟有 170 多个团，10 余万人。其中深入苏区中心地带，时刻威胁苏区安全的张学良部就有 60 个团之多。而占据黄河一线富庶地区和主要县镇的阎锡山部，亦多达 58 个团。^③

第三，从经济条件上讲，陕甘地区赤贫千里。

① 《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协议》，载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7 册，第 187 页。

② 中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2 页。

③ 陈德，《红军东征战略方针的提出过程及其演变》，载《中共党史研究》1986 年第 3 期，第 31 页。

陕甘根据地作为一个单一的根据地，版图可谓不小，但自然条件、人口数量、物产资源都很糟糕。自然环境的恶劣给红军的后勤供给、兵员补充造成很大困难，加之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天灾人祸席卷全国，西北地区更首当其冲。国民党政府铁道部业务司商务科 1935 年出版的《陇海西兰段经济调查报告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西南线陕西段调查区域内二十五县，各县农民生活之痛苦，有非外人所能想象者，盖前数年连年灾旱频仍，五谷不登，农民无法生存，皆拆借房木家俱，及鬻买儿女，以作纳捐及糊口之资……各地交通不便，产销失其调剂，丰年谷多价贱，农民仅免冻饿，荒年谷少价昂，民食辄起恐慌，‘匪’患频发，耕稼不宁，兵家剿‘匪’，粮秣之供给，夫马之征发，无一不对于疲蔽之农民生活，加以再度之蹂躏摧残。一般农民，能得布衣粗食，足以蔽体保温者，已属厚幸；夏秋两季，农家儿女，十九裸体。”^①

中央到达陕北后，很快就看出了局势的微妙，并立即思考摆脱不利态势的方略。为应对敌军的进攻，此时中央分成前后方两组人马。毛泽东在前方主军，指挥打仗，张闻天在后方主政，思考政治路线的转变。从这一期间他们之间的电报来往上看，中央为摆脱困境，有东进和西出两种考虑。1935 年 11 月 30 日，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电报中说：“目前不宜即向宁夏，根本方针仍应是南征与东讨，东讨之利益是最大的。”翌日，他再次致电张闻天：最好是出走山西和绥远的道路。^②

毛泽东的想法是颇具战略眼光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使陕甘地区不可能有大的发展，必须选择新的战略发展方向。东出，向华北发展当时是最为有利的。在这块土地上既有山高林密，连绵千里的众多山脉，又有一望无际、良田纵横的大平原，在这里生息着中华民族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且北方民情剽悍，有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华北又处在抗战的前沿。如果党的力量能够深入华北，必将在民族战争中如鱼得水，迅速壮大。这就是为什么中央红军在到达陕北后差不多是在立足未稳的情况下就开始东征的原因。

① 张汉，〈一九三五年前后的农村状况〉（资料辑录），载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 7 册，第 308 页。

② 毛泽东：《目前根本方针应是南征与东讨》，载《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96 页。

二、“争取时间”的空间保证

东征取得了相当的利益，但未能达到把党的主要力量放到华北的目的，在山西军阀阎锡山和蒋介石的共同“围剿”下，红一方面军被迫撤回原来的落脚点陕甘根据地。事实证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单纯靠军事手段实现东进战略是办不到的，必须找到新的斗争策略。

东征回师后，陕甘根据地面临严峻的局面，根据地的东面，蒋介石的“中央军”和阎锡山的晋军正准备西渡黄河从东面压过来。南面，国民党的中央军封锁了西兰公路，集结重兵企图向北进犯。西面有宁夏、青海的20万马家军虎视眈眈，北面是千里沙漠。从战略态势上讲，1935年底到1936年初，共产党控制的最后一块根据地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口。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中共中央意识到这场斗争说到底是一场“争取时间，争取空间，争取力量”^①的较量。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三者的关系为：争取力量是党的最终目标，只有壮大党和人民的力量，才能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这个力量的来源，则取决于广大的战略空间——根据地。而争取力量，争取空间的首要条件是争取时间。这是1935年以来的国际国内形势所决定的。华北事变之后，日军大举进攻华北乃至整个中国已然是箭在弦上，蒋介石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由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剿共灭党”的方针，因此，侵华战争不仅意味着对共产党的进剿，也同时意味着蒋介石政权的生存也受到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从国民党政府的立场出发，认识到一旦民族战争爆发，共产党的发展就可能无法控制，后果不堪设想。时局、国内国际的舆论，都不允许他组织一次又一次的反共“围剿”战争，而只能“毕其功于一役”。所以他一定要在红军长征后，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进行孤注一掷的“剿共”，力图赶在日军全面侵华之前彻底解决共产党。也正因为这样，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力量必须设法坚持斗争，不被敌人削弱乃至消灭，力争在全国抗战爆发之前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因此双方在这一阶段的斗争异常激烈，错综复杂，政治的、军事的、战场上的和谈判桌上的，甚至还有来自各自内部的各种各样的斗争。这一系列的斗争都围绕着“争取时间”这个关键。

^① 周恩来，《敌人新的进攻下我们的任务》，载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446页。

如何在极端不利的战略态势下，仅凭弱小的力量赢得“争取时间”的胜利？最为重要的是党必须制定出新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①

瓦窑堡会议决议的通过标志着党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发生了转变，这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根据这一新的策略，党成功地同东北军和西北军结成了统一战线，而局部统一战线的建立，首先赢得的也是时间，它延缓了国民党军大举“围剿”陕甘根据地的部署，推动了后来西安事变的爆发。

1936年5月，蒋介石着手组织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任命陈诚为总指挥，调动了16个师又3个旅准备对陕甘根据地发动新的“围剿”。陈诚战役重演，以堡垒战术缓慢向心推进。当新一轮“进剿”开始后，中央红军对之以大规模的“西征”，避开敌军的锋芒，向西猛烈扩大陕甘根据地的面积。其目的有三：一是迎接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二是扩大根据地，以空间换取时间。有了更大的根据地，就有了更加广泛的同敌人周旋的空间，就更有利于坚持斗争；三是伺机夺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西征完成了前两项任务，三大主力军会师后，准备共同完成第三项战略目标。1936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颁布《十月作战纲领》，计划：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之其余二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

按照这一计划，红军的主力几乎有一多半西出黄河，夺取宁夏。这将意味着河东剩下的部队要承受更大的军事压力，也不可避免地要牺牲陕甘根据

^① 张闻天：《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载《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地的部分空间。当红四方面军 21800 人按计划西渡黄河之后，河东战局又生不测，国民党重兵压过来，河东红军不得不转移，无法按原计划作战，遂使河西部队成为孤军。根据战局的变化，11 月 8 日，中央军委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决定放弃宁夏战役，再度调头向东发展。

这一作战计划表明当时的局势已相当紧张，为避免被敌人围歼，红军准备放弃经历了千辛万苦才找到的落脚点，采取流动游击的方式包围追堵截的各路敌军再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战，这几乎就是一次新的长征。在这个作战计划里还能看出一个问题，整个计划没有提到建立根据地。这显然是中共的领导人意识到，在敌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围剿的情况下，建立根据地是不实际的。只能通过流动作战，争取时间。

这一计划尚未实施，中央就接到张学良的请求，希望红军再坚持一下，“熬过一、二个月”等待西北局势的变化。从政治的角度衡量，应该接受张学良的请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已经确立的政治路线。但从军事意义上看，坚持陕甘有相当大的风险。经权衡，中央答应了张学良的要求。集中三大红军主力于 11 月 21 日至 22 日在山城堡一带痛击“追剿”而至的胡宗南之一部，迫其驻足。不到一个月，果然爆发了西安事变。而西安变事的和平解决则是党在“争取时间”斗争中赢得的最关键的一步棋。此后，战场沉寂下来，国共双方在谈判桌上唇枪舌剑，从西安到南京，到庐山，不论谈得如何，谈判本身就是赢得时间。

1937 年 7 月 7 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9 月底，八路军名正言顺地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战。至此，长征胜利以来党为之奋斗的东进战略得以实现。力量弱小、态势危殆的红军最终从根本上扭转了局面，靠的首先是党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同时，也与党拥有一块面积较大的根据地息息相关。陕甘根据地是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保存下来的最后一块完整的根据地，没有这块根据地党很难生存和发展，更失去施展政策策略的平台。陕甘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虽然还不能促成全国革命高潮的立刻到来，但党依托着这块唯一的根据地，在“争取时间，争取空间，争取力量”的斗争中至少在“争取时间”这一最关键点上赢得了先机。

从这一意义上讲，西路军的失利并非错误路线所至，更不是党内斗争的悲剧。21800 名红军的浴血奋战，英勇牺牲，有力地策应了东面红军主力的行动，阻挡了西部马家军对红军的巨大威胁，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艰苦环

境下坚持了相当之久，为争取时间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一贡献事关全局，事关整个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三、无可替代的战略地位

争取了时间也就争取了空间，争取了力量。党的力量东出黄河之后仅仅用了三年，到1940年，八路军完全实现了在华北广大地区的战略展开。除原有的陕甘宁边区外又相继建立了晋察冀（包括北岳、平西、平北、冀中、冀东等区）、晋绥（包括晋西北、大青山等区）、山东（包括冀鲁边、鲁西、湖西、鲁中、鲁南清河、胶东、滨海等区）^①，八路军的兵力由出师时的4万人左右猛增到40万人，是原来的10倍。各根据地的人口（包括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开辟的根据地）约达一亿。至此，党在“争取时间，争取空间，争取力量”的斗争中完全实现了奋斗目标。

以陕甘根据地的创建为地理坐标，以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八路军东出黄河这三年为时间坐标，以整个民主革命进程为尺子，来衡量陕甘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最少能作出如下判断：

1. 陕甘根据地为三大主力红军提供了长征的落脚点，为保存革命力量以图日后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2. 为党摆脱困境，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实现东进战略提供了空间上的支持，并在必要的时候以空间换取了宝贵的时间。

3. 不利的地理位置转换成无可替代的有利地位。

由于党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陕甘根据地最初地广人稀，物产贫乏，易于被包围封锁的种种不利因素在全面抗战爆发后迅速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民族战争的角度看陕甘宁根据地，它有着得天独厚、无可替代的优越地理环境。原来犹如绞索的黄河大河套变成了防御日寇进犯的天然屏障，加之各抗日根据地的拱卫，日本侵略军从未踏上这片土地一步。而党中央却能依托陕甘宁根据地的地理之便畅通无阻地指导全国的斗争，使之真正成为革命力量的大本营。

4. 由此为起点，中国革命战争越过了“围剿”和反“围剿”的作战样

^①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中国革命战争地图选》，地图出版社1981年版。

式，抗战中大片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逐渐同陕甘宁根据地联接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再被四面包围。日后，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在战场上演变成战略防御、战略进攻、战略决战和战略追歼的作战样式。从这个意义上讲，陕甘根据地在长征胜利后的发展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在战略态势上的一个转折点，就像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转折点一样，陕甘根据地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从初创、发展、挫折到再发展、不断壮大、直至全国胜利的转折点。

作者：叶晖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副研究员。

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及贡献

熊美杰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由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统一形成的。这块根据地从其前期1932年3月建立的第一块寺村塬根据地起至1937年9月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止，共五年半时间。期间经历了无数次曲折反复，艰苦奋斗。根据地军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西北革命根据地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一、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唯一保存得比较完整的一块根据地，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依靠自己创建的武装力量，高举土地革命的旗帜，坚持武装斗争，在大江南北的广大农村先后开辟了如井冈山、中央、湘鄂西、鄂豫皖等十多块根据地。可是，一个时期的中央领导工作在“左”倾错误的影响下，使苏区党的组织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殆尽。在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各根据地红军被迫先后撤离，进行战略转移。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明方等人的领导下，抵制了“左”倾错误的影响，带领军民从实际出发，执行正确的方针政策，贯彻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围剿”，根据地不断巩

固、扩大。在鼎盛时期，西北革命根据地东临黄河之滨，西迄六盘山下，北到长城，南至淳耀。曾建立陕甘边、陕北、陕甘晋省，神府、关中特区等及所属 53 个县苏维埃政府，成为一块比较完整的较大的根据地。

1934 年 10 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撤出中央根据地，开始战略大转移，进行长征。长征途中，中央政治局曾几次召开会议讨论落脚点的问题，有的没有定论，有的虽然决定了方向和目标，但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未能实现。1935 年 9 月 20 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甘肃岷县的哈达铺。根据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陕北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9 月 27 日，中央政治局在通渭县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长征以来，这个一直困扰中央的问题，终于得到解决。当红军行进到有陕甘分界碑的六盘山顶时，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已经走过了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避免了国民党军接连不断的堵截追击，结束了一年来的长途跋涉。从此，开始了中国革命新的历史时期。

二、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是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心

1935 年 10 月 19 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至 1937 年 9 月，西北革命根据地就成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先后驻吴起镇（今吴起县）、甘泉县下寺湾、瓦窑堡（今子长县）、保安（今志丹县），1937 年 1 月 13 日迁往延安。在这里领导和指挥西北革命及全国革命斗争。1935 年 9 月 16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首先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延川永坪镇，与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西北红军合并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拉开了全国红军会师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序幕。11 月 6 日，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会师于甘泉县象鼻子湾。1936 年 9 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南部。在西北根据地军民的策应和大力支持下，10 月 9 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22 日，红二方面军的红二军团在静宁将台堡。23 日，红六军团在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全国各路红军主力汇聚西

北革命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工农红军的大本营和全国革命的领导中心。

三、西北革命根据地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完整系统形成和成功实践的基地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西北革命根据地就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此后发生的一切，无论是从时空或地点来看，都与西北革命根据地不无关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完整系统的形成和成功实践也是如此。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后，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制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接着党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掀起了要求停止内战，抗日救亡的强大群众斗争。这时的斗争目标一方面是号召民众动员起来，积极参加抗日；一方面是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投降卖国行径，总的方针和口号是“反蒋抗日”。中共中央到达陕北还不到两个月，就在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心瓦窑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制定了在新形势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瓦窑堡会议是统一战线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正确方针政策的形成。1936年5月，红军在中央机关驻地瓦窑堡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并与当时进攻红军的国民党东北军和西北军实现了停战。这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策略，已由“反蒋抗日”发展到联合各阶层、各阶级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逼蒋抗日”。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国民党停止内战。七七事变爆发后的1937年9月25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了新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这个统一战线不仅包括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等进步力量，而且包括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部分地方实力派和其他爱国分子等中间力量，还包括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顽固派。确定了在统一战线中坚持党的领导 and 独立自主原则，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执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对消极抗日的反共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的内容、原则、方针、政策等，都是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形成和施行的，在这里得到了成功的实践。

中共中央根据新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制定的新政策，或对过去所执行政策的修改和调整，也都是首先在西北革命根据地试行和执行的，有些是在这里取得经验后向其他根据地推广或提供借鉴的。

四、西北革命根据地军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

牵制了国民党大量军队，策应各路红军的战略转移。中央红军长征后，国民党蒋介石在调集兵力围堵追击的同时，又调集军队“围剿”西北革命根据地，致使其战线拉长，南北不顾。1935年2月，蒋介石调集26个团的兵力，对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根据地红军在刘志丹等领导下，经过十多次战斗，先后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定、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当年7月，蒋介石又调集阎锡山、高桂滋、井岳秀、马鸿逵等部15万人，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妄图一举摧毁根据地、消灭西北红军，使长征中的各路红军无立足之地。在刘志丹指挥下，西北红军先后取得绥德县老君殿、吴堡县慕家原寨子、定仙娥、横山等战斗的胜利，给进犯之敌以重创，使晋军龟缩在黄河东岸，不敢西犯。西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牵制了国民党大量兵力，客观上起到了减轻各路红军在长征中的压力，策应红军战略转移的积极作用。

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前夕，根据地的正规红军部队已发展到5000多人，各路游击师、游击纵队、支队总数已达4000多人，与红二十五军合编后的红十五军团，正规红军已近万人。红军和游击队的装备已有很大改善，战略战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为了扩大和巩固根据地，人民踊跃参加红军。1936年初，陕北区根据中央《关于猛烈扩大红军的指示》，接受中央下达招收7000人的任务，仅三个月时间，就有9000多人应征入伍。富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把收1000多人参加红军。陕甘军委军事部派人组织成立独立团，后编入红二十九军。短短几个月，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就达到三万多人，仅渡黄河东征的正规红军就有

1.4 万多人。这支武装力量与后来的红二、四方面军会合，成为抗日的急先锋、中华民族的精兵。

为党和国家培养造就了一批高级干部。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刘志丹、谢子长的领导和培养下，涌现出了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如习仲勋、马明方、马文瑞、阎红彦、杨森、杨琪、张秀山、张达志、王世泰、贺晋年、张策、郭洪涛、张邦英、龚逢春、刘景范、崔田民、蔡子伟、高朗亭、李赤然、王兆相等。他们不但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立下了卓著伟绩，而且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优良的传统为后来形成的延安精神打下了基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根据地形成了优良的传统，如实事求是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根据地和红军的领导者能够抵制“左”倾错误的影响，从实际出发，制订方针政策。他们领导群众在土改中，对地主不搞肉体消灭，给富农以出路；在军事战略上，坚持农村割据，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在统战工作中，团结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他们提出创建工农武装的三种形式，即：白色的（派人做争取国民党军队及地方民团的工作）、灰色的（派人做土匪武装的争取工作）、红色的（创建工农武装）。红军长期转战深山老林，餐风宿露，经常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党政军人员没有房住，自己动手挖窑洞，造土炕。为了减轻人民负担，自己动手开荒种地。又如坚定的信仰和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根据地主要创建者谢子长先后参与领导渭河起义、渭华起义，到国民党军中做兵运工作，失败了，重新起来再干，毫不气馁、动摇。全家有11人参加革命，9人牺牲，剩下老少寡妇6人继续革命不灰心。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的王泰吉，在领导麟游起义、参加渭华起义失败后，曾两度被国民党当局关押。他在临刑前赋诗：“功名不必自我成，革命实践作先锋，遗嘱同志莫顾虑，宇宙将来到处红。”体现了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精神。根据地主要创建者刘志丹，曾多次受执行“左”倾错误的领导人的排挤、打击，几次降职以至降为普通一兵。在错误肃反中，通讯员把逮捕他的密件交给了他，他完全有机会脱险。但为了不致引起党的分裂，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来到瓦窑堡，直至被捕。曾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的张秀山，红军陕北第三团团长王兆相，中共神府特委组织部长毛凤翔三人的父亲在土改中被错杀，但他们都以大局为重，毫不计

较个人恩怨，坚持继续革命不动摇，为党为人民做出了重要贡献。所有这些都为后来延安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为根据地的创建和迎接中央的到来，做出了英勇的牺牲与无私的奉献。根据地在创立和发展过程中，屡遭国民党军和反动民团的围攻，根据地内游击队和红军的指战员们不怕流血牺牲，英勇抵抗，为反击敌人“围剿”保卫根据地，牺牲的指战员和革命群众数以千计，其中突出的代表有谢子长、刘志丹、李妙斋、杨森、黄鹏、钟学高、谢绍安、杨重远、白明善、王兆卿、毕维舟、谢维俊、周冬至、王满堂等。西北革命根据地人民不会忘记这些长眠于黄土高原的英雄们。

西北革命根据地虽地域偏僻，土瘠民贫，但人民还是节衣缩食，千方百计为中央红军筹粮、筹款，各方动员做好战地勤务工作。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吴起镇农民捐粮 2.5 万斤，猪羊 50 多头只，几千斤羊毛和成百匹布。陕西省筹粮 970 余石，赤源县筹款 1600 多元。群众争先恐后地把伤员接回自己家里疗养，仅赤源县六区一次就安置伤员 200 多名。在直罗镇战役中，富县和中宜县组织了数百副担架转送伤员和军用物资。红军东征时，仅绥德、清涧两县就在 20 天内造船 60 多只，延水县出担架 1000 多副，驮畜 800 多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仅 4 个多月，陕西省妇女做军鞋 8486 双，袜子 553 双，延川县在 4 天内就赶缝军服 3000 多套。根据地内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亲如一家人的感人场面随处可见，谱写出了一曲曲动人的凯歌。“千家万户把门开，快把亲人迎进来，热腾腾的油糕摆上桌，滚滚的米酒捧给亲人喝……”这首脍炙人口的陕北民歌，就是当时情景的真实写照，至今流传，经久不衰。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军民关系，成为后来不断开展“双拥”工作的光辉典范。

作者：熊美杰，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教授。

试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几个特点

王新生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人民进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人民军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十几块根据地之一，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作用。长期以来，史学界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够重视，因而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笔者就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的特点进行一些探讨，以说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起到的独特作用。

一、积极开展兵运工作，通过兵运工作打下创建红色武装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创建过程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通过开展兵运工作，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军事骨干，为创建红色武装和革命根据地打下基础。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笔者先对比较著名的根据地的军事骨干进行一些分析。毛泽东在领导和赣边界秋收起义时，起义军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即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湖南平江、浏阳和湖北崇阳、通城的农军，江西安源的煤矿工人。上井冈山后，又有袁文才、王佐的绿林武装加入。再后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

起义农军上井冈山会师。可以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军事骨干主体来自原国民革命军和两湖尤其是湖南的农民运动骨干分子，少量来自工人和绿林武装。再看鄂豫皖根据地，最初是中共黄麻特委组织的黄安、麻城农民自卫军举行起义，建立黄安县农民政府和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后上黄陂木兰山开展游击战争发展起来的。方志敏等建立的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是领导弋阳、横峰地区的农民起义，建立革命武装和政权发展起来的。左右革命根据地，是邓小平等领导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起义，与韦拔群领导的左右江农军结合建立起来的。从上述分析可以明显看出，这些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在北伐战争经过地方，是工农运动的中心地带，尤其是农民运动开展得比较猛烈，军事骨干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原国民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其二，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和骨干；其三，进入革命队伍经过改造的绿林武装首领。

地处中国西北的陕甘两省，与上述党在南方建立的革命根据地省份党的力量、所掌握的武装、群众的觉悟程度以及敌人方面的情况等等，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从事武装斗争、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也有着很大不同。其军事骨干主要来自从事兵运工作的人。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迅速派代表赴中共中央请示工作，及时获得了中央的指示和八七会议文件，并在1927年9月26日至27日召开省委扩大会议，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作出《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同时还作出了《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农民斗争决议案》、《军事运动决议案》等，提出了“党到农村去”，积极开展农民运动，“用各种方式武装农民……必要时可以上山”，积极准备武装起义。1927年10月，唐时、白乐亭、谢子长领导了渭河起义。1928年5月，唐时、刘志丹领导了渭（南）华（县）起义。与渭华起义同时，陕西党组织还在旬邑、礼泉、淳化、三原、澄城等地发动和领导了农民起义，但很快都失败了。

1928年秋，中共陕西省委派刘志丹、谢子长参加陕北特委工作。1929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举行扩大会议，研究加强武装斗争等问题。刘志丹批评了特委书记杨国栋要党员都隐蔽起来停止活动的错误观点，提出“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主张。会议决定以做兵运工作为主，创造红军，并决定刘志丹任特委军委书记。会后，特委和各地党组织先后派出大批同志

到陕北、甘肃、宁夏等地驻军中从事兵运工作。

事实证明，中共陕北特委决定以大规模开展兵运工作作为开展武装斗争的切入点是正确的。兵运工作，是共产党从事武装斗争的重要手段之一。1928年5月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共军事工作的训令》指示中共中央建立军事部，并要求在军事部下设三个部，其中第一个部便是“对敌人军队工作部”，首要任务是“在军阀军队中工作”。“目的是破坏军阀的军队，加强党在军队中的影响，使士兵群众倾向到革命方面来。”具体方法为：

“（1）尽力设法在各军阀军队中登记（抓取）同情我们的士兵。

（2）在最可靠的及已登记的士兵当中设法组织同情共产党的士兵小组或支部。

（3）吸收受到相当训练的士兵加入共产党，并在这部分的兵士中组织共产党支部。

（4）应当特别设法在军官与下级军官中工作，但在组织上不能因对军官的工作而束缚了我们对兵士的工作。某部分军队的军官，虽然比较的可靠，但如果他不是共产党员，则不应当使他知道在他的队伍当中那部分兵士已经有了组织。

（5）至于对高级军官的工作，只有在使各军阀间的冲突加剧的路线之下才可进行。

（6）为达到团结士兵的目的，可以利用他们的乡土观念（同省、同县、同乡），有是或者氏族观念。

（7）包括海陆军士兵的广大的群众的组织的形式，或者是‘革命兵士海军联合会’，或者是其他类似的组织。

（8）按照党的纪律，派遣一部分党员到军队中充当士兵及军官（经过军阀的军事学校），同时，党应保证对他们的领导。

（9）特别要注意我们潜入兵工厂及武器库的问题，在这些地方我们的影响应当要很有把握，最主要的是党能够抓住那里的工人。党的中央及地方委员会对这种工作应当特别注意，应该特别用一支强有力的力量做这种工作。

（10）必须在警察中进行工作，如果我们在警察中能有组织的影响，则警察恰好是我们取得武器较易的来源。

(11) 必须在商人武装(商团)中进行组织工作,因为商团亦似警察一样,是我们取得武器较易的来源,特别是在即将暴动的时候。”^①

共产国际把兵运工作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当时在指导思想虽然含有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经验、以城市工作为中心的成分,即希图通过兵运工作将军阀部队搞垮,举行起义,一举占领中心城市,迅速取得革命在一省或数省乃至全国的胜利。但是,其提出的关于兵运工作的具体方式和方法,对中国共产党从事兵运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负责军事部工作的周恩来对兵运工作十分重视,他在中共六大作的军事报告,把兵运工作作为此后党的军事工作的九个方面的第一位,具体提出:“在反动军队中,应有秘密支部建立。以连为建立支部单位,人数多则成立支分部”;“对工农分子入伍,应有组织地有计划地有训练地大批入伍”;“在乡村地主的武装组织有民团、保甲,成分是贫农、流氓,本身带革命性,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可取得一部分力量”。并认为:“中国下级军官很多从士兵中提拔起来,因此生活与士兵差不多,下级军官亦有从小资产阶级出身,富于革命情绪……容易走到革命方面来。”要求“从敌人吸收革命的青年军官成为革命军队的人才”。周恩来还特别强调:“有计划地把军队兵变能与工农武装暴动相配合,或仅与乡村农民游击战争相配合,或与城市工人暴动相配合”^②。

可以明显地看出,周恩来在贯彻共产国际关于兵运工作的指示时,不是机械地照搬,而是有发展。其一是根据中国农村存在地主武装民团的实际情况,提出党要到其中去工作;其二是认为反动军队中的下级军官多是由士兵提拔起来的,富于革命情绪,可以吸收而成为革命的军事人才;其三是强调兵变必须与工农武装暴动、与农村游击战争相配合。

1929年中共陕北特委在研究武装斗争问题时,决定以兵运工作为主,正是在贯彻中共六大精神的基础上作出的。对此,张秀山曾在回忆中说:“当时,陕北特委对兵运工作很重视。一九二九年刘志丹同志任陕北特委军

①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共军事工作的训令》，1928年2月4日，载《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429—43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0—33页。

委书记，他遵照党的‘六大’精神，积极动员陕北党员到地方军阀井岳秀、高志清部队以及‘后湫天’土匪武装中开展兵运工作，争取抓到武装力量，准备组建红军游击队。随后，特委又向宁夏苏雨生部派了许多党员去作工作。……在志丹、子长等同志的领导下，西北党的军事活动进入了风起云涌的阶段，打下了三二年创建红色武装的基础。”^①

当时陕甘两省作兵运工作是有有利条件的，自冯玉祥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成为新军阀之后，于1928年6月与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等派系联合“北伐”奉系张作霖，其主要兵力进入到河南和山东一带。其后，冯玉祥在1929年5月和蒋介石发生了战争，失败后又与阎锡山联合，于1930年5月至10月同蒋介石发生了中原大战。冯玉祥部参加新军阀混战，属于自己后方的陕、甘、宁等省兵力空虚。在冯玉祥部控制力减弱的情况下，陕、甘、宁边界地带的小军阀如苏雨生、谭世麟、陈珪璋等乘机扩充自己的力量，为共产党员打入进去提供了机会。尤其是原为冯玉祥部将的杨虎城在蒋、冯、阎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背冯投蒋，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革命军讨逆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兼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赶走了西北军系统的省政府主席刘郁芬，掌握了陕西省军政大权。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杨虎城基本上统一了陕甘两省。杨虎城势力在陕甘两省的崛起，给中国共产党在杨虎城部开展兵运工作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针对冯玉祥退出陕、甘等地，杨虎城主政陕、甘，并和各小军阀不断发生混战的情况，1931年1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在《陕西党的目前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中提出：要建立军阀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军阀军队里我们的力量，十倍加强我们在这些军队里的工作，发动和领导兵士日常斗争，并要求各地党组织建立中心部队的工作，加强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在农民斗争剧烈的区域内，特别注意兵士斗争与农民斗争的配合。^②在这个指示下，大批共产党员到杨虎城部作兵运工作，第十七路军的第十七师、第四十二师、第五十八师，以及警备旅、骑兵团、炮兵团等，都有共产党作兵运工作。

① 张寿山：《甘肃、宁夏兵运工作回忆》，载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甘肃党史资料》第3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

② 参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共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2页。

从1929年春夏到1933年7月，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先后领导了数十次兵变或起义。笔者认为，这些兵运工作为陕甘红军游击队的建立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辟起到了以下作用：

1. 建立起陕甘边党领导下最初的武装

1930年初，谢子长、刘志丹等带领几十人，来到宁夏苏雨生骑兵第四师开展兵运工作。谢子长任第十旅旅长，刘志丹任第八旅第十六团副团长。同年春，苏雨生在军阀混战中失败，谢子长、刘志丹脱离苏雨生部队，来到甘肃庆阳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开展兵运工作。谢子长、刘志丹以谭的名义，在甘肃庆阳、陕西定边、保安（今志丹）的结合部三道川招募农民组建一个团。谢子长任团长，刘志丹任营长。同年夏，由于投靠谭世麟也被编入第三团的土匪张廷芝叛变，第三团被打散。同年10月，刘志丹又借谭世麟部骑兵第六营的名义，奇袭合水太白镇，将谭部第二十四营缴械，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在南梁一带活动。这支游击队的成立，揭开了陕甘边武装斗争的序幕。

1931年2月，刘志丹率部在合水县固城与赵连璧、阿守孝、贾生财、唐青山等人的武装会合，并进行整编，刘志丹任总指挥。不久，游击队向宁县转移，途中遭到敌人袭击，刘志丹率100余人到达宁县麻子掌一带活动。4月，刘志丹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率部编入驻彬县的杨虎城警备旅苏雨生部，任补充团团长，准备扩大部队，待机打出红旗。苏雨生觉察到刘志丹的行动后，将他逮捕。中共陕西省委通过南汉宸、杜斌丞，将刘志丹营救出狱。刘志丹出狱后到国民党陈珪璋部，以第十一旅旅长的名义继续从事兵运工作，但再次遭到挫折。

9月，刘志丹借马锡五等先后到南梁地区，将活动在这一带的贾生财、赵连璧、杨丕盛等三支武装进行整编，恢复了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10月下旬，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队和杨仲远、阎红彦率领的陕北游击支队在林锦庙会师。11月初，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来到南梁，与刘志丹一起领导这支革命武装。1932年1月初，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陕北游击支队改编为第一支队，南梁游击队改编为第二支队。1932年1月，中共陕西省委派军委书记李杰夫来到西北

反帝同盟军，传达省委决定：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2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治委员。

经过刘志丹、谢子长等艰苦的兵运工作，陕甘边终于建立了党领导的红军游击队。这是此后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力量。

2. 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军事人才

在土地革命之前，党没有自己的军队，只有一少部分人在国民革命军中工作，产生了最初一批军事人才。大革命失败后，陕西党组织动员在敌军的力量，先后组织和发动了渭河起义和渭华起义。但两次起义先后失败，原先积累的军事人才受到严重损失，只剩下刘志丹和谢子长等少数人。这与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任务是很不适应的。因此，继续开展武装斗争，还要有一个积蓄力量和培养军事人才的过程。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西省委先后作出开展兵运工作的决定后，一批共产党员相继到甘肃、宁夏地方军阀和杨虎城第十七路军中开展兵运工作，起到了积蓄和培养军事人才的作用。当时，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党员，受到反动政府的通缉无法立足，进入军阀部队后，反而可以暂时安身。1931年春，刘志丹、谢子长打入苏雨生第四师后，中共陕北特委曾选派数十名学生到该部，并在第八旅第十五团举办了学兵队。第十五团副团长张东蛟（共产党员）兼任学兵大队大队长，高岗任分队长，学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其中有张秀山、贺晋年、高鹏飞、黄培中、李培清、李树林等。学兵队不仅学习军事课程，而且经常开学习会、辩论会，上政治课，讨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问题，讲马列主义原理。中共六大制定了党的“十大纲领”，由于秘密环境，张秀山和黄培中凭记忆只凑出了九条，但对中共六大关于中国革命性质、动力、任务、前途的基本内容还是清楚的。^① 这些学兵毕业后大部分当了连排级军官，在实战中军事素质也有较大提高。可以说，陕甘兵运工作，既形成了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核心，也形成了张秀山、贺晋年、马锡五、高鹏飞等一批骨干，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

^① 张秀山：《甘肃、宁夏兵运工作回忆》，载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甘肃党史资料》第3辑，第51页。

起了重要作用。

3. 为红军游击队的发展提供了兵源

兵运工作不仅建立了陕甘边党领导的最初武装，也给陕甘红军游击队的发展提供了兵源。1932年7月9日，曾是党在苏南生部举办的学兵队学员高鹏飞、杨林等，领导驻合水西华池的杨虎城部新编第十一旅特务营两个连起义，与陕甘红军游击队会合，小部分被编入陕甘红军游击队骑兵队，大部分被编为第三大队，高鹏飞任大队长。这次起义是党在甘肃地方小军阀部队长期进行兵运工作的结果，壮大了陕甘红军游击队的力量。1933年6月21日，时任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兼红二团政治委员的杜衡推行“左”倾冒险方针，武断地要红二团离开照金苏区南下渭华。结果，红二团于7月在终南山失败。红二团南下后，照金苏区危急。就在这时，共产党员王泰吉率领陕军骑兵团1200余人于7月21日在耀县起义。起义遭到敌人围攻失败，但余部100余人在王泰吉率领下进入照金苏区，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成为照金苏区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于坚持和发展陕甘边游击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4. 获取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

从事武装斗争，建立自己的军队，光靠大刀、长矛、鸟枪、土炮是不行的，必须拥有武器弹药，否则，只有失败。红军初创时期，尚不能自己制造武器弹药，获取武器弹药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战斗中从敌人手中缴获，其二是从事兵运工作，有计划地派人打入敌军，从而获得武器弹药。陕甘红军游击队的武器，最初基本上是后一种方式获得的。

二、注意开展统战工作

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但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受斯大林“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观点的影响，在实践中犯了关门主义错误，把应当争取和可能争取的广大中间阶级和阶层推到敌人的一边。尤其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兴起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中央本应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剧烈变动的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但是，王明“左”

领错误统治下的中共中央，未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制定出正确的战略策略方针，而是继续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方针。他们虽然也讲统一战线，但排斥一切上层分子，排斥一切中间势力，只要兵不要官，即所谓的“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他们还粗暴地指责党内注意到和承认中间势力并表示愿意与之合作的同志，是做了国民党各派和其他各派的俘虏。

“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下的中共中央犯关门主义错误最典型的例子是對待福建事变的態度。1933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鼐联合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陈铭枢以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黄琪翔等，发动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这时已迁到中央苏区的中共临时中央，如果对这一事变能采取正确的策略，对粉碎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将极为有利。但中共临时中央由于继续把中间势力看作“最危险的敌人”，坚持执行关门主义的错误方针，没有在军事上给第十九路军以直接有力的配合，坐看第十九路军失败，失去了中央苏区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军事“围剿”的有利战机。

而这时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刘志丹等领导人从实际出发，十分注意统战工作。当时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仅要面对国民党军持续不断的“围剿”、“进剿”，同时也要面对根据地内的民团、土匪以及哥老会、红枪会、扇子会等会道门各种势力。根据地军民主要是对付国民党军队的围攻，同时也要肃清反动民团的势力，并处理好同各种社会势力的关系。这样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进剿”，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

根据民团对红军游击队的不同态度，刘志丹认为要区别对待，“凡与我军为敌对抗，我有力量消灭的，坚决消灭，暂时消灭不了的，待我力量壮大，再消灭之；凡向我军表示友好共处，或愿保持中立者，则尽量继续争取他们，维持现存关系，以便我军集中力量，消灭最顽固最反动的民团武装”^①。按照刘志丹的意见，红二十六军同盘踞在庙湾一带的夏玉山（夏老么）建立了统战关系，并通过夏玉山购买过几批弹药和物资。1933年1月中旬，红二十六军派李妙善为代表，同夏玉山谈判，双方约定：“两家继续

^① 夏玉山，《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忆述》，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280页。

交朋友，互不侵犯，互通情报，互行方便。”^① 这是一次成功的谈判。但推行“左”倾盲动错误的红二十六军领导人杜衡不顾刘志丹等人的反对，命令红二团攻打夏玉山部，不仅使红军遭到严重失利，而且还破坏了同夏玉山刚刚谈成的约定，致使夏部参加了国民党军对照金根据地的进攻。好好的一个统战关系，就这样被“左”倾盲动者断送了。

针对陕甘边根据地内土匪的情况，党和苏维埃政府制定的政策是：“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坚决彻底消灭”，“为群众所痛恨无法争取的惯匪……也予彻底消灭。”除上述两情况外的“一些土匪则采取一切办法争取改造他们”，^② 在这个方针之下，红二十六军对政治土匪张廷芝部和惯匪杨谋子部进行了坚决打击，而对贫苦农民出身、被逼投身绿林的黄龙山“山大王”之一郭宝珊进行争取工作。1934年10月，郭宝珊在庆阳新堡率两个连起义，参加红军。1935年10月，郭宝珊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内，哥老会很多。哥老会大多讲义气，与红军、游击队有关系，并提供过不少帮助。根据地党和苏维埃政府对他们采取争取政策，而对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则发动群众清除，不直接进行干涉。另外，扇子会、红枪会、硬肚、软扇等会道门在陕甘革命根据地内也相当多，其中成员多为贫苦农民，虽然迷信，但对统治阶级都有反抗性。根据地党和苏维埃政府逐步争取和改造他们，建立地方游击队，为红军补充兵员，对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全党处在“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统治下的时候，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采取统一战线策略，是非常可贵的。其统一战线实践经验，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三、实行以南梁为中心建立三路游击区的发展战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需要有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式。如果发展方向、发展思路和发展方式不符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就会受到挫折。如果发展思路、方向和方式是正确的，根

^① 张西山：《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忆述》，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321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259页。

据地就会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实行“狡兔三窟”，以南梁为中心建立三路游击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所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中一种独特的发展方式。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充满了艰难曲折，一方面是受到“左”倾盲动错误的干扰，另一方面根据地的发展，也有一个逐步符合斗争实际的过程。陕甘红军游击队成立后，先是建立了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继而创建了照金根据地。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存在了5个月，照金根据地存在了10个月。这两个根据地丢失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先后任中共陕西省负责人和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的杜衡推行“左”倾冒险错误，指责刘志丹等在山区建立根据地是“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不顾客观实际情况要求红军去平原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但是，这两个根据地面积小，红军在里面没有回旋余地，也是一个原因。寺村塬根据地范围只有72个村镇，照金根据地稍大些，也只有南北长80余里，东西宽50余里。由于根据地面积狭小，敌人来“围剿”或“进剿”时，红军没有回旋余地，只好转到外线作战。红军到外线作战，没有根据地为依托，而根据地内虚，很难内外配合，打破敌人的“围剿”。

1933年11月上旬，根据刘志丹的建议，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划分三个游击战略区，并组建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陕北为第一路游击区，以安定为中心；陇东为第二路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关中为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在三路游击区中，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沿桥山子午岭山脉向南北发展。

南梁位于陕甘交界桥山山脉的中段，方圆几百里，沟壑纵横，林深树密，回旋余地大，便于红军游击，进可直逼关中，退可扼守山林，易守难攻。东北可取陕北，群众受革命影响较深。因此，从地理上和群众条件上讲，南梁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地方。以南梁为中心，以照金和安定为两翼拱卫，以南北为发展方向，这是经过一年多创建根据地的艰苦奋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层总结寺村塬、照金根据地的经验教训制定的符合实际、思路清晰、方向明确、方式正确的发展战略。

经过红二十六军和地方红军、游击队的艰苦作战，到1934年2月，在陕甘边界地区，以南梁为中心，东西约200公里，南北约150公里的根据地

开始形成。

毛泽东对刘志丹等建立三路游击区的发展战略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①

上述几个特点说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和陕甘党组织在领导创建陕甘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坚持从当地实际出发，不懈努力，善于总结经验教训，善于创造，善于制定革命发展战略，创建、巩固和扩大了这块根据地，并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连在一起，形成陕甘革命根据地（也称西北革命根据地），为此后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也为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提供了抗日的出发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历史经验是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世纪、新的历史阶段，仍然闪烁灿烂的光辉，需要继承和发扬。

作者：王新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处长、研究员。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忠心耿耿 为党为国》，载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 页。

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模式

——陕甘边根据地的特点研究

占善钦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创立了十多个革命根据地，其中以毛泽东、朱德等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中央根据地最为出名，逐步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根据地的斗争中，毛泽东总结了根据地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同时对各根据地的特点也予以注意。1930年1月，毛泽东就指出：朱德毛泽东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无疑义地是正确的。^① 这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对“李文林式”、“方志敏式”等根据地的特点研究都有不少成果，而对其他地区的根据地研究明显偏弱。

陕甘边根据地的特点就较少有人研究。陕甘边根据地是20世纪30年代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领导陕甘边人民创建的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北方最早的苏维埃区域。这块根据地后来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完整的红色区域，不仅有力推动了中国北方特别是西北地区各民族的革命斗争，更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实现历史性转折做出了巨大贡献。可见，陕甘边根据地在中共党史和解放军史上具有极为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北方局1944年版，第139页。

重要的地位，其特点很值得深入研究。

一、在流动中不断壮大

陕甘边根据地在全国革命根据地中，具有罕见的流动性，并在流动中不断壮大。1936年，毛泽东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其中就指出：“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其区域开始是非常之小，后来也并不很大。而且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这种领土的流动性，完全是来源于战争的流动性。”^①这一对根据地流动性的论述，在陕甘边根据地体现得十分典型，集中体现在流动时间长、流动幅度大。具体来说：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历时6年之久，并经历了以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为活动中心的三个发展阶段，其中寺村塬、南梁两个阶段在甘肃境内，照金阶段在陕西境内。

1. 寺村塬阶段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就先后派刘志丹、谢子长等一大批党员和进步青年在西北地区进行兵运、起义等武装斗争，多次努力都最终失败了。对此，刘志丹认为：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象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②。1930年，刘志丹利用担任陇东民团军骑兵营长之机，领导了太白起义，建立了革命武装，并经过努力，在1931年9月，成立南梁游击队。1932年1月，部队改称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又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开始执行游击战争的行动纲领，4月在正宁县寺村塬组建赤卫军和农民联合会，建立红色政权——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15人，常务委员7人，李杰夫任主席，下设土地、肃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0、229页。

② 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第3版。

反、财政、食粮等委员会，后来虽然没能存在下来，但是一次重要的学习和实践，影响深远，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在陕甘边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之际，陕西省委批评陕甘红军游击队在山区建立根据地是“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要游击队到自然条件较好的平原地区去创建根据地。1932年6月，陕甘游击队撤离寺村塬，东进陕西韩城地区，遭受挫折后又返回寺村塬。7月下旬，陕西省委派省委常委李艮任游击队政委。李艮到游击队后，大批所谓的“机会主义领导”，并在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的情况下，派出战士在五顷塬分配土地，限期20天内分配完毕。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李艮把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理解为军事上的死守和强攻硬拼，致使游击队接连失利，被迫撤离寺村塬，根据地丧失。

2. 照金阶段

陕甘游击队撤离寺村塬后，分兵游击，发动群众，筹集粮款，补充队伍，渡过了难关。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开赴宜君县转角镇，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陕西省委“左”倾领导人杜衡主持这次改编，大力批判陕甘游击队的“右倾机会主义”，逼迫谢子长、阎红彦等离开部队，对刘志丹降职使用，自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红二团成立后，坚决执行陕西省委的指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肩负起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新根据地的重任。到1933年三四月间，红二团在战斗中连连取胜，群众斗争蓬勃发展，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先后建立。4月5日，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召开，选举产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在这前后，还成立了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等。照金根据地初步形成，其地域以薛家寨为中心，东达胡家巷、高山槐，西至黄花山、七界石、马栏川，北达桥头川、伍房川，南到桃梨原、高尔原、老牛坡，地跨耀县、旬邑、淳化3县边界，方圆数十里。^①

正当革命形势不断好转之时，杜衡坚持错误路线，于1933年6月强令红二团南下渭华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结果遭到数十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的

^① 刘凤阁、任惠吉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围追堵截，几乎在终南山全军覆没，杜衡也被捕叛变，陕西省委遭到破坏。陕甘边区的党和人民经受了这一严重考验，新成立的红四团、耀县三支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补充进来，加强了军事力量。8月，陕甘边区特委在陈家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重新组建主力红军的问题，并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10月上旬，总指挥部决定红军主力转外线作战，以粉碎敌人的“围剿”，虽在战斗中取得重大胜利，但照金留守的军民寡不敌众，坚持到10月中旬后被迫突围，照金随之陷落。

3. 南梁阶段

为解决革命面临的困境，明确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于1933年11月在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联席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分析斗争形势，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确定了刘志丹数次提出的以南梁为陕甘边区革命活动中心等建党、建军、建立根据地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方针，勾画出了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基本格局。包家寨子会议后，陕甘边区党和红军立即投入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4年2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四合台恢复成立，习仲勋当选为主席，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军事、文化等委员会，行使根据地临时政权的职责。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临时革命政权转变为苏维埃政权的条件逐渐成熟。11月，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正式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习仲勋当选为政府主席，刘志丹任军委主席，朱志清任赤卫军总指挥。这标志着陕甘边根据地的确立，是陕甘边乃至西北革命斗争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935年2月，在革命形势的发展下，同时也为应对国民党的重兵“围剿”，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安定县周家峪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正式统一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党政军的领导。这使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很快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其中，陕甘边根据地的范围“东到临真镇，南到淳化、耀县，西到庆阳、环县，北到定边、靖边，面积达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近80万；下辖南区、东区和中心区三个行政

单位。中心区包括华池、赤安、庆北、合水、安定、安塞等县，南区辖正宁、宁县、旬邑、淳耀、三原等县，东区辖甘洛、中宜、富西等县^①。

二、在勇于探索的同时顾全大局

1943年4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指出：“刘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之斗争”，使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这对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努力探索建立陕甘边根据地的艰辛历程，做了高度的评价。

1. 在与上级的探索分歧中顾全大局

早在1931年秋，刘志丹、马锡五曾经在桥山山脉中段南梁一带作过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认为这里是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建立根据地有许多有利条件。但是，当时“左”倾错误指导下的陕西省委坚持南下关中，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一再否决刘志丹的意见。1932年6月，陕甘游击队东进韩城作战失利，转移到正宁一带休整。部队领导人讨论下一步行动方向时出现分歧，有的主张南下，有的主张北上。陕西省委派来的政治委员李杰夫提出：愿南下者跟他们走，愿北上者跟刘志丹走。这一分歧，反映了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而且处理不好可能造成分裂。刘志丹、阎红彦等同志都反对“分家”，最终决定就地开展游击活动，伺机向南北发展，从而坚持了团结，对陕甘游击队的巩固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陕西省委长期以来坚持到平原地区开辟根据地的指导思想，最终还是给陕甘边区带来极大损失。1933年6月，陕西省委“左”倾领导人杜衡不顾刘志丹等人的反对，强行作出南下渭华的决定。而在部队渡过渭河之前，杜衡以向省委汇报工作为名离队，后被捕叛变，陕西省委遭到破坏。由陕甘游击队改编而成的红军第二十六军红二团在渡过渭河后，进退维谷，团党委有人主张前进，有人主张后退，意见不一。刘志丹最后说：杜衡是坏人，我们

^① 唐成祥、黄兆安主编，《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10页。

自己搞起来的队伍，他硬是要我们自己去搞垮，我们唯一的任务，是设法保全部队，现在只有前进了。^① 部队继续前进，虽经英勇奋战，但众寡悬殊，几乎全军覆没。这次失败，再次从反面为建立根据地问题指明了方向，同时陕西省委被破坏，也在客观上排除了“左”的错误指导，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红军顽强地在绝境中奋起，决定以南梁为中心建立根据地，从而迎来了陕甘边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2. 在内部的探索分歧中顾全大局

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过程中，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依照陕甘边的实际运用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在根据地内外实行了一套正确的政策。尤其是在白色恐怖包围下，能正确对待哥老会、烟商、民团等社会力量，充分利用敌人阵营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哥老会采取争取政策，因苏区哥老会的人很多，大多讲义气，对我们有过不少帮助，并与我们有长期的关系，如其中有反革命分子，要发动群众去清除，不要直接出面干涉，对扇子会、红枪会、破肚、软扇等会道门组织，则采取争取政策，这里各种会道门在苏区内相当多，他们虽然迷信，但都还有反抗统治阶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能改造他们。^② 在刘志丹的教育启发下，苍沟哥老会头目冯大爷、东坪冯大爷、小石岩民团团总罗连城，都为革命做过许多好事。原青海军区副司令员郭宝珊本来是黄龙山的“大王”，刘志丹等同志多方面做工作，终于把他引上革命的道路，他还立了许多战功。有的同志对刘志丹等的正确主张很不理解，不断提出非难，甚至进攻与红军有统战关系的民团。刘志丹耐心解释道：“干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③

遗憾的是，这样的非难和猜忌最终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不必要的损失。1931年，刘志丹在改造土匪、民团武装的基础上成立南梁游击队。1932年，在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不久，部队一些领导人认为由南梁游击队改编的二支队成分不纯，部队不稳，缴了二支队的枪，

① 《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讨论稿）》，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室1982年印，第70页。

② 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第409—411页。

③ 《刘志丹年谱》，载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第760页。

解散了二支队，打死了几个人。事件的发生还使一支队部分人员惊慌出走。对于这次事件，198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其中指出：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①

3. 在与兄弟党组织和友军的探索分歧中顾全大局

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红军，不仅对上级的错误指导和内部的错误纷争都以大局为重，而且对待兄弟党组织和友邻红军也同样是顾全大局。1934年7月，谢子长、郭洪涛率陕北游击队主力转战来到南梁，陕甘边、陕北两地领导人在南梁刘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会上宣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信，信中不切实际地指责红二十六军领导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桐山主义”，说部队组成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有人还做了支持这些错误指责的发言。对此，陕甘边区的与会人员有些议论，但考虑到他们是由兄弟党组织陕北特委派来的，觉得是在重复北方代表指示信中的内容，不解决实际问题，所以没有展开议论。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陕甘边特委委员张策等同志后来找陕甘边特委书记张秀山和刘志丹说：“怎么陕北管起陕甘边的事了？”^②张策后来还回顾说：“我那时虽然不大晓得其中的是非曲直，但我知道，自从1933年陕西省委被破坏后，陕甘边特委一直没有上级党的领导，而且这期间，中央和北方局都没有派人来这里检查过工作，就是我们的邻居陕北特委，也没有派人来过这里。那么这些批评到底来自何人何地呢？这不能不使人奇怪。虽然受到了一大堆批评指责，陕甘边特委的领导同志还是本着革命友谊赠送了许多枪支经费，特别是把红四十二师政委的位置让了出来，由谢子长暂时代理，并派红

① 《关于西北红军战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载《党史通讯》1986年第8期。

②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

四十二师的部分主力红三团到陕北协助作战。”^①

阎家洼子会议虽然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但因陕甘边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顾全大局，会议的主导方面还是积极的，加强了陕北和陕甘边两地党组织和红军的联系，并派出红三团北上作战，对陕北根据地有很大帮助。这也为以后两支红军的联合，两个苏区的统一打下基础。郭洪涛后来也说：会议决定谢子长担任红四十二师政委，并派红三团北上，同陕北游击队一起活动，“对于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不采取这一果断的战略措施，仅仅依靠陕北武装的力量去粉碎敌人的‘围剿’，确实是有困难的。”^②

总之，在陕甘边根据地创建的艰辛历程中，由于党处于幼年时期，党内指导思想出现几次“左”倾错误，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依照当地实际来运用马列主义原理的探索，遭到了来自上级、内部、兄弟党组织和友邻红军的错误指责，但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红军以革命事业的大局为重，服从党的纪律，维护党和军队的团结，在实践中努力奉献，以探索结果来证明是非曲直。周恩来当时评价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诚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③李维汉也评价道：刘志丹“明知个人会有危险，但还是顾全大局，服从纪律”^④。

三、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根据地建设

刘志丹牺牲后，毛泽东曾在一次大会上这样说道：“联系群众这一条，也要用客观标准来衡量。比如，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论定，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刘志丹同志牺牲

① 张策：《我的历史回顾》，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49页。

② 郭洪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北革命斗争史实回忆》，载《陕西文史资料》第12期，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页。

③ 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载《人民日报》1979年9月16日第1版。

④ 《李维汉同志谈陕甘宁边区党史的几个问题》，载《党史资料通讯》1981年第5期。

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① 这既是对刘志丹联系群众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刘志丹领导的陕甘边根据地群众工作的认可。以刘志丹为领导的陕甘边根据地，不仅代表人民群众利益顽强英勇地进行革命斗争，而且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根据地建设，从而获得群众的广泛拥护。

1. 开展土地革命，满足农民土地要求，减轻农民负担

陕甘边区土地比较集中。南梁一带 69.2% 的土地是地主的，67.1% 的农户是租户。这里出租土地 1.8 万余亩，每年收取租粮四五千石。1930 年，环县的各种摊派名目有 120 余种。不可思议的是官府竟然强迫农民种植鸦片，以便征收“烟亩罚款”，不种者则征收“懒款”。在边区更加特别的是剿赤捐，只在王郎坡附近几个村子，每日除供给国民党的军队 300 人的饭以外，还要出洋 30 元。^② 还有雇工、高利贷等剥削，加上军阀混乱，兵匪成灾，压得陕甘边区人民喘不过气来。

刘志丹领导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红军充分注意到了这些现象。1932 年，陕甘游击队就发表布告，宣布自己的根本任务，首要一条就是本军是贫苦工农自己的武装力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作不妥协的斗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此外明确了很多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相关的内容，如国民党军阀给予工农劳苦群众一切苛捐杂税、摊派勒索，概作无效；帮助穷苦工农、白军士兵，起来分配豪绅地主的食粮财产和土地；一切文字的口头的高利贷、账债、契约，宣告无效；缴收白军、民团、警察的武装，武装农民赤卫队，保护自己的利益等。^③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陕甘边根据地政权不断健全，尤其是南梁地区逐渐组建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在整顿和加强工会、农民联合会、贫农团、赤卫军的同时，又成立了青年、妇女、儿童等群众组织。在全面建政的基础上，陕甘边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土地委员长李生华回顾说：陕甘边最早分土地在荔

① 《毛泽东文集》第 3 卷，第 60 页。

② 参见刘凤阁、任德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第 83、198 页。

③ 参见刘凤阁、任德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第 172 页。

回堡，当时的政策是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或者只留给些不好的地；富农的土地只没收出租部分，即他们自己种不了的长余土地。^①当然，在开展土地革命初期，根据地由于缺乏经验和“左”倾错误思想影响等原因，分配土地存在一些脱离实际的问题。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陕甘边根据地开始总结出陕甘边土地革命斗争的特点。这主要有：由于陕甘边地广人稀，土地贫瘠，历来就是广种薄收，农民所受的痛苦，首先是土匪、灾荒为害，高利贷，苛捐杂税的剥削，所以我们进行土地革命时，群众对于分土地并不感到多大兴趣，而对于打土豪，分粮食、牛羊和衣物，不交粮、款和租子，则很感兴趣，南梁地区由于土地集中、地多人少，地主又多住在庆阳城，群众对土地的要求不太迫切，与陕北恰恰相反。^②而且南梁地区外来户多，这些外来户在异乡安家，不得不接受奇重的高利贷盘剥，“驴打滚”，“大加一”外带五分的高利贷，使这些移民，世世代代做牛马。因此，在土地革命中，农民关心废弃债务，甚于关心分配土地。^③

在调查实际、掌握特点的基础上，陕甘边根据地开始形成一套成熟的土地政策。对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总结道：（1）没收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2）分川地不分山地，这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是种1年休息1年；（3）中心地区分土地，边境地区则不分，这因为边境区的群众自己的牛羊都不保，还要什么土地，而边境区因苏区的扩大而变成中心区时，仍进行分土地；（4）田、苗一齐分，因农民最需要的是苗，若分田不分苗就会降低农民的情绪；（5）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没有地没有牛羊或少地少牛羊的雇农、贫农和中农；（6）阶级划分是依该户的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及其剥削与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的；（7）争取与改造流氓参加生产；（8）红军家属分好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④此外，废除一切债务（不含农民之间的债务）和高利贷。^⑤

① 参见刘凤阁、任惠会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第413页。

② 参见刘凤阁、任惠会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第406、413—414页。

③ 参见《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讨论稿）》，第122页。

④ 参见刘凤阁、任惠会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第409页。

⑤ 参见《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讨论稿）》，第122页。

针对农民的沉重负担，陕甘边根据地废除各种苛捐杂税、摊派勒索，同时对于军队和政府的供给，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之豪绅、地方，并有计划的向敌人夺取，而对群众不动员粮，也不交“欢迎”粮，^①做到了对群众秋毫无犯。陕甘边区的广大农民分到了土地，又没有负担，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生产积极性很高，其他很多地区的农民也不断投奔过来。

2. 活跃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

南梁地区在清朝以前就有集市贸易，但清朝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后停止了集市，此后再也没有恢复，群众买东西要到百里以外的甘泉和安塞等地，来往极为不便。因此，长时间以来，群众只能维持落后封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力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陕甘边根据地政权建立后，成立集市便利交易，在白庙、荔园堡等地建立了集市，保护小商人，允许其来苏区做生意。荔园堡集市初成立时，每月3集，逢一（即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逢集日，白区商人运来兰、白布匹、粉连纸、绿红纸、油墨、食盐等物品，在集上购买牲畜、土特产，带走大烟和白洋。根据地人民主要是卖熟米、细粮、马料，并卖用兰布做的鞋，每双1块白洋。^②

几乎每逢集日，边区政府主席习仲勋等人都要去集市转一转，看一看，了解市场发展状况，及时采取相应政策措施，进一步促进边区经济的繁荣。边区政府没有明文规定的税收制度，不向商人收税，而且在此基础上又采取优惠让利政策，将南梁地区的山货、羊畜、皮张等土特产品低价卖给白区商人，鼓励他们将边区的紧缺物资从白区贩运过来，政府出面保护他们的安全和利益。同时，边区也有一部分人到白区去贩货。开始白区商人来苏区者较少，都是一些过去常来这一带做买卖的商人，或在苏区有熟人关系的商人前来交易。后来就逐步增多。他们来时，驮的盐、粮（细粮）、布匹等东西……敌人企图封锁边境，但封锁不住，脚户还是常到苏区来做生意。^③这极大地解决了边区政府不少困难，方便了群众生活，增加了群众的收入。

恢复集市的初期，市场上流通的都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国民政府

① 参见刘凤阁、任继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第400页。

② 参见刘凤阁、任继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第410、426页。

③ 参见刘凤阁、任继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第408页。

的货币信誉很差，经常贬值，群众对此深恶痛绝。为此，边区政府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银行，并建立造币厂，发行自己的货币，在边区内统一使用，严禁使用国民党的伪币，建立了独立的金融体系。边区的货币是用木板刻模，印在白洋布上，加盖边区政府大印，再涂以桐油。票面有红色一角、蓝色二角、紫色五角、黑色一元4种。群众称为“油布票”或“苏币”。苏币币值稳定，很值钱，每元苏币相当白洋一元，携带方便，很受群众欢迎，真人在集市上卖得苏币，可到政府供给处兑成白洋。^①这极大地促进了边区的高品流通。

陕甘边根据地还努力通过其他办法来改善农民的生活。例如，当时，军队和干部买鞋的人很多，集市供不应求，后来政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给群众发布让做鞋，并规定了合理的手续费，群众都抢着做。再如，南梁政府当时组织了合作社，华池县各区都有，红三团还给捐款六七十元，合作社组织群众养蜂、养猪、养鸡。当时这些都订有计划，并向各区和干部作了传达，只可惜由于“围剿”和反“围剿”的战争频繁，有些未能完全实现。^②

3. 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制定移风易俗的社会政策

陕甘边根据地由于长期贫困和落后，农民基本是文盲。这种状况，在农民向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红军通报敌情时有着直观的颇具趣味的反映。处在白色包围中的陕甘边根据地，遍布各地的农民成为特别重要的了解敌情的来源。农民中识字的人极少，能够写一封明白信的人更缺。即使能写信的，大体上都是错别字，有的信我们实在难以看懂，要花很大的功夫分析辨认，拼音看形，才能知道信的内容。有的人不会写字，干脆用一片破纸插着一根鸡毛，经多人之手一直传到南梁我们的驻地。还有的用一张破纸包上一块煤炭，插上鸡毛，也传到我们这里，我们看后，只能知道是不好的消息，知道是敌人来了。^③

边区政府很重视解决军队和群众文化水平较低的问题，在战争条件下，仍大力支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就指出：当

① 参见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第426页。

② 参见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第415、426页。

③ 参见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第917页。

时“办了军政学校，刘志丹同志任校长，我任政委，马文瑞、蔡子伟、吴信峰等同志负责教学工作，培养军政干部，各乡办起了列宁小学，发展教育，扫除文盲。”^①军政学校主要训练军队连排长以上干部，学员200余人。在荔园堡附近的转嘴子，办起了陕甘边区的第一所红色学校——列宁小学，学生近60人，学生的文具和教员的吃用，全部由政府供给。^②此后，各乡也陆续办起了列宁小学，陕甘边东区就依靠政府部门和群众的大力支持，解决了课本教材、教员奇缺困难。桥扶峪、阎家沟、下寺湾、王家坪、杏子沟门等地先后都办起了列宁小学。^③边区政府还十分注意成人的文化教育，在一些村庄办起了成人扫盲识字班，开展扫盲活动，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坚持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

由于经济落后、文化低下，陕甘边根据地原来还存在许多迷信、愚昧的旧风俗旧习惯。对此，边区政府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活动，设立了禁烟、禁赌、放足委员会，发布了相应的条例，并制定了反对封建婚姻、反对迷信活动等法规，开展了以“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足、劝男人剪辫子”为内容的“六劝”活动。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群众，引导他们从封建思想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边区政府提倡开展文化娱乐活动，每开大会或逢纪念节日组织演出，宣传英雄模范人物，表彰好人好事，宣传科学常识和进步思想。开始要求给雇农发单衣、棉衣、手巾等物，多侧重于雇农方面，而有些雇农则好吃懒做，以后我们规定凡是雇农一定要劳动；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寡、残废，均实行救济。^④另外，还大力倡导男女平等，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和工作，努力把根据地建设成为革命的精神文明和生活文明的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在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的活动中，陕甘边根据地的党和红军始终起着模范带头作用，遵守革命纪律，倡导艰苦朴素的革命生活。当时，刘志丹“提出制定一条法律，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以上者枪毙，现在看起来这处分未免太重，但那时老百姓最恨贪官污吏，

① 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第3版。

② 参见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第427、478页。

③ 参见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第113页。

④ 参见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第411页。

盼望有为民理政的‘清官’，正因为刘志丹同志了解群众的心情，才制定严格的法规，以警戒自己的同志”，“有了这条法令，在干部中确实没有发生过贪污事件”。^①

综上所述，陕甘边根据地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即在流动中不断壮大、在勇于探索的同时顾全大局、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根据地建设。中共中央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建立也予以过关注，在1932年4月曾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为陕甘边根据地党和红军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只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中共中央对于陕甘边根据地后来的具体发展并不知情。陕甘边根据地主要依靠自己的探索和努力，在长期斗争中坚持下来，并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完整的红色区域，最终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学术界对此也颇为关注，从西北地区偏远，刘志丹等的正确领导、中共中央的及时到达等方面探讨了“硕果仅存”的原因。这都忽略了这块根据地自身具备的特点，上述三个鲜明特点正是这块根据地能“硕果仅存”的重要原因，也正是区别于其他根据地模式的重要表现。

作者：古善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中共党史研究》编辑。

^① 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第3版。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 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特点

李蕊芬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于1933年11月，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区人民创建的。这块红色根据地的开创，和全国各个根据地的创建一样，有着许多共同的发展规律，即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工农武装割据、坚持武装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在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实际创建过程中，陕甘边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披荆斩棘，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坚持从实际出发，走出一条不平凡的成功之路，创造出不少有特色的鲜活的具体经验，凸显了自身特点和独到之处，创建、巩固、发展、壮大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西北的一面红旗。南梁政府——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也创造了新的鲜明的特色，不仅在当时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就是在今天看来仍发人深省，值得继续探索、研究和借鉴。归纳起来，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从失败中崛起

陕甘边区属于西北地区，大革命时，就接受了革命的熏陶。1927年，

大革命失败后，一批共产党员受党的委派，纷纷来到了西北。他们像革命的大种，在西北地区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兵运等各项革命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辟革命根据地，形成了星火燎原西北的局面。

选择南梁为中心，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包含着血的教训。1933年6月，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终南山，因孤军作战，在敌军重兵“围剿”下弹尽粮绝，几乎全军覆没，竟经过千辛万苦创建的第一支西北红军主力部队，被“左”倾机会主义的忠实执行者所断送，给陕甘边区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敌人的重重“围剿”下，1933年8月，渭北革命根据地陷落。10月，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在敌人的“围剿”下失守。由于陕甘边正宁县寺村塬一带游击根据地和照金革命根据地的连续丧失，陕甘边已经沒有一块革命根据地可供红军立足，斗争形势十分残酷。在反“围剿”斗争中，无数革命战士为了夺取革命的胜利，不惜抛头颅、洒热血。革命却仍然接连遭到失败，血的教训引起了人们深刻的反思。陕甘边区党组织认真总结了渭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正宁县寺村塬一带游击根据地和照金革命根据地失败的经验教训，在充分肯定这些根据地开辟与存在的重大意义和历史作用的同时，指出了这些革命根据地有的离敌人太近，有的地方太小，没有回旋的余地等不足之处，这些也是造成失败的客观原因。从而充分认识到开辟革命根据地，开创红色政权，不能单凭主观愿望，更重要的是不能脱离实际，必须面对现实。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要选择最有利我生存、发展、壮大的地方，最有利于消灭敌人的地方创建革命根据地，南梁就是这样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方。一是具有地理优势。在陕西和甘肃两省的边界，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大山脉，俗称桥山。南梁地处桥山中段，这里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有利于屯兵养马，集聚革命力量。山大沟深，森林连绵数百里，有险可依。是积粮屯兵的理想之地，回旋余地很大，有利于机动作战，开展游击战争。二是具有政治优势。从政治上看，当时这里是一个陕西省和甘肃省都鞭长莫及的地方，敌人统治难度比较大，是敌人统治力量的薄弱环节。这十分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由于土地兼并极其严重，大量土地集中在地主手里，造成大量流离失所和饥饿，农民痛恨强权的土地兼并和苛捐杂税，早已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基础。这些客观条件正是革命军队和红色政权得以生存的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功创建，从危急中挽救了陕甘边区

的党和红军。在经受了生死存亡的重大考验后，陕甘边区的党组织和红军从失败中走出来，重新在西北地区崛起。他们面临着千难万险，不怕失败，百折不挠，前赴后继。在事关革命何去何从的危急关头，他们当机立断，选择以南梁为中心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这并非是失败之后，仓促慌张的抉择，而是经过长期实践，深思熟虑的结果。早在1930年秋天，陕甘边红军的创始人刘志丹就来到南梁，深入考察这里的经济、政治及群众生活状况。陕甘边的第一支游击队就诞生在南梁地区，又被称为“南梁游击队”。1931年10月，晋西游击队也辗转来到南梁地区，与南梁游击队在南梁附近的林堡庙胜利会师。1932年1月，西北反帝同盟军组建，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1933年6月起，红军南下失败，惨遭重创，在根据地相继陷落的危急情况下，在分析了南梁地区的实情后，陕甘边的党和红军统一思想，增强开创南梁革命根据地的信心，加快了创建步伐。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史称包家寨会议。这次会议作出了三个重大决定：一是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红四十二师；二是向陇东南梁进军，在陕甘边界地区建立中心根据地；三是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北、陇东、关中三路游击区。这三项重大决定很快得到落实。11月7日，在葫芦河川的莲花寺召开全体军人大会，正式宣布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尚任师政委，刘志丹任师参谋长，黄子文任师政治部主任。红二十六军起死回生，转危为安，重振旗鼓，成功开辟并巩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使陕甘边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失败乃成功之母”，在失败和挫折面前，人们变得聪明起来。陕甘边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北、陇东、关中三路游击区，被称为是“狡兔三窟”之策。这一决策的主要内容就是建立三路游击区，并相应地组建了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陕北为第一路游击区，以安定县为中心，向南发展，强世清任总指挥，魏武任政委；陇东为第二路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向四周发展，杨琪任总指挥，高尚任政委；关中为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向北发展，张明吾任总指挥，黄子祥任政委。三路游击区又共同以南梁为中心开展活动。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进出各游击区，帮助各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实践证明，这一英明决策使红军和游击队有了充分的回旋余地，有效地发挥

了牵制、打击敌人的作用。“狡兔三窟”的决策，是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的重要特色之一。一是用足了独特优势。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创建根据地的实践，充分利用南梁离敌人统治中心距离较远，敌人鞭长莫及，以及这里地势易守难攻的优势，化解各种不利因素，从而改变了原来在力量对比上红军处于劣势的状况。二是正确的战略定位。红二十六军的恢复和建立，陕甘边拥有了正规的红军，但是当时的环境还是打游击的环境。陕甘边区党组织从实际出发，采取红军与游击队相结合作战的办法，形成三个游击区，牵着敌人的鼻子走，赢得了主动权，打开了新局面。三是灵活的战略战术。由于战略定位的正确，南边的敌人被第三路游击队“围着腿”，到不了南梁第二路游击区，北边的敌人被第一路游击队挡着道，红军主力可以随时到每一路游击区，自由地打击敌人，“蒋”敌人的军了。在战略战术上，红军和游击队不打消耗战，不死守一地，在运用中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这就是红军化被动为主动，有力地打击敌人，壮大自己的创新的战略战术。

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特色

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有许多工作要做。如选择根据地的地址，建立革命军队，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工农武装割据，创立红色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等等。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创建过程中，全方位地蓬蓬勃勃地开展了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基本形成了五大特色。

根据地的创建离不开人民军队发展壮大，武装斗争是根据地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红军是武装斗争的主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配合红军打仗，军民团结，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陕甘边特委领导的照金根据地和渭北等地区的游击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陈家坡会议后，部队继续扩大，为重新组建红军打下了基础。刘志丹脚险回来后，不到一个月，红军又增加了150多人。为此敌人十分恐慌，派出重兵“围剿”。红军采取突然袭击、暗攻巧取的战术，获得了合水战斗的全胜，极大地鼓舞了红军战士和合水县革命群众的对敌斗争热情。这次战斗的胜利，对于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极为重要。但是

约500名红军面临1000多个装备精良的敌人，他们采取“蘑菇”战术，把1000多个敌人拖得只剩下800多人，选择有利地形，彻底打垮了敌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红军在运动中采取“避实就虚、避强打弱、敌疲我打”的战术，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拉开了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序幕。红二十六军重新创建后，全歼新堡子民团，拔掉荔园堡这个楔在南梁地区的反动据点，为南梁地区的人民除了一害。为了解决初创南梁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棉衣问题，红军飞兵攻打合水县城，又是飞兵奇袭，又是大获全胜。红军利用休整期间，大力发展游击队。在游击队英勇机智的战斗中，将南梁中心区域的民团、土匪彻底清除，使南梁根据地迅速扩展，纵横达100余里。敌人胆战心惊，不断加紧“围剿”，企图扑灭已经燃烧的熊熊烈火。红军对此作了精心准备，与游击队相互配合，在蘭家砭消灭敌人两个连后，又飞速消灭了民团，自制土炮，攻下高家寨子，骑兵团在李家梁获胜，四战皆捷。在西华池，红军利用有利地形，骑步兵配合，以少胜多，全歼敌人一个团，缴获轻重武器1000多件，俘虏敌军700多名，此役被称为西华池大捷。这些战斗的胜利，既是红军英勇奋战的成果，也是广大根据地人民积极扩红，为部队输送兵源，做好收救伤病员的工作和经济、后勤等各项保障工作的成果，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发展和巩固，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双管齐下，是南梁革命根据地创建的一大特色。由于条件不成熟，革命根据地不可能马上建立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陕甘边的党组织和红军认为，开辟一块革命根据地，必须要做到军事工作和群众工作双管齐下。二者缺一不可。群众工作做好了，可以支援军队；军事行动的胜利，不仅能提高军队的士气，也能提高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充分体现了双管齐下的特色。红二十六军重新恢复后进行了整编，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并马上派出刘约三、吴岱峰等军事干部，到平定川一带组织地方游击队和第二路游击指挥部。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庆阳、合水、保安、安塞游击队先后成立，1934年1月第二路游击指挥部正式成立。庆北、定边、华池等地方武装陆续建立。他们为创建和保卫南梁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师党委又做出决定，派张策为42种党委特派员，到南梁一带开展地方群众工作，建立党组织。并决定待习仲勋养好伤后，也到南梁一带开展群众工作。经过这些干部深入到农民之中，宣传革命道理，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南梁一带穷苦农民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在党的领导下，首

先在全岔沟成立了第一个农民联合会，接着又在白马庙川、玉泉庙川等地成立了农民联合会，并在这些地方成立了贫农团、雇农工会、妇女会、赤卫军等组织，开展了打土豪，斗地主，分粮食、财物，牛羊的斗争。红军利用战斗空隙，以连队为单位分别到平定川、白马庙川、二将川、太白川一带，宣传政策，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充分发挥红军战斗队、工作队的作用。1933年11月25日，在小河沟四合台创建了南梁地区第一个乡村苏维埃政府。决定建立南梁后方工作委员会，领导和开展南梁根据地的群众工作。正是在双管齐下工作方针的指引下，根据地的军事力量日益壮大，群众组织迅猛增加，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蓬勃发展起来了。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一块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创建时一无所有。南梁地区虽有许多优势，但也存在着不少困难。根据地开辟后的首要任务是创建红色政权。1934年2月25日，红四十二师党委主持，在小河沟川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选举产生了根据地的临时政府——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军事、文教等委员会。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建立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成立了威震八方的农民联合会和赤卫军大队。对此，国民党统治者惶恐万分，于3月初纠集了8个团，兵分8路对南梁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为避敌锋芒，师长刘志丹等率领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打击敌人。敌人进入南梁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先后用铡刀杀害了农会主任白杨珍、地方干部曹思聪和红军修械所工人李青山等6人，活埋了游击队员、地方干部和群众数十人。随后又扑到保安县（今志丹县），抄了刘志丹的家，挖了刘家祖坟，杀害了刘志丹的数名亲人。在反“围剿”斗争中，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率领游击队掩护群众，坚壁清野，灵活运用战术战法，奋勇杀敌。红军主力外线作战的节节胜利，加上根据地内线斗争的有力配合，迫使敌军很快退出了根据地。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正式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建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习仲勋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政府下设粮食、财政、经济、土地、肃反等委员会，附设放足、禁烟、禁赌委员会，相继建立了农会、贫农团、赤卫军、工会、青年、妇女、儿童等群众组织，边区党政军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体现了让人民群众休养生息的精神，政府体察民情，深得民心，在经济发展上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各县

也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根据地的工作得以全面开展。

土地革命是根据地建设的重要任务。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从实际出发，依据以往开创根据地的经验，制定土地革命政策，其主要内容有八条：一是没收地主和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家庭中参加劳动的成员，留给其他维持生活的土地和财产；二是分川地不分山地，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是种一年休耕一年；三是中心地区分土地，边远地区不分。随着苏区的扩大，边区变成中心苏区后再分配土地；四是田、青苗一起分，因农民最需要的是青苗，如分田不分青苗会降低农民积极性；五是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没有牛羊或少地少牛羊的雇农、贫农和中农；六是红军家属分好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七是阶级划分以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和剥削或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八是争取和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特色非常鲜明。第一条的内容就与众不同，他不是没收地主富农的全部土地，只没收出租部分的土地。而且，参加劳动的地主可以分地。这在其他地区是比较少见的。由于陕甘边区地广人稀，山地基本没有人种，因此，不做分配。边缘区暂不分配土地，也就是土地分配暂缓，要等发展为中心地区，条件成熟了再分配。这些政策简洁明了，操作性强，便于落到实处。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时期把开展游击战争与三分（地、粮、财务）、五抗（税、租、债、粮款）结合起来，把建立革命武装同开创根据地和建立红色政权结合起来，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这两个结合充分显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党组织的思想水平和工作水平。

统一战线是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的一大特色。陕甘边党组织十分注意政策和策略，对敌人不是搞一刀切，而是分化瓦解，区别不同对象，对于顽固不化的坚决予以打击，对于可以争取利用的，就争取利用。在陕甘边这片土地上，除了广大群众外，还有哥老会、民团、土匪，等等。红军作了大量的统战工作。工农民主政府制定了相关的政策，对民团的政策有三条：一是对靠近我们的民团则与之建立互不侵犯关系，如对罗连城、何子新等；二是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则坚决消灭，如赵老五、梁邦栋等；三是对保持中立的民团教育争取，使其向我们靠拢。对土匪的政策也是三条：一是对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坚决彻底消灭；二是为群众所痛恨无法争取的匪首，如杨谋子之类也予彻底消灭；三是此外的一切土匪则采取一切办法争

取改造他们，如对郭宝珊、蒙古奎就是这样的。政府还制定了各种社会政策，指出，一是对哥老会采取争取政策。苏区哥老会很多，他们大多讲义气，对我们有过不少帮助，并与我们有联系。对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工农民主政府则发动群众清除，不直接出面干涉。二是对哥老会、红枪会、硬肚、软缠等会道门采取争取政策。苏区内这类组织相当多，他们虽然迷信但对统治阶级都有反抗性，在这一点上能争取和改造他们。工农民主政府对白军俘虏政策也明确规定，对俘虏采取教育、争取、改造使用政策，不随便杀掉。红二十六军的排长、连长很多是从白军中来的。从以上这些政策可以看出陕甘边党的领导的政策性是很强的，而且很善于做统战工作，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政策，充分运用了统一战线这一法宝，同时也为党的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陕甘边的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于当地革命实际的成功范例。南梁革命根据地成立时间较晚，他们虚心学习其他革命根据地的成功经验，提出了要走井冈山道路，刘志丹等人组织党员和红军战士学习毛泽东的《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断提高对中国革命、对红色政权的认识，提高自身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并以此来指导革命实践。陕甘边根据地后来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体，坚持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成为革命的大本营，是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础的。陕甘根据地的创建特色也可以归纳为艰巨性、独特性、全面性、灵活性和辐射性。艰巨性：土地革命时期，全国每一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都是不容易的。而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尤为突出。一是敌人的强大险恶。大革命失败后，陕甘边区的共产党人在开展兵运工作中，经历了 70 多次的失败，几乎没有胜绩。但他们百折不挠，信仰坚定。二是我方力量的弱小。革命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既要经受战争的考验，又遭遇党内错误思想的打击，数次被打得几乎全军覆没，却终于在风风雨雨中顽强地壮大起来。三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的难度更大。一波三折，两易中心，革命根据地一建立，往往成为敌人袭击和“围剿”的目标。形势的险恶、任务的艰巨触目惊心。独特性：南梁地理环境是陕甘边独有的，以南梁为中心陕甘边革命地创建的独特性，也由此而产生。南梁地区山高林密，便于打游击，但也便于土匪出没。为了防土匪，村村寨寨都设民团，民间组织也比较多，加上国民党军队

等，统战对象层次多，范围广，这使南梁根据地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统战工作。“投兔三窟”的战略决策，也充分体现了南梁根据地的独特性。因为这一决策本身就是因地制宜的产物，没有桥山山脉作依托，也就无法制定这样的决策。全面性：是指南梁根据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群众工作等各项工作都做得比较到位。灵活性：是指军事上的随机应变，政策上的灵活机动。辐射性：是指影响力。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西北地区影响是很大的，晋西游击队、陕北游击队等都深受其影响。

作者：李惠芬，女，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干部。

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造性实践

张 复

大革命失败以后，西北地区党组织注意到了抓武装的重要性，认为“没有革命的武装，将会一事无成”。同时，也注意到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但是，通过何种途径，在什么地方组建革命军队，如何具体地创建革命根据地，当时并不十分清楚。于是，进行了多年的兵运工作。几年的兵运活动，使党培养和锻炼了大批军事干部，积蓄了革命力量，在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中，逐步提高认识，摸索经验，特别是井冈山根据地“工农武装割据”的榜样，使他们找到了革命发展的正确道路。

习仲勋回忆说，1932年9月当他在两当兵暴失败、搞农民运动也屡受挫折的情况下，内心很沉重，第一次见到刘志丹和谢子长时就向他们讲述了这些受挫折的经历和困惑。刘志丹对习仲勋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① 谢子长也叮嘱习仲勋说“过去我们没有根据地，现在要搞，你在这

^① 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陕西版，1996年8月24日。

“儿人熟地熟，工作条件好，我们没有枪支弹药留给你，你要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成立农民协会，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① 习仲勋把这次会见和谈话视为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发生深刻影响的重要经历而屡屡提起。

习仲勋还回忆说，1932年2月，他在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委员和县团委书记时，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工作很有个性特点，尤其重视对党内同志的理论学习和思想文化教育。他在任职伊始就把自己深入学习和具体运用过的党中央下发的一些文件，如毛泽东撰写的《古田会议决议》、《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经常抽出时间向党内作传达和宣讲，逐渐形成了惯例，几乎每天总要抽出一定的时间进行政治理论学习。他还结合渭北革命斗争的实际，和大家一起学习讨论党在南方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战术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简要法规等。习仲勋回忆说，他参加革命斗争七年来，还没有这样集中时间系统的学习过政治理论和军事知识，赵伯平组织的这些学习和讨论，对他的思想和以后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②

在不断总结西北革命斗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情况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例，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领导人，便全身心地投入到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中，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由此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

一、关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931年9月，晋西游击队进入陕北后，在陕北特委和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的领导、支持下，转战于清涧、安定、延安、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县，发展为陕北游击支队。1932年1月初，为适应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按照省委指示，陕北游击支队和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合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不久，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政委李杰夫，参谋长杨震远。全军编为三个大队。陕甘游击队成立以后，即遵照陕西省委的预定方针，挥师南下，向渭北地区发展。

7月23日，省委派李昆来游击队传达省委关于“彻底转变陕甘新苏区的机会主义领导，以创建陕甘新苏区与二十六军”的指示，并担任游击队

① 习仲勋：《陕甘高原 革命历程》，1986年8月14日。

② 《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页。

政委。李昆到部队后，连续召开干部会议，讨论创造新苏区和二十六军的问题，批判所谓的“机会主义领导”。要求部队“停止游击战争”、“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还限期 20 天内将五城壕土地分配完毕。以后，在敌军重兵进攻下，由于李昆的错误指挥，游击队与强敌打了 3 次硬仗，伤亡惨重，最后只得分散突围。

1932 年 12 月 18 日，杜衡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陕西省委代表的身份来到部队，传达中央和省关于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指令。杜衡提出要彻底改造陕甘游击队的“机会主义领导”，给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同志扣上“右倾机会主义”，“上山主义”，“逃跑主义”，“反对省委”等帽子，撤销了他们的领导职务，强令离队去上海中央局“受训”。由于谢子长、王世泰等人的力争，才勉强留下刘志丹（做宣传工作），^①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后，杜衡任军政委兼团政委。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组建以后，根据省委的指示，决定开展山区游击战争，在照金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照金，位于耀县西北，地当耀县、三原、淳化、旬邑、宜君、同官 6 县之交，沟壑纵横，地势险峻。红二团接连打了几个胜仗，并帮助地方党先后建立香山、芋园、照金、旬邑、宜君等 5 支游击队，初步打开了局面。1933 年 3 月 8 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成立，书记金理科，军委书记习仲勋。同时还成立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斋任总指挥，习仲勋任政委。随后，又有十几支游击队相继诞生。4 月 5 日，特委在照金召开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副主席习仲勋。不久，又成立了桃曲潭、照金、老爷岭、马栏、七岔石等基层革命委员会。至此，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根据地基本形成。

1933 年 4 月下旬，杨虎城、井岳秀以 4 个正规团和 6 个县的民团 8000 余人的兵力，分 4 路围攻照金根据地。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团党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红二团到外线活动，李妙斋、习仲勋等率游击队坚持斗争。红二团经过 20 余天的机动作战，打退了进犯照金之敌，形势好转。但是，杜衡却头脑发热，要求红二团南下，创建渭华新苏区。他不顾刘志丹等同志的反对，独断专行，强令红二团南下，部队在蓝田张家坪遭到 1000 多敌人围追

^① 吴志渊：《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40 页。

堵截。恶战之后，只剩100多人，分股突出重围。红二团南下近500名指战员，此时生还者仅约100人。中国共产党辛辛苦苦集聚的第一支西北红军主力，就这样被“左”倾机会主义者断送了。^①而在红二团南下时，杜衡借口回西安向省委汇报，只身离队，不久被捕叛变投敌。

照金根据地的丧失，使陕甘边红军再次陷入无处立足的困境。此时又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根据地究竟应该建立在哪里？下一步采取何种行动方针？这是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1933年11月3日至5日，陕甘边区特委和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会议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讨论了部队的改编、根据地重建和以后的行动方针问题，最后决定：第一，撤销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红四十二师；第二，军事后方移至南梁，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三，开辟3个战略区，计划建立一、二、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包家寨会议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陕甘边革命斗争从挫折走向兴旺，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11月中旬，红四十二师进入南梁地区，全面展开了创建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南梁地区位于甘肃庆阳县境内，境内山峦叠嶂，地势险要，敌人统治力量又十分薄弱，是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理想场所。红四十二师师长由王泰吉、刘志丹先后担任，开展了一系列游击战争，并且十分注意首先打击歼灭敌人军队中的薄弱力量——反动民团，又不失时机地成立了根据地的临时政权——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这样南梁革命根据地在实际斗争中逐步形成。

1934年11月1日至6日，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荔园堡隆重举行。会议就根据地的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土地、财政、粮食等决议案，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下设土地、劳动、粮林、财政、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军委主席刘志丹，赤卫军总指挥朱自清。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成立大典和庆祝活动。随着边区苏维埃政府的诞生，各级基层政府陆续建立起来。到1935年2月，先后建立了华池、赤安、庆北、甘洛、合水等十余个县级苏维埃政府。

^① 吴志圃：《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第43页。

二、关于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批示陕北特委“编制游击队，立刻开始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中共陕北特委遂将党的工作重点转向农村，进一步发动群众，为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积极准备条件。1932年3月，陕北特委在延川成立了游击队，10月，特委决定将游击队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这是陕北特委领导的第一支红军游击队。随着游击队实力的不断扩大，1933年4月，特委又将九支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一支队的建立与发展，说明全面发动陕北游击战争的主客观条件基本成熟。在这种形势下，特委决定召开一次全委扩大会议。

1933年7月23日，中共陕北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在佳县高起家洼召开。马明方主持会议并作政治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陕北的社会基本情况、革命斗争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根据红一支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事实，阐述了在陕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和可能性，指出开展武装斗争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基本成熟，明确提出了全面发动陕北游击战争的新任务。会议一致认为“陕北具备了开展游击战争的条件，决定立即发动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首先开辟神府（神木和府谷）、绥清固的根据地；加强一支队，新建二、三支队；其他地区则积极创造条件，迅速完成开展游击战争的准备。同时决定恢复和加强各县、区党团组织的领导，发展党团员，建立农会、互济会、妇女会、赤卫队、少先队，开展抗粮、抗捐税、抗租债的斗争，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建立工农苏维埃民主政权。”会议还抵制了北方局代表的“左”倾错误指示。高起家洼会议，是陕北革命斗争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陕北游击战争由组织准备转向全面发动，由秘密活动转向公开武装斗争的转折点。会议做出的战略决策，对于开展陕北游击战争，创建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9月，陕北特委委员马文瑞来到神木县南乡，传达贯彻特委第四次扩大会议精神。随后，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在神木成立，并开始了神府地区的游击战争。

1934年1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谢子长回陕北领导游击战争。谢子长的到来，使游击战士深受鼓舞，在谢子长的领导下，游击队接连打了几

个胜仗，并建立了安定、延川游击根据地。

1934年4月初，陕北特委在佳县神堂沟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提出了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确立了放手发动群众，普遍开展游击战争的总方针。决定加强游击队的统一领导，成立游击队总指挥部，为创造一个正规红军师而奋斗；扩展已有的游击根据地，逐步把各区连成一片，造成游击区的统一局面；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陕北全区工农民主政府和各级工农民主政府。神堂沟会议，适时地提出了党在新形势下的总任务，为陕北的革命斗争描绘了宏伟蓝图，对于发展陕北红军和扩大根据地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会后，各地工作迅速铺开。1934年7月8日，根据神堂沟会议的决定，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杨道岭成立，谢子长兼任总指挥，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

为了进一步加强陕北红军和陕甘边红军的联系，搞好两地区战略协同，以便互为犄角，相互配合，共同发展，7月18日，谢子长率陕北游击队及赤卫队200余人南下陕甘边。25日，在南梁阎家洼子与红四十二师会合。28日，陕甘边和陕北军政联席会议召开。会议决定红四十二师三团北上，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井岳秀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谢子长兼任红四十二师政委。这次会议，统一了对革命形势的认识，促进了两区的相互了解和团结，对于两区的战略协同和革命斗争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陕北游击战争的全面发动和深入开展，引起了敌人的密切注意。井岳秀调集万余人的兵力，向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在谢子长的亲自指挥下，西北红军三战三捷，仅用10天时间，就彻底粉碎了反动军阀井岳秀发动的第一次“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斗争，打出了红军的军威。敌人遭到痛击之后，便收缩兵力，暂取守势。在胜利面前，陕北党组织保持清醒头脑，认为敌人绝不会善罢甘休，我们的任务不是去攻城略地，而是利用敌人发动新“围剿”之前的间隙，迅速实现神堂沟会议提出的各项任务，即扩大红军，巩固阵地，建立政权，造成强大的革命武装和稳固的根据地，使革命斗争立于不败之地，以此迎击敌人的新的反扑，并在斗争中不断壮大自己。为此，陕北特委在清涧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冲破“围剿”的决议案》，决定正式成立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分配土地；扩大赤卫军，少先队和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红军编制，创建一师红军。会后，根据地建设掀起了更

高的热潮，革命武装力量迅速扩大，仅仅两三个月时间，就成立了18支游击队。

1935年1月30日，根据新的革命高潮，陕北特委在安定县白庙岔举行典礼，宣布将陕北红军各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成立师部，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参谋长朱子休。下辖一、二、三团。这一时期，基层革命政权建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1935年1月29日至31日，陕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安定白庙岔召开，来自陕北各县的150名代表，济济一堂，共商大计。会议就建立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大会决定成立陕西省苏维埃政府，选举马明方任主席。省政府下设土地、粮食、财经、劳动、文化教育、内务等委员会和保卫局。会议还通过了各级工农民主政府组织法、选举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法令。1月31日，数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举行，热烈庆祝陕西省苏维埃政府成立。随着形势的发展，陕西省很快建立起16个县级工农民主政权，即赤源、秀延、仲远、延安、横山、清涧、吴堡、绥德、佳芦、延川、延水、靖边、米东、米西、神木、府谷。在这一地区内，除县城和几条大道被敌人控制以外，大多数乡村、集镇都是红色区域，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

三、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

1935年春，国民党当局调集西北五省军阀，近五万人，再次对西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与此同时，西北革命形势也出现了统一的趋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中，由分散到统一，终于形成了陕北、陕甘两块革命根据地。1934年夏秋，陕北游击战争已经发展到延河流域，陕甘边的游击战争推进到洛河川。陕北和陕甘边两区，相去不足百里。而两区之间的安塞、延安、甘泉等县的游击战争已经发展起来。洛、延夹河地带的反动势力，在红军的打击下，朝不保夕。驻守县城之敌，再也无力抵抗两支红军的进攻了。此时，把陕北和陕甘边根据地连成一片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统一两区的领导，协同步调，势在必行。1935年2月5日，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赤源县陶家峪召开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两块根据地和两区

的革命武装，惠子俊任西北工委书记，刘志丹任西北军委主席（一说谢子长），会议确定了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并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西北工委和军委的成立，统一了两区红军的领导，为西北革命斗争向更高阶段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谢子长因伤病恶化，未能参加会议。1935年2月21日，他在安定县灯盏湾村不幸逝世，时年38岁。

根据地和红军迅速发展，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1934年10月，也就是对江西瑞金中央根据地实行第五次“围剿”时，国民党中央统帅部开始筹划“围剿”西北根据地和红军。蒋介石调集了6个师30个团，约5万人的兵力，对西北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敌人的战略战术，完全照搬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一套办法。采取分割“清剿”、逐区“蚕食”的方针，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梯次推进。同时组织还乡团、“铲共义勇队”，辅之以政治欺骗宣传，推行保甲连坐法，经济上严密封锁，企图彻底摧毁根据地。

面对数省军阀的联合围攻，根据地军民早已众志成城，严阵以待。根据周家峪会议精神，刘志丹亲自起草了《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粉碎敌人二次“围剿”动员令》，于2月18日下发执行。第二次反“围剿”战役，自1935年1月31日南沟岔战斗开始，到8月21日定仙娥战斗结束，历时7个月，共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在第二次反“围剿”中，红军先后解放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6座县城，消灭敌人正规军5000余人，地主民团武装3000余人，缴获长短枪8000余支，轻重机枪约300挺，迫击炮14门，子弹数十万发。开辟了甘泉、富县、宜君、定边、靖边、环县等游击区，实现了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的统一，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在陕北，国民党势力仅能控制一个完整的榆林县和绥德、米脂、神木、府谷、横山、延安等县城，农村大致都成了红色区域，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政治形势。这时，根据地人口超过100万，根据地的范围发展到东起黄河，西至环江，南到淳耀，北迄长城的广大地区，在20多个县建立了革命政权。游击区扩大到陕西和陇东的30个县，其中陕西25县。各路游击队和游击纵队发展至4000余人。地方游击队与赤卫军已经普遍建立。西北工委、军委、前总的成立，红军主力兵团的组建，标志着西北根据地的初步形成。而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陕北和陕甘边的根据地连成一片，则标志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最后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时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是西北人民的光荣与骄傲！是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①

四、创造性开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内在含义

西北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创造性地创建，就在于西北根据地的领导人能够从实际出发，以井冈山根据地样板，不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排除了王明“左”倾错误在西北地区的干扰，吸取经验教训，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坚持党的领导，开展武装斗争，依靠人民群众，坚持在敌人薄弱的山区创建根据地。期间经历了清涧、淳化起义和多次兵运的失败，经历了“左”倾错误的干扰，甚至经历了前后两任上级领导杜衡、李杰夫的叛变投敌，经历了创建渭北、陕南、照金根据地的失败，牺牲了很多战士、干部，在和上级联系不畅的情况下，用血的代价，经历无数艰难曲折，这才逐步地创造性地摸索出一条符合西北地区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正确道路。

早在1945年，习仲勋在西北党的历史会议上，回顾了两当兵变、渭北苏区的创造和红四团的成立、照金苏区的建立与恢复红二十六军、陕甘边苏区的发展与“左”倾路线的肃反情况后，他就精辟地总结指出：从以上这一连串的历史看来，我有这样一些感想：第一，武装是革命之本，所谓枪杆子万能并不全是错误的，只要枪杆子拿在农民手里，与红军苏区结合起来，那就是“万能”的，我们边区党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武装斗争史。第二，“枪山主义”是创造根据地的马列主义，即使在抗战后，我们也没有什么“平原主义”，还不是在太行山、五台山、大青山建立根据地？第三，真正的领袖是在不脱离群众斗争的同志中产生的，绝不会在没有经过斗争锻炼的人身上体现出正确路线。第四，理论与实际结合是革命事业成就的主要因素，盲目与靠书本知识都不能成事。红二十六军的一套，是适合革命需要的，是把实际经验提到理论原则上的。自然，真正的领导是从政治上思想上去领导，不仅仅是组织上的领导。第五，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党内思想问题。“左”倾机会主义是错误的路径，是由不白觉到自觉，由错误到正

^① 吴志渊，《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第99页。

确，而正确路线也是由不完备走上完备，形成一整套。第六，陕甘边的斗争史，是统一战线的又斗争又联合的历史，当然这种统一战线还是小范围的，还不像中央来了以后那样广泛，等等。^①

作者：张复，北京现代网景文化传媒公司董事长，张仲实同志之子。

^① 习仲勋在西北党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7月11日。

试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的历史必然性

李庆勇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20世纪30年代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陕西省和甘肃省交界地区创建的红色革命根据地。本文通过考察民国初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甘肃庆阳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军事政治局势特征，分析研究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地区正反两方面政策的得与失，全面而客观地论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正是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成功实践。

一、20世纪初期庆阳地区的人口与社会经济

民国初期的庆阳各县，自然灾害频繁，旱灾、水灾、冰雹、瘟疫等自然灾害连年不断，人民或死于饥荒，或逃往其他地方，从而造成这一时期该地区人口呈现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特点，人口数量基本保持低速增长的趋势。1915年至1935年发生于庆阳地区的自然灾害有十余次之多。据《庆阳地区志·灾异志》记载，1915年，庆阳、镇原、宁县、合水、环县等陇东17县大旱，夏秋无收；1924年甘肃全省春夏亢旱，庄稼几乎无收，正宁、合水、环县立秋后又遭水灾；1926年夏，陇东各县大旱，5月冰雹相继为灾，四乡逃荒者络绎不绝；1927年甘肃东部及中、南部大旱，受灾达50余

县，民饥；1928年春夏，甘肃大旱，受灾达50余县。庆阳境内各县均属重灾区。麦禾未种，灾民既乏充腹之粮，又少御寒之衣。多剥菜根树皮，炒糠秕掺和而食，更有人相食，掘尸碾骨易子而食者；1929年甘肃全省58县大旱，继以冰雹、洪水、虫害、霜冻、瘟疫流行，春耕失种，颗粒未收。入夏后，树皮、草根、麸皮、油渣等食之以尽。外出逃生者多饿死野外，白骨曝日。所有牲畜因草枯竭而饿死，幸存者多被杀食度荒；1931年春，合水大旱；1932年庆阳、镇原、宁县等44县大旱，收成大减，民饥外逃；1934年，镇原等45县大旱，禾苗多枯死；1936年，环县大旱。^①从上述记载中我们看到，当时庆阳各县是年年都有旱情，处处都有饥荒。尤其是1927年至1929年的3年大旱，受旱土地面积之大，受灾人口之多，为历史上所罕见。当地人民既乏充腹之粮，又少御寒之衣，甚至发生了惨绝人寰的易子而食的惨剧。

连续多年的自然灾害造成庆阳境内人口总量在20世纪初期的20年多年里一直处于低速增长趋势，人口学上表现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特点。1927年至1929年的3年大旱，甘肃全省死于饥饿者140余万人，死于病疫者达60余万人。陇东地区饥谨更是骇人，人口死亡流散更甚，环县民众死于霍乱、伤寒、赤痢、瘟疫者达3671人。1930年环县有5570人，比上年的13767人少了8197人。^②迄今庆阳各地还流传着“人吃人，狗吃狗，乌鸦吃石头”的民谣。1928年，庆阳各县人口总数为318088人。相比较而言，历史上该地区人口最多的清代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人口总数曾达到121万之多。^③多年的战乱和饥荒给该地区造成了惨重的人口损失。

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地方人口更加稀少，大量的土地荒死了。在这种情况下，地主、富农经济迅速发展，大量土地日益集中在少数地主和富农手中。有的地主有地数千亩，有的甚至达数万亩，各类大型农具一应俱全，粮食囤积严重。当时土地集中的状况相当严重，庆阳县（今庆城县）的大部分耕地主要为所谓的“八大家”占有。据记载，庆阳县八大家之一的恒义

① 参见甘肃省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庆阳志》第1卷，兰州大学出版社，第372页。

② 甘肃省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人口志》第1卷，兰州大学出版社，第471—472页。

③ 甘肃省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人口志》第1卷，第471—472页。

兴（地主李子良的字号）占有耕地7万多亩，拥有耕牛1000多头，从庆阳县到陕北定边都有其土地，每年收租子达4000石至5000石。^①作为社会生产最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生产基本上处于封闭的自给和半自给的简单再生产状态。

土地的日益集中，造成绝大部分自耕农沦为佃农和雇农。农村社会的两极分化日益突出，阶级矛盾更加尖锐。这种濒临破产的社会经济格局却为红色政权的创立和发展带来了难得的机遇，陕甘边地区的共产党人就是在这—社会背景下领导人民群众组织工农武装，建立红色政权，从而确立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二、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庆阳地区的军事政治特征

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陕甘边地区处于一个军事局势变迁极为激烈、政治形势极为动荡的时代。一方面该地区经历了由北洋军阀统治向国民党新军阀统治、地方政权由服从北洋政府到听命南京国民政府的变迁。新老军阀的政权更替过程在一定时间和地域范围内造成了新的权力真空；另一方面由于陕甘边地区地处陕甘宁三省区的交界处，偏离中心城市和交通主干道，加之该地区处于黄土高原腹地，交通基础设施落后，使得各派军阀在这一地区的行政和军事控制力极为薄弱。上述两方面的因素，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带来了极为有利的军事政治条件。

1928年12月底，国民党完成对奉系军阀的北伐后，继之而起的是蒋、冯、阎、桂各派军阀先后爆发为争夺中央权力而进行的战争。甘肃地区在冯玉祥国民军开赴反蒋前线后形成了新的权力真空，各地大小军阀趁机而起，如盘踞平凉的陈珪璋、盘踞固原的黄得贵、盘踞陇西的鲁大昌、盘踞天水的孔繁锦等。军阀之间为争夺权力，相互混战。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之后，甘肃全省宣布效忠南京国民政府，但此时的蒋介石由于忙于内战而无暇西顾，甘肃境内仍然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中心，地方军阀依然活跃于甘肃各地。

^① 甘肃省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农业志》第1卷，兰州大学出版社，第800页。

军阀并起时代的庆阳各地经历了各类大小军阀相继而起的统治。据《庆阳地区志》记载，1927年至1935年间驻防庆阳的军阀部队主要有：1927年甘军黄得贵部驻庆阳县药王洞和元城镇（今属华池县），同年，冯玉祥国民军进驻陇东并驱逐了黄部；1931年地方军阀陈珪璋接受蒋介石改编，驻防平凉和庆阳，陈部13旅高广仁部驻宁县旱胜镇，第五旅蒋云台部驻庆阳县西峰镇；1932年甘军新十一旅石英秀部驻防陇东，旅部先驻西峰，后移庆阳县城，部队分驻庆阳、合水和西华池；1933年，国民党第35师马鸿宾部治成章旅进驻环县木钵、曲子、洪德、环城一带；1934年10月，蒋介石嫡系61师361团驻防西峰镇。^①军阀统治庆阳期间，征兵派饷，横征暴敛，民不聊生。这点从当时陇东军阀陈珪璋给蒋介石的呈文中可以看到，自民国十五年冯军盘踞甘肃，谋窥中原，征兵派饷，民苦更甚，弱者死亡，强者为匪，因与乡人组织自卫团共谋自卫……^②

军阀统治的崩溃，给庆阳境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权力真空，形成了当时政治无序、社会失范的危机局面。民团、帮会、土匪等各类地方军事武装相继而起，造成庆阳境内混乱的军事政治格局。军阀统治的瞬息起落，给地方社会秩序的维持带来了极大的挑战。1928年以后，由各县地方士绅支持组建的民团武装应运而生，以维持当地社会的正常秩序。至1931年前后，合水有民团20多股，正宁有民团10多股。一般的民团武装组织为20人至30人，大的民团武装有上百人。其武器装备成为大刀长矛，成为现代化的步枪。后来这些民团武装有些参加了红军，有些为其他民团收编，有些自行解散，大部分于1937年被改编为各县的保安大队，成为地方政府控制的武装团伙。^③庆阳县（今庆城县）的民团武装于1927年成立，设区团、乡团，统辖乡村武装。到1937年县保安大队成立时，有官佐25人，士兵313人，步枪285支。^④庆阳境内的帮会武装主要是红枪会，它是1925年由陕西传入陇东各县，以烧香敬神，结拜兄弟等形式秘密组织武装，练武防身，抗击土匪，使用大刀长矛，后因思想迷信，武器落后，大部分被官兵和土匪击溃。

① 甘肃省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军事志》第4卷，兰州大学出版社，第340页。

② 《甘肃省代主席王柏等电述甘政分枝情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全宗号1，卷号1987。

③ 甘肃省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军事志》第4卷，第289页。

④ 庆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4页。

由于兵灾饥荒不断，庆阳境内土匪蜂起，股多名杂，危害极大，仅见诸史志记载的就有十多股。这些土匪武装规模不等，小股武装仅有数人，大的武装团伙有数千人之众。有些土匪武装乘国内军阀相互混战的局面，发展为后来称霸一方的军阀豪强，如20世纪30年初控制平凉和庆阳的陈柱璋军阀武装就是由土匪武装发展而来。

军阀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造成权力真空，给地方社会造成了强烈的不安全感，散兵、土匪、帮会、民团等各类地方军事武装兴起，他们相互倾轧，肆虐地方，使得社会秩序彻底失范。正如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这就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正是在这一形势下，陕甘边地区的共产党人拉开了武装暴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三、党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政策及其对根据地创建的影响

严重的自然灾害、残破的社会经济以及军阀混战的社会局面，使得广大人民群众迫切需要一个公正有力的政权来维持社会正义，领导他们改善生活，进行生产建设。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正是适应了当地民众求生存求稳定的需要，因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其社会政策主要有：（1）土地分配政策。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分给贫农、雇农和缺乏土地、牲畜的中农；地主家庭中参加劳动的成员，留给其他维持生活的土地和财产；红军家属有分得好地的优先权，凡家在苏区的红军一律分地，白军士兵暂不分地，应分部分留作公田；中心苏区分地，边缘地区暂不分配，随着苏区的发展逐步扩大分配区域。^①（2）财政粮食政策。发行苏币，建立集市贸易，保护小商贩，鼓励白区小商贩来苏区做生意；奖励农耕，发展生产，军粮主要取之于地主豪绅和向敌人夺取，对农民免征粮食；对红军家属、孤寡残疾人实行救济，争取

^① 甘肃省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党庆志》第4卷，兰州大学出版社，第285页。

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建立牧场，喂猪养牛。(3)文化教育政策。兴办小学，重视文化教育；颁布禁烟、禁赌、放足条例；信任并培养政治上清楚的知识分子。党的一系列土地革命和发展生产的社会改革政策，符合当地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得到了群众的普遍拥护和支持，极大地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这一点我们可以从20世纪30年代初著名新闻记者范长江的记叙中看出边区苏维埃政府是怎样得到群众支持和拥护的：“某县长曾在合水以东召集民众训话，数次中传，到者寥寥。而苏维埃召集开会，则二十四小时之内，可以立刻齐集百里以内之民众”，“政府军追过环县以北后，此事若繁星之民众，皆避不见面，使政府军之饮水粮秣，皆无法解决，道路亦无人引导，限于进退失据之苦境中……不能不归功于刘志丹之民众组织基础”。^①

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共产党的领导对于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决定意义。这就要求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②因受“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曲折和反复。当时的陕西省委受“左”倾错误思想束缚，反对刘志丹提出的在陕甘边南梁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而提出了在关中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主张。由于关中地区地处平原地区，居于交通要道，是西北地区的国民党统治中心，因而这种脱离客观实际的指导思想给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带来了重大挫折。1931年10月，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在南梁附近的林锦庙胜利会师后，陕西省委指示会师部队南下渭北建立根据地。但因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红色武装没能在渭北建立起根据地。当时陕西省委多数同志就对这种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提出批评，“我们首先检查到第一次杜同志（即杜衡）提出了攻取三原，结果因为省委多数同志的反对，纠正了这一错误。但是不久又以杜同志的意见为中心决定攻取三原，并以三原为中心，建立渭北临时苏维埃政权，这是十足的立三路线的军事冒险。这一错误的来源是：1. 对于国民党统治力量的过分的‘左’的估计，认为国民党军阀不能很快的——以至半月之久，开军队到三原来。2. 对于我们游击队的力量‘左’的估计，的确夺取大城市或截断渭河交通，还不是目前陕西红军游击队所能胜任的。”^③此后，陕甘边的党组织和红军在

①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7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9页。

③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70—71页。

陕甘边桥山南麓的照金开展创建苏区斗争。1933年6月中旬，杜衡又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华，他说，渭华一带有党的组织，群众基础好，紧靠终南山，地势险要，军事上可以切断陇海路，威逼西安。杜衡的南下方针受到了刘志丹等人的反对。刘志丹认为，渭华暴动失败后，党组织遭到破坏，群众被残酷镇压，情绪低落，红军到那里不易立足；红军若脱离陕甘边根据地困难很多，危险很大。但杜衡对刘志丹等人的意见横加指责，给他们扣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他不顾众人的激烈反对，强令红二团南下渭华，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围追堵截下，部队惨遭失败，损失殆尽。刘志丹等部队主要领导人脱险后，历尽艰辛重返照金，并在庆阳境内合水县的莲花寺恢复重建了红军第二十六军，最终开创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①

上述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说明，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生命线。正确的、符合地方社会实际的方针政策有利于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错误地脱离了地方社会客观实际的方针政策给根据地的创建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四、结 论

通过对20世纪初期陕甘边地区的庆阳地区社会经济状况、政治军事特征以及党在根据地创建过程中正反两方面政策得失的分析中我们看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正是立足实际，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成功实践。只有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客观实际相结合，才能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方针政策，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和路径选择。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把握。

作者：李庆勇，甘肃省庆城县博物馆工作人员。

^①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陇东革命史料选编》（二），1985年编印，第22—23页。

从中国革命的道路看陕甘边 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冯建霞

武装夺取政权，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在这极为严峻的形势下，要不要坚持革命？为何坚持革命？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亟待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照搬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在城市举行武装暴动，占领中心城市，然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另辟蹊径，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从中国式革命道路的角度论述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一、陕甘游击队的艰苦征战，标志着陕甘边区的武装斗争进入工农武装割据的新阶段

大革命失败前后，1927年7月11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陕甘区委改组为陕西省委。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精神，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党领导陕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通过了农民斗争和军事运动等9项决议，标志着陕西党组织已经完成了战略方针的转变。

陕西省委虽已意识到抓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但通过什么途径，怎样组建军队，还需探寻摸索。在清涧、渭华和旬邑等武装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情况下，从事了艰苦的兵运工作，但又屡遭挫折，他们逐步悟出：“没有革命的武装，将会一事无成”^①。经过几年的兵运活动，终于探索找到了革命发展的正确道路。正如谢子长后来所说：“搞革命武装，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还是要走井冈山道路。要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②。刘志丹也总结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象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③

1931年9月，刘志丹在兵运工作失败后，将分散活动于合水、庆阳山区的赵连璧、杨培胜、贾生财的三支民间武装，^④ 集合于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进行整编，建立起陕甘边地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工农武装——南梁游击队，全队共300余人，编为三个大队，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任军需。南梁游击队建立后，刘志丹汲取搞兵运的经验教训，坚持以南梁为中心，依托桥山山脉开辟南梁游击区，首战二将川，消灭张廷芝一个骑兵团。接着又击溃合水民团的进攻。一时游击队的名声大振，开创了陇东游击战争的新局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9月22日，中共中央号召组织群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0月下旬，阎红彦、杨重远率领陕北游击支队（即晋西游击队及其与之联合的商保武装）辗转来到南梁附近的林锦庙同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胜利会合。两支部队会合后，建立了中共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任委员。12月，部队转移到正宁县月明珠北梁桥子。1932年1月初，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支队长，杨重远任参谋长。同时，建立了中共西北反

① 王子宜：《学习刘志丹同志的高尚品德》，载《革命英烈》1981年第2期。

② 贾西军：《回忆子长同志》，载《革命英烈》1982年第1期，第16页。

③ 甘肃省党史委：《陕甘革命根据地时期党在陇东地区的活动》（讨论修改稿），1987年8月稿中，第5页。

④ 三位头领均系晋大仇深的世苦农民，因不堪忍受残酷的压迫与剥削，被迫拉起“绿林”武装，占山为王，与井冈山的黄文才、王祝星同一性质的民间武装。

帝同盟军党委，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等为委员，两个支队亦建有中共党支部。

1932年2月初，西北反帝同盟军移驻正宁县三嘉岭整训。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岭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中共陕甘游击队队委会，李杰夫任书记。陕甘游击队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边区正式成立了工农红军，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进入到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新阶段，揭开了陕甘边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序幕。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即遵照陕西省委的预定方针，挥师南下，2月13日攻占旬邑职田镇，15日阳头坡一战大获全胜。然后转战于耀县、同官（今铜川）、宜君等县。3月19日，奔袭正宁县山河镇，因向导迷路，错过战机，计划未实现。当晚，队委会召开会议，决定依靠地方党组织，开辟寺村塬革命根据地。

1932年3月20日，陕甘游击队进驻正宁县寺村塬，以这里为中心，发动周围72村的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斗地主，分财物，成立赤卫军、贫农团、妇女会等组织。22日，在游击队总指挥部的指导下，召开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寺村塬革命委员会”，^①开展土地革命。这是陕甘边地区建立的第一个革命政权，虽然为时很短，却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一次有益尝试。

4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陕甘游击队巡视，刘志丹同路返队。21日，陕甘游击队离开寺村塬，奇袭旬邑县城，全歼守敌300余人。24日，杜衡在旬邑批评陕甘游击队负责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将部队改编为3、5两个支队，第3支队队长刘志丹，参谋长吴岱峰，第5支队队长阎红彦，参谋长杜重远。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队委会也随即消失。4月下旬，陕甘游击队进入陕西西部和渭北地区活动，强烈地刺激了敌人，使之部署重兵“围剿”陕甘游击队。为了统一指挥，陕西省委决定重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队委会，刘志丹任总指挥，李杰夫任队委会书记。在刘志丹指挥下，部队半个月内在永寿、礼泉、乾县、彬县、郿县、洛川、中部、宜君等地，作战9次，共歼敌1400余人，

^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0页。

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但就在这时，陕西省委指示陕甘游击队东进韩城，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结果遭到陕军重兵“围剿”，损失惨重，刘志丹不得不率部向陇东转移。

6月下旬，刘志丹率部撤到宁县麻子掌，部队士气低落，思想混乱，在行动方向上发生了南下三原和北上桥山的分歧。为此，陕甘游击队队委会在麻子掌和梁掌堡两次召开会议，统一了认识，作出了以桥山山脉为依托，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决定。会议选举阎红彦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队编成三个大队，刘志丹任2大队队长兼政委。此时，谢子长在暗运组织兵变失败后东返。7月9日，在谢子长策划下，杨林、高鹏飞等人发动了西华池兵变，拉出170余人参加红军，编为陕甘游击队的一个大队，大队长高鹏飞，政委阎润平。西华池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在甘肃领导的唯一完全成功的起义，震惊了敌人，壮大了红军游击队的力量，给处在困境中的陕甘游击队以有力的支持。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根据陕西省委的报告，作出了《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新苏区的决议》。6月1日，陕西省委根据中央决议精神作出了相应的决议。7月23日，陕西省委派李良到陕甘游击队传达省委关于创建陕甘新苏区与红二十六军的指示，并担任陕甘游击队的政委。李良到后，推行“左”倾错误，批判所谓的“机会主义领导”。他不顾敌人准备“进剿”游击队的严重形势和刘志丹、阎红彦等人的反对，在正宁县南邑村连续召开干部会议，空谈创造新苏区和红二十六军的问题。8月初，当敌人向游击队发起围攻时，游击队仓促应战，李良先是命令部队强攻王郃坡寨子，失利后又要求“死守五顷塬”。游击队与敌人打了3次硬仗皆败，部队伤亡惨重，最后只得分散突围。8月24日，突围出来的指战员在马栏聚齐，近500人的队伍锐减至200余人。陕西省委对李良的错误作了严肃处理，但仍然强调改造游击队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撤销了阎红彦的总指挥职务，重派谢子长任总指挥。

陕甘游击队在马栏稍事休整即进入耀县照金一带活动。9月12日，照金战斗获胜，歼敌400余人。敌人又调重兵合围，游击队在保安县城、瓦子川、墩儿梁连战失利，伤员增多，给养更加困难，队委会决定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渡过难关。经过近两个月的休养生息，部队恢复了元气，军威复振。

12月18日，杜衡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陕西省常委身份来到陕甘游击队，对部队一年来的活动横加指责，诬蔑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等有“反革命阴谋”，攻击他们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柏山主义”、“土匪路线”、“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撤销了他们的领导职务，强令他们离队去上海中央局“受训”。由于谢子长等力争，刘志丹和杨重远才勉强被留下。1932年12月24日，杜衡在宜君县转角镇（今属旬邑）召开军人大会，宣布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并举行授旗仪式。^①杜衡任军政委兼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刘志丹任政治处长。下辖4个连，共200余人，有长短枪150余支。

红二团组建以后，根据省委的指示，决定开展山区游击战争，在照金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因为，这里沟壑纵横，山峦叠嶂，地势险要，位于6县之交。12月27日，红二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歼焦坪之敌60余人，很快开辟了香山、九保两个地区。接着部队南下，消灭照金、旬邑民团各一部，将根据地扩展到照金薛家寨地区。红二团很快发展至300余人，并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起照金、旬邑、宜君、香山等5支游击队，初步打开了局面。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成立，书记金理科，军委书记习仲勋。同时还成立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李妙斋任总指挥。4月5日，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召开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副主席习仲勋。不久，又成立了照金、马栏等基层革命委员会。至此，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面积2000多平方公里。

4月中、下旬，红二团经过20余天的机动作战，消灭了一批敌人，队伍扩大到近500人。此时，杜衡却头脑发热，不顾刘志丹等人的反对，强令红二团南下，创建渭华新苏区。6月21日，红二团从北梁出发，次日抵达三原。杜衡借口向省委汇报，只身离队（不久被捕叛变）。红二团抢占了渭河渡口，歼敌30余人。当日中午，部队向临潼进发。红二团冲破国民党陕西警一旅的围追堵截，且战且走，退入秦岭山区，与敌周旋。7月，部队在蓝田县张家坪与敌激战竟日，恶战之后，只剩100多人，分股突出重围，历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刘志丹传略》，载《建国以来刘志丹研究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页。

经济难，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掩护下，先后返回照金。由于红二团南下并惨遭失败，照金根据地处在危境之中。1933年10月中旬，坚持了10个月的照金根据地被敌占领。

陕甘游击队在艰苦征战中创建的寺村塬根据地、照金根据地，存在的时间虽然都不长，但它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后来陕甘边地区武装斗争的发展壮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有益的借鉴。

二、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发展，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的成功实践

1933年6月下旬，在红二团被迫南下后，陕甘边特委领导地方游击队继续坚持斗争。7月21日，在陕西省委领导下，杨虎城部骑兵团团长王泰吉在耀县率部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受挫后，与新成立的耀县游击队先后转入照金根据地，壮大了在艰苦环境中坚持斗争的根据地的武装力量。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尚任政委。会议决定今后的战略方针是：不打大仗，打小仗，集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打击敌人。10月4日，刘志丹由南山脱险回到照金，即被任命为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陈家坡会议后，红军集中指挥，频频出击，节节胜利。敌人又气又恨，急调陕军4个正规团和三原、耀县、淳化等6个县民团共6000余人，向照金根据地发动进攻。临时总指挥部分析敌情，认为敌兵力较大，不宜在狭小的根据地内与其周旋，决定红军主力转到外线，寻机歼敌。10月12日，王泰吉、刘志丹率红军北上。主力红军北上后，敌军在叛徒陈克敏的带领下，攻占薛家寨，照金根据地陷落。转入敌后的红军主力，首战合水县城，毙俘200余人，再战庆阳三十里铺，消灭了当地民团，接着在合水毛家沟门，歼敌200余人，三战三捷，重挫了敌人的锐气，大振了红军的声威。

照金根据地的丧失，使陕甘红军再次陷入无后方的困境。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葛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根据刘志丹的建议，总结了以往武装斗争的经验，讨论了部

队改编，根据地建设和今后行动方针等问题。会议决定：第一，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先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三团和骑兵团，共500余人。第二，以桥山山脉为依托，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作为红二十六军的军事后方。第三，开辟三路游击区（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成立第一、二、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包家寨会议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和红军的领导人，运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理论，解决陕甘边区革命实际问题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它是陕甘边革命斗争从挫折走向勃兴，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会议在陕甘边革命斗争处于彷徨困难的时刻，及时清算了“左”倾错误，作出了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根据地的正确决策，从而把陕甘边地区的革命斗争引导到坚持中国式革命道路的胜利轨道。

11月中旬，红四十二师进入南梁地区，全面展开了创建南梁根据地的斗争。南梁位于甘肃省庆阳县与合水县境内（今属华池县），地处桥山山脉中段大梁山南麓，在甘肃庆阳、合水、陕西富县、保安（今志丹县）四县之交，黄河第三级支流葫芦河上游及各支流川道皆是其范围，以荔园堡川的南梁堡为中心，方圆达百余里，地势险要，敌人统治力薄弱，是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理想之地。为了廓清南梁地区的外围，红42师主力转入外线打击敌人，部队先后击溃岳秀部一个营，全歼新堡民团和赵沟民团，消灭陕西警备骑兵团四个连。这些战斗为建立南梁根据地打下了初步基础。部队还利用战斗间隙，分兵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建立农会组织，并建立了约1000人的赤卫队。

1934年1月上旬，红四十二师返回南梁地区。因王泰吉去河南做兵运工作（不久牺牲），^①刘志丹继任师长，高岗因犯错误被撤职，杨森接任政委。2月25日，师党委在小河沟四合台村主持召开群众大会，成立陕甘边根据地临时政权——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选举习仲勋为革委会主席，白天章为副主席。革委会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军事、文教等委员会。革委会的成立，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基本形成。

红军和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民党陕甘当局的惊慌。2月，陕甘

^① 习仲勋，《怀念王泰吉同志》，载《陕北革命史料选编》（二），第10页。

军则以 8 个团的兵力分 8 路向南梁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企图将新生的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中。刘志丹与红四十二师党委分析敌情后，制定了以第三路游击队牵制和袭击南线之敌，红四十二师在第三路游击队配合下转入外线打击敌人的战略方针。红军主力从耀县出发，相继攻打了陕西的瑶曲、石板、五里镇、店头等地，歼敌百余人。3 月中旬，红四十二师用声东击西战术，袭击了保安蒿家砭，消灭了该地民团。接着奔袭庆阳元城、高桥、赵栗子的国民党军与民团。4 月 2 日，在赤水西华池全歼国民党“围剿”主力部队王子文团两个营及一个机炮连共 700 余人。西华池战斗后，红四十二师主力南下支援第二路游击队作战，5 月中旬，先后取得了三里塬、和尚塬、瓦子川战斗的胜利，迫使窜入南梁地区的国民党部队和民团狼狈退出，陕甘边根据地军民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1934 年 7 月 25 日，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谢子长率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来到南梁，同红二十六军共商对策。7 月 28 日，中共陕甘边特委与中共陕北特委在网家洼子召开红二十六军和陕北游击队干部联席会议。会议宣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信。这两封信仍坚持“左”倾路线错误观点，不顾客观事实，否定红二十六军开创陕甘边根据地艰苦卓绝的斗争。对于这种指责，陕甘边根据地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用根据地创建和红军与游击队发展壮大的事实，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会议决定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北上陕北，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会议还推荐谢子长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会后，在中共陕甘边特委和刘志丹的热情支持下，调拨给陕北游击队 100 支枪和数百枚银圆。

网家洼子会后，中共陕甘边特委作出了《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又称七月决议。决议对陕甘边今后的工作做了全面部署，提出的主要任务是：积极恢复和建立党组织，深入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普遍开展游击战争，扩大与巩固红军，扩大根据地，恢复照金苏区，打通陕北苏区，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加强政权建设，建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推进边区的革命斗争。各地根据决议精神，迅速掀起了革命斗争高潮，使陕甘边根据地进入大发展时期。到秋季，在陕甘边界的 18 个县的部分地区相继成立了正式或临时的革命政权。

1934 年 11 月 4 日至 6 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

到会代表 100 多人。会议就根据地的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土地、财政、粮食等决议案。正式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下设土地、劳动、粮林、财政、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为刘志丹，赤卫军总指挥为朱自清。同时，在原革命委员会保卫队基础上，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郭锡山任大队长。11 月 7 日，举行了盛大的成立典礼和庆祝活动。此后，随着边区苏维埃政府的诞生，许多县区也先后建立了红色政权。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是西北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成为当时中国革命中形态较为完整的“工农武装割据”地区。

历史的经验值得总结，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沿着“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在陕甘边地区开创出武装斗争的新局面，其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因为三个“坚持”。

第一，坚持看准了的目标不动摇。创建革命根据地，是走中国式革命道路的核心。但是，在哪里建立根据地？就成为核心的核心。1931 年秋，刘志丹和马锡五曾经在桥山山脉中段南梁一带作过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最先提出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构想。当时这个想法没有被其他领导人所接受，就形成了此后较长时间的争论与斗争，其焦点是在临近敌人统治中心的平原还是在远离敌人统治中心的山区建立根据地。经过南下渭北和东进韩城两次失败的教训，到 1933 年 11 月包家寨联席会议上，陕甘边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才认识到刘志丹提出的在以南梁为中心的桥山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是正确的。会后的史实证明，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发展，是刘志丹等领导人坚持看准了的目标不动摇，坚持走中国式革命道路的成功壮举。

第二，坚持与“左”倾领导者的错误作斗争不妥协。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发展过程，也是以刘志丹、谢子长等执行正确主张的党和红军领导人与执行“左”倾的陕西省委领导杜衡等人错误主张的斗争过程。杜衡等人凭借权力，搞宗派活动，一次次否定刘志丹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和主张，还给他们加了“游击主义”、“桥山主义”等许多罪名，甚至蛮横地将他们排斥出领导岗位。刘志丹等党和红军的领导人虽然违心地服从“左”倾领导的错误决定，但他们在思想上对“左”倾领导者的错误主张进行了坚决的抵制，从不苟同和妥协。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是刘志丹等同志坚持走中国革

命道路的胜利成果。

第三，坚持在实践中探索不停止。陕甘边和陕北地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北方唯一成功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斗争的地方。这里，不仅在四周有白色政权的包围，而且远离党中央和开展武装斗争较为活跃的南方，党中央的决定和指示经常迟到甚至收不到，加之当时党中央领导集体中也有“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因此，陕甘边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在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实践中，带有很强的选择和探索的性质。他们以创建武装、开展游击战争为先导，开辟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经过创建寺村塬、照金等根据地政权的摸索实践，最终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后又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西北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对中国革命做出了伟大贡献。

三、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发展而成的西北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在坚持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中硕果仅存的根据地

在陕甘边根据地发展壮大的同时，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也有了很大的发展。1934年夏秋，陕北游击战争已经发展到延河流域，陕甘边的游击战争则推进到洛河川。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之间相距不足百里，西北革命形势出现了统一的趋向。1935年1月，经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巡视员黄翰建议，陕甘边特委书记惠子俊、军委主席刘志丹等率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北上陕北，到赤源县（今子长县）灯盏湾看望正在养伤的谢子长，^①就统一陕北与陕甘边两块根据地的领导等问题，达成共识。2月5日，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岭召开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两块根据地的党和军队。西北工委书记惠子俊（未到职前由崔田夫代理），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一说谢子长^②）。会议确定了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并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刘志丹传略》，《建国以来刘志丹研究文集》第25页以及《陕北红军和苏区主要创建人——谢子长》，《人民日报》2009年7月29日第2版中，均称根据地。

^② 1934年8月26日，谢子长在清涧河口战斗中负伤，1935年2月31日逝世，时年38岁。

任总指挥，高尚任政委。西北工委和军委的成立，标志着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统一和西北根据地的形成。从此，西北革命斗争向更高阶段发展。

1935年春，西北地区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使蒋介石极度不安，急调驻河南的高桂滋部八十四师及陕、甘、宁、晋四省军阀部队约5万人，对西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此时，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主力还只有4000余人，游击队也不过3000余人。面对这种形势，西北工委和军委同意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多数同志的意见，部队向南发展，进攻延长、延川、保安、安塞，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为一片。刘志丹亲自为西北军委起草了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根据地党政军民立即投入战斗。

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从1935年1月15日南沟岔战斗开始，到8月21日定仙娥战斗结束，历时半年多。红军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6座县城，消灭敌人正规军5000余人，民团武装3000余人，缴获枪支8000余支，子弹数十万发。开辟了甘泉、富县、宜君、定边、环县等游击区，实现了陕北根据地和陕甘边根据地的统一，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在陕北地区，国民党当局只能控制一个完整的榆林县和绥德、米脂、神木、府谷、横山、延安等县城，广大农村基本上都成了红色区域，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政治形势。

在第二次反“围剿”接连取胜之际，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正在穿越渺无人烟的茫茫草地。长征快要到达陕北的时候，1935年7月，蒋介石又调兵遣将，部署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自任总司令，除原有陕、甘、宁、晋等省地方军阀部队外，又增调了东北军张学良部和中央军毛炳文部等，共十余万兵力，分五路向西北根据地进攻。刘志丹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制定了集中主力红军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趁敌部署尚未就绪，8月下旬，首先在定仙娥歼灭阎锡山部一个团，迫其退回山西。接着又集中兵力进攻北线敌人，牵制了国民党十多万军队，减轻了长征路上各路红军的压力。正在此时，徐海东、程子华等率领红二十五军，由鄂豫陕苏区西征北上到达陕北。刘志丹起草了《为欢迎红二十五军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并派习仲勋、刘景范前去迎接。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在延川县永坪镇胜利会师。为统一红军指挥，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发动了劳山和榆林桥战役，为粉碎敌人第三次

“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就在这紧要关头，“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在西北根据地实行错误的肃反，逮捕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干部，造成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幸好，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及时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使西北根据地转危为安。11月20日至24日，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歼灭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10月22日和23日，红二方面军的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分别在将台堡、兴隆镇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由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发展而成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坚持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不仅是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而且是抗日战争和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实践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理论，不仅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而且为马列主义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作者：冯建霞，女，延安革命纪念馆编研部副主任，文博馆员。

论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赵晓红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陕甘边区革命斗争实际相结合，创造性运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积极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理论的成功实践成果，从而成为“硕果仅存”的陕甘根据地和新中国雏形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为中国革命做出巨大贡献。

一、创造性运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陕甘边根据地得以创建的根本原因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党为挽救革命、寻找革命新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一大批共产党人，经过创建、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首先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探索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的紧密结合。毛泽东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的因素。”^①到1930年夏，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8页。

全国已建立革命根据地 15 块之多，红军和地方革命武装发展到约 10 万人，使中国革命走出大革命失败的低谷重新走向高涨。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创建和发展壮大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正如习仲勋所说：陕甘边根据地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原因是，“首先，党组织把革命斗争的重点始终放在农村，贯彻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很坚决”^①。事实上，刘志丹、习仲勋等西北共产党人不但“贯彻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很坚决”，而且以马列主义、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为指导，结合陕甘边实际，创造性地运用“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创建根据地，突出表现为：

1. 从陕甘地区实际出发，组建革命武装力量，开展武装斗争

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为创建革命武装进行了艰苦的探索。陕甘地区的党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于白色恐怖之时，来到陕甘宁军阀部队中开展兵运工作，培养骨干。西北共产党人在组织和参与开展兵运工作中认识到必须建立强大的、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自己的军队，并在总结和汲取兵运工作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出依靠兵运骨干，改造“绿林”武装，组织农民游击队，创建党所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的方式。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于 1930 年 10 月发动“太白起义”，创建了南梁游击队。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第一次抛弃军阀番号创建的陕甘边地区中共独立领导的红色武装。1931 年 9 月在合水县倒水湾进行整编，10 月下旬在林德庙与陕北游击队会合，后来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1932 年 2 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同年 12 月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时辖红二团，后发展到 5 个团）。红二十六军在党的领导和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在陕甘边界坚持艰苦卓越的武装斗争，成为开展土地革命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骨干力量和军事保障。

2. 制定有利于群众利益的土地政策，推动土地革命运动

土地问题是革命的基本问题。在陕甘边根据地创建过程中，陕甘边区的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序言第 1 页。

党和红军始终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从实际出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运动。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创后，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土地革命工作，依据《井冈山土地法》的原则，结合陕甘地区实际和过去的斗争经验，确定了当时的土地革命方针，重点放在消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上。主要采取在根据地中心区域分配土地，敌占区、边缘区暂不分配土地，以打土豪、分浮财为主，随着根据地的逐步扩大和巩固再扩大分配范围。这种有利于农民大众的土地政策，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的重要条件。陕甘边区的土地革命，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热情，使土地革命成为红军的力量源泉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促进了根据地的创建和红军的发展壮大。

3. 始终把创建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作为革命的主要任务

在创建红军、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陕甘边区党组织始终把建立根据地作为中心工作任务，因为革命根据地是进行武装斗争的基地和依托。刘志丹对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非常清楚。1932年夏，在总结革命斗争的成败得失时曾对习仲勋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象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队，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①。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的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历程长达6年之久，经历了以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为活动中心的三个发展阶段。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后，于1932年3月在正宁县寺村塬建立红色政权——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揭开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序幕。1932年8月下旬，由于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游击队接连失利，被迫撤离寺村塬，根据地丧失。1933年初以陕西耀县为活动中心，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10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对照金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根据地失

^① 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第3版。

守。1933年11月后，以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在南梁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从而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走上了健康发展道路。到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标志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巩固。

总之，陕甘边党组织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的建设有机结合，走具有陕甘边特色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使武装斗争真正成为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中心支柱，土地革命成为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基础，根据地建设成为党领导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依托。创造性运用“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壮大的根本原因，也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理论的有益探索和成功实践。

二、从实际出发不断抵制和克服“左”倾错误，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毛泽东于南方领导创建中央根据地之时，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西北共产党人，就在远离革命中心的陕甘地区，依据陕甘边区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具体实际，为寻求适合西北革命发展的道路而进行艰苦的探索和斗争。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虽然有了马列主义、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指导，但是因受国民党长期而残酷的“围剿”和党内“左”倾错误的干扰而历经险阻，几经起伏。

陕甘边根据地在创建过程中，由于寺村塬、照全根据地的丧失，不得不两次转移活动中心。究其原因，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即国民党反复调集重兵“围剿”以及红军、根据地本身发展不够十分强大和革命活动中心的选取不够理想。而“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和干扰则是其直接原因。在陕甘边游击战争蓬勃发展和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建立后，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于1932年4月来陕甘游击队巡视工作，指责游击队“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错误”，令陕甘游击队撤离寺村塬并改编游击队分散活动，结果被强敌围攻，1400余人仅剩200余人，只得退回寺村塬。7月，陕西省委派李良任红军游击队政委，李良推行陕西省委关于取消游击战，主张阵地战和平原战的错误主张，在强敌“围剿”之际，错误指挥，导致游击根据地丧失。在以照全为中心陕甘边区根据地创建后，杜衡仍坚持推行“左”倾错误，在组

织上搞宗派主义，对党内持不同意见者大力排斥；在军事上推行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强令红军放弃照金根据地南下打关中，最终不仅断送了红二十六军，而且照金革命根据地也随之丧失。

以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陕甘边领导人坚持走井冈山道路，始终认为南梁地区是陕甘边区革命斗争中心的首选。因为南梁位于陕甘两省交界，地处桥山山脉中段大梁山麓，有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地理条件，同时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并有很好群众基础。在陕甘边革命斗争和红军处于危机的时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于1933年11月3日至5日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在深刻剖析批评“左”倾错误对陕甘边革命斗争的束缚和影响的基础上，根据刘志丹等人的建议，会议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以南梁为中心再创革命根据地。为确保南梁中心根据地的开辟，将陕甘边区划分为三个游击战略区。实践证明，包家寨会议所确定的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至此，陕甘边武装斗争由失败走向胜利，陕甘边根据地走向健康发展道路。毛泽东后来赞誉道，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

有学者称包家寨会议是陕甘边党史上的“遵义会议”，这是因为包家寨会议使根据地的创建转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为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到1934年11月，创建了巩固的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使陕甘边根据地进入最辉煌发展阶段。而此时“左”倾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使南方革命根据地丧失殆尽，党中央和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寻找新的立足之地。

三、党的领导、民众的支持和根据地的全面建设，使陕甘边根据地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全国最稳固的革命根据地

1. 坚持党的领导是陕甘边革命斗争胜利的政治保证

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艰难历程中，形成了以刘志丹、习仲勋为主的领导集体，他们为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壮大做出了特殊贡献。突出表现为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陕甘边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紧紧

依靠群众，坚决同“左”倾错误作斗争，在远离中共中央及至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立足实际，独立解决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制定和实施适合陕甘边区实际的正确方针和政策，使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取得了胜利。

2. 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是陕甘边根据地创建发展的根本前提

兵民乃胜利之本，创建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的最深厚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刘志丹等共产党人能在陕甘边屡挫屡起，就是因为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以南梁为中心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中，由于民众的广泛参与，得以建立各级各类群众组织，从而依靠群众组织发起形成“工农武装割据”的群众运动。正因为这样，在危难时刻，军民同仇敌忾，以血肉之躯铸就捍卫革命根据地的铜墙铁壁。1934年5月，国民党对陕甘边根据地发起“围剿”，在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之时，国民党仇良民、谭世麟部1000余人进占南梁，肆意烧杀。为保护红军的武器弹药，老雇农武万有被敌人活活打死；为保守革命机密，金岔沟农民联合会主席白养珍等6人被敌人杀害，42名革命干部、群众在阎家洼子等地被敌人活埋。这些都没有吓到英勇的陕甘边人民群众，他们依然义无反顾地支持革命，成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坚强后盾。

3. 全面进行根据地建设，是陕甘边根据地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

根据地的建设首先是政权建设，因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西北共产党人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过程中，非常重视政权建设。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一经成立，即着手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政令、法规，全面展开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各级政府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加强军事建设，开展“扩红”运动，扩大苏区；兴办文教，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积极开展统一战线，期间曾争取郭宝珊绿林武装起义，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成为红四十二师一支主力团队。

为巩固红色政权和经济建设，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边党政军领导人做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特别是在根据地经济建设方面采取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策略。战争年代国民党当局用来对付根据地军民的主要手段，一

是军事“围剿”，二是经济封锁。因此，根据地打破经济封锁是取得反“围剿”胜利的基础。根据地的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为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采取于民生息方针，减轻农民负担，促进经济发展，密切党群、军民关系；发展贸易，也是根据地经济工作的重要方面，发行货币，设立集市，特别是与白区商人建立贸易关系的政策，就是在今天看来，也极具前瞻性，从而使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的根据地发生巨大变化，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进入辉煌发展阶段，成为当时全国最稳固的革命根据地。

四、与陕北根据地携手协作促使陕甘边根据地发展壮大，并在其基础上最终形成统一的陕甘根据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陕甘地区存在着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活动区域。陕甘边根据地在刘志丹、习仲勋等共产党人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多次“围剿”，仅1934年就对南梁中心根据地发起三次“围剿”。根据地人民与红军、游击队、赤卫军以血肉之躯铸起保卫根据地的铜墙铁壁，经大小三十多战，取得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并使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逐步发展到包括淳化、富县、中部、宜君、旬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保安、安塞、靖边、耀县、甘泉等十几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各县相继建立红色政权，武装力量得到迅速壮大，从而使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进入大发展阶段。

在陕甘边根据地创建的同时，陕北游击战争也逐步开展起来了，到1934年3月间，陕北游击战争遍布11个县，逐步形成了安（定）清（涧）、绥米佳吴和神府三个小块游击根据地。1934年5月，国民党八十六师向陕北各游击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7月下旬，谢子长等率陕北游击队主力来到南梁，共商破敌之策。7月28日，在南梁阎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分析陕甘边和陕北的革命斗争形式，确立了陕甘边、陕北根据地互相配合和协调作战的战略方针。会后陕甘边区党政军调拨100支步枪和数百块银圆支援陕北游击队，并派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主力红三团随谢子长北上陕北。红三团到陕北战场后，与陕北游击队协同作战，四

战四捷，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推动了陕北根据地革命斗争蓬勃发展。9月中旬，红三团返回南梁。10月初，红三团再次转战陕北，配合和支援陕北红军游击队的斗争。11月中旬，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派杨琪到陕北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巡视员，协助开展陕北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陕北军民的英勇战斗，逐渐使被敌人分割的小块游击根据地连成一片。1935年1月成立了陕北区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也同时成立。

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在反“围剿”斗争中始终以革命大局为重，密切配合，协调作战，使陕甘革命斗争在更广阔区域广泛发展。到1934年夏秋，陕甘边游击战争推进到洛河川，陕北游击战争发展到延河流域，两区相距不足百里。1935年春，蒋介石在重兵追剿长征红军的同时，调集4万余兵力，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起第二次“围剿”。2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安定（今子长）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统一了两根据地军队和组织领导，使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后红二十六军主力再次北上陕北，与红二十七军协同作战，挫败了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时采用过的堡垒战术，攻克6座县城，使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统一的陕甘根据地。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陕甘边根据地是陕甘根据地形成的重要基础和组成部分。而陕甘根据地的形成为党中央和长征红军落脚陕甘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更为以后的中国革命大本营陕甘宁边区创造了条件。

五、陕甘根据地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此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实行武装割据，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创建了众多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从农村开始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然而，王明“左”倾错误影响，使党遭受严重损失，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几乎损失百分之百。农村革命根据地除陕甘根据地外，均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中共中央和红军被迫先后撤出根据地实行战

略转移。正如毛泽东所说：“结果只剩下一个陕北。”^① 陕甘根据地在刘志丹等领导下，在接连粉碎蒋介石军队“围剿”的斗争中不断巩固、扩大，先后建立了45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成为土地革命时期全国唯一坚持下来的红色区域。正是这块唯一坚持下来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坚实的立足之地。

1935年8月，蒋介石又调动十万兵力对陕甘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根据地军民英勇抗战，刘志丹率领主力红军连连取胜。时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与陕甘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配合长征红军北上。10月19日，中共中央、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11月21日至23日，毛泽东直接指挥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从此，陕甘根据地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入一个崭新的波澜壮阔的发展时期。为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扩大抗日红军力量，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东征山西、西征甘宁，同时极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到1936年首先与东北军、西北军达成“三位一体”统一战线，接着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既促成了国共两党一致抗日，又使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至此，中国共产党立足陕甘根据地，在此基础上巩固发展为陕甘宁边区，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和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中心，并最终取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作者：赵晓红，女，中共甘肃省庆阳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① 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第360页。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历史经验及其历史意义

王晋林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遵照党的指示，创造性地把毛泽东红色政权的理论和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把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结合起来，坚持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经过极其艰苦曲折的斗争，成功地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最终与陕北根据地发展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创建最早革命根据地，也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不仅开创了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新局面，也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创造了条件，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历史经验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创建时间最早的正式的工农民主政府，是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在西北地区的具体实践结晶，它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

1. 坚持走井冈山的道路，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坚持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是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必由之路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坚持革命，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党的领导下，先后在甘肃、陕西地区组织和领导的一系列武装起义和兵运工作，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加之受主观“左”倾错误的影响大都失败了。三年多来武装起义和兵运工作失败的沉痛教训，使他们逐步地深刻认识到，斗争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装，没有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因此，从1931年开始，他们根据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积极组建革命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红色政权，以完成在积极开展当地的游击运动中，创立新的红军队伍及陕甘边苏维埃的任务。^① 经过三年多英勇顽强、艰苦卓绝、曲折复杂的斗争，几经挫折和反复，最终于1935年底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后在反“围剿”斗争中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逐步发展成为统一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坚持实践“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成果，是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在陕甘边区的生动体现，是坚持走井冈山道路的成果。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开创了西北革命斗争的新局面，使红军和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有了后方依托，使土地革命斗争有了可靠的战略基地，使西北地区的土地革命斗争得到迅速发展。习仲勋指出：“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全国各个根据地一样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走井冈山的道路。”^②

2. 不断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是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军事基础

武装斗争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主要斗争形式，只有建立强大的革命武装，才能开展武装斗争，以革命的武装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才能创建革命

^① 《中共中央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1932年4月20日，见刘国凯、任惠公主编：《红二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142页。

^② 《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上卷），第218页。

根据地并得以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在建立陕甘红军游击队的基础上，创建了西北地区第一支正规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红二十六军和红军游击队在刘志丹等的领导下，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在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军事“围剿”斗争中，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运动中大量地歼灭敌人，不断地发展和壮大革命武装，使根据地创建和发展有了坚强保证。随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在游击战争的洗礼中，革命武装迅速发展壮大，到1934年底，红二十六军发展到2000多人，红军游击队扩大到3000多人，赤卫军发展到5000多人，随着革命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主力红军和红军游击队的武器装备有了较大的改善，政治素质、军事技术和作战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成为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坚强柱石。

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①在创建和发展根据地的游击战争中，中共陕甘边特委和南梁政府组织、领导根据地人民群众踊跃支前，开展战勤服务工作，组织担架队、运输队运输物资，抢救伤病员等；配合和支持主力红军和红军游击队作战，建立赤卫队、步递哨等组织，为红军站岗放哨、侦察敌情、传递情报等；广泛开展“扩红”运动，实行自愿兵役制度，在赤卫军、少先队的基礎上建立游击小组，并积极参加红军和游击队。在根据地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地人民为保卫和巩固土地革命的成果，在人力物力上大力支持革命战争，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正是紧紧依靠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革命武装才得以发展壮大，游击战争才得以广泛开展，革命根据地才得以迅速地创建和发展。

3. 坚持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对土地最迫切的要求，不断加强根据地建设，是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群众基础

开展土地革命，铲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心内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创建和发展中，始终坚持实行土地革命，在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6页。

南梁政府建立之前，根据地就开展了以打土豪、分浮财、废除地主债权为内容的土地革命斗争。南梁政府建立后，按照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和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决议案》的精神，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和法令，组织和发动根据地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以分配土地为主要内容的土地革命斗争。通过开展土地革命，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消灭了千百年来存在的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了农民对土地最迫切的要求，充分调动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使他们把自己的切身利益与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踊跃参加革命武装，积极支持革命战争，为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可靠的群众基础。

陕甘边根据地党和政府在深入开展土地革命的同时，为巩固和促进根据地的发展，认真地总结了根据地创建和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在不断地加强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建设中，从根据地建设的实际出发，先后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比较完善的政策和法令，促进根据地各项事业的建设。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顺利进行，也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各项建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4. 坚持党的正确领导，不断克服“左”倾错误的影响和干扰，是根据地创建并得以发展的根本保证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和干扰，刘志丹、谢子长多次受到打击和排挤，使陕甘红军和红军游击队几遭严重损失，使刚开辟的正宁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以及后来创建的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根据地等先后丧失。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实际斗争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甘边党政军领导同志逐步认识到“左”右倾错误的危害，对“左”右倾错误路线在陕甘边根据地创建中的影响不断地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当时，绝大多数同志是团结在刘志丹领导的正确路线下，进行了英勇的胜利的斗争。”^①在创建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他们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在认识和总结根据地创建的经验教训后，从陕甘边创建革命

^① 《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66页。

根据地斗争的具体实际出发，把坚持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相结合，最终建立了南梁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在反“围剿”斗争中逐步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坚持贯彻执行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不断地克服来自党内“左”右倾错误干扰和影响，革命力量才能得以发展壮大，革命根据地才得以创建和发展。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是革命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根本保证。习仲勋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陕甘边的党组织、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经历了长期而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和来自党内‘左’右倾路线的干扰，历遭艰险，几经起伏，终于使红日驱散乌云，胜利的曙光映红陕甘高原的山山水水，把苏维埃的种子传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中国西部，成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①

5. 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壮大革命力量，是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创建和发展中，根据地党和苏维埃政府吸取了以往革命斗争中的经验教训，注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壮大革命力量作为创建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条件。在统一战线工作中把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结合起来，对有政治背景的土匪，为群众所痛恨的流氓，坚决予以消灭；对一般土匪，则采取各种办法去争取改造。如对政治土匪张廷芝部和霍匪杨谋子部等，红军坚决予以打击。而对黄龙山郭宝珊率领的绿林武装，苏维埃政府则采取团结、争取、教育的政策。在党的教育和政策感召下，1934年10月，郭宝珊率领120余人在庆阳新堡宣布起义，参加红军。11月10日，陕甘边区特委和军委在荔园堡将郭宝珊所部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员，任焕花任政委，下辖三个大队。西北抗日义勇军后来发展成为红二十六军的一支主力团队，为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① 《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上卷），第218页。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对极端反动的地主民团坚决消灭，对同情、靠近共产党、红军及苏维埃政府的民团，则与之建立统战关系，互不侵犯。对那种既不反对也不愿接近共产党、红军及苏维埃政府的民团，在实际斗争中教育他们，使之转变，向苏维埃政府靠拢。当时合水县境内有大小民团 20 多支，经过争取工作有好几支参加了红军，其余大多数与苏维埃政权保持着友好关系。对哥老会采取争取政策，建立长期统战关系，对其中的反革命分子，发动群众去清除。对麻子会、红枪会等会道门组织，采取争取的政策，逐步予以改造。对白军俘虏采取教育、改造政策。通过政治上的争取，一些白军俘虏参加了红军和红军游击队，在斗争中成长为优秀的指战员。

南梁政府在根据地对政治上可靠的知识分子给予充分的信任，分配适当的工作，并在工作和斗争中注意培养，保护小商贩，争取、鼓励和保护白区的高贩到苏区做生意，以促进苏区经济的繁荣。土地改革中也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对地主家庭参加劳动的成员，也留给他们维持生活的土地和财产；白军士兵应分配土地部分暂留作公用等。上述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措施，壮大了革命力量，促进了根据地各项革命事业的建设，为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历史意义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继续和发展，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伟大斗争的组成部分，它不仅在西北革命斗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对中国革命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1. 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是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西北地区最早取得的成功实践成果，开创了西北革命斗争的新局面，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完成了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从组织和发动武装起义到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转变。大革命失败后，以刘志

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老一輩革命家，在党的领导下先后在陕甘地区发动和组织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兵运工作，他们在深刻总结三年多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后，决心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从1931年开始，他们在陕甘边界地区先后建立了南梁游击队、陕甘红军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等革命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展开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陕甘边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阶段。“在荒僻的陕甘边境，红二十六军的生长与新的苏区的创造，必然要如火燎原的广大的开展起北方苏维埃运动。”^①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推动了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随着陕甘边红色武装的创建和游击战争的开展，1932年建立了寺村塬游击根据地，成为陕甘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最初实践。1933年照金革命根据地建立，陕甘边界地区革命斗争呈现出新的局面。1934年，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发展到新的阶段。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发展中，先后派红二十六军主力北上陕北，支援和配合陕北的游击战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5年初，陕北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在更广阔的范围更猛烈地展开。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游击战争中创建，在反“围剿”斗争中发展，并在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起来。1935年2月，国民党发动了对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的第二次军事“围剿”。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两块根据地的工作，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各地游击队，并决定集中红军主力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反“围剿”斗争中打通两块苏区的联系。反“围剿”斗争开始后，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刘志丹的指挥下，抓住有利战机，在运动中相机歼灭敌人，先后解放定边、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6座县城，打通了两块苏区的联系，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到陕甘两省20余县的广大红色区域，西北革命根据地由此形成，“成为西北人民解放斗争的旗帜”^②。

① 《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1932年6月26日，载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61页。

② 《习仲勋文选》，第166页。

2.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为红军长征北上抗日提供了可靠的落脚点，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动员全民族夺取抗战胜利以及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地区的反动统治，有力地推动了西北地区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展。正在此时，由于王明“左”倾错误干扰和敌人的重兵“围剿”，中央苏区和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相继丧失，而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以及后来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仅存的最后一块革命根据地，它的存在和发展，牵制了一部分国民党军队于自己周围，在客观上强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无疑为长征中的党中央和红军北上抗日提供了坚实的落脚点，并发展成为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1935年9月27日，长征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到达甘肃通渭县西南的榜罗镇，在这里中共中央又掌握了一些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情况，进一步增强了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了解和对全国革命形势的认识。当日晚，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作出将长征的落脚点确定在陕甘革命根据地、使长征走向胜利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的实施，使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转移到抗日战争的前沿阵地，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由南方转移到西北，实现了中国革命由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走向迎接抗日战争新阶段的伟大转折。在这个伟大转折中，西北革命根据地转变成为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新的大本营，成为抗日战争的出发地和解放大西北的战略基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3.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历史经验，是留给老区和全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永远激励我们奋发向前不竭的精神动力和力量源泉。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不仅在甘肃谱写了甘肃革命史上极其光辉灿烂的篇章，而且在中国革命史上也有着重要的地位。陕甘边革命根据

地创建和发展的历史经验，不仅对于今天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而且对于资政育人，弘扬精神，发扬传统，惠及后代，启迪未来，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中所展现出的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和高尚的革命精神，已成为今天我们进一步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推动各项建设事业奋斗目标实现的巨大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坚强的红军战士为革命的胜利所表现出来革命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许多为人民光荣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以及他们所建树的光辉业绩，将永远铭刻在党和人民的心中；革命前辈在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艰难困苦的战斗岁月中，所表现出来的无限忠于党、无限忠于革命事业，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崇高的革命精神，是留给老区人民和全国人民巨大而宝贵的精神财富，这种精神财富的传承，将不断激励着我们为建设老区、发展老区以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作者：王晋林，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图书馆馆长，教授。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迎接长征红军概述

曲涛

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不能不研究陕甘边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长征的这种密切关系，不仅表现在陕甘边根据地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而且表现在红军长征的过程中，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也始终不断地从各个方面开展着迎接红军长征的艰苦工作，直接或间接地支援和有力地配合了各路红军长征，对于红军长征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但是，由于各方面资料条件的制约，人们在对各路红军长征的研究给予极大关注同时，对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迎接红军长征方面所做的各项工作情况则不甚了了。笔者试图就此问题粗浅地探讨。

一、努力排除“左”倾错误的干扰，成功创造巩固的长征落脚点

陕甘边区的党和红军对于迎接红军长征所做出的最突出贡献就是在外有优势的敌人进攻，内有“左”倾错误危害的严酷环境中，孤军奋战，忍辱负重，终于成功地保存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这个“硕果仅存”的根据地，创造了长征落脚点的地域条件。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

地削弱了红军的成果”，“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①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这个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在王明“左”倾错误笼罩全党，陕甘边区党、红军和苏维埃工作受到“左”倾错误干扰的条件下，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边区党和红军主要负责干部顾全大局，开拓创新，在反复的磨难和曲折中创造出来并得以保存的。

长期以来，党史学界有这样一种习惯性的认识，说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会成为“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由于“这里的党组织和红军离开当时‘左’倾路线统治的党中央较远，错误的东西难以较快影响到这里”^②，因而受到的“左”倾错误危害较轻。这种认识是不符合陕甘边区历史实际的。事实上，当1933年夏季王明“左”倾错误发展到高潮时，陕甘边区的武装斗争也受到了极为严重影响，遭到了灭顶之灾。1933年6月，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仅有的一个团）在陕西省委领导人杜衡的强迫命令下，脱离陕甘边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华，几乎全军覆没；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被敌人破坏，杜衡等人叛变，陕甘一带的党组织和党员受到严重损失；8月，渭北游击区在敌人的重兵围攻下陷落；10月中旬，照金根据地在敌人的重兵围攻下陷落。这就是说，早在红军长征前，陕甘边区的根据地和红军在“左”倾错误的干扰下受到的挫折和失败一点也不比别的根据地少。因此，创建“硕果仅存”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红军长征提供一个可靠的落脚点的任务在当时是十分艰巨和复杂的，也是十分紧迫的，这是迎接红军长征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面对一连串的失败，以刘志丹、习仲勋为代表的陕甘边区党、红军和革命群众毫不气馁，他们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在陈家坡会议和包家寨会议上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自觉排除“左”倾错误干扰，克服了超乎想象的困难，正确制定了坚持在陕甘边区开展武装斗争，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三路游击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和巩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等一系列的战略决策。1933年11月，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在遂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85、187页。

② 李志全、胡新民：《陕甘革命根据地研究综述》，载《党史通讯》1986年第3期，第30页。

花寺成立后，立即挥师南梁，扫荡陕甘边区的反动地方武装。同时，党和红军还派出工作人员深入山区，访贫问苦，热情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发动群众建立农民联合会、贫农团等群众性革命组织。经过扎实细致的工作，到1934年2月，南梁革命根据地粗具规模。2月25日，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小河沟成立，习仲勋任主席。从2月到5月，南梁革命根据地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一次“围剿”，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到18个县的农村，面积约2.3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

为了统一领导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巩固后方，支援前线，扩大红军的游击战争，1934年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正式成立，习仲勋当选为主席。在受到种种指责和刁难的情况下，陕甘边区党和苏维埃政府始终坚持从陕甘边区的实际出发，认真开展扎实细致的群众工作，提出并实行了著名的“十大政策”，促进了陕甘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建设的深入开展，发展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生活，有力地支援了前线，巩固与扩大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使革命武装斗争得到了广泛开展，主力和地方红军发展到5000人，根据地面积扩大到4万平方公里。1935年春，国民党反动派调集4万大军对陕甘边、陕北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根据地军民经过5个月的浴血奋战，粉碎了敌人的“围剿”，陕甘边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终于实现了为红军长征提供一块巩固的落脚点的目标。

1935年8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越雪山、过草地，向西北实施战略转移，陕甘根据地对于红军长征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国民党反动派调集10余万大军对陕甘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疯狂“围剿”。九十月间，正当反“围剿”战斗处于紧要关头，“左”倾错误的阴霾又开始笼罩在陕甘边区的上空，刘志丹、习仲勋身陷囹圄。在生死考验危急关头，刘志丹、习仲勋想得最多的问题还是保存这块根据地，保存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正如1980年10月11日，李维汉在与陕西省部分党史工作者座谈时指出的那样：刘志丹明知一部分同志被冤屈关起来，自己也会被捕，他有枪杆子，有群众，要干就起来了，那就打起内战了，结果是分裂，给敌人造成一个大缺口。他明知个人会有危险，但还是顾全大局，服从纪律。由此可见，刘志丹、习仲勋为创建和保存陕甘边区这块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和无私的牺牲。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巩固和发展，就是陕甘边区

党、红军和根据地革命群众为保障红军长征胜利而从事的最重要、最关键的迎接工作。

二、及时自觉地用各种方式给长征中的中共中央传送陕甘边根据地的信息

1933年后，陕甘边区的上级党组织陕西省委遭敌破坏后，陕甘边区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刘志丹、习仲勋等党政负责干部曾多次派人去西安、上海试图用各种方式建立与上级党组织和中央的联系渠道。据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的张策回忆，仅他见到过的就有两次：一次在1933年打合水前，红军在黑慕墁时，师党委曾派秦武山到关中国民党统治区找陕西省委。另一次是1934年三四月间，在荔园堡的呼志录（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粮食委员长）家中，由张策执笔，在纸烟盒里的那一张很薄的纸上，用很小的字写明陕甘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简要情况，派了一位叫王锦全的府谷籍青年战士，前往上海找党中央。解放后张策与金海旺同志一起工作时，曾听他谈到那时有个陕北同志找党中央，但因当时上海的情况十分紧张，白色恐怖极为严重，这个同志就在上海拉人力车维持生活。^①总之，因各方面因素限制，在漫长的时间内，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寻找上级党和中央的努力都没有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积极扩大红军的活动范围，形成一定的声势，制造令人震惊的舆论效应，不失为一种间接地与中央和上级党组织沟通信息的有效方法。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沟通与党中央的联系创造了信息上的有利条件。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红二十六军主力依托根据地，向敌人发起了一系列的攻势。1934年11月15日，刘志丹、习仲勋获悉敌环县县政府正在集中5个区的反动民团整训，决心拔掉这个隐患，命令骑兵团从南梁出发，到达悦乐附近与庆阳游击队会合。按照预定方案，骑兵团一连一排作为先头部队，提前到达曲子新城，他们将马匹隐藏后化装进城。16日拂晓，红军骑兵团和庆阳游击队到达曲子，立即向敌发起猛攻。提前化装进城的红军战士也突然拔出手枪投入战斗。敌民团和保安队有的还在蒙头大睡，有的

^① 张策：《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回忆》，载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第915页。

见城内外一起响枪，不知所措。遭到突然袭击后，顿时乱作一团，稍作抵抗就四散逃命。环县民团团总李恒泰被红军堵在群众家中活捉，保安队长崇敬义率保安队 20 余人逃到曲子北台，也被红军包围在打瓜洼的山头上活捉。整个战斗仅用了半个小时就胜利结束。此次战斗，红军击毙国民党区长朱文成，俘敌近百人。缴获战马十几匹，长短枪 60 余支，子弹及其物资一批，红军无一伤亡。曲子战斗胜利结束后，红军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并处决了李恒泰、崇敬义等反动分子 3 人，并将缴获的粮食和衣物一部分分给了当地的贫苦农民和群众。

不久，红军主力又长途奔袭长武县城。1935 年 1 月，骑兵团从南梁根据地出发，越子午岭，经正宁、宁县，强行通过敌军的三道封锁线，直插泾河川，挺进和越过西兰公路。骑兵团利用在洛河川交道壕战斗中缴获的敌军服装，化装成敌军，向长武进发。沿途民团见正规军来到，恭敬相待，不敢怠慢。红军骑兵团在没有受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抵达敌后方重镇长武。杨森师长一声令下，数百名红军骑兵团战士跃马挥刀，向长武县城发起了猛烈进攻。战斗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就胜利结束，歼敌守城自卫团 100 余人，缴获武器百余支，还在长武城内打了土豪，筹集到经费万余元及一些食盐、布匹、鞋袜、香烟等物资。泾川县城守敌吓得闻风丧胆，弃城而逃。杨森即率领骑兵团乘胜消灭了瑶店等据点的反动民团，然后途经西峰董志塬又抓获了 3 名劣绅，胜利地返回了南梁根据地。

红军闪击长武的战斗和奔袭曲子新城的战斗影响甚大，尤其是闪击长武的战斗，切断了西北的交通要道——西（安）兰（州）公路，对陕甘两省造成极大震动。各地的报纸都对此作了报道。《大公报》说，陕甘边区的红军“攻曲子，陷长武，陇东震动”。从实际效果来看，这几次战斗客观上起到了沟通中央红军与西北红军联系的作用。1935 年以后，陕甘边区的红军和根据地的活动成为全国新闻关注的焦点。各地报纸对陕甘边红军的行动作了大量的报道，这就为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及时了解西北红军及陕甘边根据地发展的最新消息提供了信息资源。

但是，陕甘边区党和红军与长征中的党中央建立某种信息沟通方式的直接或间接的努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造成这一严重现实的原因是，1934 年 10 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由于各地党组织被敌人破坏严重，同时也由于党中央与上海局的电台联系中断，党中央处于

被敌封锁、信息隔绝状态，根本无法通过正常的组织渠道全面了解西北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具体情况。直至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长征进入甘肃后召开的俄界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上研究和讨论中央红军行动方针问题时，还未能作出以陕甘根据地为长征落脚点的决定。在俄界会议的报告中，毛泽东对于长征落脚点问题讲了这样一段话：“目前应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这个方针是目前的基本方针……我们可以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不然就永久打游击战争，我们不应把自己变成瓮中之鳖，中央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张闻天在发言中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说：“我们目前的战略方针是改变了，因为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力量是削弱了，所以我们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改变，在陕甘创建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中心，在目前是较少的可能，所以目前战略方针是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更大规模地来进行国内战争。”这时，党中央因不知道地域辽阔的陕甘根据地和强大的西北红军的存在，作出了以游击战争方式打到苏联边界去的决策。

1935年9月20日，中央红军走出草地后，进占甘南重镇哈达铺，毛泽东急切地渴望通过新闻媒体的渠道了解西北的情况，这正好与陕甘边区党和红军与党中央建立联系的努力相吻合。从缴获到的敌人报纸和发现的陕甘红军宣传材料中，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终于了解到了陕甘根据地和西北红军发展壮大的详细情况。9月22日，中央军委在哈达铺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形势和红军整编的报告。他指出，现在民族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一定要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9月26日，陕甘支队进抵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会议确定了以陕甘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的战略决策。

就在党中央和长征红军北上陕甘之际，刘志丹、习仲勋也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了有关中央红军长征的准确的消息，他们自觉地行动起来，直接派出人员，进入敌占区寻找长征途中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1935年10月15日左右，刘志丹派出的人员终于在镇原三岔一带迎接到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毛泽东看过信后，站在山顶上，向正在休息的部队大声召唤：“同志们！我们就要到达陕北苏区了！我们的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派人来接我们

了……”毛泽东的话还没讲完，山坡上立刻欢腾起来。^①

另据《肖锋长征日记》记载：“10月11日，晴，军团直属队经冯家庄、岩于底，蔡口集到苦水常宿营，行程九十里。现在我们已经靠着陕北境界了。朱主任收到陕北红军独立师热烈欢迎中央红军北上抗日通电。通话说，我陕北红军独立师热烈欢迎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愿做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敢死队，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宣战，用实际行动欢迎红军北上抗日，巩固抗日的西北阵地。看到这一通电，大家都十分高兴，与陕北刘志丹的红军就要会合了。我们盼望的一天就要来到了。”^②

可以断定的是，在当时信息不通、对于中央红军行军路线不了解的情况下，刘志丹、习仲勋派出联络的人员绝不只是见到中央红军的这一路，他们为了迎接长征红军，殚精竭虑，精心谋划，必定派出了多路的人员，在更广泛的地域打听中央红军的踪迹，最终才找到了长征中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使之成为长征故事中的一段最动人的佳话，这对于长征胜利作出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三、积极开展长征红军将要路过地区的群众工作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边根据地党和红军领导人时刻关心着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长征，他们通过地下党及统战关系，多渠道收集中央的最新消息。当时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的张文华就回忆说：我们收到甘泉、延安、鄜县教育局和高等学校转来上海中央局发出的“八一宣言”材料，知道了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号召组织地方抗战队等，也知道了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军事委员会朱德、周恩来、王稼祥。7月下旬，陕甘特委代书记习仲勋同志主持召开扩大会，由我起草决议案和形势报告以及动员1600人参加红军通知，经会议通过后印发各地。^③

1935年7月下旬至8月初，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代理书记、边区苏维埃

① 肖锋：《跟随毛主席长征》，载《星火燎原》（3），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9页。

② 肖锋：《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页。

③ 《张文华1983年11月谈陕甘边区党政军机关东迁》，载刘国刚、任善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区》，第481页。

政府主席习仲勋主持召开了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在研究陕甘边区工作的同时，也专门研究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工作，在8月5日通过的《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案》中，对于长征红军行动方向的判断作出了正确的估计：“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的会合，且更顺利的向北进攻。”据此，习仲勋和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明确提出，要高度重视中央红军将要到达地区——甘肃的工作，因为向“甘肃发展在策应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方面有着极大意义”，虽然合（水）环（县）正（宁）是人烟稀少的千百荒山，但为了与中央（红）军的呼应，必须争取陇东的发展，而宁（县）、正（宁）、扶（阳）、合（水）、环（县）是争取陇东的必要阵地。^①

在这次会议后，为了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特委和苏维埃政府积极开展甘肃敌占区的工作。在甘肃敌占区，广泛发动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和陕甘根据地红军胜利的消息，这就为中央红军在甘肃顺利长征准备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后来，中央红军来到甘肃后，当地群众因早闻了红军的英名，所以一听来的部队是红军，立即开门迎接，并热情地为红军腾出房屋，置办粮草。^②《杨尚昆回忆录》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时，杨尚昆见到习仲勋后，高兴地对习仲勋说：我们长征到达哈达铺时，看见了一份油印的红军传单，这个传单上印着“红军占领中心城市的伟大胜利”，仔细看了内容后才知道这个中心城市就是瓦窑堡。杨尚昆接着以开玩笑的口吻问习仲勋：“瓦窑堡就那么一点点大，还算什么中心城市啊？”习仲勋也笑着答道：“瓦窑堡在陕北算个很大的地方了。这里早有‘米脂的女子，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当然是很有名气的地方！”杨尚昆说，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见了这些材料的的确很高兴，因为这说明陕甘有红军、有根据地，并且就在瓦窑堡附近。^③哈达铺位于甘肃南部，在岷县和西固县（今宕昌县）之间，距离陇东根据地很远。但从杨尚昆在哈达铺能看到红军宣传材料这件事上，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迎接中央红军，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特委和苏维埃政府当时

① 《陕甘边区特委决议案》，1935年8月5日，载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第94页。

② 康生：《西北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95页。

③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页。

甚至派人将西北红军的宣传材料散发到了甘肃南部一带，这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奇迹。

陕甘边根据地迎接长征红军的工作，不但对敌占区群众起到了直接的发动作用，而且对于长征红军也起到了鼓舞的作用。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后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的朱开铨就曾经回忆说：红军到哈达铺后，从当地邮局得到不少的报纸，我们在报纸中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在陕北有一块苏区根据地，有红军、有游击队。这个消息使大家都非常高兴……现在得知陕甘有一块红军的地盘，有一个落脚点，大家的高兴劲就别提啦！朱开铨还回忆说：我们在通渭城时，还亲眼看见以刘志丹的名义发出的布告，主要内容我记得是公布红军的主张，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当时我们都非常高兴，战略转移的任务就要胜利结束了，从万般艰难中走出来的中央红军面前出现了光明。我们自从离开中央苏区后，辗转征战，流离颠沛近一年，眼看就要到家了，我们怎么能不高兴呢？^①

在陇东，因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刘志丹率领主力红军北上陕北作战，南梁根据地中心区大部在敌重兵的进攻下失陷。习仲勋领导陕甘边区各级党政组织，积极开展根据地的恢复工作，摧毁敌人的政权，为红军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扫清道路。9月，在习仲勋领导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恢复建立了庆北办事处。9月下旬，华池战区成立，崔凤鸣任党委书记，高生荣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机关驻地在南梁李沟门。一区苏维埃政府（又称白马区苏维埃政府）由原二、三、四区的部分地区合并组成，机关驻南梁河洼子，辖玉皇庙、白马庙、刘坪三个乡苏维埃政府，区政府主席李兴高；二区苏维埃政府（又称林镇区苏维埃政府），由原一、四区部分地区组成，机关驻林镇梁沟门，辖三个乡苏维埃政府，区政府主席安仲成。在华池战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南梁根据地人民拆碉堡、平战壕，重建家园，迅速消除战争创伤，各乡、村的红色政权都逐步恢复和建立。

陇东根据地的恢复对于确保党中央和长征红军顺利进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防止国民党军追击等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1935年11月9日，当时在西北采访的《大公报》著名新闻记者范长江非常客观地报道了陇东一带群众掩护长征红军、阻止敌人追击的种种活动。他在《中国的西北角》中说，

① 朱开铨：《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136页。

国民党军追过环县以北后，此地寥若晨星之民众，皆避不见面，使国民党军之饮水粮秣，皆无法解决，道路亦无人引导，陷于进退失据之苦境中。彭德怀于洞悉此种情况后，乃集结其饥疲的红军约五千之众，于陕北边境上作猛烈反攻，国民党军乃不得不相继退下，未敢再行深入。由此可知，陕甘边根据地党和红军在长征红军将要路过地区的群众宣传和组织等方面的工作成效是很显著的。

四、积极为各路长征红军筹备粮草，开展支前工作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迎接红军的准备工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粮食和物资方面的工作。对于这个方面的工作，过去研究得比较少，但是，从一些资料中，我们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陕甘边区党政组织为迎接各路长征红军，及早动手，未雨绸缪，细心地筹划着、安排着各方面的准备工作。

对于红二十五军的支前工作。据当时任甘洛县第一区赤卫军大队长的李世俊回忆：1935年7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下寺湾的河滩上，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大会。红二十六军的部分部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干部及政治保卫队，甘洛县各区赤卫队，及延安、富县几个临近区的赤卫队代表，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在大会上，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同志首先讲话，他说，我们根据地的形势发展很快，很好。最近，我们的一支兄弟部队要到陕甘苏区来，我们要积极做好迎接他们的一切准备工作。接着，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粮食委员长马锡五同志讲话。马锡五在讲了形势问题后，接着重点讲了粮食工作。他说：“现在我们根据地军民要十分重视粮食问题。习仲勋同志讲了，我们的兄弟部队要来。这样，粮食工作就更显得重要。常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兄弟部队一到，我们就需要比现在还多的粮食。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向农民要更多的粮食，咋办呢？我的意见，今后打下地主、土豪劣绅的粮食，都要节约使用，要保管好这些粮食，防止霉烂，使兄弟部队来我们这里后有足够的粮食供应。我们的部队越来越多，我们粮食的主要来源还只是打土豪、打地主，所以，大家要十分注意节约粮食；同时，还要争取多种，多打粮食，迎接兄弟部队的到来。”马锡五同志讲完后，甘洛县第一区区委书记王英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表示要响应苏维埃政府的号召，种好庄稼，多打粮食，迎接兄弟部队的到来。李世俊接着回

忆说，当时，我们还不知道是哪个兄弟部队要来。过了不久，到今年八月，红二十五军果然在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的带领下，转战陕南、陇东来到陕北苏区，有好多部队还在我们甘洛县一区的永宁山附近宿了营。这时，已担任甘洛县一区区主席的李世俊，送了十多头猪、一百多只羊等许多慰劳品慰问红二十五军的将士。^①

红二十五军到来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发动根据地群众积极支援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所到之处，根据地“群众也象接待亲人一样，腾房子，碾米磨面，送猪羊，热情慰劳”^②。到处洋溢喜迎亲人的欢乐气氛。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和军委主席刘景范前往永宁山迎接红二十五军，在下寺湾一带休整的红二十六军第三团也派团长黄罗斌为代表，到刘家堡欢迎红二十五军先头部队。

习仲勋主持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大会，并在大会上致欢迎词。徐海东、戴季英和红二十五军全体将士与边区军民一道参加会议。红二十五军两位代表讲了话。会后，还演出了眉户剧，款待红二十五军的将士。徐海东看后连声称赞道：“好戏！好戏！”^③在陕甘边根据地军民的热心照料下，红二十五军将士很快恢复了体力。

对于中央红军的支前工作，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到达吴起镇后，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用鸡毛信将这一特大喜讯传遍了整个陕甘边区。^④赤源县委派了一个赤卫军大队长，抬着牛、羊慰劳中央红军，陕甘晋省委也派人前去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苏区人民全体行动起来，为中央红军碾米磨面，赶制棉衣、棉鞋，保证了中央红军的物资供应。

11月21日，直罗镇战役开始，陕甘边根据地的军民积极行动起来，支援红军的作战。在陕甘边区军民的大力支援下，直罗镇战役取得了辉煌的胜利。11月30日，红一方面军举行营以上干部大会，毛泽东作了总结，他指出：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的原因是：“（一）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

① 李世俊：《回忆马福五同志》，载《陇原星火》，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6页。

② 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第3版。

③ 张文学：《陕甘边领导机关在洛川》，载中央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第338页。

④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教研室、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地区斗争简史》，1991年5月打印稿。

本的)。(二)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三)战斗准备的充足。(四)群众与我们一致。”这四个条件决定了我们胜利与敌人失败。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对直罗镇战役作出高度评价,指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美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①

对于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的支前工作,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静宁、会宁地区胜利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11月,红军主力开始向陕甘根据地靠拢,陇东根据地军民立即行动起来,加紧开展支前工作。11月16日,中央军委在《关于动员群众消灭胡宗南的战略指示》中指出:“胡宗南加紧向我进攻,我军采取诱敌深入,大举消灭该敌的旗帜,红军日内开到山城堡、环县之线,请你们动员工作人员及全体民众援助红军,一致对敌,紧急筹集粮食一个月,[并对]敌到地区坚壁清野。”^②遵照指示精神,陕甘宁省委发动曲子、环县、华池等地的群众,为红军主力部队运送粮食、蔬菜、麦草和门板,组建兵站和医院。为了完成筹粮和运输任务,陕甘宁省委还在环县地区成立了“动员委员会”,并制定了粮食保管、运输及供给制度,以减少浪费。筹粮工作以没收土豪、地主藏粮为主,同时在小地主和富农中进行募捐,还购买了一部分粮食,全力保证了数万红军将士的粮食供给。11月21日,山城堡战役开始后,曲子、环县根据地人民群众组成了许多担架队、运输队,抬担架,送弹药,源源不断地将各种粮食、物资运往前线,抢救伤病员,为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做了必要的后勤保障工作。

综上所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为迎接各路红军的长征进行了大量的细致的工作,这些工作对于保证红军长征的胜利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作者:曲涛,陇东学院政法经管系主任,教授。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9页。

② 《中央军委关于动员群众消灭胡宗南的战略指示》,载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形成》,第72页。

寺村塬根据地的性质和地位

姬有文 王聪仁

1932年3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县寺村塬（正宁本地亦称南塬，包括永和、寨头、五顷塬及三嘉塬一部分村镇，方圆百余华里）建立了陕甘边第一个红色政权——寺村塬革命委员会，从而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序幕，使陕甘边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武装斗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建立寺村塬根据地是陕甘红军在陇东地区开展革命斗争的需要，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一次有益的、有计划的重要尝试

1932年2月12日，西北工农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之后，遵照陕西省委的指示，挥师南下渭北，2月13日攻占旬邑县取田镇，收缴了该镇保安团的枪支。2月15日，在阳坡头打退了陕警三营及彬县、旬邑、淳化三县民团500多人的进攻，转移至香山寺休整。不久，富县、同官、耀县民团对游击队发动大规模“围剿”，游击队员全力抵抗，并给敌人以重创，但终难以立足。于是在击退庙湾民团之后，经直君、在焦家坪、艾蒿洼连打两仗之后，西越子午岭，于3月回到正宁柴桥子一带。其时，陕军17师和甘军陈珪璋新编第13师残部，正在陇东火拼，

陈部一部残余退逃正宁一带抢兵抢马，正宁县政府催款委员马某在猴头双佛堂一带催粮要款，敲诈勒索。碾庄子群众赵锁用三节鞭把马某赶跑。马某逃回县府，向山河城防司令刘科报告，南区（指寺村塬）百姓造反。刘科扬言要血洗南区。为了防备官府镇压，张村、巩家斜、东侯郎、梁家沟圈、后庄子（习称上五社），新庄子、碾庄子、双佛堂、车家沟、东城（习称下五社），西沟、苜蓿岭、杜家堡、莫刺村、苟仁、西侯郎（习称六社）群众办起了民团，分别推选巩世信、张述元、杜兴帮为上五社、下五社、六社团总。民团成立后，200余名团员在苟仁寺院集会，决定进行交农斗争。此时，正值陕甘红军游击队驻扎西城四圪塔，民团闻讯派巩世信、范喜奎前往打探消息，告知了寺村塬群众反抗斗争情况。陕甘红军游击队闻讯立即改变原定出击旬邑的计划，决定留驻正宁，乘群众自发斗争蓬勃兴起之机，到寺村塬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发起第一次攻打山河城战斗。原定分东西两路夹击，并和山河城内敌驻军陶连长（关中人）约定内应，在19日拂晓以拍手为暗号，开放东城门让游击队攻入城内。3月18日夜，三嘉、寺村塬10多个村庄的群众由张彦升带队，寺村塬的民团由杜兴帮带领，手持大刀、长矛冲破沿途豪绅阻拦，翻沟来到山河城西的柑柏树、移风一带，驻在西城的陕甘红军游击队18日晚向山河城东急行，欲与群众配合形成两面夹击阵势。结果驻在西城的游击队在18日晚行军途中因向导天黑迷了路，被带到山河城以北的九龙畔时，才发现路走错了，当即直奔山河。这样就误了时间，到山河城已是19日早晨了，错过了攻城计划时间，作内应的陶连长等人不敢打开城门。到下午，游击队有一士兵叛变（山河城里人），偷爬到城墙底下，被敌人用绳子吊上城去，向敌告密，致使陶连长被捕杀害，他所带士兵的枪全部被下了。第一次围攻山河城失利。^①

陕甘红军游击队攻打山河城失利后即移驻寺村塬。队委会重新讨论了行动方针问题。经过周密研究，队委会制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和五项任务，决定：（1）到南塬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打击豪绅地主的破坏；（2）将群众组织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3）立即实现陕甘红军游击队的纲领；

^① 《抢救自述陕甘游击队第一次围攻山河城》，载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第209页。

(4) 发动和组织群众，准备攻打山河城；(5) 成立革命委员会，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随后陕甘红军游击队立即开赴双佛堂、新庄子、西城一带，将总部设在新庄子张进明家。

游击队来到寺村寨后，分头在新庄子、西城、上南坡头、车家沟、碾庄子、双佛堂、苟仁、西沟、曹雷岭、莫刺村东西候郎、巩家斜、张村等村庄张贴标语，召开群众会议，宣传革命道理。谢子长、高岗、杨仲远等人走村串户，访贫问苦，深入做群众的工作。经过宣传发动，各村都成立了农民联合会、贫农团，民团改编为赤卫军，在新庄子成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杜兴帮任总指挥，巩世信、张进选、邢进有任副总指挥。3月22日，在陕甘红军游击队指挥部领导下，寺村寨东起五墩梁，西至上南坡头等数十村庄的贫雇农积极分子在新庄子集会，选举成立了寺村寨革命委员会，张进元任主席，唐贵荣任副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军事委员、财粮委员、贫农委员、工会委员、青年委员等。陕甘边第一个红色政权由此诞生。

寺村寨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在陕甘红军游击队的指导下，进一步开展了以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产为中心内容的反封建斗争。先后没收了西城村豪绅刘喜坤、于庄村豪绅赵元亨、罕宅村豪绅赵义的粮食和牛羊牲畜，分配给当地的贫苦农民。3月底，陕甘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和寺村寨革命委员会在苟仁村寺院召开千人公审大会，公审了民愤极大的豪绅赵元亨和其走狗巩德功。宣判大会后，在新庄子将赵元亨、巩德功处决。

寺村寨革命委员会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以来，在陕甘边区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该政权成立后，打土豪、分财产，使昔日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土豪劣绅威风扫地，使长久受压迫的广大贫苦农民扬眉吐气，成为主人。所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领导革命斗争的一次有益的、有计划的重大的尝试，开创了陕东红色政权建设的先河，是陕甘边区党和红军游击队有组织、有计划创建的，并不是宣布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就撤走了，它建立了红色政权，组建了赤卫军，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与白色区域是根本不同的，因此，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和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

二、寺村塬根据地的建立，使陕甘红军游击队有了后方依托，促进了陕甘边游击队的巩固和发展，为两年后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领导成立了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并处决了赵元亨之后，遂于4月13日同赤卫军总指挥杜兴帮、巩世信等带领的约千余名手持土枪、杆子、农具的寺村塬赤卫军和农民在苟仁寺会合，军民联合第二次攻打山河城，拔除敌据点。当天晚上谢子长、刘志丹率部与赤卫军总指挥杜兴帮带领赤卫军从苟仁出发经首宿岭，翻越张家坪，上塬后到达路家崖窟、巩家畔、杨家畔一带，赤卫军在这里原地待命，游击队向山河城下返回。刘志丹带一部分游击队攻城东，阎红彦带一部分游击队攻城西，骑兵埋伏在城周围的村子以作接应。战斗打响后，因山河城易守难攻，攻打两天一夜未攻下，且游击队伤亡较重，4月15日游击队暂退距山河城20里的西坡休整，以待机再战，赤卫军撤回了寺村塬，城里驻敌刘和林的保安队和驻早胜的谢绍安（外号谢牛）部取得联系；16日上午，谢绍安遣一营人马向陕甘游击队驻地西坡扑来，游击队当机立断组织了一支奋勇队，由张应琪率领设埋伏圈，进入战斗后，其他人员正面迎敌，且战且退，透敌深入。当游击队引敌进入伏击圈后，向敌杀了回马枪，在奋勇合击下，猛烈冲杀，敌伤亡惨重，残部向山河城逃窜。游击队俘敌二三十人，缴获三十余支枪。逃敌一个排逃至山河城东北的一个窑洞里，窑洞外面的游击队人员向敌喊话令其投降，敌人向窗外扔出两支枪诈降，游击队员都金标信以为真，从涝地边起来收枪，被敌人开枪打死，顽敌趁机逃进城内。当天下午游击队撤出阵地返回寺村塬，第二次攻山河城未克而结束。^①4月20日，陕甘红军游击队在地下党组织配合下，南下奇袭旬邑县城获胜，俘敌300余人，缴获枪支400多支，子弹万余发，这是陕甘游击队战史上打开的第一座县城。

同年4月下旬，正当陕甘边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之际，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视察工作，这位“左”倾错误的忠实执行者

^① 苏惠民、彭敏东1987年10月编印的正宁党史资料之26《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配合赤卫军第二次攻打山河》，第1页；《陕甘游击队配合赤卫军第二次攻打山河城》，第12页。《田秋白回忆陕甘游击队第二次攻打山河城》（内部资料现存正宁县委党史办，庆阳市党史研究室也有存档）。

认为攻城失利是“逃跑主义”，以“以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罪名，撤了谢子长总指挥职务，派其在甘肃靖远搞兵运工作（谢子长在靖远水泉堡发动兵变，成立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任总指挥），命令游击队到旬邑马家堡集结，将游击队分编为三、五两个支队，队长分别由刘志丹、阎红彦担任，强迫分散活动。5月，因敌分路“围剿”，为了统一指挥，陕西省委又命令两队集结于旬邑清水塬，恢复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李杰夫任队委会书记，半月后，部队转战5个县，作战9次8胜，共歼敌14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400多支，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正当胜利之时，陕西省委又命令部队东进韩城，在平原区建立根据地，结果遭到国民党军重兵围攻，损失严重。在危急情况下，刘志丹率部队越过了子午岭进入陇东正宁根据地。6月底，游击队转战宁县麻子掌，部队只剩下200多人，由于军事上的失败，部队思想混乱，领导人之间在行动上也发生了严重分歧。为此，陕甘游击队在麻子掌、梁家堡先后召开了两次队委会，在统一思想基础上，确定了以桥山山脉为依托，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并将部队统一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阎红彦担任总指挥、高山保、刘志丹分别担任步兵大队大队长，张龙光任骑兵大队长。梁子掌会议是一次统一思想、避免分裂、确定今后实际行动方向的重要会议，它对于游击队的巩固和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梁子掌会议后，7月9日，在谢子长、刘志丹部署下，又组织发动了西华池起义，游击队扩大到500余人，并趁夜带领起义队伍向盘克壕开进，第三天，部队开往正宁的耿头塬，在这里召开了庆祝西华池起义成功，欢迎起义军加入陕甘游击队的庆祝大会。

西华池起义后，国民党政府开始了对寺村塬革命根据地进攻的部署。恰在这时，即7月23日，中共陕西省委委派军委书记李昆来到寺村塬，任游击队政委，取代了李杰夫的职务。李昆一上任，就全力推行陕西省委“边区军事地形是有利于平原作战”的主张，要求游击队“停止游击战争”，“坚守阵地”，指责游击队领导是“游击习气”、“上山路”、“逃跑主义”，要改变游击战的路线。当游击队击退敌人的进攻、重新占领五顷塬后，李昆又提出要“死守五顷塬，不让铁蹄踏进五顷塬一寸地”的口号，限令游击队在20天内在五顷塬分完土地，并摧毁敌人的牢固据点，建立新的根据地。李昆的决策，立即遭到游击队广大指战员的强烈反对，但他固执己见，强令

集中游击队的领导，蹲在屋子里整整开了7天会，进行无休止的争辩。更严重的是他抛开游击队的现任领导，组织“秘密队委”，分裂党和红军，打击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由于李良的错误，红军游击队失去战机，使敌人完成了包围根据地的计划，占领了寺村与鞏头的许多村庄，割断了两地联络。直到这时，游击队才开始迎击敌人的进攻。在李良的指挥下，三天连打三个败仗。8月20日，游击队硬攻王郎坡土围子，遭到王郎坡反动民团的阻击，造成五六十人严重伤亡。第二天，游击队还未来得及出击，王郎坡等地的敌人又来进攻，游击队四面受敌，苦战一天，伤亡惨重，不得不转移三嘉塬，游击队刚刚突围，又遭到敌骑兵冲击，损失30余人。第三天，敌人一早就分四路向游击队“包剿”，游击队损失惨重，被迫撤离根据地，转移至高风坡、马栏等地，部队仅剩200余人。

陕甘游击队撤离寺村塬根据地后，根据地失去支柱，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只存在了5个多月。游击队先后转战旬邑、耀县、保安等地，由于失去后方依托，接连失利，损失严重，处境危险，最后退往子午岭的平定川、豹子川一带荒无人烟的地区。此时正值严冬季节，部队给养困难，伤病员无处安排，战士衣单被薄，部队吃粮难以解决，伤寒病在部队蔓延，战士情绪低落，思想混乱，陕甘边革命处在危急之中。这些说明，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存在的5个多月中，陕甘红军游击队因有后方依托而显得如鱼得水，进退自如，有利则出外线开展游击活动，失利则回师休整，即使遭受严重挫折也有后方根据地的回旋余地，得以休整和补充，因此促进了游击战争的开展。与此相反的是，当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丧失后，陕甘红军游击队则失去了后方依托，得不到充分的休整和补充，处处被动，处境险恶。所以，寺村塬根据地创立和发展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中发挥了积极的重大作用和贡献。

三、寺村塬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陇东地区建立的第一个游击根据地，在中共陕甘边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影响非常深远

寺村塬游击根据地是陕甘边区党和红军游击队为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中一次重要革命实践和探索尝试，它虽然未能转变为革命根据地，是因为它仍属于游击根据地，但它在陕甘边游击战争中发挥了积极的重大作用，传

播了革命先进的思想，给人民带来了希望，为后来党组织的发展和革命政权的建立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并奠定了基础。

1. 寺村塬游击根据地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以来，在陕甘边区建立的第一个游击根据地

常言道：“万事开头难”。在革命初期建立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确实举步艰难，来之不易。

其一，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红军人力比较少。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有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和工农武装割据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①。当时，陕甘红军游击队建立不久，人数才 300 人左右，西华池起义后，扩充到 500 人，人数极少。

其二，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红军武器装备极差。靠起义战斗中缴获的武装进行扩充，也靠当地民众的长矛、大刀、土枪、农具配合战斗。

其三，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红军作战经验不足。正如本文前面提到的第二次攻打山河城失利，等等。

其四，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区域不稳固。1932 年 2 月 12 日建立陕甘红军游击队后仅 1 个多月时间，陕甘红军游击队力量弱小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割据以及斗争环境的严酷性，迫使红军部队经常处于高度的游击作战之中。受这些条件的制约，根据地的区域也处于经常性的变动之中，暂时无法形成中心区域的革命根据地。

其五，寺村塬游击根据地正宁地方党组织和政权组织还未健全。当时正宁地方党的组织建设还未能展开，政权组织尤其是基层政权组织还未健全，正宁赤卫军也不稳固，农会、贫民团等群众组织的工作没有开展起来，也就未能有效地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讲，它反映了当时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性质。

其六，根据地不稳固。陕甘红军游击队在当时所依托的正宁寺村塬（包括五顷塬、湫头、永和）、三嘉塬及宁县盘克塬一部的游击根据地当中，

①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 年 10 月 5 日。

无法形成中心区域和边缘区，红军游击队常常转移，有时以这里为中心，有时以那里为中心，这样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土地革命深入开展。虽然陕甘红军游击队建立后，即在发出的布告中明确提出分配地主豪绅土地给贫苦农民的纲领，但是没有制定出具体措施，因而分配地主豪绅土地的纲领也就未能很好地得到贯彻实施，也就不能很好地组织和发动农民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支援革命战争，来保卫红色政权和寺村塬游击根据地。所以，陕甘红军游击队撤离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后，根据地失去了支柱，寺村塬革命委员会仅仅存在5个多月时间，但给人们和历史留下深刻影响，在陕甘革命斗争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2. 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实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开辟是陕甘红军游击队在条件艰苦、举步艰难情况下开展的第一次革命实践活动

红军建立初期，谢子长、刘志丹等老一辈革命家，能够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在认识和实践走“工农武装割据”道路，开辟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重要性。1932年2月12日建立陕甘红军游击队，1932年3月22日建立寺村塬革命政权，打起了工农武装斗争的革命旗帜，建立了陕甘边第一个红色政权，改变了陕甘革命斗争的形势，为开辟陕甘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这使正宁地区土地革命能够顺利进行，并使土地革命有了可靠保证，也使红军游击队有了后方依托，调动了当地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许多群众踊跃参加红军游击队，壮大了红军力量，有力地支援了陕甘边革命斗争。

3. 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建立的实践证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

在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创建过程中，党内曾经发生两种不同的指导意见。以谢子长、刘志丹为代表坚持搞游击战的正确路线，使寺村塬根据地得以建立。另一种就是寺村塬根据地建立不久，顽固坚持“城市中心论”的杜衡和坚持搞“停止游击战争”、“坚持阵地”的李昆，他们分别来到根据地，强令游击队远离根据地，坚持到三原、富平等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其结果是不但使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丧失了革命武装的支柱并陷于瘫痪，而且使陕甘

红军游击队失去根据地的依托，1400 多人的队伍损失了 1200 多。这充分说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革命就会取得胜利，否则，革命就遭失败。

4. 建立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目的是发动团结和领导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建政权、人民当家做主、民族平等、人民过好自给富裕生活。这是唤起民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前提和必要条件

陕甘红军游击队初期到寺村塬后，在新庄子等村庄，张贴标语、召开群众大会，访贫问苦；建立根据地后，又发动汉族和回族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和牛羊牲畜，始终贯彻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回汉人民对红军、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增强了回汉民族团结，调动了群众革命积极性，这在当时建立和发展寺村塬游击根据地、支援红军战争，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5. 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唤醒、教育和锻炼了正宁人民，壮大了正宁地方武装力量，为民众翻身求解放指明了方向，铺平了前进的道路，也为陕甘红军后期革命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

1930 年以来，谢子长、刘志丹先后在正宁县一带开展革命活动，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932 年 3 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塬（新庄子）期间，深入群众、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农会、贫农团、赤卫军，成立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广大人民在陕甘红军游击队和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了抗粮、抗款斗争，从此革命烈火燎原正宁。陕甘红军游击队撤离后，从 1933 年 9 月起，平子游击队、正宁回民游击队等地方武装相继建立，正宁人民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与统治阶级展开殊死搏斗，在漫长的革命斗争中，始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始终站在革命斗争前列，前赴后继，不怕牺牲，出现了郭廷藩等许多革命前辈，这些都是陕甘红军游击队给后人留下的宝贵财富，永远不会消失，它为正宁

人民指明了革命的方向，铺平了前进的道路。

综上所述，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从1932年3月22日建立，到同年8月22日撤离，存在了5个多月时间，它是以谢子长、刘志丹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陕甘边区创建的第一个红色革命政权，在中共陕甘边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影响非常深远。它开辟了陕甘边区红色政权建设的先河，是中国共产党人创建革命政权的一次重要的有益尝试。虽然只存在5个多月，但它打击了土豪劣绅的气焰，大长了贫苦农民的威风，是一次惊天动地的革命实践，在陕甘边人民的心中，播撒了革命的火种，为两年后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华池南梁的重建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在中共陕甘边历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不可磨灭的一页。

作者：程有文，中共正宁县党史研究室主任。

作者：王聪仁，中共正宁县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陕甘边南区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立

张邦英

陕甘边南区（后来的关中特区），在陕甘边以及西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为了便于人们比较确切地了解这一地区的创建和发展的历史情况，仅就我所了解和经历的情况写了这个回忆。

陕甘边南区，地处桥山山脉南段、陕甘两省的边界地带。包括现在的陕西耀县、淳化、旬邑、彬县、宜君、黄陵、富县、甘泉和甘肃正宁、宁县的一部或大部。这里山岭、川峪、高塬、沟壑甚多。靠近深山的地方，森林茂密，道路崎岖曲折，交通十分不便。

过去，封建军阀、国民党在这一地区的军事控制较为薄弱，当地人民群众深受封建地主、官府的剥削压榨和土匪的骚扰，生活极度贫困，不得安居，对改变现状具有强烈的愿望。土地革命时期，党组织和革命武装在这里进行游击战争，并在照全创建了革命根据地。之后，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在三路游击队活动发展的地区，建立了陕甘边南区党组织和革命政权，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织部分。1936年春，由于局势的变化和区域的变动，陕甘边南区改为关中特区。

在革命战争年代，陕甘边南区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的发展犹如一把尖刀，直插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的统治中心——西安，对甘肃的敌人威胁也很

大。同时，这一根据地所处的位置，又使它成为据守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南大门，对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二

早在1931年10月间，刘志丹同志领导的合水太白镇起义部队和杨仲远、阎红彦等同志所带的晋西游击队，就在宁县、正宁、旬邑等进行武装斗争。为适应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需要，并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两支部队于1932年1月间，在正宁的柴桥子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随即在部队中进行反帝爱国教育，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学习古田会议文件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反对不良倾向，进行组织整顿，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做了许多准备工作。1932年2月，为动员人民群众开展反对封建地主、土豪劣绅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部队又在正宁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仍任正、副总指挥（以后刘志丹任总指挥，阎红彦曾一度任副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在陕甘边地区第一次打起了工农革命的旗帜。不过，这次改编在做法上有错误，使部队本身受到了一定损失。之后，部队在正宁、宁县、旬邑、宜君、中部、同官、耀县、淳化、白水、宜川、韩城、保安、合水一带，同当地民团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近一年的战斗，取得了许多胜利，并打开了旬邑县城，发展了自己的力量。部队在正宁活动时，曾先后两次打了县城山河镇，援助当地农民群众围城抗粮抗款的斗争，并一度在寺村塬附近的部分村子，帮助成立了农民协会、赤卫队和临时革委会，打土豪，分财产，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同年6月以后，曾到三原武字赤色区及耀县照会等地进行革命活动并与当地反动武装进行战斗。1932年12月，为贯彻执行6月中共北方局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关于建立新的红军与苏区的决议，陕西省委派杜衡（以后叛变）到部队，在宜君的杨家店子、转角镇召开会议，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杜衡在这次部队改编中，借机打击和排斥部队的原主要领导同志，自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政委，王世泰同志任团长，不得不留下有军事指挥经验的刘志丹同志任参谋长。

三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成立后向南进军，于1932年底至1933年初，打了宜君的鱼家坪，全歼了驻在那里的民团武装，击退陕北军阀井岳秀的援兵，占领了耀县香山寺，歼灭了耀县照金、两源、淳化、铁王等地的许多民团。这时，李妙斋、黄子文、习仲勋相继任游击队指挥（后又为李妙斋），习仲勋任政委（后为张秀山），金理科任特委书记（后为秦武山），在照金地区进一步宣传、组织群众，建立农民协会、妇女会，赤卫军和党的基层组织，开展打土豪、分牛羊、分粮食，进行游击战争。并在4月5日召开照金地区的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了陕甘边照金临时革命委员会，选举周冬至（雇农）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兼共青团特委书记），从而扩大了革命的影响，使红二十六军有了后方根据地。当时党、政、军领导机关设在土儿梁，后迁到薛家寨。

照金一带革命斗争迅速发展，使敌人很恐慌。于是，杨虎城调集西北军的警卫团、特务团、骑兵团和一部分地方民团，对红军、游击队进行“围剿”。面对这种情况，杜衡形左实右，错误地估计形势，不顾故强我弱和刘志丹等同志的反对，决定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离开照金，到1928年进行过革命暴动的敌人统治中心的渭（南）华（县）一带建立根据地。部队遂于6月底经三原、高陵等地南下到临潼，受到敌人的围追堵截，不到两个月，便在终南山遭到失败。杜衡的错误决定，使多少同志用鲜血和生命缔造的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毁于一旦，同时也使照金根据地陷入危机。

四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后，照金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和游击队在陕甘边特委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1933年7月21日，杨虎城的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率部在耀县起义后成立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党组织在起义中组建的耀县游击队和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四团，先后进入照金根据地会合。8月14日，陕甘边特委召集党政军负责同志在陈家坡召开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联席会议，着重解决了三支部队的统一指挥、统一行动问题。会议决定建立陕甘红军主力部队，王泰吉为指挥、高岗为政委，从而为恢复、发展红二十六军，有力地打击消灭敌人，扩大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后，指挥部队打击了照全周围的庙湾、柳林、让牛村等地的民团，并继续西进，随即同前来的陕北安定游击队一起夺取了旬邑县城所在地张洪镇，对陕西的敌人震动很大。1933年10月中旬，西安绥靖公署乘我主力部队（刘志丹同志此时已从终南山返回，担任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北上攻打合水县城之机，调集杨虎城部孙苍浪特务团和耀县雷天一、柳林肖振山、庙湾夏玉山、瑞曲陈日春及叛徒陈克敏的民团等反动军队三千余人，对照全根据地发动了“围剿”。敌人连续几天包围，炮击薛家寨后方，我防守部队（敌“围剿”开始，原指挥李妙斋在与民团的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指挥由吴岱峰接任）在敌多而我力量很小、又不能死守的情况下，遂与党政机关突围，退出这一地区，向合水、庆阳方向转移，留下当地游击队在张明吾、黄子文的指挥下，到淳化、耀县、旬邑边界地区继续坚持斗争。接着，陕甘之敌又相互配合，对我主力部队进行“追剿”，我军经过英勇奋战，先后取得消灭三十里堡民团和毛家沟门反击战等胜利，打退了敌人的“追剿”，挫伤了敌人的锐气。

五

为进一步增强部队战斗力，发展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根据刘志丹同志的提议，部队和特委的负责人于1933年11月在合水包家寨召开了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不仅对部队重新进行了整编，恢复了红二十六军，成立了四十二师，而且还认真总结了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终南山失败和照全根据地失守的经验教训，决定以陕北安定、陇东南梁和关中照全为中心，成立三路游击队，建立三个根据地，红军主力从中策应，积极配合，主动灵活地打击消灭敌人。

会议结束后不久，第三路游击队即在原照全几个游击队和平子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并成立了指挥部，王安民同志任指挥，张仲良同志任政委。接着，三路游击队在红二十六军主力的大力帮助下，积极发动群众，壮大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当时，在三路游击队指挥部领导下，金理科在淳化、耀县，杜克、李尚勤在正宁、旬邑、彬县，黄子文在中部、宜君、富县、甘泉、宁县等县，团结当地革命积极分子，宣传群众，组织农民协会、赤卫军，建立青年、妇女组织和区、乡革命政权，党的组织，发展革命武装。同时，

在我政治影响下，周围地区一些不堪忍受豪绅地主压迫剥削的农民群众，揭竿造豪绅地主的反，参加了游击队；在敌军和保安团队中一些不满现状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组织哗变，弃暗投明，加入革命队伍。到1934年秋，耀县、淳化、旬邑、正宁、宁县、富县、甘泉、宁县等县，先后组建了十几个游击队，打击歼灭了许多敌人，拔掉了南邑、直罗、麻子掌、小石崖等地的民团据点，恢复了照全根据地，为建立陕甘边南区革命政权，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在各县游击队分别担任队长和指导员的有张占虎、穆天祥、罗恒彩、任连俊、李文喜、何秉正、郭炳坤、刘玉才、赵铁娃、唐智祥、杨兴才、刘永培、卜凤明、乔占才、边德荣、苏继堂、牛书中、宋桐良、孙振海等同志。

六

1934年9月间，陕甘边特委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决定将三路游击区划为陕甘边南区，成立陕甘边南区党委和陕甘边南区工农革命委员会，派我任南区党委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在此期间，曾任过一段中、宜、富、洛游击队政委），黄子文任南区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原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驻三路地区办事处主任），领导机关设在中部县（今黄陵县）双龙镇上川小石崖附近的高窑子和灵湾，进一步发展这一地区的游击战争，扩大革命武装和根据地，加强建党建政工作。当年冬，陕甘之敌杨步飞、冯钦哉等部对我区疯狂发动“围剿”，中宜游击队在宜君建庄川的高松树，富西游击队在直罗镇西北部的一个无名寨子上，先后被敌人包围，战斗中除很少战士突围外，多数阵亡（富西游击队队长宋桐高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经济员高禄瑞兼任政治指导工作，被俘后遭敌枪杀）或被敌带走。中宜游击队指导员苏继堂同志陷入敌手后，被带至中部县城，受到敌人两个多月的关押和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直到被绑赴刑场时，还高呼“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壮烈牺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面组织力量坚持斗争，一面任命邵凤林为队长、牛书中为指导员，新成立了以樊长青为主要领导的宜君建庄游击队。

1934年冬，在各县游击队发展的情况下，遵照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的指示，三路游击队抽出约两个连的兵力补充了红军主力部队，于1934年底前后又以指挥部所属的特务队和平子游击队为骨干，成立了红二十六军

第一团，由陈国栋任团长、张仲良任政委。作为红二十六军在陕甘边南区的主力部队。红二十六军第一团成立后，同敌人进行周旋。1935年4月间，部队在宁县金村庙与马鸿逵、马培清部打了一次遭遇战后不久，张仲良同志调离部队到地方工作（任中宜县革委会主席，王英为助手），陈国栋同志调陕甘边南区游击队任总指挥，红一团团长、政委分别由贾维义、郭炳坤接任（贾维义之前，寇金才曾代理过团长职务，时间不长即在作战中牺牲）。

1934年冬后，随着陕甘边南区革命武装斗争和区域的发展，一些地方逐渐建立了区、乡党、政组织和部分县临时革命委员会、办事处，于1935年秋相继成立了新正（正宁）、赤水（旬邑）、淳耀（县）、新宁（宁县）、永红（彬县永乐等地，后大部被敌占领，改为一个区）、中宜、富西等县的革命委员会和党的领导机关。当时在这些县担任主要领导的有金理科、杜宛、杨伯伦、芦永财、郭廷藩、李尚勤、张积太、李积斌、李科、郭存信、郭进庭、秦善和、封保宝、孙彦成、王振喜、杨宗耀、李德禄、焦怀兴、王秉祥、郭洪超、韩明奎等同志。

七

1935年七八月间，在陕甘边特委和南区党委领导下，红一团和各县游击队积极向外活动，配合西北红军主力粉碎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各县继续建立健全党、政组织，进一步巩固根据地，准备分配土地。这时，西北工委派唐洪晟任南区党委书记，惠碧梅做团的工作，我改任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陕甘边南区领导机关从中部县迁到了正宁县的三嘉源和南邑等村，原属中宜、富、甘、洛等县工作，遂划归陕甘边区直接领导。10月间，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下，陕北进行的错误肃反扩大到陕甘边南区。当时陕甘晋工委派来鲁负责南区党委书记，进行肃反（唐洪晟改任组织部长），并带了一个营的部队和若干人员予以协助。他们采取“先外后内”、“先下后上”、“先部队后地方”的办法，逮捕了几十名党、政、军干部和从白区来的同志，其中一些人含冤被害，一时间人心惶惶，思想混乱，许多人对革命产生了怀疑，各项工作受到了很大损失。与此同时，在鲁贵“左”的思想指导下，他带来的那个营配合红一团和当地部分游击队在清水源、城前头村与敌人打了两次，结果未能打好，引起许多同志和群众的

不满。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及时制止了这一错误肃反，不知还会有多少同志被逮捕受迫害，闹出多大的乱子，给革命造成多大的损失！

1935年秋，在当地革命斗争形势日益深入发展的情况下，我们根据中央苏区的土改政策和上年冬在小石崖上川、五坝梁等地试将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的情况以及当地土地多、佃农多、地主豪绅在城市居住多的特点，在南区许多地方进行了分配土地。当时先从教育和训练干部、积极分子入手，并成立土地分配委员会。接着，发动农民群众特别是贫雇农开会讨论分配办法。然后对地主的土地、牲畜、农具、浮财和富农多余的土地进行分配，并为农民分到的土地进行丈量，插上牌子，还为外地逃荒来的难民解决了一部分土地、耕畜和种子等困难。土地分配的进行，使广大农民群众欢欣鼓舞，更加相信革命、相信共产党。阶级觉悟和对敌斗争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当时，有许多青年参加了红军和游击队，不少地方建立了游击小组；新正县的农民群众积极帮助和配合本县游击队、赤卫军打开新正县最反动的王郎坡寨子，收缴了反动地主民团的枪支，并将镇压群众革命斗争罪大恶极的民团首领赵老八兄弟中的四人送交南区革委会处决，影响很大。

为了进一步加强南区的革命武装和政权建设，除了将三原心、武字区来的一部分武装改编为十九支队外，游击队指挥部在上级指示下，将新宁游击队的第三、四支队，新正游击队的五、八支队，赤淳游击队的六、十、十一、十三支队，分别改编为独立一、二、三营，孙兴才、焦怀兴任一营营长和政委；张志行、张嘉伯任二营营长和政委（焦怀兴、张嘉伯以后在一次袭击敌人的作战中同时阵亡）；边德荣、刘永增任三营营长和政委。当年冬在米头梁召开了陕甘边南区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南区苏维埃政府，秦善秀（贫雇农）为主席，我为副主席。下设拥红、肃反、土地、财政、教育等委员会，郭树廷负责财政工作。之后，各县也相继召开代表会议，选出了各县的苏维埃政府。

八

1935年11月直罗镇战役至12月瓦窑堡会议期间，为适应抗日战争新形势和革命根据地发展的需要，中央决定成立陕甘、陕北两省和关中、神府、

三边三个特区。1936年初春，将陕甘边南区改为关中特区，中央派贾拓夫任关中特委书记，张德生任特委组织部长，习仲勋任特区政府副主席，江华任特区司令员，秦善秀和我继续担任特区政府正、副主席，陈国栋改任特区副司令员，加强了这一地区的领导。贾拓夫同志一到这里，即向大家传达了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泽东同志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使大家深受教育和鼓舞，进一步增强了坚持武装斗争、巩固革命根据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迎接抗日战争新局面的信心。接着，特区办了一份油印的关中小报，在宣传党的任务，反映一些地方的斗争经验、教育干部、促进工作上，起了很好的作用。

不久，国民党东北军向我关中特区和部队采取步步进逼的办法进行“围剿”，以后又大举发动“进剿”，并由动飞机进行轰炸。当时正值中央红军东征后回师陕北，准备挥戈西进，向甘肃、宁夏发展。中央将关中特区主力部队和许多领导干部调离特区，留下个别领导同志和县游击队坚持斗争。于是，特委决定留下习仲勋负责主持当地工作（不久也调走），只剩下秦善秀（后在敌人“围剿”下光荣牺牲），同时将三个独立营合编为红三团，与原红一团（钟辉为团政委）一起命名为关中红军，由江华任司令员，贾拓夫任政委，我任政治部主任，陈国栋和刘永培分别任红三团团、政委。

关中红军组成后，在当地与敌进行了短时间周旋，于六七月间沿桥山以东北上，向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转移。部队在经富县的直罗镇向道德碾行进中，我和红三团三营营长边德荣因过去常常带游击队在这一带活动，道路、地形较熟，走在部队的前面。我们行进至道德碾畔时，突然与从东线向我“进剿”的敌军遭遇，在一片枪声中，边德荣同志不幸中弹牺牲，我们失去了一位英勇善战的好党员、好干部。于是，我军绕道前进，敌人当晚撤走。部队第二天到达道德碾后，休整了一天，当时，担任陕甘省委军事部长的萧劲光司令员，曾为全体指战员讲了话。接着，部队继续北上，按计划到达了目的地。这次遭遇战后，敌人为请功，曾在西安东军办的一个报纸上，刊登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谎称某年某日在某地“剿匪”中，打死了红军一个营长，还活捉了关中革委会主席张邦英。没想到，敌人的这一谎言竟成了30年后“文化大革命”中对我进行审查的一大历史问题。

自从主力部队和许多领导同志离开后，关中特区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继续进行这一地区的工作，特区工委成立，汪锋任书记，张凤歧任

组织部长（曾在陕甘边南区做宣传工作），郭存信任宣传部长，领导当地干部、游击队坚持了一段时间的斗争。九十月间，中央又派习仲勋到关中特区任书记，重建特委，张凤歧继任组织部长，与习仲勋一起派去特区的张策任宣传部长，郭炳坤任司令员，贺建山和牛汉山分别做工运、保卫工作，陈学庸任赤水县委书记。当时特区领导的武装力量很薄弱，在敌人采用碉堡政策进行“围剿”的困难情况下，仍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统一战线和其他许多艰苦工作，打击消灭了许多敌人，恢复了许多被敌占领的区域，发展了自己的力量。不久，西安事变发生，我一、二、四方面军开到渭河以北地区，配合张学良、杨虎城部队应付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这时关中特区的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区域也有了发展。1937年陕甘宁边区成立时，关中特区遂改称关中分区，以后又改为专区。

九

陕甘边南区武装斗争的开展和根据地的建立，不仅对促进当地革命斗争形势发展和巩固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做出了贡献，而且在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同白区党的联系上，也起了一定的桥梁作用。当时，许多从白区到陕甘边、陕北根据地或由根据地去白区工作的同志，往往经过这里，受到当地武装人员或秘密交通的护送。新正县有个赵白秀，就是专门做交通工作的。据我所知，从1934年夏到1936年春，刘少奇、蔡子伟、张文舟、李启明、张庆孚、李铁轮、朱理治、鲁贲、王世英等同志出入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都从这里经过。印象较深的是鲁贲于1935年夏从北平往陕北送北方局的秘密指示信到这里，当时因敌人“围剿”，无法送到，遂给了他许多路费返回，信由这里派武装人员转送过去。再一个是张庆孚和贺山多从上海来陕甘边，还带着一支手枪，在经西安、彬县进入我区时，给我们写了一封在紧急或特殊情况下才使用的鸡毛信，通报他们的来意。此信由群众一村传一村，很快传到我们手里，我们感到很危险，为安全起见，我亲自带保卫队去接回他们，并派武装将他们护送到陕甘边特委。另一个是王世英同志从上海来找中央，在经过这里时，曾将他特为中央负责同志所买的美国派克钢笔给我和特区另外三位负责同志各分了一支，这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处于战争环境，找毛笔写字都十分困难的人来说，真是如获至宝。印象最深的则是，党中央

1936年3月派刘少奇同志从瓦窑堡去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推进北方地区各阶层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当时刘少奇同志看上去有四十来岁，大高个子，穿一件灰色的长棉袍，戴着一顶驼毛的套头帽，围一条毛围巾，像一位饱经风霜、远道而来的学者，颇有政治家的风度，使人感到和蔼可亲。与他同行的有他的夫人。当时我们将委的几个同志特意搞了一顿有酒有肉的晚饭为他饯行。大家围坐在一个小炕桌旁，无拘无束，边吃边说，每人还唱了自己拿手的一个革命歌曲，度过了一个欢乐愉快的夜晚。这情景虽然过去半个世纪了，那种上下级之间同志式的深情厚谊，使我至今记忆犹新，仍感到十分亲切。

多少年的实践证明，陕甘边南区革命根据地之所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始终在敌人包围中巍然屹立，成为陕甘边人民群众一座坚强的革命堡垒，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党中央、陕西、陕甘边党组织和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的领导下，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坚持走毛主席开创的井冈山革命道路，使井冈山火炬照亮了桥山大地。陕甘边南区革命斗争实践，充分证明了毛主席“工农武装割据”、“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过去，有些“左”倾机会主义者说这是“枪杆子万能”、“逃跑主义”等，显然是没有根据的，是完全错误的。

作者：张邦英，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之一，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民政部原副部长，2010年逝世。

红二十六军建军史上具有 历史意义的两个会议^{*}

张秀山

1932年底，我结束了在上海中共临时中央局受训回到西安，根据我的要求，这年11月初中共陕西省委批准我去陕甘游击队工作。

一、红二十六军的诞生

1932年12月，根据《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要求陕西省委迅速编制一个师或两个师，“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的有部队，编成为经常的正式红军，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指示，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将陕甘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12月24日，部队在宜君县转角村举行红二十六军红二团成立大会。

会上，杜衡代表省委宣布了红二团的干部名单：杜衡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王世泰任红二团团长，郑毅任团参谋长，杨重远任团参谋处主任，杨琪任团管理处处长，刘约三任团经理处长。全团编有两个连，将骑兵大队改编为骑兵连；步兵大队改编为第一连，我任连长（不久改任为骑兵

* 本文系张元生根据父亲张秀山的回忆整理。

连指导员)；少先队仍为少先队，团部还设一个直属的政治保卫队。全团共有200多人。虽然人数不算多，但队伍的质量都很好。

在会上，杜衡对刘志丹、谢子长大加责难，强令他们离开。对杜衡的这种做法，大家非常不满。在我们一些同志的强烈要求下，杜衡才勉强留下了刘志丹，让他当了个团政治处处长。

根据陕西省委开辟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指示，红二团成立后接连打了几个胜仗。

红军的初步胜利，冲昏了杜衡的头脑，他不顾客观条件是否许可，1933年1月先是硬逼着红二团去攻打庙湾镇民团，遭到失败；后又决定红二团南下，导致全军覆没，只有刘志丹、王世泰等少数同志回到照金。

1933年6月初，杨森来到渭北游击队，向我们传达了陕西省委指示：将渭北游击队和富平游击队合并，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四团，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王伯栋任参谋长，杨玉亭任经理处长。6月13日，在三原武字区红四十二师第四团正式成立。

此时，我在渭北游击队任政委，因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也称耀西游击队）政委习仲勋负伤，省委决定我去接任耀西游击队政委。我把渭北游击队的工作向杨森作了交代，并同他们一起研究了红四团改编的一些具体问题。

这时，由于王泰吉领导的国民党十七路军骑兵团正准备在耀县举行起义，他们派人来渭北游击队进行联系，省委又决定我暂时留下。

7月21日，王泰吉领导的骑兵团在耀县举行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乘骑兵团起义的有利时机，中共耀县县委主持成立了耀县游击队。这就大大壮大了红军的力量。

陕西省委这时组建红二十六军红四团，具有特别的重大意义。一是表明红二十六军这面红旗仍然屹立于西北高原；二是在政治上击破了红二十六军被消灭的预言。

二、陈家坡会议

红二团南下失败后，根据地失去了坚强的支柱，接着，耀县义勇军暴动也遭到失败（起义部队在三原辘轳把与敌遭遇，受到严重挫折）。在强敌进

攻面前，照金苏区、渭北苏区全部失败，革命根据地越来越小，物资奇缺，红军不能在村庄里居住，只能钻梢山（即山沟），梢山里的生活非常艰苦，连觉也不能很好地睡。红军失败，陕西、甘肃、汉中的党组织被破坏，苏区垮台，全被“左”倾机会主义这些叛徒搞完了，我在报纸上天天看到这种消息，感到非常痛心。这是红二十六军咬紧牙关的时期。虽然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到了照金地区，但由于没有统一的领导，根据地仍然存在着严重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不坚定的人发生了动摇，右倾悲观失望就出来了。他们认为红军在陕甘不能发展，只能打游击；陕甘边特委只能领导游击队，不能领导红四团。主张红四团分散打游击，不能建立根据地。而我们认为，我们还有军队，只要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指挥，把我们的基础搞起来，红军就能发展壮大，根据地就能恢复和发展。红军队伍要统一指挥，在陕甘边特委领导下创建苏区。

为了组建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恢复、巩固根据地和加强红军建设，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苏区的陈家坡召开特委扩大会议，讨论把红四团、耀县游击队和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三部分武装力量统一起来，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这就是红二十六军建军史上著名的“陈家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秦武山、杨森、高岗、习仲勋、李妙斋、张邦英、陈学鼎、陈国栋、黄子祥、王伯栋和我。高岗以陕西省委特派员身份出席会议。秦武山、习仲勋和我三人是特委成员，轮流主持会议。红四团与游击队的连以上干部和抗日义勇军中的党员干部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对汇合起来的三支部队的今后行动方向、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人选等问题发生了激烈争论。会议从当天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上午，最后才统一了认识，作出了决定。

会议激烈争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三支红军队伍，今后是坚持集中领导统一行动，还是继续分散活动。黄子祥、王伯栋等同志不同意三支红军部队统一行动，提出红四团应回到三原地区打游击。他们认为：现在陕西省委已经被敌人破坏，渭北苏区又退了出来，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经过几次战斗，所剩下来的人也不多了，就目前这点力量，还是分散开打游击好些。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来自三原地区的干部，仍然留恋渭北地区，希望将渭北地区恢复起来。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不可能马上实现的。

由于在渭北游击队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对渭北根据地的情况以及黄子祥等一些同志的思想情况是了解的，渭北游击队的同志对我也是信任的。我在会上说：渭北根据地各方面条件的确很好，但是在目前情况下，敌人能允许我们在那里立足吗？因为它离敌人太近了，距敌人的统治中心西安才100多里，距渭北重镇三原县城仅20多里，敌人是决不会让我们在那存在的。再说，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现在的力量很弱，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四团后，还是那么多人，那么多枪，即使回去了，敌人打来，我们能坚持住吗？游击队打游击能消耗敌人，疲惫敌人，如果将三支力量分散作战打游击，那只会被敌人逐个消灭，不可能形成红军的主力部队，形成一个拳头去打击敌人，根据地也就不可能建立和巩固。

与会绝大多数同志认为，形势确实是严重的，但是，我们还有红军和游击队，特别是党政军的一部分骨干还在，这是红军和游击队能够巩固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和杨森等大多数同志坚决主张红军和游击队集中起来，加强领导，统一指挥，在陕甘边特委的正确领导下，红军和根据地一定能够得到巩固和发展。经过摆事实讲道理，最后大家统一了认识，同意把三支红军部队统一起来，组成红军临时总指挥部。

争论的第二个问题是：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的人选。与会的大多数同志主张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王泰吉任总指挥。但有的同志（黄子祥、王伯栋等同志）则认为，由王泰吉任总指挥，就成了义勇军领导红军了，他们不同意王泰吉担任这一职务。实际情况是，王泰吉经党组织审查批准已经恢复了党籍，并且已是党的领导干部。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在耀县起义时，部队的成分是比较复杂，决心参加革命的人不多，但经过三原掩护把战斗、耀县小邱战斗及照会战斗之后，抗日义勇军剩下了百余人，不坚定的人都被淘汰掉了。这时的抗日义勇军已和红军部队差不多了，根本不存在什么抗日义勇军领导红军的问题。会议最终决定王泰吉担任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

争论的第三个问题是：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政委人选。会上推举高岗任临时总指挥部的政委。在陕西省委被破坏以后，省委组织部长贾拓夫派高岗任军事特派员领导军事工作。高岗到薛家寨后，特委开会决定高岗任抗日义勇军政委。黄子祥、王伯栋同志反对高岗担任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政委。他们以省委已被敌人破坏为理由，不承认高岗是省委派来的军事特派员。在会

上，习仲勋、秦武山和我都证明高岗来时，带有贾拓夫开的介绍信。经过争论，最后还是决定由高岗任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委。

会上最后表决时只差两只手，如果他们再多两只手，那事情就难办了，如果会议走了分散的路线，那么红军也就完了。

陈家坡会议统一了党、政、军的认识，决定组建陕甘红军的主力部队，提出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红军深入陕甘边地区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大照金根据地的正确方针。

会议确定的方针决定了红二十六军的命运，红二十六军由一个团发展为一个师。陈家坡会议是在西北革命转折的重要关头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为陕甘根据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薛家寨失守

陈家坡会议后，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照金地区还有不少游击队和群众武装，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所属的第一、五、七、九、十一支队仍留在照金地区，作为地方部队。陕甘边革委会政治保卫队也归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指挥，总指挥是李妙斋，我任政委，我们带领游击队坚持在照金一带打土豪，开展游击战争，保卫照金根据地。

这时，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机关都住在薛家寨，这里聚集了一批我党的革命力量，又是红二十六军唯一的后方，我们在这里储存了大批物资，安置了一些伤病员，同时还关押了一些被俘人员。山上的气候寒冷，阴历8月下旬，山下下着雨，山上就已开始降雪了。薛家寨地势险要，易于坚守，它和对面山上的龙家寨只隔了一个秀房沟。

1933年8月间，敌人调动了耀县、富平、铜川的民团近千人向照金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薛家寨对面山上的龙家寨被土匪陈克敏占领了，他勾结民团一起向我们进攻。

这天拂晓，敌人向薛家寨发起猛烈进攻，陈克敏带领土匪从黑田峪冲过来。我和李妙斋带着队伍到秀房沟，在沟口把敌人打退了。随后民团又从薛家寨的后山上打了过来，我们又冒雨赶到薛家寨，看到革命委员会的政治保卫队和修械所的工人们正在和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他们打得英勇顽强，敌人的几次进攻都没有得逞。到了下午，敌人见攻不上来，就开始撤退了。

李妙斋看到敌人撤下去了，就吹哨子集合部队准备反击。但是，敌人撤退时，在树林里埋伏下了几个伏击手，李妙斋和通信员武功不幸被敌人的伏击手击中，当场英勇牺牲。

李妙斋同志，原名王桥山，山西汾西县人，是我党知识分子出身的优秀干部，他曾在井岳秀部队中当过排长。1932年参加陕甘游击队，担任过大队政委。红二十六军二团成立后，党曾多次派他到民团那里执行任务。李妙斋的牺牲是我们的一个很大损失。

敌人对根据地的几次“围剿”，进攻，都没有能够攻下薛家寨。不久，我军又打开了旬邑县所在的张洪镇。这使国民党政府更加恐慌不安，《西安日报》登过这样一条消息：“蒋（介石）再电邵（力子）杨（虎城），肃清薛家寨的残匪（指我红军）”。

10月间，杨虎城任命杨子恒为总指挥，汇集了四个团兵力，并抽调周围几个县的民团配合，大约有6000多人，又向照金根据地及红二十六军进行第五次大“围剿”。敌人的部署是：以孙辅承团（附属一个炮兵营）及三原、淳化、耀县三县的民团，攻击我照金根据地；以冯钦哉师的一个团在黄陵、宜君一带堵击；以何高侯团在旬邑、淳化一带堵击；以陵东赵文治团为追击部队。当赵文治团进到毛家沟门时，我红军主力部队将其击溃，歼灭了该团的大部，剩余的一小部分逃窜而走。在山上守卫薛家寨的陕甘边游击队有第一、七、九三个支队和政治保卫队。第五和十一两个支队在山下掩护群众，与照金地区的敌人进行周旋。

敌人为了进攻照金根据地，到处抓老百姓来修建到照金和兔梁山的车道。路通后，用马把大炮拉到兔梁山的龙家寨山顶上，敌人的指挥部就设在山上，准备围攻薛家寨。

首先以孙辅承团附属的炮兵营的几门大炮猛烈轰击薛家寨。虽然敌人的炮打得很猛烈，但由于敌人炮兵的技术太差，打了三四天，没有一发炮弹击中我们的要害。石洞和我们修的工事也没有落上一发炮弹，我方无一人伤亡。从敌人打来的炮弹片看，有平射炮，有曲射炮。敌人的机枪射手打得也不准，记得在敌人进攻后的第三天中午，我从后山阵地向右石洞方向走去。敌人在秀房沟的小山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身上左边挂着文件袋，右边挂着手枪。敌人发现我后，就用重机枪向我扫射，但子弹全都打在路面以下二三尺远的山坡上。

敌人不断地从龙家寨炮击薛家寨。陕甘边特委书记秦武山召开特委会，讨论研究坚守薛家寨的问题。在会上，秦武山问我：“咱们的队伍在山上能守多长的时间？”我说：“根据我们储存的弹药和粮食计算，顶多能坚守半个月的时间”。会上没有研究半个月以后的问题。在讨论中，有人还希望我军主力部队能够尽快打回来，以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围剿”。

在山上，石门路上我们有一个分队把守着，阵地前沿我们修了防御工事，还埋有地雷，易守难攻。敌人的大炮架在对面的山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们阵地的情况。敌军久攻不下，后来发现在我们石门工事与后山巍峨阵地之间的悬崖峭壁上，有一条几百米长的石缝。在这条石缝内长了许多小柏树，而在这条石缝上面，我们没有修筑防御工事，也没有布置防守人员，这是我们在防御上一个不小的疏忽。

敌人发现这条石缝后，就利用我们的疏忽，抽 100 多人，组成突击队，配合土匪，在夜间由陈克敏带路，趁着拂晓时偷偷地爬了上来，然后散开埋伏下。这已是敌人进攻的第六天了，天亮后，对面山上的敌人只打了三炮，就停止了炮击。当我从战壕里发现爬上来的敌人时，敌人已经全部展开向我们的防御工事发起了冲锋。我当机下命令，让战士们多带些手榴弹向党家山方向撤退。秦武山、惠子俊、刘约山和后勤人员、修械所的工人以及能跑得动的伤病员，都从黑田峪下去了。他们刚离开，敌人就冲了过来，走不动的伤兵员和守石门分队的少数战士被俘。先进寨子的是敌人正规军，后山上的民团包抄上来后，已经迟了一步，没有能堵住我们的退路。敌人冲进寨子后，都争着冲进石洞里去抢东西，顾不得继续追击我们。

我们从党家山北边的沟里撤出。从黑田峪下去的几十个人，也由秦武山、惠子俊、刘约三带着，北上找主力红军部队去了。我和吴岱峰带着游击队撤出后，到了七界石、石门关一带继续打游击，后来北上与红四十二师会合。

四、包家寨会议

薛家寨失守后，我们的根据地要在哪里建立？志丹、高岗和我研究过这个问题。我说：“兔子有三个窝。兔子为什么要有三个窝？因为一个窝恐怕人或者别的走兽捉住它。在一个窝里住长了、经常住，就容易被别人知道。

所以，红军一个根据地就吃不开。我们要经常调个窝，调换着住，这样才能够存在。红四十二师要以这样的原则建设根据地。”于是，我们确定陕北第一路游击队创造一个根据地，陕甘边第二路游击队创造一个根据地，关中第三路游击队也创造一个根据地。四十二师在三个根据地中，哪里好打仗就在哪里打，帮助三个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把他们打成一片。薛家寨失守以前，这个观点还不明确，当时只是普遍地开展游击战争，不是抓住三个根据地这样的中心来发展。

1933年11月3日，红军临时指挥部和陕甘边特委的部分成员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总结和吸取了照金根据地失守的经验教训，作出了三项重大决议：

一是决定把陕甘红军临时指挥部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部。部队到莲花寺后，正式改编为红四十二师。王泰吉为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师长兼参谋长，杨森（红四团政委）兼任红四十二师党委书记。决定把西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三支队和原红四团的少年先锋队编成红三团，王世泰为团长，李映南（后叛变）为团政委。我带的部队大部分编入了主力红军。另一部分游击队留在照金周围，坚持开展游击战争。

二是决定建立三路游击区，开辟三个战场，扩大根据地建设。会议之后，红四十二师派出了一批干部，拨出一些武器弹药，分头去开辟三路游击区。

第一路游击队，是以先前派出的强世骥领导的陕北游击队为基础逐步扩大。强世骥担任总指挥，魏武任政委，活动地区以安定县为中心，向周围发展，达到与南梁根据地相连接的目的。

第二路游击队，以庆阳、合水、保安的三支游击队为基础发展壮大。杨瑞任总指挥，开始没有政委。活动地区以南梁为中心。任务是建立南梁根据地。

第三路游击队，以照金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的游击队为基础发展壮大。第一任总指挥为张明吾（出任不久被叛徒暗杀），第二任是王安民（后英勇牺牲），政委张仲良。活动地区是以照金为中心。照金游击队过去经受过多次战斗锻炼，基础好，战斗力强，为坚持和巩固照金根据地做出了突出贡献。

三是决定开辟建立南梁根据地。

会议在总结照全根据地失守的教训中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照全靠近咸榆公路，接近敌人的中心城市，加之地区窄小，回旋余地受到限制，不利于根据地的发展扩大。会议根据刘志丹的提议，经大家深入讨论，决定红二十六军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开辟建立南梁根据地。

南梁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一是南梁地区位于桥山山脉中段，桥山山脉北起盐池、定边，南至照全根据地，连接陕、甘、宁的十余个县，山大沟深，林木茂密，地形复杂，交通阻塞，便于我军迂回作战。南梁的另一特点是地处陕甘两省交界处，敌人统治力量薄弱。二是南梁地区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这里的老百姓多是外地逃来的难民，深受封建军阀剥削压迫之苦，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革命要求，前些年刘志丹等同志在这里闹过革命，共产党在这一带有一定影响。

包家寨会议在战略上解决了陕甘边根据地发展的方向问题。

红二十六军开的会议很多，但是从历史上看，陈家坡会议和包家寨会议，在红二十六军建军史上尤其具有更为重大的历史意义，为陕甘边党和红军指明了一条通向光明和胜利的道路。

作者：张秀山，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之一，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家农委原副主任，1996年逝世。

试论“七月决议”的产生 及其历史意义

李占年

“七月决议”即1934年7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作出的《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是在深刻总结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历程及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份具有前瞻性、纲领性的文献，对于推动根据地全面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1941年12月，这个文件被收入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六大以来》（上）一书中，是延安整风的重要学习材料之一。

本文试就“七月决议”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发挥的重大作用及其历史意义作点探讨，并以此纪念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75周年。

一、“七月决议”产生的历史背景

“七月决议”产生的背景是多方面的，作者认为主要有如下三点。

1. 照金革命根据地丧失，陕甘边革命遭受重大挫折

1933年6月至10月，因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和敌人的猖狂进攻，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及整个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急转直下。6月下旬，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军政委杜衡的强令下南下渭华地区创建

新苏区。因远离根据地孤军作战，在敌重兵“围剿”下，几乎全军覆没，杜衡南下途中离队去西安，不久即被捕叛变，陕西省委遭敌破坏，陕甘地区一些党的地下组织也受到重大损失。7月下旬，渭北游击队和富平游击队在三原武字区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8月，在敌人强大兵力的“围剿”下，渭北苏区丧失，红四团被迫转入照金根据地；7月下旬，共产党员、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骑兵团团长王泰吉在耀县率部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由于失去红军主力的接应，在三原等地遭敌围攻，严重受挫，余部亦艰难退入照金根据地。照金根据地在陕甘边区特委的领导下，成立了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领导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积极开展对敌斗争。10月中旬，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根据地只有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所属的几支游击队和政治保卫队，敌人乘机调动兵力，一面围追红军主力于陇东，一面疯狂围攻照金苏区。根据地军民在习仲勋等同志的指挥下，顽强斗争，终因力量悬殊，于10月15日被迫退出根据地的中心薛家寨，向陇东转移，照金根据地失陷。陕甘边的党和红军再一次面临着在哪里立足、创建根据地的抉择。

2. 包家寨会议召开，陕甘边党开始正确领导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

陕甘边党政机关和游击队转移到陇东与主力红军会合后，经过十多天的休整和冷静思考，认为虽然与上级党组织中断联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失败，但陕甘边的党和红军还在，必须坚持斗争，创建新的根据地，尽快确定今后的战略方针和斗争策略。于是，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于1933年11月3日至5日，在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将陕甘边武装斗争的重点转向桥山山脉中段的南梁地区；为确保南梁中心根据地的开辟，按照刘志丹等同志“狡兔三窟”的设想，将陕甘边区划分为3个游击战略区，陕北为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向南发展；陇东为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向四周发展；关中为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向北发展。三路游击区又共同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并沿桥山山脉向南北发展。这次会议消除了“左”倾思想的干扰，作出了正确的决策，使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会后的第三天，红军即开往合水县莲花寺进行整编，恢复了红二十六军，成立了四十二师，同时成立了四十二师党委。不久，第二、三路游击总指挥部相继成立，很快组建了红军、游击队、赤卫军三位一体的革命武装力量体系。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习仲勋、张策等同志积极发动群众，组建革命群众组织以及农村党组织，使以南梁为中心的红色区域不断扩展。2月25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重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白天章任副主席；5月2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南梁寨子湾恢复，张秀山任书记；同时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会书记。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

3. 陕甘边区第一次反“围剿”取得胜利，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

正当武装斗争节节胜利，南梁苏区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初步开展的时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频频调兵，接连发动反革命“围剿”。针对国民党军的“围剿”，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决定以部分游击队袭扰和牵制国民党军，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和部分游击队转到外线寻机歼敌，以打破“围剿”。3月，红四十二师和游击队、赤卫军在陕甘边区军委主席兼师长刘志丹率领下，由南梁北上，直捣国民党军陕西警备骑兵旅第二团后方吴起以南的三道川。经筒家砭、李家梁等战斗，歼该部4个连及民团一部。尔后，红四十二师折转南下，于4月2日在西华池（今合水县城）地区歼陇东警备第二旅第五团团部及2个营，计700余人。5月上旬，在淳化三里源遭遇战中，歼国民党军陕西游击支队2个连。这时，国民党军开始新的“围剿”。鉴于国民党军兵力较大，红四十二师于5月下旬北返南梁地区。6月，红四十二师一部北上保安（今志丹），在马子川地区击退第八十六师第五一二团一个营的袭击，歼其100余人。至此，红四十二师和游击队经30多次战斗，共毙伤国民党军及民团3000余人，挫败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苏区的“围剿”，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反“围剿”斗争胜利后，革命委员会领导根据地人民重建家园，大力发展武装力量，陕甘边根据地革命武装斗争进入全盛时期。

在此历史背景下，1934年7月下旬，刘志丹、张秀山、高岗、杨森、习仲勋、张邦英等领导人召开陕甘边区特委会议，分析陕甘边革命斗争形势，决定由张秀山起草边区特委下一步的工作任务，后经特委开会通过，下发陕甘边区党政军组织。这就是《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亦称“七月决议”。

二、“七月决议”的主要内容

“七月决议”共3部分：第一部分概括分析了全国和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基本形势，指出“中国革命形势猛烈的向前推进”，“特别是在陕甘边区，红四十二师与各地游击队的政治影响之下，群众斗争的情绪愈加深入”；第二部分检查总结了陕甘边党政军的工作，集中检讨了陕甘边党脱离群众与党内斗争不深入等问题；第三部分全面部署了边区党的任务。决议提出了9个方面的任务，即党的建设、政权问题、扩大巩固部队、开展游击运动、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群众工作、肃清右派、深入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七月决议”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全面建设所提出的战略性措施，是正确而又十分重要的，是陕甘边乃至西北根据地全面建设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其主要精神是：

1. 强调把党的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党能否保持在根据地的领导地位，关键在于党的自身建设的不断改进和加强。为此，在党的思想上，决议针对“党的政治工作不够深入”，“一切工作远远落后于客观形势后面”的状况，强调加强思想建党，成立特委训练班和部队短期训练班，培养干部，改进领导方法；在党的组织建设上，决议强调党要加强对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健全完善各级党组织，发展党员，使党真正成为群众的核心。为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决议强调提拔得力干部担任区委书记，并吸收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的贫雇农积极分子入党；在党的作风建设上，强调领导必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建议，做好群众的工作，尤其是做好妇女工作，鼓励广大妇女参加洗衣队、慰劳队、缝衣队，更好地为红军服务，不断密切党群关系。

2. 提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目标任务

创建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让人民群众翻身做主人，享受到政治上的民主权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的目的。为此，决议强调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目标任务是：“创造中心苏区、转变临时政权”，“务必于十月革命纪念日成立正式苏维埃政权”。强调在抓好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建设的网时，要积极创造条件，转变临时政权，于十月革命节正式成立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并强调要加强党对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发展农联会、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组织，颁布法令，规定实施方针；要创造南梁中心苏区，恢复照金苏区，打通陕北苏区。并在巩固老苏区的同时，帮助陕北游击队完成创造新苏区的任务。

3. 明确了红军建设的基本思路

决议对部队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要加强军事训练和发展工作。首先，把扩红作为部队建设的中心工作。责成第二路游击队和第三路游击队于两个月内各完成扩大一个团红军的任务，建议四十二师帮助陕北游击队完成扩大一个师红军的任务，将红四十二师扩大为一个军。其次，决议重申扩大部队的关键是巩固部队。提出巩固部队的办法除了加强党的领导外，最主要的是加紧教育训练，要组织列宁室、识字班、政治研究会、开设军事政治学校等，通过有组织的政治教育来提高战士的政治水平。同时，决议还要求各级党组织抽调部分同志打入敌人内部，组织革命兵变，瓦解敌人，壮大自己。再次，决议强调组织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指出要抓住一切有利时机组建游击队，并要求各游击队必须根据特委制定的游击队行动纲领去行动，规范了部队的行为。决议特别强调赤卫队、少先队等群众组织要想方设法购置武器，开展对敌斗争，并要鼓足勇气，夺取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

4. 强调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是陕甘边目前最迫切的任务

开展土地革命，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是党激发人民的革命热情，获得农民支持和拥护的有力保证，也是摧毁封建剥削制度、解放生产力、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激发其政治热情的根本举措。决议指出实行土地革命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目前最

迫切的任务，除了分配苏区的土地以外，必须向四周去开展，在各游击队区域内，群众斗争高涨的地方，立即开始分配土地。

5. 提出开展民族革命战争的原则和方法

决议指出，目前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4省，美帝国主义驱使藏兵进攻西藏，鼓动新疆南部独立，美帝国主义给国民党提供了大批军火和军事干部，形成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新形势。为此，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必须联系到反帝斗争，在广大劳苦群众面前作广泛的宣传与鼓动，以引起群众的反对与仇恨。并在这个基础上组织义勇军、反帝同盟军等，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并决定派一名得力同志组织义勇军。

陕甘边特委希望全体同志必须深入到支部作彻底的讨论，百分之百地执行决议，并把执行的结果报告特委。在“七月决议”精神的指导下，陕甘边的党政军民立即投入了一场新的战斗。

三、“七月决议”的重大作用及其历史意义

“七月决议”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区党组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解决陕甘边实际问题的一个纲领性文献。它初步提出了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入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是陕甘边革命武装斗争由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的一个关键决议。

1. “七月决议”标志着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党和红军在政治上的进一步成熟

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区党组织和红军，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长期实践中，逐步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实事求是地、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决议虽然对陕甘边党政军的工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有些甚至是不切实际的批评，但是它结合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具体实际，确定了陕甘边关于建党建军和创建根据地的重要决策，对陕甘边的革命发展具有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决议提出要“加强渭北游击队党的领导，辛字区、武字区各成立一个党支部；建立第三路游击队党委，领导三原、耀县、旬

邑、正宁、淳化的支部工作。红四十二师党委及各路游击队的党组织，要发展党员，扩大组织，使党真正地成为群众的核心。”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党和军队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提出了把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因而它是陕甘边党和军队建设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决议强调要“联系到反帝斗争，如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四省等事件，在广大劳苦群众面前作广泛的宣传与鼓动，以引起群众的反对与仇恨。在这个基础上组织义勇军、反帝同盟军等，开展民族革命战争。”这说明陕甘边的党已自觉地肩负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重任，这比1935年8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还早一年。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认为，群众是真正的革命动力，只有充分发动群众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决议要求做群众工作再不能有丝毫的忽视了，说明陕甘边区党组织进一步认识到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并在采取有力措施改变群众工作不能适应革命形势发展要求的问题。

“七月决议”标志着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及其领导核心在政治上的进一步成熟，从此以后，陕甘边区的党组织自觉排除“左”倾和右倾错误，领导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进入全盛时期。

2. “七月决议”明确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奋斗目标

“七月决议”提出转变临时政权（即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为正式政权，“在这样巩固苏区的过程中，分配土地，统计人口，宣布苏维埃政府的选举法，务必于十月革命纪念日正式成立苏维埃政权”。这就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勾画了基本蓝图。按决议要求，陕甘边区党组织加紧了政权建设的筹备工作。1934年11月4日至6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葛园堡老爷庙主持召开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根据中华苏维埃选举法，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当选为军委主席。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文化、工农监察、肃反、妇女等委员会。11月7日，在葛园堡召开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宣告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之后，各县也相继建立红色政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

府的成立，实现了临时政权向苏维埃政权的转变，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成熟，在陕甘边乃至西北革命斗争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到1934年底，陕甘边根据地和红军得到了很快发展，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发展到包括淳化、富县、中部、宜君、旬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保安、安塞、靖边、耀县、甘泉等十几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2.3万平方公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颁布了土地革命的一系列政策、法令，创办红军军政干校、列宁小学，设立集市，发行货币，开展禁烟、禁赌、打土豪、分田地、解放妇女等根据地建设活动。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使纵横几百里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最辉煌发展阶段。

3.“七月决议”所制定的战略决策，迅速推动陕甘边革命进入了大发展阶段

决议发布后，中共陕甘边特委按照会议制定的战略决策，领导根据地军民认真抓好落实工作。7月28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在阎家洼子召开。这次会议作出了几项决议：由谢子长兼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贺晋年任陕北游击队总指挥；红二十六军派一个团去陕北，支援陕北游击队的反“围剿”斗争。阎家洼子会议结束后，为适应当时斗争形势，陕甘边特委还进行了组织上的调整，决定由工人出身的惠子俊担任特委书记，张秀山去庆阳游击队担任政委。

8月5日，根据阎洼子会议的决定，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在谢子长、王世泰、黄罗斌的率领下，从南梁根据地出发，进军陕北。这时，陕北军阀八十六师井岳秀部配合地方民团，正在向以安定、绥德、清涧为中心的陕北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在谢子长指挥下，王世泰、黄罗斌率领红三团立即紧密配合陕北游击队，投入了反“围剿”的斗争。8月17日，窜入安定县景武场清剿的敌军一个连，被红三团和陕北一、二、五游击支队包围，担任主攻的红三团奋勇冲杀，一举将乘犯之敌全歼，旗开得胜。随后，我军挥戈东进，于8月23日在绥德县张家圪台，又歼敌两个排，并击溃增援之敌一个连。接着，红军转锋南下，直取清涧县河口镇，8月26日，向河口镇守敌发起了猛烈进攻。谢子长身先士卒，不幸身负重伤，但仍然坚持

指挥战斗。红军指战员顽强拼搏，击溃了敌军一个连，拔掉了这个对根据地威胁很大的反动据点。至此，红三团配合陕北游击队，三战三捷，胜利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推动了陕北根据地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河口战斗后，红三团护送谢子长到安定、延川根据地养伤治疗。9月中旬，英雄的红三团满载转战陕北的捷报，高奏凯歌，回到南梁。

9月19日，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从第三路游击队特务连及其他游击队抽调部分人员，合编成立红四十二师第一团，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下辖两个连。10月10日，以第二路游击队之保安、庆阳、安塞游击队为基础，合编成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团长刘景范，政委胡彦英，下辖三个连。这样红四十二师超额完成了决议中“组成二、三路游击队于两个月内完成（组建）一团铁的红军的任务”。至此，红四十二师已拥有五个团的建制，其中包括郭宝珊率领的抗日义勇军，兵力近千人，游击队发展到1500余人。至此，陕甘边根据地以南梁为中心，周围形成了东、西、南三个比较稳定、相互支持的战略区，为西北革命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局面。

随着反“围剿”斗争的胜利，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统一的陕甘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长征红军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落脚点，也成为各路红军北上抗日的出发点。

“七月决议”是陕甘边革命史上一个纲领性文献，是陕甘边党组织领导武装斗争以来丰富经验的总结。它指引着陕甘边的红军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军队建设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同时，它时刻警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抓好党管军队、党管武装的各项工作，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群众，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能永葆先进性，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

作者：李占年，中共甘肃省庆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试论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根据地的 创建发展及其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贾杰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陕甘边区人民，经过百折不挠的武装斗争创建起来的，是中国北方最早的革命根据地。后来在反“围剿”斗争中与陕北苏区连成一片，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又是全国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和全国解放战争中解放大西北的战略基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奠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大本营的地域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综观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红二十六军是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武装力量，是必要条件和前提；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发展又为红二十六军在陇东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是重要保障和坚强后盾，从而创建和保卫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红二十六军是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武装力量，是必要条件和前提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经历了寺村驿、照金和南梁三个阶段。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发动的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等

斗争也连续受挫，以刘志丹、谢子长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不屈不挠、艰苦探索，领导开展“兵运”工作，经过“三道川建军”、“太白起义”等一系列行动方式，1931年9月在合水县倒水湾整编成立了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这次整编创建了陕东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为陕甘边正规红军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0月，杨仲远、阎红彦率领的陕北游击支队到陕甘边区，在南梁林堡同南梁游击队会合，从此，从南梁发展起来的红色武装汇成了不可阻挡的铁流，开始为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地进行革命战争。1932年1月，南梁游击队和陕北游击支队在正宁县蔡家子会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同时成立中共陕甘游击队委员会，正式打出工农革命的旗帜，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在陕甘边区逐渐形成。4月，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寺村塬选举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陕东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2月，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镇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第二团。

红二十六军正式诞生后，按照党中央“确定在陕甘边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新苏区”的指示^①，部队立即南下开赴照金地区，投入到以创建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的英勇革命斗争中。1932年12月27日，红二十六军第二团首战焦家坪，然后进军香山寺一带打土豪，广泛发动群众，组织贫农会和赤卫军，开辟了香山和九保两个游击区，使红色区域扩大到照金薛家寨地区，迅速形成了以红二团为主力、地方游击武装和赤卫队相结合的多层次革命武装，使根据地的开辟有了坚强的支柱。随着武装斗争的深入开展，1933年4月，陕甘边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召开，选举产生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正当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领导照金根据地人民深入开展革命斗争，根据地人民革命热情日益高涨时，杜衡顽固推行“左”倾错误方针，使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失败，给陕甘边区红军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1933年8月成立的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坚持外线作战，为粉碎敌军的“围剿”，北上陕东，首战奔袭合水城，然后连续打了毛沟门战斗等几个大胜仗。这些战斗的胜利，是以刘志丹为主要代表的全体指战员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对革命势力的挽救，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和革命群众，沉重打击

^① 曲涛、李仲立，《陕东老区红军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3页。

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为红二十六军在陇东的恢复成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包家寨会议后，为实现建立南梁根据地的战略任务，部队在合水县太白莲花寺进行整编，正式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红四十二师辖红三团、骑兵团，共有人枪 500 余。主力红军在陇东的恢复和发展，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有了坚强的武装支撑，对陕甘边革命武装斗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有力地保证了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开辟。红四十二师成立后，立即开展清剿陕甘边界反动地主武装的斗争。荔园堡战斗，红四十二师捣毁了国民党陕西警备骑兵二团新兵营，在此前后，还消灭了阎家洼、赵家沟的地主民团，为建立南梁根据地扫清了障碍。红军部队在平定川、太白川、二将川等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分牛羊、分土地，组织农民协会，充分发挥了红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用。^① 1933 年冬至 1934 年春，陕甘边区游击战争迅速发展，红二十六军不断发展壮大，为保卫陕甘边乃至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立下了卓著战功，特别是在创建南梁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红二十六军的帮助下，第二路、第三路游击队指挥部及众多的游击队建立。二路游击队指挥部先后组建了庆阳、合水、保安、安塞等红军游击队，并以此为基础，重新组建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第三路游击队指挥部包括平子、旬邑、淳化、照金及宁县三支队、中宜等游击队，在此基础上组建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一团。从而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相辅相助，协同作战的武装力量体系，为陕甘边的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创造了坚实的基础，使陕甘边的革命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到了 1934 年 2 月间，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红色区域在短短 4 个月中，扩大到包括保安、安塞、甘泉、邠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宜君和黄陵等 14 个县的部分地区。^②

1934 年 2 月至 5 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边南梁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反革命“围剿”。红四十二师及第二、三路游击队，出击外线作战，经过西华池战斗等大小几十次战斗，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使陕甘边根据地更加巩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转变为陕甘边区工农民主政府创造了必要条件。1934 年 11 月

① 参见曲涛、李仲立：《陇东老区红军史》，第 103 页。

② 参见曲涛、李仲立：《陇东老区红军史》，第 111 页。

4日至6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顺利召开，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当选为政府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为副主席；选举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成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朱志清任赤卫军总指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实现了临时政权向苏维埃政权的转变，揭开了陕甘边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建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①，他还在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中提出“有相当数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这些论断是从大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和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经验中取得的，实际上提出了以军事斗争作为党的工作重心的问题。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同样是实践着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真理。几年的兵运工作挫折，使刘志丹等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认识到，能否建立一支具有坚定的政治觉悟和严格的纪律作风的军队，是武装斗争成败的前提。人民军队的建立，发挥了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位一体的任务，不仅能够打胜仗，而且广泛发动群众，解决了经济来源，密切了军政、军民的关系。在红二十六军的帮助下组建的众多的游击队等地方武装，不仅配合红军作战，而且是正规红军兵员补充的重要来源。陕甘边根据地经过艰苦的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使红军游击战争和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和巩固起来，成为积蓄和壮大人民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在国民党对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发动的三次“围剿”中，西北红军和根据地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始终不畏强敌，团结战斗，取得了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为红二十六军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是重要保障和坚强后盾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中就提出，在红军的建设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建军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页。

原则，创造党领导下的红军部队。要求陕西省委“从自己的常委中派遣一人去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并指出，首先应该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队伍编成正式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一师。

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实践充分证明，只有红色政权建设作保障，才能使革命武装得到发展壮大。在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陈家坡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纠正了在部分干部中产生的右倾悲观情绪，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革命武装力量，对坚持和发展陕甘边游击战争起到了重要的挽救作用。红军得到集中领导，统一了思想，很快变被动为主动，取得了合水、毛沟门战斗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

1933年11月3日至5日，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总结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根据地的经验教训，讨论部队改编和根据地重建等重大问题。会议做出三项重大决策：一是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和耀县三支队合编为红三团，将红四团改编为骑兵团，以适应长途奔袭、快速出击和步骑协同作战的需要。二是向陇东南梁进军，坚持在陕甘边界桥山山脉中段的南梁地区建立中心根据地，发展和壮大主力红军，建立红色政权，开创“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三是划分三个游击战略区，组建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陕北为第一路游击区，以安定为中心；陇东为第二路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关中为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三路游击区又共同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并沿桥山子午岭山脉向南北发展。包家寨会议做出的这三项重大决策相辅相成，特别是解决了红军的行动方针和战略方向问题，挽救了红军，对陕甘边红军的前途和命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对红二十六军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包家寨会议后，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先后派习仲勋等到南梁地区开展群众工作。1934年2月15日，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习仲勋任主席。南梁根据地的各级红色政权成立后，立即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成立农民联合会等，使南梁革命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成为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坚固堡垒。红二十六军恢复成立后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师、团成立了党委，四十二师党委书记杨森。连队成立了党支部，以加强党对基层组织工作的领

导。随着苏区日益发展和壮大，为了加强和改善党对苏区工作的领导，1934年5月28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决定恢复和健全陕甘边区特委，同时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① 统一指挥陕甘边苏区的革命武装力量，刘志丹任军委主席。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是陕甘边区临时政权机关，陕甘边区特委是陕甘边区党的领导机关，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是陕甘边区军事领导机关，从路线、方针、政策上领导陕甘边区的创建，为发展壮大红二十六军和地方游击队做出了卓越贡献。7月28日，陕甘边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与陕北特委、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南梁阎子村召开联席会议。会议通过讨论分析陕甘边和陕北的革命斗争形势，确定了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游击区配合作战的正确方针，为粉碎国民党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打下了基础。特别是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完全形成后，在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领导下，进行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建设，根据地的红色武装力量得到不断补充和扩大，使红军的战斗力得到了提高，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1930年1月给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信中在总结各地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中指出必须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②，指明坚持根据地斗争的意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和《粮食决议案》等重大决议，苏维埃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为红军战胜敌人提供了思想政治保证。红军依靠各级政治机关、政治工作干部和军事干部，依靠广大党员和士兵骨干，依靠地方党政部门和群众革命组织，全面开展战时政治工作，激发广大指战员和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战斗热情，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动员、组织人民群众支援和参加战争，从而保障了红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取得斗争的胜利。由于根据地逐步健全后勤组织机构，建立了后方基地，红军可以储备军用物资、安置和救治伤病员、

① 甘肃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甘肃省志·共产党志》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274页。

训练和改造战俘等，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也因为根据地加强地方武装建设，使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相互依存，密切配合，形成三结合的人民武装力量体系，在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中发挥了巨大威力。

三、陕甘边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又是全国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和全国解放战争中解放大西北的战略基地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0日，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①而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失败后，1935年初，国民党当局又急调重兵对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

1935年2月5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统一领导陕甘、陕北两块根据地。为加强反“围剿”斗争领导，西北军委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兼任总指挥。集中陕甘、陕北红军主力，组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转入外线作战，进行反“围剿”斗争。两个多月时间，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进行大小战斗10余次，解放延长、延川、安塞、安定、靖边、保安6座县城，在广大农村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多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4000多人。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标志着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被彻底粉碎，为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创造了落脚点。

1935年7月，国民党又向陕甘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第三次军事“围剿”，妄图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消灭西北红军和全国“硕果仅存”的这块根据地。蒋介石亲任西北“剿共”总司令，总兵力达10余万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与后来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组成红十五军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488页。

团，英勇奋战。9月20日，中共中央率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到达哈达铺。在这里，根据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的陕北红军的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①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达到陕甘根据地后，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保证了陕甘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从而使陕甘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1935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作直罗镇战役总结时指出：“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②。

作者：贾杰，中共甘肃省环县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第49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0页。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问题初探

刘家斌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夺取政权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的一个主要目的。加强政权建设则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进行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党在根据地局部执政的重要方式和途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开辟和建设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十分重视政权建设工作，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效和经验。本文将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作一个粗浅的考察和探讨。

一、陕甘边根据地的开辟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陕西和甘肃边界地区的工农红军和人民群众创建的，1935年2月后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其他根据地一样，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开辟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由于党的武装力量在同敌人作斗争的过程中，基本上处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之下，因此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和政权的建立，出现了两次转移活动中心，形成3个发展阶段，即：1932年年底之前以甘肃正宁寺村寨为活动中心，1933年年初至10月以陕西耀县照金为活动中心，1933年11月至1935年2月以甘肃庆阳南梁为活动中心，在陕西保安（今志丹）、安塞、甘泉、富县、中部（今黄陵）、宜君、旬邑、淳化、耀县和甘肃庆阳、合水、宁县、正宁等县的部分农村建立了工农政权，设立了陕甘边南区及华池、赤安、庆北、安塞、赤淳、富西、富甘、合水、中宜、宁县、

正宁 11 个苏维埃县治。

在开辟根据地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对于陕甘边苏维埃政权的创建十分重视，多次作出指示。早在 1929 年 4 月 16 日和 6 月 22 日，中共中央两次给中共陕西省委发出指示信，并作出关于《陕西问题决议案》，指出陕西目前的工作任务是：尽力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工作，加强党对群众斗争的领导；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从领导工农群众的日常斗争，发展到开展农民游击战争，以至建立苏维埃政权。根据这些指示，中共陕西省委以相当的力量在陕甘边界地区展开了初创革命武装的工作。首先是选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打入国民党的地方军队，在取得合法军职后进行秘密的兵运工作。

1930 年夏，刘志丹、谢子长带领一批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乘国民党陇东驻军谭世麟扩充势力之机，打入该部，并以谭世麟的名义张旗建军，在甘肃庆阳、陕西定边、保安（今志丹）的结合部三道川招募农民组建了革命武装。经过一系列挫折，刘志丹、谢子长等从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兵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搞革命武装，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还是要走井冈山的道路”。1931 年 9 月，刘志丹偕马锡五等先后到南梁地区，将分散活动在合水、庆阳山区的赵连璧、杨培胜、贾生财 3 支武装集合起来，在合水太白附近的倒水湾进行整编，在陕甘地区建立起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

1931 年 9 月 22 日，中共中央作出《由于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第二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向陕西等 8 省提出了“在某些武装斗争已经成熟的农民区域，集中力量发动农民斗争，一直到游击战争”的任务。11 月 20 日，中央又指示中共陕西省委加紧农民运动，使之逐步发展到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的轨道。12 月 5 日，陕西省委依据中央精神作出了《关于目前陕西党的中心工作的决议》，指出各级党组织要集中力量领导农民斗争，积极准备开展游击战争。此后这个斗争便在陕甘边区展开，开始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以正宁寺村寨为活动中心的发展阶段。1932 年年初，南梁游击队与阎红彦等人率领的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 月 12 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三嘉墩锦章村召开大会，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部队改编后，利用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自发斗争的有利时机，在

南原地区就地组织农民，以寺村塬为活动中心，开辟革命根据地。3月19日，游击队队委开会讨论决定，将群众自编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立即实现陕甘游击队的纲领；准备再次攻打山河镇。3月20日，陕甘游击队开到寺村塬，将群众自编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成立了赤卫军指挥部。4月上旬，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塬新庄子召开千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斗争纲领，号召农民参加土地革命，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大会期间，每村选举农民代表1名，共70余名（贫农40余名、雇农10余名，其余为中农），举行了工农兵代表会议，宣布推翻正宁县的国民党豪绅地主统治，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亦称寺村塬革命委员会）。4月12日陕甘游击队撤离寺村塬。随后，边区革命委员会由于失去依托而停止活动。

正当陕甘游击队以寺村塬为活动中心，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时候，中共中央于1932年4月20日作出《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这个决议规定“在积极的开展当地的游击运动中，创立新的红军的队伍及陕甘边苏维埃区域的任务”。决议要求：“彻底地摧毁当地的反革命的政权机关，组织苏维埃的政权机关。应该从当地的群众组织及游击队中选择可靠的党员和非党员来组织陕甘边苏区革命委员会，来领导农民的斗争，扑灭反革命的势力与夺取武装革命。革命委员会必须宣布全国苏维埃大会的一切决议与法令，并努力实现这些法令。他应该根据苏维埃的组织法来组织乡村县以至全边区的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这里应该特别注意保证在苏维埃政权之中的无产阶级与雇农的骨干及党的领导。”^①

6月1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工作的决议》，提出了开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红军和陕甘边根据地的三大任务，强调：“对于革命委员会应当用最大限度的力量领导。这一革命委员会很快的能执行土地革命，以转变为苏维埃政府。这是党目前一个中心工作，应当而且必须加强他的组织力量，具体的经济的规定他的工作。他的组织成分应当是工人、雇农、苦力、贫民、中农与游击队的代表，严防富农豪绅……等混到里边来。同时又须在各地的游击运动中，普遍加紧建立革命委员会，以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62、64、65页。

扩大并深入苏维埃运动。”^①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北方六省代表会议通过《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决议》，强调指出北方党的基本任务是创造与发展陕甘新苏区，正式组建红二十六军并锻炼成为一支强有力的红军。决议要求：“在边区首先应当发动广大劳苦群众百倍地开展和深入群众斗争（农民反地主，雇农反富农），巩固与加强边区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工作，要绝对保证党在这一临时政权内的领导。”“在边区广大劳苦民众热烈要求与拥护之下，在游击区域巩固与扩大之下，在红二十六军游击队及一切群众武装强有力的保卫之下，革命委员会应依照苏维埃选举法令，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②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作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创造陕甘新苏区的决议》，要求创造红二十六军。9月中旬，陕甘游击队袭击耀县照金获胜，击毙国民党富平、同官、耀县3县民团总指挥党谢芳，歼敌400余名，并派习仲勋、李妙斋等到照金半园一带发动群众，开辟地方工作。11月，陕甘游击队再回照金活动时，半园、高山槐一带已组建了一批农民联合会和游击队，群众斗争蓬勃兴起。游击队又连续召开群众大会，组织70多个村庄的数千群众成立分粮委员会，没收分配了大地主囤积的粮食，激发了广大贫苦群众投身土地革命的积极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了以照金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同年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随后，红二十六军经过一系列战斗，开辟了红军新的游击区域，巩固了照金苏区的外围。到1933年秋，陕甘边根据地的照金中心区域，东达胡家巷、高山槐，西抵七界石、黄花山，北迄断头川、王家沟，南至老牛坡、桃架原，横跨耀县、化、旬邑、宜君4县边界，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

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兔儿梁正式成立。3月中旬，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成立。3月15日，中共陕西省委致信红二十六军，认为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已提到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要求“立刻由农联、游击队、共产党、红二十六军代表共同组成边区革命委员会”。以照金为活动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壮大以及照金与渭北苏区的紧密呼应，使国民党当局极为恐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青两省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73、74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青两省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103页。

情，国民党一面调拨枪械武装照全周围的反动民团，一面调兵遣将“围剿”照全苏区。苏区军民奋起抵抗，展开了激烈的反“围剿”斗争。

此后，陕甘边的革命斗争又出现曲折。中共陕西省委遭到破坏后，同年10月16日照全苏区陷落。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革委会委员王满堂、王万亮和不少革命群众被敌杀害。

照全苏区陷落后，陕甘边红军主力北上到合水一带。1933年11月3日至5日，随军北上的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人在合水的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总结开展武装斗争和创造根据地的经验教训，讨论部队改编、根据地重建等重大问题。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尽快组建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组建3路游击总指挥部，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开辟南梁苏区。

南梁位于庆阳（今华池）境内，地处桥山山脉中段大梁山麓，方圆百余里。境内山岳起伏，森林茂密，沟壑纵横，地形复杂，便于开展游击战争，这一带也是刘志丹、谢子长早期从事兵运活动的地方，群众基础很好。境内之敌又多为小股地主武装，战斗力较弱，有着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包家寨会议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入以南梁为中心的发展阶段。1934年2月25日，由中共红四十二师党委主持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今属华池县）召开群众大会，选举成立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白天章、贾生秀任副主席。5月2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恢复，张秀山任书记；同时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边金山任副主席，吴岱峰任参谋长。

1934年7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作出《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陕甘边“已经进到新红军和新苏区的创造阶段”，提出陕甘边党、政、军目前的任务是：以华池为中心，向四周发展；恢复照全苏区；打通与陕北苏区的联系；创造条件，转变临时政权为正式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在边区特委领导下，各地党组织得到进一步发展，先后建立中共陕甘边区南区委员会（书记张邦英）、赤淳工委（书记全理科）。许多乡村也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成为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

在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的形势下，中共陕甘边区特委于1934年9月决定将第三路游击区划为陕甘边南区，成立南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张邦英任党委书记，黄子文任革命委员会主席，领导机关设中部县小石崖附近的高

窑子和灵湾，从而加快了南区苏区的恢复和发展。同年11月上旬，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召开，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1935年年初，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都有很大发展，分别建成大片的苏维埃区域。同时国民党又开始了对两块苏区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在此情势下，对两块苏区的党政军组织实行统一领导和指挥，已经十分必要。2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岭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的党政军组织。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成立，标志着由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构成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开始。在中共西北工委的领导下，陕甘边苏区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二、陕甘边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的建设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权的创立和建设，经历了一个从革命委员会到边区苏维埃政府的过程。边区一级政权先后建立过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照金革命委员会和南梁革命委员会。

根据中共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的规定，在正式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前，最初的政权形式是临时性的，即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应由参加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组织之代表成立之。工作开始的第一天，便须把革命委员会的武装起义的参谋部的职务划分清楚。武装起义参谋部应受革命委员会的指挥，且宜迅速变为红军司令部，指挥该区一切军事行动，准备动员工人的力量。”革命委员会在它组织的第一天，就应宣布新政权的成立，并着手准备成立正式的代表会议政权。革命委员会是临时政府，苏维埃是正式政府。

根据这一决议案的有关规定，陕甘边区先后成立的三个革命委员会也是临时性的革命政权机关。它们的组织机构分别为：

(1) 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由15名委员组成（其中农民委员10名，游击队委员5名），陕甘游击队政委、中共队委书记李杰夫兼任主席，另有两名副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肃反、财政、食粮等委员会。各村也分别成立革命委员会，大村由5名委员组成，小村由3名委员组成。同时，对赤卫军进行了整编，禁止富农、豪绅地主参加使之真正成为中农、贫农、雇

农、苦力群众的武装组织。编制办法是，以村为单位成立分队，以乡（约七八个村）为单位成立大队，分队长、大队长由群众选出。各乡联合成立总队部，设总队长、副总队长、参谋长各1名。赤卫军总队部在边区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

(2) 照金革命委员会。由贫苦农民代表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革委会下设土地、粮食、肃反等部门，王满堂任土地委员，姬守祥任粮食委员，杨在泉任经济委员，王万亮任肃反委员。在基层政权建设上，边区特委、红二十六军、边区革委会发动并领导群众成立了照金、香山、茅园、七界石、老爷岭、桃渠原、马栏川等区、乡、村革委会，选举一大批有觉悟、有威望的干部担任红色政权的领导职务，建立起革命新秩序。

(3) 南梁革命委员会。设主席一人（习仲勋），副主席二人（白天章、贾生秀），政治秘书长一人（蔡子伟）。同时，设土地委员一人（张步清），劳动委员一人（牛永清），财政委员一人（武生秀），食粮委员一人（呼志禄），军事委员一人（边金山），肃反委员一人（贾生秀）。同时组建政治保卫大队，大队长郭锡山，负责保卫革委会的安全。

1934年夏秋之交，在革命斗争蓬勃发展，根据地不断扩大，武装力量不断加强的基础上，开始着手筹备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和成立苏维埃政府。在大会召开之前，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吴岱峰、蔡子伟等人一起在陕甘边豹子川红军干校组织会议，进行了两个月的筹备工作。刘志丹为大会起草了政治决议案和军事决议案，政治决议案是要大会通过并付诸实行的主要文件。蔡子伟及其他同志起草了财政、土地、粮食等决议案及其他一些文件。整个大会的筹备工作几乎都是在荔园堡和红军干校进行的。^①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办法，参照中央苏区的经验，按照各方面人数多少确定代表名额，由群众民主推选。工人、农民、军人、妇女等各界均有代表，照顾到各个方面。会议期间，完全由代表民主选举产生苏维埃政府的委员，它和过去由群众团体推举革命委员会机构和领导成员的办法有所区别。

在完成了上述准备工作之后，1934年11月4日至6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革委会根据特委“七月决议”精神，在南梁荔园堡主持召开了陕甘

^① 蔡子伟：《陕甘边根据地政权建设回忆》，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624页。

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陕甘边区的贫苦农民、工人、游击队、赤卫军和红二十六军中选出的 100 多名代表。刘志丹、习仲勋、惠子俊、杨森、张秀山、马文瑞、张邦英、蔡子伟、张策、吴岱峰、黄子文等领导干部，以普通代表身份出席了会议。会上，刘志丹、习仲勋、蔡子伟等向出席会议的代表介绍了全国革命斗争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与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的情况，总结了陕甘边根据地创建以来的工作，并分别作了关于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政权建设等报告和讲话。代表们怀着激动的心情，认真商讨了有关陕甘边根据地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一致通过《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及《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和法令。

接着，代表们充分酝酿讨论选举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有关事宜和人选，推举出了自己满意的候选人。在酝酿的基础上，大会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民主选举。阎洼子村苏维埃代表武海潮在投票时，提出先写上刘志丹的名字时，刘志丹很诚恳地说：“先写上你最满意的同志吧。搞政权建设和地方工作我比不上仲勋。”直到武海潮把自己要选的其他人都提完了，再三坚持要选刘志丹时，他才在选票的最末写上自己的名字。代表们在这种充分民主的气氛中，投票选举习仲勋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和边金山为副主席，并选举出各委员会的委员。

11 月 7 日，在荔园堡庙前广场的戏台前，举行了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群众大会，晚上还演了戏。出席大会的除正式代表外，周围数十里的群众也都赶来参加。这样的盛会，在当地来说，真是开天辟地第一次！老百姓们奔走相告说：“我们几辈子人没有见过这样的大事情。”整个荔园堡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大戏台上，首先映入人们眼前的是一条巨幅红色标语，上面写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大戏台下，几千人云集在场地上，喜气洋洋，热闹非凡。场地四周，镰刀铁锤红旗和各式各样的彩旗交相辉映。人如海，旗似浪，锣鼓震九霄，口号若雷响。^① 在热烈的掌声中，刘志丹首先讲话，接着习仲勋讲话，郝文明和工农兵等各界代表都发了言，会场一片欢腾。代表大会最后举行隆重的阅兵仪式。边区红军和游击队、赤卫队全副武装，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主席台前，无比壮观。大会号召：各地

^① 蔡子伟：《陕甘边根据地政权建设回忆》，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 624 页。

代表要把会议的精神迅速传达下去，要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壮大武装力量，广泛发动群众，把武装斗争推向新高潮，取得更大胜利。

工农兵代表大会的召开和苏维埃政府的成立，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从此，革命委员会临时政权正式转变为苏维埃政权。这是这个地区由不十分固定的游击区域转变为巩固的根据地的主要标志。

新成立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由习仲勋任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为副主席，蔡子伟、张文华先后为政治秘书长，李生华为土地委员会委员长，张钦贤为劳动委员会委员长，杨玉亭为财政委员会委员长，蔡子伟兼文化委员会委员长，惠子俊为工农监察委员会委员长，呼志禄为粮食委员会委员长，郝文明为肃反委员会委员长，高敏珍、张景文先后为妇女委员会委员长。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军委主席刘志丹，副主席边金山，参谋长吴岱峰，供给部长马锡五，秘书长杨在泉。赤卫军总指挥朱志清，副总指挥郑德明、梅生贵，参谋长梅生贵兼任。

边区以下是县苏维埃政权。在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前后，县以下的各级地方政权亦相继建立。到1935年2月，先后建立了华池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由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贾生秀兼任），赤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边金山），庆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强家珍），安塞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王巨德），赤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宋飞），合水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李彦），富西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韩明奎），富甘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张尚达），中宜县革命委员会（主席张仲良），南区革命委员会驻宁县办事处（主任刘永培），南区革命委员会驻正宁办事处（主任郭廷藩）。

县之下是乡与村的苏维埃政权建设。乡、村设立了乡革命委员会。以1933年建立的照金金盆乡革命委员会为例，该乡设革命委员会主席一人（崔金有），文书一人（随德浪）。下面管理三个行政村革命委员会，第一行政村为胡家巷行政村，村主席一人（南吉祥）；第二行政村为窑儿沟村，村主席一人（白栋樟）；三行政村为房上村，村主席一人（由马长贵担任）。各行政村下面又管辖若干自然村。

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权的执政职能和成效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边区党政军发布一系列的政策和法令，在根

据地内开展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当时，最迫切的问题，是满足贫苦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即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革为农民土地所有制。陕甘边根据地的各级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都设有土地委员会，专责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在大部分区域分配了土地。但是，在具体政策和实际措施方面，各个发展阶段有所不同。

夺村时期，开始是打土豪分财物，就是采取军事行动，没收土豪的粮食、牲畜和其他财物，而不没收分配其土地。边区革命委员会没收了西城村刘西坤、于家庄赵元亨、琴宅赵秉义等土豪的粮食、牛羊、布匹、银钱等财产，部分留作军需，其余分给贫苦农民。以后又在五顷原按照人口平均分配了农村的全部土地，但由于苏维埃政权还不巩固，群众未充分发动起来，实际是明分暗未分。

照金时期，主要是通过没收地主、反动富农和祠堂、庙宇的土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根据人口与劳力结合的原则，分配给雇农、贫农，对土地不足的中农予以补充。同时采取谁租种就给谁的办法，将没收的土地首先分配给应当得地的贫苦佃农，在田间插标写牌确定其地界。华园乡分配了耀县学堂和香山寺的土地 2000 余亩，金盆乡分配了耀县平原大地主李卜客、陈家城地主梅生玉土地 5000 余亩。

南梁时期，没收地主及富农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分给雇农、贫农和缺少土地的中农，同时给地主家庭中参加劳动的成员留一定数量维持基本生活的土地。川台地按应得土地的农民人口平均分配，山地以其耕地能力按户划块。先分台地，后分山地，青苗随地一起分配。土地分配工作是在根据地的中心区域进行的，而在边沿区域仍然执行的是打土豪、分财物的政策。1934 年 6 月，庆阳游击队没收繁坊畔塔儿掌土豪胡克中家粮食 500 石，牛 100 多头，羊 2000 余只，银圆 1000 枚，大部分给了贫苦农民。秋季，庆阳游击队打开庆阳大地主兼商业“恒义和”在悦乐上堡子的储粮仓库，给贫苦农民分配粮食 2000 余石。

通过土地革命和分地工作，陕甘边区消灭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巩固和扩大根据地。

其次，苏维埃政府积极领导群众发展生产，并采取措施减轻农民负担。

陕甘边根据地地处经济落后的地区，广大农民生活极其贫困，边区的工农政权一成立即采取多种措施减轻农民负担，扶植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主要是：（1）不向农民征粮、派款，使其休养生息。党政军的开支主要靠“打土豪”解决。（2）经营红军公田。就是在土地分配中适当留出一部分土地作为“红军公田”，由村苏维埃政府经营。其收获一部分用于优抚红军的家属和烈属，一部分用于过往的红军游击队零散人员。（3）兴办小牧场。就是把打土豪没收的牛羊适当留出一部分，组织专人集中放养。耕牛用于为贫苦农民耕田，羊只主要供军用。（4）组织互助合作社，集资支持农民发展生产。兴办荔园堡互助合作社时，边区苏维埃政府号召机关、部队捐款支持，红三团一次捐款50多元。（5）党政军人员全部实行供给制。从边区领导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红军战士，经济待遇一律平等。这些措施节省了财政支出，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再次，发展贸易，开设集市，发行货币。为了发展根据地的经济，满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调剂余缺，促进流通，苏维埃政府开设了集市。照会时期在薛家寨山下停子沟设立了集市，五日一集，主要是为红军收购粮食和其他生活日用品。南梁时期在荔园堡设了集市，每月农历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日。每逢集日，荔园堡方圆数十里的群众纷纷前来赶集，市场生意兴隆，一派生机。逢集有炸麻花的、卖蒸馍和荞麦面饅饅的，卖其他小吃的，还有卖余粮的。摆摊子的高声叫卖，顾客争相购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几乎每逢集市，习仲勋和我们几个人都去转一转，群众每每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那时候，没有明文规定的商业税收制度。集市贸易真正起到了促进边区经济流通的作用。^①

对国民党统治区来根据地做生意的商人，苏维埃政府采取争取、欢迎和保护的政策，还通过各种办法同一些开明的商人建立合作关系。为鼓励他们来苏区做生意，苏维埃政府将苏区的山货和羊畜廉价卖给他们，使他们有利可图。又通过他们把苏区缺少的棉花布匹和其他物资运进来。经过一段时间，一些商人因受到革命影响，逐渐变得同情革命，千方百计给苏区输送货物。

为确保苏区经济稳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在南

^① 曹子伟：《陕甘边根据地政权建设回忆》，载中共中央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627页。

果发行自己的货币——苏币（群众称为苏票），并禁止国民党的货币在苏区流行。苏币是采用木刻版印在白平布上，然后盖上边区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会的印章，涂以桐油而成的。印鉴是蓝色的，总共发行 3000 元。票面分一元、五角、二角、一角。苏币与银圆等值。花一角钱能买到很多东西，商品和货币价格十分稳定。为取信于民，解除群众和商人的顾虑，财政委员会在荔园堡设立了苏币银圆兑换处，使苏币获得了很高的信誉。

最后，进行文化教育建设和社会建设。南梁地区过去没有一所学校，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提倡兴教办学。首先在荔园堡办起了第一所列宁小学，学生 40 多名。校舍是没收地主的房子，设备十分简陋，师生们自力更生，架木板当桌子，垒土台当凳子，扫锅墨当墨汁。教材是自编的油印本或手抄本。边区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长蔡子伟亲自为学生编写课本。这些教材完全是新的革命内容，多采用顺口溜的形式，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好学易记，既是文化课本，又是政治课教材。其中有一首开头两句是：“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二导师……”第一所列宁小学创办后不久，很多村庄也陆续办起了列宁小学，以后又在太白、九只窑口等地陆续办起了列宁小学。苏维埃政府还很注意成人的文化教育，在一些村庄办起了扫盲识字班。

同时，还创办红军干部学校，大力培养干部。随着根据地的不断扩大，武装斗争的深入开展，部队和地方都需要大批干部，为适应形势，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革命委员会于 1934 年 10 月初在荔园堡正式开办了红军干部学校。校长由刘志丹兼任，政委由习仲勋兼任，吴岱峰任军事主任主持日常工作，马文瑞、蔡子伟等兼任教员。学员主要是红军、游击队的中、下级干部，也有少数地方干部。教学内容主要有政治、军事、文化和政权建设。红军干部学校在荔园堡举办了第一期，1 个月时间。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校址迁到豹子川张岔，又办了两期。第二期 70 多天，第三期 3 个月。前后 3 期共培训干部 200 多人。

在报刊发行方面，为了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苏维埃政府分别创办《布尔塞维克生活》和《红色西北》报，由龚逢春和蔡子伟分别主编。它们发表的多是红军的战报及党和政府的决议，为团结教育人民、建设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在社会建设方面，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活动，设立了禁烟、禁赌、妇女放足委员会，发布了相应条例，并制定

反对封建买卖婚姻，反对迷信活动等法规，开展了以“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足、劝男子剪辫子”为内容的“六劝”活动。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群众，引导他们从封建思想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通过这些政策和措施，陕甘边的广大群众的精神状态和根据地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呈现出积极向上、生机勃勃的景象。

从以上初步的考察和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根据地开展的政权建设，具有以下特点和经验：（1）政权建设离不开革命武装的发展和革命战争的胜利。只有不断发展和扩大红军的力量，根据地的政权才能建立和巩固起来。否则，就无法存在一天。这充分表明：“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①（2）根据地政权是人民群众的政权，必须充分吸收群众代表参加政权建设和对各项事务的管理，并在政权中担任重要职务；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3）根据地政权必须为民办事，切实为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出发，进行各项决策，制定各项措施。如苏维埃政府对土地革命的开展，集市贸易的恢复，发展生产和减轻负担等措施的实施，无不体现了群众利益的需要。正是因为苏维埃政府满足了群众利益的需求，才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欢迎，陕甘边根据地才得以不断巩固和扩大。

1935年年初，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都获得了很大发展，分别建成了大片的苏维埃区域。同时国民党军队又开始对两块苏区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在这种形势下，两块苏区的党政军组织实行统一领导和指挥，已经非常必要。为此，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中共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岭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统一领导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的党政军组织。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的成立，标志着由陕甘边、陕北两块苏区构成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开始。在中共西北工委的领导下，陕甘边苏区进入了又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作者：刘宋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巡视员兼处长，研究员。

^① 毛泽东：《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8月7日，载《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7页。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历史功勋

徐振伟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独立领导武装起义、创建革命根据地。以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为标志掀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为先导，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在尝试武力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根据地建设为革命发展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最终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其中根据地建设更是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实践，为最终实现从局部到全国执政的跨越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本文试就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创立、发展演变为线索，从共产党成功局部执政的视角，着重探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革命实践和历史贡献，以纪念其不朽的历史功勋。

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

1927年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贯彻八七会议决议，强调加强军事工作和农运工作，从此拉开了陕甘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序幕。

1927年10月至1928年间，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县清水潭农民起

义等先后爆发，1930年10月1日，刘志丹发动“太白起义”，打响了我党在甘肃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进行革命斗争的第一枪。^①1932年4月，习仲勋等领导了“两当起义”，5月谢子长领导了“靖远起义”，在革命形势的推动和影响下，西华池起义、荔店起义等又先后爆发。从1927年到1931年期间，西北的革命形势发展成为全国革命的一个缩影，其特点、轨迹都与全国革命惊人地相似，起义虽大多失败，但是它们扩大了党在西北的影响，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锻炼和培养了一批党和红军的骨干力量，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同时打击了国民党在西北的反动统治，有力策应了全国其他地方的革命斗争。

1931年，刘志丹在经历了宁县张皮壕战斗失利、兵运失败和“旱胜事件”后，于9月进行“倒水湾整编”，成立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10月，阎红彦率领陕北游击支队与南梁游击队在华池县林堡庙会师，1932年1月初，部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刘志丹、谢子长任正、副指挥。2月12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部队在正宁三嘉坝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开始创建正宁寺村塬根据地。3月22日，农民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它是陕甘边区建立革命政权的一次有益尝试，开创了陇东红色政权建设的先河。^②8月，由于“左”倾错误影响，反“围剿”失利，寺村塬根据地丢失。

1932年12月24日，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开始创建照金根据地。1933年3月8日，在照金成立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金理科，军委书记习仲勋。4月5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农民代表），副主席习仲勋，还成立若干基层委员会，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革命根据地形成，但由于反动力量的大举围攻和主力红军北上陇东后敌众我寡的不利境地，10月16日，薛家寨失守，照金革命根据地在坚持10月之久而后丢失。

1933年11月3日至5日，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会议采纳刘志丹的意见，做出三项决议：一是恢复二十

① 张永良：《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历史地位》，载郭文奎主编：《南梁烽火与中国革命》，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

② 陈永发、秦生：《星火燎原西北——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140页。

六军，成立四十二师；二是将陕甘边区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华池南梁地区；三是为确保南梁苏区的开辟，将陕甘边区划分为三个游击区，陕北为第一路游击区，以安定为中心，陇东为第二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关中为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三路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根据包家寨会议精神，11月8日部队在合水莲花寺整编，正式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全师有人枪五百多。1934年2月25日，师党委在南梁小河口四合台村主持召开群众大会，选举成立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此后红军在刘志丹等率领下粉碎陕甘军阀对根据地的“围剿”，积极创造中心苏区并向四周开拓，根据地发展到包括淳化、富县、中部、宜君、旬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保安、安塞、靖边、耀县、甘泉等十几个县，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并在这些地方建立了正式的或临时的革命政权。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南梁为中心，东西约400里、南北约700里的战略区域逐步建立，建立苏维埃政府的条件基本成熟了。

1934年11月4日至7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举行。会议就根据地建设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通过《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副主席贾生秀、牛永清，秘书长蔡子伟。下设土地、劳动、粮秣、财政、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和保卫大队以及《红色西北报》编辑部等，李生华、张伙贤、呼志禄、杨玉亭、郝文明、惠子俊、蔡子伟、高敏珍、郭锡山、宋飞分别负责政府各项工作。军委主席刘志丹，赤卫军总指挥朱自清。^①在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有3000多人参加的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在荔园堡隆重举行，正式宣告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随着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各级基层政权也陆续建立起来，到1935年2月，华池、赤安、庆北、甘洛、合水等县级苏维埃政府先后建立。各级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颁布和实施政令法规，加强根据地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建设。

从1931年到1934年间，陕甘边区的革命发展经历了红军的创建、壮大

^① 陈永华、姜生：《星火燎原西北——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第160页。

和根据地建设两易中心，经历了革命政权从临时性质到正式苏维埃政府的转变。从“倒水湾改编”、林锦唐会师到莲花寺整编，构成了红军发展壮大的脉络；从照金到南梁，奠定了陕甘边根据地的基本范围；从寺村墩革命委员会、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权逐步形成、发展并最终实现局部执政。一系列的革命事件构成了一幅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

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建设

南梁，位于今甘肃省华池县境内，地处陕甘两省交界处的桥山山脉中段大梁山南麓，当甘肃华池、合水，陕西保安、甘泉四县交界，黄河第三级支流葫芦河上游及其各支流川道皆是其范围，包括平定川、豹子川、林镇川、荔园堡川、玉皇庙川、白马川、二将川、大风川等，以荔园堡川的南梁堡为中心，方圆达百余里。境内重峦叠嶂，柏林密布，沟壑纵横，地势险要，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群众苦难深重，是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理想场所。^① 包家寨会议确定了以南梁为中心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思想，为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发展和红色政权的建立指明了前景。^② 此后陕甘革命形势的发展面貌焕然一新。“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所强调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工作得到了充分发展，为夺取革命胜利，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愿望，共产党人从未放松任何条件下的政权建设，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革命伊始，就不间断地争取局部条件下的合法执政，从寺村墩革命委员会、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无不体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愿望。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既具备一般政权的所有特征，又具有明显的时代特点。苏维埃政府的政权性质清晰，“苏维埃”一词本身是俄文的译音，含义为“议会”、“理事会”、“院”等，中共六大《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明确指出：苏维埃的正式名称应当是工农兵代表会议（乡区的可简称农民代表会议）。^③ 就是说，工人、农民和士兵通过“代表会议”这种组织

① 吴志渊：《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第47页。

② 马西林、王树栋：《陕东革命斗争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③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第18页。

形式管理国家，实施自己的权力。因此，所谓苏维埃政权就是工农民主专政政权。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权作为统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组成部分，是全国苏维埃政权的地方政权，相当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省级政权。^①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作为战时政权的主要功能是动员、组织、保卫根据地，同时通过一系列政策、法令法规加强边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建设，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巩固政权。具体来讲，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要从以下领域加强政权建设：

在土地政策上，1934年冬边区政府参照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精神，结合边区实际，制定了依靠贫农，巩固的团结中农，区分富裕中农，不与富农混淆，反对富农，消灭地主（没收地主一切土地），按人口与劳动力的混合原则分配土地，划分成分，先由贫农团通过，再经全体农民大会通过，两分土地的土地革命原则。^②根据这一原则，边区政府按照各农户的主要生活资料来源及其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在农民中划定阶级成分，没收地主财产，一部分充公，一部分分给贫苦农民，富农则只没收出租的土地，在分配时优先照顾红军家属。这一土地政策，充分体现了边区政府新民主主义政权性质，解决了根据地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土地问题，保证了边区党政军的供给，初步消灭了农村中的剥削关系，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

在经济政策上，边区政府通过鼓励农民发展生产、设立集市、发行边币、保护小商贩等措施，活跃了边区经济，改善了根据地军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苏维埃政府在荔园堡设立集市，确定农历每旬一日为集日，为活跃集市贸易，对白区商人采取争取和保护其利益的政策。针对南梁地区货币流通混乱的局面，边区政府在寨子湾设立陕甘边区苏维埃银行，在油坊沟设立造币厂，发行用布制作的“苏币”。随着集市贸易的发展和金融流通的革命，陕甘边区的经济逐渐繁荣起来。

在文化教育方面，边区政府从实际出发实行了一套符合边区实际的政策。对于知识分子，只要政治上清楚，政府一律信任并分配给适当工作予以培养和重用；对白军俘虏采取教育、争取、改造和使用的政策；为改变山区

① 李智勇：《陕甘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② 参见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区苏区》（上），第145页。

封建陋习和愚昧落后的局面，1935年边区政府明令禁止赌博，禁止缠足。为了贯彻党的方针政策，陕甘边区特委和苏维埃政府分别发行了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生活》和《红色西北》，同时，边区政府先后在荔园堡、豹子川创办陕甘边区第一所红色学校——列宁小学和红军干部学校等，学校开设了文化、政治和军事课，努力发展边区文化教育事业，提高边区群众、特别是红军指战员的政治和文化素养。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实行的这一系列政策措施，巩固了边区政权，发展了根据地，充分实践了局部执政条件下的各项事业，标志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政治上的成熟。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大大鼓舞了边区人民的革命斗志，改变了边区政治混乱、经济落后、文化愚昧、风俗恶劣的旧面貌，从基础上保证了红军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从根本上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根据地，为西北乃至全国革命形势大发展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1935年2月，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实现了陕甘边区和陕北根据地的军政统一。同年7月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标志着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至此，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作为西北共产党人实现局部执政的政治实践完成了基本历史使命，而它的历史功勋则在往后的革命历程中逐步显现，以陕甘边根据地为重要组成部分的陕甘根据地（又作西北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仅存的一块最完整、最巩固的红色根据地，成为各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也成为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①充分体现了其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价值。

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历史功勋

陕甘边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占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发展为后来的陕甘根据地（又作西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区和陕北），其历史功绩被高度肯定。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指出：“陕北是两点，一

^① 陈永发、李生：《星火燎原西北——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第174页。

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①不言而喻，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作为陕甘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功绩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作为陕甘边根据地建设的核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其历史功绩自然也在“两点”中得到体现。可以说：“两点”是对包括陕甘边区在内的陕甘根据地历史功绩的最主要的评价。

与此同时，我们不应忽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历史功勋还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条件下的成功执政，这为党领导全国革命走向胜利赢得了人民信任和支持，并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切实的物质保障，又为革命胜利后成功地实现全面执政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锻炼了干部、培养了人才。^②

1. 为党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中国共产党赢得全国革命的胜利，首先在于它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执行了一整套符合人民利益要求的政策，因此被人民所拥护，为历史所选择。追根溯源，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其目标、纲领、政策、方针无不体现了这一特征，而要成功实现这些政策、方针，就必然要获得合法执政的地位，唯有如此才能全面贯彻党的路线方针。从这一角度来理解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发展，我们更能清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的脉络，也才能理解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作为一个局部执政范例的全部意义和历史功勋。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全部政策、法令无不体现了对最广大人民利益的维护。例如，土地政策就充分体现了边区政府的无产阶级政权性质，解决了根据地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土地问题，保证了边区的党政军的供给，初步消灭了农村中的剥削关系，极大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农民，因为在中国有 80% 的人口是农民，其中贫雇农占农村人口的 70%，他们“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

① 《刘志丹对红军长征的重要贡献》，载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第 262 页。

②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编：《井冈山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纪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 8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349、370 页。

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①。而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在于土地问题，“耕者有其田”是广大农民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所以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关键，农民问题则是中国革命的关键。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建立、发展的不同时期，土地政策始终是政权建设的关键环节，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即颁布《土地决议案》，其根本宗旨就是要把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现有地同耕，有饭同吃。并结合当地实际，首先废除债务，烧毁契约，然后分配财产，诸如粮食、牛、羊等，最后分配土地，彻底解决了当地农民的根本问题，满足了其迫切需要，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这保证了以后陕甘边根据地的扩大、发展，成为各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成为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同时，也为最终获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心和支持。体现了人民群众的信心和支持正是革命胜利的“力量之源，执政之基”。

2. 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切实的物质保障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为发展社会经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苏维埃政府在解决了土地问题之后，积极鼓励农民努力发展生产。首先对农民实行免征粮不派款的政策，党政军的各项开支主要来自地主豪绅，不足部分通过市场向农民购买，对红军、烈士家属和残疾孤寡老人实行政府救济。对“二流子”进行改造，教育他们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增加农业生产者。其次苏维埃政府还要求机关、部队兴办农场，开展种植养殖，自力更生，解决困难。这些努力不但解决了边区军民的吃饭问题，而且使粮食自给有余，经济有一定发展，为革命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这一成功经验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不断被推广，根据地最终克服经济困难，并且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现了“丰衣足食”，壮大了人民武装，为最终赢得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3. 为争取实现全面执政奠定了基础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是西北共产党人正确理解、践行“工农武装割据”

^①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3页。

思想的成功体现。在如何夺取政权的道路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一度迷信苏联模式，即“城市中心论”，妄图在一个或者数个大中城市获得政权，赢得革命胜利，进一步扩散到全国。实践表明：这样盲目照搬苏联模式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危害，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在诸多共产党人领导的武装起义相继因攻打大城市而失败的背景下，毛泽东毅然选择了井冈山，成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而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也是在不断克服错误路线，在不断的失败中自觉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经历了渭北、寺村寨、照金、南梁根据地的创建，最终以南梁为中心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并且使之成为土地革命时期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成为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成为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也成为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这一成功实践从理论上证明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正确性，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成功典范。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人建立的地方政权，是共产党局部执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基于局部的成功执政并发挥了关键的历史作用，用实践回答了中国革命“走什么路”的问题，廓清了革命队伍中的部分不当认识，为最终赢得全国革命胜利，实现全面执政选对了道路，奠定了基础。可以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作为一个局部政权的主要意义在于证明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正确，实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目标。

4. 为党后来成功实现全国执政积累了经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经历了不同阶段，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中心工作。中国共产党最早致力于领导工人运动，“二七”惨案表明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强大和残暴。后来共产党以国共合作为基础，以“北伐”战争为契机，领导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宣告了国共合作的全面破裂和大革命的失败。以南昌起义为开端，以八七会议为转折，共产党又开始独立领导革命。但是由于缺乏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理解，缺乏独立领导革命的经验，结果遭受了一系列重大挫折。在实践中不断反思，科学总结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自己的武装，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取得局部

执政的地位，实现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有机结合，在实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一系列政策的同时，不断克服“左”和右的错误，基本上形成了比较符合实际的工作思路、原则、方法，在此过程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执行的一系列政策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在以后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传承、发展，这无疑是共产党执政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经验。虽然说陕甘边区仅仅是一个局部的、农村的政权，但它却是“硕果仅存”^①的红色政权的基础，于是它的成功经验被共产党继承、发展，对于实现全国范围的执政有重大价值。

5. 为党后来实现全面执政锻炼了干部、培养了人才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②。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发展为党的革命事业培养了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一大批革命的领导者，为革命与建设事业锻炼了干部、培养了人才。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习仲勋、蔡子伟等亲自发动群众办学，通过努力，首先在荔园堡转咀子办起了第一所列宁小学，招收学生六七十名，同时废除传统的教学方法和内容，自编革命内容的新教材。此后又在太白、荔园堡川口等地陆续办起一批小学，使苏区的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为根据地培养了一批有文化的人才。此外，为提高全体军政干部的素质，陕甘边区特委和军委还在南梁荔园堡开办了陕甘边区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刘志丹任校长，习仲勋任政委，教学的内容涉及政治、军事、文化和政权建设，对提高党政军和地方干部素质发挥了重大作用。

虽然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局部执政的条件下锻炼、培养的干部数量有限，但不可否认这些干部最后汇入到解放全国的革命洪流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历史作用，特别是以习仲勋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最后成长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建设和发展，乃至为改革开放事业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距今75周年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迁，后人愈加清晰地看到它的伟大贡献，感受到它的历史光芒。实践表明：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序言第1页。

②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4页。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存在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对当前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丰富的启示作用。

我们纪念它，正是为了让它的历史功勋照耀未来！

作者：徐振伟，中共甘肃省庆阳市委党校讲师。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研究

岳峰伟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根据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中共陕西省委在陕西、甘肃发动了渭华起义、两当起义、靖远起义、西华池起义等大小数十次武装起义。伴随着这一系列武装起义，中国共产党在陕甘的革命斗争进入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时期，开辟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形成了陕甘边苏区。1934年11月1日至6日，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选举产生了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诞生了中国西北第一个正式的红色政权。

一、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陕甘边苏区的创建，历时6年之久，经历了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三个阶段。在寺村塬和照金两个阶段，陕甘边区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政权建设，相继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

1932年3月22日，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新庄子召集寺村塬东起五顷原，西至上南坡头一带72个村庄的农民约五六百人，召开寺村塬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不久，陕甘游击队离开寺村塬，到陕西旬邑一带开展游击战争，革命委员会即停止活动。在寺村塬阶段，陕甘红军游击队初

建伊始，兵力薄弱，不足以保障红色政权和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事实上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区域很不稳定，加上时间仓促，群众尚未充分发动起来，土地革命也没有深入进行。尽管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存在的时间不长，在敌人“围剿”下解体，但这是在陕甘边建立根据地的一次重要尝试，对陕甘边革命政权的正式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创建寺村塬游击根据地失败后，陕甘游击队转战至陕西宜君县转角镇，并在此正式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开始创建照金根据地。1933年4月5日，陕西照金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陕甘边区进入了照金阶段。应该说照金根据地有比较适合工农武装割据发展的条件，而且陕甘边红军和党组织广泛发动群众，深入进行了土地革命，在此期间创建了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的革命根据地。但是，这里距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心城市很近，根据地地域狭窄，回旋余地小，再加上“左”倾错误的束缚和干扰，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失败，致使红军力量薄弱，在敌军重兵“围剿”下，坚持不到一年又丧失了。

照金革命根据地丧失后，红军无立足之地。在此危急时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于1933年11月3日至5日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确定了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战略方针。随后陕甘边党和红军立即投入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并于1934年2月25日在南梁小河沟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后来转变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红色的革命政权是依托根据地而存在的，陕甘边根据地在寺村塬、照金时期，由于游击根据地的不确定性和地理环境的不适应性，这两个时期的建政活动相继失败。陕甘边区的寺村塬、照金阶段从建立到失败，客观上都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积累着经验，积累着干部力量，积累着群众基础，同时也不断扫除黑暗反动势力，扫除旧社会的政治垃圾。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的建政活动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与革命委员会的区别

在寺村塬和照金时期建立的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就其政权组织形式和作

用而言，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有着巨大的区别。

1. 正式与临时的不同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当时各根据地政权的名称并不一致，有“工农兵政府”、“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等。在西北地区，革命委员会一直是临时的政权机关。1932年6月26日，中共北方各省省委代表联席会议《关于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指出，巩固与加强边区革命委员会的组织，要绝对保证党在这一临时政权内的领导；^① 1932年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决议案》指出陕西党必须执行的战斗任务，包括建立和巩固革命委员会的临时革命政权……立刻成立边区革命委员会；^② 1934年7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创造中心苏区，转变临时政权……务必于十月革命纪念日成立正式苏维埃政权，即以此华池苏区为陕甘边的中心苏区，向四处发展^③。由此可以看出，1932年3月22日成立的寺村寨革命委员会、1933年4月5日在照金成立的革命委员会、1934年2月25日在南梁重建的革命委员会都是临时政权组织。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的临时性质，决定了它只是党在陕甘边区建政的尝试和探索，其发展的最终形式是苏维埃政府。

2. 在革命斗争中的地位不同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认真吸取教训，在八七会议上作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决定。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政权只能由枪杆子中取得，军事斗争是土地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在国民党多次重兵“围剿”下，西北红军进行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根据地几次失守易地。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委员会政权职能得不到有效的发挥，甚至成为红军的下属一个部门。1932年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决议案》指出，过去游击队把革命委员会看成游

① 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区》，第176页。

② 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区》，第177页。

③ 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区》，第268页。

击队下的一个部门，听游击队的指挥，不了解它是一个群众的政权机关，以致革命委员会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形成强有力的政权机关。在边区广大的劳苦民众热烈要求与拥护下，在游击区的巩固与扩大之下，在红二十六军及一切群众武装强有力的保卫之下，革命委员会依照苏维埃选举法令，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①由于革命委员会的地位必须符合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其政府职能得不到充分发挥，也就不能成为完整意义上的政权组织。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颁布了土地、经济、文化等政策，组织和发动群众参加革命，巩固和扩大了陕甘边区，对坚持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以致夺取革命的最终胜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在南梁地区建立苏维埃政府的环境优势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②。以南梁为中心的桥山山脉中段地区，除经济力量稍差外，基本上具备上述条件。这里地形复杂，森林茂密，交通不便；红军游击队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大；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处陕甘宁军阀割据势力的间隙，反动统治的力量相对薄弱；群众深受地主豪绅的剥削压迫，有强烈的革命愿望，刘志丹等曾在这里从事兵运，群众基础好，与寺村塬、照金相比更适宜工农武装割据。包家寨会议后，恢复了红二十六军，成立了四十二师，并进驻南梁。红四十二师横扫了陕甘边界的井岳秀部一个营和新堡、赵沟两个民团、陕西警备骑兵旅四个连等反动武装，建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红军、赤卫队组成的革命武装力量体系。红军力量壮大，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保证了红色政权建政活动顺利进行。

四、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政权建设

红色的苏维埃政权是特殊环境中的政权，有着特殊的任务。苏维埃政权

^① 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区》，第17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7页。

主要任务是进行土地革命，组织武装斗争。在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和红军战士的同时，还要组织工农业生产，发展商业贸易，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支持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加强了根据地的经济、军事、文化建设，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把根据地的建设和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保证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顺利进行，促进了根据地各项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土地政策。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项主要经济政策。边区苏维埃政府依据 1931 年中共中央提出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大会土地法草案》，颁布实行《土地决议案》。1932 年以前，陕甘游击队开展土地革命的口号是“打土豪，分财产”。从 1934 年开始，边区苏维埃政府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全面开展土地革命斗争，解决土地所有权的问题。边区苏维埃政府发动人民群众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没收地主土地、牛羊、粮食、庄宅和其他财产，没收富农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和财产，分配给贫、雇农和缺少土地、牲畜的中农，按照主要生活资料来源和剥削与被剥削的程度划分阶级成分，实行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击豪绅地主的土地革命路线。边区苏维埃政府主要做法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分给贫农、雇农和缺乏土地、牲畜的中农；地主家庭中参加劳动的成员，留给其能维持生活的土地和财产；红军家属有分得好地的优先权，凡家在苏区的红军一律分地，白军士兵暂不分地，应分部分留作公田；中心苏区分地，边缘地区暂不分配，随着苏区的发展逐步扩大分配区域；奖励农耕，发展生产，财粮主要取之于地主豪绅和向敌人夺取，对农民免征粮食；对红军家属、孤寡残疾人实行救济，争取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建立牧场，喂猪养牛。为了改变根据地群众的生活状况，边区苏维埃政府大力鼓励农民发展畜牧业，并从政府办的牧场中，提供牛、羊、马匹给贫苦农民，帮助他们渡过缺少牲畜造成的生产、生活困境。

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成为武装斗争的力量源泉。边区苏维埃政府实行自愿兵役制，广泛成立游击队。红军战士阵亡发给埋葬费，家属予以抚恤。这些政策，吸引众多的群众参加红军、游击队，使红军力量进一步壮大，红二十六军由原来两个团的建制扩建为 5 个团，兵力近 2000 人，各路游击队也发展到 2000 余人，赤卫军 1500 人，少年先锋队 100 多人。

根据地的土地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千百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了农民迫切要求的土地问题，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对巩固红色政权起了重大作用。

商业、金融政策。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指出：苏维埃应保证商业自由，不应干涉经常的商品市场关系。^①为此，边区苏维埃政府采取了比较宽松的商业政策。在荔园堡设立集市，每月逢一为集，广招各处商贩前来贸易，互通有无。兴办合作社，发展农副业生产。一些白区商人通过往来，也开始同情以至倾向革命，千方百计给苏区输送货物，贸易日见兴隆，经济相当活跃，使敌之封锁政策破产。边区苏维埃政府禁止国民政府钞票在苏区流通，印制发行了“苏币”（群众称为苏票或油布币），并设苏币与银圆兑换处，白区来的小商贩所得苏币可在此兑换银圆，保障了苏币信誉。边区苏维埃政府财政收入取之于地主、豪绅，并有计划地向敌人夺取，不足部分按价向农民购买，多余部分分配给贫苦农民；机关部队实行供给制，官兵一律平等，并兴办机关农牧场，自力更生，解决困难。减轻农民负担，实行休养生息，对农民不征粮、不派款，鼓励耕种，发展生产。

文化教育政策。边区苏维埃政府开办列宁小学，发展文化教育事业。首先在荔园堡的转咀子开办列宁小学，以后又在太白等地陆续办起列宁小学。与此同时，在一些村庄办了成人扫盲识字班。颁布禁烟、禁赌、戒足条例，并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脚、劝男人剪辫子”的“六劝”活动，移风易俗，树立新风尚。边区特委创办《布尔什维克的生活》党内刊物，边区政府创办《红色西北》报纸，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反映边区各方面建设情况，起到了教育和鼓舞作用。开办红军干部学校，培养革命干部。红军干部学校创办于1934年10月，校址先在荔园堡，后迁往豹子川张岔。学习内容主要有政治、军事、文化和政权建设。前后共办了3期，培训干部200余人，对提高红军干部的政治军事素质起了重要作用。边区苏维埃政府信任并培养政治上清楚的知识分子，制定技术干部待遇标准，把知识分子当做革命的财富，在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放手、生活上关心，因而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来到苏

^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第181—184页。

区，对苏区事业给予很大的帮助和支持。

社会政策。在苏区建立前，南梁是一个土匪出没的地方，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不仅消灭了旧政权，而且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些社会问题进行改造。对哥老会、扇子会等会道采取争取政策，抓住他们都带有反抗统治阶级情绪的特点进行改造。为了打破旧的社会体系，南梁政府还成立一些群众组织，如雇农工会、贫农团等，其成员是政府培养起来的新的乡村社会精英，他们在分配土地、组织动员民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政权建设，促进南梁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使南梁山区的经济逐日繁荣起来，使南梁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陕甘边苏区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南梁的人口由苏区创建前的 600 多户 2400 余人，很快增加到 1000 多户 6000 余人。

综上所述，陕甘边苏区在寺村塬、照金、南梁三个时期相继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是红色政权的尝试、探索和发展，直至 1934 年 11 月将革命委员会转变为苏维埃政府后，中国西北第一个红色政权才建立起来，并且得到巩固和发展。陕甘边苏区的组织领导者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西北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走上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井冈山之路，在西北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道路。苏维埃政权是在特殊环境中建立的政权，中国共产党通过建设苏维埃政权学会了在特别复杂的条件下治国安民的艺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是杰出的代表之一。

作者：岳峰伟，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审主任科员。

浅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与陕甘省 苏维埃政府的衔接问题^{*}

朱春宁 杨斌 朱瑞华

在纪念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 75 周年之际，根据中办字（2008）21 号文件精神，朱开铨和罗培兰的后代与朱开铨生前的秘书杨斌一起，共四座谈朱开铨、罗培兰生前讲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或建制编入陕甘边省苏维埃政府的经过，现将他们的这段亲身经历整理如下：

1935 年 9 月 20 日，中央红军攻占了甘肃省的哈达铺。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有一块刘志丹开创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依然存在。9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正式决定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放在西北，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就定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935 年 10 月 19 日，中央红军进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党中央、毛主席经过与基层干部群众交谈发现 9 月中旬刚成立的陕甘晋省委极力推行“左”倾错误，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搞错误肃反，不顾敌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围剿”造成的严重军事形势，逮捕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并已错杀 200 余人，根据地的干部和群众人心惶惶，各级政权机构大部分处于瘫痪状态，已经造成严重的政治

^{*} 本文是曹粉任陕甘边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主席的朱开铨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红军女干部罗培兰的亲属与朱开铨生前秘书杨斌座谈记录整理。

混乱，这块土地革命战争中硕果仅存的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军事和政治危机之中，即决定制止错误肃反。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内部政治危机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从实际上解除“左”倾教条主义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

与此同时党中央毛主席果断决策，依托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下决心打一个大的歼灭战，从军事上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保卫和进一步巩固这个全国仅存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解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外部军事威胁。

1935年10月21日，毛主席命令中央红军在吴起镇打垮尾追的马匪骑兵部队。战斗结束的当天下午，毛主席即派曾在他身边担任中央政府巡视团巡视员的王首道率中央红军一个连赶往瓦窑堡接管陕甘晋省委保卫局，及时解救了刘志丹、习仲勋等一批陕甘边根据地的干部。这是党中央、毛主席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采取的组织措施之一。

1935年10月22日，党中央决定撤销陕甘晋省，同时成立陕甘省和陕西省以及关中和神府特区。这也是党中央、毛主席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采取的组织措施之一。

毛主席提议，派曾在他身边担任中央政府巡视团巡视员的朱开铨担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委员、中共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兼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土地裁判部长，负责筹建陕甘省苏维埃政府，主持陕甘省政府工作，接管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及所辖区域的政府机构，将其编入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序列；组建陕甘省支前工作团，迅速开展直罗镇战役的战勤工作，配合红一方面军打败敌人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1935年10月23日，中央红军行进至陕西甘泉县下寺湾时，毛主席派王观澜在路旁守候朱开铨，向他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王观澜强调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在陕甘边区打一场大规模的歼灭战，这是关系反“围剿”战略全局的决定性战役，只有组织和动员陕甘边根据地的全部力量打一个大胜仗，中央红军才能在陕甘边根据地站住脚，这是毛主席第二次派朱开铨在

危急的关头，^①接管负责人被摘掉了的根据地的政权机构，重建领导机关，安置当地干部，指挥地方武装配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进行反“围剿”军事斗争。

1935年10月24日，朱开铨率从中央红军配属的警卫部队，到达陕甘省苏维埃政府驻地寺湾，当地干部王生玉担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时总共只有七八个人，在三孔窑洞里办公与居住，还不如中央苏区一个乡政府的规模，凭这种现状难以承担党中央、毛主席下达给陕甘省的战勤任务。朱开铨向王生玉转达党中央、毛主席的命令，要陕甘省迅速开展直罗镇战役战勤工作，组建支前工作团，首先要保障红一方面军和地方武装一万五千人的每日粮草供应，在15天内筹足一个月的粮草随时调用，还要组织和动员战区群众支前参战，组成向导队、担架队、运输队，转运粮食、弹药和伤员。王生玉面有难色地说：“我原来是硝皮工人，没有做过这些工作。”朱开铨又问：“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哪些同志负责供给红二十六军财粮工作？”王生玉答：“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粮食委员会委员长马锡五同志、财政委员会委员长杨玉亭同志。”朱开铨说：“你要尽快把他们找回来。”王生玉说：“陕甘省成立之后，在我们陕甘边搞肃反抓了一些有‘问题’的干部，还有一些干部到游击队帮助筹粮筹款就联系不上了，现在要找到马锡五和杨玉亭同志很困难，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军令如山，时间紧迫。只有找回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把他们编入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尽快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基础上筹建陕甘省政府，才能迅速组建陕甘省支前工作团，有效地开展直罗镇战役的战勤工作。朱开铨把中央红军带来的警卫队和干部分成小组，除执行勤务的人员外，都到群众中去做宣传工作，宣传党中央、毛主席率中央红军长征已经到达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央红军和红二十六军是一家，已经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党中央、毛主席已经下命令停止乱抓人、乱杀人；宣布撤销陕甘省，成立陕甘省和陕西省；中央红军将和红二十六军并肩作战，保卫陕甘边的土地革命

①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江西省党史资料（第十一辑）》（中央苏区粤赣省赣南省专题）赣出字 88001 号，1989 年 10 月，第 24、197 页。1934 年 6 月，毛泽东派朱开铨任会（县）安（远）工作委员会主任，兼会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独立营政委，曾连续 3 次被敌人袭击，损失惨重的会安工委，有效地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两个团，保障了守卫中央苏区南大门江 22 师的侧翼安全。

胜利成果，打败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主持省政府工作的副主席是中央红军来的朱开铨，欢迎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回来继续工作。有几个中央红军的干部反映，宣传了一个上午，群众还是说“解不下”^①，尽管南北方语言不同，一时没有明显的效果，朱开铨仍然要求大家坚持耐心地做宣传工作。为了尽快找到马福五、杨玉亭等原陕甘边的干部，朱开铨做通了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通信员的思想工作并获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表示愿意带中央红军来的警卫队去寻找原陕甘边区政府的干部。

1935年10月初，在习仲勋的帮助下，罗培兰逃过了被捕被杀的劫难，安全转移到游击队。当年10月底游击队接到群众送来的情报，下寺湾又到了一些红军部队，罗培兰身穿便装到下寺湾查明情况，被原陕甘边区政府的通信员指认出来，为防止出现意外，陕甘省苏维埃政府派出的中央红军警卫队立刻悄悄围住她，采取突然行动下了她的枪。警卫队的干部问：“你是不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你叫什么名字？”罗培兰被警卫队战士架住无法脱身，就大声说：“我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罗培兰，你们要杀就杀。”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通信员马上告诉她，党中央、毛主席率中央红军长征到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下令停止乱抓人、乱杀人，陕甘晋省已经撤销，现在成立了陕甘省，从中央红军派来的朱开铨任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他派省政府警卫队寻找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干部回来继续工作。罗培兰将信将疑地被领回陕甘省苏维埃政府，朱开铨听了警卫队的汇报后立即命令警卫队的战士松手放开罗培兰，朱开铨说：“党中央毛主席授权我负责筹建陕甘省政府，接管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你是中央红军找到的第一个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你要服从领导，听指挥、守纪律。党中央毛主席已经派王首道率中央红军去瓦窑堡解救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干部。现在敌人对陕甘边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已构成葫芦河的东西封锁线和沿洛河的南北封锁线，采取南进北堵、向北压缩的态势，企图将立足未稳的中央红军一举消灭。中央命令陕甘省委、省政府组织支前工作团，全力以赴配合红一方面军进行反围剿。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首先把马福五和杨玉亭同志找回来，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要成建制同中央红军调来的干部合编，组成陕甘省苏维埃政府。”这是罗培兰第一次和朱开铨见面，

^① “解不下”是陕甘边当地方言，指听不懂。

朱开铨的话打消了她的疑虑，她相信这就是习仲勋曾经开会布置要迎接的中央红军，立刻表示先联络马锡五。朱开铨在询问了罗培兰的资历后，根据工作需要，任命地为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科长、支前工作团干事，负责联络、召集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及所属各级组织的人员到陕甘省来工作，同时命令从中央红军来的警卫队派两名干部带一个班协助罗培兰，并要求热情接待归来的同志。罗培兰立即启用陕甘边区紧急联络方式——鸡毛信，马锡五接到信后与杨玉亭很快来到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并陆续联络了一些干部和游击队（独立营）。1935年11月初，在排除了“左”倾教条主义执行者的干扰后，朱开铨代表陕甘省委、省政府提拔重用了一些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任命马锡五为陕甘省国民经济部长、杨玉亭为陕甘省财政部长，并任命了省政府各部及各县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同志，把陕甘边区苏维埃的干部成建制地编入陕甘省苏维埃政府序列，及时稳定了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干部队伍的情绪，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新筹建的陕甘省各级政权机构迅速地投入直罗镇战役的战勤工作。

朱开铨布置陕甘省直罗镇战役支前工作时指出，红一方面军是上万人的大兵团作战，军情瞬息万变，陕甘省预设的供给站点不可能随处都有，根据在中央苏区的战勤工作经验，凡红一方面军在陕甘省战区发生的食宿、饮水、柴草、人工等费用，群众可以凭红军部队出具的欠款白条到陕甘省苏维埃政府设置的兑付点足额领取现金，这样做的好处是不增加群众的负担，只要有群众的地方，红军就能解决后勤供给问题，增加了红军的机动性，保持了轻装灵活打击敌人的优势，加上坚壁清野，只要敌军进入根据地，一找不到向导，二找不到粮食和水源，只有分兵运输后勤辎重，敌人将立即陷入行动迟缓、被动孤立的困境。

1935年11月8日，冒着漫天大雪，朱开铨率领陕甘省支前工作团开赴郿县战区，支前工作团中从中央红军来的干部较少，大部分是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主要是依靠他们帮助与群众的沟通、动员和组织群众，陕甘边根据地的群众就像中央苏区的群众一样积极参战支前。中共陕甘省委委员、省保卫局长郑白兴指挥警卫队和各县地方武装游击队肃清匪特、收集敌情、封锁消息；中共陕甘省委委员、陕甘省少共书记揭俊勋和杨玉亭负责筹集经费及加工储存粮食；马锡五和米裕德负责动员群众坚壁清野、帮助隐蔽红军主力部队、组织向导队、担架队和运输队、转运粮食弹药和伤员。朱开

钱、郑自兴、揭俊勋等陕甘省支前工作团主要领导干部以郿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韩明奎等为向导，到直罗镇附近实地选择安全的转运路线、估算往返路程和所需时间、选择便于主力部队隐蔽的驻地。郿县的石咀、凤凰头、张村驿、东村一带的群众家家户户把红军迎进家门，红一方面军的一万多主力部队就集结隐蔽在群众家里，敌人的飞机连续几天低空侦察始终不能发现蛛网以待的红军主力部队。在寒冷的冬天，红一方面军的部队在战前得到了充分的休整，有效地提高了战斗力。

1935年11月21日至24日，毛主席亲自指挥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实现了将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战略目标。

1935年11月30日，在陕甘省郿县东村召开的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毛主席高度评价了陕甘省委、省政府的支前工作，并将其列为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四个主要原因之一。毛主席在《直罗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报告中指出：“没有群众与我们一致，则隐蔽主力，搬运伤员，供给粮食，都不可能做的这样好。”这是对陕甘省委、省政府支前工作的充分肯定和表彰。历史的事实证明，陕甘省的支前工作确保了直罗镇战役的战勤供给，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下达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干部成建制编入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是成功的，刘志丹、习仲勋培养的陕甘边区干部队伍在直罗镇战役的战勤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他们为党中央、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在陕甘边根据地站住脚做出了宝贵的历史性贡献。

作者：朱开俭同志的子女以及生前秘书。

试谈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廉政建设

况晓东

陇东革命老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根据地之一，也是“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从陕甘边苏区到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老解放区所属各级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南梁苏维埃政府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建立的干部管理教育制度，依法惩贪制度、民主监督制度、精简机构和俸以养廉制度等一套科学的廉政建设制度，使陇东老解放区成为中国人民心目中的一片净土和文明特区。在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认真学习和研究陇东老解放区所属各级政府廉政建设的经验和做法，对新时期党的干部管理、干部教育和党的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作用。

一、干部管理和干部教育是防腐倡廉的根本保证

陇东老根据地所属各级政府始终把加强党对干部的管理和教育，作为防腐倡廉、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保证。他们认真学习贯彻陕甘宁边区政府有关干部管理的规定，并继承发扬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干部管理的经验，规范公职人员的行为和违规后的处罚。

1934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把惩治贪官污吏、树立廉洁政风列为政权建设的头等大事，习仲勋等政府领导带头执行。南梁政府实施的军事政策《暂行条令十八条》规定：“临阵脱逃者处以死刑，破坏枪支

者处以死刑，强奸妇女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 10 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一切缴获要归公。”正是有了这些规定和法令警戒自己的同志，当时陕甘边根据地没有贪污案件发生。对于负责干部要求更为严格，犯了纪律，有了错误，都要施以相应处分。据《习仲勋传》记述：“高尚犯过错误，就曾受到撤职处分。”

1943 年 4 月 25 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5 月 8 日，又公布《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上述行政法规明确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所有干部的登记审查、提拔培养、配备使用、任免调动、考绩奖惩、待遇保健等都由边区民政厅统一管理。同时，对任用干部的标准、对干部的奖励条件和办法、对干部的惩戒和惩戒种类等都有明确规定，规范了公职人员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违规后会受到怎样的处罚。《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还规定：“政务人员应有的品格是，在品行道德上成为模范，为民表率。要知法守法，不滥用职权，不假公济私，不要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陇东老解放区的各分区政府以及县、区、乡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上述规定，使公职人员言有所依，行有所规，起到了极大的预警作用。

在加强干部严格管理的同时，陇东老解放区把干部教育特别是不断净化广大党员、干部的心灵，抵挡升官发财的诱惑，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作为防腐倡廉的一项重要工作。早在 1934 年 10 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和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创办了陕甘边红军干部学校。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又扩展为军政干部学校。学员来自红军、游击队的中、下级干部，也有地方干部。刘志丹任校长，习仲勋任政委，吴岱峰、蔡子伟、马文瑞等同志担任教员，先后开办 3 期，共有 200 多名红军干部和南梁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参加了学习，受到了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1942 年 2 月 28 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决定》指出，在目前条件下，干部教育工作应该是第一位的。“政治方针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按照党中央的批示和边区政府开展对广大党员干部教育精神，陇东根据地所属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广大党员和干部着重抓了以下三方面的教育。

一是革命理想教育。就是教育广大党员和干部要认清革命前途，懂得现在的努力，是为了实现解放全中国这个大目标，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所以，每个共产党员在入党的时候，就决心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将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这就为广大党员和干部指明了奋斗目标 and 前进方向。

二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在国民党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面前，部分党员和干部对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淡忘了，产生了不愿继续过艰苦生活情绪，有的甚至沾染了贪污腐化的不良习气。针对这种情况，边区政府及时要求共产党员在各级政府工作中廉洁奉公、多做工作、少取报酬。坚决克服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大力提倡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特别是1944年9月，毛泽东发表《为人民服务》以后，陇东根据地广大党员和干部，认真学习边区政府对干部的要求和张思德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公仆意识。

三是艰苦奋斗作风教育。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陇东老解放区发扬光大了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土地革命时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干部待遇很低。那时，实行供给制，官兵一致，不分等级，靠打土豪和种公田解决政府和军队供养。边区政府主席习仲勋带头执行政府工作人员供给制度，从吃饭、穿衣到公文草拟所需笔墨纸张等用品，均由财经委员会按每人的最低需要发给，形成以艰苦为荣的良好风尚。1937年，西北办事处会议对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的办公费作了详细的规定。政府办公费每月30元；如系行政专员所在地，办公费可酌量增加，但每月最多不得超过50元；区政府办公费每月3—4元；乡政府经费每月由边区政府津贴6元，办公费在内，乡长不另外支取伙食、鞋袜费。陇东老解放区所属县、区、乡要求“从节约一张纸、一寸布、一滴灯油、一根火柴做起”，“防止浪费腐化习气”。并规定“公私费用必须严格分开，一切私人费用均不能公家出账，禁止办高价酒席”，“坚持廉洁节约的作风，严厉反对贪污腐化现象”。这有效地防止了奢侈浪费现象的发生，使陇东老区各级政府党员、干部自觉把艰苦奋斗、廉洁节约视为自觉行动，身体力行。

二、依法惩贪和民主监督是防腐倡廉的有效方法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陇东老解放区所属各级组织为了防止失去监督的权力产生腐败，认真贯彻执行边区政府一系列惩治腐败和民主监督的法规、法令和要求，坚持依法惩治腐败和民主监督，取得明显效果。

《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试行一段时间后，于1939年正式颁布。《条例》规定：边区所属之机关部队及公营企业之人员、群众组织及社会公益事务团体之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即以贪污论罪：克扣或截留应当发给或缴纳财物者；买卖公物时从中舞弊者；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意图营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违法收募捐税者；伪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勒索敲诈收受贿赂者；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等。并规定了具体惩处标准：贪污数目在10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死刑。贪污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或5年以下有期徒刑。贪污在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上或3年以下有期徒刑。贪污100元以下者，处1年有期徒刑或苦役，并追缴其贪污所得财物。在如此严厉的刑罚下，谁敢以身试法，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这充分表明了陕甘宁边区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

1942年1月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决议，宣布中共西北局提出的《五一施政纲领》为《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该纲领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1943年3月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交代条例》，对各级政府机关政务人员工作变动时前后任如何交接作了详细规定，强调“前后任交代时得由其直接上级派员监交”；“收入之款以票据为凭，支出之款以单据为凭；公共财产及物品，以财产目录、财产增损表及前任交代清册为凭；其他解款、划拨款，以解款批回银行票据以及领款机关签收为凭”；“交代不清逾期三个月者，请边区政府视其情节轻重处分之，如涉及司法范围者，得速请司法机关惩办之”。

陇东老根据地各级组织，除了认真贯彻、严格执行边区政府的规定外，十分重视所属各级政府的建章立制，健全法制，严明法纪工作。他们

依法严肃及时处理违法违纪案件，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其职位多高，功劳多大，都一视同仁。据1947年5月7日《边区群众报》介绍，在解放战争中，陇东专署财政分处副处长梁某，组织上派他给正在作战部队筹集粮草，仓库距部队只有四五十里地，他怕吃苦，擅自放下任务没管。二次派出去后，又在后方闲游了4天，中断了前线部队的供给，影响了战斗。合水县保安科长严某，在敌人进攻时惊慌失措，使若干重要文件丢失。对这两个恶性渎职人员，陇东专署很快呈报边区政府，予以撤职处分。

实行民主监督，是保持权力廉洁的最有效的途径。为了防止政府工作人员以权谋私，贪污腐化，陇东老区所属各级政府廉政建设中，始终把权力置于民主党派、专门机构和人民群众严格的监督之下。

一是依靠民主党派监督。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政策，即在各级参议会常驻委员和各级政府中，“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边区的各级参议会和政府机构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按照这些规定，陇东各县在几次普选中，严格执行“三三制”政策。选举一开始，由于能够和人民同甘共苦，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多是共产党员，共产党的主张、政策和作风也深得民心，加之陇东革命老根据地的特定环境，决定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有着特殊深厚的感情，所以人民在选举各级参议员和政府工作人员时，都极愿意多选共产党员。这样共产党员当选的比例往往超过三分之一的限制。针对这种情况，陇东各县又进行了改选。环县政府原来11名委员中共产党员占8人，改选时谢正和等5名共产党员主动退出，其他各县政权中共产党员超过三分之一的也都纷纷提出辞职。“三三制”的实行，有力地冲击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开创了广泛发扬民主的正确途径，为人民直接监督和管理政权提供了的重要经验。陇东老解放区所属各级政府的共产党员，真诚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和他们一起商量问题，决定问题，并自觉接受党外

人士的监督，使陇东老解放区各级政府的廉政建设受到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监督。

二是专门机关监督。陕甘边苏区时期，南梁苏维埃政府就设立了工农监察委员会，作为行政监察机关，行使检查监督职责。陕甘宁边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对政权的监督体制建设。在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内，政府主席、县长、乡长及其委员，由各级参议会选举。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负责人也由各级政府主要领导人提名，经各级参议会批准。上述各种公务人员在任职期间，如有违法失职行为，参议会可以代表人民将其罢免。各级参议会代表民意，承担着监督政府和行政人员的责任。在陕甘宁边区第三次普选中，人民群众检查政府工作的热情十分高涨。庆阳高迎区六乡，老百姓批评乡政府对减租减息政策执行不彻底；镇原三岔一乡的女选民批评政府对督促妇女放脚工作做得不认真，以至对大脚妇女歧视，等等，乡政府立刻接受这些意见，并很快改正了这些缺点。

三是人民群众的监督。1943年制定的《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规定：“各下级政府或政务人员，如接到人民向上级政府控告的诉状，特别是控告政务人员的诉状，需随时负责转呈上级政府，不得有任何阻难，亦不得置之不理。”《陕甘宁边区政府政务人员公约》也要求政务人员“要善于联系群众，要了解群众情绪，关心群众需要，倾听群众批评”。“要站在群众之中，不要站在群众之上”。1945年9月，边区政府还专门向各级政府发出《各县政府对人民控告干部的案件应及时认真负责处理》的命令，指出：“一部分政府人员同人民的关系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而人民敢于向政府控告，则是好的现象。”命令还规定：“以后凡遇此种控告，不论是由本府交办的或人民直接呈诉的，你们必须认真负责的、实事求是的切实查明，公平处理，切不可敷衍了事，更不可有徇袒政务人员的行为。”可见，边区政府对来自人民的监督是非常重视的。人民是政权的真正主人，陇东所属各级组织认真实施上述规定和命令，加强人民群众监督，使抗日民主政权廉洁高效、充满活力。广大党政军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把陇东老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建设事业，推向一个稳定发展的阶段。

三、俸以养廉和精简机构是廉洁政治的重要措施

俸以养廉和精简机构制度，是陇东老解放区廉洁政治的两项比较重要的举措，有效地保证了陇东老区所属各级政府各个时期政府的高效和干部的廉洁。

土地革命时期，陕甘边南梁苏维埃政府干部和红军待遇很低，实行供给制，官兵一致，不分等级。他们依靠打土豪和种公田解决红军供养。军队每人每天供给小米一斤半，每20人一碗盐，起初衣服、鞋袜自备。到了陕甘宁边区时期，条件仍然十分艰苦，物资极度紧缺。但是，边区政府依然把“俸以养廉”的原则写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一原则的基本精神是，保障一切公务人员及其家属必需的物质生活及文化娱乐生活，厉行廉洁政治。当时，边区政府继承了土地革命时期的光荣传统，对公务人员推行略有差别的供给制，并适当发放必要的津贴。并对每位公务人员按月发放一定数额的保健费，对干部子女实行统一供给抚养和教育的制度。据《华池县志》记载，抗日战争初期，陇东老区所属政府按照《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规定：正、副专员，正、副县长每人津贴为2.5元；区长1.5元，一般工作人员津贴1元至1.5元，勤务员、炊事员为1元。在伙食供给上，除病员、休养员给予适当照顾外，所有公务人员均同等标准。国民党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后，供给即行取消，从1939年起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自给。解放战争中，陇东分区规定的供给标准是：大灶伙食每人每天小米1斤2两，小灶伙食每人每天1斤3两。每人每月猪肉2斤，油1斤2两，盐1斤，菜30斤，柴90斤。干部每人每年单衣、衬衣、棉衣各1套（或土布3丈、2丈5尺、6丈和棉花2斤），鞋2至3双，毛巾一条。家属生活由地方包耕或代耕解决，并根据家庭情况酌发小麦1至2石。1948年陇东专署又规定：机关、学校、团体每人每天供小米1斤，要求节约1两。每月盐1斤，肉半斤，菜15斤，柴60斤。

由于物质匮乏，陇东老区实施的“俸以养廉”制度标准还是比较低的，只能维持政府公务人员最低的生活水平。他们的廉洁奉公，主要还是靠共产主义觉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来支持的，而不是靠俸禄养成的。但是，“俸以养廉”制度毕竟解除了他们生活的后顾之忧。这对政府公务人员的普遍廉洁和防止他们升官发财、钻营禄位、贪污腐化思想的滋生，培养艰苦朴素的

作风，还是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必然滋生腐败。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重要指示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有关规定，陇东各级抗日民主政府于1942年和1943年两次进行精简整编。它的基本要求是，切实整顿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加强基层，提高工作效能，节约人力、物力，促进廉洁政治建设。陇东分区专署在这次精简中将原来的处一律改为科；将原来民政、教育科合并为民教科；财政、经建、粮食科合并为财粮科；保安科改为保安分处。这样，原来包括秘书室在内的7个科室合并缩小为3个科室和一个分处单位。还撤销、合并了运输、卫生、税局等单位。各县政府在精简中将1科、3科并为1科，2科、4科合并为2科，取消秘书室，设政务、事务秘书各1人及事务人员若干人，管理各项具体事务。分区专署原有工作人员44人，经过精简合并后配备干部25人，事务人员6人，精简13人。各县行政机构经过精简后共配备干部112人，事务人员35人，精简64人。华池县级单位精简干部20人；新宁县府编制25人，区级24人，精简干部22人；合水县府编制33人，区级28人，精简13人，其中4名送延安学习，7名调动工作，2人到行政村工作。陇东分区在精简行政机构的同时，对群众团体的专职人员也相应减少。陇东分区工会在原有脱产干部60人中减去40人，并取消区工会主任一职。同时，严格控制领导职数。乡政权，设乡长一人，文书一人；大区公署及边境区，设助理员三人，小区设助理员二人，秘书由助理员兼任，每个区必须配备一个知识分子干部。县政府县长兼自卫军大队长，设政务秘书一名，协助县长处理政务，每县至少配备两名得力的知识分子干部。专员公署作为边区政府代表机关，保留处、科编制外，并加强干部质量。专署设高等分庭，由专员兼任庭长。陇东老解放区所属各级政府经过两次精兵简政，既使上级组织变得精干合理，又使基层政权和生产部门的工作得到加强，不仅战胜了物质困难，减轻了人民群众的负担，而且加强了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改进了工作作风，严明了行政纪律，保持了政府的清廉，形成了勤政效益。

由于陇东老解放区从土地革命时期起，各级党政军组织在不同时期，在建立比较科学、适应各个时期廉政建设制度的基础上，既抓好贪污腐化、严重违法乱纪等大要案的查处惩办工作，又经常性地开展反对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请客送礼、奢侈浪费等腐败现象的斗争，同时，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本

因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发扬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使陇东老革命根据地廉政建设，廉洁政治，清廉作风深入人心，发扬光大。广大党政军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推动了陇东老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使之成为陕甘宁边区乃至全中国最文明进步的地方。

作者：巩晓东，甘肃省庆阳市广播电视台新闻部副主任，记者。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

黄正林

1934年11月，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志丹、习仲勋创建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笔者就自己所见资料对南梁政府的经济社会政策进行论述，以求教于党史研究的专家。

南梁苏区建立后，开始着手新政权各项制度的建立。在经济方面的政策主要包括土地政策，财经、金融政策和商业政策，社会政策方面主要是针对土匪、会道门和革除社会陋习如缠足、赌博、吸食鸦片等。

一、土地政策

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项主要的经济政策。1931年中共中央提出的《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大会土地法草案》规定：“所有封建地主豪绅军阀官僚以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无论自己经营或出租，一概无任何代价的实行没收。被没收的土地，经过苏维埃由贫农与中农实行分配。被没收的旧土地所有者，不得有任何分配土地的权限。雇农，苦力，劳动农民，均不分男女，同样有分配土地权限。老弱残废以及孤寡不能自己劳动，而又没有家属可依靠的人，应由苏维埃政府实行社会救济，或分配土地后另行处理。”^① 根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的土地法草案，

^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第184页。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建立的过程中，就实行分配地主土地给农民的政策。1933年3月15日《陕西省委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要求分配地主的土地给农民：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起来没收一切地主祠堂庙宇及反革命富农的土地，将土地平均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地主绝对不能在任何名义的掩盖之下分得土地；富农只有在他自己耕种的条件下，分得一份劳动土地。土地应该按人口与劳动力的标准来分配。在分配土地时，不仅要考虑雇农和贫农的利益，而且要顾虑中农的利益，只有在基本农民愿意和帮助之下，才能实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一切农民过去的欠债与租税应立即废除。从政策内容来看，这一政策完全符合苏维埃土地法的精神。指示同时要求：二十六军、游击队、农民联合会及党与青年团作最广泛的群众鼓动，动员群众自动起来，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之下分土地，不要成为二十六军的分土地。把香山寺、香山堡、照金、玉泉、八堡、九堡一带豪绅的土地立刻没收来分配，深入反富农斗争。^① 1934年的南梁地区也进行了土地分配的斗争，陕甘边区特委的指示中指出：实行土地革命是我们目前最迫切的任务，除了分配苏区内的土地以外，必须向四周去开展。在各游击区域内群众高涨的地方立即开始分配土地，如五堡川、百宝川、平子原等处。^②

南梁政府正式建立后制定了更为详尽的土地分配方案：（一）没收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二）分川地不分山地；（三）中心地区分土地，边境地区则不分，边境地区因苏区扩大而变成中心区时，仍进行分土地；（四）田、苗一齐分，农民最需要的是苗，若分田不分苗就会降低农民的情绪；（五）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没有牛羊或少地少牛羊的雇农、贫农和中农；（六）阶级划分是依该户的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及其剥削与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的；（七）争取与改造流氓参加生产；（八）红军家属分好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③ 这是南梁政府成立后最基本的土地政策。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关于土地问题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适合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如

① 参见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年1—3月），甲6，内部资料1992年版，第333—334、335页。

②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年4月—1936年），甲7，内部资料1992年版，第388页。

③ 《习仲勋1945年7月11日在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谈陕甘边苏区的创建》，载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409页。

分川地不分山地，原因是南梁地区由于土地集中，地多人少，地主又多住在庆阳城，林镇一带多是韩家的土地，元城一带多是田举人家的，都在庆阳，他们对前原的租子收得紧，后山有时顾不过来。因此，群众有比较宽余的土地，对土地的要求不太迫切。^①又如规定根据地的边缘地区不分土地，等到边缘地区发展成为中心区域时再分土地，这和原来红军打到那里，在政权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就分配土地的做法是有很大区别的。

根据南梁政府的土地政策，苏维埃政权控制的中心区都进行了土地分配。土地分配工作由土地委员会领导，最初担任土地委员长的是张步清。由于他家比较富，对土地革命不热心，刘志丹对习仲勋说：你把土地委员长不换，土地永远分不开。于是贫农出身的李生华担任了土地委员长，苏区的土地分配才得以展开。李生华回忆说：陕甘边最早实行土地分配的是葛园堡。我先后去赤安义正川、甘泉县马家老庄搞土改。^②王生金回忆了当时苏区土地分配的一些情况：我曾任土地委员会委员。当时没有农会，就由贫农团负责领导土地斗争。这里的土地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庆阳恒义成、裕茂隆（皆为高号）所有，再加上当地的地主，几乎所有土地都是地主阶级的。葛园堡张清玉是个破产地主，但也有川地200多亩，山地2000多亩，粮食几十石。在土地斗争中，首先由土地委员会调查掌握和没收地主的全部财产，仍然后再定成分，进行分配。在分配时，首先照顾雇农和佃农，给他们全分的是好地，然后再按成分给其他缺少地的农户分配。这里的土地广，每人可分川地10亩。我家5口人，共分川地50亩，山地约有100多亩。对山地是采取按块的分配方法，谁要多少就给他分多少。对其他财产的分配，也是先照顾雇农佃农。给地主什么也没有分，组织他们进行“打生产”。给红军战士和家属同样分给一份土地，在给白军中当兵的暂时不分地，但留有公地，待他们回来后，再分给地。1935年春，由于这里农户增多，又采取抽多补少的办法进行二次分地。^③这是关于当时根据地如何进行土地分配的一条非常好的材料，把根据地分配土地的过程和方法描述得栩栩如生。它反映了这样

① 参见《李生华1983年7月4日谈苏区的创建》，载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414页。

② 《李生华1983年7月4日谈苏区的创建》，载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413页。

③ 《王生金1958年4月21日谈南梁一带的群众工作、土地改革、经济文化建设》，载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425—426页。

几条信息：（一）根据地比较认真地贯彻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土地政策；（二）土地分配完全照顾了贫苦农民和红军战士及家属的利益；（三）土地分配中执行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如在白军中当兵的人回来后可以分给土地；（四）结合当地土地实际情况进行土地分配。随着根据地的扩大，一些边缘区域变成中心区域，也进行了土地改革，如庆阳县白马区（包括白马庙川、二将川、玉皇庙川、东华池、半道川等地，人口约有四五千人）在1935年冬开始分配土地的，各村召开群众大会，讲清土地政策，评定成分。当时，不给地主分（地），将地主的土地、粮食、牛羊没收，分给了贫雇中农。^①

土地改革后，在南梁政府的领导下，群众积极从事生产，粮食产量有了增加，农民的生活也有了改善。原来这里牲畜很少，几乎没有羊。加之土匪常来抢掠牛羊，有钱的人都将牛羊赶走了，因缺乏牲畜使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土改后分到了牛羊，畜牧业发展了，每村都有了马，有了羊群。当时每套牛可种川山地100亩左右，产粮二三十石。生产发展了，群众生活改善了，南梁一带农户也多起来了。这一带地多人少，横山、靖边迁来的农民很多。如荔园堡原来只有5户，逐渐增加到20余户，大都是根据地建立以后迁来的。^②这些都说明根据地分配土地的政策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是一项富民的政策。

二、财政、金融政策

土地革命时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权的财政来源是什么？这是研究南梁政府经济政策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苏区粮食政策的中心是保证军粮，保证民生，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藏，对群众不动员粮，也不“欢迎”粮。靠收买军粮供给军队。财政、粮食的另外一个主要来源是取之豪绅、地主，并有计划的向敌人夺取。^③根据地财政的主要问题是解决粮食

① 《刘志丹 1935 年 4 月谈苏区创建》，载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 415—416 页。

② 《王生金 1935 年 4 月 21 日谈南梁一带的群众工作、土地改革、经济文化建设》，载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 426 页。

③ 参见《马仲德 1945 年 7 月 11 日在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谈陕甘边苏区的创建》，载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 490 页。

和穿衣的问题，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打土豪、分浮财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之一。另外一个办法是采取“绑票”的办法获得粮食、布匹、财物和金钱，这些事主要由当地的游击队来做。李生华回忆说：为了解决活动经费，游击队有时也出去搞些浮财。把豪绅地主抓来押起来，让他们家属出钱来赎。当时老百姓说话算数，大家说这人名声较好，我们收钱后就把这人放了；大家说那人很坏，我们收钱后把那人也杀了，不杀老百姓不答应。有时候也拉豪绅地主家的小孩，让他们拿钱来赎，马匹、枪支也可以。^①高生荣回忆说：除在苏区进行土地斗争外，赤卫队和游击队还深入白区拉土豪、赶牛羊。当时，在白区拉回的土豪四五十人，统交保卫队管押……保卫队管押的土豪，除少数没有什么劣迹，经群众讨论释放外（如元城子姓高的，赞川李家因乡行较好释放），对绝大多数土豪，在把他们的钱财、牛羊搞来后，都杀掉了。^②这是苏区获得财政支持、保障军需的一个主要财政来源。此外，为了解决红军经费来源，在分配土地时，每个村还留五六亩公地，是最好的，给红军解决经费供给。^③但这在解决红军给养上不占主要地位。

在金融方面，南梁政府禁止国民党钞票在苏区流通，曾先后以“陕甘边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陕甘边农民合作银行”、“陕甘边苏维埃银行”的名义发行货币，称为苏票。关于苏票的种类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有四种，即面值一元、五角、二角和一角，由手工刻板，在白洋布上用桐油刷制而成，流通了大约半年时间。^④一说是三种，另外一说苏票有三种，即五角（紫色）、二角（蓝色）、一角（红色）；^⑤武海潮的回忆也说流通的苏票票面分为1角、2角、5角三种。^⑥

① 《李生华 1983 年 7 月 4 日谈苏区的创建》，载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 413 页。

② 《高生荣 1959 年 4 月 22 日、23 日谈苏区创建》，载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 418 页。

③ 《武海潮 1979 年 6 月 20 日谈苏区的创建》，载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 424 页。

④ 魏武德主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银行编年记事》，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9 页。

⑤ 华池县志编写组：《华池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53 页。

⑥ 《武海潮 1979 年 6 月 20 日谈苏区的创建》，载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 424 页。

三、商业政策

对于中小工商业者，中国共产党采取保护政策，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指出：“苏维埃应保证商业自由，不应干涉经常的商品市场关系。”^①因此，南梁政府采取了比较宽松的商业政策，“允许小商人来苏区做生意并予以保护，荔园堡集市允许白区米的小商贩设摊买卖，所得之苏币可向政府银行兑换银元”^②。为了便利商民交易，南梁政府财政委员会专门设立货币兑换处，^③同时，在荔园堡、白马庙等地建立了集市，如荔园堡的集市每月开市三次，逢一为集，即农历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日。^④苏区集市刚设立时，由于小商贩不了解苏区的商业政策，白区商人来苏区者较少，都是一些过去常来这一带做买卖的商人，或在苏区有熟人关系的商人前来交易。后来就逐渐增多。他们来时，驮的盐、粮（细粮）、布匹等东西，回去时贩卖牛羊、烟土等。敌人企图封锁边境，但封锁不住，脚户还是常到苏区来做生意。^⑤对于根据地商业贸易的状况，王生金回忆说：当时，对从合水西华池一带来苏区做买卖的商人，采取欢迎态度。他们在集市上卖得苏票，可到政府供给处兑成白洋。荔园堡集市成立时，每月3集，逢一（即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逢集日，白区商人运来蓝、白布匹、粉连纸、绿红纸、油墨、食盐等物品，在集市上购买牲畜、土特产，带走大烟和白洋。根据地人民主要是卖熟米、细粮、马料，并卖用蓝布做鞋，每双一块白洋。^⑥集市的建立不仅满足了群众的需要，而且政府和红军所需的必需品也是从集市贸易中换来。慕子伟回忆说：荔园堡在清同治以前曾有过集市，同治年间倒了，这里群众交易很困难。我们在荔园堡设立了集市，群众非常欢迎。集市立起来后，我们和外地商人搞交易，我们用羊只换回我们需要的布匹、油印机。

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上），第184页。

② 华池县志编写组：《华池县志》，第53页。

③ 《刘志丹 1936年4月谈苏区创建》，载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415页。

④ 华池县志编写组：《华池县志》，第53页。

⑤ 《高生第 1936年4月22日、23日谈苏区创建》，载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408页。

⑥ 《王生金 1936年4月21日谈南梁一带的群众工作、土地改革、经济文化建设》，载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426页。

子弹等。^①从这些回忆材料来看,根据地的商业贸易是比较繁荣的,说明根据地商业贸易政策是正确的。

四、社会政策

在苏区建立前,这里是一个土匪出没的地方,基层社会大多由各种会道门控制。南梁政府建立后,不仅消灭了旧政权,而且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些社会问题进行改造。因此,南梁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社会政策,包括:(一)对哥老会采取争取的政策。苏区哥老会人很多,大多讲义气,与红军有过较长时间的交往,对红军有过不少帮助。对其中的反革命分子,要发动群众去清除,不要直接出面干涉。(二)对麻子会、红枪会、硬肚、软扇等会道门组织,则采取争取政策,这里各种会道门在苏区相当多,他们虽然迷信,但都带有反抗统治阶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能改造他们;(三)颁布禁烟、禁赌、放足等条例,并向群众宣传不要赌、不吸烟,好好参加生产;(四)在劳资政策上,最初规定给雇农发单衣、棉衣、手巾等物,侧重于雇农方面,但一些雇农好吃懒做,于是政府规定凡是雇农一定要参加劳动;(五)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寡、残废,均实行救济政策。^②为了打破旧的社会体系,根据地还成立了一些群众组织,如雇农工会、贫农团等。雇农工会由雇农组成,全根据地设总会,各县设分会,村设村会;贫农团在各区设区团,乡设乡团,村设村团。雇农工会和贫农团各级受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③雇农工会和贫农团是根据地乡村社会新建立的群众组织,其成员是根据地政权培养起来的新的乡村社会精英,他们在分配地主土地、组织动员民众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颁布的一系列经济社会政策来看,南梁政府完全是一个代表工农利益的政权。它所颁布的土地政策、商业政策都有利于根据地经济的发展。土地政策的实施,解决了千百年来农民所要求的土地问题,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

① 《李子德 1985 年 5 月 8 日谈苏区发行与集市贸易》,载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 486 页。

② 《习仲勋 1945 年 7 月 11 日在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谈陕甘边苏区的创建》,载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 410—411 页。

③ 《陕甘边红二十六 A 类县——陕甘边区目前的形势》,1935 年 1 月 31 日,载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 275 页。

生产积极性，不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而且有利于根据地的农业发展。保护中小工商业者的利益，促进了根据地商业的发展，便利了群众的生活。社会政策改革了一些社会陋习，使根据地成为一个真正的新社会。

作者：黄正林，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南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经济政策评析

导引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区的党组织、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遭受了长期而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和来自党内“左”右倾错误的干扰，创建了自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以后发展成为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斗争是怎样坚持下来的？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全国各个根据地一样有着共同的发展规律，这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走井冈山的道路。但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具体环境的不同，在斗争实践中形成的自身的经济建设特点和具体经验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经济政策的形成

1932年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三嘉塬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部队没有根据地，只能是不停地转移撤退。陕甘边根据地在初创时期，尚谈不上有系统的经济政策。游击队要立足，在经济上首要解决的是自身的粮秣和经费。关于这个问题，3月6日中共陕西省委关于红军游击队的决议就提到：“应该想各种办法去解决。应该利用鄂豫皖苏区的经

验，发起打豪绅的竞赛，规定奖励办法，没收豪绅地主的粮食财产等。”^① 3月8日，中共陕西省委关于陕西游击战争的行动纲领对游击战争的任务与行动也做了明确指示，“没收豪绅的粮食和财产，分配给贫农、雇农和苦力；宣布一切高利贷无效，焚毁一切奴役和剥削农民的契约；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征收统一的累进律的税收，加重负担于富农身上（或临时征收也照同样原则）……”^② 从中可以看出，在寺村寨时期，经济政策的制定指导思想主要是侧重打土豪分财物，没收土豪的粮食牲畜和其他财物，部分留作军需，其余分给贫苦农民。

4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寨新庄子召开千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议期间，工农兵代表会议召开，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一种观点认为这个革命委员会只有正副主席，再没有什么下设的组织。但多数观点认为革命委员会下设了各个委员会，即土地、肃反、财政、食粮等委员会。杜衡1932年6月2日关于陕甘游击队情况向北方各省代表联席会议的报告称：执行委员会内有土地委员会、肃反委员会、财政委员会、食粮委员会。^③ 从革命政权建立后的活动来看，打土豪、分土地、分财物，这些工作基本上是有顺序进行的，必然有相应的组织机构来负责。同时，陕甘边革命政权属于省级苏维埃政权，已经颁行的《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对这类地方政府的机构设置、各委员会人数都有具体的规定。因此，在革命政权下应有下设机构。后来陕甘游击队撤离寺村寨，土地、肃反、财政、食粮等委员会因失去依托而停止活动。这些机构虽然活动时间短暂，但作为一级组织机构，奠定了以后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经济工作机构的雏形。

1932年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肩负起创造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重任。1933年4月5日，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召开，选举产生了边区新的革命委员会，贫苦农民代表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革委会下设有土地、粮食、肃反等部门，王满堂任土地委员，姬守祥任粮食委员，杨在泉任经济委员，王万亮任肃反委员。为了保卫根据地，红二十六军在薛家寨相继设立红军医

① 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39页。

② 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44、45页。

③ 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第162页。

院、被服厂、修械所、仓库等后勤单位，同时边区领导机关在薛家寨山下建立了集市贸易，解决了红军、游击队就近购买粮食、蔬菜和其他必需物资问题。据时任秀秀沟农会主任的杨玉财后来回忆，薛家寨被称为“红军寨”，为了活跃根据地经济，解决山上红军吃粮问题，边区革委会在亭子沟立集，让周围几十里路内的群众到这里搞交易，卖粮、卖菜，开始规定5天一集，后来只要不打仗，这里天天都有卖粮卖菜的人，边区呈现出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与赤村寨时期的经济政策相比，照全时期的经济政策不再局限于打土豪、分财物，开始涉及游击队后勤补给、与边区群众进行商业贸易等方面，向更广阔的方向发展，这与根据地自身的发展壮大和成熟有很大关系。

1933年10月中旬，薛家寨失守，照全革命根据地丧失，中共陕甘边区特委转移至甘肃陇东一带。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联席会议，确定了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陕甘边区“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的基本格局描绘了新的蓝图。1934年2月25日，中共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小河口四合台主持召开工农兵大会，再次建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斗争蓬勃发展。11月4日至6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轟四堡老爷庙主持召开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根据中华苏维埃选举法，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南梁政府的创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甘革命斗争中的一个历史性转折，它使革命委员会这一临时政权转变为苏维埃政府，陕甘革命斗争由流动的游击区域变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南梁政府成立后，习仲勋当选为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为副主席，蔡子伟、张文华先后为政治秘书长。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文化、工农监察、肃反等委员会，李生华、李钦贤、杨玉亭、呼志禄、蔡子伟、惠子俊、郝文明分别为各委员会委员长。会议还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及《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和法令。这一系列政策法规的通过，标志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经济政策正式形成。

正确的路线与政策，是保证革命胜利的指南。没有正确的路线，便不

会有革命胜利的发展。在党的路线、政策指导下进行的革命根据地建设，体现着党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政策和思想。从现存的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出，陕西省委、陕甘边特委对游击队的活动随时向中央加以汇报，给游击队下达的行动纲领也是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和中央苏维埃法令制订的，如《中共陕西省委关于陕甘游击队情况向中共中央的报告》（1932年3月21日）、《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工作的决议》（1932年6月1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1934年7月）。这些报告、决议贯彻了中共“六大”决议，创建红军、建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打击土豪劣绅、开展土地革命，这是陕甘游击队和革命政权行动的总方针和总纲领。同时也决定了陕甘边区根据地经济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具有鲜明的苏维埃政权的性质。

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经济政策的特点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政权的一次尝试。陕甘边地区长期以来经济落后，广大农民生活极其贫困，边区的工农政权一经成立即采取多种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实行休养生息，同时活跃根据地经济，打破敌人封锁。

习仲勋在回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总结了当时实施的主要政策，其中财经粮食政策方面的主要内容有：“鼓励农民生产，发展农业，增加粮食；成立牧场，养猪放羊；粮食供应是保证军粮和民生的大事，边区政府建立了流动仓库，分散储藏，对群众不动员交粮，也不交‘欢迎’粮，靠收买民粮供给军队；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之于豪绅地主，有计划的向敌人夺取；成立集市，便利交易，在白马庙、荔园堡等地建立了集市，群众大感方便；保护小商人，允许其来苏区做生意；发行苏票，流通金融。”^①

分析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陕甘共产党领导广大工农群众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其制定的经济工作政策，特点主要有：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258页。

1. 借鉴吸收了传统反帝反封建农民斗争建立政权后打土豪、分财物的经济政策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史上传统农民斗争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当属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在经济上实行一种公有共享制度即圣库制度。^①太平天国圣库的物资来源很重要的两个方面是：打败清军或攻克城镇缴获的战利品；各处城乡人民的贡献和对富户派大捐。打先锋所得的财物。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从初始的寺村寨时期，打土豪分财物，没收土豪的粮、牲畜和其他财物，发展到南梁时期虽然在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已经进行了土地分配工作，但在边沿区域仍然执行的是打土豪、分财物的政策。如1934年6月，庆阳游击队没收紫坊畔塔儿掌土豪胡克申家粮食500石，牛100多头，羊2000余只，银圆1000枚，大部分给了贫苦农民。传统农民斗争对陕甘边革命有深刻影响，打土豪、分财物一直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财政的一项重要来源。

2. 把农业生产放在苏区经济建设的第一位

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大国。在苏区，大部分居民是农民，其经济实际上主要是农业经济。只有农业生产发展了，才能解决苏区军民的吃、穿问题，才能增加农民的收入，才能有更多的农副产品用于交换，解决苏区急需的紧缺物资；也只有首先发展农业生产，才能更好地坚持长期的革命战争，并为开展苏区的各项建设，改善群众生活，巩固工农联盟和红色政权提供可靠的物质基础。据张文华^②回忆，“当时在南梁根据地初步进行土地分配的基础上，边区政府还注意了苏区的生产发展问题。我们结合毛泽东在全国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就如何组织农民搞好生产，解决群众生产和生活中的困难等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

为了建立革命战争可靠的物质基础，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采取一系列具体的行之有效的措施发展农业生产，不仅保证了革命根据地军民生活的需要，而且为巩固革命根据地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其一是奖励农耕，发展生

① 圣库即公库、国库。太平天国以一切财物为上帝所赐，初时又规定地上帝得称圣，故称公库为圣库，亦称公库制度。

② 陕西渭南人，曾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建国后在陕西师范大学从事教育工作。

产。党政军开支取之于地主豪绅和向敌人夺权，不足部分按价向农民购买，余即分配给贫苦农民，对农民免征粮食。其二是经营红军公田。在土地分配中适当留出一部分土地作为“红军公田”，由村苏维埃政府经营，其收获一部分用于救济红军家属、孤寡残疾人，一部分用于过往地红军游击队零散人员。其三是兴办机关农牧场、合作社，喂猪养牛，发展农副业生产。把打土豪没收的牛羊适当留出一部分，组织专人集中放养，解决了根据地耕牛不足的问题。耕牛主要为贫苦农民耕田，羊只主要供作军用。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否建立“牛群站”的问题，“刘志丹等同志认为，南梁地区地广人稀，居住分散，建立‘牛群站’对于群众生产和生活多有不便。所以，这种形式实际上无助于解决群众耕作方面的困难。另外，边区政府还就‘苏区的经济建设’和创办合作社等问题形成过专门的决议。”^①

3. 重视商品经济的发展，有计划地组织根据地人民进行对外贸易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社会经济，农业和手工业占绝对优势。在工业生产方面，虽然照金时期红二十六军在薛家寨建立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仓库等后勤单位，但敌人占据中心城市，控制着大量的工业生产，对革命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切断了根据地的农副产品同白色区域的工业品的交换，造成根据地日用工业品缺乏，农副产品滞销。因此，有计划的组织根据地对外贸易显得尤为重要。陕甘边根据地的对外贸易，实际上是以货换货，以物换物。

为了解决部队、机关的供给和群众生产、生活上的困难，边区政府决定在苏区范围内恢复集市，发行货币——“苏币”（群众称为苏票或油布币），禁止国民党的货币在苏区流行。苏币以木板刻好，印在白布上，涂以桐油，总共发行3000元，票面值分1元、5角、2角、1角4种，与银圆等值。为了维持苏币的信用，边区政府设立了现洋兑换处，各地商人及农民群众可以随时兑换。照金时期在薛家寨山下亭子沟设立集市，主要是为红军收购粮食和其他生活日用品。南梁时期在荔园堡设立集市，每月阴历初一、十一、二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489页。

十一为集日。每逢集日，荔园堡方圆数十里的群众纷纷前来赶集，商品交易很活跃，物资供应也很充足。对白区的商人，苏维埃政府采取争取、欢迎和保护的政策，鼓励他们来苏区做生意。白区商人运来蓝布匹、白布匹、粉连纸、绿红纸、油墨、盐等，运走牲口、烟土和大洋。根据地人民主要是卖熟米、细粮、马料，并实用蓝布做的鞋，每双可卖1块大洋。通过往来，一些白区商人也开始同情以至倾向革命，千方百计给苏区输送货物。据估计，活动于陕甘边界及南梁地区的外地商人约500多人。^①随着集市贸易的发展和金融流通的革命，南梁山区的经济逐日繁荣起来。南梁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根据地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南梁的人口由根据地创建前的600多户2400余人，很快增加到1000多户6000余人。

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经济政策的历史作用

总体来看，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经济政策的特点是随着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发展显示出来的。这些特点体现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形成的经济政策及其实践在整个中国经济政策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

1.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实行的经济政策，是陕甘边领导人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尤其是在与中共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对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进行的初步探索，显示出社会主义本质的萌芽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制定的经济政策是为着建设和巩固红色政权开展起来的。在艰难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领导集体，他们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陕甘边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紧紧依靠群众，坚决同“左”倾错误做斗争，在远离中共中央及至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立足实际，独立解决陕甘边区经济建设的重大问题，制定和实施适合陕甘边区实际的正确方针和政策。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土地委员会、财政委员会、粮食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范围内统一领导经济工作的开始；《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及《粮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481页。

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和法令的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经济政策的初步形成；其实践与经验教训，为中国共产党成功地领导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乃至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经济政策截然不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经济政策一切为了人民，体现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走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萌芽。在分配制度上，边区政府工作人员实行供给制。政府的所有工作人员不论高低，一律实行供给制度，从吃饭穿衣到办公所需笔墨纸张一切用品都由财经委员会统一计划，统一筹办，按每个人的最低需要发给，如衣服，冬来发棉，夏来换单。没有什么特权思想和特殊化表现，形成一种艰苦为荣的风尚。

2.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工作，走陕甘边特色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有力配合了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

刘志丹认为，在战争年代如果不重视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没有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就得不到改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作为根据地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互为条件，互为依托，它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与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相互配套开展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正是立足陕甘实际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和成功实践，其基本思想就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的紧密结合。(1) 武装斗争是土地革命和经济建设的支柱，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心环节。离开武装斗争，土地革命与经济建设就不能有效地进行。(2) 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能广泛发动群众，取得革命战争所必需的战略物力资源，武装斗争就会失败，根据地就会丢失，也就谈不上进行经济建设。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经济建设就失去了群众基础，不能巩固和发展。(3) 没有经济建设，根据地得不到巩固，武装斗争就会失去依托，就会变成黄巢、李白成式的流寇主义，不可能长期存在，土地革命的成果就得不到保障。在相对稳定的革命根据地，只有发展生产、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才能巩固政权、稳定人心。经济工作做不好，必然导致政治和军事上的失败。陕甘边根据地抓住农业这一最主要环节，把握贸易金融财政这一重点

环节，使根据地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军民生活有了改善，有力配合了根据地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工作的开展。

3.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经济制度的创立及其实践中形成的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是今天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同时，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打土豪、分财物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经济制度，并进行了大胆的实践，付出了艰辛甚至生命。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之所以能够创建并保存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陕甘边区的党和干部能够坚持革命、不畏艰难、敢于创新。这种精神源于“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激励和鞭策着以后的共产党员一代接一代为着人民根本利益兢兢业业地战斗着，尽职尽责，无私奉献。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经济政策的创立与实践过程中，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经济建设规律性的认识不足，加上“左”倾错误的影响，有的法规和规章在创立初期，程度不同地带有了“左”的色彩，使苏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寺村寨时期，五顷塬土改时，地主不得分地，富农只分给一份“劳动的份地”，在南梁时期这些得到了部分纠正，地主家庭参加劳动的成员，分配给维持其生活的土地和财产。可以看出，这些不足，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初创时期难以完全避免的，是发展中的问题，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经济政策及其实践的主流是应该肯定的。这是在研究和评价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经济政策时应当采取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陕甘革命根据地虽然创建时间晚于其他根据地，偏于中国西北一角，却是全国革命处于低潮，在最黑暗的时期，远离党中央以至失去联系的情况下，西北地区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从当时西北的实际出发，坚持工农武装割据的硕果。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加强了根据地的经济、军事、文化建设，大大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使它以全新的姿态雄踞在国民党重兵把守下的陇东，成为党所领导的全国红色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戴引兄，女，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审处副主任科员。

陕甘边根据地货币考

姚杰

近年，笔者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陕甘边根据地发行的几种货币进行研究考证，发现馆内藏有陕甘边根据地尚存空缺币种（如陕甘边区南梁油布币、陕甘省苏维埃银行贰角银币券），同时也发现一些原史料、书籍、回忆文字记载中的问题。由于现存史料有限，本文只对陕甘边苏区发行的几种货币及相关问题，结合馆藏试做初步探讨与梳理，仅为管窥之见，望专家、学者赐教。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前身——陕甘革命根据地，是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组成。其中陕甘边根据地曾发行陕甘边区南梁油布币、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布币）、陕甘省苏维埃银行银币券（纸、布币两种）和铜币券等货币。

一、陕甘边区南梁油布币

陕甘边根据地建立前，南梁地区地广人稀，农田荒芜。1932—1934年间，在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下，红军先后开辟了陕甘边和陕北苏区。1934年2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现属甘肃省华池县）四合台村成立，习仲勋任主席，杨玉亭为财政委员会委员长，蔡子伟为文化委员会委员长。此时，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是年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

陕甘边区南梁油布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发行最早的苏区货币。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为了巩固根据地，活跃边区金融，促进贸易往来，发展经济，便利群众生活，恢复了因回汉民族矛盾停止了几十年的嘉园堡集市，与此同时，为了抵御通货膨胀的国民党钞票，以及银圆和实物不便携带，加之缺少小额辅币给苏区贸易流通带来的困难，刘志丹和财政委员会的同志决定禁止国民党钞票在苏区流通，印刷发行我们自己的货币。^①

陕甘边区当时的物质条件很差，缺少印制钞票的设备和纸张，负责印制货币的人员就因地制宜，用布代替纸张，在白布上印好图案后，怕掉色，就用热（桐）油处理。终于印制出根据地自己的货币。印制厂设在南梁的油坊沟，只有三名工人……完全靠手工刻板，手工印刷。^②（经与馆内专门从事印刷工作的专家看票后，确认我馆收藏的3枚油布币均为石印，非原记载的木刻、油印。）

油布币为银圆兑换券，规定每十角兑换大洋一元，票面分为一角（红色）、二角（蓝色）、伍角（紫色）、一圆四种。^③（伍角、壹圆币尚未见实物）发行货币的准备金是靠打土豪和没收地主浮财等方式筹集的。苏区内一律使用这种票币。由于老百姓的赞成和拥护，油布币“在苏区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信誉，币值较为稳定”。南梁油布币为根据地货币中非常罕见的珍品，具有很高的研究及史料价值。

1. 油布币概况

国家博物馆藏有壹角油布币2枚、贰角油布币1枚（原皆定名为普通布币），均为横式，毛边手工剪裁，仅正面印有图案。贰角和壹角币，票面图案相同，只是颜色不同，版别略有差异。图案设计简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① 林振荣、杨波：《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集市贸易与“南梁油布币”》，载中国钱币学会革命根据地货币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延安）论文集。

② 林振荣、杨波：《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集市贸易与“南梁油布币”》，载中国钱币学会革命根据地货币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延安）论文集。

③ 林振荣、杨波：《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集市贸易与“南梁油布币”》，载中国钱币学会革命根据地货币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延安）论文集。

油布币上端框内有右读横书“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口号；中间框内为三颗五角星组成的主体图案，中间五角星稍大，星内有镰刀斧头图案，两侧五角星略小，内有红或黑色水油盖印的竖读票面值“贰角”、“壹角”等字样，两小五角星上方，分别有该票的印发时间和编号，其中表示月、日和编号的阿拉伯数字为黑色毛笔手写；两小五角星下方，各有一小方形黑色印章，印文均为“经理之印”；左右两侧框内分别印有竖书“提高工农生活”、“随时兑换现金”字样；下边框内印有“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发行”字样。

贰角币纵 6.8 厘米、横 14.3 厘米，6 位编号“第 099866 号”，票面图案与文字为深蓝色；壹角币纵 6.9 厘米、横 14 厘米，5 位编号“第 03459 号”；另一张壹角币纵 6.7 厘米、横 14.6 厘米，编号“第 09816 号”，均为红色油墨印制。其中壹角币，可见在大五角星上盖有三行竖读 12 字黑色方形印章，印文有些字迹因褪色模糊，已很难分辨；经与馆内从事文献、文字专家辨认，印文前 5 个字为“财政委员会”，最后两字为“之印”，其余 5 个字经反复推敲辨认，似为“货币发行处”等字。背面盖有一大方形黑色印章，印文严重褪色，已分辨不清。

笔者在研究、考证过程中发现，在有关的书籍、文章中，对油布币的发行与停止使用时间、流通地区、印制方法、色彩、用布的质地以及票面上盖印的印文等多方面的论述均存在一些问题。例如：

(1) 无面值油布币。《中国钱币大辞典》图一说明为“陕甘边区南梁油布币 1934 年无面值半成品券”，与票面情况不符。该票为我馆藏币，面值贰角，只是脱色严重，不易辨认。另从它的磨损、脱色程度等多方面分析，应为正式发行与使用过的油布币。

(2) 油布币票面印文。据《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货币史》，油布币“背面无图案，在正中盖陕甘边区银行大印，两边竖写票面值，票面值下面各盖正副银行行长印章”。据《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集市贸易与“南梁油布币”》一文，油布币“上盖陕甘边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之印，印鉴是蓝色的”。而上述馆藏三枚油布币票面两小五角星下方，小方形黑色印章的印文均为“经理之印”，而非“正副银行行长印章”。馆藏票大五角星上盖的三行竖读 12 字方形印章的印文，既非上述所云“陕甘边区银行”，也不是“陕甘边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之印”，且印鉴为黑色，而不是蓝色。

(3) 关于油布币所用布的质地。一些书籍及文章认为南梁油布币是用白粗布印制。如林振荣、杨波撰写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集市贸易与“南梁油布币”》一文：“这种白粗布质地的货币，虽制作粗糙，流通时间短，鲜为人知”。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一书：“有三名工人用粗老白布代替纸张，印制出了质地硬脆，形同油布的陕甘边区银行货币”。经看票后得之，我馆收藏的3枚油布币所用的布质为过去俗称的白细洋布，而不是当地生产的粗老白布。

(4) 关于油布币的颜色。首先，《中国钱币大辞典》中，金诚先生介绍图一，无面值油布币即贰角油布币的颜色为黑色；《中国近代纸币史》一书认为：“该油布币的版式是：黑色印刷，长方形券框”。但从上述介绍我馆收藏油布币中可以得知，壹角油布币为红色，贰角油布币为深蓝色油墨印刷。因此，《中国近代纸币史》一书，笼统地将各种面值的油布币均认定为黑色印刷是不正确的。其次，《中国钱币大辞典》一书，认为无面值、半成品油布币，即贰角币为黑色印刷也是不对的。林振荣、杨波撰文，“票面分为一角（红色）、二角（蓝色）……”这与我馆收藏的壹角、贰角油布币颜色相吻合。再有，《中国钱币大辞典》中，描述“壹角券：红黑色套印”也是不对的。壹角油布币的票面图案及文字只用单一颜色，即红色油墨印制，其中黑色的阿拉伯数字为人工毛笔手写，中间的方印及壹角面值均为黑色水油盖印，并不是与其它图案同时套印。

2. 关于油布币的流通地区与发行停止使用时间的考证

笔者考证过程中发现，有关的书籍、文章，均认为南梁油布币的发行和流通使用时间很短，且多数认为，油布币仅限于陕甘苏区的南梁地区流通使用，其发行和停止流通的时间也有不同说法，例如：

(1) 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魏协武主编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银行编年纪事》一书指出：“1935年1月，陕、甘、宁、晋4省军阀进犯南梁根据地，4月上旬，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迁至洛河川的下寺湾，油布币即停止（发行——引者注），前后流通约半年左右”。

(2)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一书指出：“1934年2月，陕甘边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发行货币，……油布币在1934年发行流通约有半年时

间”，1934年11月1日至7日，“陕甘边区召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随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壮大，原发行的‘油布票’已不能满足边区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决定设立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发行‘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简称‘农民券’，同时停止‘油布票’的发行”。

(3)《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货币史》附录蔡子伟的《南梁根据地革命斗争片段回忆》指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了活跃经济，我们在分配土地和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恢复了集市贸易。……废除了伪币，印制发行了陕甘边区自己的货币。^①

(4)林振荣、杨波撰文指出：“边区革命委员会——在经济建设方面，为了活跃边区的经济，促进贸易事业的发展，在南梁东沟成立了陕甘边区银行。……印刷发行我们自己的货币”。“这种白粗布质地的货币，虽制作粗糙，流通时间短，鲜为人知”。

陕甘边区南梁油布币是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发行的，我馆收藏的三枚油布币上的印发单位也证明了这一点。由此，首先可以推论：南梁油布币开始发行的时间上限应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即1934年的2月25日之后。

其次，从各革命根据地发行货币所标明印发单位的规律分析，通常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府之后，发行的货币一般均标明“某某苏维埃银行”或“某某苏维埃政府”发行，陕甘边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府之后发行的货币就是很好的例证。

例如：上述所引《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一书指出的：“1934年11月，陕甘边区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原发行的‘油布票’已不能满足边区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决定设立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发行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1935年4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撤离南梁地区，迁至陕西甘泉下寺湾，并停止发行‘农民券’，开始印发‘陕甘省苏维埃银行’的‘银币券’和‘铜币券’”。

引文中提到的两银行的行名与货币上标明的印发单位，均与其他革命根

^① 蔡子伟，《南梁根据地革命斗争片段回忆》，载《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第250页。

据地发行货币时所标明印发单位的规律相吻合。所以，南梁油布币开始发行的时间下限，最迟不会晚于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即应在1934年11月7日之前。因此，我们可以推论：蔡子伟回忆中“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后，印制发行了陕甘边区自己的货币”的说法应该是不准确的。

再有，上述馆藏第1枚壹角油布币的印发时间为1934年11月7日，与贰角油布币的印发时间相同，其编号分别为“第03459号”和“第059866号”；第2枚壹角油布币的印发时间为1935年8月1日，编号为“第09816号”。从馆藏3枚油布币的印发时间和编号上分析，南梁油布币停止发行使用的时间不会早于1935年8月1日。

经过多方面分析，笔者认为：

(1) 当时油布币的发行是根据陕甘苏区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在不同时间、分批印发流通使用的，而且，特别是在重大的纪念日，印发一定数量的油布币以示纪念。已知至少为两次，即：上述两枚壹角油布币的印发时间“11月7日”是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它同时也是召开庆祝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的纪念日，还有“8月1日”是建军节。

(2) 油布币流通范围不仅仅在陕甘苏区的南梁地区，它应该在陕甘苏区的其他一些地区也流通使用过。因为1935年4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已经撤离南梁地区，迁至陕西甘泉下寺湾，而我馆收藏的第2枚壹角油布币的印发时间为1935年8月1日，说明此时油布币在南梁以外的一些地区仍在继续流通使用。

(3) 从馆藏第2枚壹角油布币的印发时间，油布币在苏区人民群众中信誉好，币值稳定，加之当时受多种客观物质条件的制约，此后发行的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和陕甘省苏维埃银行的银币券和铜币券的发行量也不大等多方面推论：在一段时间内，油布币是与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以及陕甘省苏维埃银行的银币券和铜币券相互补充、同时流通使用的。故上述“发行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同时停止油布票发行”和“1935年4月上旬油布币即停止发行”的说法，以及油布币发行时间极短、发行量甚少，流通范围仅限于陕甘苏区的南梁地区等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4) 从上述油布币发行时间的考证结论中，我们还可以推论，当时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未建立陕甘边区银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一书也认为，“实际上未设立银行，只设立了4家货币兑换所”。因为，依照根

根据地发行货币所标明印发单位的规律，如果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已经建立了陕甘边区银行，油布币上就应印有“陕甘边区银行”字样，而不该在油布币下框内出现“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发行”字样。故林振荣、杨波文中“在南梁东沟成立了陕甘边区银行”，“印刷发行我们自己的货币”的说法也是不准确的。

3. 油布币存世量

根据笔者调查、考证，相关书刊登录的油布币图录，均为国家博物馆藏油布币。因此，目前油布币实物仅见我馆独家收藏3枚，其中贰角币1枚，壹角币2枚。

南梁油布币是陕甘革命根据地发行最早的苏区货币，因此油布币的发现，不仅改写了原陕甘革命根据地最早发行的苏区货币为1935年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发行的布币的历史，而且丰富了苏区货币的种类，为研究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及苏区货币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二、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

1934年11月7日，陕甘边特委和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原发行的油布币已不能满足边区经济发展的需要，边区政府便决定在华池县南梁建立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杨玉亭为负责人，发行了陕甘边区第2种货币——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

国家博物馆藏有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贰角兑换券2枚，其图案相同，版别稍有不同。《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和《中国钱币大辞典》刊图，均为馆藏币，馆藏另一枚币未见书刊登录。再有，《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刊登了一枚由吴筹中先生提供的贰角兑换券，上述3枚兑换券皆同图不同版。

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发行的兑换券，现仅见贰角面额券，其存世量以及相关的文字资料极少。该币为竖式，布质、石印，单面图案。

馆藏2枚均为蓝色，一枚略浅，纵13.2厘米，横7.5厘米，中间镰刀斧头图案内，有花枝纹环环绕的“贰角”面值；上端印有右书“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和“每十角兑换大洋壹圆”字样；下端有“苏区一律

通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年制”字样（即1935年）；四角花纹框内，皆为斜书“2”字。另一枚纵13.1厘米，横8.8厘米，中间盖有印文为“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之印”的红色方印；其上有券的红色编号，现可辨认后4位数为“2642”，其前似有1或2位已磨损失色的痕迹；下端左右两侧各有一红色小方印，印文同为“总经理印”。

关于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停止发行的时间，目前口径不一，尚未定论。现见两种说法。《中国钱币大辞典》记述：1935年4月后，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改称陕甘省苏维埃银行，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停止发行。^①另《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一书指出：“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后，因统一使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苏维埃纸币，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兑换券即停止发行”^②。现因缺少更具说服力的史实，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史料发掘与补充。但笔者依据上述油布币的印发时间及考证的推论，在目前这两种说法中，较为倾向于后者。

还应指出的一点，《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等书中记述的“兑换券是布质的，用蜡纸版油印之后，涂上桐油漆面晾干而成”的说法欠妥，该券应为石印，且未涂桐油漆面，非油布币。

三、陕甘省苏维埃银行发行的货币

1935年4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迁至陕西甘泉下寺湾后，将陕甘边区农民合作银行改称为陕甘省苏维埃银行，负责人仍为杨玉亭。该行发行了银币券和铜币券。现收集到的银币券有一角、五角、一元三种和布质的一元一种；铜币券有二十枚一种。^③

国家博物馆的账册及分类编排的文物卡片中，原只见藏有陕甘省苏维埃银行发行的壹元面值银币券5枚（其中1枚为布质），后笔者在研究陕甘边根据地货币时，发现其中有两枚为壹角和贰角面值的银币券。贰角券的发现，令笔者喜出望外，因贰角券乃目前尚未见文字记载与实物发现的空缺

① 《中国钱币大辞典·革命根据地编》，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2页。

②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革命根据地货币》，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第154页。

③ 《中国钱币大辞典·革命根据地编》，第152、153页。

币种。

再有，由馆藏贰角银币券的发现可知，银币券发行的种类是4种而不是原来所说的3种。

陕甘省苏维埃银行发行的货币特征为：

1. 银币券

银币券均为横式，石印，设计简朴，其形式与风格基本相同，馆藏币均为6位编号。壹角券与贰角券票面图案相同，均为纸质，蓝色。壹角券纵7.4厘米，横11.5厘米，贰角券纵7.4厘米，横11.6厘米，颜色比壹角券略浅，因磨损、褪色严重，有些图案已分辨不清。

正面：小“工农”字样和“镰刀斧头”图案及装饰花纹组成底纹及边框图案；票面上端印有右读横书“陕甘省苏维埃银行”行名；行名下左右两侧均有由红色水油盖印的6位数编号戳印，壹角编号为“023829”，贰角券编号为“035877”；中间为一个有横线的大双边圆圈，圈内有由斜线纹组成的镰刀斧头图案，其圆圈内下部，印有横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年印刷”字样；圆圈两侧纵形花纹框内，分别有面额“壹（或贰）”、“角”字样；“壹（贰）”、“角”字下，均有一小方形红色篆字“总经理印”章；票的四角花纹框内为斜书“壹（贰）”字样；

背面：中间为镰刀斧头图案（贰角券基本褪色），其上盖有一方形红色印章，该章中间为地球图案，印文为竖读3行“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两侧纵形花纹框内，分别有阿拉伯数字“10（或20）”；票的四角花纹框内为斜书阿拉伯数字“1（或2）”；四周边框内，小“工农”字样为底纹；边框外四周，有似羽毛图形的装饰性图案。

五角券与壹角、贰角券图案大致相同，只是正面银行名称书写呈弧形，面值外的花纹框变为五角星，再下端增加一行“凭票即付”字样。关于五角券的颜色，因馆藏无五角券，现所见书刊也未见记载，需进一步核实。

壹元券纸质与布质币图案相同，仅颜色不同。馆藏布币蓝色，纵8厘米，横14.8厘米，编号“010247”；2枚纸币分别为红色、纵8.1厘米，横14.8厘米，编号“009633”和黑色、纵8.1厘米，横15厘米，编号“018949”；其主要图案及布局与壹角、五角等面值券相似，而上述币背面

边框外四周似羽毛图形的装饰性图案，布币为正面图案。再有，印文为竖读5行“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印章，纸币皆盖印在背面，唯有布币盖印在正面。

2. 铜币券

陕甘省苏维埃银行发行的铜币券目前仅见贰拾枚1种，亦为横式，设计风格、票幅与银币券相似，其背面四角的阿拉伯数字“2”，上端两角为正书，下端两角为倒书，而银币券皆为斜书。

馆藏上述货币，除1枚农民合作银行贰角兑换券为黄克诚收藏、捐赠外，其他均由林伯渠收藏，后由其夫人朱明捐赠我馆收藏。因其货币流通范围小，发行量有限，时又处敌我斗争异常尖锐激烈的战争环境，货币留存下来的可能性极小，故均极为珍稀。

陕甘边根据地先后发行的四种货币，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促进了苏区集市贸易及苏区与白区间的物资交流，为活跃、繁荣根据地经济，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支援革命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不是林伯渠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宁可舍弃自己的衣物，精心保存下来包括这几件鲜为人知、极其罕见的油布币等在内的几十件苏区、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发行的各种质地的货币，那么，我们今天就很难亲眼目睹并且知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曾经发行和使用过非常古朴且又极具时代与地方特色的边区货币。

作者：姚杰，女，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的经验教训及现实启示

刘秉政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认为：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群众才是真正的革命动力。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①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巩固与发展过程中，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具有显著特色的群众工作模式和经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的成功经验和深刻教训，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宝贵财富，对当前和今后党的群众工作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的成功经验

1. 保障群众的切身利益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成功的前提

保障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闹革命的根本目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8页。

陕甘边革命斗争时期，党领导革命武装开展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斗争，是为了不断地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和生产生活的权利。

(1) 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甘肃华池南梁荔园堡召开，选举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并产生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土地、劳动、粮食、财政、工农监察、文化和妇女等委员会委员长。同时还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部。随后，各县陆续建立革命政权。南梁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是党在陕甘边进行民主政治的有益尝试。苏维埃政权给予一切过去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人民群众从民主制度中首次表达自主的意愿，首次掌握自己的政治命运，首次成为自己的主人。同时，苏维埃各级政府实施工农兵代表会议制度，吸收工农群众参加并管理自己的政权，极大地增强了陕甘边区人民的民主意识，促进了各级政策法规的贯彻执行，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获得新生的人民群众热爱自己的政权，积极保卫自己的政权，陕甘边区根据地由此得到迅速发展。到1934年底，根据地发展到包括淳化、耀县、中部、宜君、旬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保安、安塞、靖边、富县、甘泉等18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约达2.3万平方公里。

(2) 保障群众享有基本生产资料的权利。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回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有关革命、农民和土地问题的提问时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①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开展土地革命，铲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是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在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前，刘志丹等就开始领导以打土豪、分浮财、废除地主债权等为内容的土地革命斗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随即按照中央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和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决议案》的精神，并结合陕甘边区的具体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土地革命的政策、法令，开展土地改革，解决和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在分配土地的过程中，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依据农户经济状况，划分了阶级成分。陕甘边区的土地革命的开展，消灭了千百年来存在的

^① 埃德加·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中国学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47页。

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极大地调动了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积极性，为扩大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奠定了可靠的群众基础。

(3) 保障群众享有基本生活资料的权利。陕甘边区的党组织和政府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同时，还十分注意关心群众日常生活中的疾苦，切实解决群众的衣食住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边区政府成立后，部队和政府机关的经费相当困难，人民群众负担比较重。为渡过难关，陕甘边特委、政府和军委的工作人员，一律实行供给制，干部战士一律平等。为了减轻群众负担，政府在向敌人夺取的同时，号召党政军机关经营红军公田、兴办小牧场、种粮种菜、养猪养羊，补充红军和机关所需。打土豪或缴获敌人的财物，除留给政府一部分外，其余全部分配给贫苦农民。

为了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发展根据地经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制定了商业、金融、贸易、财政、粮食等方面的法令和政策，并在荔园堡设立集市，为当地农民提供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市场。为活跃集市贸易，对白区商人采取争取和保护其利益的政策，把根据地的羊只和山货廉价卖给他们，鼓励他们把苏区缺少的布匹和其他货物想方设法运到根据地来。边区政府还发行了“苏币”，禁止国民党的钞票在苏区流通。

边区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经常组织干部识字、学习文化知识。在荔园堡办起了陕甘边区第一所学校——列宁小学。同时在一些村庄办起了成人扫盲识字班。创办了红军干部学校，先后培养部队和地方干部 200 余人。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还分别创办《布尔什维克的生活》、《红色西北》刊物，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人民。南梁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根据地成了人们向往的地方。南梁地区的人口由根据地创建前的 600 多户 2400 余人，很快增加到 1000 多户 6000 余人。

2. 凝聚群众的革命力量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成功的基础

俗话说：一根筷子易断，一把筷子难折。只有把群众组织起来，才能形成万众一心的强大力量。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就非常重视党的基层

组织和各类革命群众组织的建立健全，先后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共青团、工会、妇女会以及由各级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指挥的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这些革命群众组织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宣传、动员和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积极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积极支援前线、踊跃参军参战，有力支持和配合了政府、部队的工作。

为巩固根据地，加强对敌军事斗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了各种战斗员条例和一系列的军事政策，内容包括：在扩大红军活动中，实行自愿兵役制度；在赤卫队、少先队的基礎上广泛成立游击小组；成立民间游击哨，帮助红军做情报工作。群众参加游击队经过战斗锻炼和军事训练后，编入红军主力部队；红军、游击队、赤卫军的武器弹药主要靠向敌人夺取，并收缴豪绅地主的武器，收缴到的武器归收缴者使用；鼓励群众购买武器，买到新武器给予特别奖励。对阵亡的红军、赤卫军、少先队战士均发给埋葬费，对其家属实行抚恤政策。这些法令和政策实行后，收到了显著的功效，根据地人民立即掀起了“扩红”运动，红色武装力量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和扩大，红军的战斗力得到提高。对于陕甘边区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工作成效和影响力，当时，著名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通过在西北的实地采访，作了如下生动的描述：根据地人民“当然赞成刘志丹之组织，使民众更不得不为之用。更经数年来赤化教育之结果，民众心中只知有苏维埃、瑞金、莫斯科、列宁、斯大林等，而不知有西安、兰州、北平、南京等名词。某县长曾在合水以东召集民众训话，数次申传，到者寥寥。而苏维埃召集开会，则二十四小时之内，可以立刻齐集数百里以内之民众。”^①

3. 采取有效的工作方法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成功的关键

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党的一切工作有赖于党员发动群众去做，依靠党与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得以生存，使根据地得以发展。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陕甘边的党和政府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采取灵活有效的群众工作方法。

^① 范长江：《刘志丹之发动与民众之意向》，载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第793—794页。

(1) 坚持以理喻人。在陕甘边照金根据地的建设问题上，当时有的人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只知道机械地按省委指示办事，去攻占敌人坚固的城镇据点，刚打下一块地方，还没有把群众组织起来，就要马上平分土地，结果中农恐慌，富农逃跑，造成根据地不巩固。^①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习仲勋坚决反对这种“左”的错误做法。他非常赞同刘志丹提出的“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的主张。^② 他注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团结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对根据地周围的民团能团结就团结，能使其中立就使其中立，只打击顽固的。对一时不明白党的政策的国民党内开明人士、老知识分子，习仲勋也首先尊重他们，耐心地向他们讲清道理，他们称赞道：“上面把你们说成是反贼，我也以为你们是草莽英雄，胡闹哩。你们原来都是治世英才。”后来一些知识分子也参加了革命，群众说：“共产党本领真大，人都愿意跟他们走。”^③ 这样，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有了新的发展。习仲勋后来回忆说：“我一生注意听不同意见，听民主人士的意见，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就是遵从志丹同志的教导和从那时的实际经验得来的”^④。

(2) 坚持以诚待人。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陕甘边党和政府在斗争中认识到这个法宝的重要性。在开辟陕甘苏区的过程中，红军力量较为弱小，如不注意搞好统战工作，化阻力为助力，还会处处受到制约。陕甘边党和政府汲取了杜衡破坏与夏老么互不侵犯关系而遭致失败的教训，积极与哥老会等帮会组织建立统战关系。正宁县西梁有一位势力很强的哥老会大爷陈某，红军和当地游击队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与其建立了友好关系。他不仅为红军和游击队来往西梁提供方便，而且给予了很多帮助。经反复做工作，游击队与华池县南梁哥老会大爷郑德明建立了统战关系，他为游击队做了大量工作，后来还担任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赤卫军副总指挥。

① 习仲勋：《难忘的教诲——纪念刘志丹同志九十诞辰》，载《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② 军事科学院：《忠心耿耿 为党为国——纪念无产阶级军事家刘志丹诞辰100周年》，载《解放军报》2000年10月14日第7版。

③ 习仲勋：《难忘的教诲——纪念刘志丹同志九十诞辰》，载《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④ 习仲勋：《难忘的教诲——纪念刘志丹同志九十诞辰》，载《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3) 坚持以情感人。刘志丹、习仲勋认为，只有壮大革命力量，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陕甘边界的子午岭和陕西黄龙山有多股土匪，其中不少人出身贫苦，是迫于无奈上山为匪的。对那些同情和倾向革命的，刘志丹、习仲勋都向其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宣传革命道理，耐心争取，肝胆相照，使其弃暗投明。1934年夏，他们派人上黄龙山做改编郭宝珊的工作，并及时送去慰问信和羊马等慰问品。在刘志丹、习仲勋的感召下，10月20日，郭宝珊毅然在新堡宣布起义，率部120余人进入庆北苏区。习仲勋与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即率红三团、骑兵团前往柔远城南一带接应。11月10日，陕甘边党政军机关在荔园堡召开欢迎大会，并将郭部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之后，一些土匪武装也接受了改编，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

4. 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成功的保证

陕甘红军创建初期，部队指战员的成分和来源比较复杂，尤其是少数人带入部队一些不良习气，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队的声誉，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为了克服部队中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纠正部队少数成员的严重违纪行为，树立为劳苦大众服务的思想，陕甘边党和政府不断加强对红军部队的政治教育，在教育中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之成为团结群众、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

刘志丹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密切联系群众，严于律己，充分发挥着模范作用。在南梁革命斗争时期，他自觉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想到的总是人民群众，战士们都亲切地称他“老刘”。他作为部队的总指挥配备有一匹马，但他几乎不骑，行军总是步行，把马让给病号骑。他穿的一件缴获来的破呢子大衣，白天搭在马鞍上当坐垫，晚上盖在身上当被子。每到一地宿营，刘志丹总要找当地群众谈话，询问周围敌情，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和群众要求。正因为如此，他对陕甘边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大家都说他是活地图。红军打下合水县后，分发没收豪绅衣物时，他要求先分给战士和群众，分到最后给刘志丹分了一条女人穿的花棉裤，他只得将它翻

过来穿。刘志丹牺牲时的遗物，只有几份党内文件和6支缴获来的香烟。毛泽东为其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称赞他：“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5. 建立严格的纪律约束制度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成功的重要条件

陕甘边党组织制定了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廉政制度，对党员提出了严格的纪律规范，要求每一个党员都要带头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的纪律，维护群众利益，自觉接受党组织的监督和批评，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反对个人主义，防止特权思想的侵袭。习仲勋后来回忆说：“我们的政权建立后，把廉政当做头等大事。志丹同志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要讲贞操。’我们定了法，贪污10块大洋就要枪毙。”^①他又说：“有了这条法令，在干部中确实没有发生过贪污事件。对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要求更严格，犯了纪律，犯了严重的错误，都要受处分。高尚犯过纪律，也受过撤职的处分。”^②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对于党政工作人员违法不但加重处分，而且严厉惩处，党政工作人员中没有贪污腐化现象。从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到基层干部，都做到了廉洁奉公，维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了群众普遍的赞扬和拥护。

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的深刻教训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发展时期，“左”倾错误对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尤其是群众工作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留下了十分深刻的教训。

1. 在思想政治上，贯彻了一些脱离群众的极左政策

例如在土地革命方面，一些地方不仅地主的土地要没收，甚至对白耕农的土地也加以没收。1935年冬，庆阳县白马区在分配土地时，对小地主郭

① 习仲勋：《难忘的教诲——纪念刘志丹同志九十诞辰》，载《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② 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第1版。

万城采取了极端的措施，将其财产全部没收分配。^① 1932年7月，陕甘游击队在韩城遭受挫折后，开到正宁县南邑、激头一带休整，李昆来部队巡视。他提出在五顷塬实行土改，并要在20天内完成平均分配土地的任务。就在李昆布置土改的同时，国民党部队完成了对游击队的包围。而李昆却不顾敌人的“围剿”，连续五六天集中游击队干部开会，同时派党员及战士组织群众分地。由于大敌当前，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所以土地分配不下去。敌人开始进攻，游击队撤退，土改宣告失败。^② 由此可见，党领导分配土地的工作，必须建立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之上，必须在巩固的根据地内才能进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进行土改，是注定要失败的。

2. 在军事路线上，执行了“左”倾盲动主义的战略方针

刘志丹曾总结道：“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因而“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③ 1932年2月，刘志丹、谢子长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抵达照金，在陕甘边界开创了照金根据地，依托桥山同敌人周旋。而当时“左”倾错误代表者不顾敌我力量悬殊，先是要红军北上，打通“国际线”，后又要南下打关中。刘志丹等同志据理力争，但被扣上“游击主义”、“土匪路线”等帽子。“左”倾路线的错误，很快导致红二十六军红二团覆没和照金根据地丧失。“左”倾错误给陕甘边群众工作造成的损失是严重的，其教训是深刻的。

3. 在工作实践上，进行了残酷斗争的错误肃反

1935年9月，王明“左”倾错误在西北根据地恶性发展起来，开展了错误的肃反。陕甘边根据地县以上的领导干部和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军官，几乎无一幸免地被逮捕，200多名干部被残酷杀害。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甘苏区，了解到西北根据地错误肃反的严重形

① 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417页。

② 郭文金主编：《南泥湾与中国革命》，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③ 中共庆阳地委编：《南梁曙光》，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

势后，立即下令：“停止捕人”，“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1942年，中共中央对此次肃反做出决定，认为：1935年九十月间在陕甘革命根据地进行的肃反，是完全错误的，……给西北根据地造成深重灾难。王华回忆道：大家处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中。党委、政府、军委机关都瘫痪了，各项工作都处于停顿状态。^① 因为错误的肃反，大片根据地沦丧，人心、军心空前动荡，几个县先后“反水”。习仲勋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反攻倒算……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②

三、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群众工作的现实启示

1. 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推进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它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无论是陕甘边时期的浴血奋战，还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改善民生是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要手段。陕甘边革命斗争时期，党的群众工作是围绕改善民生展开的。目前民生问题突出表现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保民生也成为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条重要措施。只有代表民意，倾听民声，关注民生，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只有解决了民生问题，人民生活安定、富裕了，社会才能保持良性的和谐发展状态；只有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谋发展、促发展积极性，重视民生问题的解决，才能促使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2. 坚持科学的群众工作方式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保证

党的事业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只有依靠人民群众的努力奋斗才能实现，

① 王华，《陕北错误肃反回忆》，载《延安文史资料》第39辑，延安市政协2006年编。

② 习仲勋，《红日照亮了陕甘高原》，载《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0日第2版。

只有依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才能结出丰硕的成果。在陕甘边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通过紧紧依靠群众，扎根于群众，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并进而取得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苏联为什么在一夜之间丧失政权呢？根本原因就是长期严重脱离群众。

当前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和党的队伍状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大大增加了。能否正确处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能否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已成为我们党面临的极严峻的考验。我们要牢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

3. 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确保党的事业成功的关键因素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早在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理论。但党内的“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在屡遭挫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逐渐认识到只有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左”倾错误。1935年的遵义会议，才真正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寺村寨、照金革命根据地先后丧失，以及后来的错误肃反，都和“左”倾错误有着密切联系。1933年11月，刘志丹主持召开包家寨会议，实事求是地确立了以开辟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陕甘边“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走上了正确发展的轨道，根据地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陕甘边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革命事业就兴旺发达，什么时候偏离了这条路线，革命的事业就会受到挫折。

为此，不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都应

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到首位。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和具体实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来观察、思考和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走科学发展的道路，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最好的坚持和发展。

4. 坚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确保党的先进性的内在要求

始终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充分相信和紧紧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最显著的标志。只有紧紧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代表群众利益，才能凝聚起强大的力量，永葆党的先进性。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坚持为广大人民群众求解放、谋幸福。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始终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鱼水相依，始终坚持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路线和优良传统，并在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持下，建立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广大党员干部在实践中能够自觉地联系群众。但是不能否认，目前的确有一些党员干部脱离群众，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甚至个别人堕落或腐败分子。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破坏了党群、干群关系。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每一个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都要做联系群众的模范，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切实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民主政治、发展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一是尊重民权。要多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关心群众，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原原本本交给群众，把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明白白告诉群众，把发展前景清清楚楚讲给群众，把党和政府的决策部署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二是畅通民意。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进一步畅通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和社会建设与管理的渠道，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保证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是顺应民意。要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

宿，并以此为标准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把人民群众的愿望作为第一责任，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让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富裕起来，不断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作者：刘秉政，中共甘肃省庆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任研科科长，庆阳市南梁革命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浅议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文教事业的历史地位

慕彩霞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设中，曾有一系列重大创举，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其中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创和发展，不仅体现了当时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且以其显著的成绩和鲜明的特点，为陇东老区乃至全国新文化运动史增添了光辉的篇章。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文教事业，是在党的领导下，在经济贫困，文化教育落后，政治、军事斗争复杂尖锐的环境中，从无到有，由粗糙到完善，逐步发展起来的。本文仅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文教事业的历史地位作一简要论述。

一、体现新民主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陕甘边区的文教事业，在南梁苏维埃政府创建前近于空白。例如华池县境内，当时四五百人中找不到一个识字的；环县全县受过中等教育的也不过只有一两个人。人们的文化生活，一年到头只有偶尔看到一两次当地艺人为替人“还愿”而演唱的皮影戏。随着革命的兴起，一些反映时代精神的革命歌谣、深受群众欢迎的戏剧、报刊及群众文化娱乐活动等先进文化应运而生，并逐步建立起了军队教育、社会教育、干部教育和小学教育等，同时也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型的人民民主教

育，体现了新民主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那么何谓新民主主义先进文化呢？毛泽东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所谓先进文化，是相对于落后的封建文化而言，并总是在同逆历史潮流的文化冲突中体现出来的，它的基本特征大体有三个：一是反映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即人民性；二是适应社会实践的需求，并体现社会实践的真谛，即科学性；三是有益于历史发展，并成为导引社会进步最活跃和敏感的精神动力。

陕甘边区的文教事业最突出的就是人民群众掌握了教育大权，工农及其子女具有享受教育的权利，男女一律平等。在学校教育中，出身于农民家庭的学生就达80%以上，其中女生普遍在10%左右，特别是贫苦子弟（女）入学率不断上升。其次，教育部门和学校都把政治思想教育放在首位，对学生进行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的目的和任务是为政治斗争服务，教育学生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培养学生的阶级观念、劳动观念和群众观点及为人民服务精神，使之成为政治上坚定，有文化、会工作、守纪律的革命者和建设者。第三，在教学方法上，改变了让学生死记硬背和注入式等旧方式，采用启发式和讨论式，或者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民主方法，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第四，在学校、教学管理上，实行政府与教育部门双重领导，废除了打骂体罚学生的做法。第五，在教师队伍建设上，政府十分重视对教师的培养和提高，并关怀和尊重教师，教师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普遍受到人们的尊敬。第六，实行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开展社会宣传，进行军事体育训练等，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1934年秋在南梁荔园堡创办的陕甘边红军干部学校，当时办学条件很差，没有教室、宿舍，自己动手挖窑洞，盘土炕；没有教学设备，自制黑板和木枪，没有纸墨笔，就是地上写字，生活也很苦，吃的是糜子，小米也不多，蔬菜更缺少。打柴、碾米、磨面、挑水、做饭等，都由学员自己劳动解决。此外，学员还要参加春播和秋收等生产劳动，既克服了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又培养了劳动观念，密切了学校与社会、学员与群众的关系。庆阳老区至今还流传着一首《五孔窑》的民歌：“喝的山泉水，吃的糜子饭，睡的五孔窑，穿的军毛毡。上山去种地，下山把书念，敌人来‘围剿’，立马和他干。”这就是当年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劳动、生活的

真实写照。

这种新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实施，真正体现了毛泽东所说的，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二、推动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深入开展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文化教育活动的掀起和发展，不仅为革命斗争的开展开辟了新的阵地，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为土地改革提供了服务。1934年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民主政权的建立，虽说只是革命的星星之火，是劳苦大众执掌政权的尝试，但文教事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根据地党和政府用新文化思想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从而筑造了根据地革命斗争的铜墙铁壁。

在风雨与雷电中孕育，在硝烟与烈火中锤炼出的革命歌谣，如《盼红军》、《打江山》、《跟上哥哥上南梁》、《遍地红》、《红军起首三喜娘》、《妇女放脚歌》等，以淳朴的语言，独特的风格，紧密配合各个阶段的革命斗争，充分发挥了宣传教育、动员激励人民的战斗作用；进步报刊、读物大力宣传领导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民众了解时事动态的主要通道，1934年红色政权在南梁创办的陇东革命史上最早的报纸即八开油印小报《红色西北》和1935年1月20日陕甘边区特委在南梁创办的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生活》，主要宣传南梁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和红军战讯，发表了大量接近现实生活、贴近人民群众的文章和文艺作品，号召人民群众起来参加革命斗争，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和鼓舞性；特别是活跃于城乡的戏剧，如陇东道情、秦腔、眉户、皮影戏、快板等，为革命奔走呼号，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战争的深入开展；根据地还采用上门宣传、办黑板报、墙报、散发传单、演讲等多种多样的形式，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对农民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当时南梁政府开办的陕甘边红军干部学校和列宁小学，就是根据革命斗争和生产的需要，从实际出发组织教学活动。学生一方面在学校接受知识教育，另一方面走出学校，到社会上去，到群众中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鼓动群众，加紧生产，厉行节约，踊跃参军，多交公

粮，多做军鞋，多写慰问信，多做拥军优属工作。学校还组织学生在节假日登门看望军烈属，在农忙季节帮助他们收碾庄稼，抽空还给军烈属担水、洗衣服、打扫卫生，以实际行动支持前线将士。在边区土地改革运动中，根据地还利用各种宣传媒体及冬学、夜校、识字组等社教组织及时宣传土地改革政策，从政治思想上武装人民群众，使他们真正认识到土改是穷人从政治上、经济上翻身的大事，纷纷投入到土改运动中去，推动了土改运动的蓬勃发展。虽然根据地进步文化活动客观环境恶劣，条件艰苦，但通过广泛地宣传动员，广大文化战士和人民群众也无所畏惧，勇于开拓，对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包括武装斗争，起着积极的配合和声援作用；广大群众以献身的精神参军参战、拥军优属、担负战争勤务和参加地方武装，保卫边区，建设边区。这保证了边区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使其在同敌人的艰苦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

三、奠定老区文教事业发展的基础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文教事业，不仅是革命斗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为庆阳老区文教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打下了坚实基础。

1.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文教工作的根本保证。根据地创建前，这里方圆几十里无一所学校。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把文教事业作为根据地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各级政府中设立文化委员会，结合实际制定了一系列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政策、发展规划。在各县、区、乡政府建立健全教育领导机构，提倡兴教办学，在物质上给予支持，使文化教育事业迅速发展。同时，各级领导干部还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检查工作，总结经验，帮助解决具体困难，推动了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陕甘边区红军干部学校，就是由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兼任校长，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任副校长兼军事主任，马文瑞、蔡子伟等兼任教员。他们经常给学员讲课、做报告，关心学员的生活，鼓励教员搞好教学工作。刘志丹还经常到校给学员讲政治课和军

事课，如讲十月革命、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开创陕甘边苏区的条件和政策、军事知识等。他还向学员讲解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亲自编写了包括原始社会、奴隶占有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等社会形态的讲授提纲。在讲军事课时，总是身体力行，边教边练，一丝不苟，特别在军事训练中，培养学员的组织纪律性和关心群众利益的思想行为，把革命纪律教育、军民关系教育等内容渗透到军事训练之中。边区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委员长蔡子伟还亲自为列宁小学编写课本。这些教材通俗易懂、好学习记，既是文化课本，又是政治课教材。由于不断加强党对文教工作的领导，根据地教育得以在艰难困苦中创建，不断克服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使教育取得了很大成就。

2. 坚持走群众路线。毛泽东曾指出：凡是须要群众参加的工作，没有群众的自觉与自愿，就只会流于形式主义而失败，对于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尤其是如此。根据地能够创办文教事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从业者的利益出发，实施民众教育。根据地推行新文化教育运动的首要目标，就是推倒几千年来劳动人民只能创造文化而不能享受文化教育的传统，确立劳动者阶级在文化教育领域里的主人翁地位。因此，苏维埃政府把发展新文化教育事业，作为实现劳动群众彻底翻身解放的重要条件，实行教育面向工农兵。从这个根本宗旨出发，从指导思想、方针、步骤到方式方法，尽可能地为广大劳苦大众接受文化教育创造条件，提供机会。在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上同群众生产、生活利益相结合，注重对群众进行政治和科学教育，从实际出发安排教学内容。此外，针对当时群众不会写信、不会写地约、对联、路条、借条，不会记账、算账，不会预防庄稼病虫害等情况，开设了应用课、珠算课、自然课等，学习庄稼栽培、纺织织布、妇婴卫生、珠算记账、公文知识。还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活动，开展了“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足、劝男子剪辫子”活动。教学组织形式也灵活多样，建立了诸如冬学、夜校、读报识字组、民众教育馆等，仅冬学就有全天冬学、半日冬学、成人冬学、儿童冬学、妇女冬学、一瘦子冬学等，还创造了个别教、互帮互教、家庭互教等多种形式，时间上采用大忙不学、小忙少学、农闲多学、雨天雪天集中学习的办法。根据地15岁以上、40岁以下的群众，凡参加扫盲学习的一般识字都在500个左右，不少人达

1000字以上。广大群众通过各种形式的学习和教育，一般都能读书看报，掌握一定科学技术，开始从愚昧落后状态中解放出来，树立了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不少人成为有一定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的新型农民，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繁荣和发展。

苏维埃政府还依靠群众，解决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除教育资助外，群众在自愿的原则下为教育筹集资金，或划分学田，或从打土豪的收入中，或从师生劳动生产的收益中等多种渠道解决办学经费问题。实践证明，只有把文教工作真正当成人民群众的事业，把文化教育和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群众才会有积极性，文教工作才能得到群众实心实意的支持和参加，才能保证和推动文教事业的健康发展。

3. 坚持文教工作中的统一战线。根据地推行新文化教育，面临着批判和否定几千年来腐朽的封建文化传统的任务，本身是一场革命。统一战线问题体现在文教领域，主要表现为在除旧布新的矛盾对立斗争中，无产阶级如何争取同盟军的问题。由于当时历史文化的极端落后，知识分子奇缺，教育人才缺乏，为适应广泛兴起的新文化教育运动的要求，根据地的方针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壮大无产阶级文化队伍，充分体现了文化界统一战线的广泛性。

边区政府把知识分子当作革命的财富，制定技术干部待遇标准，对知识分子政治上信任、工作上放手、生活上关心，因而吸引了大批知识分子从敌占区、国统区来到根据地，对根据地各项事业给予很大的帮助和支持。他们的全部活动，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坚持团结、民主方向，而且以刚健雄伟的姿态走出书斋、校门，突破过去狭隘的知识分子的圈子，深入到广大民众中去，以通俗的大众化的文艺形式抨击黑暗现实，鼓吹政治民主和妇女解放，反映现实和人民大众的生活斗争，唤醒人民大众的民族情绪。许多知识分子还在与工农兵的结合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热爱边区、建设边区。生产再苦，苦而心甘，工作再忙，忙而无怨。列宁小学教员张景文积极组织宣传队向群众宣传翻身闹革命的道理，担任列宁小学教员并自编教材，又承担了组织妇女等工作，为工农民主政权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四、增添宝贵的文化资源和技术力量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文教事业，不但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鲜明的战斗性，而且涉及面广，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造就和充实了一批新生的骨干力量。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伴随着革命发展而产生的陇东歌谣，其内容、风格以及思想性、艺术性，成为陇东乃至甘肃文学史上最早表现党领导下农村革命斗争包括武装革命斗争的作品。戏剧方面有陇东道情、秦腔、眉户、皮影戏；社火表演方面有新秧歌、云朵子、跑旱船、高跷、灯舞；美术方面有剪纸、面塑和石兽雕刻，还有大量的民间传说、革命故事等。一批像高原、柳青、柯蓝、艾青等作家同一些民间艺人一道深入农村，挖掘素材创作了短篇小说《乌鸦告状》、《刘巧儿团圆》等，这些都是加载文艺史册的优秀作品；报告文学《我们的英雄何万祥》，后被拍成电影，在观众中久负盛名；民间流传的“云朵子”舞蹈，后被著名的舞蹈家陈爱莲提炼加工，改编为深受国内外赞誉的《荷花舞》；陇东道情，后被专家加工，成了闻名全国的新剧种——陇剧；《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绣金匾》、《边区十唱》等民歌不仅唱遍了陇东乃至边区，而且唱遍了全中国。这些作品都有着充实的内容和生龙活虎的精神，保留下了一个伟大民族在苦斗中的血肉与呐喊，镌刻下了民族革命的文化丰碑，丰富了根据地的文化宝库，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写下了光彩壮丽的一页。

根据地还造就了一批土生土长的文化精英，如农民诗人孙万福、新秧歌运动的旗帜刘志仁、农民歌手汪庭有、剧作家黄润等，是他们中杰出的代表，更多的是数不清的话跃于乡间的社火头、民歌手。刘志仁，被边区政府树为“特等艺术英雄”，对旧社火的形式大胆革新，曾以演得真、唱得顺、舞得欢，受到群众的极大欢迎。周扬曾评价说：“刘志仁和他的南台社火，堪称为群众新秧歌运动的先驱和模范。”与其争奇斗艳的庆阳黄润领导的社火队，曾以表演《减租》，受到中央领导和文艺界名人的赞赏，黄润也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根据地建立了在全国较有影响的培训干部、教师的学校，如列宁小学、陕甘边红军干部学校等。仅陕甘边红军干部学校从成立到1935年春，仅半年时间，就招收了3期学员（第一期在荔园堡70多天；第二、三期在豹子川、张家岔90多天），共培训军政干部300多名和号兵10多名。学员毕业后被分配到红军济南队、赤卫队以及各地方

政府担任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社会教育中，成立的民教馆、列宁俱乐部、夜校等，在机关、部队及广大农村中普遍地开展了识字扫盲活动，到全国抗日战争以前，根据地接受扫盲教育的达五六千人。这些同志无论是从事军事、党政工作或是文化、教育工作，都对巩固扩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队伍的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在革命斗争中成为技术和骨干力量。

作者：慕彩霞，女，中共甘肃省庆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人秘科科长。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宣传教育 文化事业的发展和意义

樊为之

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为其传播马克思主义，推进中国革命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西北革命过程中各级党组织和西北革命的主要领导人都高度关注宣传文化工作。刘志丹早在甘肃陇东从事革命根据地创建活动的时期就编写了“苛捐杂税，官逼民反；大家起来，实行共产”的唱词教给民间艺人宣传革命。唱词通过陇东老曲子艺人的演唱，传遍了陇东地区，为后来建立革命根据地做了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照金和南梁的不同时期都积极致力于宣传教育文化工作，用党的宣传工作去教育引导群众，传播和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积极性，这一工作的大力开展，对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建设和巩固都产生了重要作用，对后来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做出了重要的群众动员工作。

一、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对动员群众、推动照金根据地的建设发挥了显著作用

陕甘红军游击队在照金等地的宣传工作对于提高群众觉悟，建立党的群众基础，为开辟照金根据地创造条件做出了重要贡献。1933年陕甘红军游击

队占领龙家寨以后，集中于照金、香山地区，一方面加强部队训练，另一方面深入村寨，开展群众工作。当时，部队干部战士挨家逐户地到群众家里，促膝谈心、启发阶级觉悟，宣传土地革命与苏维埃运动，组织分粮斗争，获得群众热烈拥护。……李妙高原是陕甘红军游击队的一个大队政委，工作经验比较丰富，尤擅长做群众工作。庙湾战斗后，刘志丹从创建根据地的长远目标着想，派他到芋园进行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工作，李妙高不负期望，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在芋园扎下根，建立党在芋园的群众基础，这样，开辟照金根据地的条件日趋成熟了。^① 在建立和巩固照金革命根据地过程中，照金地区的人民群众和农民游击队，紧密配合主力红军行动，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照金群众掀起的参军热潮中，先后有三十多名优秀子弟参加了主力红军，有百余名热血男儿、英俊妇女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他们中许多人在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献出了年青生命。照金群众还积极开展支前活动，男人们不分昼夜为部队运粮送草、修建工事、打造壕墙，妇女们任劳任怨，为部队赶做军鞋、磨面制粉、做饭洗衣。^② 人民群众对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其中党的宣传教育工作发挥了显著作用。

二、卓有成效的宣传教育文化工作对南梁根据地的建设，对推动群众投身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南梁革命根据地非常重视开展宣传工作，通过党的宣传工作教育和引导群众，启发群众觉悟，巩固了红色政权的革命基础。

陕甘边党组织和政府将在群众中间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看作做好组织群众的重要工作，中共陕甘边特委做出的《陕甘边特委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提出：要在深刻的宣传鼓动过程中组织灾民联合会，并且要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要地方党的同志和群众对妇女群众深刻的宣传鼓动，以组织拥护红军的洗衣队、慰劳队、缝衣队。^③ 陕甘边根据地

① 张青山：《照金革命根据地纪实》，载中共耀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第195页。

② 《照金革命根据地历史情况调查》，载中共耀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第354页。

③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5年4月—1936年），甲7，1993年，第399—400页。

党、政府和干部群众对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视和投入，推动了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

首先宣传教育工作在动员人民群众参加革命，积极配合军事斗争方面，为建设南梁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之前，红军的革命干部就深入南梁地区的川道，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宣传南方苏区革命的大好形势，讲地主的剥削和压迫，讲军阀和民团的暴行，大大地自发了广大农民的阶级觉悟和革命思想。在农民纷纷要求摆脱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上，他们领导南梁地区村村组织农民联合会，组成了赤卫队，为建立政权创造条件。

根据地领导人亲自参加宣传教育工作，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工作密切结合，有效地发挥了宣传教育工作的作用，推进了革命工作的发展。在军事斗争的基础上，习仲勋、张秀山、张策等到南梁地区，积极开展党、政、军工作，甚至挨家挨户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建立了雇农工会、贫农团、赤卫队、少先队、妇委会等群众组织，并且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的基础上，先后在白马庙川、玉皇庙川、小河沟川、豹子川、二将川以及保安的五保川、义正川等地建立区乡一级的革命委员会。以后又逐步地建立了南区、庆阳、淳耀等县一级的革命委员会和华池等县一级的苏维埃政府，为建立整个边区的革命政权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①

利用各种形式，对广大群众全面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宣传工作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经验。南梁政府成立后，专门成立了文化委员会，蔡子伟任文化委员长。每逢传统节日或庆祝战斗胜利，文化委员会充分利用平凉曲子、陇东老曲子、陇东道情、快板等文艺形式，组织军民演出“闹红”节目，宣传革命。另外，苏维埃政府还组织宣传队下村串户，利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党的政策，如给荔园堡群众教唱革命歌曲：“穷苦大众一条心，跟上红军闹革命，打土豪呀分田地，穷人能过好光景，嗨嗨呀嗨嗨，穷人能过好光景”，宣传穷人受苦挨冻的根由，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动员他们参加革命。做好妇女宣传教育工作是南梁革命根据地深入开展这项工作的重要举措。南梁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长张景文，积极投身到党的

^① 高建寅：《关于陕甘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几个问题》，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8页。

宣传教育工作中去。她亲自编唱鼓励妇女解放，参加革命的信天游：“婆姨女子放开脚，长发剪成短毛盖，男当红军女宣传，革命势力大无边”。带领开展妇女工作，宣传婚姻自由，开展妇女放足，动员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生产和工作。在她的影响下，许多姑娘、婆姨走出家门参加了革命工作。

三、军队中宣传教育文化工作的深入开展，对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部队，对建设革命根据地具有深刻的影响

各级党和西北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在陕甘边革命活动开展过程中高度关注军队中的教育工作，1934年7月中共陕甘边特委做出的《陕甘边特委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就明确指出：要扩大军队，必须巩固部队，巩固部队的办法除了加强党领导外，最主要的是加紧教育训练。今后各连队的政治人员，一方面按照政治课程去教育，另外必须组织列宁室、识字班、政治研究会等以提高战士的政治水平。同时，特委责成革命委员会在后方开设军事政治学校，以训练大批的军政干部，这一任务在目前扩大部队开展游击运动的过程中最为迫切。^①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对军事教育在扩大和巩固军队、保卫革命根据地的作用有着深刻的认识，并身体力行参加军事教育活动，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艰苦战争环境中根据地军事教育事业的发展。1932年1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刘志丹就在部队中开办了军政干部训练班。1933年又创办了随营学校，既学习军事知识，又扫盲识字。1934年2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随营学校在南梁改办为红军干部学校，后学校迁址豹子川张岔，改名“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成为一所培训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军政学校。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马文瑞、燕子伟等为教员。学校“住房全部是土窑洞，有些是在干校成立后，学员们自己动手挖成的，门窗因陋就简，用木柴和木棍做成，室内盘土炕。……学员主要来自部队中、下级干部，还有少量地方干部。没有

^①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年4月—1936年），甲7，第397页。

什么正规的教室和教材，给每人发根铅笔和一点麻纸，教员在台上讲或在黑板上写，学员们作笔记。干校的生活也很简单，主食是黄米，蔬菜很少，但羊肉常常吃，大家叫它‘黄米杠子烂羊肉’，生活得很愉快。”^①学校开设政治、军事、语文、政权建设等课程。当时军事课由刘志丹亲自讲授，卓有成效地提高了学员的军事素养和有关游击战争的知识水平。吴岱峰、马文瑞、蔡子伟等同志分别教授政治、语文、政权建设等课程。学校共办3期，第一期1个月，第二期70多天，第三期3个月，先后共培训军政干部200余名，他们被分配到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和边区政府工作，都成了陕甘红军和南梁根据地的中坚，有效地加强了军队力量，巩固了根据地政权建设。

部队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对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部队收编了部分当地武装，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对于改造这些部队非常重要。为改造这些部队，红军领导和战士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有计划地给他们上政治课，向他们宣传马列主义，讲革命的道理和革命的胜利前途，讲国民党的反动、卖国行为。军队中开展的宣传教育工作对提高这些部队的觉悟，坚定他们的立场，起了重要作用。

四、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工作对开启民智，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和受教育程度，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革命后备力量做出了重要贡献

陕甘边区党政军组织在发布政治、军事、经济等政策和法令的同时，也发布了文化方面的政策和法令，明确地规定陕甘边苏区实施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文化教育政策，指出对政治上清楚的知识分子，一概相信并分配适当工作，明确了边区的文化教育政策主要是兴办列宁小学，推动农村青少年教育。

根据地领导人的重视是以列宁小学为代表的根据地普通教育和群众教育稳步发展的重要原因。事实上早在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南梁成立初期，根据地领导人为配合革命斗争的需要，就着眼于下一代的培养，促进群众教育的

^① 蔡子伟：《南梁根据地革命斗争片断回忆》，载《陕西文史资料》第9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50页。

工作。刘志丹精辟地论述了知识的重要性，从历史发展轨迹中总结了知识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指出：“没有知识会犯更大的错误，历史上农民运动总是失败”，“人无知识就变得愚昧狭隘”。^①为办好普通教育，边区政府委派文化委员长蔡子伟负责筹办陕甘边根据地的红色学校——列宁小学。刘志丹、习仲勋、蔡子伟等根据地领导不仅以身作则，亲临学校讲课、作报告，传播革命理念，宣传斗争形势，而且关心学校的具体建设工作。当时学校的笔、墨、纸等教学用品缺乏，刘志丹就从陕甘边军事委员会的经费中挤出30元送给列宁小学作经费，习仲勋又从边区政府的办公用品中挤出笔、墨、纸送给学校，以解决学校教学的需要。列宁小学在霍建德、高敏珍、胡兆阳、张景文等学校领导和教员的努力下，在南梁革命根据地主要领导人和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得到了长足进步，学校白手起家，泥土台当桌椅，石板作黑板，自编教材，开设国语、算术、体育、歌咏等课程。在校学生由1934年3月最初的10多名增加到了1935年春的60多人。从1934年3月至1949年9月建国前的15年时间里，这所具有光荣革命历史和传统的初级小学，共培养毕业生210多人，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建设培养了有用人才。

作为根据地的教育机关，列宁小学将教授学生知识与宣传革命有机地结合起来，将培养莘莘学子与唤醒群众的革命觉悟密切地统一起来。学校通过给同学们教授“马克思是谁呢？是世界革命的领袖。他终生领导着我们穷苦人革命，还把穷人革命的办法指示出来”，“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二导师”，“拿刀杀豪绅，拿枪打白军”这样的内容，不但传授了革命知识，而且培养了学生的革命情感。列宁小学适应战时环境的需要，为培养学生保卫革命成果的军事能力，在教学内容中增加了军事课程。学生们拿着红缨枪、木大刀，练习武术、拼杀，这培养了他们顽强勇敢的革命精神和长大参加红军的雄心壮志。学校除教学生文化外，还带领他们参加劳动，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闹革命，打江山，穷苦人儿把身翻，要想把穷根剜，跟上红军上前线”等革命道理，鼓舞群众参加革命，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第一所列宁小学创办起来之后，陕甘革命根据地其他乡、村也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陆续创办了列宁小学，推动了根据地普通教育事业的发展，很好地传

^① 马文瑞：《群众领袖 革命楷模》，载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第81页。

播了革命思想和先进文化知识。

为全面提高西北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根据地党和政府非常注重发展成人教育，通过宣传教育进一步提高根据地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为增加群众的文化水平，根据地各个地方相继成立了成年人识字班，开展扫除文盲活动。如华池县各区还开展了“列宁文化运动”，在南梁、刘坪、白马庙、柔远等地办起了16处扫盲识字班和夜校。教学内容上成人教育在识字的基础上，相继增加了默写、唱歌、时事、卫生等内容。这些举措最大程度上使农民和战士掌握了更多的文化知识，大力发展了革命教育事业。

五、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文化出版工作对扩大西北革命影响，在根据地内外传播先进文化知识，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巩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胜利成果产生了重要作用

通过出版红色刊物来推动党的宣传工作，既体现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对利用新传媒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视，体现了陕甘边区特委和政府能够得心应手利用新传媒方式开创宣传文化工作的新局面，又表明了根据地文化建设工作，乃至整个根据地建设进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阶段。为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激励人民群众，1934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于南梁根据地荔园堡创办了《红色西北》，1935年1月20日陕甘边特委在南梁创办了党内刊物《布尔塞维克的生活》。中共陕甘边特委宣传部长龚逢春兼任主编的《红色西北》，以黑、红、蓝三色油墨套印，编排精巧，图文并茂，表现了根据地在刊物印刷和出版方面的力量。作为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红色西北》主要刊登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消息，尤以红军战讯为最多，并刊登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某些决议和宣传号召性文件，有力地配合和推动了陕甘边根据地的各项斗争和建设。对于《红色西北》的出版工作，根据地领导倾注了心血，刘志丹、习仲勋、唐子俊、蔡子伟等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经常为《红色西北》撰稿，他们还派人设法搞来油印机和质地较好的有光纸、蜡纸的油墨，保证了刊物的印刷质量，使这个刊物受到党政工作者、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人民的欢迎。领导人的关注和根据地建设成果共同促进了文化

事业的发展 and 繁荣。

陕甘边区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党的宣传事业。正如《布尔塞维克的生活》宗旨所说，“为了使广大党群众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定的把握上铁一般的团结起来，为了加强党的战斗力量……提高每一位党员的政治水平，传达党的经验教训，交换党的工作方法，并转达一切政治及群众斗争的消息，以引起党员的工作积极性”。“英勇的来领导千百万广大劳苦群众的斗争，争取西北以至全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最后胜利”。陕甘边区特委和政府创办革命刊物的初衷就是要利用它来宣传马克思主义，通过党的刊物来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这些刊物对更好地繁荣西北革命根据地党的宣传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者：樊为之，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陇东剧团的建立与贡献

陈晓贵

一、陇东剧团成立的背景及简况

陇东剧团的前身为1939年6月成立的庆环农村剧校，1940年改名为陇东剧团。再往前追溯，可追至1937年秋成立于曲子的陕甘宁剧社，1938年改为人民抗日剧社庆环分社，曾迁往延安。这个剧社在陇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它为陇东地区的革命文艺事业开了一个好头，对陕甘宁边区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7年1月，中共中央进驻延安。1937年9月，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中共中央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建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前后辖延安、绥德、三边、关中和陇东5个分区20余县，约150万人。从此，陇东分区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陇东分区主要包括庆阳、合水、环县、华池、镇原、曲子等县。

文艺宣传是营造革命舆论的主要形式之一。在20世纪中叶以前，戏曲是中国文艺的主要形式，同时还是一种重要的教育形式，所谓“社会教育，其感人最深，普及最广者，莫如戏曲”。而在革命文艺产生以前，戏曲中“良者故多，恶劣淫秽是以败坏风俗者也在所不少”。编演新戏的目的就是要补救社会教育的这种缺陷。陕甘革命根据地建立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

移风易俗，在边区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社会风气，文艺工作则要肩负着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积极投入到伟大的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重任，为建设、巩固、发展人民民主政权做出积极的贡献。

陇东剧团是陇东分区的主要文艺团体，直属于陇东分区党委。为进行革命宣传，1939年春，陇东特委在庆阳县曲子镇举办了一个戏曲训练班，他们先排演了一些秦腔传统戏，很受群众欢迎。这年，陕西西府民间艺人张云带领着皮影戏班的一些艺人流落于曲子镇，他们擅长陇东曲子、道情、秦腔、眉户等戏曲形式，演出过不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剧目，还编写了一些人们称为“旧瓶装新醋”的新戏，宣传抗日救亡，这很受庆环分区党委重视。在分区党委书记马文瑞、专员马锡五的支持和关怀下，分区将这几位艺人全部接收，将其与训练班合并，抽调墨道平、史虎臣、赵守一负责组织筹建庆环农村剧校，校长由史虎臣担任，副校长刘飞军。

这个剧校自置于共产党的领导后，一下子有了生气。墨道平、赵守一、程秀山、田益荣等一批共产党的新型知识分子干部开始编写一些新型秦腔现代戏，如《转变》、《送郎上前线》、《钟专员》、《张凤娇》等新戏，这些作品尽管没有出版刊印，没能流传下来，但在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中，为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都起到了积极的宣传鼓动作用，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方面更是功不可没。

陇东剧团最活跃、最辉煌的时期当属解放战争时期。此前由于剧团正在幼年时期，领导干部调动太频繁。从剧团成立到解放战争开始的7年之中，共更换过近10任团领导，平均每任不到8个月时间，同时也缺少专业干部，因而影响较小。除剧团创建人在戏剧上还有一定艺术才华之外，大多为行政干部和业余爱好者。直到1945年田益荣、曲子贞两人接班领导剧团，这一局面才稍有改变。

为了尽快使陇东剧团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1946年10月，西北局派黄俊耀担任团长，田益荣为副团长。黄俊耀是陕西澄城人，从小喜爱戏曲，1927年投身革命，1928年参加了与胡华暴动相呼应的澄城丰庄起义，1932年加入共青团，担任过地下党支部书记，是著名演员，又是剧作家，曾经在关中剧团任过政治协理员、民众剧团宣教处处长，对剧团建设的发展方向有一套成熟的想法。他认为，根据地的剧团就是要真正体现出中国的气派、民族的形式，通过有说有笑、热闹红火的娱乐活动，使人们明白事理，养成良

好的习惯，树立好的道德风尚和社会风气，真正到达寓教于乐的目的。因此他坚持剧团要以陇东人民熟悉的秦腔、眉户等戏曲形式为主开展工作。田益荣也是陕西省人，西安高级师范学校肄业。1936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先后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民运部干事，第三八五旅警七团宣传股股长兼团宣传队队长、旅宣传队队长等职。1945年底调陇东剧团任团长，对剧团以发展地方戏曲为主的主张非常赞成，并创作、改编30多部秦腔历史剧和现代戏，是最早将陇东道情搬上舞台的艺术家。二人对剧团的发展认识一致，很快使陇东剧团建设步入健康道路。

二、革命的宣传队、战斗队

为能够更好地担负起党所赋予的各项任务，剧团大抓全体成员的学习，抓骨干、抓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抓要求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树立正气。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剧团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有了明显的好转，组织纪律性得到极大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战斗力也得以很大提高，同时还大抓了剧本的创作。

剧团领导认为，作为革命的宣传队，一个剧团要想站住脚，就必须有自己的剧目和代表作品。他们组织全团认真学习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分析了陇东剧团的历史和现状，遵照“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宗旨，坚持走以发展地方戏曲为主的路子，紧密联系现实生活和革命斗争，编演群众喜闻乐见的剧目。

(1) 生动的政治教育大课。1947年元旦，剧团在地委礼堂上演了他们自编的大型秦腔现代戏《阎王寨》和新编历史剧《路安州》。《阎王寨》一剧，通过贫苦农民刘德全一家遭受人称活阎王“何百万”残酷剥削迫害的悲惨遭遇，有力地鞭挞了地主阶级的残忍无道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使广大劳苦大众明白，只有奋起参加革命，推翻蒋介石的腐朽政权，才能过上幸福生活的道理。为了演出的成功，团长黄俊耀亲自执导排演了这部戏，并扮演了剧中的恶霸地主“何百万”。

《阎王寨》在庆阳城一上演，就引起空前的轰动。人们对这部新剧赞不绝口，分区的干部群众都没想到这部戏如此感人肺腑。他们认为该剧完全可以与同类的《血泪仇》、《白毛女》相媲美。《阎王寨》一剧的成功演出—

下子将陇东的艺术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层面。

《闹王寨》是继马健翎创作的秦腔现代戏《血泪仇》、贺敬之、丁毅合编的歌剧《白毛女》之后的又一部同类型的戏剧作品，但其轰动效应并没有因此而减弱。新中国成立之后，这部戏被编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优秀剧目选集中。该剧虽然没有《血泪仇》、《白毛女》的传播面广，在全国的影响力也没有那么大，但它在陇东地区的影响却非常大。在陇东地区，戏剧《闹王寨》是给当地部队上政治大课的一部重要教材，但凡举行大的活动，都要上演这部戏，每次演出，台下的群众、战士、干部都是口号不断，连成一片。1948年入秋，胡宗南派出几千人向环县的木钵进犯，剧团也正好被邀请到那儿给部队演出《闹王寨》。当演到活阎王“何百万”当场打死农民刘德全的时候，一个战士两眼含泪，喷射出愤怒的目光，端起枪对准了扮演活阎王“何百万”的演员就要打，幸好被旁边的排长拦住了，他提醒那个战士说：这是演戏！戏演完时，上千解放军官兵群情激愤，斗志昂扬，个个摩拳擦掌，纷纷表示：誓死保卫边区，哪怕敌人来一个军，也要将来犯之敌打成肉泥。剧团在部队的掩护下将剧目坚持演完。那一仗，解放军将士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果真抓进犯之敌全部歼灭在木钵区的红土峡呢。

戏演红了，陇东剧团在边区也有了名气，分区领导表扬他们，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到陇东分区视察工作时也要观看他们的演出。这对剧团同志鼓舞很大，他们觉得自己没有白付出。打那以后，陇东剧团在全分区的影响逐渐大了起来。

(2) 活跃的思想政治工作队。1947年春以后，剧团一面大抓整顿，抓组织纪律和政治学习，一面抓基本功训练和创作，同时还抓军事训练，参加镇反肃特、战后清场，配合党政机关动员群众参战，安排群众生产、斗争。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分区党委又将剧团分为两个分队，一队由30多名年轻力壮的成员组成，由团长黄俊耀亲自率领，并以“兰东支队”为番号，随野战部队执行一些特殊的战地宣传任务；另一队主要是后勤人员和一些年老体弱的同志、女同志及家属、孩子，在后方活动。

1947年4月，“兰东支队”的30多名剧团团员在团长的率领下，赴合水县的肖咀子、店子原一带，为驻在那里的骑六师慰问演出，并做好一定的思想政治工作。

骑六师是一支起义时间不长的部队，政治素质和阶级觉悟普遍较低，解

长胡景铎系陕西省富平县人。他大哥胡景翼是1917年组织陕西靖国军的主要领导者之一，在“反袁护法”斗争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受其兄长影响，胡景铎自幼就富有正义感。后来成为国民党驻陕北横山一带保安部队的副总指挥。因不堪忍受蒋介石、胡宗南集团的歧视，拥护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他率5000多名国民党官兵，于1946年10月在陕北横山起义，成立了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接受共产党领导，胡景铎本人也加入了共产党。不可否认，这是一支正义的军队，但他们毕竟在国民党旧军队里时间太长，身上还存有浓厚的旧习气。“兰东支队”去骑六师不但是要进行慰问演出，还要帮助他们成立士兵委员会，给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

小分队的同志们与骑六师的官兵同吃同住，同操练、同娱乐，与战士和基层军官谈心，交朋友，宣传党的政策、方针，揭露国民党、地主阶级的反动、黑暗，批判封建思想意识，提高广大官兵的阶级觉悟，激发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血战到底的革命热情。一到连队，剧团的同志便去刷写标语。这已成为他们的习惯，不用谁吩咐安排，剧团走到哪儿，标语就刷写到哪儿。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他们先在三团各连成立了士兵委员会，官兵关系，士兵生活都有了较大改善，部队在政治上有了民主，士兵有了发言权，纪律性也有所加强，剧团的同志在各营连也有了一定的地位，一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都把他们看作朋友和老师。他们向剧团同志学文化，讨教解决问题的办法。剧团的同志向他们学习射击、投弹、拼刺刀和其他军事常识。不久，另外两个团的士兵委员会也相继成立，部队的政治素质均有所提高。小分队抓住有利时机，又在各营团有目的地演出了一些他们新编的剧目和传统戏，反响很大。自此，全师上下也都喜欢起剧团了。

(3) 革命战争的宣传队。剧团同志不但坚持为部队和分区驻地及各县城乡巡回演出，还帮助各县剧团和区乡基层编排新剧目，指导他们的业务工作，活跃乡村群众文化生活。他们经常参加农村中的减息减租、土地改革等工作，和群众吃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和老百姓如同一家人，谈生产、拉家常，从思想深处与群众建立起了感情。因此，剧团创作的剧目，作品都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戏剧语言中吸收了大量的民间口头语和地方话，加以提炼后使之既生活，又生动形象，通俗易懂，深受群众喜爱。

1947年5月中旬，“兰东支队”离开骑六师回陇东分区。他们来到陕甘交界的一个叫黑水寺的地方，这是富县一个区的所在地，区上同志热情地接

待了小分队的同志。第二天吃过午饭，小分队准备要走时，区长林山开口想让他们帮忙写一个动员已安置下来的老红军、老八路伤病员重上前线的说明节目，以便在第二天的群众动员会上用。林山区长是广东人，是一位著名作家，但由于普通话讲得不太好，做当地群众的宣传工作有一定困难。

这的确使团领导黄俊耀为难。此时已过午时，第二天上午就要用，能拿出一个说明节目来吗，他确实没把握。但看着区上同志期盼的目光，黄俊耀只好满口答应。他简单地向林山区长了解了些基本情况，便开始构思、动笔。经过一夜苦熬，终于写出来了一部小戏，剧名就叫《再上前线》，足可演四五十分钟。由于本子写得非常生活，又形象生动，唱词流畅，排演也很顺畅，演出后，很受群众喜爱，当下就有不少安置在当地的老红军、老八路和群众要求参军，重上前线。林山区长激动地说：“你们这部戏，比我做10次报告都顶作用得多！”

1947年10月，陇东分区进行了一次查思想、查阶级、查斗志、查立场的“四查”运动。在这次整风学习中，剧团根据运动中揭发的一些材料事例，创作出了中型现代眉户剧《四查》。这部戏是以讽刺喜剧的形式表现的，情节生动，人物性格鲜明，滑稽可笑，矛盾集中，且唱词近乎于说白话，通俗明了，唱腔流畅，易于上口，也很有教育意义，很受边区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

1948年元月，因形势发展需要，陇东剧团更名为“陇东文艺工作团”，业务也随之扩大。3月初，为庆祝“三八”妇女节，剧团又编排演出了宣传妇女放脚的眉户小戏《大脚好》。这出戏一上演，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广大的妇女们看着台上那妇女的表演，听着她女儿的演唱，不觉得已将自己融入在剧中，感到那的确就是她们的生活。她们看着这种带有善意讽刺的戏，笑得流出了开心的眼泪，也在生活中愉快地告别了昨天。这出戏演出后，还真有一批妇女放了脚。此后，这出戏成为陇东地区群众经常观看的主要剧目之一，剧中那一小段女儿的唱腔也成为当时许多农村女孩子一时流行的娱乐唱段。陇东剧团在边区的名气也随之大震，边区干部群众兴奋地说，陇东剧团来了就有好戏看。在分区内出走，到处都要查路条，唯独陇东剧团的同志可以畅行无阻，因为边区的老百姓和民兵都认识他们，这就是艺术、戏剧艺术的魅力和感染力。

此后，剧团掀起了一个创作高潮，前后创作出的剧目有：反映混入我军

内部暗中破坏我军民关系的敌特分子在整军中被查处的中型秦腔现代戏《除奸计》，反映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领导国统区人民进行反饥饿的大型秦腔现代戏《反蒋灾》；反映地方游击队破获地主分子暗中成立反动保甲组织的中型眉户现代戏《破奸案》，动员人民群众积极支援解放军的小型眉户剧《借粮》及其他一些小剧目，这些戏剧都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创作的文学作品主要有表现边区一个放羊小孩，故意将进犯敌人引向歧路而遭敌人枪杀的短篇小说《牧童的血迹》和表现一伙小孩憎恨蒋介石统治集团的童话《蝎子》。这两篇作品均发表在当时的文学刊物《延安文艺》上。

(4) 革命的战斗队。在战争年代，剧团不但要努力用文艺形式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还要随时参加对敌斗争，配合部队牵制敌人。1947年2月，国民党胡宗南部集结了6个旅的兵力，向陇东解放区大举进攻。为避免少受损失，保证群众的生命安全，庆阳、合水等县的一些剧团都暂时解散，将所有人员疏散回家，只保留了陇东剧团随分区党政机关开展游击战争并进行必要的宣传工作。为确保分区首脑机关的安全，剧团团长带领全团一边撤离，一边派人探查行动路线，随后率全团七八十号人马一路急行军连夜赶到华池县柔远城，与分区机关及时会合。3月6日，西华池战斗结束，剧团配合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及时进行战后清场等工作之后，深入各户，动员群众返乡，安排群众生产，稳定群众的情绪，有力地配合了当地镇反肃特等对敌斗争工作。

最紧张的是1949年1月21日，那天是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也正好逢集市，群众热情极高地汇集看戏，一派和平景象。傍晚人们正准备吃晚饭时，剧团侦察人员探回消息说马鸿逵匪军有一支骑兵队伍已将分区机关和剧团的联系切断，并正向剧团驻地袭来。敌人是误将剧团当做了分区首脑机关。这可怎么办？人家是一百多条快枪的铁骑兵，对没有多少战斗力的机关是势在必得。而剧团虽说有七八十近百口人，但仅有三十条破枪。人员也多是些妇女、老人和小孩。就凭这些人这些枪，要明着对付全副武装的敌人是不可能的。只有巧妙周旋，使敌人摸不着我们的虚实。那时刚入夜幕，针对敌情，剧团领导果断决定扔下锅灶立即撤出。此时天气突变，风雪交加，全团七八十口人马在黑夜里踏着半尺多厚的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行走着，时而山洼沟底，时而山梁崖顶。他们身后不时传来敌人喊杀声和战马的铁蹄声。一些妇女孩子不时摔倒，但谁也不吭一声，深怕被敌人察觉到他们的真

实身份，给首脑机关的安全带来威胁。面对极其严峻的形势，团领导镇静自若，带领全团翻山越岭，连续几天几夜的急行军，终于甩掉了敌人，掩护了分区首脑机关的安全转移。

剧团通过这两年多的创作活动和战争生活，不仅锻炼和提高了一批同志的创作能力，促进了剧团的业务建设，提高了演出质量，同时也培养提高了剧团同志的革命斗志和良好的工作作风，使陇东剧团从各个方面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为后来改编为甘肃省文工团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三、陇东剧团对陕甘宁根据地文化建设的作用和贡献

在陕甘宁边区众多文艺团体中，陇东剧团仅是一个分区级的剧团，论实力并不是很强，但这个剧团能在复杂的形势中，准确把握自己，找准自己的位置，演好角色，特别是在解放战争的三年多时间里，他们立足陇东地区实际，充分利用陇东群众所喜爱的秦腔、眉户这一戏曲形式，很好地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对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是有力地鼓动了群众参加抗日救亡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积极性。他们能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形式，寓教育于娱乐之中，通过有说有笑、热闹红火的剧情，最大可能地将一件事表现得尽情尽理，使人明白事理。如眉户现代戏《再上前线》就是这样一部戏，这部戏没有用政治报告式的鼓动，而是以情打动人，让那些已在百姓家落户的复转军人从内心深处感到自己的责任与义务，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上了前线；眉户现代戏《大脚好》是一部改造农村群众的旧观念和不良生活习气的小戏，这部戏也没有简单的说教，而是用生活的事实告知人们，怎样做才更好，因而更容易引起广大群众的重视，使他们能在生活的愉悦中告别昨天，迎接明天。群众很爱看这样的戏剧作品。

二是打造戏剧精品，使之成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教材和工具。在战争年代，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目的就是激起广大官兵的阶级觉悟，从而激发他们的革命斗志。陇东剧团编写的秦腔现代戏《阎王寨》，就是通过贫苦农民刘德全一家遭受人称活阎王的恶霸地主“何百万”残酷剥削迫害的悲惨遭遇，有力地鞭挞了地主阶级的残忍无道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从而激起了广大解放军官兵英勇奋战的斗志。这部戏在陇东被视为和秦腔现代戏

《血泪仇》、歌剧《白毛女》同类型的戏剧作品，是中国共产党和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大课的主要教材。与之相当的还有《反蒋灾》、《两支枪》、《四查》等，因为这种形式较之政治报告更通俗易懂，更易于深入人心，为广大干部群众所接受。

三是为革命队伍培养了大批文艺人才，为中国的的新文化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国现代历史上，革命戏曲现代戏的发祥地就在陕甘宁边区，其主要代表是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而陇东剧团也是为革命戏曲现代戏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重要团体之一。这个团体还为革命队伍培养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艺术家，除黄俊耀之外，还有率先在全国将领袖人物搬上戏剧舞台、创作出优秀话剧《西安事变》的剧作家程士荣，以创作《天山脚下》、《远方青年》等少数民族生活的优秀话剧而闻名的剧作家武玉笑，音乐家易炎、王中才等。陇东剧团也在战争的锻炼考验中发展成为在全国有影响的省级剧团——甘肃省文工团、甘肃省话剧团。甘肃省省级各剧团几乎全都是由陇东剧团派生出来的，如将陇东道情改造发展为陇剧并创作演出著名戏曲《凤落池》的甘肃省陇剧团，创作并演出了举世闻名的大型舞剧《丝路花雨》的甘肃省歌舞团等，其主要领导和主创人员也均为陇东剧团培养出来的。在各个解放区众多分区级剧团中，能发展成为一支在全国有影响的省级文艺团体的并不多，而陇东剧团就是这样一个英雄的团体。

四是配合部队，在战争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陇东剧团作为一个文艺团体，没有任何武装，但他们能以自己的努力，配合部队清扫战场，参与基层政权肃清敌特，参加农村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在动员群众转移、安排群众生产、稳定群众的情绪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牵制敌人，掩护首脑机关安全转移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作者：陈晓黄，甘肃省抗早防汛指挥部办公室调研员，高级工程师。

陇东优秀革命民歌在中国革命 音乐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以《军民大生产》、《绣金匾》、《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为例

左 扶

音乐是流动的历史，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音乐作品，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时代的脉搏，探索那些尘封已久的历史记忆。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革命歌曲一直伴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而发展。几千年来，中国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留下了无数反映农民起义的民歌，但是由于历史的久远，我们无法得知它们的全貌。20世纪以来中国革命歌曲的发展却有史可见，有脉可循。特别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山河破碎、亡国灭种的特殊时期，抗日战争那如火如荼、震撼人心的战斗生活，孕育出许多优秀的革命民歌，其中，陇东民歌《军民大生产》、《绣金匾》、《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成为这一时期中国革命民歌的代表作，在中国革命音乐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一、三首革命民歌的诞生经过

陇东，是历史上的一个地域概念，指甘肃的东部，我们现在所说的陇东革命根据地，是指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所辖的合水、庆阳、曲子、环县、镇原和关中分区所辖的新宁、新正等8县，它是第二次革命战争中保留下来的一块红色区域，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它

成为革命圣地——陕甘宁边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陇东发展的漫长过程中，人民群众用歌声传承文明，用吟唱传递情感，用音乐袒露心声。五四运动以后，陇东民歌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较大发展，唱出无数刚健清新、富有强烈战斗气息的革命民歌。特别是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使陇东民歌在老解放区的土地上出现空前的繁荣。这些具有崭新内容的民歌大都是歌手、诗人、作曲家在传统民歌的基础上运用填词、改编等方法演变、发展的。这些填词、改编可以说是对旧民歌从内容到形式的继承和革新，是中国革命歌曲创作上足以自豪的优良传统。经过重新演绎，这些已经融进我们血液里的经典民歌焕发出新的活力，它们就像震天的号角，运动的战鼓，以炽烈的感情，崭新的内容，随着战斗的硝烟响彻在陕甘边的每一个角落。特别是《军民大生产》、《绣金匾》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三首民歌至今仍唱响在中国的大江南北。

1. 《军民大生产》

这首歌是由庆阳地区流传甚广的劳动号子演变发展而来的。劳动号子是产生并应用于劳动的民间歌曲，具有协调与指挥劳动的实际功用，从最初劳动中简单的、有节奏的呼号，发展为有丰富内容的歌词、有完整曲调的歌曲形式，体现出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并通过劳动号子表现出劳动人民的乐观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甘肃庆阳，人们建房、修路时就用这种“叫号子”的办法用石块夯筑地基。这种打夯号子一般没有固定的词，全由掌夯的把式即兴填词并领唱，其他拍夯的人员就以“嗨咳”和“西哩哩哩嗨啦啦嗨罗罗罗咳”之类固定句式应和。唱词则全凭领唱人目之所及，情之所至，脱口而出。1942年，抗大七分校及第770团的战士们进驻华池县东华池镇，在劳动过程中，他们与当地群众中的掌夯把式一道，以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为背景，新编了打夯号子的歌词，唱出了《边区十唱》这首优美的打夯歌（歌词附后）。这首歌唱军民大生产运动的民歌很快在当地驻军和群众中传唱开来。1945年6月间，《松花江上》的作者、人民音乐家冼星海为了响应党中央、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粉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的封锁包围的号召，在一次随“关中八一团”到庆阳一带演出时，听到了这首民歌，非常激动，于是对十段歌

词进行了提炼和修改，减缩成五段，起名《军民大生产》，流传至今。（歌词附后）

2. 《绣金匾》

《绣金匾》是大家早已熟悉和喜爱的一首陇东民歌。但是，它的作者和创造过程却一直鲜为人知，使这首民歌作为陕北民歌传唱了半个多世纪。其实，这首感情饱满，风格细腻的民歌，是20世纪40年代陇东新正县马栏三乡（今正宁县永和乡）一位叫汪庭有的木匠编唱的。

汪庭有祖籍陕西高阳县。两岁时因家乡受灾，全家人外出逃荒，不久，父母相继去世，剩下他和哥哥两人相依为命。1936年，他流落到正宁县永和乡，并在那里落户，开始种地，学做木活。由于心灵手巧，干活认真又不计较报酬，手艺也越来越好，他渐渐成了周围小有名气的木匠。

汪庭有没有读过书，他所受到的唯一的文化熏陶，就是在四处流浪和拉长工、打短工时学唱陇东的《五更道情》、《五哥放羊》、《绣荷包》等民歌。在边区，他的光景改变了，不再受冻挨饿，不再被人欺压凌辱。他那被旧社会压抑了的才能，在新的生活环境里很快发挥出来。他一边做木活，一边哼唱欢乐的歌曲。为了表达自己对共产党、人民领袖和边区生活的真挚感情，他采用陇东人民喜闻乐见的《绣荷包》曲调和表现手法，开始了《十绣金匾》这首民歌的创作。

据著名诗人艾青在延安《解放日报》上撰文说，汪庭有嫌《绣荷包》表现的是男女爱情，给有威有望的人民领袖、民主政府和人民军队送去不合适，应当绣一个大金匾。因此，他把这首民歌定名为《十绣金匾》。因为不识字，汪庭有在编唱这首民歌时遇到了很大困难。他常常把第一段记住了，才能再编唱第二段。有时候，后面一段编好了，而前面一段又忘掉了。为此，他想了一个办法，每编好一段，马上教给村上的孩子唱。这样，他就可以放心地编第二段，如果第一段唱不出来时，再找孩子们唱。就这样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辛勤努力，汪庭有终于编成《十绣金匾》（歌词附后）。解放战争时期，将“十绣”精练为“三绣”，改名《绣金匾》（歌词附后）。

除此而外，汪庭有创作的民歌还有《表决心》、《防奸歌》等。《表决心》也是一首长歌，分10个月来唱，每个月8句。它详细叙述了国民党统

治区顽固分子残害人民的罪恶事实，配的是陇东流行的《珍珠倒卷帘》曲调，唱起来悲痛哀伤，让人听了又愤填膺。汪庭有的这些艺术成就受到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1944年11月，他光荣地出席了陕甘宁边区文教英雄大会，荣获甲等艺术英雄的光荣称号。

3.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我们知道，一件成功艺术品的创作是以生活为源泉，以激情为动力，以思想为灵魂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的创作也不例外。它是一位大字不识的农民创作演唱的，这个人叫孙万福。

孙万福1883年出生于甘肃环县曲子镇刘旗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一直务农，虽然不识字，但聪慧过人，擅长吟诗编歌，有出口成章的本领。村里每年要社火，必请他担任“春官”。他的吟唱诙谐幽默、声情并茂，语言质朴生动，比喻形象，在十里八乡很有名气。1936年，工农红军西征时解放了他的家乡，这个翻身以后的农民，家庭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激发了他的劳动热情和创作热情。在火热的生产劳动中，他始终倾心于诗歌创作。1943年12月，在中共西北局接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面对让他翻了身的领袖，这位老英雄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近毛主席，用双手紧紧抱住毛主席的肩膀，动情地说：“大翻身哪！有了吃有了穿，账也还了，地也赋了，牛也有了。这都是您给的！没有您，我们这些穷汉子爬在地下，一辈子也站不起来！”说完这几句话，他的感情如同决开的坝堤，一泻千里，他用颤抖的声音即兴唱起来：

高楼万丈平地起，
盘龙卧虎高山顶，
边区的太阳红又红，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他唱的这首民歌就是《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歌词附后）。

除此之外，孙万福还创作了《歌唱毛主席》、《边区人民要一心》、《我们边区象清泉》、《自卫军》、《二流子要转变》、《抗战副团》等大量热情洋溢的诗歌，在当时的延安《解放日报》和《陇东报》发表的就有20多篇。《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唱出来以后，经贺敬之修改润色，发表在《解放日

报》上。从此，这首优秀的民歌就在边区传唱开来。1971年，由陕西省文艺工作者集体改词，作为“五首革命民歌”演唱，在全国颇有影响。

二、陇东革命民歌因其多彩的艺术特色、深刻的思想内容、鲜明的时代特征在中国革命音乐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陇东革命民歌是陕甘宁边区革命民歌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陇东的优秀儿女们创作了数量相当可观的革命民歌，这是陇东人民在革命斗争年代里踊跃参加革命、竭力支援革命的生活写照。《军民大生产》、《绣金匾》、《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三首歌曲成为其中的佼佼者，透过这三首歌曲，我们就可以探究陇东革命民歌的全貌：

1. 多彩的艺术特色

有人说，革命民歌的思想性非常强，而艺术性却不及旧民歌。的确，我们将一些革命民歌和非常优秀的旧民歌相比，是有这样的感觉。但是，这些旧民歌都是经历了历史的荡涤而成就的精华。在革命民歌中也有这样的经典之作，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三首陇东革命民歌，其艺术特色就非常鲜明。

首先，陇东革命民歌从歌词的填写创作上，有以下特点：（1）沿袭了中国历代民歌一直采用的传统手法——比兴。关于比兴，朱熹在《诗集传》中曾曰：“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在陇东，人民群众总是用一些丑恶的东西去比那些反动统治阶级，唤起人们对敌人的憎恶之情。而用美好的事物比那些自己热爱的对象，以唤起人们对美好事物的联想和回忆。如《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中有两句词“边区的太阳红又红，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天上三光日月星，地上五谷万物生，来了咱们的毛主席……”用代表光明的日月星辰来比毛泽东，表达了对领袖毛泽东的无限敬仰和热爱之情。（2）纯朴，由心而发，不加雕琢、朴实自然。如《边区十唱》中：“开榆林，开荒地，念书的娃娃们也上山”；《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中：“为咱们能过好光景，发动了生产大运动，人人努力来生产，丰衣足食吃饱饭”；这些直白的语言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就像老乡

的对话，用“吃饱饭”三个字来概括大生产对群众带来的实惠，质朴而准确，这是翻身农民对大生产运动发自内心的咏唱，无比深情、亲切，毫无修饰。(3) 极其明朗、精神乐观、积极向上。如《军民大生产》每一段歌词都有极大的鼓舞力量，具有很强的号召性，反映了当时边区生产的火热景象：《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最后一段歌词：“边区人民要一心，古树开花耀眼红，千年古树盘了根，开花结籽靠山稳。”《绣金匾》中：“五绣老百姓，抗战最热情，组织起自卫军，打倒小日本。”“七绣女生产，织布又纺线，加入识字组，要当女状元。”虽然当时边区经历着严重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生活非常困难，但人们毫无悲戚之感，而是对胜利充满着信心，这种明朗的基调是由生活本身决定的，因为延安时期，解放区的生活本身就是明朗的，生活决定民歌的内容，内容又决定艺术形式，经过融变，进而形成一种艺术特色与艺术风格，丝毫没有伤感和颓废的情绪。(4) 巧妙生动，许多看似平常的词句，似乎是脱口而出的俗言俚语，仔细琢磨，又会感达到其构思巧妙，乡土气息浓郁。如《军民大生产》中：“又能武（那么呼嗨），又能文（那么呼嗨），人问我什么队伍，一、二、三、四！八路军（那么呼嗨）。”“能文”、“能武”这是陇东人民对有才能人的评价，虽然简洁，但形象地道出了八路军队伍的整体素质；后两句一问一答，用喊口号的形式，回答出了八路军热情向上、满怀激情的军队形象。这质朴而雄壮的词句，似乎是从陇东高原深处发出的浑厚希望之声。可以说直到现在，这两句词都是对人民军队形象表述的经典词作，后来的好多文艺作品都沿用了这样的创作手法。又如《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整个歌词都写得形象生动，朗朗上口，特别是第一段，用比兴的手法，准确地描述出了陕甘宁边区在毛主席、共产党的领导下，欣欣向荣、充满希望的景象。同样，在《绣金匾》中，简洁明了的词句，却准确地描述了人民领袖的光荣形象、边区人民的积极向上和军队群众的鱼水深情，句句经典，荡气回肠。

其次，陇东革命民歌在体裁的运用上丰富而多样，除继承传统的陇东民歌的体裁如山歌、号子、小调外，还融合了现代歌曲创作常见的体裁，如进行曲、抒情曲、颂歌等，往往在一首歌里可以看到多种体裁形式，更大地拓宽了歌曲表现的空间。如《军民大生产》，原曲调是一首陇东劳动号子《推炒面》，通过填词改编，改变了原曲的速度、节奏和装饰音的用法，采用了进行曲的音乐节奏，充分挖掘了原曲朴实刚健的内涵，同时又

具有了豪放、粗犷、雄壮的风格，音乐形象非常鲜明，旋律质朴流畅。全曲突出了“x x x x x | x x |”节奏，鲜明而规整。采用一领一合、男女分段齐唱的演唱形式，语言生动、风趣、群众化，富有热情和强大的鼓动力，唱词与衬词交替出现，更显动感和整体气势；第三句连续的十六分音符节奏“x x x x”及旋律中富有弹性的同音反复，由高到低跳进，都给人以新鲜感，突出了热情、风趣、乐观、活跃的气氛，形象地再现了大生产运动的火热场面。又如《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原曲本是一首流传很久的传统民歌叫《光棍哭妻》，经孙万福重新填词演唱及后来文艺工作者的改编后，成为一首经典的颂歌。全曲为起承转合的四句体结构。前两句完全重复，旋律起伏较大，跨越了高、中、低三个音区。第三句与前两句有明显变化，由四小节扩充为七小节前半句正词，旋律在高音区连续向最高音“ $\dot{1}$ ”冲击后，接上主音“5”突出了热情而激动的感情，后半句由中音区下行到低音区稳定音上，而它在原民歌中为三小节衬腔，与以上乐句的节拍数也不均衡。第四句与第三句相对称，有中音区环绕下行到低音区，同样重复唱词，给人以亲切感。全曲既有高亢、激情、奔放的陇东地方风格特色，又根据音区高低起伏的对比，表现了亲切、深情、内在的赞美之情。而《绣金匾》则通过改编整理巧妙运用了调性的转变，使《绣荷包》这首陇东民歌，由对亲人远离后的思念、期盼之情的小调，转变为《绣金匾》这首对领袖的深情怀念和热切赞美的颂歌。它们曲调基本相同，但因唱词、情感不同，采用了不同的调式色彩。《绣荷包》属于民间音乐中的以“ $\text{间}(\text{b7})$ ”代“ $\text{变宫}(\text{7})$ ”，大声(5617124)“苦音”徵调式，其中“ b7 ”“4”两音在旋律中比较突出。《绣金匾》为六声(23456 $\dot{1}$)商调式，“3”“6”两音比较突出，给人以抒情明朗之感。在旋律进行中，突出了以四度上行与级进下行为基本乐思，按照“起、承、转、合”结构逻辑，形成很方正的单乐段。每段四句，均为“五、五、七、五”句式。为了使乐句拍数均衡，在五字句的句尾采用了拖腔旋法，也突出了情感抒发，拖腔的基本轮廓，逐渐由高到低，自由模仿，从热情赞美转入深情内在。第三、四、五段首句在高音区出现使情感得到进一步强调，新颖而感人，速度变化也可随情感做不同处理。陇东革命民歌体裁的多样化，符合了当时特殊的革命斗争环境和生活所需要。

2. 深刻的思想内容

陕北的革命民歌，就其思想内容而言，主要是歌颂革命领袖、歌颂共产党、歌颂人民军队、歌颂边区的，反映边区军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和对领袖的爱戴之情。

民间诗人孙万福创作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这首陕北民歌，形象生动，比喻真切，表现了陕北人民对领袖的热爱，反映了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建设边区的高昂斗志和边区人们的生产、生活蓬勃发展的万千气象。歌词于朴实中见哲理，于淳厚中含深情，为人民群众长期咏叹。周扬曾在《解放日报》上撰文，对《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作了详尽介绍和高度评价。他写道：“这个老头是一个很有诗意的人，他的讲话就像诗一样，简直是出色的朗诵啊，比某些职业的朗诵诗人还高明呢！”“孙万福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善于把这些思想和情绪化为活泼的、带有丰富多彩的语言。不但个别句子带有诗意，而且通篇带有诗的结构和风格。他时常在语言里用着一些成语、形象和比喻，而且有时用得那样恰当，使旧的成语获得了新的生命”。孙万福的诗歌创作，大部分是对边区人民翻身生活的歌唱和对党与领袖的赞扬，在当年的陕北及陕甘宁边区，有很大影响。

从《十绣金匾》歌词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民群众对革命领袖的爱是多么的深沉和热烈，句句真切，字字深情，因此，它得到许多著名的诗人和艺术家的高度评价。著名诗人、延安文艺运动活动专家艾青在《汪庭有和他的歌》一文中曾经这样评价：“他的歌不是用文字写下来的，他的歌是用感情化成一串串的声音，在自己的脑子里记忆下来的。”“从汪庭有这个《十绣金匾》的歌里，我们可以看出劳动人民对革命领袖、革命军队、革命政权、革命根据地纯真的爱和对劳动生产的热情。只有在民主政权下面生活的人，才能唱出这样的歌。”^①《十绣金匾》传唱不久，就增加了歌颂朱德的新内容。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紧密配合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内战阴谋的斗争，原作中歌颂八路军的歌词随之作了改动，并把原作的“十绣”精炼为“三绣”，演变成为在战争环境中随时随地用以教育、鼓舞人民群众的《绣金匾》，表达了人民群众对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八路军的热爱、拥护。

而《军民大生产》成为流传甚广的经典之作，很主要的原因是它在思

^① 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11月8日第4版。

想上反映出边区军民革命乐观主义的感情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整首歌热情地赞颂了边区军民在敌人重重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下，在严重的经济困难面前发扬乐观的革命主义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壮观场面，他们组织各种各样的生产自救运动，团结一致，共渡难关，表现出边区军民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一切侵略者都将在这排山倒海、气势如虹、坚如磐石的革命精神中自取灭亡。这是一首思想和艺术高度统一的经典之作。

3. 鲜明的时代特征

《绣金匾》、《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和《军民大生产》都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些诞生于特殊年代的革命民歌有着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首先，它们反映了边区军民热爱领袖、拥护共产党的感情。

抗战时期，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制造摩擦事件，发动三次反共高潮，而中国共产党则坚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原则，坚持抗战到底，并在边区实行民主制度，成立民主政权，实现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愿望，使边区到处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因此陇东人民深情地高唱着《绣金匾》，高唱着《咱们的领袖毛泽东》，高唱着《军民大生产》，抒发着对共产党、毛主席和人民军队发自内心的赞颂。人们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把中国从黑暗引向光明。

其次，它们反映了边区军民团结一致、抵御强敌、克服困难的时代精神。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边区军民一边克服重重的经济困难，一边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还要加紧生产支前抗战，困难真是大极了。但是，他们没有被吓到，没有退却，“男男女女，齐动员”，“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加紧生产，为抗战”，军队更是“比民忙大半，夜晚守警戒，白天务庄田”。当时的边区，真是“世事多太平，军和民大团结，大家一条心”。

这三首革命民歌作为陇东革命民歌的代表，因其在艺术方面亦庄亦谐、亦雅亦俗的独特风采，因其艺术性、思想性的完美结合，在中国革命音乐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陕北革命民歌对中国革命及中国革命音乐史的影响

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以《军民大生产》、《绣金匾》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为代表的陕北革命民歌，有着激励人民积极投入革命斗争的实际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三首歌曲依然久唱不衰、广为流传，它们不仅有着鼓舞人心、坚定信念的深远意义，并且具有净化品德、愉悦情感、陶冶性情的新的审美作用。它们的艺术价值、思想价值等都对当时以及后来的艺术家、作家的歌曲创作、文学艺术创作产生过直接的和深远的影响。

《军民大生产》是音乐家张寒晖的传世佳作。几十年来，这首歌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作，作为“五首革命民歌”之一，一直鼓舞着中国人民的战斗和劳动，影响广泛。1964年，周恩来在领导编排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时候，曾把这首歌曲采用在大歌舞中，并且指出：“《军民大生产》是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把我们饿死的情况下，边区军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战胜一切困难支持抗战，而产生的时代声音”^①。1982年底，中国政府领导人访问非洲11国时，几内亚的艺术家们曾高唱起《军民大生产》，载歌载舞地热烈欢迎中国贵宾。作为一首优秀的中国歌曲，《军民大生产》已传播到了国外，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优秀歌曲。

《绣金匾》这首歌，不仅在战争年代充分发挥了战斗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更加广泛传唱、妇孺皆知，成为人人喜爱的优秀革命民歌。在数十年的流传过程中，得到人民群众和专业文艺工作者的再创作和再锤炼。1976年，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相继逝世。在这举国哀悼之时，人民艺术家郭兰英怀着悲痛的心情，对《绣金匾》进行了再创作，将第三段歌唱八路军的歌词“三绣八路军，坚决打敌人，消灭了日本鬼，全国享安宁”改为“三绣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鞠躬尽瘁为人民，我们热爱你”，使它变成了一曲饱含深情，怀念毛主席、周总理和朱总司令的颂歌。时至今日，《绣金匾》被众多艺术家以不同的艺术形式搬上舞台，每当人们唱起、听到或看到《绣金匾》时，常常被那感情浓烈、声调婉转的词曲感动得热

^① 韩承：《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载《人民音乐》1979年12月号。

泪盈眶。

同样,《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于1971年和《军民大生产》一起被列入“五首革命民歌”,成为现时期颂歌创作的光辉典范,许多颂歌都是由“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这句话演变而来。而这句话似乎已经不是一个歌名,我们在任何地方都能听到,它已经成为一个特定的词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和它的作者孙万福已永远载入中国民歌的史册之中。

一首歌就是一部史书,一段曲就是一幅画卷,一个音符就是一则动人的故事。在层出不穷、灿若星辰的陇东革命民歌这一艺术的海洋中,璀璨夺目的贝壳是难以捞采完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对它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做更认真的研究和探索,重新审视它在中国革命音乐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因为这些在血与火中诞生的优秀作品已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值得珍视的精神财富,也必将深刻地激励世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附:

1. 《边区十唱》

(领) 四二年那么

(合) 嗨咳,

(领) 大生产那么,

(合) 嗨咳,

(领) 边区的男男女女,

(合) 西哩哩哩哩咳咳咳咳咳咳咳咳,

齐唱员那么嗨咳!

(领) 变工队那么,

(合) 嗨咳,

(领) 磨坊班子么,

(合) 嗨咳,

(领) 劳动团组织,

(合) 西哩哩哩哩咳咳咳咳咳咳咳咳,

齐唱员那么嗨咳!

(领) 劳动英雄么，

(合) 嗨咳，

(领) 起模范呵么，

(合) 嗨咳，

(领) 组织起乡亲们，

(合) 西哩哩哩啦啦啦啦哩哩哩咳，

爬满了山那么嗨咳！

(领) 开荒林那么，

(合) 嗨咳，

(领) 开荒地呀么，

(合) 嗨咳，

(领) 忘事的娃娃们，

(合) 西哩哩哩啦啦啦啦哩哩哩咳，

飞上了山那么嗨咳！

(女) 妇女们呀么，

(合) 嗨咳，

(女) 更不同呀么，

(合) 嗨咳，

(女) 手握着纺车，

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嗨咳，

纺线线那么嗨咳！

(领) 六月里天那么，

(合) 嗨咳，

(领) 热难当呀么，

(合) 嗨咳，

(领) 头戴草帽，

(合) 西哩哩哩啦啦啦啦哩哩哩咳，

汗往下滴那么嗨咳！

(领) 枣红的脸那么，

(合) 嘴咳，

(领) 磨磨子磨呀么，

(合) 嘴咳，

(领) 手拿着锄头，

(合) 西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咳，

把旱锄那么嘴咳！

(男) 三八式那么，

(合) 嘴咳，

(男) 排弹筒呀么，

(合) 嘴咳，

(男) 别别看手榴弹，

(合) 虎里虎磨不拉拉拉齐查查咳，

出了发那么嘴咳！

(男) 手榴弹呀么，

(合) 嘴咳，

(男) 脑袋大呀么，

(合) 嘴咳，

(男) 抽成那一鞭，

(合) 不列列列不列列列不列列列咳，

开了花那么嘴咳！

(齐) 又能武那么，

(合) 嘴咳，

(男) 又能文那么，

(合) 嘴咳，

(男) 人同我什么队伍，

(喊) 一、二、三、四！

(唱) 八路军那么嘴咳！

2 《军民大生产》

解放区那么响呀，
大生产那么响呀，
军队和人民，
西哩哩哩嗷嗷嗷嗷嗷嗷嗷呀，
齐动员那么响呀！

开荒林呀响呀，
开荒地呀么响呀，
不分男男女女，
西哩哩哩嗷嗷嗷嗷嗷嗷嗷呀，
加油干呀响呀！

妇女们呀响呀，
都争先呀么响呀，
手摇着纺车，
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纺线线那么响呀！

自力更生么响呀，
丰衣足食么响呀，
加紧生产，
西哩哩哩嗷嗷嗷嗷嗷嗷嗷呀，
为抗战那么响呀！

又能武呀么响呀，
又能文呀么响呀，
人同我什么队伍？
一、二、三、四！
八路军那么响呀！

3. 《十绣金匾》

正月里闹元宵，
金匾请开了，
金匾请咱毛主席，
领导的主意高，
一扬毛主席，
人民的好福气，
你一心爱我们，
我们拥护你。

二月里刮春风，金匾请得红，
金匾上请的是，
边区陕甘宁，
二请陕甘宁，
世事多大平，
军和民大团结，
大家一条心。

三月里来是清明，
金匾请三层，
金匾上请的是，
模范八路军，
三请八路军，
抗战下决心，
对民众多恩情，
爱国爱人民。

四月里立夏天，
金匾请得宽，
金匾上请的是，
八路军生产，
四请军生产。

比民忙大半，
 夜晚守警戒，
 白天务庄田。
 五月里五墙阳，
 金匾榜的明，
 金匾上榜的是，
 边区老百姓，
 五墙老百姓，
 抗战最热情，
 组织起自卫军，
 打倒小日本。

六月里热气腾，
 金匾榜花云，
 金匾上榜的是，
 民众的劳动，
 六墙民劳动，
 有利有名声，
 行行出状元，
 二流子成英雄。

七月里七月半，
 金匾榜金钱，
 金匾上榜的是，
 妇女闹生产，
 七墙女生产，
 织布又纺线，
 加入识字班，
 要当女状元。

八月里八月半，
 金匾榜得圆，

金匾上绣的是，
边区合家欢。
八样好家常，
卫生身体壮，
全家人都和气，
民主好商量。

九月里九重阳，
金匾绣得长，
金匾上绣的是，
移民上天堂。
九精唯民来，
政府好优待，
老户们帮助他，
吃用有办法。

腊月里天气寒，
金匾十绣全，
金匾上绣的是，
政府恩情宽。
政府恩情宽，
冬学处处办，
有吃有穿有文化，
快活过新年。

4. 《绣金匾》

正月里闹元宵，
金匾绣开了，
金匾绣唯毛主席，
领导的主意高。

二月里刮春风，

金匾榜的挂，
金匾上榜的是，
敬星毛泽东。

一榜毛主席，
人民的好福气，
你一心为我们，
我们拥护你。

二榜总司令，
革命的老英雄，
为人民谋生存，
前过好光景。

三榜八路军，
坚决打敌人，
消灭了反动派，
全国事安宁。

三榜周总理，
人民的好总理，
鞠躬尽瘁为革命，
我们热爱你。

5.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原词)

高楼万丈平地起，
盘龙卧虎高山顶，
边区的太阳红又红，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天上三光日月星，
地上五谷万物生。

来了咱们的毛主席，
挖掉了穷根翻了身。

为咱们能过好光景，
发动了生产大运动，
人人努力来生产，
丰衣足食吃饱饭。

边区人民要一心，
古树开花耀眼红，
千年古树盘了根，
开花结果靠山明。

6.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改编后）

高楼万丈平地起，
盘龙卧虎高山顶，
边区的太阳红又红，
咱们的领袖毛泽东。

山川万里气象新，
五谷生长绿茵茵，
来了咱们的毛主席，
挖掉了穷根翻了身。

自力更生闹革命，
开展生产大运动，
为了革命的胜利，
跟着咱领袖毛泽东。

作者：左快，延安枣园革命旧址文博馆员，延安枣园革命旧址管理处副主任。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民族工作的 实践及历史作用

郭 林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刘志丹、谢子长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坚忍不拔的精神，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在西北地区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同样是创建这块根据地的三大法宝。在西北这块多民族地区，民族工作是革命根据地创建者十分重视并取得良好成绩的工作。虽然它还谈不上丰富和全面，但民族工作的实践，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动员少数民族群众参加反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民族民主革命，走上正确的民族解放道路，发挥了开创性的作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中共中央和陕西省委关于民族工作的指导方针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展民族工作的行动纲领和政策基础。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国家，以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对中国的民族关系问题就很重视。不但承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并把汉族以外，占中国人口 8% 的各民族统称为少数民族，在不同的革命历史阶段，都提出了正确对待少数

民族和解决中国民族问题与宗教问题的基本主张和方针政策。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党的民族问题纲领。鉴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军阀割据混战,边疆民族经济极端落后的情况,中国共产党提出,在尊重边疆人民自主原则下,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成为民主自治邦”^①,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以解决国内民族关系的设想。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提出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中民族问题的双重任务,这就是“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并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组织自由统一(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192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四届一次扩大会议做出《关于蒙古问题决议案》,首次提出民族团结纲领。中国共产党指出,要将蒙古族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全中国的解放运动结合起来”,“联合中蒙农民以反对共同的仇敌”,同时却“不应当淹没蒙古人的民族利益”,并且提出宣传工作上“要注意蒙古人的风俗言语及其他特点”等民族政策。^②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中心开始从城市走向农村。从1927年8月到1934年10月,随着武装斗争的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红色政权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活动日益活跃。尤其是中日民族矛盾逐渐加剧的形势,使党对少数民族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有了深入认识,也更加重视民族工作。中国共产党在前一时期已提出的民族平等纲领基础上,充实了许多新的内容。1928年夏,在莫斯科近郊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制定了《关于民族问题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问题“对于革命有重大的意义”,大会委托中央委员会准备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党的第七次大会时“列入议事日程并加入党纲”^③。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加紧“党在中国境内少数民族中的工作”,“在有少数民族区域的省委,应组织少数民族工作委员会,以管理此事”^④。1931年11月,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年7月—1949年9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

②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年7月—1949年9月),第38、39页。

③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年7月—1949年9月),第87页。

④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年7月—1949年9月),第133页。

全国代表大会做出的《关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决议案》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第一次从理论上详细阐述了党对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表明苏维埃政府反对民族压迫，主张民族平等，承认民族自决自治，支持少数民族反抗帝国主义、军阀、地主、官僚及民族内部剥削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的鲜明立场和态度。提出了设立民族学校，使用民族语言文字，发展民族文化和培养民族干部参与政权管理等实施民族平等纲领的具体政策。这就使党的民族问题纲领和民族政策有了比较清晰的整体轮廓。1934年1月，毛泽东再次阐明苏维埃政府民族政策的出发点是，“争取一切被压迫的少数民族环绕于苏维埃的周围，增加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革命力量”^①，给苏维埃民族工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与目标。同时，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面对“境内少数民族斗争的高涨”，检讨了党在少数民族工作中“不可容忍的薄弱”，要求“党必须加强在蒙古人、回族、苗族、瑶族之间的工作，党必须领导少数民族的民族解放与自立而斗争”。并责成政治局及满洲、内蒙古、陕西、云南、广东、四川省委，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定出各民族中具体工作的纲领”^②。党对民族工作在理论上的深层思考和对具体民族的分析及各项民族政策的提出，对推动党领导下的各族人民反帝反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所在的西北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区，而陕甘宁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回族居多。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在这个地区执行得如何，对于推动西北少数民族解放运动和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也注意到了西北的民族工作。1926年1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西北国民革命军的工作方针中就指出：对回民须有适当的政策，不损害这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生存权利。“对于蒙、回民族问题”，应有适当解决，“应尊重这些少数民族的权利”，^③以引导他们参加全国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斗争。1929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六届二中全会在关于陕西问题的决议，要求陕西党加强回族蒙族中的工作，对于回族与陕北蒙族须扩大民族自决，联合奋斗的宣传，坚决反对国民党军阀屠杀压迫回族蒙族的反动行为，反对民族间一切歧视不平等的待遇，同时亦要领导回蒙民众反对他们的酋长王公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年7月—1949年9月），第210页。

②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年7月—1949年9月），第205页。

③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年7月—1949年9月），第46、47页。

的各种专制特权。^①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和指示，陕西党组织对于民族工作也给予了一定重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陕甘党组织派出大批共产党员到国民党军队中进行兵运工作的同时，对当地回族军阀部队也展开了工作。1932年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做出《关于粉碎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的决议》。《决议》同时也指出各级党组织对于“建立回民工作是边区内丝毫不能放松的工作。根据苏维埃政府的少数民族决议，深入回民中的土地革命和阶级斗争，肃清回民中豪绅地主分子，建立回民的武装组织”，并且肯定“过去游击队对回民工作是有相当成绩”的。^②1932年12月9日，荔店兵暴领导人、陕西省委常委李昆（化名愚痴）在向省委所作的报告中认为：在陕东陕甘边以至甘肃全部发动兵变开展游击战争，必须注意和正确的解决少数民族尤其是回族的问题。应当把“各民族一律平等”和“民族自决”的口号提到最高程度。发动回民的游击战争和组织回民的苏维埃。同时亦必须提出“回汉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打倒回汉民族中的统治阶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③

1932年12月20日，中共陕西省委专门做出《关于西北回民工作的决议》。《决议》揭露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及封建民族上层统治者对回族人民的压迫剥削与欺骗、屠杀，分析了西北回族人民的生活状况与争取民族解放、反对封建压迫斗争的重要意义及失败原因，提出了苏维埃政府的民族工作方针。省委指出，“只有粉碎这一切的欺骗宣传，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回族解放运动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因此，回族劳苦群众解放运动与中国苏维埃运动是不可分离的，而且是争取中国革命彻底胜利的一个主要支柱。”省委要求，在创造西北新苏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粉碎敌人对红四方面军、红二集团军和红二十六军的“围剿”中，必须“千百倍的加紧对于回族劳苦群众斗争的领导”，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创造回民苏维埃和红军”，动员并号召回族及西北其他少数民族的劳苦群众与中国工农群众共同联合起来，去打倒他们的共同敌人——帝

①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52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120页。

③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与少数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第88页。

国主义和一切民族的地主资本家的统治，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省委特别指出在回汉杂居的区域中，在领导工农群众斗争中，必须注意民族下层统一战线的运用，提出各民族的共同和特殊要求的纲领，领导他们的共同和单独的斗争。共同斗争的领导机关和这些区域苏维埃政权机关中间，应当有各民族的代表参加，并且要注意消灭一切民族间的仇视与成见。一切民族间的纠纷应由各民族劳苦群众选举同等人数的代表组织委员会共同解决。要注意群众的宗教信仰，在回民中应当提倡信教自由。省委还要求，在回汉劳苦群众中，必须加紧拥护中国苏维埃政府的宣传，要告诉广大回民群众，中国苏维埃共和国的目的，是在建立一个没有民族界限的国家，是在消灭一切民族间的仇视与成见，中国苏维埃绝对无条件地承认回族的民族自决权。为积极开展回民工作和回民苏维埃运动，必须动员党与群众组织，提高下层同志和群众的积极性，运用群众路线。责成各级党部，特别是西安、陕甘边区、甘肃河州、海原、天水、宁夏之灵武、金积等地，要用各种必要的方法，建立在回族劳苦群众中间的工作，大量的吸收回族劳苦工农群众入党。省委和各地回民及其他少数民族工作的各级党部，在有回民的地方应迅速成立回族委员会或少数民族委员会，坚决引进新的回族的工农干部参加各级指导机关，同时责成各级党部，搜集一切关于少数民族的材料和在少数民族工作中的经验。^①

虽然陕西省委以上这些指示和决议，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在西北的分裂活动揭露不够，对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主要矛盾的形势强调不够，在如何开展民族、宗教统战工作的方针政策方面，还只强调了下层统一战线，对民族宗教上层可以争取团结的一面认识欠缺，等等，如认为红军游击队“对回民中的阶级斗争根本没有去执行，还是和回民中的豪绅地主妥协”^②。但从这些指示和有关决议中，我们看到，陕西党组织基本贯彻了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民族问题纲领，在武装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已经认识到正确解决民族问题，联合少数民族共同斗争的重要意义，已经把民族平等和民族联合共同对敌与武装斗争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联系在一起，提出了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的口号，并对西北民族问题作了实际分析，特别强调回汉民族要联

① 参见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1932年，内部资料，1991年，第406—427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120页。

合团结共同斗争。同时还提出了回汉杂居区政权组织中的民族代表问题，处理民族间纠纷的正确办法和照顾民族特点，大力发展回族党员，培养回族干部，成立少数民族工作机关等许多很实际的民族工作的正确方针，肯定了红二十六军的民族工作成绩。这些对于贯彻中共中央的民族问题纲领，指导陕西北发展陕甘边苏区中加强民族工作，推动回族人民的解放斗争和加强民族团结，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民族工作是伴随着武装斗争进行的。

历史上，陕甘地区是回族聚居区。1862年陕甘回民大起义前，回族遍布陕西各州县，约占全省人口的1/3。宁夏、甘肃东部，尽系回庄。回民大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对回族人民采取了残酷的镇压、迁徙、限制手段，致使陕西和甘肃的回民死亡逃散，人口锐减。民国以后，军阀混战，土匪四起，加上连年灾害和沉重的苛捐杂税，陕甘宁地区的各族群众，一直生活在贫穷落后和闭塞的生活状态中。回族聚居区，阶级分化严重。抗战前，甘宁青三省中，只占人口百分之四的门宦地主占有43%的土地，而占人口百分之五十的贫农，只占17%的土地。^① 马鸿逵统治下的宁夏，苛捐杂税多达70多种，回民中小商人纷纷破产，无地和失地农民更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所以，这里的群众具有反抗统治阶级剥削压迫的强烈要求。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所辖区域和红二十六军及地方游击队活动曾到达的区域，回族比较集中的地方是正宁县的西渠村、龙嘴子村（后改为新正县一区一乡和九乡）。这里地处子午岭山麓，森林茂密，崖高谷深，层峦叠嶂，既是军事关隘，又是游击战争的要地。20世纪30年代初，在正宁县的龙嘴子、西渠两个乡聚居着120来户，300多口回民。^② 其他如宁县、庆阳、定边、合水、华池等地也有回民居住。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正宁是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革命武装活动的中心区域，许多重大事件在这里发生，党的民族政策也在这里得到初步实践。

① 《抗战中的甘宁青》，第207页。

②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中共正宁县委员会、中共庆阳地委统战部编：《陇东党的抗战工作》，1995年，第9页。

1932年1月,刘志丹创建的南梁游击队和南下的陕北游击队,在正宁月朗梁桥子正式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2月,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正宁三嘉塬正式成立,并建立了中共队委会。同年3月,陕甘游击队进驻正宁寺村塬新庄子后,积极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改编民团为贫农团,组建农民赤卫队、农民联合会,成立了寺村塬赤卫军总指挥部。4月初,千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召开,号召贫苦农民参加土地革命,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东至五顷原子,西至永和以西,北至四部河川,南至旬邑,正宁交界地区之内,共计72村”^①的赤卫队、贫农团代表和游击队战士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举行了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亦称寺村塬革命委员会),创建了以寺村塬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在革命委员会组织领导下,群众斗争恶霸豪绅,贫苦农民第一次做了主人。

虽然在寺村塬成立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是它的影响很大。党和红军游击队及革命政权组织的威望,在各族群众中留下了深远影响。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塬发动群众,成立农民联合会、赤卫军和革命委员会时,就派人到龙咀子、西渠发动回民起来和汉族兄弟一起闹革命,打土豪,同时对回民中的小地主区别对待,72村代表中就有回民代表。^②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民族工作,得到陕西省委的赞扬和肯定。省委特别指出:红二十六军在陕甘边区游击运动的开展,更加提高回族劳苦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热烈拥护,打破了一切民族界限,回汉工农群众站在一条战线上,积极的坚决的开展游击战争,为苏维埃政权而奋斗。^③在党和红军民族平等政策的影响下,回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得到很大提高。1932年9月17日,中共陕西省委在《关于陕甘边区反围剿军事工作计划向中央的报告》中写到,在组织边区周围的农民游击队开展游击运动时,“龙咀回民成立1大队”^④。1933年7月,正宁县党小组建立后,积极发展革命力量,正宁接连爆发农民群众自发的武装反抗斗争。同年秋,“龙咀子、西渠一带回民青年王世平、王世英等19人自发组织起回民支队,在陕甘边一带,反抗国民党的压迫”^⑤。这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499页。

② 参见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中共正宁县委党史办、中共庆阳地委统战部编:《陇东党的统战工作》,第9页。

③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1933年,第420页。

④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425页。

⑤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715页。

是陕甘边回族人民的第一支革命武装。

1933年11月初，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举行联席会议后，恢复了红二十六军，并建立了第四十二师。1934年2月25日，以习仲勋为主席的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同时于1934年1月至2月，相继组建了三路游击区和游击总指挥部。第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带领游击队来到正宁县孟家河、西渠一带，与当地党组织共同组建革命武装力量，开辟革命根据地。游击队在五顷塬、孟家河、龙咀子、洞子沟等地领导贫苦农民开展革命斗争”^①。到1934年秋天，第三路游击队发展到一千多人，其中所辖回民支队有43人。^②同年10月，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将回民支队改编为第十六支队，队长王世平，指导员王世英。^③陕甘边南区党委和南区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陕甘边南区的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局面。在组建革命武装的同时，各级苏维埃政府也陆续成立。继五顷塬乡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龙咀子回民乡成立革命委员会。^④回族贫雇农第一次当家做主人，管理自己的事务。1934年11月初，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慕园堡成立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斗争进入了大发展时期。1935年秋冬，龙咀子进行了土地改革，贫苦的回民群众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之后，在扩大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正宁回民支队与其他游击队配合，打了不少漂亮仗。经过全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回民支队锻炼成长、发展壮大，成为陕甘宁边区著名的少数民族革命武装力量。

在论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实践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开展民族工作并取得很好成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与内蒙古毗邻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对蒙古族的民族工作也开展得很有成绩。活动于横山、靖边一带的陕北红军，同与横山、靖边毗邻的具有革命传统的伊克昭盟乌审旗有着友好往来。陕北红军尊重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与乌审旗的蒙古族同胞通过文化、贸易等交流渠道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共产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对广大蒙民和爱国的民族上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34年，陕北特委派曹动之等人，在靖边南山正式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715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576页。

③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716页。

④ 参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743页。

组建一支蒙汉骑兵游击支队，曹动之任队长、吴亚雄任政委。蒙汉骑兵游击支队转战在陕、伊交界的大小石砭、尔林川、城川、白泥井、巴图湾、纳林河、石湾、青杨岔、镇靖及盐池、甘泉、安塞一带。1935年2月，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成立后，实现了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党的领导和军事指挥的统一。西北军委成立了以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的前敌指挥部，统一指挥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和游击支队进行反“围剿”斗争。蒙汉骑兵游击支队归前敌总指挥部领导，参加了攻克靖边、攻打横山、解放杜斯庄、黑峰子等战斗。蒙汉骑兵游击支队英勇善战，连战连捷，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西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大规模“围剿”立下了战功。7月，西北红军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6座县城后，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在西北高原上把汉、蒙、回各族人民团结在党的旗帜下，有力地推动了西北革命斗争和抗日斗争的发展。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前，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的民族工作遥相呼应，相互支持，使党的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中得到贯彻执行，使回、蒙族群众初次看到了少数民族争取解放的正确道路。

三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民族工作成就，具有开创性历史作用。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少数民族并不多，根据地的发展壮大经历了血与火的磨难和考验，红色区域的发展是在粉碎敌人无数次的“围剿”、破坏中才得以巩固的，频繁战争环境使得党和红军、游击队及地方革命政权，不能留下更多的历史资料。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有关党和红军在陕甘边开展民族工作的比较详细的资料很少，以上的论述必定很欠缺。但是，从这些还很系统的资料中，我们已经看到，开创西北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的先辈们是怎样用他们的不懈努力和兄弟情谊，帮助回族同胞反抗阶级压迫、争取民族平等和自身解放的。党和红军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开展民族工作的实践，其历史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第一，党和红军在陕、甘交界的民族聚居区第一次宣传了民族平等、信仰自由和回汉一家的民族政策，支持和帮助贫苦回民建立了革命武装力量，

并且将回民的自发斗争引导到党的领导下，使他们的斗争与土地革命和创建苏维埃紧紧联系起来，使回民同胞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解决中国革命总问题中，才能实现本民族的解放。龙嘴子等地的回族群众从红军游击队的行动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认识了工农革命的意义。他们热爱红军游击队，处处帮助红军游击队。龙嘴子的回民群众看到在同敌人作战中失散的红军战士，“马上把他请到家里弄吃喝，服侍他们”。“有一次，在和敌人作战中，一个同志在一个地方压着，拿来十几个农民各持刀斧等农具，问这一同志是干什么的？这一同志在惊慌中只得答是红军，以为这一下就完了，但是农民却说好，好，我们就帮助你。”^①但看到追赶红军的白军，就拿上锄头捧着打。回民群众对党和红军的感情说明他们相信共产党，相信刘志丹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是为回民解放而斗争的，因此他们愿意一直追随红军，坚持武装斗争，并成为保卫革命根据地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的行动，无疑是对党的民族政策的最好宣传，同时也影响着陕甘宁交界地区的广大回族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正确的认识，回民群众不断移入边区生活。

据1940年10月陕甘宁边区召开回民第一次代表大会时的资料显示，以新正县一区一乡第一、第三行政村历年来回民人口变化情况为例，这两个行政村，民国元年7至7年有3家回民；民国8年有10家；民国18年至27年增加到40余家，民国28年是70余家；民国29年增加到204家。从这个资料中可以看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也是回民人口增加最快的一个时期。边区回族人口的增加，无疑证明了党和红军的威信在少数民族中不断增长。这对于壮大革命力量，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土地革命，建立民族政权的实践，为以后西征红军和陕甘宁边区开展民族工作，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积累了初步经验，打下了良好基础。

党和红军不仅在龙嘴子等地组建了回民自己的武装力量，而且发展了党员，在回民乡成立革命委员会，进行土地分配，“过去没有土地，或缺少土地的回民，都分得了土地和牛羊”^②。尽管作者现在还没有看到确切的资料能够说明，龙嘴子回民乡是回民自治乡，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属于民族自治政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130页。

② 民族问题研究会编：《回回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23页。

权，但是可以肯定，回民乡革命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是以回族为主的，它是回民自己的政权。回族劳苦群众建立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力机关，这在土地革命时期的西北地区是第一个，是个创举。它告诉人们，回民群众可以自己管理好自己的民族事务。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后，党的民族工作进入了大发展阶段。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发表后，党便在西征红军解放了的宁夏豫旺、海原、固原等回民聚居区进行了建立回民自治政权的尝试。1936年10月20日，明确冠以“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民族自治政权建立，并且发布《回民自治政府条例》、《土地条例》等法规，自用刻有党徽和中文、阿拉伯文的政府印章，回民马和福任自治政府主席。“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以民族区域自治方式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重要尝试。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党的民族工作有了很大发展。从国民党统治区迁入和来到边区的少数民族日益增加。新正县龙嘴子、西梁一带老解放区的回民最多。1940年发展到150多户430多人。到1941年11月，边区召开第二届参议会时，据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统计资料，新正县有回民727人。^①1941年5月1日，《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发布后，边区政府实行了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逐步建立两个相当于边区一般“区”的回民自治区〔新正县回民自治区（包括一区一乡和九乡）和定边县回民自治区〕和两个相当于一般“乡”的回民自治乡。边区政府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为自治区、乡的回民群众整修或新建了清真寺。回民自治区、乡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发生了质的变化。边区的民族关系、宗教关系出现了和谐发展的新局面。这对于边区的稳定发展和扩大党在全国少数民族中的影响，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奋斗，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为全国树立了民族团结共同抗日、共同发展的光辉榜样。其中，无疑凝结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时期开创性民族工作积累的实践经验和打下的良好的群众基础。

作者：郭林，女，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年7月—1949年9月，第949页。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及其特点

柯登科

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曾经把它上升为党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结合本地特点和自身实际，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努力探索、实践，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本文试就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及其特点作粗浅分析。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同革命武装和根据地建立同步开始的。主要工作有四个方面：一是开展兵运；二是利用军阀矛盾并借助其他关系保护革命力量；三是开展对少数民族的统战工作；四是争取政治倾向不十分明确的土匪和杂牌军阀以及哥老会与红色武装保持中立。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走上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道路。中共陕西省委也明确做出在地方军阀部队中开展兵运，争取兵权，准备起义的决议，号召共产党员到兵营中去，到士兵中去，学习军事，争取改造旧军队，发展革命武装力量。随后，刘志丹、谢子长等一大批共产党员深入旧军队和各式旧武装力量之中开展工作。当时，党的基层组织还对共产党员到旧式武装中

去干什么作了讨论。”党组织认为一定要当兵，同士兵结合，才能把党的工作做好。”^①当时，陕北特委派入打入陕北高白清、杨庚午，陇东谭世麟，宁夏苏雨生等部队，还派杨琪等人进入蒋骝保卫队中。

进入各种旧式武装中的同志，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做上层的工作，争取掌握兵权，千方百计联络士兵的感情，扩大党员在士兵中的影响力。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刘志丹三道川建军，“太白起义”，收编李培霄饥民武装，建立南梁游击队等，初步建立起了革命武装力量，这是陕甘边区党组织在兵运方面实践统一战线所取得的初步成功，为以后发展革命力量，建立革命政权积累了重要的经验。

进入创建陕甘边区红军和根据地阶段，陕甘边区党组织的统一战线工作重点转移到利用各种关系保护革命武装、扩大革命力量方面。1931年10月下旬南梁游击队与晋西游击队会师后，部队缺少吃穿，又缺少枪支弹药，也没有安全的安身之地。游击队领导人刘志丹等决定暂时将部队隐藏在陇东地方军阀陈珪璋，取得新编十三师第十一旅番号 and 防地，并得到陈珪璋部拨发的棉衣、枪支弹药。

黄龙山土匪梁占奎手下营长郭宝珊，早在1932年时就与刘志丹有交往，经中国共产党不断教育争取，1934年10月20日起又加入红军。这次起义，是陕甘边时期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成功范例。起义不但壮大了革命力量，而且给以后以兵运为内容的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多方面的成功经验。

这一时期，陕甘边党组织对少数民族的统战工作也开展起来。早在1929年中共陕西省委就要求加强对回族的工作。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就在正宁县龙嘴子、西渠两个乡发动贫苦回族群众闹革命，打土豪，分财产。在召开农民代表大会时，回族代表与汉族代表享有同等的权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采取对回民中的小地主区别对待的政策，十分成功。

陕甘边特委和各地的党组织、红军、游击队十分重视争取部分土匪、哥老会、红枪会等与红色武装保持中立。比如，正宁县西渠是红军南下北上的必经之路，当地有一位势力较大的哥老会大爷陈某，周围很多土匪、民团和哥老会头目都敬畏他。中国共产党经过多方努力，与其建立了较好的关系，不但红军、游击队可以顺利通行，而且一些党政军负责人还在他家住宿。有

^①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14页。

的民团武装头领和士兵，经过中国共产党做工作，还加入了红军队伍。

为了打破敌对势力在经济上的封锁，活跃苏区经济，党和红军还保护来往区做生意的白区商人的利益，规定一元苏币兑换一块银圆，因为当时国民党货币贬值得很厉害，这一规定对白区商人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使边区与白区商人建立了良好的贸易关系。为了吸引白军士兵脱离反动派阵营，边区政府在土地分配政策中规定，给白军士兵也分土地，但是，在白军士兵脱离反动阵营回归苏区以前，应分部分暂时作为公田。

上述统一战线政策的实行，对保存革命力量，发展革命力量，建立和巩固革命政权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作用，也对以后的统一战线工作带来很多有益启示。

二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虽然带有很大的尝试性、探索性，但是，由于刘志丹等同志“抓得很紧很精细”^①，统一战线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也呈现出独有的特点。

特点之一：统一战线思想方面，把贯彻上级精神和大胆创新结合起来。统一战线是争取人心、凝聚力量、扩大同盟的工作。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环境十分复杂，各种武装力量犬牙交错。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苟且偷生，又不能到处树敌。党中央对陕甘边地方党组织如何开展对士兵、土匪、哥老会和少数民族的统战工作思想明确，认识深刻。《中共中央关于陕西党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指出：要加紧对士兵的工作，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以争取广大的士兵群众，使之与工农斗争结合起来，具体工作上要“深入一切反革命军队士兵群众中去”，争取士兵；对土匪、哥老会的争取，还要“确立党在里边的领导地位”。对回族等少数民族的统战工作，要加强“联合奋斗的宣传”，“反对民族间一切歧异不平等的待遇……在以回族士兵为主要成分的部队中，……要特别加紧工作”。陕甘边区党的领导人，不但对中央的部署认真贯彻，而且结合实际灵活运用，总体上看基本是坚持了“需要争取的就争取，能争取的就争取”的思路。当时，陕甘

^① 蔡子华：《中共党在陕甘边的统战工作》，载《中共陕甘边区党史办、中共正宁县委员会、中共兴山县委统战编：《陕东党的统战工作》，1993年，第413页。

边境的特点是：地方杂牌军队多，民团多，土匪多，哥老会多。刘志丹、谢子长等根据省委指示，采取阶段分析方法，区别情况，灵活开展统战活动，不但成功打入各种旧式武装之中，而且成功争取了士兵，掌握了部分领导权，一旦时机成熟，就发动起义，建立革命武装。特别是他们对“不反对红军”的开明绅士实行团结，对“回民中的小地主区别对待”等统一战线思想，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是难得的创新，也是很成功的。

特点之二：统一战线策略方面，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陕甘边交界地区，旧式武装力量各种各样，有地方杂牌军队、民团、土匪、哥老会，等等，他们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政治面貌复杂且多变。刘志丹、谢子长等根据这种情况，一方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原则、立场和观点，另一方面，广泛利用亲戚、朋友、师生、同学、同乡等各种关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刘志丹本人曾经争取到保安县民团团长、宁夏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第八旅第十六团副团长、陇东地方军阀陈珪璋部第十一旅旅长等身份，也和哥老会大爷拜把子……这些对于发展革命力量特别是保存革命力量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为了培养军事干部，陕甘边区党组织没有采取简单划一的办法，而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置。用各种关系进入旧军队的同志，有的当军官，有的当士兵。还在苏雨生部第八旅第十五团成立学兵队，张秀山、高鹏飞、贺晋年等几十个党团员都在这里接受了学习和锤炼。

对于土匪武装，陕甘边特委和边区政府采取了分化利用和改造的方针。能够争取改造的尽可能争取改造，民愤太大的则下决心消灭之。鉴于南梁地区哥老会极多，团结他们则是我们不容忽视的一项工作。对哥老会的统一战线工作，方法更加灵活，能使其保持中立的争取保持中立；能使其为我所用的为我所用；能引导其进步的争取一切条件促其进步。哥老会大多数都和我们拉上了友好关系……^①

特点之三：统一战线工作方面，把探索性与务实性结合起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从搞兵运起步，在利用旧式武装派系的矛盾中实现了保存革命力量、发展革命力量的目的。事实上，在革命武装还很幼稚，敌强我弱，各种武装力量犬牙交错的情况下，隐蔽、求生并获得发展壮大，必

^① 参见整子伟：《中共党在陕甘边的统战工作》，载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中共正宁县委员会、中共庆阳地委统战部编：《陇东党的统战工作》，第416页。

须依靠成功的统战活动。虽然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从总体上看尚处在探索阶段，面对许多复杂的情况，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全体同志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他们只能根据具体情况和环境独立探索，但是，从后来实践的结果看，他们的统战工作很务实，效果明显。譬如，在兵运工作初期，他们派一些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利用一切机会进入旧式武装中，发展党的组织，宣传、教育，争取士兵群众，一旦时机成熟，即举行武装起义。正因为军队中的统战工作很务实，他们不但成功组织了一次次武装起义，建立起了革命武装，也培养训练了从事武装斗争的干部。革命武装建立起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以保存革命力量为重，先后把部队挂名在苏雨生、陈珪璋名下，既克服了当时的困难，又取得了一些物资装备，可谓一举多得。又譬如，争取白区商人到苏区经商，给白军士兵分配土地，对与我们有合作关系的开明地主采取少收土地等政策和做法以及对民团、哥老会、土匪、地方军阀的许多统战策略和措施，也都很务实，很有创造性。

陕甘边区党政组织、游击队领导人成功地运用了统一战线策略，也形成了他们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特点，使得统一战线对革命发展及以后建立革命政权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扩大我们党的政治影响；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积极因素，化被动为主动；积累经验，为以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提供有益的启示等。今天我们研究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有关问题，也应该对老一辈革命家在统一战线方面所做的工作进行挖掘、整理，弘扬他们求真务实、勇于探索、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何登科，中共甘肃省庆阳市委党校副校长，副教授。

论红军西征在宁夏回民聚居区开展民族统战工作的历史经验及其深远影响

郭全志

1936年5月，为了打退蒋介石军队对陕甘苏区的围攻，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军会师，并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党中央决定组建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第二十八军、第八十一师及骑兵一团，向甘肃、宁夏进军，进行西征作战。西征红军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高度重视和大力开展民族统战工作，成功地在宁夏回民聚居区团结了广大回汉族群众和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团结了东北军及一切抗日武装，打击了马鸿逵部队，开拓了宁夏革命局面，将陕甘苏区扩充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保卫和巩固了新生的全国革命大本营。这一伟大胜利，对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以及对宁夏人民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红军西征前，陕甘苏区正处于比较危急的军事境地。当时，蒋介石仍坚持其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拒绝议和，继续调兵遣将，对陕甘根据地形成包围态势。陕甘革命根据地东有晋军阎锡山部驻黄河以东；东北有中央军汤恩伯

部驻清涧、绥德、米脂地区；北有井岳秀、高桂滋部驻榆林一带；南有东北军张学良部和西北军杨虎城部驻洛川、宜川等地；西有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驻陇东；西北有马鸿逵部驻宁夏。敌人从四面包围陕甘革命根据地，并采取蚕食政策，先后侵占吴堡、佳县、绥德、清涧等地，逐步缩小包围圈。在此情况下，党中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毅然决定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陕甘宁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进行西征。

然而，红军西征进入宁夏，不仅面对着强大的军事对手，而且也遇到了十分复杂的民族矛盾问题，无论军事、政治形势都是非常严峻的。

在军事上，与红军直接对垒的主要是地方军阀马鸿逵的部队，还有东北军的一个骑兵军和第六十七军等部。特别是军阀马鸿逵，是宁夏的土皇帝，为了巩固在宁夏的封建割据势力，借“抗日”四处抓兵，借“防共”拒绝兵力外调。在不足70万人口的宁夏，养兵近10万。部队号称“马家军”，比较野蛮、凶悍，尤其骑兵作战能力较强。马鸿逵又是一个军阀出身的酷吏，担任国民党宁夏省政府主席后，多年来对共产党人和同情革命的进步人士实行残酷迫害、血腥镇压，妄想用灭绝人性的恐怖手段威慑群众，扑灭革命，并鼓动其所属部队对马家至死效忠，与红军血战到底。

在政治上，宁夏地区民族关系复杂，历史上造成的民族创伤尚未愈合，马鸿逵又险恶地挑起新的民族矛盾，给西征红军进入宁夏设置了严重的鸿沟与障碍。

宁夏是中国最大的回民族聚居地，回民遍及全区，尤以在西吉、海原、固原和同心地区最为集中。在漫长的旧社会，回族的生存史也是一部血泪史。回族人民除受到阶级压迫之外，还屡受民族压迫。清朝同治年间，西北地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回民起义，遭到了残酷镇压和血腥屠杀。事后，几万名回民从陕、甘和宁夏内地被迁赶到宁夏东南部山大沟深、土地贫瘠的偏僻地方，回族人民长期疾苦不堪。国民党统治期间，又继续实施民族歧视政策，不承认回民是一个独立的民族。长期以来，由于受到民族歧视和国民党反动军队的蹂躏，回族群众对汉民，特别是对汉民军队成见很深。虽然1935年红军长征时，曾经过宁夏部分地区，在当地群众中有一定影响，但西征红军入境前，国民党宁夏军政当局一方面加强军事设防，一方面利用民族宗教问题，进行造谣诬蔑，蛊惑群众，又造成了一些新的民族矛盾和隔阂。如他们在各县建立了专门诬蔑红军的“宣传团”，在回民群众中散布红

军是“依不里斯”（魔鬼）、“红军一来，要‘杀回天教’”、“共产党要实行‘共产共妻’”等谣言；还起劲地宣传红军抓了回民俘虏，要一律杀头，妄图煽动回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恐怖、仇恨心理。因而当听到红军西征入宁的消息后，不少回族群众心存疑虑，产生恐慌情绪；有的担心红军走后，马家军卷土重来，“秋后算账”，不敢接近红军；有的青年男女逃往深山野外，躲藏起来。这种严重的思想隔阂和障碍，给红军在宁夏回民聚居区执行作战任务、开展革命活动造成了很大困难，也为红军做好民族统战工作提出了新的重大课题。

二

在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中，统一战线始终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红军之所以能在宁夏回族地区战胜困难险阻，消除民族隔阂，转变敌我态势，实现挥师西征的战略目的，获取西征作战的重大胜利，与红军在整个西征过程中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统战政策，创造性地卓有成效地做好民族统战工作息息相关。

通过回顾和研究这段历史，笔者认为，红军西征在宁夏开展民族统战工作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全军上下思想统一，高度重视做好民族统战工作

在西征前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提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日程。毛泽东在西征誓师动员时，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西征的三大任务，即：扩大新根据地，扩大红军，打击马鸿逵、马鸿宾的封建势力。以此来促成我陕甘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我们与东北军、西北军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① 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几次下达政治工作指示，都明确提出：“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工作，是我们西征中的战斗任务之一，是和我们消灭敌人战斗任务一样重要。”^②

层层传达和反复宣传教育，使全军指战员明确了西征的战略目的和指导

① 《聂荣臻回忆录》（上），第316页。

② 中共宁夏组织史资料编辑组编：《中共宁夏地方史简编》，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7页。

思想，提高了对做好民族统战工作的认识。全军各部队无论是做群众工作、回民工作、白军工作，都是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在制定和执行各项政策上，也本着有利于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作了严格的政策规定。如在回民区，一般连队均无打土豪之权，一律由政治机关协同地方政权统一办理。为了争取全民族团结抗日，对回民地区的开明地主将没收改为募捐抗日经费的方式，对其中能够拿出粮食支援前线的人，红军还可赠送“团结御侮”的锦旗予以嘉奖等。在回民工作中，部队又明确提出反对大汉族主义，承认回民的民族自决权。对尊重回民风俗习惯等，也作了更严格的规定。为了切实做好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在入宁前，部队就自上而下介绍了东北军的情况，进行了争取东北军抗日救国的教育。为了有利于展开政治攻势，在情感上与东北军产生共鸣，各部队还普遍教唱了《流亡三部曲》、《打回老家去》和《五月的鲜花》等歌曲。并熟记了一些政治鼓动口号，排练了一些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上述措施的实施，有效地统一并提高了全军的思想认识，为做好西征中的民族统战工作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 发挥党的民族政策的强大威力，建立西征红军与回族人民的血肉联系

中国统一战线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联盟，另一个是全体劳动者同一切可以联合的非劳动者的联盟。而第一个联盟是统一战线的主体和基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西征红军在宁夏回民聚居区，始终把认真宣传、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教育红军战士牢记红军根本宗旨，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感召回族群众，消除民族隔阂，密切军民关系，发动、组织回族劳动群众同情革命，支持革命作为首要任务。

党中央、红军总政治部和西征红军总部对做好宁夏回族地区的工作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部署。在红军西征出发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了《对回族人民的宣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阐明了民族自决、民族平等和民族解放的原则和方针。红军总政治部颁发了《关于回民工作指示》，强调西征红军要把党对回

民工作的各项方针政策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严格遵守，以便争取军事、政治斗争的胜利。并规定了红军进入回民区的“三大禁令、四大注意”，即：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讲究清洁、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不准乱用回民的器具、注意回汉两大民族的团结。

红军各部队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了《关于回民工作指示》和《红色中华》报刊登的《回民工作问答讲话》。由于深入进行宣传教育，广大指战员把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严格遵守回民风俗习惯变成了自觉行动。在进入回民地区后，根据回民爱清洁的特点，红军帮助群众打扫街道和院落。在紧张的征战中，红军战士宁肯挨饿受冻，夜宿街头，也不入户扰民。红军进驻同心（当时县名豫旺）后，彭司令员带头不吃大荤，并把司令部设在豫旺堡的一座破庙里。有一位名叫马占才的回民老乡丢了马，彭司令员与红军战士打着手电、举着火把，连夜找到马匹，交还失主。红军首长爱民的故事很快传遍了同心山川。回民地区大都严重缺水，当地群众视水为宝，把雨水、雪水储存起来，贮在“水窖”里。红军各军团都提出要求，决不与民争水。一盆水，往往是几个人甚至几十人先用于洗脸，然后再轮流烫脚。在固原七营川、清水河一带，有些村庄村民饮用水，要到十几里以外的山下去挑，红军就实行了“满缸水”活动。同心地下水是苦水，有“水贵如油”之称。同心城内有一口水井，叫“官井”，因年久无人掏挖，水量不足，也很不卫生，群众常为吃水发愁。红军就掏挖了这口井，并新修了井口。掏过的水井，水又旺又甜，当地群众很高兴，把这眼井改名叫“红军井”。

红军每到一地都召开阿訇会、积极分子会、群众会，反复宣传讲解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各部队还选派干部、战士深入村庄各家各户开展宣传动员工作，并在大街小巷张贴标语口号，进行宣传鼓动。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使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加之红军纪律严明，关心群众，热爱群众，真心实意地为回族人民服务，回族群众逐渐消除了对红军的思想疑虑和隔阂，同红军官兵逐渐熟悉起来，亲热起来。有的回族老人主动帮助红军写标语，做宣传工作。有些回民群众主动为红军做事，并给红军送来了大批军鞋和粮食。王团庄解放后，群众像过年一样欢腾雀跃，高兴地唱起了欢快的歌曲。有首歌唱道：“滚滚乌云风散，红军来了见晴天，家家户户住红军，回民

红军亲又亲，回汉人民是兄弟，团结起来打日本”^①。过去回民群众怕见兵，也最怕被抓去当兵。许多回民青年看到红军好，真正是人民自己的队伍，纷纷自愿报名参加红军。同心羊路村有两个回民青年（兄弟二人）“夜行百里当红军”，一时传为佳话。

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和民族政策感召下，西征红军和当地回族劳动人民建立起了水乳交融的血肉联系，红军的军事行动得到了广大回族群众的全力支持，从而奠定了西征必胜的深厚的群众基础。

3. 抓住少数民族地区统战工作的关键，大力做好民族宗教上层工作

中国共产党同少数民族中爱国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是中国整个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由中国的具体条件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特殊情况决定的。回族群众信奉伊斯兰教，宗教意识比较浓厚，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对他们的思想与行为影响很大。特别是伊斯兰教在宁夏历史悠久，传播广，影响大，教派、门宦繁多，民族宗教关系十分复杂。因此，大力做好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工作，对于开辟回族地区的工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西征红军进入宁夏境内后，通过内线传递消息、积极分子做工作、红军代表登门拜访等形式，逐步沟通了与当地宗教界人士的关系。与回族上层人士接触时，一般各级部队首长亲自出面洽谈，并主动到各清真寺赠送锦幛，进行宣传。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等领导同志都非常重视做穆斯林上层人士的工作。彭司令员在海原县吊堡子驻地，经常邀请当地伊斯兰教伊合瓦尼教派的李阿訇到司令部作客，还把一位回民木匠送给他的精制木床送给这位阿訇，两人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为了团结回族上层人士，红军曾几次把一些有名望的回族老人和阿訇请到部队，给他们反复讲解红军一不派捐款，二不催粮草，三不拉夫抓丁，在宁期间，决不骚扰百姓。这种做法对稳定回民地区的人心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征红军经过同心时，红十五军团多次派干部到敌占区洪家岗子拜访八

^① 《红旗漫卷》，宁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页。

十高龄的伊斯兰教虎夫耶门宦教主洪寿林。经过宣传，这位老教主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救国教民的主张表示理解和支持。一次，两位红军代表来到他家，被国民党民团发现。洪教主深明大义，怕红军代表被敌人抓去，就把这两个红军藏在自己的“禁房”（教主修心盘道的净地，任何外人不得入内）里。洪教主白天亲自给他们送茶送饭，倒大小便，晚上与红军代表亲切交谈。红军的言谈引起了教主的共鸣，他感动地说：“红军是顺民之师，必定胜利！”红军代表在他家住了七天七夜，最后为安全起见，他把两位红军代表打扮成阿訇模样，派人护送回部队。此后，洪教主经常给教民宣传红军是穷苦人民的军队，并动员回民给红军送粮送草，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红十五军团为了表彰和感谢他，以政工部长唐天际等人的名义给他赠送了一面上书“爱民如天”四个大字的锦旗。他心情十分激动，请人赶制了一面锦旗，亲笔题词，送给红军，并特备两箱蜡烛，送给红军领导照明使用，寓意红军为“太阳之光，普照大地”。

西征红军通过做好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工作，在广大穆斯林群众中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作用。在党的民族宗教统战政策光辉照耀下，回民地区的民族宗教界人士逐步理解红军，支持革命，为红军开展工作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4. 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帮助回族人民组织革命武装，建立红色政权

开拓宁夏革命局面，创建新的根据地，是红军西征的战略目的之一。西征红军为了尽快在回民地区顺利开展工作，最广泛地发动群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首先大抓了回族干部培养工作，并组建了回族的革命武装。西征各部队以团为单位成立了回民工作团。红一军团成立了回民教导团，配备了受过党校教育的回民干部任教，培训回民工作干部。红十五军团经西征总部批准，成立了回民独立师，由回族干部马青年和欧阳武分别担任师长和政委。彭德怀司令员非常关心这支部队，亲自给回民独立师布置任务，传授带兵经验和工作方法，使这支部队成长很快。回民独立师进军宁夏后，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政策，发动群众，剿灭土匪，维护治安，巩固革命政权，深得回、汉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西征红军所到之处，都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组织领导当地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开展民主革命斗争，并积极做好建立红色革命政权和地方武装的工作。还帮助回民群众，成立回民联合会、回民解放会、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在西征中，红军解放了宁夏的盐池、固原、同心、海原、西吉等广大地区，首先普遍建立了区、乡基层革命政权，接着建立了盐池、豫旺、固北三县苏维埃政权。还根据毛泽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关于“凡属回族的区域，由回民建立独立自主的政权”的原则，帮助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县级回族自治政权——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由当地回族农民马和福任自治政府主席。自治政府的建立，是西征红军认真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是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回民聚居区的第一次尝试。当时，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曾向全国、全军和各地回族教主名流以及土耳其代表韩德发出通电，^①对于团结全中国各民族抗日具有一定的号召力。自治政府成立后，除发动群众搞好生产，协助部队剿匪肃特、维护治安外，在短短的两个多月里，就动员了300多名回汉族青年参加了红军，还为红军筹办了200多石粮食和400多件皮衣，有力地支援了红军的战斗行动。党和红军解放了回族人民，回族人民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红色政权、热情支援红军，这是取得西征胜利的重要保证。

5. 把统战工作与军事斗争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做好争取、团结敌军工作

争取、团结东北军及一切抗日武装，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是红军西征的又一战略目的。西方野战军政治部指出：“使每个指战员深刻的认识：要争取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不仅仅是依靠红军打天下，而且要争取白军到我们这边来。”^②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变化，西征部队中军团和师政治部的敌军工作部门均改称为抗日战线工作部（科），连队建立抗日战线工作小组，从上到下，形成了严密的组织体系。全军上下思想统一，目标明确，都把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作为军事斗争的重

① 《红色中华》报1936年10月22日。

② 《聂荣臻回忆录》（上），第310页。

要指导思想。

争取东北军是当时工作的重点，红军主要采取了以政治争取为主的做法。刚接触时，东北军对红军有所轻视，有时还有一些主动性的局部摩擦行为。遵照毛泽东《关于西征战役的作战原则》，^①在六盘山附近，红军与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第一师和骑兵第六师接过火，消灭过他们的几个骑兵连，用红军英勇善战的军事行动给广泛的多层次的统战工作铺平了道路。为了粉碎蒋介石部队对陕甘苏区的围攻，争取、团结东北军及一切抗日武装，彭德怀司令员指示红一军团对被俘官兵以礼相待，进行宣传教育后，归还所有武器弹药，并全部予以释放。大部分被释放的官兵，感激得热泪盈眶。此后，红军还在两军阵地前唱《流亡三部曲》、《打回老家去》等歌曲，并主动前去拜访东北军官兵，宣传抗日救国、一致对外的道理。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多次前往守敌骑兵第六师军营，直接拜访白凤翔师长，与东北军达成了互不侵犯、共同抗日救国的秘密协议。协议形成后，驻守在清水河两岸的红军与东北军，形成了一条奇特的战线。每当蒋介石命令东北军进攻红军时，东北军立即先通报红军部队，然后双方朝天空放枪，往山沟打炮，用真枪实弹打热闹非凡的“假仗”。在9月18日这一天，红军与东北军在固原县杨郎镇召开了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紀念大会。会上双方部队官兵共同振臂高呼：“打回东北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日救国的热忱融为一体。

地方军阀马鸿逵及其部队以凶残著称。红军同样顾全大义，又打又谈，在军事斗争中不忘统战工作，有效地争取、瓦解了敌军。在红军包围豫旺县城下马关后，马鸿逵部骑兵营长孔庆福和伪县长董天祥率骑兵和壮丁队死守。马鸿逵亦从银川派飞机前往助战。红军围城两个星期，相持不下。红军向敌军喊话，解释党的政策与主张，城外回、汉族群众也向守城部队和壮丁喊话说：“红军对老百姓好得很！”劝他们不要为敌人死守。最终，守敌纷纷起义，献了城池，只有个别顽固军官逃跑。

在西征中，红军正确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顾全民族大义，把统战工作与军事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有效地争取并团结了东北军和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化干戈为玉帛，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①《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史料》，第31页。

三

从1936年6月至12月，西征红军在宁夏回民聚居区转战半年之久，进行了十多次大的战斗。在这段时间里，红军所进行的民族统战工作，决策正确、形式生动、内容创新、层面广泛、工作深入，不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民族政策深入人心，引导广大回、汉族群众积极向往革命，坚定地跟党走

红军遵照党的指示，在西征期间，忠实、积极地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全心全意为回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去工作、去战斗，用生动、具体、令人信服的事实在宁夏人民心中构筑了一座高大的丰碑，使他们在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鲜明对比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回族人民才能获得解放。红军走后，党的民族统战政策在当地回、汉族人民心中深深扎根，始终以强大的感召力，呼唤着人们走红军的路，跟着共产党走。1936年11月豫海回民自治政府遭到敌人破坏后，一万多回民群众不堪宁夏封建军阀马鸿逵的压榨，陆续沿着红军所走过的道路到陕甘宁边区安家落户，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海原、固原一带是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长征经过和1936年西征时战斗过的地方，当地回、汉族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非常敬仰和向往。红军长征、西征时播下的革命火种一直在熊熊燃烧，反蒋反马斗争从未间断。1939年1月至1941年5月先后爆发了三次回民武装起义。这三次起义虽然没有中国共产党组织的领导，但起义中提出的“成立回民独立军”、“回民单独组织自己的抗日武装”、“成立回族自治政府”等政治口号，显然是受到当年红军政治主张的启发和影响而提出来的。在第三次起义失败后，起义领导人马恩义等人率领起义军余部，毅然投奔陕甘宁边区，后组建为边区联防司令部抗日回民骑兵团，在保卫边区和转战陇东高原的战斗中屡建战功，充分展示了党的民族统战政策的强大威力。

2. 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红军同东北军、西北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引发西安事变的一个重要动因

红军西征之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向华北进攻，企图灭亡全中国，民族矛盾上升，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反人民政策。这一政策不仅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进步力量的反对，在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也引发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冲突与斗争。西征红军根据党中央的正确决策，紧紧把握斗争的主动权，对敌军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防止“豆箕之争”，有效地团结了东北军、西北军，化敌为友，与对方构成了潜在的抗日联盟，使“剿共”的东北军转化成为红军的同盟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也促使国民党一些高级将领觉醒。1936年上半年，红军已经同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西北军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协议。从10月起，张学良的主要助手王以哲就与彭德怀司令员天天通电交递，与红军的往来日渐密切。他还把自己所辖部队和胡宗南等部的进军路线、行进时间通报给彭德怀。张学良部与红军的密切交往，使东北军官兵的抗日要求日渐强烈。加之红军在山城堡战斗中取得伟大胜利，使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更加坚定了与红军携手抗日的信心。张、杨出于爱国热情和对蒋介石倒行逆施的激愤，为了逼蒋抗日，毅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次事变直接推动了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为党的民族统战工作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3. 为宁夏地区的民族统战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形成了优良传统

红军西征在宁夏回族地区开展民族统战工作的伟大实践，在当地干部和群众中有口皆碑，为中国共产党后来在宁夏地区开展民族统战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与形成宁夏地区民族统战工作的优良传统关系极大。

在西征红军开拓的民族统战工作的基础之上，从解放前的宁夏地下党组织，到参与解放宁夏的各部队，都很重视做好民族统战工作。宁夏解放时，十九兵团领导就曾组成以伊斯兰教界知名人士郭南浦为团长的和平代表团，

先期赶赴宁夏，向宁马当局和有关人士转达和平解决宁夏问题的诚意，解释有关政策，促成了国民党军第八十一军光荣起义。宁夏解放后，各级党政领导也很重视民族统战工作，在各级政府、人大和政协给民族宗教上层代表人士安排了代表席位和领导职务，并注意同他们交朋友，真诚倾听他们的意见，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予热情帮助。每逢回民重大节日，党政领导按当地风俗习惯前去清真寺祝贺，表达党和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关怀，密切了同民族宗教界人士的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自治区第九次党代会以来，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加快宁夏的建设与发展，自治区党委进一步增强与各民主党派和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合作意识，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维护民族地区的团结稳定，促进民族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重大战略性问题上开展了多层次的协商对话，谋求共识，受到了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欢迎。

宁夏的绝大多数民族宗教界人士，由于西征红军开展民族统战工作的影响，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他们拥护党的领导，进行正当、合法的宗教活动，宣传有关政策法令，对宁夏地区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同心伊斯兰教虎夫耶门宦教主洪清国，他父亲洪寿林逝世时，把西征红军赠送的锦幛交给他说：“我留给你红军的这面锦幛，比什么家产都珍贵，你要不惜一切将它保存下来，等待红军回来。”他遵照父亲遗嘱，把锦幛放在罐子里，用黄蜡封上口藏在坑洞里，一直保存到解放以后，献给了宁夏博物馆。他对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当教主后经常利用宗教活动，宣传党的政策，支持政府工作，后被选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解放初期，宁夏各地不少清真寺的阿訇，利用回民上寺礼拜的机会，帮助政府宣传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和婚姻法等。“文化大革命”中，不少民族宗教界人士受到冲击，但他们并未因此动摇对党的信念。“文化大革命”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调动了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积极性。宁夏伊斯兰教人士结合新的形势，制定《爱国公约》，进一步把爱国守法变成自觉行动，在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移风易俗、宣传计划生育等项工作中充分发挥了他们特有的积极作用。在发展国际性伊斯兰经济、打造清真品牌、推出崭新的系列穆斯林用品等领域起到了中坚作用。全民族携手共进，和善互补，有效促进了宁夏的改革进程和各项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历史是一面镜子。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当年红军西征在宁夏开展民族统战工作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成功经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在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大胆实践、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统战理论的又一光辉典范，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对于我们做好新时期的民族统战工作有着现实的启迪和借鉴作用。我们应当珍视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进行深入研究，科学总结，认真借鉴，为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做好民族统战工作，密切党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促进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作者：郭全忠，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研究室副厅级研究员，高级政工师，中国未来研究所终身高级研究员。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中国法制现代化 进程中的一个特有阶段的杰出 代表及其时代意蕴

于涛霖 陈毅根 王佳斌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基础上建立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①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保有的根据地，完整地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个时期、三种政权形态（工农民主政权、抗日民主政权、人民民主政权），是很长时期内全国革命的指导中心，^②是所有根据地的政治核心和政策策源

①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在时空上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三个阶段，并分别称为边区、边区和解放区。为了方便表述，在此以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统称之。

② 从1935年到1948年，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一直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直接领导着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在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和延安被誉为“抗日的灯塔”和“革命圣地”。中共中央军委制定的许多作战指示和命令，都是从这里传达到各个根据地，乃至全中国和全世界。毛泽东于抗战即将胜利之时，从战略高度对陕甘宁边区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性做了精辟概括：“第一步，打败日本侵略者；第二步，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两步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和指南中心，就是陕甘宁边区。”

地,^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模型,^②更是中国现行法制的源头。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开展研究,具有典型性。在西学东渐,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广泛植入中国法制体系的今天,回眸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汲取其法的精神和理念,对遏制非理性地移植西方法制、非理性地讨伐中国传统法制的做法及科学回答社会转型中的变革和稳定这一当前命题,无疑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的发展阶段及历史地位

法律具有地域性,1935年国民党对陕甘边、陕北苏区发动的第二次“围剿”被粉碎后,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6县城获得解放,使陕北革命根据地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进而形成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这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提供了地域条件,也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法制建设成果得以延续。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基础之于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经济基础不同,则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提供了决定性条件。陕甘宁等革命根据地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本质上讲,仍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但其推行的土地革命等经济政策,显然不同于国民党政府推行的经济政策。这一变化,在客观上也必然要求革命根据地进行新的法制建设,以对这一变化加以维护。当然,正是由于革命根据地内经济政策的这一变化仍属于同一社会形态内的量变过程,所以革命根据地法律建设在本质上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而非社会主义性质。从这个角度讲,陕甘宁等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是中国法律近代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有阶段。

① 任弼时:《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档案馆藏:《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一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② 党的各项新民主主义纲领和政策都是从这里逐渐向其他根据地推广的。在民主建设上,实行“三三制”;在经济上,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在全国抗日战争时期量减质减);建立公共经济等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文化上,用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代替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文化。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秘书长任弼时曾说:“陕甘宁边区对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来说,是由于一种领袖的地位,即根据地的领袖地位。这个区域里的一切重要设施,对于其他根据地有一种先导的模范的作用,要为其他根据地所效法。”

1.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的发展阶段简介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经历了初创、形成和完善三个发展阶段。在初创阶段（1934—1936年），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及在其基础上建立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法制建设具有明显的从属性，即其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有明确的从属关系，一般是直接翻印实施中央苏维埃政府的法律。另外，虽然此时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在短时间内制定了许多法令，但由于条件限制，党的各项决议及纲领政策实际上起到了政府法令的作用。在形成阶段（1937—1945年），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发展迅速。在继承苏区经验的基础上，以中国共产党《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文件为立法依据，制定和公布了一大批法令。在完善阶段（1946—1949年），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修改法律内容，为完成解放事业提供法制环境。如1946年4月，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通过《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1948年4月制定《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保护工商业的布告》、《陕甘宁边区政府暂行组织规程》等。

2.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的历史地位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革命根据地之间在行政上不是一种隶属关系，但各革命根据地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身的立法指导，同时又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而制定的，因此，各革命根据地在地域上虽是被分割的，但其制定的法律在性质上却是相同的，在内容上也是统一的，其共同的法律实践不仅改变了中国法律近代化的发展方向，而且开创了中国法制建设的新时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之于其他革命根据地，在法制建设上的历史地位则在于其立法的引领性、内容的示范性和调整的全面性。

（1）立法的引领性。这突出体现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的形成阶段，其几乎引领了整个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如其最先制定了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确保农民地权的法令，并颁布减租减息的土地法规。早在1937年4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就发布了《关于土地政策》的布告，宣布“在没有分配土地的统一战线区域，地主豪绅的土地停止没收”，并规定“在已分配了土地的区域，地主豪绅回来，可在原区分配给他与农民一样多的土地房屋”。1939年又正式制定《陕甘宁边区土地所有权条例》，确保了农民已分

得土地的所有权。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还是第一个实行普选民主制度的区域。1937年5月，根据议会民主制度的原则，制订了第一个《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选举条例》，并开始了第一次民主普选运动，一切赞成抗日的人，不分阶级、党派、性别、民族和信仰，不受财产和文化程度的限制，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民以普遍、直接、平等、不记名方式选举各级议员和政府领导成员。1939年1月，第一届参议会在延安正式召开，民主选举产生参议会和政府。对此，朱德评价说，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陕甘宁边区是第一个。^①又如，1946年4月，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率先通过《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②对政权组织、人民权利、司法制度、经济文化等作出明确规定。另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还率先着手起草基本法典，如1942年先后起草《陕甘宁边区刑法总则草案》、《陕甘宁边区民法草案》、《陕甘宁边区刑事诉讼法草案》、《陕甘宁边区民事诉讼法草案》等。^③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率先立法，无疑引领着其他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也无疑使民主法制建设深入人心。

(2) 内容的示范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的这一历史地位是与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当时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分不开的。从1935年到1948年，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一直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党的各项新民主主义纲领和政策都从这里逐渐向其他根据地推广。毛泽东1938年就指出，陕甘宁边区的作用，就在于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1940年，他在边区党政联席会议讲话中又说：“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因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一切重大制度和方针政策都是党中央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结合边区的实际情况提出来的，许多法令也是经党中央讨论或批准的，重大法律制度也都是先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试行，然后才在其他根据地推广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具有明显的内容示范性。

(3) 调整的全面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法制调整对象广泛，法律部门

① 林健成：《试论陕甘宁边区的历史地位及其作用》，载《民国档案》1997年第3期，第108—109页。

② 此为制定正式宪法的雏形，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本拟以此为基础起草正式宪法，但不久内战全面爆发，致使制宪工作中断。

③ 这些草案虽未经参议会讨论通过并颁行，但均经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政府批准和参议会认可，交由司法机关内部试行。

众多，确立了基本框架和方向，在大的调整领域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如在宪法性文献方面，1939年1月，第一届参议会通过《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941年11月，第二届参议会又通过《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抗日民主政权的组成实行“三三制”原则。在土地立法方面，1942年，根据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制定了《土地租佃条例草案》和《地权条例草案》，规定了土地承租、承租、买卖的优先权制度。在刑事立法方面，制定了《抗战时期惩治汉奸条例草案》、《抗战时期惩治盗匪条例草案》、《惩治贪污条例草案》、《破坏金融法令惩罚条例》等法律。在婚姻家庭方面，制定了《婚姻条例》、《抗属处理办法》、《修正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等。在民商和经济立法方面，制定了《优待移民难民垦荒条例》、《农业贷款章程》、《运输合作奖励办法》、《救国公粮征收条例》、《营业税修正条例》等法律。行政立法取得重大进展，内容涉及战时兵员、物资、牲畜的动员，抗属优待抚恤，户籍枪支登记，民众团体组织和登记，干部任免、调动、考核、奖罚，行政机关设置及其职责权限等。司法与诉讼制度成绩斐然，著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①就是一个典型。^②所以说，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在社会主要方面均建立了法制，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

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之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时代意蕴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并未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而结束，也并未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而被束之高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的某些成就或技巧对当今法制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① 马锡五在担任陕甘宁边区陇东专区及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期间，在巡回审判中贯彻群众路线，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了解案情；依靠群众，教育群众，尊重群众意见，方便群众诉讼，手续简便，不拘形式。他依靠群众纠正错案，解决疑难案件，被人民群众誉为“马青天”。他的审判工作经验被总结为“马锡五审判方式”。这一方式是在巡回审判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是司法工作的一面旗帜。它的出现和推广，培养了大批优秀司法干部，解决了积年疑难案件，减少争讼，促进团结，利于生产，保证抗日，使新民主主义司法制度落到实处。

② 张全仁、曹明昭：《试论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人民民主法制的特点和经验》，载《西北史地》1989年第3期，第98—103页。

1.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哲学基础：中国问题特殊性意识

自清末修律以来，西方法制就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蹒跚前行，至今已成为一种显学，其具体表现就是在法制建设过程中，必谈西方法制文明，必循西方法制主张。然而，在这百年中国法制建设中，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却对西方法制的移植持摒弃和怀疑态度。其根源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理性恪守着中国问题特殊性的意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一个其他国家所不存在的历史阶段或条件，这就是当时的共产党人既要完成资产阶级所没有完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又要积极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特别是在全国抗日战争期间，国共两党为抵御日寇侵略而互相承认政权的合法性、法制的执行力，对这些双重的和叠加的因素，共产党人不得不考虑，具体表现在法制建设层面，其结果必然是共产党人不得不对源于西方的法律制度持怀疑态度，有时还须对其进行改造。例如，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在法制建设过程中除了有选择地采用国民政府“六法”中有利于人民的一些内容外，还依据独立的立法权，对“六法”中的内容进行改造。

历史证明，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是卓有成效的，完成了当时中国的革命任务。特别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法制更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建设的模型和源泉。历史不会倒转，也不能假设，陕甘宁等革命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等领域的积极践行，铸就了共和国大厦，这一大厦横亘60多年，其本身就说明了共产党人所持的中国问题特殊性意识及所遵循的法制理念和采取的法制措施，是正确的。显然，在改革开放日益深入的今天，中国问题特殊性意识仍然需要。目前中国所处的时代虽然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双重的和叠加的因素，其法制建设理念和套路也不会那么彷徨不定，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形，其复杂程度不亚于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境况。由此看来，在法制建设过程中，如何发展地看待中国问题特殊性，如何树立和增强中国问题特殊性意识，就成为新时期国家和人民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

2.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维度：西方化法律传统、革命根据地法律传统

中国问题特殊性催生了革命根据地法律传统，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西方

化法律传统被移植于中华大地，其结果必须导致中国存在两种法律传统，并按照各自轨道平行发展。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两种法律传统曾交替被视为“先进”和“落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马锡五为代表的革命根据地法律传统得到了高度认可，被认为是人民的、革命的、进步的；西方化的法律传统则遭到了否定，被认为是非人民的、非革命的、落后的。但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情况有了变化：后者被认为是符合现代要求的，是中国法制的发展方向；前者则是保守的、传统的，需要改良、改造的。而当前两者皆受重视，不分仲伯地接受学界研究并在实践中发展。

上述发展过程本身表明，两种法律传统一直没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首先，这是由中国问题特殊性决定的，在革命根据地法律传统形成之时和西方化法律传统被移植之时，两种法律传统都有各自的政治烙印，都为各自的政权服务，政治对立性决定了带有政治烙印的两种法律传统在其产生和发展之时就不可能存在融合的基础。

其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种法律传统虽客观存在于中华大地，但却没有融合的机会。“新中国成立后，原根据地时期法律制度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们，也以胜利者和成功者的身份成了新中国法制建设的领导者，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在根据地时期的作法作为成功的经验在新中国加以推广，这种人事上的联系也使新中国的法律制度深深地打上了根据地的印记。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事实，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新中国的法律传统形成于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①历史上是曾有过这样的机会的，即在国共合作共御日寇侵略时，根据地成了中华民国的特别行政区，国民党政府也制定了一些有关抗日的法律法规。各抗日根据地在司法实践中，均有原则、有选择地援用了国民党政府的某些法律文件。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高等法院《论边区司法答客问》（1944年4月20日）就指出援用的原则包括：“一、适合抗战团结的需要；二、适合民主政策；三、适合边区历史环境；四、适合广大人民的利益。”^②从1937年7月到1942年8月，陕甘宁边区在形式上也是以国民政府最高法院为第三审的。但这种短暂的融合只是形式上的，连年的民族救亡战争、祖国河山被日寇霸占、国民党不积极抗战等，更

① 熊欣一：《试论革命根据地法律制度研究》，载《法学家》2008年第3期，第27—29页。

② 张希地：《革命根据地法制史》，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

使得这种短暂的融合未能真正地开展下去。

最后，两种法律传统客观上存在的明显差异使其很难融合。“西方化的法律传统主要流行于学术机构或高层政权机构，乡土化的法律传统主要流行于社会组织或基层政权机构。近百年以来，在我国众多的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中，主导性的法学话语基本上都是西化的法律理念、法律制度与法律技术。”革命根据地法律传统，则主要存留于乡村社区、乡镇政权、乡镇法庭等社会组织或政权机构中。如果说西方化法律传统依然存在于中高级审判机构（尤其是沿海城市的涉外案件特别是涉外商事案件中），那么马锡五的审判方式则流行于众多的基层社区和基层法庭。^①这是其一。其二，从逻辑关系来看，“西方化法律传统的逻辑起点是某些应然的目标或理念，如正当程序、契约自由、法律至上、法律信仰等。这些应然性的目标或理念构成了创制法律规则、改革法律制度与完善法律技术的起点与归宿”。革命根据地法律传统的逻辑起点，“则主要是实然的社会效果或政治效果，如要适应乡土社会的需要或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1942年2月3日，毛泽东为马锡五条笔题词：“一刻也不要离开群众。”1944年3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以“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为题发表评论，指出“这种审判方式贯彻了充分的群众观点，是真正民间的、真正为人民的”。按照这样的逻辑起点，革命根据地法律传统的承载者应当按照乡土社会中特有的情理规则与是非观念处理纠纷。如果纠纷的解决者不能理解乡土社会中特有的交往规则与秩序观念，他所提出的解决办法不能契合争议双方对于公正的想象与期待，那么不但不能排解纠纷，反而会引发更多的纠纷。

上述表明，两种法律传统很难融合而又不得不并存，于是就出现了一些学者所揭示的一种社会现象，即一些主流媒体一方面宣传“程序正当”、“回避”、“举证责任”等现代法治理念，另一方面又宣传“主动送法上门”、“为企业排忧解难”及反复劝阻离婚等。想必这也是中国问题特殊性的一种表现吧。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是让其并存下去，还是演绎一种能替代两者的第三种法律模式？笔者认为，中国乡村与城市二元化模式仍将在较长时期存在，两种法律传统各有所需的市场，所以推崇任何一种法律传统都是不明智的，而两者内在的客观差异性注定了替代性法律传统模式是不可能实

^① 参见喻中，《吴经熊与马锡五：现代中国两种法律传统的象征》，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1期。

现的。最好的解决之道，是对两种法律传统给予必要的尊重和认可，并通过沟通、交流，使两者的发展渐行渐近。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极富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运行方法论：注重政策、注重调解、注重判例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另一个启示就是法制运行方法论问题。陕甘宁边区法律渊源复杂。陕甘宁边区的法律包括立法机关颁布的法律纲领、条例、规程、办法等，党的政策，政府命令，政府与军事机构的联合文告，司法机关的指示等。^①在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颁行的部分法律法规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也具有效力，加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处于中国西北内陆，民俗、习惯、乡村规约等繁多且具有一定约束力。这些渊源在调整对象、范围和功能、效力层阶上没有明确区分，互相之间难免存在冲突和矛盾。法律渊源的复杂性和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给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法制运行提出了挑战。因此如何在这样纷繁复杂场域下让革命根据地法制有效运行起来，就成为革命根据地面临的紧迫任务。而这一问题，实质就是法制运行方法论。

纵览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法制运行模式和机制，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注重政策的指导作用。陕甘宁边区曾是中国革命的政治中心，是根据地的首都。因此，如何处理政策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既是一项学术问题，也是革命问题。毫无疑问，政策在革命战争时期是非常重要的。根据地时期大部分时间是没有统一的中央政府的，而各革命根据地又相距遥远，在此情况下如何统一各根据地的法律制度便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此，以共产党的政策为依据制定法律便成为一条简便有效的方法。特别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本身即是根据地的首都，党的重要政策都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试点后才推向其他革命根据地及全国的，因此，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进循以政策为法律制定依据更显重要。当然，法律为此也“付出了

^① 参见汪世荣、刘全斌：《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编制判例的实践与经验》，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牺牲自主性发展的代价。以政策作为法的主要渊源之一，不仅影响了法律的稳定性，还使得法律变得笼统和不易操作。法律的这一尴尬地位，使法律工具主义的传统观念不仅渗透其中，在某种程度上，还被强化并一直延伸到现在，成为法治现代化的最大障碍^①。但这一过程必须经历。当前党的政策仍必须发挥着法制建设的指导作用及法律缺失时的法的功能，因此在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处理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仍是一个需要开展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是非常注重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调解制度是在中国民间排忧解难的历史传统的基础上，经过改造形成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制度。^② 调解制度发端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农运动中，在抗日战争期间得到了普遍发展。1943年，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民事案件调解条例》，并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1948年9月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指示信规定了三项原则。^③ 理论和实践证明，调解完全符合现代法治精神和司法要求。但一段时间以来，调解一度被认为是“违背现代法治原则”，是“低水平司法”。“重判轻调”倾向明显。对此，2009年7月18日召开的全国法院调解工作经验交流会指出：“调解是高质量审判，是高效益审判，调解能力是高水平司法能力。”“把调解作为案件的首要结案方式。”“打牢调解优先理念的思想基础。”^④ 当前就业、劳动争议、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等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大量增加，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而面对着日益增多的人民内部矛盾，必须深刻认识调解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作用，重温和学习借鉴革命根据地时期的调解制度与措施，力争通过调解方式解决复杂纠纷，实现“案结事了”。

三是注重判例作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建立在民众的文化素质非常低的

① 刘全波、李娟：《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档案及其学术价值》，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161—162页。

② 张晋藩：《中国法制史》，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732页。

③ 一是双方自愿，不许有任何强迫；二是要遵守政府政策法规，照顾民间善良习惯；三是任何人不愿调解或不想从调解，有权向县司法处或地方法院起诉，调解不是诉讼的必经程序，不得加以任何阻挠。张晋藩：《中国法制史》，第734页。

④ 王胜俊：《最高法院强调把调解作为首要方式》，载《光明日报》2009年7月29日第4版。

基础之上，加之法律渊源繁杂，制定粗糙，^①故时任边区参议会会议长谢觉哉在1942年4月15日的《边区参议会常社会报告》中建议，“拿裁判的好例子做教育裁判员的教材”^②。1944年1月6日，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应根据历年经验，将好的判例加以研究整理，发给各级司法机关参考”^③。随后，李木庵^④主持编制了《陕甘宁边区判例汇编》，选编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延安市地方法院有代表性的各类判词共计77件。《陕甘宁边区判例汇编》由例言、案件处理办法、判词，选编意见与审定意见等四部分构成，以典型案例的裁判文书为核心，旨在明晰制定法条文和弥补法律漏洞，为司法活动在实现社会稳定、平衡成文立法与社会现实脱节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经验支持。当前中国不承认案例的法律渊源地位，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民俗繁多、立法权多元的发展中国家，案例在统一司法审判，提高司法人员法律素质，促进法治现代化等方面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尚未有过立法机构组织编撰案例活动，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此外，利用普通法与特别法关系处理问题也是革命根据地法制运行机制的一个特点。特别法多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立法的一大特点。“根据地的那些稳定的社会关系以普通法来加以规定，普通法具有系统、适用面广、稳定等特点；而对那些需要变革的社会关系，以特别法加以规范。特别法灵活、简易、修改方便、效力优先。两种法律交替适用，较好地处理了稳定与变革的关系。”

① 例如，对于与老百姓关系最密切的、发案率非常高的婚姻案件，法律规定的就十分粗糙。《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1939年4月4日）仅32条，全文文字不足千字，而处理具有复杂性和普遍性的抗属婚姻问题的法律《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法》（1943年1月15日），仅7条400余字，对常见的买卖婚行为、婚约行为等没有规定。

② 王定国、王萍、吉世霖：《谢觉哉论民主与法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页。

③ 西北五省区编委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69页。

④ 李木庵（1884—1959），湖南桂阳县人，法学家，清末毕业于京师法律专门学堂，后在平津、福建等地从事律师和教学工作，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代院长、检察长，边区政府法制委员，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司法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政法法律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1955年任最高人民法院顾问。

三、结语

尽管当前法学理论研究的旨趣仍倾向于西方法制文明，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法制作为共和国法制的源头和革命法制的代表，其历史地位和现实影响是无法抹煞的。特别是当前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与法治的变革诉求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强烈，然而中国问题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一变革困难重重。民众在追求变革的同时，更渴望稳定，因为稳定压倒一切，稳定遂成为最高的诉求，因此，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抛弃革命根据地法律传统和全盘移植西方法律传统都是非理性的，应给予两种法律传统以必要的尊重，建立两种法律传统的对话机制。另外，中国当前所面临的形势并不亚于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形势，合理借鉴革命根据地时期特别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法制建设经验，充分重视法制运行方法论，才能更好地保证国祚绵长、社会安定。

作者：于坤霖，辽宁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省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会长。

作者：陈敬根，《中国海商法年刊》、《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科版）》、《航海教育研究》责任编辑，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理事，辽宁省法学会治安管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海商法学研究会理事。

作者：王佳斌，辽宁北城律师事务所律师。

建立以庆阳洪德为中心的新的根据地

——毛泽东关于西征战役的战略选择

李红喜

1936年5月下旬至7月下旬，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以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的西方野战军取得了西征战役的胜利。对马鸿逵、马鸿宾等国民党军予以重大打击，除杀伤大量敌军外，俘获其官兵2000余人，解放了甘肃庆阳的环县和陕西、宁夏的定边、盐池、豫旺等4座县城，开辟了纵横200公里的陕甘宁新根据地，并使之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西征战役的胜利以及在东线开展的游击战争，为后来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发展西北抗日的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风云变幻、极为复杂的形势下，毛泽东审时度势，先是亲自率部发起东征战役，后又及时部署、指挥西征战役，并根据实情中止建立以庆阳洪德城建立根据地的战略设想。本文拟从毛泽东关于西征战役的战略选择这一视角，展现战略家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高超的战略战术思想。

一、根据形势变化，及时改变战略行动方向，从主要的战略方向转向次要的战略方向

1935年冬，刚刚率领中央红军胜利结束长征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面对着急剧变化、极为复杂的政治形势和亟待解决的军事战略问题。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攫取华北，并准备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中华民族面临着

亡国的严重危险；而国民党蒋介石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调集重兵进行反共内战，阻止和镇压各界人民团体和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军事方面，当时红一方面军刚结束万里长征，补给困难，地处陕甘苏区，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又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只有向外发展才能开创新局面。但向何方发展呢？当时，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内部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设想和意见。

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①。

在29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他一开始分析了当前形势的主要特点：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独占中国和红军的胜利。随即提出1936年的军事部署是：“正确估计敌我力量，准备对日直接作战，扩大红军，发展游击队及白军工作。”他提出：红军应乘全国抗日高潮的形势，东渡黄河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要在战略上扩大战果。会议经过充分讨论，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于12月25日通过《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形势下，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党在新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②同时还指出，1936年主力红军作战的主要目标，还应该是汉奸卖国贼的军队。

根据这一战略方针，1936年2月20日，毛泽东、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称开始东征。抗日先锋军冲破阎锡山部队的防线，渡过黄河，先后取得关上村、兑九峪等战斗的胜利。同时，为了扩大红军东征的影响，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和有关政策，毛泽东、彭德怀于3月10日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

红军的东征行动，遭到阎锡山部队的顽抗。这时，对红军东渡入晋深为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04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588—590页。

不安的蒋介石，为了达到消灭红军，并乘机将蒋系势力插入山西的目的，应阎锡山的要求，先后抽调驻河南、湖南等中央军约 10 个师，并委任陈诚为山西“剿共”军总司令，分两路增援阎锡山，同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队与之配合。

4 月 20 日，红军在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堵和围攻后，集中于晋西地区。这时，国民党军也跟踪围拢过来，企图压迫红军于黄河东岸狭小地区而消灭。这时的战略态势是：山西敌军主力构筑从三交镇起，经中阳、孝义、灵石、临汾、新绛至河津的东南北三面封锁线。陕西方面东北军已开始进至富县、甘泉之间构筑堡垒，杨虎城的 4 个旅进至韩城、宜川之间，都准备继续向北进攻，并从西面封锁黄河。

两天后，毛泽东在各路国民党军逼近晋西、即将发动进攻的情况下，致电林彪等各军团首长并告周恩来，指出：方面军“行动方针基本的为了向东或向北突出封锁线，进到晋东南或晋西北，特殊的也为了必要时西渡打杨虎城（张学良、杨虎城正向陕北进攻）”，但是“万一情况改变到暂时不许我们在山西继续活动时（没有出封锁线可能时），我们也准备暂时地回到陕、甘，经营神府区域、三边区域、环水区域、渭水区域、陕南区域等次要的战略方向”。不过，“若干时间之后，即情况改变到东出有利于我作战之时，仍然准备回到东面主要方向”。^①

25 日，国民党军在隰县、午城镇、大宁一带，开始构筑堡垒封锁线，增加了红军向东向南突进的困难。同时，陕西方面的东北军、第 17 路军也开始由甘泉、宜川地区向北推进。鉴于这一情况，毛泽东同彭德怀从康城镇前往桑壁镇，与林彪、聂荣臻等一起连日研究敌情，及时调整部署。

对晋陕甘的敌情作了全面分析后，毛泽东于 28 日决定暂时撤出山西返回陕北，在同彭德怀致电周恩来等的电报中指出：山西方面，阎锡山和蒋介石有 51 个团，取堡垒主义向我推进；陕西方面，蒋介石强令张学良、杨虎城军向陕北进攻，企图封锁黄河；国民党军控制下的神府、三边区域空虚，特别是“在甘肃是蒋介石之胡宗南两路部入山西，毛炳文调甘南，王均伍诚仁等在陕南与甘南，张学良原在环水区域之部队，大部调陕西，环水区域及其以西均空虚”。“根据上述情况，方面军在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

^①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 337 页。

而在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容许我们到那边活动，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等任务。另一方面则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计划，亦是当前的重要任务。此外则有派一支队去陕南扩大苏区，吸引敌人之必要。”“向西执行上述任务，仍然是为着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之基本的政治的任务。华北各省仍然是战略进攻方向的主要方向。”^①

同一天，毛泽东同彭德怀又向张闻天“提议开政治局会，讨论新的行动方向及其他与此关联的问题”，“新的行动方向有二方案：一、方面军全部先到神府，东胜区域一时期，尔后向西边陕甘宁区域。二、方面军全部即向陕甘宁区域（包括黄河以南大道以北），而以二十八军、三十军去神府区域。此两方案请你及政治局各同志考虑，我们亦正在考虑。”^②

5月2日，毛泽东、彭德怀下达渡河命令。至5月5日，红一方面军全部撤回陕北苏区。毛泽东、朱德向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等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指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在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通电呼吁“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人民、党派，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的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③

红军东征，历时75天，消灭国民党军7个团，俘敌4000余人枪。取得江河作战经验，提高了战斗力，迫使晋绥军由陕西撤回山西。红军扩大新兵8000余人，筹款30余万元。在山西20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23—524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98—599页。

③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26—527页。

二、为扩大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提出发动西征战役，建立以洪德城为中心的新的根据地

红军回师陕北后，蒋介石仍然不顾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无视中共提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倡议，着手成立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4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指挥入晋的中央军和晋绥军各一部以及东北军、十七路军，对陕甘苏区发动新的“进剿”。其首要目标是夺取以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为中心的陕甘苏区的东北地区。

当时的军事形势是：在陕甘苏区的东面和北面，有国民党中央军2个师、晋绥军1个师又1个旅准备渡河入陕，协同陕北的第84、86师，采取堡垒政策，向根据地腹地步步进逼。在苏区西部，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一部部署在陕甘宁边界地区。在苏区南部，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向北进攻。但张学良、杨虎城已同中共建立初步的合作关系，不愿再同红军作战。

毛泽东、彭德怀致电中共中央，建议在前方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5月8日，中共中央在延长县交口大相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上，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与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毛泽东从全国大局出发，指出当时的形势是：现在反日反法西斯的运动如暴风雨般地发展，“群众运动发展到不怕统治阶级压迫的状态！九一八所激起的运动不如此次之深厚广大。”中间分子的态度转变过来了，落后分子也一天天觉醒了。我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被许多人所接受。我们的任务，总的建立全国人民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具体的政治任务，在目前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口号是争取直接对日作战，以红军作先锋，可以转到同东北军一齐去干。对南京的态度，在我们方面是发一个回师宣言，主张停战议和。在山西立足，从目前我们的力量来看，还有困难，或是不可能的。“东边的路，是将来必走的，是长时期内战略进攻的方向。”

关于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毛泽东分析当时军事形势后，提出在甘肃建立新的根据地。他说：是要在陕南、甘肃、陕北、宁夏“四中择一”，因为“方向在一个时期中只能一个”。他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作了比较：陕北，没有饭吃，地域狭小，不能去；宁夏，黄河南岸不大，虽有金马油，但从政治、经济观点着眼不应该去，因为马鸿逵可能争取或守中立，军事上

此地不能守，经远也是这样；陕南是重要的战略区域，又有红军，但必须注意，或者去时容易回来时难，或者国民党军队在西安、襄阳间构筑堡垒，不能出东方。这样不能选择陕南、陕北、宁夏，因此“甘肃是上述几条路的必由之路。地方虽不好，但有极重要的意义。再在三边及甘北弄它一块。地广人稀，敌人以后进攻困难。这是这一时期的任务。”^①

会议经过讨论，决定接受毛泽东的意见，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5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大相寺发布西征战役命令。命令指出：“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为着扩大抗日红军，为着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为着一切抗日力量有核心的团聚”。西北军委决定：以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战役，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地区发动进攻。次日，西方野战军分左右两路相继出动。

为了进一步研究军事行动问题，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以洪德城为中心的新的根据地战略设想。他说，我们在6、7、8月要以洪德城为中心创造新的根据地。东边蒋介石、阎锡山以30个团向我们进攻，是我们的主要敌人。蒋介石对陕、甘加紧部署，企图将我们与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隔开，与东北军隔开，与苏联隔开，在西北大于“剿共”。现在不能说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矛盾消失，西北军阀派别多，于我们有利。我们的阵势在西，而蒋介石集中兵力在东。

因此，我们的工作，第一，在安塞以西、洪德城附近四五百里地区做赤化工作；第二，对东北军完成主要方面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政治上的，内部的团结，干部的创造等；第三，坚持陕北游击战争，最好是在白龙山及神木地区，变“太平世界”为“不太平世界”，方式以小游击队活动为最好，短小精悍，在每区中应有一大的游击队。

中共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次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西边创造新根据地，东边坚持游击战争，南边做东北军的工作，为6、7、8月之三大基本任务。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以洪德城作为新的根据地的中心，其原因有：第一，重要的地理位置。洪德城所属的庆阳地区即陇东，地处关中西北外围

^①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85页。

高地，以陇山为依托，地势较高，足以俯瞰关中，从这里南攻关中腹地较易，而关中腹地向北仰攻较难，自古以来就是西北地区的军事重心。同时，自陇东地区向西，是进入甘肃西部的重要通道。第二，良好的群众基础。陇东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27年这里就建立了甘肃第一个党支部——中共宁县支部。后来，刘志丹、谢子长等在这里发动起义，建立了南梁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1934年，在华池南梁成立了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第三，经济条件较好，洪德城、河连湾一带是镇原以北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带。

根据毛泽东、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西方野战军经过10多天的作战，先后取得曲子、阜城战斗的胜利，左路军夺取了阜城、曲子、环县、洪德城之线的城镇，控制了该线交通。右路军则攻占了宁条梁，包围安边堡，主力进至宁夏边境。西方野战军已经占领陕甘宁三省边境的广大地区，并进行了创建苏区的初步工作，陕甘宁根据地初具规模。

为了巩固新开辟的陕甘宁根据地西部，毛泽东同周恩来于6月6日致电彭德怀，指出：“横山、定边同五百里工作是西方根据地的北面屏障，是北出绥、宁打通苏联的战略枢纽。应以81师与28军、骑兵团全力担负，限1个半月内（7月半止）完成初步赤化。”“庆阳、洪德城线及其东西地区是西方根据地的重心，是镇原以北人口经济条件较好地带，应以一军团1个师及军团政治部一半及陕甘宁红军主力全力担负，亦限7月半完成初步赤化。”“安边、定边是战略要点，保持于敌人之手将成后患。清涧等城可为股鉴。但一时不易攻下，应计划于2月至3月内多方设法攻下之。”10日，西方野战军决定，由红28军同红81师、骑兵团组成中路军（又称北路军），担负夺取安边、定边、堆子梁等地，巩固陕甘宁根据地西部的任务。

自6月14日开始，西方野战军又先后进行定边、盐池、豫旺、红城水等战斗，占领了定边、盐池、同心、豫旺等城镇，并在这些地区大力开展创建苏区的工作。7月27日，毛泽东、中央军委决定结束西征战役，毛泽东在给西方野战军及各军团首长约的电报中指出：“两个月来西方野战军以其坚

决机动的指挥和英勇牺牲的战斗，完成了在西方创造根据地的任务。”^①

三、在瓦窑堡迟早必失的情况下，为争取主动，决定中央及军委各机关移至庆阳环县洪德城、河连湾一带

红一方面军主力西征的同时，东线红军在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下，为保卫陕北苏区，支援西方野战军作战，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同进攻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坚决的战斗。

6月中旬，东北军第67军和第105师主力按照蒋介石命令，由延安地区分3路向北进攻，企图进占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15日，分别进至安塞、蟠龙和水坪一线。这时，早已进至绥德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第13军，也有从东北面配合行动的迹象。瓦窑堡危在旦夕。

中共中央、毛泽东考虑到瓦窑堡迟早必失，为争取主动，同时避免与东北军发生直接战斗，于15日决定中央及军委各机关撤离瓦窑堡，准备移至洪德城、河连湾一带。

为了顺利完成中央机关的迁移，毛泽东进行了非常周到的安排。他在15日致彭德怀、林彪等各军首长的电报中指出：“估计到瓦窑堡迟早必失，我军决搬空瓦市，准备作战。中央及军委各机关准备移至洪德城、河连湾一带其辎重先行，并以杨家园子及吴起镇附近为转运休息地点。”

毛泽东命令彭德怀负责布置洪德城、河连湾一带机关（包括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在内），“期于本月底完成”。林彪负责指挥沿途搬迁的机关、部队，并定16日开始。

为顺利进行中央机关的迁移，毛泽东“责成：1. 两宋（指红28军军长宋时轮和政委宋任穷——作者注）以两连兵力担任杨家园子、沙集之线以北的掩护，并肃清该地带的团匪。2. 劲光以一团兵力担任杨家园子、沙集之线的掩护，并肃清保安附近团匪。3. 至诚至少集中二百只牲口，从十六日起驮粮来杨家园子，以便接运资材、机器及一部分伤病员至吴起镇、洪德城，并于吴起镇附近布置宿舍及粮食。”

为防止中央迁都洪德而在政治上产生不利的影晌，毛泽东在电报中特别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60页。

强调指出，中央此次准备迁移与抗战，并不改变利用目前西南事变，加速进行西北大联合的根本大计。要求彭德怀在干部及群众中应解释，“中央迁都是为着直接领导和巩固新的更大的西北根据地，是为着更便于发展东西的游击战争，是为着更易于争取东北军，准备着新的反攻”^①。同时，毛泽东也十分明确地指出了迁都的意义之所在，就是为了巩固以洪德城为中心的新的更大西北根据地，是为了便于领导当时正在进行的西征战役和东方开展的游击战争，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向东发展，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

在决定撤离瓦窑堡的同时，为了扼止国民党军对瓦窑堡的进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一方面同东北军领导人进行交涉，促其遵守互不侵犯协议，停止进攻行动；另一方面，作了抗击敌人进攻的部署。17日，东北军后撤。但是，在20日黄昏，驻石湾之国民党军第86师一部，由北面乘隙袭入瓦窑堡，中央党政军机关在红军大学学员队的掩护下，安全撤离，至7月10日前后迁到保安、吴起镇等地，但后来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继续西撤到洪德城一带。

中央为何没有继续西撤呢？这与当时的形势变化有关。第一，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自4月延安会谈后，中共加紧了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并取得了较大的成效。6月底，刘庸致电中共中央，说张学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中央也觉得“东北军工作有新的进步”，^②特别是7月初，毛泽东同周恩来、张闻天在安塞听取刘庸关于东北军情况的汇报后，更是认为“那边的工作大有希望”^③。第二，虽然与东北军的关系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就在中央机关西撤的6月底7月初，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利用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之机，指挥东北军大举进攻红军，特别是第106、108师由庆阳地区向北进攻曲子镇，对洪德城一带构成极大的威胁。因此中央机关驻在处于陕甘宁根据地腹地的保安，更有利于指挥红军和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1936年春夏，毛泽东根据国内政治形势和当时战场形势的变化，毅然改变原来自己极力主张的军事战略主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47页。

② 《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7页。

③ 《毛泽东年谱》（上卷），第556页。

要方向，转向战略次要方向。指挥红军从东征转向西征，从向东发展革命根据地转而向西建立新的根据地，并取得预期的战略结果，这充分反映了毛泽东高超的战略战术思想，也彰显了毛泽东一直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的巨大威力。西征战役，在毛泽东军事指挥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作者：李红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综合处副处长，副编审。

周恩来与红军西征战役

王凯捷

1936年的红军西征战役，是在中共中央与红一方面军经历长征胜利到达陕甘苏区后，为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在首先取得东征战役胜利后，为创建并扩大陕甘宁新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而发起的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军事行动。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与红军的重要领导人，为西征战役做出重要决策与部署，参与制定了符合战场实际与形势发展的战役计划，指挥东线红军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配合西线红军的攻势作战，积极争取东北军、十七路军等国民党爱国武装实现共同抗日，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政治智慧，为此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重要贡献。

一、决策部署西征战役

1936年2月至5月，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下，取得了东征战役的胜利。然而，国民党当局无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继续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建立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调集“中央军”和晋绥军各一部以及东北军、十七路军等共16个师又3个旅，企图一举消灭红一方面军，彻底摧毁陕甘苏区。

为打破国民党军新的“围剿”，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想

据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和陕甘苏区面临的情况，决定扩大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与抗日红军，努力争取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大联合，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推动全国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立。陕甘苏区党和红军的战略任务是：形成广大的陕甘宁苏区，并向北打通与苏联、蒙古的联系，向南策应红二、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北上；争取东北军、十七路军及其他爱国武装；广泛开展陕甘苏区的游击战争。争取时间，争取空间，争取力量，为发动全国抗战和发展革命力量创造条件。为此，1936年5月8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召开的党中央负责人及红一、红十五军团干部会议上，决定发起西征战役。

此间，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积极协助毛泽东决策部署红一方面军的军事行动，并具体谋划红军西征战役。中共中央做出西征战役决定后，1936年5月17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就军事形势等问题作了报告。同时为配合西征，开辟新苏区，提议将中共陕甘省委改为中共陕甘宁省委，李富春为书记；成立中共陕豫鄂省委（简称陕南省委），贾拓夫为书记。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提议。随后，周恩来负责起草制定了《关于西征战役的行动命令》。18日，周恩来与毛泽东、彭德怀在大相寺共同发布了这一命令。针对蒋介石、阎锡山企图乘红军西渡，以4个师以上兵力由吴堡入陕的情况，决定“以红军之一部钳制蒋阎西渡部队及陕北、渭北敌人，以主力组织西方野战军活动于陕甘宁广大区域。另以有力支队，进出陕南，与我陈先瑞部会合，活动于陕鄂豫三省，调动并吸引蒋介石主力于该方面，使我主力易于在西方取得胜利。”^①为此，以主力红一方面军第一、第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等共13000余人，组成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左权、聂荣臻分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和政委，徐海东、程子华分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和政委。要求：“野战军第一步以夺取并赤化安定、定边、环县、曲子之目的，在五月十九、二十两日由现地出发，分两路西进（行军计划另发），以七天行程到达新城堡、沙集、吴起镇之线集结，休息两天，一军团完成环县、曲子、庆阳一带侦察，十五军团完成安定、定边侦察，十五军团准备攻占安定、定边两县城，左聂率一军团相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第473页。

机攻占曲子及环县。其战斗部署及后方勤务机关均由彭司令员规定之。”^①对二十八军、三十军、二十九军及拟组建的三十一军（后因故未能组建）的行动也作了具体部署。所有西北军委直接指挥的部队，须经常用无线电与军委保持联络，以保证随时接受军委的补充命令。

按照预定作战计划，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1936年5月19日至20日，野战军分左中右三路开始西征。红一军团为左路军，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红八十一师，军委直属骑兵团为中路军。5月28日，左路军由延川地区出发，向甘肃的环县、曲子、庆阳一线前进。为支援西线作战，18日，周恩来与毛泽东、彭德怀致电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红三十军军长阎红彦，指示三十军自19日开始向宋家川进发，务必在23日到达，并以小部队切断宋家川、打连山的交通联系，以游击队切断打连山、义和镇、三十里铺间敌人的交通联系，坚决阻击蒋、阎两军渡过黄河。6月1日，红一军团第二师由庆阳三十里铺、环县八珠原等地进发，向曲子镇守敌发起攻击，经过激烈战斗，活捉敌一〇五旅旅长冶成章（外号“野骡子”），取得毙敌百余名，俘敌200余人的胜利。与此同时，红四师进占阜城，并击溃马鸿宾第三十五师8个营的反攻，歼敌6个营，俘敌1100余人，环县、洪德城守敌落荒而逃，左路军乘胜占领木钵、环县、洪德一带的交通要道，扫清了西进障碍。右路军红十五军团由蟠龙、安塞一线直插靖边并攻占宁条梁。随后兵分两路西进。至此，西征第一阶段作战取得重大成果。

为准备西征第二阶段作战，6月6日，周恩来起草并与毛泽东共同签发了致彭德怀的电报，指出：“横山、定边间五百里工作是西方根据地的北面屏障，是北出绥宁打通苏联的战略枢纽，应以八十一师与二十八军、骑兵团全力担负，限一个半月内（七月半止）完成初步赤化……庆阳、洪德城线及其东西地区是西方根据地的重心，是镇原以北人口经济条件较好地带，应以一军团一个师及军团政治部一半及陕甘宁红军主力全力担负，亦限七月半完成初步赤化。”10日，彭德怀下达攻占安定、定边作战命令。随即，红七十三师于6月12日和14日先后攻占同心县城和王家团庄，切断了马鸿宾第三十五师回援及北逃通路。右路军红十五军团在取得豫旺城战斗胜利后，先后夺取了韦州（今宁夏盐池）、定边等县城，给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6月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第474页。

25日，周恩来与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通报有关情况时指出：“我西方野战军连战皆捷，消灭马鸿宾大部，马鸿逵一部，夺取定边、花马池、环县三城及宁条梁、曲子镇、同心城等数大镇，前锋逼近黄河，开辟了九个苏维埃县。”^①至7月底，红一方面军在西征战役中先后攻占甘肃洪德、环县、曲子镇及陕北三边广大地区，达到了扩展西部根据地的战略目的。

二、指挥东线游击战争，配合西线作战

周恩来在参加部署西征战役的同时，还适时根据东部地区敌情变化，提出以东线游击作战配合西征战役的主张，同时将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安全与坚持游击战争相结合，以有力的行动配合了西征作战的胜利。

西征战役开始前，周恩来就考虑到阎锡山部队及中央军有西渡黄河占领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的可能，因此建议西方野战军西进后，在苏区的东部坚持游击战，配合西征。西征战役发起后的5月28日，周恩来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强调指出：应“在东边坚持游击战争，阻止入陕的中央军、晋军西进”^②。对此，周恩来起草的《关于西征战役的行动命令》就已明确要求红三十军攻击靠近黄河的宋家川守敌，以游击战阻挠敌人过河。同时，他指示红二十九军主力在韩城地区采取积极行动，并在6月初活动于吴起镇与环县、曲子、庆阳之间，以配合红一军团行动。

5月下旬，东北军从劳山向延安进犯，6月14日，东北军分三路向瓦窑堡进犯，并推进到平步塔、青化砭、下寺湾一线，同时驻绥德、清涧的中央军也有配合进攻的可能。为此，中共中央召开的常委会决定中央撤离瓦窑堡，周恩来留守东线指挥红二十九军主力、红三十军和陕北苏区地方武装等部，坚持东线游击战争，牵制敌军主力，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的西征作战，同时布置中央机关及军委转移。随后，在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的赤卫队誓师大会上，周恩来检阅部队并发表讲话。15日2时30分，周恩来与毛泽东在给红一方面军及中共陕甘宁省委领导人的电报中，通报了当前的敌情及中央机关撤离瓦窑堡的决定，同时军委决定：“恩来留守东线，指挥东面各

①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08页。

②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上册，第293页。

军及地方部队抗击进攻敌人，并布置中央及军委转移。”^①

面对东北军分三路进犯瓦窑堡的情况，周恩来临危受命，将保卫中央机关转移与配合西线作战相结合，指挥红军留守部队与国民党军展开斗智斗勇的较量。其间，周恩来起草的一系列电报和部署，充分展示出其军事家的气魄和机智果敢的谋略思想。为部署中央机关安全转移，14日，周恩来急电萧劲光、李富春并转杨至诚并告彭德怀，指出：“东北军现分三路向瓦窑堡前进，今日其右路到平步塔，中路已过青化砭，左路拟由下寺湾向上桥前进，估计明十五日可进至永坪、蟠龙、安塞之线，绥、清敌人亦有配合可能。我军决定由瓦窑堡准备作战。中央各机关的资材及军委后方从明日起开始向吴起镇移动。”^②为此，他在随后的部署中要求彭德怀负责布置洪德城、河连湾一带机关（包括红军学校）转移；林彪负责指挥沿途搬迁的机关和部队。同时指示宋时轮和宋任穷以两个连的兵力担任杨家园子、沙集以北的掩护任务，并肃清保安附近的土匪武装；杨至诚至少集中200头牲口接运资材、机器及一部分伤病员至吴起镇、洪德城。17日，根据敌我情况的变化，规定了中央机关的分组及行动要领。21日，国民党军高双成部炮兵营从横山县石湾出动袭击瓦窑堡。周恩来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党、政、军机关安全撤退，然后向西转移到磁窑，中共中央迁到保安。

此后，瓦窑堡成为东线战场的焦点。其间，与周密安排中共中央撤离瓦窑堡的同时，周恩来抓住敌人急于攻占瓦窑堡、企图迅速摧毁中央机关的心理，指挥红二十九、红三十军以及陕北地方武装与进攻之敌展开了机智灵活的战斗。15日，面对东北军三路进攻的态势，周恩来及时电示红三十军军长阎红彦和政委蔡树藩，指令红三十军务以3天行程限在17日赶到延水城集结，准备侧击由清涧或由永坪向瓦窑堡进犯之敌。到达延水后速与红二十九军取得联系，以便协同行动。同时令红二十九军转至延水、冯家坪之间待命。18日，陕北地方部队攻占永坪、蟠龙等地，东北军撤至永坪、蟠龙以南。此后，为将东北军拖在这一地区，掩护中央机关转移，周恩来连续向红三十军和红二十九军发出3封电报，指示他们在延水、永坪、贺家坪、鲁家坪一带迅速集结。与此同时，为分化瓦解敌人，红军与东北军进行了多次秘

^①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上卷，第300页。

^②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上卷，第269页。

密接触，使其撤出永坪、蟠龙。但国民党中央军汤恩伯部却向瓦窑堡步步进逼。鉴于情况变化，周恩来即刻电令调红二十九军及独立第一、二团活动于清涧线，“迟阻敌西进以掩护瓦窑堡”。此外，为体现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诚意，周恩来电告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如果中央军将占领瓦窑堡，我们必事先通知你们，由东北军占领。”^① 针对国民党中央军汤恩伯部两个团的进攻，他指示红三十军、红二十九军予以坚决反击。要求他们“二十一日应改进至扶榆坪、路家渠、王家坪之线并准备遭遇老君殿向南沟岔、瓦窑堡抗击之敌，坚阻其前进，同时指挥吴岱峰支队协同作战”。并指示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及地方武装一部统归阎红彦指挥。21日，针对汤恩伯部一个营乘中共中央机关撤离之机偷袭瓦窑堡的情况，周恩来带领两个连位于瓦窑堡以南的磁窑，急电阎红彦等，决定红二十九、红三十军接电后务必星夜向瓦窑堡开进，次日拂晓开始攻击。22日，周恩来与毛泽东赶到瓦窑堡外，并指挥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完成包围，同时将情况通报东北军王以哲。23日午后，东北军进入瓦窑堡。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随即取消包围。周恩来与毛泽东、张闻天等启程赴安塞。同时，红二十九军、红三十军及地方武装转移外线继续与敌周旋。至7月15日，红二十九军转至石家川、李家川一线；红三十军主力在进驻十里铺后，遵调新城地区集结，待机打击当地反动民团并策应红二十八军的行动。

坚持东线游击战争，直接关系西线红军作战的成败。为此，周恩来反复指示部队加强思想动员工作。要求军一级首长深入基层连队开展谈话和进行解释，消除干部、战士的疑虑，“首先将坚持东线游击战争配合西线扩大苏区的政治任务，提到每一个指战员面前，说明这次非放弃苏区逃跑，并且失掉瓦窑堡与遭受部分损失不能丝毫减少我创造西北大局面与战胜敌人的信心，并颂扬西线胜利，以前的及最近的，攻占定边、花马池、七营，消灭敌骑兵两连、民团全部、缴大电台两个等及全国形势讲给干部战士，就使其都认识这是有利于我们的条件而兴奋起来。”^② 从而极大地树立了广大指战员坚持东线作战的信心和勇气，并以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确保了中央机关的安全，巩固和扩大了老苏区，牵制了国民党中央军、阎锡山部队和东北军的主

①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上卷，第304页。

②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上卷，第307—308页。

力，以有力的行动配合了红军西征战役，为此后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实现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发展西北抗日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领导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确保战略目标实现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甘苏区后，在打破国民党军“围剿”、发展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始终高度重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东征战役中，统战工作取得重大成效，为确保西征战役的胜利，周恩来继续发挥统战工作的威力，为团结争取东北军、十七路军及国民党爱国人士、各爱国阶层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红军西征战役能否实现预期战略目的，除正确的军事部署和灵活机动的军事行动外，全力并适时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以实现全民族抗战的神圣大业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决定发起西征战役后的第6天，就致函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时子周，说明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请其联合各界作救亡图存之举，并“愿先生广布斯旨于华北，求得抗日战线迅速建立”。同日，又分别致函张伯苓和谌小岑，说明中国共产党关于“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实现团结抗日的方针。对他们为国共合作奔走表示“益增兴感”，称赞二人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救国热忱，希望他们继续推动各方“迅速联合”，“共促事成”。并欢迎曾养甫、谌小岑到陕北“商讨大计”。后周恩来派出代表与曾养甫、谌小岑举行谈判，并就共同抗日问题达成初步共识，充分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热切愿望和诚意。

国民党东北军和十七路军是具有爱国传统的部队，并持强烈的抗日反蒋的积极态度。驻防陕甘实施“剿共”后，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和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积极的联系。此间，为推动东北军迅速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停止内战，中共中央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就决定成立由周恩来任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的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此后，周恩来主持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一战线工作，并与两军达成了初步协议。1936年4月9日，周恩来赴延安，与张学良举行谈判，最终达成联合抗日的协议。延安谈判后，中国共产

党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在东征期间统战工作取得一定进展的基础上，西征战役发起后，为继续巩固发展与东北军、十七路军业已建立的关系，1936年5月20日，周恩来在瓦窑堡向中共中央通报了红军与东北军合作的情况。指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全国广大人民的同情与拥护。“全国几十个政治派别在联共反日或联日反共的问题上起了分裂、震动与变化，我党与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正在积极组成中。”^①在随后于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上，周恩来发言指出，由于东北军已从要求抗日发展到有反日反蒋的初步决心，中国共产党可以争取东北军的大多数，目前的政策不是瓦解东北军，而是巩固它；建议成立抗日会、俱乐部等组织团结其左派，坚决打击其内部的法西斯反动分子。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于6月20日发布《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此后，周恩来的这一主张日渐深入与成熟。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进一步提出：为推动大革命的到来，当前要建立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红军的三位一体，争取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在红军内部加强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两广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分析了事变爆发的原因，提出中共的基本政策是：推动全国反日反蒋力量的发展，更广泛地运用统一战线，不仅做桂系的工作，而且要做蒋介石集团内部工作；呼吁召开全国救国代表大会，推动抗日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成立。在此基础上，周恩来在7月5日与毛泽东等专门听取关于开展东北军工作的汇报。他为此着重指出，对东北军的政策不是瓦解、分裂把它变成红军，而是帮助、团结、改造，使之成为抗日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同时，针对东北军忽视内部组织和思想工作的倾向，周恩来建议加强对东北军的宣传工作，将扩大联合战线放在工作的首位。中共中央根据这项建议，决定成立白军工作部，由周恩来主持。由于陕甘根据地周围大多为东北军，因此白军工作应以东北军为主。

在红军发起西征战役后，东北军在蒋介石严令下分三路向瓦窑堡推进。针对这一形势，为切实体现红军与东北军等爱国武装的团结合作，周恩来巧妙地利用这一时机，在公开摆出迎战东北军进犯假象的同时，实际上采取回避周旋的策略。5月25日，东北军从劳山向延安进发。为此，周恩来致电萧劲光等，指示派出游击队在东北军经过的道路，“分成数组率领群众沿大

^① 《周恩来军事活动记实》（1918—1975）上卷，第293页。

道侧面高呼（抗日的口号）进行宣传”^①；6月10日，他在致左权、聂荣臻的指示电中，要求在开辟庆阳局面时“着重东北军”。同时与毛泽东电告李富春、萧劲光、彭德怀等：“以主要力量进行争取东北军的工作，而不是向东北军突击或攻击。”^②14日，东北军三路部队已逼近瓦窑堡，为避免冲突，便于中共中央机关安全撤离，周恩来急电东北军王以哲：“务望火速电令前线兄部停止前进”，否则“造成两方敌对，于目前局势实有大害”。接电后，王以哲立即率部撤回蟠龙、永坪以南，从而使红军能够集中力量迎击国民党汤恩伯部，并使中共中央机关从容转移。而当国民党中央军占据瓦窑堡后，周恩来则及时通知王以哲，并撤回瓦窑堡，让东北军进驻；后东北军将撤出瓦窑堡的消息告之红军，周恩来又部署部队进行收复；当周恩来了解到东北军缺乏食盐后，立即指示红军设法解决。要求驻盐池、定边的部队首先集中骡马将5000斤食盐运到吴起镇。这种配合默契的军事行动，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敌对双方和平相处的奇迹。对此，7月27日在保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对周恩来领导下的东北军工作给予高度评价，称赞其“可为很好的模范”^③。并认为：由于这方面工作的进展，党的整个工作部署应该相应地改变：原来的工作次序是，第一在西边建立根据地，第二在东边建立游击区，第三建立联合战线。现在应改为把联合战线的扩大放在第一位。

陕甘宁地区是汉、回、蒙等多民族聚居区，团结动员各民族与宗教界人士共同担负起抗日救国的重任，是西征战役期间中国共产党开展的重要工作，周恩来为此付出了极大心血与努力。为确保西征战役的顺利发展，5月19日，周恩来在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并听取李富春汇报后指出：西征时应采取更灵活的政策以争取回民、蒙民，基本原则是实行民族自治，并决定在少数民族中不打土豪。对此，“中央决定回民工作基本原则是回民自决，我们应站在帮助地位上去推动和发动回民斗争”。“只有在回民群众同意下，才能打回人土豪”，“红军不得自己动手打土豪”。^④此后，周恩来又作出一系列指示，要求西征部队和东线部队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并切实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与宗教信仰。为此，周恩来向部队规定了三大禁

①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上卷，第294页。

②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上卷，第298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一），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页。

④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1918—1975）上卷，第297页。

令：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吃大荤，禁止毁坏回文经典；同时颁布四大注意：讲究清洁，尊重回民风俗习惯，不乱用回民器具，回汉两族团结。据此，红军总政治部下发《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在部队中深入开展民族政策教育。在开展蒙民工作时，周恩来要求部队进到蒙民集中地区，并要特别注意执行中共中央对内蒙人民的宣传，扶助蒙民自决，而不是赤化，以建立北线上的缓冲地带。同时指出，对蒙古王爷应分化、争取，对喇嘛完全争取。周恩来还根据甘肃地区哥老会盛行的情况，指示前方部队“可设法与哥老会的龙头唐宝山联络，并争取其参加抗日”。对设在苏区内的天主教堂，周恩来本着与教堂建立和平关系的态度，指示部队与其签订协定，但承认教堂存在的前提条件是：教堂承认红军之抗日救国，反对反动军阀；拒绝一切国民党军阀部队、民团、特务进入教堂从事反动活动；一切教民均为苏维埃公民，服从苏维埃法律；红军承认宣教与信教自由；教堂财产不没收，由教堂自动捐助抗日救国经费；经济通商不加阻碍。在周恩来的具体要求下，红军与少数民族友好相处，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从而得到了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的真心拥护，为西征作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军西征战役，给予坚决反共的宁夏军阀马鸿逵、马鸿宾部沉重打击，开辟了陕甘宁新苏区，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为实现主力红军会师，发展西北抗日新局面奠定了坚实基础。周恩来在西征战役期间做出的具有远见卓识的军事决策和部署以及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体现出的超凡政治智慧，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宝贵财富永留史册。

作者：王凯捷，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三处处长，副研究员。

整军经武 枕戈待命

——西安事变前后彭德怀和任弼时在庆阳

宋教军

从1936年11月下旬山城堡战役，直至西安事变爆发后1937年1月上旬的40多天里，毛泽东坐镇陕北，运筹帷幄；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奔走于古城西安和云阳之间，纵横捭阖，苦心斡旋；彭德怀和任弼时则驰骋沙场，和友军结成三角联盟，调兵遣将，以军事行动保障政治谈判，以政治路线统率军事活动。庆阳一直是他们两人的活动区域，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战斗足迹，直至南进关中地区。笔者曾经于1991年12月前后，为撰写《任弼时年谱》和《任弼时传》，沿着红二方面军走出草地后的行军路线实地采访，其间到过庆阳的大部分地区，温故知新，感受很多。谨以此文表示对老区人民的敬意和谢意！

1936年11月15日，中央军委连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和任弼时，要求红一、四两个方面军的主力在豫旺堡、盐池、环县的三角地区“集结全力，准备打第一仗，消灭敌之北路纵队”。“二方面军到环县附近休息，准备作打第二仗主力。”第二天，彭德怀、任弼时命令各部向山城堡南北地区运动，集结待机。山城堡，位于甘肃环县以北，洪德城和甜水堡中间，六水汇流，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利于红军设伏。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贺龙和任弼时联名下达《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指出：“粉碎这一次进攻，开展新的局面，以作三个方面军会合与西北苏区的第一个赠献给胜利的全苏区人民的礼物。”经过一昼夜战

斗，红军将敌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全部及二三四旅两个团全部歼灭。与此同时，向盐池方向进攻的敌人也被二十八军击溃。山城堡大捷，是三军会师后第一次军事胜利，也是促成西安事变的一个因素。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等率全军团以上干部致电毛泽东主席转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表示“坚决实现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每个战役的任务”为“开展西北抗日根据地，争取迅速增援绥远直接对日作战，来领导全国人民并影响全国各地、各党各派各军走向抗日统一战线，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奋斗”。11月26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彭德怀、任弼时分别为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简称“前总”）总指挥和政委，统一指挥除西路军外的红一、二、四方面军各部及其他兵团。

—

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彭德怀和任弼时一直在庆阳，围绕着如何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主要做了如下几项工作：

1. 冷静思考，分析复杂局势

彭德怀、任弼时得知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经过反复研究，于13日、14日致电中央军委，指出，“西安事变后对全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大的推动作用”。我们“目前战略方针应迅速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找机会争取宁夏、巩固兰州，一部东出绥远，与（傅作义）联合抗日”。电报估计到，“何应该可能组织蒋嫡系发动对张战争，我应把握主动”。彭德怀、任弼时身临前线，指挥三军，深知众多官兵有杀蒋复仇情绪，但他们在电报中并未向中央提出“杀蒋”、“审蒋”等要求，表明他们对如何处置蒋介石问题持冷静态度。

西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在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认为，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是应该拥护的。针对张学良文电中抗日援绥（指1936年10月傅作义率部在绥远奋起抗日，全国人民群起声援——笔者注）的词句不明显，他着重强调，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举得更明显，并认为，兰州、汉中等战略的要点应即布置。张闻天在发言中则明确提出：“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

攻”。中共中央的基本立场是强调抗日，一切为了抗日。所以，对蒋介石的态度，强调要把他同亲日派区别开来。

由上可见，西安事变爆发后，彭德怀、任弼时与中共中央，对事变的性质、处置蒋介石的态度及军事部署等基本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们知道，要和平解决事变，首要的是认清事变性质。抗日是和平解决事变的目的，不杀蒋介石是和平解决事变的重要前提，一定的军事准备是和平解决事变的必要手段。彭德怀、任弼时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同中共中央不谋而合，是很有助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

对张学良、杨虎城释放蒋介石后的国内外时局，彭德怀、任弼时同样能够正确分析。12月26日，张学良送蒋介石返回南京，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及时向彭、任通报了情况。26日至28日，彭、任多次致电军委和毛泽东，其中有三封电报较为重要。电报指出：“西安事变及放蒋后，目前中国局势有走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较多可能（性）”，“蒋组织大规模的进攻红军之可能性较少”。这一事变，“给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以有力的推动”，“党的主张已取得某些实力派拥护和接受”。但由于国际形势的影响，如英、美的动摇和日本的威胁，蒋介石回南京以后，“可能产生新的动摇”，“仍然会不放松限制红军的发展，束缚红军于寒苦的边缘区域”。为打破蒋介石的束缚，根据军委和毛泽东的电示，彭、任在庆阳发布命令：“为督促南京撤兵，为准备万一变化，为便于扩大补充，野战军仍执行南进方针。”^①而这与中共中央关于形势正在好转，但蒋介石的承诺“尚待证实”，故红军应“占领有利的战略形势”的分析也是一致的。在错综复杂的形势面前，彭、任能够保持头脑冷静，全面分析时局，表现了他们政治上的远见卓识。

2. 直行己见，完善军事方针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中共中央收到了张学良“今已将蒋等扣留”的电报。在着重研究如何从政治方面解决西安事变的同时，还讨论了在军事方面应采取的方针，重新部署红军主力的行动，以配合政治上和平解决事变。军委和毛泽东连电彭、任通报情况，并指出：因为亲日派已奉行大规模内战，在敌主力向西安进逼时，我军应奉行大的战略，迂回并击破亲日派之头

^① 《彭任致军委主席团电报》，1936年12月26日、27日、28日。

脑。故“决将西峰镇集中计划废止，改至延安、甘泉集中，以便取直径迂回至敌主力后之郑州等地，并发展至直迫南京”^①。然而，“我们对战争是后发，不是先发”。这是一个集中主力，兵出河南、进逼南京，从军事上配合西安张、杨的战略设想。对此，彭、任立即进行分析研究，及时向军委提出异议：如此巩固西安的战略方针目前不应采取，因为这“必须红军出河南取进攻姿态，这样可能延长内战，失去固原、兰州及陕甘公路，且我主力在时间上来不及，增援西安要费时二十天”。而西北敌军将以胡宗南为指挥中心，对我发动南北进攻，不仅“隔断中苏和（我主力与）西路军联络，兰州亦不巩固”。彭、任认为，为了达到迅速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的战略目标，停止内战的具体有效办法是：把握红军主力，乘敌目前混乱局势，“首先打击胡宗南，消灭西北中心反动力量”。至少应压迫胡敌西退，在运动中歼其一部，恢复原有苏区。这样才能争取毛炳文、曾万钟及中立青海、宁夏四马，巩固后方，停止潼关之敌的进攻。这时，在前线的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也提出相同意见。这些意见归纳起来，即是集中主力，就地打胡，从战略上配合西安张、杨。

显然，军委和“前总”在红军主力行动的战略方针上意见不够一致，分歧点在于：（1）红军主力是经陕北即刻南下，还是在陕甘边驻守。（2）红军主力行动基本目标是进逼敌首脑南京政府，还是巩固西北根据地。而对于西安张、杨，则都主张在战略上予以配合。在猝然而至的事变面前，作为在后方的统帅部军委，和身临前线的高级指挥员彭德怀、任弼时等，出现不同意见是正常的，它反映了红军统帅部和前线将领对时局的初步认识和上、下级间的良好关系，也表现出彭、任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

这时，南京国民政府已召集紧急会议，撤夺张学良本兼各职，确定倾向于亲日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指挥调动军队，蒋嫡系部队进入潼关，占领华县，还派飞机在西安上空侦察、恫吓，连被扣留在西安的蒋介石，也“甚盼中央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国内各派、各系军阀也群起攻击张、杨，日本扶持亲日派，企图趁火打劫，甚至苏联也通过《真理报》、《消息报》连续发表社论和评论，对张、杨持反对态度。西安张、杨一时陷入孤立无援境地。其部队“出现不稳”，有的已叛投蒋军。军委和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红军

^① 《军委主席团给彭任电报》，1936年12月14日。

迅即出动，直接援助张、杨，配合东北军、十七路军，形成军事上的“三位一体”巩固西安，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立足西北、推动全国抗日局面出现的关键所在。于是，一方面坚持红军主力立即南下，同时也修正了原兵出河南、进逼南京的计划。决定以红军主力取直径南下，迅速出至西峰镇地区，靠近东北军，“或增援西安打何应钦，或增援固原打胡宗南”。事实证明，这是较为切实可行的方针。据此，彭、任立即向红军各部发布出动命令，部署红军主力分为三个梯队，“均以七天为限到达指定地点（西峰、庆阳附近）集结待命”。第三十二军、第二十八军等组成追击军，钳制胡宗南部，掩护红军主力南下。12月17日，抵达西安的周恩来与张、杨在西安商定：以杨部控守西安；东北军主力集结渭河南北备战，另以东北军一部集结固原、平凉，监视胡宗南部；红军立即接防肤施（今延安）、甘泉，以便南下渭北，侧击蒋军，参加决战。随后，彭、任率红军主力，兵分两路，夜行晓宿，兼程南下。

1937年1月2日，当蒋介石蓄意报复，调遣大军重新进逼西安之际，彭德怀、任弼时还及时向军委提出一个建设性意见：鉴于日本压迫南京打击左派，征服中间派。我们的战略方针应以巩固张、杨两部之联军，打击刘峙东路集团，西防孙震，北防胡宗南等，并力争使其动摇。为此，野战军第一步应集结在兴平、扶风地域，相机打击进犯西安之敌。如将来地形、敌情不利于我作战时，则向商州、洛南转移，进攻洛阳，深入河南，取得战略上的主动，直接从军事上支援张、杨，不使他们陷于孤立。军委和毛泽东对这个“攻敌所必救”，即以主力深入敌根本重地，借以调动敌人，争取战略主动的意见非常重视，不仅调徐海东的第十五军团先期进军到商洛地区，而且也准备将红军主力全部开往陕南，跳到敌战略包围圈的外侧。只是由于地形、缺粮等不利因素，特别是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这一战略设想未得以实现。

时隔不久，彭德怀、任弼时担心的事发生了：西路军进入河西走廊，虽经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却连连受挫，“情况颇严重”。张闻天、毛泽东等来电，征询彭、任“有何意见”，并告之，军委“极秘密（地）准备派出三分之一力量向西增援”。拟由红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第二十八军，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或四军），红二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及直属骑兵第一团组成援西军。对此，彭、任及左权（时任“前总”参谋长）致电军委：西路军目前处在一种严重关头，野战军亦处在“团结友军，保障和平，推动全国

抗日运动之重要关键”，认为红军以主力西出，于军事、政治上均不利，1/3 出援不易完成任务。途中需要时间 40 天，万一发生变化，则增援无效，困难更大，可能被蒋军隔断，造成更不利的局面。建议用积极的政治交涉办法，或以适当的军事力量威胁青海省会西宁，以求达到接出西路军之目的。^① 军委和毛泽东经慎重考虑，“为避免平分兵力及准备万一（情况变化）时在东面作战”，决定红一方面军全部不动。随后，重新调整了援西军的兵力部署。后来，援西军西开至陇东镇原地区，距西路军尚有近两千里路程时，西路军兵败，援西军只好就地转入整训。事实说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采纳彭、任等人的建议，调整援西军的兵力部署是正确的。否则，红军兵力分散，援西军远征跋涉，既难以救援西路军，又分散了东面红军主力的实力，不利于西安事变的善后工作，如时局突变，红军主力难以迅速集结，将会导致全局战略上的被动。

3. 整军扩军，枕戈待命

彭德怀、任弼时的整军、扩军思想非常明确，特别是作为“前总”政委的任弼时，十分重视部队各级党组织的思想和组织建设，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

彭德怀、任弼时抓整训军队工作，主要是在西安事变以前。当时，由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罪行尚未在广大指战员中揭露；由于红军主力刚刚结束长征，身体极度疲惫；还由于红军进入新区，不能沿用过去打土豪的办法筹借粮款解决补给，加上陕北苏区人少地狭，经济落后，红军将士非常需要在政治思想、军事训练、后勤供给等方面进行休整。所以，山城堡战役刚一结束，彭、任就根据军委和毛泽东指示，电示红军主力各部、地方部队首长，部署全军进入备战姿态。自 1936 年 11 月 29 日起，进行为期 7 天的整理和教育，要求各部“健全党的组织，加紧进行党员的教育，深入传达上级指示信，（并）发动（官兵）讨论和测验”。提高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自觉性，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是整训部队的又一个重要内容。11 月 30 日，根据部队中个别人严重破坏纪律的问题，彭、任再次电示各部队首长及全体指战员：要“加强阶级教育，提高战士中的自觉纪律”，使大家

^① 《彭、任、左致军委电报》，1937 年 2 月 21 日。

懂得：“红军是工农的儿子，一切行动都是为工农大众的利益，凡属违犯和损害群众的利益及一切脱离群众的行为，我们须誓死反对。”我们要“发动工农群众对红军的批评，使工农和红军亲密的团结起来”。此外，他们还要求部队缩小机关，充实战斗连队，整理军容，巩固部队团结，改善给养等。

西安事变以后，部队整训工作的重要内容是进行统战工作教育。彭德怀、任弼时多次向红军各级首长强调，要争取群众与影响友军（指东北军、十七路军——笔者注），并以很好的态度与言论行为对待他们，与他们建立亲密的联系，严令全军指战员，“严守友军区域纪律，不打土豪，不破坏其现有政权组织”。因为这时红军已准备和东北军、十七路军联合作战，彼此间建立友好的合作关系甚为必要。经过各项整训工作，部队军事、政治、纪律等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部队面貌有了很大改观。虽然部分战士赤足单衣，粮食大部靠自筹，但指战员“仍然表现吃苦坚决”，“战斗情绪甚佳”。第三十二军等部的整军工作简报认为，整训“成绩尚好，干部中亦开始了整理”，“地方工作及友军统一战线的工作，由于执行新策略”，发生的僵化或“左”倾错误得到纠正，骑兵部队群众纪律“开始不好，以后有大的进步”。

扩大红军是任弼时历来重视并时刻抓紧的重要工作。在西安事变前后这段紧张的日子里，任弼时和彭德怀、杨尚昆仍未放松抓这项工作。彭、任、杨认为，“红军是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加紧充实红军部队，可以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建立。特别是当时局出现向不利方向发展的趋势时，“对东北军团结工作，倚赖红军十分重要”。可见，“扩大、巩固抗日的中坚力量，以实力推动全国抗日运动”，冲破蒋介石的封锁和限制，非常重要。为此，彭、任、杨于12月22日向红军各兵团首长发出关于扩大红军的指示信，提出：我们必须抓紧时机，利用一切机会来扩红，争取在1937年2月底扩大一倍（12月28日又提出6个月内扩大10万新红军），号召各级军政首长明确这一战略任务，努力动员全体指战员，动员前线 and 后方，“坚决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奋斗”。扩红工作方法为：（1）在广大群众中进行红军抗日救国主张及红军与人民群众血肉关系的宣传，激发群众参军参战的巨大热情，促成群众加入红军的热潮；（2）发动群众没收汉奸、卖国贼及民愤大的土豪的土地财物分给群众，解决其切身利益；（3）严肃政治纪律，严密扩红组织，组织竞赛和严格督察，总结经验教训；（4）定出扩红计划，利

用各种方法贯彻执行；(5) 训练入伍新战士，做好优待新战士家属的工作。根据释蒋后的新形势，彭、任还提出，红军应进驻人口较稠密地区，加强白区抗日义勇军组织，使其成为扩红主要源泉。同时，他们还十分注意依靠各级地方党组织开展扩红工作。

4. 主和主战，旨在实现和平

为努力做好西安事变的善后工作，中共中央于1936年12月27日向党内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1937年1月7日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的指示》。提出党的基本方针仍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抗日救国诺言，反对亲日派挑动内战阴谋。西安方面则力求巩固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争取已被蒋扣留的张学良回陕主事。但东北军、十七路军在战与和问题上分成两派，分歧愈演愈烈。中共代表团（对外称红军代表团）周恩来等，从中努力说解，分歧仍未消除。

这时，彭德怀、任弼时已率红军主力开到西安以北数十里的泾阳、三原地区。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彭、任也及时地去做说服工作。他们或在群众大会上宣讲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义，或者宴请有关进步人士，解释党的正确主张。十七路军将领赵寿山对放蒋想不通，彭、任、杨等亲往其警备司令部说服赵寿山，并同他合影留念。赵寿山后来回忆：“我起初也不大明白放蒋的道理，后来经过任弼时、南汉宸等同志的解释，才明确认识到放蒋是对的。”^① 为说服主战派，彭、任以红军前线指挥员身份，于1937年1月下旬来到西安城内，同杨虎城、王以哲等晤谈，出席在金家巷张学良公馆召开的有东北军、十七路军等方面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他们首先分析了国际形势，随后指出，目前国内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战争。中共鉴于这一根本形势，愿意同一切抗日力量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西安事变中放蒋是对的，争取、逼迫蒋抗日的可能性更大了，只要我们好好团结，张学良能够回来，蒋介石也可以抗日。因此，目前形势不宜用战争手段解决事变后的问

^① 赵寿山：《西安事变前后的回忆》，载《陕西文史资料》第15期，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6页。

题。打仗不利于张学良回来，可能引起更混乱的局面，那样，高兴的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彭、任等做了大量而耐心的说服工作。

然而，由于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自食其言，蒋张学良扣押，西安方面主战派占了上风，连联军代总指挥杨虎城也提出了准备开战的意见。1937年1月30日，周恩来等来到“前总”，同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等紧急会商。大家认为，为避免造成与西安方面的对立，只要两个朋友意见一致，红军可以保留自己意见，采取灵活的策略，支持他们的主张，包括和他们一起打仗。随后，彭、任又同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致电陕北毛泽东、朱德等表示：我们主张接受甲案实现和平，假如南京继续军事进攻，我方要自卫。“我们为和平奋斗的基本方针仍不变”，在力求和平中仍不同友军处于对立。因此，今天只有同他们一道打，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如打得好，和平仍然有望，否则，使友军从实践中相信我们的和平主张，在不利条件下接受和平。“打有两个可能前途，即迅速结束内战与延长内战的前途，我们应力争第一个前途的实现”。任弼时还说，同张、杨部一同打仗“不是为着发展大规模战争，而是为着求得和平解决”。我们应争取打几个胜仗，为和平而奋斗。毛泽东、朱德等当即复电指出：和平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我们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应始终同他们一道，协助他们争取更有利条件。

后来形势的发展，使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各级将领认识到中共代表意见的正确，大规模的新内战最终没有打起来。这与彭、任等所做的许多重要说服工作是分不开的。

二

彭德怀、任弼时在西安事变前后，从军事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作用在于：

第一，使红军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中共中央及军委保持一致，以军事实力为后盾配合政治谈判，力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创造了有利条件。

彭德怀、任弼时是前线红军的最高首长，他们对中共中央及军委的战略

意图理解得如何，直接关系到红军指战员的情况能否及时传给中共中央及军委，而中共中央及军委指示能否正确下达给各部队，是变为红军指挥员具体行动的大问题。简言之，就是党能不能指挥枪的问题。因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不久，顺利地实现全党全军的思想认识统一及军事指挥权的集中，尚需一个过程，更何况张国焘分裂主义的错误影响还未得到清算。所以，各部队的指战员，对中共中央及军委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解程度和执行的自觉性均有所不同。彭、任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抓住山城战役刚刚结束，新的战事到来之前的间隙，从政治思想、军事技术、后勤供给、军纪军容、统战等方面整训部队，提高红军的军事、政治素质。整训结果表明：来自不同根据地的各路红军，刚刚结束万里长征，就能够集中统一在中共中央及军委的号令之下，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这对于中国共产党应付突发的西安事变，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具有直接意义。而这些是与彭、任的辛勤努力分不开的。

难能可贵的是，彭德怀、任弼时对中共中央及军委的指示、命令并不盲目执行。作为前线最高指挥员，发现上级指示有需完善之处，在条件允许情况下，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根据战场实际情况，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政治上、军事上的远见卓识，直抒己见，协助统帅部进一步完善各项决策。前文中彭、任提出的几项建设性意见，都是立足于党牢牢把握红军主力巩固西安，准备应付突发事变，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以达“迅速停止内战，发动全国抗日战争”之目的，故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所采纳。当然，彭、任对自己建议中的不正确之处，一经军委和毛泽东指出即迅速改正。总之，彭、任率兵在外，以卓有成效的工作，一面整训部队，保证党对红军绝对领导；一面协助中共中央及军委完善军事战略方针，使中共中央、毛泽东得以坐镇陕北，运筹帷幄，用政治谈判和军事防御的两手策略，指导西安事变后复杂的军事和政治斗争，最终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

第二，使红军同东北军、十七路军保持“三位一体”，壮己声威，威慑敌军，有效地配合西安方面与南京政府、蒋介石的政治谈判。

西安事变刚一发生，中国共产党就明确表示红军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毛泽东致张学良电表示：“红军准备全力增援”。周恩来也表示要在解决事变的实际工作中发挥“红军作用”。所以，当张学良请求红军集中环县附近时，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即电复：拟以二万红军移驻环县、曲子、

豫旺堡、毛居井地域与你部靠近。如果胡宗南等部自北向南进逼时，红军坚决从其侧后进击，配合你部坚决消灭之。

彭德怀、任弼时率红军主力南下分两个步骤：一是12月20日红军兵分两路，取直径南开到庆阳、西峰、正宁、宁县地区，杨虎城、王以哲等以为事变和平解决，要求红军停止南下。红军这一步骤发生在西安事变期间，作用重在稳定张、杨部队。当时，蒋介石被扣留在西安，何应钦借“营救”之名，调兵遣将，准备向西安张、杨部大举进攻，其主力已进逼西安。此时张、杨部队内部出现许多不稳定迹象，南京方面还采取拉杨打张的分化策略，张、杨部队有被分化解体危险。而红军主力南下与其靠拢，一可以“壮其胆而振其气”，二可以解救张、杨危机，“应付各种事变，远离则不能”。据台湾李云汉的记述：“周恩来到达西安之日，陕北共军即开始从张、杨手中接防陕北延安等地。原驻陕北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均已奉调南移。有了周恩来等的协助和共军的支持，张学良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了。”张学良“强辞抗辩，自称西安事变为‘万不得已’之举”，和共产党联合，是“基于爱国抗日之合理之举”，释蒋离陕，“在抗日主张及行动未实现以前，尚难办到”。^①张学良对红军战斗力十分赞许，红军主力的增援自然使张、杨感到有了依靠。时隔55年后，张学良还赞叹不已：“我必须承认中共的军事力量不可忽视。”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跋涉进行军后，仍然保持军容实力。“面对这样顽强善战的共军，即（既——引者注）消灭不了他，最好与他合作。”

红军主力南下第二个步骤，是在蒋介石于南京扣押了张学良，又令重兵攻占潼关，形势骤然逆转时采取的。应杨虎城等再次请求，彭、任于1937年1月4日率部继续兵分两路南下。1月8日，左路中的第一军团到达陕西耀县、泾阳、三原。9日，右路中的第十五军团到达咸阳，又根据杨虎城的建议，奉命前出陕南商洛地区（1月15日）。10日，第二十七军开抵洛川。随后，红军“前总”驻扎在泾阳县云阳镇南门的文家大院，直属机关参谋部、政治部、地方工作部对外化名为“长江部”、“武昌部”、“衡阳部”，也驻守镇内。红军主力南下直入关中，引起东北军、十七路军及各界进步人士的兴奋和震动，西安方面迅速作出反应。据李云汉讲，杨虎城为准备对付

^① 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页。

南京军事行动，一方面加强同红军联络，请“彭德怀等部共军移驻三原、赤水一带，一方面派遣武装干部到各县整编民团，分发械弹，狂派粮食，准备动员作战”^①。因西安方面在红军主力支援下采取强硬态度，作了可战可和的两手准备，加上国内外舆论压力，蒋介石不敢轻举妄动。他下令缓攻西安，认为“此时我军如向西安进攻”，共军“必有一部向晋边渡河攻晋，以牵制我军，此着非常厉害”。^②蒋军将领对西安以红军为中心的“三位一体”作战也极为恐惧，认为“逆共合股，其势已成，若不早除，后将噬脐”。甚至力主动兵的何应钦也深有顾忌：红军“亦已陆续南下，若使一旦冲出潼关，则洪流滔决，必至难于收拾，中央调驻重兵于陕境，实系重在防”^③红军。

此外，这一时期红军的军事活动，使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界进步人士，包括国民党军队将领，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扩大了政治影响，也为后来中共中央立足陕北，指导全国革命斗争准备了大后方。

西安事变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努力，西安事变最终得到和平解决。中共除在政治上参与事变和平解决的工作外，军事上也起到了有力的策应和后盾作用，其中，彭德怀和任弼时是功不可没的。

作者：宋毅军，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副巡视员，研究员。

① 李云汉：《西安事变始末之研究》，第228页。

② 陕西等三省档案馆藏，《西安事变史料选编》，第196页。

③ 陕西等三省档案馆藏，《西安事变史料选编》，第276页。

刘志丹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军事贡献

香 娟

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一书中，用近三千字的篇幅描述了刘志丹的生平和功绩，其中有这样一段：“刘志丹是个现代罗宾汉，怀有山里人对富人的仇恨；在穷人中间，他成了救星；而在地主和放债者中间，他又是上天的神鞭。”

刘志丹（1903—1936），原名刘景桂，字子丹，是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从1930年到1935年，他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了长达6年的艰苦奋斗，创建了西北红军，建立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刘志丹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坚决走井冈山武装割据的道路，并结合当时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的建军思想和革命实践，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财富；他开创革命根据地的大无畏精神和毅力，将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一、建立革命武装

1928年初，刘志丹受中共陕西省委指派，和谢子长、唐澍等到冯玉祥部许权中旅工作，发展军内的党组织。刘志丹等带领党、团员深入到部队驻地，宣传、组织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和赤卫队，打土豪分财物，推动了当地农民革命的发展，进而又推动了部队政治、军事工作的发展。同年五六月间，刘志丹和唐澍等领导了渭华起义，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唐澍任总司

令，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渭华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以工农群众和军队相结合，以武装起义与苏维埃政权相结合，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重要起义之一。

根据中央指示，陕西省委于1927年9月26日至28日在西安召开会议，会议提出“党到农村中去”、“党到军队中去”的口号，要求各地党组织在军事上举行武装兵暴；在政治上进行土地革命，打倒封建地主阶级。按照这个精神，中共陕西省委派出一批共产党员打入陕西、甘肃的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兵变工作。1930年春，刘志丹受党组织派遣，来到庆阳三道川（今属吴起县），趁甘肃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扩充势力之机，打入该部开展兵运工作。10月，刘志丹前往绥德，参加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继续开展兵运工作，待条件成熟时再举行兵变，建立红色武装。会上成立了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谢子长、刘志丹分别任正副总指挥。会后不久，刘志丹即回到陕甘边界开展“兵变”。9月28日，刘志丹借其任骑兵营第六营营长之机，以商筹粮草的名义率部进驻甘肃合水县太白镇。与二十四营的赵连璧（即赵二娃）取得联系，商定计划。10月1日，刘志丹、杨树荣（即姜兆荣）击毙陇东民团第二十四营营长黄毓麟、副营长王凤珠。缴获该营一连全部枪械弹药，并击溃二连。部队在转移途中，活捉三连连长马建有，将三连枪支和马匹也全部缴获。这就是有名的太白起义。此次战斗共缴获90余支枪械，10余匹骡马。随后，刘志丹组建起一支四五十人的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所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群众称其是“刘志丹游击队”或“南梁游击队”。这一军事行动奠定了陕甘边革命武装斗争的基础。

刘志丹带领游击队分三部分在太白、华池县南梁（当时属庆阳县）、保安和安塞边界打土豪，筹集粮饷。仅仅两个月，刘志丹游击队就扩充到150余人。因部队受挫，处境困难，刘志丹通过马燧五等与地方军阀苏雨生部联合，部队被编为陕西警备骑兵旅补充团。刘志丹因打土豪被疑心的苏雨生设计关押，后经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任职的共产党员南汉宸、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和省委的多方营救后出狱。

在建立革命武装的过程中，刘志丹、谢子长等清楚地认识到军事运动应当同农民运动相结合。搞革命武装，依靠在旧军队里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还是要走井冈山道路。此时，刘志丹得知，在陕甘边界的子午岭和

陕西黄龙山区，有很多绿林武装，其中不少人出身贫苦，因不堪忍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生活无着，而逼上梁山。这些绿林武装与地主阶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改造，他们就有可能走上革命道路。这种构想开始时是作为补充兵运工作的，随着兵运工作的屡屡受挫，这种方式终于成为刘志丹等共产党人创造西北红军的主要方式。1931年9月，刘志丹到南梁地区，将分散活动在合水、庆阳山区的赵连璧、杨增胜、贾生财三支武装集合起来，在合水太白的倒水湾进行整编，建立起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陕甘边境游击队（也称南梁游击队）。全队300余人，分为三个大队，刘志丹任总指挥。

南梁游击队建立后，刘志丹逐渐意识到：游击队虽然建立起来了，但部队给养无法解决，加之群众对我们队伍性质不了解，要争取群众的广泛同情和支持，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刘志丹决定先争取国民党西北军的番号 and 给养，使游击队渡过难关，并利用公开身份，扩充部队，伺机打击敌人。1931年10月下旬，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与转战到达的陕北游击支队在华池县林锦庙（今林镇）一带会师。会师后，革命武装发展到千余人。因接近寒冬，部队缺吃少穿，又缺弹药，没有安身之所，随时都有失败、覆没的危险。为了解决眼前的困难，刘志丹灵活运用统战策略，决定暂时利用陈连璋，经多次谈判，陈连璋再次任命刘志丹为第11旅旅长，把庆阳新堡一带划为11旅防区，并拨给了棉衣、枪支弹药，解决了部队的燃眉之急。到12月中旬，中共陕西省委派荣子舞到部队传达省委的指示：在全国上下一致抗日的形势下，省委决定部队脱离陈部，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12月底，部队离开庆阳县新堡和悦乐镇，转移到正宁县北柴桥子村。1932年元旦，全体军人大会在北柴桥子村召开，由省委代表荣子舞宣布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以及同盟军领导人名单，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

1932年2月12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塬细嘴子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后叛变），杨重远任参谋长。此后，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红旗在陕甘边界的上空高高飘扬，标志着陇东的革命武装斗争从长期以来的隐蔽状态转向公开化。

刘志丹以一个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的胆略和气魄，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经受了多次兵运工作的挫折，并通过改造绿林武装的大胆实践，结合实际，

百折不挠，推动了西北革命武装斗争的发展。

二、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刘志丹曾经说过，“多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几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是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要有根据地。”在兵运工作屡受挫折的情况下，刘志丹从实践中逐步地悟出，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建立自己的武装，没有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利用地方军阀只是权宜之策，应该努力创造条件搞我们自己的武装，把革命武装的建立同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结合起来。他深刻认识到，要想在陕甘边开展革命斗争，必须走毛泽东的井冈山道路，采取“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①。因此，从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刘志丹把全部心血都花在创建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事业上。按照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建立人民武装，积极开展当地的游击战争，创建红色政权，以完成在积极开展当地的游击运动中，创立新的红军队伍及陕甘边苏维埃的任务。^②

1932年秋，谢子长、刘志丹曾多次率领红军陕甘游击队到照金地区宣传土地革命，传播革命火种，开辟地方工作。1932年12月26日，刘志丹带领红二十六军挥师东进，数战告捷，横扫了照金腹地和外围的反动势力。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兔儿坪正式成立，随后，建立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4月5日，陕甘边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在照金召开，选举产生了边区革命委员会。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使国民党当局极为恐慌。他们一面调拨枪械武装照金周围的反动民团，一面调兵遣将“围剿”照金苏区。苏区军民团结一致，以各种灵活机动的战术袭击敌军，取得很多胜利。6月下旬，因“左”倾错误的干扰，红二团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9页。

^② 《中央关于陕甘边区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苏区的决议案》，1932年4月20日。

南下渭河，随后陷入敌人重围，苦战数月，终因敌军重兵“围剿”而兵败终南山。随后，刘志丹等领导的红军武装北向子午岭进发，来到合水县包家寨子休整。

照会根据地失守后，陕甘边的党、政、军领导机关随军转战庆阳、合水、宁县一带，最后也来到包家寨子。

南梁位于陇东今华池县与合水县境内，地处桥山山脉中段大梁山麓，方圆百余里，是西北黄土高原的偏僻地区，地域辽阔，沟壑纵横，地形非常复杂。这一带是刘志丹、谢子长早期从事兵运活动的地方，群众基础很好。加之距离反动统治中心兰州较远，距西安、银川也为数百里之遥，且交通闭塞，境内之敌多为小股地主武装，战斗力较弱，反动统治势力比较薄弱。南梁基本上属于“三不管”地区，在这里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有回旋余地，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地理优势。刘志丹曾豪爽地说：连土匪搞几支枪就可以在这里占山为王，弄得军阀无可奈何，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可以在这里闹革命呢？同时，这里阶级矛盾尖锐，广大人民群众深受反动势力的剥削和压迫，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革命要求，易于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易于聚集革命力量，在陕甘地区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也有着良好的群众基础。

刘志丹高瞻远瞩地分析了陕甘边革命形势，经过深思熟虑，提出召开一次有红军和陕甘边特委领导人参加的联席会议。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联席会议，这就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包家寨会议。会上，刘志丹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陈述了组建红26军42师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全面剖析了把南梁地区作为陕甘边根据地的有利因素和条件；提出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沿着敌人统治薄弱的桥山一带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建立几个根据地的主张。会议最终确定了刘志丹主张的以南梁为陕甘边区革命斗争中心的战略方针，为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和红军政权的建立指明了方向，使西北地区的革命形势转危为安，勾画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发展的基本格局。

包家寨会议的核心内容，是明确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是陕甘边革命斗争走向新胜利的重要转折点。包家寨子会议把陕甘边根据地的中心选择在南梁，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运用毛泽东关于红军政权的理论，解决陕甘边革命斗争实际所作出的正确决策；在同上级党

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会议纠正了“左”倾错误，总结了陕甘边革命斗争经验，确定了党和红军发展的战略方针；真正把陕甘边革命斗争的领导权掌握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共产党人手里。为陕甘边未来革命斗争的发展和红军政权的建立指明了方向。

根据包家寨会议的决定，1933年11月8日，王泰吉、刘志丹在葫芦河川的莲花寺主持召开陕甘边区红军游击队全体军人大会，正式宣布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师政委，刘志丹任师参谋长，黄子文任师政治部主任。1934年1月，经红四十二师党委同意，王泰吉到豫陕边一带从事兵运工作（后被敌逮捕杀害），刘志丹继任师长。整编后的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南梁地区作战。春节前，在莲花寺养伤病愈的习仲勋到达二将川，担任第二路游击队队委书记，兼任庆阳义勇军指导员。1934年2月25日，中共党组织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召开群众大会，选举恢复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还不满21岁的习仲勋当选为主席。

1934年7月下旬，刘志丹和杨森、习仲勋、张邦英等分析了当前的斗争形势，并制定下一步的工作任务。经特委开会通过，《中共陕甘边特委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制定下发，按照《决议》提出的“创造中心苏区，转变临时政权”（即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这样巩固苏区的过程中，分配土地，统计人口，宣布苏维埃政府的选举法，务必于十月革命纪念日正式成立苏维埃政权”的要求，11月4日到6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荔园堡老爷庙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00多人。会议期间，代表们认真讨论了根据地建设的重大问题，通过了刘志丹为大会起草的《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和蔡子伟起草的土地、财政、粮食等决议案。会议根据中华苏维埃选举法，选举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实现了临时政权向苏维埃政权的转变。会上还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区赤卫队总指挥部。习仲勋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志清任赤卫队总指挥。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确立，在陕甘边乃至西北革命斗争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三、根据地的发展壮大

由于全国各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和红军的壮大，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越来越大。1933年10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的同时，也开始了向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进攻。

1934年春，在蒋介石指令下，陕甘国民党军队调集了共8个团万余人的兵力，企图以分进合击的战术一举扑灭陕北革命的熊熊火焰。当时，陕甘边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总共不过1300多人，而且武器装备很差，敌我力量悬殊很大。刘志丹分析认为，敌人来势凶猛，规模空前，大有踏平根据地之势，但敌人骄狂冒进，协同混乱。他在进行战斗动员时说：“打仗一定要灵活，不要硬打，能消灭敌人就打，打不过就不打。游击队要善于隐蔽，平常是农民，一集合就是游击队，打仗是兵，不打仗是农民，让敌人吃不透。”^①刘志丹针对敌人平分兵力和战线过长的弱点，决定由第三路游击队牵制南线之敌，他亲自率红四十二师和第二路游击队转外线消灭正面之敌。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游击队先后在陕西和陇东境内连续打胜仗，其中以劣势兵力取得胜利的西华池之战就是刘志丹在陕甘边第一次反“围剿”斗争中的军事杰作。西华池战斗歼敌一个团部及两个整营共700余人，创造了步骑兵协同作战的范例。之后，红军在刘志丹的率领下，依然转入外线作战，迫使敌人撤出南梁根据地。1935年5月间，红军在外线歼敌取得重大胜利后，回到南梁根据地，陕甘边根据地长达4个月的第一次反“围剿”斗争胜利结束。

这次反“围剿”斗争共有大小战斗30余次，歼敌3000余人，是对陕甘边红军和根据地的第一次严峻考验。广大军民不仅经受住了这次考验，而且在斗争中壮大了红军，进一步巩固了根据地，建立了革命政权，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

为了粉碎敌人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根据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巡视员黄翰的建议，在陕北赤源县周家硷召开联席会议。会议由刘志丹主持，讨论了统一两地党政军的领导和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等问题。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工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军

^① 习仲勋，《难忘的教诲——纪念刘志丹同志九十诞辰》，载《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委)，选举惠子俊为工委书记，刘志丹为军委主席（一说谢子长）。为加强作战指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成立，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尚任政委。

2月18日，刘志丹发布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动员令》在分析了全国和陕甘边革命形势后，着重分析了敌情，认为敌人此次“围剿”的规模虽大，但各派军阀之间矛盾重重，弱点很多，蒋介石把自己的嫡系部队摆在第二线，派非嫡系为先锋，而各派系又各有自己的打算，都以保存实力和地盘为目的，只有高桂滋部冒险进犯，打破该敌，即能打乱敌人的“围剿”计划。因此，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决定，红军反“围剿”的任务是集中兵力，打破高桂滋部的进攻，然后向南、向西发展，逐步将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动员令》还详尽地部署了红军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作战方针。命令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主力北上陕北，同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主力协同作战，留下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一部就地坚持游击战，骑兵团和机向外线出击，地方游击队和赤卫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活动牵制和打击敌人，形成了主力红军与游击队相结合、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相结合，主攻方向与牵制方向相配合，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相配合的阵势，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动员令》最后要求：红军、游击队、赤卫队、少先队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树立必胜的信心，坚决服从命令，反对游击习气，以不怕牺牲的精神夺取斗争的胜利。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的组建和《动员令》的发布，是重大的战略决策。它为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从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做好了充分准备。

5月，红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在安定县白庙岔与陕北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会师，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刘志丹任总指挥。刘志丹审时度势，及时捕捉战机，实施灵活指挥，巧妙地打击敌人。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以刘志丹为首的前敌总指挥部的指挥下，连战获胜，所向披靡，在两个多月的反“围剿”斗争中，共消灭敌正规军5000多人、民团武装3000多人，缴获长短枪械3000余支、200余挺轻重机枪，消灭了敌人大批有生力量，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长等6座县城，并在2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也扩大到30多个县。主力红军发展到两个师9个团，共5000多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4000人。在红军的沉重打击下，北线敌人彻底失败，南线敌人亦退兵，敌马鸿宾部也从南梁退出。9月，红军胜利回到

南梁。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

陕甘边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使陕甘边、陕北两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即西北根据地。其中已经建立县级苏维埃政权的有华池、庆北、新正、新宁、永红、赤安、安塞、淳耀、赤水、甘洛等，整个西北革命根据地，其游击区含陕甘两省 30 个县，总人口超过 100 万。陕甘边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统一后的西北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仅存的一块最完整、最巩固的红色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成为全国革命的中心，并以此为基础开创了全国革命的新局面。

1935 年 7 月，蒋介石亲白部署陕、甘、宁、青等省的部队对进入陕北的红军实行分割“围剿”，调集反革命军队共 10 万余人，对陕甘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

刘志丹认为，处于防御地位的弱小红军，要打破强大之敌的“围剿”，必须抓住关节点，不能蛮干乱打，必须周密部署，才有取胜的把握。他认真地分析了敌情，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打击西渡黄河不久、态势孤立、立足未稳的阎锡山晋绥军。他认为，打退晋绥军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具有关键意义。刘志丹在战斗中灵活机动，战法独特。1935 年 8 月 20 日，他率部在绥德、吴堡地区向敌军发起突然进攻，歼灭晋绥军第二〇六旅 1 个团和 4 个连，俘虏 1800 余人，迫使晋绥军主力撤回黄河以东，从而巩固了苏区的后方，为以后集中兵力反“围剿”创造了条件。

9 月中旬，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同长征到达陕甘苏区的红二十五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被称为西北“活地图”的刘志丹，协助军团长徐海东研究部署伏击歼敌方案。10 月 1 日，为打破敌军的进攻，红十五军团决定采取集中兵力，以围城打援的战法，歼击孤军冒进之敌。因对当地地形十分熟悉，刘志丹提出了有利于部队隐蔽和歼敌的劳山作为伏击区，并精心部署红军摆下口袋阵。结果，劳山之战全歼第一一〇师师部又两个团，毙伤团长何立中以下 1000 余人，俘团长杨德新以下 3700 余人。缴获长短枪 3000 余支，轻重机枪 180 余挺，炮 12 门，战马 300 余匹和电台 1 部。

11 月初，红十五军团在甘泉附近与长征到达陕甘苏区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会合。3 日，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

治委员，辖第一、第十五军团。21日，在直罗镇战役中全歼敌第一〇九师和第一〇六师1个团，俘5300余人。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刘志丹等老一辈共产党人领导创建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有力地推动了西北地区土地革命的开展，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地区的反动统治；它牵制住一部分国民党军队于自己周围，强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领导的武装壮大和根据地的建设；随后，陕甘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使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中国革命最终取得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6年4月14日，在指挥攻占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刘志丹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3岁。为纪念他，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并在城北建刘志丹陵园。

刘志丹一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英勇善战，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忠心赤胆。他是西北工农红军的缔造者，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毛泽东称他是“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赞誉他“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朱德称刘志丹为“红军模范”。刘志丹在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中为壮大革命力量，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毅力，坚决走井冈山武装割据的道路。他的建军思想和革命实践，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笔宝贵财富；他身经百战，历经种种磨难，英勇无畏、不屈不挠。刘志丹是陇东家喻户晓的英雄，他在革命战争中形成的军事思想和杰出的军事指挥艺术，在中国革命史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刘志丹为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作者：胥娟，女，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审处副主任科员。

试论刘志丹、谢子长的兵运工作

任学岭 王保舟

一、刘志丹、谢子长在陕甘边的兵运活动

渭华起义失败后，1928年七八月间，刘志丹、谢子长先后回到陕西省委，旋即被派往陕北。时当陕北特委处在米脂遭到破坏之后的消沉时期。根据中共中央、中共陕西省委和陕北特委的指示精神，刘志丹、谢子长便开始了陕北和陕甘边界的兵运活动。

1929年春，刘志丹回到家乡保安县（今志丹县），在当地党组织负责人王子宜和乾北暴动失败后回到家乡从事革命活动的曹力如的帮助下，利用保安县民团团总路仰之和政界的矛盾，将该路赶走，刘志丹、曹力如分别担任了正、副团总。刘、曹利用这一合法身份力图将这支民团改造成为革命武装。保安县党组织遂派一批党员进入该民团，并建立了党的支部，开始了对这支反动武装的改造。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支持当地群众的革命斗争，曾逮捕和处决了几个为人民痛绝的豪绅。刘志丹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惶恐和反扑，迫于反革命的压力，刘志丹离开了民团。曹力如和其他人则继续在民团潜伏，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1930年初，陕北特委派刘志丹、谢子长到宁夏苏雨生骑兵第四师做兵运工作。刘、谢带数十人，以率部来投的合法名义，进入苏雨生部。刘志丹、谢子长不但在陕北、陕甘边人民中有崇高威望，而且在当地军阀中也享

有盛名。苏雨生以“小庙得大神”，偶得英雄的仰慕心情，款留刘、谢。苏雨生为求扩大势力，以谢子长为旅长，同时委派刘志丹为张廷芝第十六团中校副团长，图以借助刘志丹掌握张廷芝（张与苏原非一个系统）。随后，陕北特委又先后派出共产党员张秀山、张东蛟、王世泰、马云泽、高鹏飞、李树林、黄玉华、贺晋年、郝兴民等 30 人，进入苏雨生部，并成立了党的军委，书记为张东蛟。1930 年春，苏雨生在宁夏失败，流窜于陕甘边界。这时，陕北特委调回谢子长，刘志丹则被苏雨生派回陕北，扩大实力。刘志丹回到保安后，从保安民团拉出一些人作基础，收集旧部，接收民间武装和“杆子”（土匪），很快组成一个营，刘志丹为营长。部队活动于庆阳北部的三道川地区。与此同时，陕北特委又派谢子长、阎红彦、赵洪枝、赵文蔚、马云泽、李维俊去宜川后撤天收编土匪杨庚武部周维奇营。即将该 300 余人枪拉出。随即进到三道川与刘志丹所部会合，编为一个团，谢子长任团长。后张廷芝以其妹作诱饵，收买周维奇，周维奇遂与张合谋叛乱，谢子长等少数干部脱险，部队均被搞垮。当时刘志丹正在庆阳，他获悉周维奇叛乱后，立即回返三道川，途中遭张廷芝追捕，刘志丹避于永宁山寨，在曹力如、王子宜保护下脱险。刘志丹、谢子长在陕甘边的军事活动受挫。

1930 年 10 月，刘志丹、谢子长回特委参加第三次扩大会议。会后不久，刘志丹被派往保安拉队伍，谢子长则调上海中央特科受训。

刘志丹再次回到保安，在保安党组织帮助下，组成一支十余人的武装部队，10 月上旬，刘志丹率领这支部队以陇东民团军第六营的番号，巧袭太白镇，击毙该镇民团团总黄毓麟，缴获长短枪 60 余支，骡马数十匹。其后，便游击于保安、甘泉、合水一带，两三个月内，发展为 200 余人枪。后并岳秀部二五六旅高双成的一个营，进驻保安进行“围剿”。刘志丹率部与敌交战。战斗多次失败，部队损失过半，被迫退至宜君县小石崖一带子午岭山区，刘志丹在陕甘边界的军事活动再次受挫。

1931 年初，刘志丹派游击队支部书记杨树荣去省委联系，省委指示他再次与苏雨生合作，积蓄力量，待机起义。1930 年冬季苏雨生在宁夏失败后，接受了杨虎城改编，当上了旅长，驻防彬县。当刘志丹再次率部打入苏雨生部时，苏雨生即将刘志丹的部队改编为补充团，刘志丹任团长，驻防旬邑县职田镇。刘志丹利用这个时机，一面收集被打散的部队，一面招收革命青年，积极扩大部队，准备起义。这时，地主豪绅暗中与国民党陕西省政府

串通，密谋捕杀刘志丹。苏雨生与反动当局合谋，假以开会为名，诱骗刘志丹到彬县，将刘志丹逮捕，关入彬县监狱，并决定判处死刑。同时调动两个团围攻职田镇。部队连排长会议决议，为营救刘志丹出狱，全军放下武器。部队被缴械后，编为徒手运输连，驻彬县东关村娘娘庙。刘志丹入狱第8天，恰遇杜斌丞因公入甘，途经彬县。经杜先生解救，刘志丹得释。第三次起兵又失败了。

刘志丹出狱后，巧遇同乡李勤甫。李勤甫系陇东暂编十三师师长陈珪璋的副官处长，他为陈珪璋在天津购买驳壳枪两打，行至彬县被苏雨生扣留。陈苏之间的矛盾骤然激化。李勤甫借刘志丹去平凉晤见陈珪璋。陈明知刘志丹是共产党员，却十分敬佩，鉴于陈苏之间的尖锐矛盾，陈愿与刘协力对抗苏雨生，并委任刘志丹为陇东十三师直辖十一旅旅长，防地划为宁县、正宁两地。这时，杨虎城已下令消灭苏雨生，通令陈珪璋执行。于是消灭苏雨生部的作战计划便产生出来了：驻早胜镇陇东十三师直辖十三旅高广仁部，驻宁县、正宁陇东十三师直辖十一旅刘志丹部为攻歼部队；陇东十三师刘宝堂旅为追歼部队。不料，高广仁与苏雨生、张廷芝早有勾结，高、苏、张三部计划退往宁夏称霸一方。在这一阴谋之下，1931年6月29日，高广仁突然行动，将刘志丹旅打垮，与此同时缴了刘宝堂旅的械，并将排长以上干部绑架，向北窜逃。但高军行至合水，被陈珪璋部西峰镇驻军蒋云台旅打散，陈珪璋部两个旅因而得救。高广仁残军退往宁夏后完全失败。而这时蒋云台却通缉逮捕刘志丹。在这种形势下，刘志丹留张秀山、王世泰、张景儒、刘约三等人于陈部，继续隐蔽，以待时机。他借马锡五高队，进入南梁地区。刘志丹又遭到第四次失败。

1931年9月中旬，刘志丹、马锡五进入南梁地区后迅速展开活动，很快便收编了赵连璧、杨培胜、贾生财三股武装，分别授予三个营的番号：赵连璧部为第一营，营长赵连璧；杨培胜部为第二营，营长为杨培胜；贾生财部为第三营，营长贾生财。至此，刘志丹终于组成了一支由共产党人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不久，该游击队与转战陕北的晋西游击支队会合，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任正、副总指挥。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打出了红旗，是西北红军的前身。

二、对刘志丹、谢子长开展兵运工作的几点认识

1. 开展兵运工作是渭华起义失败后的形势所迫，且具相对有利的条件

以渭华为中心的各地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当局加强了在陕西的反动统治，疯狂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党的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怎样建立、发展、壮大自己的军事武装组织，是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而当时陕甘地区地方贫瘠，1928年起又发生了连年的自然灾害，加上军阀混战不断，经济急剧崩溃，农民生活极为贫困；再加之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军阀的腐败，官长克扣军饷，层层盘剥，士兵的生活也极其恶劣。军阀之间争夺地盘，矛盾重重，相互厮杀，士兵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被任意打骂甚至遭杀害，官兵关系紧张，士兵不满情绪十分严重，自发的兵变时有发生。

此外，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远离陕甘地区，当地的驻军多为南京政府不够重视的杂牌军队和地方军阀。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军队退出陕甘地区，当时该地的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力量为杨虎城十七路军及一些地方军阀，他们为扩充自己的实力，到处收兵买马。这些都说明当时开展兵运工作不仅是形势所迫，而且存在着开展兵运工作的相对有利条件。

2. 刘、谢等人开展兵运工作符合当时中央、陕西省委及陕北特委的指示

1928年2月，中共中央分析了开展兵运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为中国军队的军阀都是中国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工具，但其中士兵分子，都是全中国失业的工人，大部分失业的农民，及一部分流氓无产阶级。他们遭生活的压迫，受军阀的雇用，所以他们是一种经济压迫受到极点，冒险的盲目群众，要为这部分群众不要成为敌对阶级的利用的工具，因此我们要做活动……兵士运动是客观的和可能的。同年3月6日，中共中央在《关于革命形势与斗争策略的决定》中提到，党的策略应该是组织革命兵士，鼓动兵

变，务普遍进行等。^①

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确立了兵运工作的方针；同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胞书》又阐明了国民党士兵在中国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和开展兵运工作的重要性。

1929年6月22日，中共中央通过的《陕西问题决议案》指出，陕西党目前的任务是加紧士兵中的工作，积极做士兵中的工作，积极发动士兵中的日常生活斗争，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以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使与工农斗争汇合起来。^②

1929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目前中国士兵状况与我党兵运策略及工作路线》的第56号通告，阐述了兵运工作的策略方针和具体要求，规定了向敌军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的口号。1930年6月19日，中共中央特别通告《关于组织兵士暴动问题》，就怎样实现兵士斗争的最高形式，过去的宝贵经验与教训、组织兵士暴动的工作路线等方面又作了详细的说明。

1931年3月1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兵运工作的决议》中又指出：“当此国内战争时期，我们的党不但要领导红军英勇的来解除国民党的武装，而且党以及一切革命的组织，必须要在敌人军队中进行破坏和瓦解的工作，在政治上夺取兵士群众到革命方面来。只有这双方面的共同行动，才能取得对敌人的胜利！”^③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1929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在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党在目前的工作是：加强农民运动，巩固学校阵地，积极开展兵运工作，派党员到白军中争取武装力量，迎接革命高潮。随后陕北特委在同年四五月间的榆林红石峡扩大会议上，又提出了“三种颜色——白色、灰色、红色”的武装斗争形式，而其中的“白色”即为开展兵运工作，并决定以“白色工作”为主。于是，兵运工作成为陕甘地区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

① 参见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陕西省委》，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8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9页。

由此可以看出，刘、谢二人从事的兵运活动，适应了当时中共党组织的要求，也符合陕甘地区当时党组织的中心任务。

3. 通过兵运工作，为党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党员数量也得到增加，党的力量得到发展

刘志丹、谢子长等经过三年的兵运工作，多次打入敌军内部，出生入死，积极工作，虽然大多遭到失败，但却有力地推动了西北地区武装斗争的开展，并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军事、政治骨干，为尔后创建西北红军和陕甘宁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参加兵运工作的许多共产党员，后来大多成为西北红军的领导人。如他们本人、习仲勋、马文瑞、王世泰、张秀山、贺晋年等，为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的创立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以及以后的革命战争与人民军队建设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另一方面，他们在军阀部队中通过各种方式，与士兵交朋友，把士兵吸引和团结到共产党组织周围，还吸收进步士兵加入了党的组织，培养了一批革命力量，使党的组织得到发展。正如王世泰回忆说，在苏雨生部补充团时，“志丹指示我们要利用暂时稳定的机会，抓紧作好战士的思想工作，发现积极分子，发展党员。那时，我们党的活动是秘密的，主要领导人都是党员，虽然党员身份不公开，但活动还是搞得有声有色的，经过一段工作，战士们的情绪比较稳定了，我们吸收了几个党员。我记得我们那时的党员有刘志丹……二十几名。二十几名党员，在当时可是一股不小的革命力量，他们分散在各个连、班起骨干带头作用。”同时，也正是他们的兵运工作，使国民党军队和官兵加深了对红军的了解，开始同情革命，或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以后中共军事统战工作在西北地区的开展奠定了基础。如，先后与刘志丹交往的国民党军官韩练成、牛化东、曹又参、左协中、刘宝堂等受到刘志丹政治思想的影响，大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些，就为后来的革命斗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参加斗争，谢子长、刘志丹还对陕北地区的帮会组织哥老会进行争取改造，将一批哥老会成员逐步引向革命道路。如永宁山哥老会大爷马锡五、小石崖哥老会大爷罗连城等。

4. 刘志丹总结兵运工作的经验教训，将军事工作转向农村，为后来创建自己的军队打下了基础

如前所述，刘志丹、谢子长开展的兵运工作，既符合党的指示精神，也为以后党的军事工作的开展培养了大批骨干，但兵运工作最终未能取得完全胜利。这使他们逐渐认识到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刘志丹等意识到干革命首先要有枪杆子，这是一个朴素的观念。枪杆子从哪里去抓？枪在敌人手里，在反革命军队里头，从哪里去抓，这是又一个朴素观念。走了弯路，吃了大亏，认识了一个道理：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利用现成的旧时武装，一切旧时的武装都不能生成革命的军队。而这一点正是列宁主义关于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理论原则。从这一原则出发，在创建革命军队的过程中，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争取一些条件，无疑是正确的。但这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而根本途径是走向人民，在人民群众中创造人民的军队。正像刘志丹总结这一历史时期的经验时所说的：利用军阀是暂时的，利用军阀的名义是搞不成的，准备了条件我们就要单独出去搞。^①“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七十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象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②谢子长也意识到：“搞革命武装，依靠在旧军队的合法地位招兵买马是不行的……还是要走井冈山的道路。要发动群众，搞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用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武器武装工农，建立和逐步壮大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只有这样的部队才是人民自己的部队，和人民血肉相连，永远不会被敌人打垮。”^③从这以后，他们便甩开了军阀部队而另寻途径了。

综上所述，刘志丹、谢子长的兵运活动，虽然其间历尽了各种各样的失

① 王世泰：《九一八以前刘志丹同志的军事活动》，1945年7月17日。

② 马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第3版。

③ 贺晋年：《回忆子长同志》，载《革命英烈》1982年第1期，第16页。

败、挫折，但同时，这些失败也使共产党人增长了才干，积累了开展军事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为尔后的西北红军锻炼和造就了一批重要的军事骨干力量，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扩大了共产党在陕甘边区的影响。他们不畏艰辛和勇于探索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兵运工作作为刘志丹、谢子长早期试图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尝试，是值得充分肯定和赞扬的。

作者：任学岭，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北历史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

作者：王保存，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办公室主任，硕士，讲师。

谢子长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雷 鸣

陕甘边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和甘肃边界地区创建的，以当时隶属甘肃庆阳的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1935年2月，中共陕北特委和中共陕甘边特委赤源县周家硷联席会议后，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西北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根据地。正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所写：“陕甘根据地，是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经过多年艰苦奋斗创建的。”这块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转移北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落脚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投身国共合作坚持八年全国抗日战争的出发点，继而成为领导全国革命力量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人民当家做主新中国的领导中心和大本营。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为整个中国革命的成功转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谢子长、刘志丹两位亲密无间战友，都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红军指挥员，西北人民爱戴的革命领袖。在长期枪林弹雨、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中，两位将军用鲜血凝成无比深厚的战友情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22页；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榆林地委党史研究室编：《陕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第4—5页。

道。从渭华暴动到宁夏兵运，从“三道川事变”到西北反帝同盟军，从红军陕甘游击队到红二十六军，从风雪子午岭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从开创陕甘边苏区到西北革命根据地建立，从反动派的血腥追捕到“左”倾错误的残酷迫害，他们风雨同舟、生死与共，渡过无数惊涛骇浪，历经多次挫折失败，败不丧志，愈挫愈奋，终于领导人民创建了西北红军，开辟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功勋卓著，永载史册。

这里，笔者仅就多年耳濡目染、访问聆听、搜集博览所得，和与会老前辈及各位学者就谢子长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即谢子长对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贡献和丰功伟绩，透过史实，作以探讨。

南梁播火种

谢子长，1897年1月19日出生于陕西省安定（今子长）县李家寺乡（镇）枣树坪村一个较富裕的农民家庭，原名世元，又名德元，字子长，号浩如，化名秋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2月21日，因伤势恶化逝世，时年38岁。

学生时代，谢子长受五四运动和杜斌丞先生“教育救国”思想影响，未及中学毕业，即于1919年末回到家乡安定县任教办学。然而，两年的办学历程，使他深切感悟到，仅靠笔杆子和温和的斗争方式，解救不了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要改革黑暗腐朽社会，救国为民，只有拿起枪杆子，组建革命队伍，以武装打垮旧世界。于是1922年春天，他辞去教务，投笔从戎，胸怀“救国为民，以武装打垮旧世界”夙愿，前往山西太原，投考了阎锡山办的山西陆军学兵团。

1923年，谢子长以阎锡山折服的优异成绩从太原学兵团毕业赴河南进行社会考察后，曾奔赴京津地区参加反帝斗争、探寻革命真理。后于1924年春天返回家乡安定，联络吸纳一批进步青年，于同年8月创办由他任团总的安定县民团。同时，协助中共地方党组织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组织农民协会，积极领导开展农民运动。由此踏上创建革命武装的征程。

由于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在上海和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合作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由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展开了武装反抗帝国主

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长达 10 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即土地革命战争。这年 8 月 1 日，周恩来、朱德等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10 月，毛泽东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

紧接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唐谢、谢子长、李象九、白乐亭等，遵照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决议及相关指示，于 1927 年 10 月 10 日在陕北清涧发动起义，打响了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清涧起义部队受挫后，唐谢、谢子长、白乐亭、阎揆要等，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于翌年 1 月 1 日率部在陕西韩城西庄镇组建唐谢、谢子长分任正、副总指挥的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北上清涧，安定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沿井冈山道路开辟革命根据地。

工农革命军在强大敌人前堵后追，战斗屡屡受挫，给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转战至南梁豹子川，所剩指战员仅有唐谢、谢子长、阎揆要、雷恩钧、郝怀仁等 29 人。面对寡不敌众的严峻形势，为保存革命火种，唐谢、谢子长不得已而为之，于 1928 年 1 月 20 日果断决定就地遣散部队，要求指战员们各自分散隐蔽到群众中去，坚持开展地下革命活动。至此，历时三个多月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宣告失败。忍痛分离时，谢子长对指战员们说：“革命没有一帆风顺的，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只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继续努力，相信革命总有一天会成功。”

“当年烽炬传千里，从此风雷遍九陔。”清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面前，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组织的大规模武装起义；是西北人民高举武装革命大旗，向西北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是创建西北红军和开辟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前奏，在陕北和南梁地区播撒了革命火种；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人民的革命斗志，教育和锻炼了西北年轻的共产党人，培养了一批优秀政治、军事人才（如阎红彦、白乐亭、雷恩钧、史唯然、李维俊、白锡林、王泰吉、阎揆要、赵和民、李果、钟师统等），对西北地区后来的革命运动，特别是走井冈山道路，开展武装斗争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积累了经

验，起到深远影响和积极作用，其重大意义和历史功绩，永载中国革命史册。

聚义三道川

1928年5月，谢子长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和唐澍、刘志丹等到西北军中受共产党控制的许权中旅，共同发动领导了大革命失败后军队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西北地区规模最大，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渭华起义。起义坚持三个月后，同样在敌重兵“围剿”下失败。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壮烈牺牲。

渭华起义失败后，1928年8月，谢子长、刘志丹回到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了起义经过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省委派他们重回陕北，开展兵运和武装斗争。返回陕北后，谢子长、刘志丹相继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领导兵运和武装斗争。

为详细了解掌握陇东地区的人文地理环境，谢子长扮做皮货商，取道陇东返回陕北。途经合水县太白镇时，被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营长黄毓麟抓捕，并被施以酷刑，险些丧命。面对凶残的敌人，谢子长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展现出共产党人的无比高大形象。当时在百里以外保安县任民团团总的共产党员刘约三，从一位李姓商人处得知消息后，立即打发人连夜赶往太白，通过在镇上开酒坊的干爹李绪增，救出了奄奄一息的谢子长。大难不死的谢子长在曹力如、刘志丹、刘约三家养伤痊愈后，顺利返回了陕北。

1929年夏，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等一批共产党员打入西北国民党地方部队，从事兵运工作。谢子长和中共陕北特委，又先后派遣共产党员李立果（赵文蔚）、马云泽、阎红彦、雷恩钧等到宜川后湫天（九殿）山寨的杨虎武部开展工作，意欲将这支绿林武装改造为完全的革命队伍。

1930年1月，驻宁夏的国民党军苏雨生骑兵第四师扩充势力，谢子长受命西去宁夏，打入苏雨生部队，任该骑兵师第十旅旅长，率部驻防银川以北的李岗堡，后移驻盐池县。此时，刘志丹也奉命打入苏雨生部队，任第八旅第十六团副团长。他们在苏雨生部队中建立了中共党委（张东蛟任书记）。中共陕北特委还派张秀山、高鹏飞、李树林、贺晋年、郝怀仁等一批共产党员，随谢子长打入苏雨生部队。同时，由陕北地方党组织选送以中共

党员为主的近 300 名学生兵，到第八旅组建学兵队，扩大革命力量，培训军事干部。打入苏雨生部队不久，谢子长、刘志丹在第八旅的驻地附近，召开了曹义参、张东蛟、牛化东、高岗、刘约三等 33 人参加的党员会议，分析国内外形势，认为苏雨生与马鸿逵的矛盾已是一触即发，决定苏、马一旦开战，受共产党控制的各部队即回陕北和庆阳一带，以扩兵为名，发展壮大革命武装。

1930 年 2 月，马鸿逵向苏雨生开战，苏雨生溃败，带领第七旅，退往陕西彬县。石英秀（子俊）带第八旅、第九旅，退至宁夏南部下马关一带。谢子长则脱离苏雨生部队，带数十人转移到陕北保安金汤镇，与刘志丹共谋前往庆阳陇东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麟部，挂名建军。同时，在敌人力量薄弱的陕甘宁边界地区，收拢逃避敌人追捕的党团员和革命者，争取民团、哥老会和民间武装，开展革命活动。

1930 年的盛夏农历 6 月，先前谢子长派去宜川县后湫天的杨庚武部活动的阎红彦、雷恩钧，带领他们拉出的周维祺营（三营）抵达金汤附近。得知消息的谢子长，亲自迎接带领他们至金汤镇，与其部属及刘志丹任副官的张廷芝、张廷祥部会合。随后，谢子长、刘志丹带领这几支部队，一同开赴与陕西吴起交界处的甘肃庆阳三道川，欲在谭世麟部挂名建军。

会聚三道川后，谢子长出任谭世麟陇东民团军“清乡”司令部直属第三团团团长，刘志丹任三团第一营营长。周维祺营改编为直属三团第二营，周维祺任营长。老土匪、高双成属下骑兵团长张鸿儒的长子，曾在石英秀部下任过团长的张廷芝，担任由其部属改编的直属第二团团团长。

聚义三道川，部队整编后，应谭世麟请求，刘志丹带杨树荣等几名共产党员，前往庆阳城的陇东民团军司令部，“帮”谭世麟整训民团军。谢子长则率领新组建的部队在三道川加紧整训，准备发动起义，建立工农红军。

土匪出身的张廷芝，和其父张鸿儒一样，是个反复无常、心毒手狠的坏家伙。在全汤一看见周维祺人多枪好的三营，便起了吞并这支武装的坏心眼。于是父子狼狈为奸，对周维祺快马、美女、金钱三条绳索齐下，很快把被搞得神魂颠倒、晕头转向的周维祺，死死绑在了覆灭的战车上。

农历润 6 月，周维祺不顾对张廷芝父子吞并周部的险恶阴谋有所察觉的谢子长、雷恩钧反对，执意带领部属和阎红彦等 15 名骑兵，随张廷芝前去宁夏下马关，帮其收罗旧部。结果，折返途经三边安边堡时，张氏父子以庚

功洗金为名，合谋上演“鸿门宴”，酒席间缴了谢子长及其所带骑兵的枪械，并予扣押。随后，张氏父子派百余骑兵直扑三道川，将周维祺营（70多人枪）全部缴械，突袭冲散猝不及防的谢子长团部和刘志丹的第一营，并搜捕谢子长、刘志丹。谢子长因穿着朴素似百姓，未被敌兵认出而巧妙脱险，回到保安与从庆阳返回的刘志丹结伴前往绥德、米脂一带，寻找中共陕北特委。

三嘉树红旗

“三道川事件”后，谢子长、刘志丹并未气馁，反而愈挫愈奋。谢子长总结“三道川事件”深刻教训，认识到搞武装斗争，不直接掌握军队是不行的。挂个空名，用军阀的那一套办法只能是虚张声势，到了紧要关头，就会弄得鸡飞蛋打，人马两空，^①从而坚定了独立建军的决心。

1930年10月，谢子长在绥德合龙山，参加了中共陕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六月扩大会议精神，确定要积极开展城乡武装暴动，并成立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赵伯平担任行动委员会书记，谢子长、刘志丹分任正、副总指挥。尔后，谢子长同阎红彦、雷恩钧、白锡林等共产党员一起，奔波秦、晋、陕，购置枪支，集结人马，组建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

同年12月，谢子长奉命前往天津向中共中央北方局汇报工作。返回途中，在山西定县会见了在国民党第四十七军从事兵运工作的拓克宽、吴岱峰、胡廷俊等人，传达了北方局关于清除“立三路线”错误的精神，指示他们不要盲动，要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坚持斗争，等待时机发动兵变或起义，建立革命武装。

翌年春节过后，谢子长在赴甘肃平凉一带从事兵运工作前，派阎红彦、雷恩钧、白锡林等再度入晋，伺机搞枪支拉武装，组建游击队。后又亲自指派雷恩钧去清涧县，给当时陕北最大型商“保运”武装的头目师德杰做工作，动员其带武装赴山西，配合阎红彦、白锡林等在晋西开展游击活动。盛夏，谢子长还亲赴山西，视察了解晋西游击队及师德杰、肖永胜两股“保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子长县委政府编：《谢子长纪念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页。

运”武装的活动情况。

1931年9月8日，因遭敌人重兵围攻，处境极度困难的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依照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指示，西渡黄河，转战陕北清涧、安定一带，寻找中共党组织和谢子长、刘志丹。通过谢子长的哥哥、中共党员谢德惠，与中共陕北特委接上关系后，陕北特委和中共安定县委，派遣和动员一批共产党员及革命青年，先后参加了游击队。晋西游击队由渡河时的30人迅速扩大到100多人。随后，根据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派张子（资）平传达的指示，晋西游击队在同意接受“约法三章”，即“服从晋西游击队队（党）委会领导，不抢穷人东西，不强奸妇女”条件下，与师储杰、肖永胜两股“保运”武装联合，在安定、清涧、延川、延长、靖边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同时组建了雷恩钧任队长的执法队，维护部队纪律。

1931年10月中旬，遵照中共陕北特委“游击队避开敌人（陕北军阀井岳秀）主力，转移陇东”的指示，以晋西游击队为骨干的300多人的陕北游击支队，在杨重远、阎红彦等带领下，转战到南梁地区，与刘志丹率领的南梁游击队会合。会合后10多天，谢子长受中共陕西省委委派，携带在西安通过杨虎城的秘书杜斌丞和军械处长史唯然（中共党员）为游击队搞到的一箱子弹，经平凉来到南梁，负责领导南梁地区的所有游击武装。

谢子长到南梁后，首先召开党团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整顿部队、打出红旗，建立工农红军游击队的指示，成立了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任委员的党委会。同时，将会合后的武装统一进行了整编。陕北游击支队编为第一支队，师储杰任支队长。南梁游击队编为第二支队，刘志丹任支队长。接着，谢子长又主持召开队委扩大会议，分析军事斗争形势，强调指出，毛泽东、朱德等带领红军上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提供了宝贵经验，指明了前进方向。

为了摆脱游击队给养没有来源的困境，给组建陕甘红军创造条件，谢子长、刘志丹与队委会成员共同研究，决定走出子午岭，转移到庆阳县城东北约50华里的新堡（现属华池县）一带休整发展。同时，经过认真讨论研究，队委会成员一致同意谢子长和刘志丹提出的借军阀陈珪璋扩充实力之机“借水养鱼”的建议，决定在保证独立自主前提下，暂时接受陈珪璋“收编”，济急军需、生息力量。随后指派马云泽、刘约三前往平凉，同陈珪璋

进行谈判。

谈判结果，达成如下协议：将游击队编为第十三师第十一旅，谢子长任旅长，刘志丹任副旅长兼参谋长，暂时驻防庆阳县新堡子；发给冬装一千五百套、军帽三千块、军械十五驮、西药一驮。随后，陈珪璋即委派警卫团长刘宝堂，携带协议中规定提供的全部军需物资到新堡，履行收编。原第一支队改编为第一团，师靖杰任团长；原第二支队改编为第二团，刘志丹兼任团长。

此后，部队即转入冬训，主要对全体指战员进行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阶级启蒙教育及遵守革命纪律教育。其后不久，中共陕西省委派荣子卿（省委军委委员，曾任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即高维翰，省委军委书记）先后来到部队，向队委会传达了省委关于“学习《古田会议决议》，按照建设红军的要求对部队进行整训，迅速组建正式红军，开往正宁、旬邑、淳化、耀县一带山区开展游击活动”的指示。要求部队脱离军阀陈珪璋，适应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怒潮兴起的国内形势，争取社会各界同情和支持，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

在新堡休整 20 余天后，队委会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决定部队分两批向南转移，由刘志丹、雷思钧带领二团和一团三营先行南下。

先行南下部队出发后，陈珪璋立即调遣一个营包围了一团，图谋“围剿”瓦解这支革命武装。谢子长指挥部队在庆阳六寸墩，一举歼灭陈珪璋部两个连后，带领一团的一、二、四营，沿子午岭西侧迅速转移到正宁县北柴桥子村，与先期南下部队会合。会合后，即遵照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将部队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谢子长担任总指挥，刘志丹担任副总指挥，杨重远担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中共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委员会（习惯仍简称队委会），谢子长任党委书记，刘志丹、荣子卿、杨重远、阎红彦、雷思钧、白锡林、胡廷俊等十几人为委员。

同盟军指战员共 700 余人，编为两个支队，一个直属警卫大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师靖杰，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杨鼎，第二大队大队长白锡林，第三大队大队长雷思钧。第二支队支队长刘志丹兼任，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赵连璧，第二大队大队长杨培胜，第三大队大队长贾生财。

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成立后，即转移到琳头、三嘉，按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进行整训。队委会遵照《古田会议决议》精神，组织指战员着重学习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开展加强革命纪律性教育，进行军事训练和政治、组织整顿。谢子长一贯非常重视革命队伍的军纪教育，不断以严重破坏革命军纪的具体典型事例，对指战员们进行严格遵守革命纪律，爱护老百姓，坚定革命信念的教育。谢子长反复强调：“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穷人的队伍，怎么能祸害老百姓呢？我们闹革命，就要讲纪律，不能拿群众的一根针、一根线……要革命，就不能不要纪律！”^①刘志丹也严肃指出：“我们来自老百姓，再去伤害老百姓，那这个队伍就会不战自垮的！”^②经过近一个月的整顿，反帝同盟军纯洁了队伍，严肃了军纪，坚定了信心，增强了斗志，提高了作战能力，密切了军民关系，为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奠定良好基础。

整训期间，陇东军阀、陇东第十三师警备司令陈珪璋，为对抗陕西军阀孙蔚如，指派属下刘宝堂团的史方成团副，前往正宁三嘉塬游说，妄图收编吞并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陈珪璋还委托史方成代表他，向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雷恩钧、白锡林等同盟军总指挥部5名成员，各赠送一枚在平凉已经刻好名字，上面还装有小指南针的骨质私人印章（雷恩钧1985年去世前仍带在身边，后其子于2005年捐赠给了延安革命纪念馆珍藏）。陈珪璋的伎俩，非但没能实现他的图谋，反而使谢子长等同盟军领导成员更加清楚地看到，陇东军阀与陕西军阀间的混战对抗，正是发展革命武装的有利时机，更加坚定了拒绝收编，彻底摆脱军阀纠缠，立即打出红旗，组建正规红军的决心。

1932年2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在三嘉塬细嘴子的一个打麦场上隆重举行。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李杰夫（后叛变），代表省委宣布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组成建制和指挥部，各大队军政领导的任命。游击队由两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大队和一个警卫大队组成，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兼队党委书记），杨重远任参谋长（刘志丹此时去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故未宣布任职）。阎红彦、吴岱峰、强龙光、白锡林等分任各大队大队长。正宁、旬邑的老百姓成群结队，抬着猪羊，吹着唢呐，前来祝贺。自此，西北高原上第一次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人们的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子长县委县政府编：《谢子长纪念文集》，第119页。

② 王德泰：《王德泰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往已久的西北红军终于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诞生了！西北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进入了新时期。

游击队一成立，便按照毛泽东在井冈山创立的建军原则，实行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执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还成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一致。谢子长等还专门给指战员讲解“十六字方针”，讲解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不打无把握、无准备之仗等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短期训练后，部队军政素质显著提高，指战员团结一致，斗志昂扬地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对敌斗争，陕甘地区的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当地穷苦百姓，曾这样赞颂谢子长和刘志丹：

中华民国二十一，
红军起首三喜哩。
谢浩如（子长）、刘志丹，
挂章、扣帽子扎营盘，
打土豪、分田地，
领导穷人把身翻。

……

1932年12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根据中共中央刘的指示，在陕西宜君县转角镇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士兵委员会采用举手表决方式，选举时任班长的王世泰担任红二团团长。西北地区的第一支正规红军部队由此诞生。

割据寺村塬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建立后，经过短期整训，接连取得旬邑县取田镇、阳坡头战斗胜利，歼敌300余人后，即按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南下陕西渭北的三原、富平、蒲城、耀县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在渭北转战月余，歼灭旬邑、彬县、长武、宜君、耀县等地民团武装共约1000余人，力量不断发展，影响迅速扩大。

1932年3月18日，谢子长率领陕甘游击队，回师正宁县北梁桥子，正值正宁南塬一带群众抗粮抗捐，自发组织民团，武力反抗反动县政府，反动政府妄图“直捣南原”的危急关头。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到来，驱散了压在

穷苦农民心头的阴云，他们有了主心骨。3月19日，谢子长带领陕甘游击队，在当地群众和民团配合下，攻打正宁县城山河镇。但因向导迷路而贻误战机，城内内应未敢行动，攻城未克。当晚，谢子长在西坡村召开队委会议，研究决定：陕甘游击队开赴正宁县南塬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土豪劣绅；将群众自行组织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配合红军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以寺村塬为中心，发动群众，建立红色政权，实行武装割据，开辟革命根据地。次日，谢子长即率领陕甘游击队移驻寺村塬，将群众自行组织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于3月24日成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谢子长在成立大会上讲话，号召穷苦农民组织起来，参加土地革命，打倒土豪、恶霸，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奋斗。几天后，各村相继成立了农民联合会。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全面展开。

1932年4月3日，在谢子长和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主持下，东至五顷塬，西至永和塬，北至四郎河川，南至正宁县与旬邑交界地之内72个村镇的赤卫队、农会代表和游击队指战员共1000余人，在寺村塬新庄子的山神庙场畔召开大会，谢子长首先讲话，强调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重大意义，号召群众组织起来，坚持革命。并举行了由72个村镇选出的70余名代表（其中贫农40余名、雇农10余名）参加的工农兵代表会议，宣布推翻正宁县的国民党豪绅地主统治，选举成立由15名委员（其中农民委员10名、游击队委员5名）组成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称寺村塬革命委员会）。陕甘游击队政委、队党委会书记李杰夫任主席（有回忆称主席是车家沟的贫苦农民张进元），下设土地、军事、肃反、财粮、贫农、工会、妇女等委员。各村也分别成立革命委员会和赤卫队，赤卫军总指挥部在边区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寺村塬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诞生了西北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开辟了西北最早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开创了建立陕甘边乃至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先河。

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建立后，积极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和组织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的粮食、牛羊、浮财分配给穷苦农民，镇压豪绅恶霸（在谢子长主持下，革命委员会在苟仁寺召开有上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公审处决了大豪绅赵元亨和恶霸贾德功），开辟建立了东西100余里，南北50余里的红色区域。

谢子长率领陕甘游击队二次攻打县城山河镇后，南下奇袭旬邑县城大获

全胜，俘敌 300 余人，缴获枪支 400 余支、子弹 10000 余发。为应对国民党军队的“围剿”，陕甘游击队于 4 月下旬主动转入外线，在陕西郿（今郿县）、洛川、中部（今黄陵县）、宜君一带游击。历经 9 次苦战，至 5 月底粉碎了敌人“围剿”，红军陕甘游击队发展壮大到 1000 余人。

正当寺村塬“工农武装割据”局面初步形成之际，1932 年 4 月 18 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到游击队巡视，指责游击队“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错误”，错误地撤销了谢子长的游击队总指挥职务，将其派往甘肃从事兵运工作。强令红军游击队撤离寺村塬根据地，东进陕西韩城一带，在平原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后因“左”倾思想干扰，停止了活动。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过程中，经历寺村塬、照金、南梁三个阶段。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活动时间虽然短暂，但其重大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的一次有益尝试，是尔后建立南梁地区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前奏。

1933 年 4 月 5 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陕西耀县的照金重新建立，选举贫苦农民代表周冬至为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革命委员会设有土地、粮食、经济、肃反等委员。

1934 年 11 月 4 日至 6 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召开，选举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当选为主席，贾生秀、牛永清当选为副主席。并于 11 月 7 日，苏联十月革命节那天，隆重举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

经正宁县寺村塬、耀县照金两个阶段红色革命根据地开创历程后，成熟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终于在庆阳南梁诞生。

陡原搞兵变

1932 年 4 月 16 日，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化名东阳）、焦维织（化名赵仪三）从西安动身，步行前往甘肃靖远王子元警备第三旅策划领导起义。途经甘肃平凉时，在东关一小客栈里，他们代表中共陕西省委听取了在平凉从事兵运工作的张秀山、曹化民、王世泰等人的汇报，传达了省委指示精神。他们在肯定工作成绩的同时，介绍了国际、国内和陕西的形势，指出

根据九一八事变后国内局势的变化，必须组织抗日运动，掀起民族革命斗争。要求注意加强抗日宣传，自发士兵们的爱国主义热情。按已定计划，加紧工作，积蓄力量，等待接近陕甘游击队时，实行哗变，把部队拉入革命阵营。谢子长还特别引用自己的工作经验，指示要到群众中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去教育群众、帮助群众，说服和改造群众。并生动地把“日常斗争”的原则加以具体化，提醒大家要帮助士兵识字、写信、学操，注意改善士兵的生活。^①

在平凉小住后，谢子长即同焦维炽前往靖远、兰州活动。

1932年4月28日，谢子长、焦维炽到达靖远，很快与王子元甘肃警备第三旅的中共地下团党委（书记张东蛟，副书记牛化东，下有三个支部）接上了头。随即一方面统一团党委成员思想，一方面在士兵中进行宣传教育和鼓动工作，为发动起义做思想和组织准备。鉴于谢子长和王子元是老同学又是“把兄弟”，很多军官都认识，不便公开露面，参加团党委会议等主要由焦维炽出面。

为筹划发动起义，团党委接连召开5次会议，谢子长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发动靖远起义的指示，强调指出：现在发动起义，在靖远、海原一带开展游击战争，不仅能在甘肃造成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大影响，也是配合红军陕甘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扩大红军、建立根据地的一个有力步骤。^②其间，为统一思想，焦维炽以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名义改组团党委（焦维炽任书记，张秀山、石子健等四人为委员）。最终，团党委决定：在敌强我弱形势下，伺机擒贼先擒王，乘王子元和新任参谋长姚绍芳举行会议时，由吕振华常驻防在司令部附近的第二营包围王的公馆，拘捕反动军官，迫使王子元下令特务营缴枪，宣布全旅起义。或在王子元参加教导队毕业典礼时对其下手，举行起义。

不料，起义之事被王子元、姚绍芳察觉。5月4日晚，王子元突然下令扣押张东蛟和王儒林等人，并收缴执法队的枪支。于是谢子长、焦维炽紧急召开团党委会议，研究决定5月5日晚提前发动起义，将可能拉出的二营、教导队、一营一连、骑兵营二、三连，共约400余人全部拉出。同时决定，

① 王树德：《王树德回忆录》，第41页；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子长县委县政府编，《谢子长纪念文集》，第260—261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子长县委县政府编，《谢子长纪念文集》，第216—217页。

让尚未暴露中共党员身份的旅参谋主任孙作宾留下，万一失败可利用合法身份营救同志，与中共陕西省委联系。5日晚，吕振华、张秀山等人分头带出200多人连夜直奔靖远县达拉池。6日，起义部队按原计划，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四支队，宣布谢子长为总指挥，焦维炽为政委。因起义时间仓促，部队撤离靖远城时和在东门外等候的谢子长、焦维炽没能接上头，谢、焦未能到任，暂由吕振华代理总指挥。部队改编后向海原方向进发途中，遭王元元两个骑兵营的围追堵截而被打散，张秀山等人被俘，第一次靖远起义失败。

5月中旬，谢子长、焦维炽等及被党组织营救的张东蛟、王儒林等，相继会合兰州，筹备再次举行靖远起义。

谢子长到兰州后，住在国家桥一个水烟作坊，并同杜润滋等共产党人接上了关系。谢子长同焦维炽、杜润滋等反复商量，决定通过上层统战关系，筹措枪支弹药和经费。很快，通过时任甘肃省政府临时维持委员会委员兼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秘书的常黎夫（中共地下党员）约请，谢子长在小西湖同杜斌丞相见。谢子长给杜斌丞介绍了共产党在西北闹革命的形势，希望他给予支持和帮助。两人推心置腹，谈得很深入。分别时，杜斌丞送给谢子长一把全新的手枪，表示对共产党人的敬重和支持。

几天后，杜斌丞又介绍谢子长和国民党绥靖公署兰州办事处主任邓宝珊在兰州五泉山会面。谢子长和邓宝珊在抵制蒋介石削除异己、联合抗日等问题上广泛交换了意见，两人志同道合，亲如一家。邓宝珊当即赠送谢子长手枪两把，子弹200发。事后，邓宝珊又密令行署副长官兼特务营营长杜汉三（进步人士，后加入中国共产党），通过常黎夫交给谢子长手提式机枪2挺、步枪3支、匣子枪2支、手枪1把及手枪子弹500发。

尔后，谢子长广泛接触如测量局长石放峰、禁烟善后局长仲兴哉等省府各厅局的一些陕西籍人士，筹措到白洋1000余元，并通过各种渠道购买步枪16支、机枪2挺、匣子枪4支、手枪1把，子弹8000余发。

正在谢子长等积极活动之时，靖远警备第三旅特务连连长杜鸿范到兰州孙蔚如部领取枪械、军装。谢子长速派张东蛟给杜鸿范做工作。杜鸿范听到谢子长等准备再往靖远，重建工农武装意图后，当即表示要带上领到的军械、军装参加游击队。后杜鸿范从孙蔚如部总共领到军装2700套、子弹20000发、步枪80余支。

筹措枪支弹药、军需物资和经费的近 20 天时间内，曾参加靖远第一次起义的 70 多名失散指战员，陆续到了兰州。谢子长串联汇聚这批指战员，安排部署重返靖远，再次发动武装起义，组建工农红军，建立游击根据地。5 月 25 日晚，杜鸿范以合法身份出面，将所有枪弹物资装箱、装麻袋并贴上其他商标，在广武门外雇用几只羊皮筏子装载，顺流而下，运往靖远。谢子长、张东蛟等也乘羊皮筏子离开兰州，前往靖远。第二天到河口后，大家将所有物资转上岸，靠人扛、马驮，翻越皋兰县北山，赶到靖远朱家窑。经短暂休整，动员编组，确定起义地点为靖远水泉堡后，谢子长即带领队伍经吴家川、黄砂湾，东渡黄河占领靖远水泉堡。同时，派人前去靖远城，命令张国威（中共党员）连长组织带领哗变部队急速赶到水泉堡会合。

1932 年 5 月 30 日，两支部队在水泉堡胜利会合，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成立，总指挥谢子长，政委焦维织（在兰州，未到职），参谋长杜润滋，秘书长鄂逸民。所辖一、二、三支队司令员分别为杜鸿范、张东蛟、王儒林，直属大队大队长姜耀，副大队长朱子休。印有镰刀、斧头图案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红旗，高高飘扬在水泉堡上空。

谢子长领导红军游击队浴血奋战靖远、皋兰、固原等地数月，张东蛟、郭映珠、王贵仁等指战员在激战中壮烈牺牲。靖远第二次起义，终因敌强我弱而失败。

靖远两次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它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领导的风起云涌的创建红军的英勇起义的一部分，正是这些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汇成了西北地区威武雄壮的武装革命斗争洪流。

靖远二次起义失败后，谢子长起程返西安，打算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后，相机策划新的武装起义。7 月 1 日，徒步行至宁夏隆德县时，相继遇见欲往兰州孙蔚如部队搞军运的杨林、高昆山、郝维新、高照耀、苏杰儒。谢子长告诉他们：靖远兵暴后，兰州形势紧迫，暂不宜去，还是到陇东开展工作为好。^①当天连夜赶到平凉县白水镇住宿后，谢子长和他们一起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经过仔细分析、权衡利弊，谢子长以中共陕西省委特派员身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子长县委县政府编，《谢子长纪念文集》，第 510—511 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编，《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 8 辑，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6—27 页。

份，决定派杨林、苏杰儒、郝维新、高照壁4人到庆阳国民党新编第十一旅策动兵变，带起义部队和红军陕甘游击队会合。当晚，谢子长还给在十一旅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李树林、高鹏飞各写了一封亲笔信交杨林携带。第二天，谢子长去了西安，杨林等去了庆阳。

杨林、苏杰儒等到庆阳后，和李树林、高鹏飞等，按谢子长指示，经过周密组织发动，于1932年7月9日，由十一旅第一团高鹏飞连长等率领第一、二连170多人，在合水县西华池宣布起义。10日晚将起义部队拉至宁县的盘克原，与前来迎接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骑兵大队胜利会合。11日抵达正宁县鞏头原，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高鹏飞任大队长。

西华池起义的成功，有力打击了西北军阀，充实壮大了红军陕甘游击队，是西北地区兵运史上最为成功的一次起义。

丹心照汗青

在谢子长组织领导靖远、西华池起义期间，杜衡、李畏相搬到红军陕甘游击队，强行推行王明“左”倾错误，指挥作战脱离实际，使游击队屡屡受挫，伤亡损失惨重。迫于形势和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中共陕西省委只好派谢子长重回红军陕甘游击队，担任总指挥。

1932年8月30日，谢子长重返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受到热烈欢迎。此时，敌人正分三路“围剿”陕甘游击队。谢子长领导游击队就地休整后，经和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认真商议研究，率领部队到陕西旬邑、耀县、淳化交界处的照金山区，坚持开展武装斗争。9月上旬，谢子长采取“以退为进”、“诱敌深入”、“避实击虚”的机动灵活战略战术，首战全歼富平、同官（今铜川）、耀县三县民团300余人，缴获民团全部枪支弹药。接着，利用有利地形，伏击击溃1000多人的何高侯团，粉碎了敌人的三路“围剿”。

参与领导甘肃两当兵暴，失败后返回陕西的习仲勋，打听到谢子长在照金镇以西四五里路的杨柳坪驻扎的消息，急忙从老苍岭赶来和谢子长会面。几天后，又在杨柳坪以北10多里外的金刚庙见到了刘志丹。习仲勋见到两

位比自己年长 10 多岁的群众领袖，特别听到周围同志都亲切地称他们“老刘”、“老谢”时，因两当兵暴失败的郁闷心情一下子轻松了许多。谈话中，谢子长叮嘱习仲勋说：“过去我们没有根据地，现在要搞。从关中逃难过来的饥民多，你在这儿人熟地熟，工作条件好。我们没有枪支弹药留给你，你要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成立农民协会，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①会见和谈话，给习仲勋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红军游击队决定乘胜向南游击，筹粮筹款，征集冬衣，而后北上安定、保安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临行前，谢子长给习仲勋交代了任务：“你留照金一带做农村工作，建立根据地，并在发展农民运动的基础上，建立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七支队。”^②刘志丹亦嘱咐习仲勋：“你是关中人，还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③

谢子长率领红军陕甘游击队北上，奔袭保安（今志丹）县城失利后，10月1日转移到陕甘交界处合水县墩儿梁、八卦寺（今富县）附近，又遭敌高双成重兵袭击，部队再次受挫。面对敌人追击和部队粮食、服装、经费无着困难，谢子长鼓励指挥员们：我们是为人民谋利益的，用不着悲观，不要怕失败，应当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更加奋勇起来。失败是成功之母，一次不成再来一次，最后胜利总是我们的。^④同时，与刘志丹一起召开队委会议，商量决定带领游击队进入子午岭的梢山地带，化整为零，分散游击，筹集军需，壮大力量。会后，刘志丹带领一个大队，到合水的拓儿原一带活动；阎红彦、杨重运带领骑兵大队，到耀县、宜君一带游击，与中共陕西省委联系；黄子文、杨森带部分人，回三原武字区活动。谢子长带吴岱峰、高鹏飞等 30 多名老战士、伤病员，留在豹子川、平定川、瓦子川、墩儿梁一带，指挥各路红军游击队，与中共陕北特委联系，护理调养伤病员。

风雷子午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在缺吃少穿、无医无药、居无定所的极端困难条件下，谢子长一面积极做思想工作，坚定乐观地对同志们说：现在树叶落了，明年春天又会长出来。现在我们遇到了挫折，只要我们不悲观，不怕失败，最后总会胜利的。熬过冬天，春天就会到来！最困难的时候，就

① 《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上册，第 99 页。

② 《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上册，第 100 页。

③ 《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上册，第 100—101 页。

④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子长县委县政府编，《谢子长纪念文集》，第 28—29、77 页。

是胜利快要到来的时候！^① 同时又和同志们一起，站岗放哨，烧火做饭，抬运伤病员，给伤员洗伤口、敷草药或用热锅油、南瓜瓤给伤员治疗枪伤，一起外出背粮、打柴、碾米，采草药、摘野果，挖野菜，筹集被褥、棉衣等御寒物品。筹集到的少量被褥、棉衣，谢子长总是让给伤病员，自己则在篝火旁边铺一条毛口袋，穿着破棉袄过夜。谢子长吃苦耐劳、以身作则和爱兵如子的精神，深深激励着指战员们，大家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

经过近两个月的分散活动，红军陕甘游击队渡过难关，转危为安，得到巩固和发展。在谢子长等亲自护理下，高鹏飞、强龙光等大部分伤病员伤病好转。阎红彦、杨重远率领骑兵大队，从耀县返回平定川，带回许多打土豪所得现洋、衣物、药品，解了游击队燃眉之急。随后，谢子长又带领骑兵大队到安塞真武洞东、西营一带打土豪，缴获 30 多匹骡马，筹集大批经费，还扩充 80 多名骑兵。解决红军游击队自身给养困难的同时，谢子长还派高鹏飞、强龙光、冯金福等携带一大批现款，送给中共陕北特委和中央北方局，作为党的活动经费。

1932 年 12 月，红军陕甘游击队各路圆满完成既定任务，在合水县拓儿原会合。近两个月的分兵发动群众，打土豪，渡难关，使指战员们历经艰苦磨炼，精神更加焕发，士气更为高涨，红军游击队又恢复了战斗力。

谢子长、刘志丹正准备按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带领红军游击队南下宜君马栏镇转角镇进行整编时，1932 年 12 月 18 日，王明“左”倾错误的忠实执行者杜衡再次来到部队，在宜君杨家店子召开党团员大会，宣称“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诬蔑谢子长、刘志丹等是“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蛮横地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的领导职务，强令他们离开部队，到上海中央局去“受训”。谢子长以革命利益、党的事业为重，为了不使部队垮掉，据理力争，坚持要求将刘志丹留在了部队，自己被迫于 12 月底离开亲手建立的红军陕甘游击队，到上海中央局“受训”。

1933 年夏，谢子长在上海中央局“受训”期满被派往河北，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到张家口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十八师，负责党的工作并协助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子长县委县政府编：《谢子长纪念文集》，第 314 页。

师长许权中指挥作战。抗日同盟军遭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双重围攻失败后，谢子长秘密回到北平，与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取得联系。11月，谢子长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负责西北的军事领导工作。

1934年1月22日，谢子长由北平经太原西渡黄河，秘密回到家乡安定县。

谢子长和中共陕北特委接上关系后，在中共安定县委协助下，经过艰苦努力，很快于1934年3月8日，恢复重建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陕北的武装革命斗争又出现新局面。不久后的7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阳道岭宣告成立，谢子长兼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下辖一、二、五支队和赤卫队、少先队，共600余人。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的成立，为组建红二十七军奠定了基础。7月17日，谢子长经过周密侦察和部署，在城内地下党员策应下，一举攻克安定县城，救出被敌人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多人，缴获一批弹药、物资。

陕甘边、陕北红军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使国民党当局惊恐万状，调集重兵“围剿”。为保卫新生革命政权，粉碎敌人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谢子长率领红一、二、五支队和赤卫队南下陕甘边根据地。于1934年7月28日，在南梁刘家洼召开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和中共陕北特委、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联席会议。会议着重分析研究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形势，商讨反“围剿”大计，决定由谢子长兼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会议同时决定，红四十二师第三团跟随谢子长北上，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井岳秀部队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会议统一了认识，增强了团结，为建设西北革命根据地打下良好思想、组织基础。

一首陕北“信天游”，赞颂谢子长和刘志丹的战友情谊：

陕北游击队，
老谢总指挥，
打开安定城，
“犯人”放出盆。
下到南梁堡，
见了刘志丹。
老刘豪爽说，

来炮轰几天。

1934年8月15日，谢子长率领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陕北游击队第一、二、五支队及赤卫队回师安定。之后，接连取得安定景武家塌、绥德张家吃台、清涧河口及董家寺等战斗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非常不幸的是，谢子长在指挥清涧河口战斗时，被子弹击中前胸，负了重伤。誓死如归的谢子长，却对身边的指挥员们说：“要革命就不要怕牺牲，打仗总是有伤亡，我这点伤不要紧。”坚持带伤继续亲自率领红军游击队东打西杀，南征北战，为创建西北红军、开辟西北革命根据地殊死搏斗，无愧是中国共产党人生命不息、奋斗不止高尚品格和顽强意志的光辉典范。

1934年9月18日，谢子长不顾伤痛，根据中共陕北特委佳县神堂沟会议精神，在安定县崖窑沟亲自主持，将红一支队与红八支队共200余人，合编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独立师第一团，并向团长贺晋年授了军旗。翌年，陕西省苏维埃政府，陕北红一、二、三团合编组建的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相继于1月25日、30日，在安定县白庙岔村宣告成立。至此，经过无数次胜利和挫折，谢子长和他的战友们，终于实现了在陕北地区建立正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理想。

谢子长伤势加重离队养伤前，高瞻远瞩，认为把陕北与陕甘边苏区连成一片，统一领导，统一步调，势在必行，首先向上级党组织提出建立统一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建议。养伤期间，他强忍伤痛，与中共陕北特委研究，并致信刘志丹和陕甘边特委，约请刘志丹带红二十六军北上陕北，共同商讨陕甘边、陕北苏区军事统一指挥及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等问题。

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及陕甘边红五、红六支队，如约抵达陕北赤源县（今属子长县）后，数次探望谢子长。1935年1月20日，赴灯盏湾再次探望时，谢子长以极大的毅力，坚持就建立西北工委、西北军委，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特别是当时最为紧要的反“围剿”等问题，与刘志丹进行了长时间深入交谈。上述所有问题，两位战友取得完全一致意见，唯有在军委主席问题上各执己见，相互谦让。谢子长说：我不行了，军委主席你就担当起来。刘志丹说：那不行，你是老大哥，只要你在一天，就还要你当。最后，谢子长严肃地说：我以中央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名

义，指定你为西北军委主席！^① 战友情谊，感人肺腑。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北特委和中共陕甘边特委赤源县周家峪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北、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和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选举军委主席时，刘志丹坚决地说：老谢是老大哥，是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的军事特派员，威望比我高，应当选他当主席。目前他不能工作，也应当选他，我可以协助他完成任务。^② 会议选举刘志丹（一说谢子长）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1935年2月21日晚上9点多，谢子长因伤势恶化，在赤源县灯盏湾不幸与世长辞，时年38岁。临终前，他依然念念不忘红军的建设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流着泪说：就这样死了，我对不起老百姓！我给他们做的事太少了！^③ 弥留之际，他仍在呼喊战友的名字和指挥部队冲锋的口令，直至逝世。

红星陨落，白雪纷飞，天地、百姓哀痛！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为稳定根据地军民情绪，防止敌人乘隙进犯袭击苏区，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决定，暂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封锁消息，秘密安葬，行文、布告仍签署谢造如（子长）职衔姓名。直到1935年5月马家坪战斗告捷后，才逐渐解除保密，用继任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的名字签署行文，发布布告。

谢子长一生驰骋疆场，骁勇善战，胜不矜功，败不丧志，对党和人民革命事业无比热爱，无限忠诚，为革命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奉献了毕生精力乃至宝贵生命，党和人民永远怀念。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后，毛泽东就曾亲口对谢子长的亲属说：西北红军的创始人谢子长败不丧志，真了不起呀！^④ 1935年，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改谢子长家乡安定县为子长县。1938年，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谢子长遗骨移葬于故乡枣树坪村，并修建子长烈士墓。毛泽东1939年6月29日和7月9日，两次为子长墓题词：“民族英雄”、“虽死犹生”，并亲笔为子长墓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子长县委县政府编，《谢子长纪念文集》，第83、132—133、149、405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子长县委县政府编，《谢子长纪念文集》，第83、132—133、149、405页。

③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子长县委县政府编，《谢子长纪念文集》，第53、347页。

④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子长县委县政府编，《谢子长纪念文集》，第11—12、335页。

撰写了碑文。1946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又在瓦窑堡修建子长陵园，2月19日举行了隆重的移柩公祭仪式，凭吊者逾两万人。同月28日，毛泽东再次题词“谢子长同志千古”。朱德题词：“谢子长同志，陕北人民领袖”。中共中央西北局送了“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 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挽联。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彭真、贺龙、刘伯承、林伯渠等也题了词。党和人民，对谢子长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所建立的重大历史贡献和丰功伟绩，给予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历史永远不会忘记：创建西北红军总指挥功照千秋，开辟陕甘苏区谢青天英风长存。

作者：雷鸣，中国农业科学院兰州畜牧与兽药研究所副厅级退休干部，高级农艺师，甘肃省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延安保小分会会长。

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根据地领导人 坚守党的政治本色的理论思考

王 纲

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是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只有坚守政治本色，中国共产党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永葆先进性，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完成执政使命。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辛实践中，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培育了崇高革命精神和优良革命传统……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思想和高尚情操，对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夺取革命、建设、改革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①“必须坚持不懈地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使各级领导干部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树立和坚持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以优良作风带领广大党员、群众迎难而上、锐意改革、共克时艰”^②。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实践中，始终不移地以党的奋斗目标为价值追求，不畏艰难困苦，坚守党的政

① 胡锦涛：《弘扬崇高革命精神和优良革命传统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载《光明日报》2007年7月28日第1版。

②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09年1月14日第1版。

治本色，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在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实践中凝练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守党的政治本色，永葆先进性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一、坚守正确选择的理想信念，始终保持对党对国家事业的无比忠诚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人从少年时期就目睹家乡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凄惨景象，在进步思想的不断熏陶下，萌发了改造社会、复兴中华的愿望。在中学求学时期，他们就先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这是他们确立坚定人生信念的转折点。刘志丹、谢子长先后受到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员的熏陶和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观。理想信念一经确立，就自始至终坚如磐石。他们从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加入中国共产党之日起，就把一切都献给了党，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都没有怀疑自己的选择，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刘志丹坚定地表示：“入党就是要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一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①谢子长在入党宣誓时激动地说：“我把一切都交给党了，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②

习仲勋投身革命时间早。大革命时期，他13岁在高平县立第一高级小学读书时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1月下旬，他满怀对革命理想的向往和追求，考入具有革命传统的三原第三师范读书，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进行校内的学生运动和革命活动。不久便因“三师革命”被捕，在敌人的看守所里，不满15岁的习仲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实践中，经历过极其艰苦复杂的斗争和无数的艰辛、曲折，进行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斗争，无论是被敌人逮捕、战斗中负伤，失散后脱离部队，被“左”倾领导者错误地降职和无端指责，甚至被错误地肃反关押，但他们都能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维护团结，顾全大局，对党毫不动摇，忠心耿耿。

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边特委的同志被王明“左”倾错误统治的中央

① 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第286页。

② 转引：《谢子长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

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指责为“富农路线”和“右倾机会主义”，多次被降职，并受到错误处分，但他们都从没有怨言，照样努力工作。谢子长身负重伤，却遭到缴械、撤销警卫班的不公正待遇，但他牺牲前想着仍是给人民做的事太少。“左”倾错误的执行者于1935年10月初将习仲勋及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刘志丹逮捕关押。刘志丹在返回途中恰好碰见了往前线送逮捕他和其他同志密令的通信员。送信的通信员不知信的内容，把信交给刘志丹，但刘志丹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仍让他将信送往前线，自己反而策马加鞭前往中央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驻地瓦窑堡，想向他们申诉，宁愿逮捕自己也不要逮捕前线的同志。但他一到瓦窑堡立即被投入监狱，连妻子和五岁的女儿也被监视。“左”倾错误执行者竟说刘志丹“明知要被逮捕，反而不跑，是狡猾地以此使党对其信任”，并武断刘志丹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诬陷他率领红军打开县城消灭白军纯系“反革命欺骗群众的花招”。在狱中，刘志丹、习仲勋作为“首犯”，戴着手铐，钉着脚镣，面对随时都有可能被活埋、枪毙的残酷现实，泰然处之，刘志丹向同狱的同志说：“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乌云总遮不住太阳。”^①保持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气节。在中共中央的关怀下，刘志丹、习仲勋等才得以获得自由重返革命队伍。当时，一些出狱的同志，因蒙受不白之冤，个个义愤填膺，刘志丹却告诫大家，党内的历史问题不必性急，要忠诚为党工作，让党在实际行动中鉴定每个党员，并指出：“过去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还多次向部队讲话强调：“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要绝对服从中央领导，听从中央调遣。”中共中央指出：“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当陕北‘肃反’问题未彻底弄清楚时，他们一贯地把握了布尔什维克立场和态度，这是值得我党同志们学习和效法的”。^②

① 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6日第3版。

②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纪念刘志丹烈士牺牲五十周年》，第25、26页。

二、坚守一心为民的政治立场，始终保持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群众的密切联系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代革命家 20 岁出头就成为陕甘根据地出名的革命家、群众领袖，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热烈拥护，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及其领导的红军、根据地政权一心为民，时时处处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保持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共中央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人选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① 不仅习仲勋如此，刘志丹、谢子长等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都是坚守一心为民的楷模。

刘志丹闹革命后，受到敌人的通缉追捕，家中房屋被烧，财产被抢，祖坟被挖，家人到处躲避，二妹夫和一个叔伯弟弟被杀，他自己甚至在与部队失散后沿途讨饭，父亲对他很不理解，请刘志丹的舅舅劝他好好享享清福，不要再去受苦受罪了，而刘志丹坚定地说：“我一个人成了员外面啥用！我要使全中国人民都过上好生活。”^② “要使全中国人民都过上好生活”，是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共同的人生价值观。

群众领袖刘志丹是一位非常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领导人。他虽然担任着师长、军长、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但群众战士见了他就像见了亲人一样，习仲勋回忆第一次见到刘志丹时，同志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刘”。刘志丹殷切地嘱咐习仲勋说：“你是关中人，种过庄稼，能跟农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并说：“只要政策对头，紧紧依靠群众，困难是可以克服的。”^③ 习仲勋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很快就发展到旬邑、耀县一带，游击运动随之扩大起来。在这个基础上，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于 1933 年 4 月 5 日建立，选举康农周冬至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兼党团书记，颁布各种法令，实行分土

① 《中国老区建设》2008 年第 4 期，第 52 页。

② 刘明刚：《刘志丹家闹革命》，载《革命年代》1991 年第 2 期。

③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党史研究室：《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 248 页。

地、分粮食、分牛羊、戒烟、戒赌、放足等政策。由于和人民群众休戚相关，这些政策受到广大农民拥护。广大群众斗志昂扬，革命情绪异常高涨，许多青年要求参军，陕甘边几支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照金根据地也得以恢复。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无论在地方还是在部队，都非常重视时时处处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与战士的利益。红军的一切生活来源，严格地规定由剥削者地主负担。部队没收地主豪绅的财物首先分给劳苦大众，然后才是部队。部队分配东西时，也是先分给战士，有一次只剩下了一条女人穿的花棉裤分给刘志丹，他就翻过来穿。他的一双布鞋白天穿在脚上，晚上枕在头下。干部们经常把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步行。1931年秋季，刘志丹来到南梁一带，深入考察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及群众条件。他和马国五一道，钻榆林，爬高山，饥餐野果，渴饮山泉，踏遍了南梁数百里栉山，研究南梁的地理环境，从平定川、瓦子川到柳沟、麻地台川、井岔沟、荔园堡、南梁堡、东华池……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当地的贫苦农民就像见到了久别重逢亲人一样对待他们。在南梁平定川，有个老杨村，只有几户人家，有一户贫苦的农民老婆婆和儿媳为了招待刘志丹，瞒着他们，连夜摸黑上山拔回了尚未成熟的荞麦，揉下颗粒，用锅炒干，用擀面杖碾烂，再用细箩过了，为刘志丹做了顿他最爱吃的荞麦面条。当刘志丹得知消息后表示歉意时，那位朴实的老妈妈真诚地对刘志丹说：“只要闹红成了事，把心摘下来也舍得。”这件事曾经在陕甘宁边区广为流传，成为佳话。^①

正是由于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一心为民，把党和红军与群众进一步联系起来，他们领导的革命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欢迎，即使严重局面到来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敌人数次调动大批兵力，妄图一举荡平陕甘边根据地。当时照金游击队只有40多个人，枪不满30支，子弹很少。敌人对渭北、照金到处进攻，但基层党的组织没有遭到破坏，游击队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到了冬天，淳化、耀县一带的游击运动又大大发展起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虽经起伏，但仍能坚持发展，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人一心为民，始终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时时处处维护和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是截然分不开的。

^① 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

三、坚守百折不挠的奋斗品格，始终保持知难而进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开辟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实践过程中走过了一条充满荆棘与坎坷的曲折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党调派刘志丹、谢子长等打入陕西、甘肃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从事兵运工作。1930年8月，他们先后来到陕东地区，打入陕东军阀谭世麟内部开展兵运斗争，为创建西北红军做军事上的准备工作。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在陕甘边地区秘密开展革命活动，陆续聚集起了一团人马，准备暴动。但不幸在“三道川事件”中遭到惯匪张廷芝的袭击，兵运受到挫折，部队受到严重损失。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毫不气馁，刘志丹说：“我们没枪，怎样革命？现在就是要利用各种方法，团结人，争取人，这些人有枪，能争取过来，我们就有了武装。”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出生入死，利用各种关系与矛盾，在军阀部队中开展兵运，在民团和土匪的夹缝中为革命工作。16岁就从事兵运工作的习仲勋后来回忆说，“那时没有最大的牺牲决心，是不能够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的，因为我还没有忘记，自己是被以共产党嫌疑逮捕过的人，这样的人到国民党的军队里干事，对敌人说来是多么危险，多么引人注目。一经被查获，就是处死”^①。1929年到1931年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利用关系，先后打入陕甘宁边界军阀部队和民团进行兵运工作，先后筹划70余次部队起义均遭失败，但愈挫愈奋，表现了共产党员百折不挠的革命气概。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刘志丹、谢子长等先后组建了南梁游击队、陕北游击支队、西北反帝同盟军、红军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开辟了照金革命根据地和南梁革命根据地，极大地推动了陕甘革命斗争的发展。

然而当时执行王明“左”倾错误的陕西省委负责人杜衡对刘志丹等坚持从实际出发，在陕甘边山区开展游击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做法大为恼

^① 卢获：《习仲勋：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载《同舟共进》2008年第12期，第43页。

火，他指责刘志丹等人犯了“左倾机会主义”、“峭山主义”、“逃跑路线”的严重错误，强令红军到位于关中平原的韩城建立根据地。1932年6月，陕甘游击队向韩城进击，结果在平原地区受到强敌围攻，遭到了惨重失败。刘志丹等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终于使犯“左”倾错误的干部转变了认识，纠正了错误倾向，维护了红军的团结和统一。

1932年7月下旬，陕西省委派代表李昆来到寺村塬一带的游击根据地，全力开展批判“机会主义”领导和“反革命阴谋”的斗争，这场斗争的矛头主要是针对刘志丹等的正确主张，对正确意见打击压制。8月，国民党军向红军发动大举进攻，在严重的敌情面前，陕西省委代表坚持错误方针，结果红军陕甘游击队损失惨重，不得不放弃寺村塬游击根据地。为了战胜困难，刘志丹等身先士卒，以自己的革命乐观主义的言行，用自己的榜样影响着部队，鼓舞着部队。他亲手为战士做饭，给战士们打麻鞋，夜间替战士站岗放哨，为战士讲解革命道理，以官兵一致的模范行动，稳定军心，鼓舞士气，使红军渡过难关。

1932年12月，红军陕甘游击队奉中共中央的指示正式改编为红军第二十六军，下辖一个团。红军投入了创建照金苏区的战斗，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地方游击队，建设红色政权，陕甘边的革命斗争又一度出现了勃勃向上的兴旺景象。然而，1933年6月，在杜衡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的专断指挥下，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被迫离开照金苏区，南下终南山，遭到优势敌军的合击。红军孤军作战，奋力抗击，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陷于全军覆没的悲惨境地。在红二十六军南下失败的日日夜夜，刘志丹等耐心地进行革命理想和信念教育，使战士们坚持战斗。经过终南山一月余的辗转作战，刘志丹患病在身，体质虚弱，干部战士见了都非常难过。刘志丹却鼓励大家：“月亮都有时圆有时缺呀！革命在一时一地的失败，算得了什么？失败了再干呀！咱们道理正，穷苦人都站在咱们这边！”还用他常说的一句口头禅安慰大家：“天不能老是阴雨，总有个放晴的时候！”^①在刘志丹的影响带动下，幸存的红军指战员挺起胸膛，打起精神，下定决心，返回陕甘边区，恢复红二十六军，扩大根据地。

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走着最艰难的革命

^① 李昆民、张守宪：《刘志丹传略》，载《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道路，终于创建和发展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43年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在延安公祭刘志丹的大会上致词说：“刘志丹自大革命起直到为党牺牲，均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以不同方式组织革命军队，虽屡遭失败，但他百折不回，至死不变，垮了再来，再垮再来，这种精神和毅力是建军的基本条件，如果有人要问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就请看看刘志丹同志。”^①

四、坚守求是创新的革命胆略，始终保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勇气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是从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开始的。在历史关键时刻，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领导创建西北红军和根据地的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坚持把革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指导工作。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陕甘边地区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以创建、发展的精神武器。

在革命斗争中，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经过无数的失败挫折与成功，尤其是在与中央中断联系的情况下，不盲目依靠上级指示和抽象教条，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正确地估量敌情我情，按照客观情况决定政策，独立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形成了适合西北地区军队和根据地建设的重要思想，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重大贡献。

一是认识到要把革命斗争的重点始终放在农村，坚决贯彻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1929年，刘志丹到陕甘边界的桥山，见当地是“三不管”的地方，一些土匪搞几支枪，就能在此割据一座山头，使动员党员说，连土匪都可以在这些地方称山大王，弄得军阀无可奈何，为什么我们共产党人不可以在这里闹革命呢？1930年秋天，他拉起一支200人的队伍上了永宁山，当地民谣传唱：“刘志丹练兵石砭湾，要把世事颠倒颠。”在此基础上先后创建了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和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使革命的星星之火逐渐燃遍了陕甘。

二是认识到武装斗争是革命之本，坚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大革命后

^① 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第373页。

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员打入敌人部队，从事兵运工作，搞了70多次兵变，就是为了拿起武器进行斗争。这些斗争虽然都失败了，却使他们领悟到军事运动不同农民运动和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革命就难以存在和坚持下去，革命没有一个为共产党绝对领导的、真正为人民利益而战斗的军队是不行的。把开展游击战争与三分（地、粮、财物）五抗（税、租、债、粮、款）结合起来，把建立革命武装同开创根据地和建立红军政权结合起来，在战略战术上，吸取了多次革命起义失败的教训，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决定红军的作战任务，在保存自己的条件下，消灭敌人，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在敌强我弱、双方力量悬殊、根据地和红军游击队经常受到敌人“围剿”的情况下，不打硬仗，不死守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使红军取得了主动，打开了局面。

三是认识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坚持在反革命力量薄弱的地方——“榆林”建立革命根据地。“榆林”，离敌人统治中心较远，其统治力量鞭长莫及，有利于革命力量的生长和存在，有利于根据地的开拓和发展。虽然“榆林”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环境极其艰苦，但是群众有强烈的土地革命愿望。创建革命根据地要先进行群众工作，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工作；此后组织武装，开辟苏区，建立政权。对于根据地建设，不搞孤立主义，在确定中心区的基础上，以主力红军为骨干，建立多路游击区，扩大回旋余地，互相呼应配合，把革命力量的积聚和扩大统一起来。依靠群众，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根据地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政治上人民当家做主，实行民主选举；经济上，在分配土地和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恢复集市贸易，发行边币，维护工商业和小商小贩利益，与白区商人建立贸易关系，发展工商业，繁荣经济；文化上，发展教育，扫除文盲，创办列宁学校和陕甘特委的党内刊物与边区政府的刊物。

四是认识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坚持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于同国民党政权矛盾的地方武装，努力争取。凡同情、倾向革命的都热忱相待。一些哥老会头目、民团团总、保安团、红枪会人员，经过团结争取，都为革命做过许多好事。刘志丹提出，朋友要越多越好，敌人要越少越好，要灵活地运用各种办法，团结人，争取人，关键是团结民众，这样

我们才能有基础，才能站住脚。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十分重视做统战工作。包括对于某些土匪，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将其改造成为游击队。庆阳杨培胜、黄龙山的“大王”郭宝珊，经过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的多方面工作，经过长期改造把土匪成分洗刷了，吸收一些新的农民成分，就成为游击队，引上了革命道路。这些部队从红军时代直到解放战争时期，立了许多战功。

五、坚守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始终保持立党为公自觉奉献的光荣传统

建立革命根据地，离开艰苦奋斗精神是无法实现的。巩固革命政权，离开广大党员自觉奉献，就无法赢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伊始，中共陕甘边特委就根据刘志丹的建议，制定了一条纪律：凡一切党、政、军干部，如有贪污十元钱以上者枪毙。同时还要求，在战斗中，共产党员一定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勇敢杀敌，不怕牺牲。这是衡量一个党员合格的标准。党员还要做到关心同志，在行军中，党员一面要主动抬伤员，帮助体弱同志背枪，做到吃苦在前，一面要做宣传鼓动工作，发动大家互相帮助，保证不掉队、不违反群众纪律，做群众的贴心人。每到一地，党员都要主动向人民群众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维护群众纪律，为群众做好事。这充分反映了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领导人非常注重强调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问题，特别对党的干部提出了严格的纪律规范，要求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必须自觉认真接受党组织的批评和监督，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反对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特权思想。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刘志丹是实践艰苦奋斗作风的楷模。他虽然先后担任过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师长、陕甘边及西北军委主席、西北红军主力兵团总指挥等重要领导职务，但他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为了给红军指战员做出表率，他和红军战士一样吃野菜，住草棚窑洞，身穿千补百纳的衣服，脚蹬麻鞋。在那时，他家里只有两个土碗，两双高粱秆筷子。有一次，家里来了几个访问他的群众，他想招待却没有东

西，最后找到了一个南瓜，煮熟后又因碗筷少只好轮换着吃。^①他的这种简朴作风影响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每一个干部群众，他的高贵品质早已在根据地传为佳话。

由于刘志丹培育并倡导了艰苦奋斗的作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各级领导干部都自觉地发扬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作风，弘扬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精神，在实践中不断加强自身修养，不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牢固树立艰苦奋斗的思想，养成艰苦奋斗的品格。

时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就是这方面的楷模。作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最年轻的领导人，他毕生坚守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不骄不躁自觉奉献的高尚品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先后担任中宣部部长、国务院秘书长、副总理等职务，但艰苦奋斗的作风不改。为了节约用水，他每次洗完澡，总是把两个小儿子又放进浴盆再洗，最后还要洗过衣服才将水倒掉。孩子的衣服和鞋袜，也是依次接力，大孩子穿旧了打上补丁，让小的再穿。男孩子因怕同学笑话而不愿穿姐姐的花色布鞋，习仲勋却让用墨水把鞋染黑照样穿。^②1979年11月23日至12月6日，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省长的习仲勋，率广东省友好代表团出访澳大利亚，回程又顺道访问香港，严格遵守外交纪律，受到群众的称赞。习仲勋在生活上艰苦朴素，在事业上自觉奉献不计名利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两次面对升迁向中央提出让贤，毛泽东称赞：“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谦虚谨慎，言必谈群众。1997年冬，西北某城市领导看望在深圳休养的习仲勋，一见面就说：习老，您在西北地区享有很高威望。习仲勋听后淡淡笑了笑，问：“有多高，有麻雀飞得高没有？”他接着说，其实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战争年代我们依靠群众，现在更不能忘了群众。你们有时间要多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的呼声。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立自强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艰苦奋斗作为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作为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

① 解放军报编辑部：《忠心耿耿，为党为国——怀念刘志丹》，载《解放军报》1977年8月4日。

② 《广东党史》2006年第6期。

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是我们党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①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刘志丹为代表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革命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我们应从中汲取宝贵的营养，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坚守党的政治本色，凝聚人心，推动社会整体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作者：王钢，西安政治学院军队政治工作学系副教授。

^①胡锦涛：《坚持党始终奋斗的优秀作风 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载《人民日报》2003年1月3日第1版。

试论习仲勋在陕甘边区的群众工作

李 耕

习仲勋，陕西富平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与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不仅为中共中央和红军提供了落脚点，而且又成为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战略大后方。特别是在此过程中，习仲勋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脚踏实地，始终把边区的群众工作放在第一位，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被毛泽东赞誉为“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本文将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习仲勋在陕甘边区的群众工作进行论述。

一、深入农村根据地 关心人民群众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在长期的革命活动和实践中，习仲勋经常深入农村，调查农村情况，因此他深切“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地替他们设想，设想怎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①。

^① 《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上卷），第328页。

所以，他能够和群众真正打成一片，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和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过去领导群众斗争时，常常遭遇极大的危险，然而每一次都是平安地过去了。因为群众掩护他，替他站岗放哨，替他隐藏得很好，而且几十里外的人专程去慰劳他”^①。“习仲勋是从群众中生长起来的，而且与群众保持着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20世纪40年代初中共党组织给他做的鉴定的一句話。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习仲勋一贯坚持的原则，他始终强调群众的利益是党的最高利益，因此，能够时刻关心人民群众各方面的权益，力行于实践之中，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过程中，习仲勋始终将自己看作人民的公仆，经常深入农村，走街串户，访贫问苦，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体察人民群众的疾苦，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缓民众之所急，解民众之所难。如在南梁苏区时期，习仲勋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在领导边区军民进行建设的过程中，能够认真听取群众意见，有空就帮群众种地、推碾子，战时带头抬担架。尤其是在制定发展边区的“十大政策”时，就规定农民在分配土地的同时，也要分配苗，因为农民最需要的是苗，如果只分田，不分苗，就会影响农民的生产，降低农民的情绪，还将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配给雇农、贫农和缺少土地、牛羊的中农；在财经粮食政策方面，鼓励农民成立牧场，养猪喂羊，发展生产，对于红军粮食供应的问题，则采取对群众不动员交粮，也不让其交“欢迎”粮，靠收买民粮供给军队的办法，^②这样对群众生活方面的细致周到的考虑和照顾，不仅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还密切了苏维埃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

其次，关心边区经济发展。边区经济建设关系边区政权的稳定和群众生活的顺利进行。在南梁苏区，为了活跃边区经济，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方便边区群众的交易，边区政府在白马庙、荔园堡等地设立了集贸市场，保护小商人，允许其来苏区做生意；并发行苏区钞票，流通金融，解决了市场缺少货币的困难，保证了边区经济贸易的正常发展。每逢集日，习仲勋都要到集市上去看交易情况，探讨活跃市场的办法，力求为当地群众提供一个互

① 《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上卷），第321页。

② 参见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258页。

通有无、调剂余缺的交易市场。时任政府秘书长的蔡子伟曾回忆说：“每逢集市，习仲勋和我们几个人都去转转，群众每每把我们围拢起来，问这问那，亲热极了。那时候，没有明文规定的商业税收制度。集市贸易真正起到了促进边区经济流通的作用。”^①

最后，重视对边区群众的文化教育。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习仲勋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非常重视提高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他亲自发动群众办学校，推动了农村青少年教育的发展。首先在荔园堡的转嘴子办起了陕甘边区的第一所列宁小学，没有教材，老师自己编写，通俗易懂，很受边区群众的欢迎。校舍简陋，师生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努力克服困难。以后，又在太白、荔园堡川等地相继办起了几所列宁小学。边区政府还十分重视成人文化教育，在一些村庄办起了成人扫盲识字班。为了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人民，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创办了不定期刊物——《红色西北》，并且在兴办学校，发展边区教育的同时，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将政治思想教育同文化知识教育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在给边区群众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也宣传革命知识。现在南梁地区一些老人还清楚记得政治教材上开头的话：“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两导师……”^②以及有关党的方针政策，而这些正是学校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对提高边区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和革命觉悟，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建立群众组织 发动群众斗争

革命是为了解放人民大众并以人民大众为革命基本力量的，革命过程就是党和人民结合的过程。胡乔木曾说，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并不等于农民自然地就追随共产党革命。在中国革命史上，革命的发动和人民对革命的拥护和参加，是共产党人大量艰苦、细致工作的结果。在边区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习仲勋每到一个地方总是首先发动群众，建立各种形式的群众组织，然后领导群众，进行分粮、分地、分牛羊的“三分”与抗粮、抗款、抗捐、抗债、抗税的“五抗”等群众斗争，打土豪除恶霸，掀起农村革命

① 蔡子伟，《陕甘边根据地政权建设回忆》，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427页。

② 《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上卷），第184页。

斗争的浪潮。

渭北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中共渭北特委成立后，习仲勋担任共青团渭北特委委员，在他和其他革命同志的领导下，工、农、妇等群众团体成立，其中农民联合会里不仅有雇农、贫农、中农，也有富农，妇女联合会里也有富裕家庭的妇女，广泛地团结了能够团结的力量。在农村群众组织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习仲勋带领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分粮分地的群众斗争和抗日救亡活动。在渭北武字区和心字区，农民被发动起来，没收豪绅、地主、富农的粮食，并分配给生活困难的群众。与此同时，渭北特委先后召开联席会议、代表会议，学习讨论苏维埃土地法，研究讨论分配土地问题，从而使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并且，根据地还通过“教育促进会”，举行群众集会活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的妥协政策，从而激发了广大群众的革命觉悟和爱国热情。

在建立照全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习仲勋“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会、赤卫队和游击队”^①。以贫苦农民和少年儿童为骨干的农民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先后成立起来，在站岗放哨、肃清反霸、维护秩序、保卫斗争成果、配合红军和游击队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农村革命群众组织的壮大和发展，对边区土地革命斗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照全革命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时任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团长的王世泰在65年后曾评论说：“仲勋是陕甘边区特委军委书记和总指挥部的政委，很多军事活动需要他去领导和指挥；他又是筹建根据地民主政权的主要负责人……大量的工作是习仲勋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得他去过问。凡熟悉这段历史的同志，都为仲勋同志扎实的工作作风、任劳任怨的品德、身先士卒的精神所感动，认为他是搞地方工作的一个典范，为照全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付出了心血，做出了贡献。”^②

在南梁苏区，习仲勋按照“先进行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运动，再开辟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的方针，深入到农村“挨家挨户地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去分牛羊。这样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发

① 习仲勋：《群众领袖 民族英雄——回忆刘志丹同志》，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第3版。

② 《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上卷），第132页。

展了二将川、白马庙川、南梁堡、豹子川、平定川、义正川、吴堡川等地的群众组织。”^①张策谈起当时和习仲勋在一起工作的情形时说：“我到南梁以后，就在当地群众中活动，村村开会，村村讲演。接着习仲勋也来了。我们一同在南梁郑大爷家里过完春节（1934年春节）。经过一春的工作，农民联合会、赤卫队、贫民团、雇农会等在以南梁为中心的几条川里相继成立。”^②在建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过程中，习仲勋深知农民问题是革命的中心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关键是土地问题，于是指导各县成立土地委员会，紧密团结贫农团和雇农工会，调查各村土地占有情况，宣传土地政策，丈量核实土地，组织领导群众没收地主的土地、牛羊、粮食，分配给贫雇农和缺地少地农民。并且在分配土地时，习仲勋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整天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很快就将群众真正地发动起来，使玉皇庙、白马庙、二将川、白沙川、豹子川等地分配土地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大大加强了与群众的联系，激发了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激情。在分配土地的同时，也划分了阶级成分，群众对自己的阶级成分极为重视，习仲勋在繁忙的工作中热情接待因划定成分等问题来访的群众，及时纠正政府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偏差。

三、发展游击队 开展游击战争

武装是革命之本，一定规模的武装力量，是进行农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有力保证。因此，在进行群众工作的过程中，习仲勋特别重视对游击队的创建，并且带领游击队员在陕甘边区广泛开展人民游击战争，在支援群众运动，打击地主武装和民团，配合正规红军开展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渭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将特务队改编为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他担任政治指导员，队伍主要活动于三原、高平、耀县一带边界地区，同时他将武字区游击队改编为第一支队。游击队力量的壮大，对于打击地主武装，肃清反动势力，维护根据地的秩序，起到重要作用。“因为游击队的扩大，所以群众斗争也急遽地开展起来，游击运动的呼声也深入到渭北各地群众斗争

①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296页。

② 张策，〈陕甘边根据地南梁苏区的开闢〉，载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400页。

中……”^① 习仲勋率领游击队到武字区后区周围开展武装斗争，杀豪绅，驱逐催粮要款的差人，使得国民党政权不敢在那里收粮收款，游击队的活动在与群众的分粮斗争相结合的情况下，使当地的革命运动形势迅速地发展起来。

在照金革命根据地时期，由于习仲勋和其他革命同志的艰苦创建，游击队伍发展到一、三、五、七、九、十一等支队以及淳化、旬邑等十二支游击队，根据地的游击运动在耀县、淳化、旬邑等地开展起来。边区游击队的发展壮大，一方面，大大地补充了红军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对于配合正规红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国民党的军事“围剿”，起到重要作用。在陈家坡会议上，习仲勋作为会议执行主席之一，主持了这次会议，会后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正式统一了对游击队的领导，此后游击队和红军主力在特委的直接领导下，以崭新的阵容展开游击战争。首先歼灭驻让牛村、庙湾的雷天一，夏玉山民团各一部；继而突袭柳林民团，打响了胜利的第一仗，迫使进攻苏区的反动民团纷纷后撤，并在旬邑县底庙地区歼灭国民党地方民团一部，智取旬邑县城张洪镇，击毙民团团总，处决国民党县党务指导员及一批恶绅，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丰硕的果实。陈家坡“会议仍以创造和扩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口号。制订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开展群众工作的战略方针。实践证明，陈家坡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它对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意义。”^②

到南梁地区后，习仲勋深入群众，组织动员群众，坚持开展武装斗争。在原有游击队的基础上派出吴岱峰、刘约三等去组织保安游击队，王子良去整顿合水游击队，吴重雄去建立安塞游击队，杨培胜组织义勇军，根据地的军事力量不断增强。在习仲勋等革命者的正确领导下，陕甘边区根据地在发展的过程中迅速壮大，到1934年底，根据地已发展到包括淳化、耀县、宜君、旬邑、正宁、宁县、合水、庆阳、保安、安塞、靖边、富县、甘泉等18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约达2.3万平方公里，建立了正式的或临时的革命政权。正规红军四十二师已由成立时的两个团500多人，发展到5个团

① 《晋拓夫关于渭北斗争情况的报告》，1933年1月，载《渭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7页。

②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251页。

2000 余人，各地的游击队亦有 1500 余人，仅南梁地区赤卫军就发展到 18 个大队。^① 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为了捣毁根据地，扼杀苏维埃政权，国民党政府调集西北军阀加紧对苏区进行“围剿”，其中 1934 年对南梁根据地大的“围剿”就有 3 次，每次投入兵力都在万人以上，人数也是陕甘边区正规红军和游击队的数倍。在此期间，习仲勋组织群众，将根据地的粮食、农具、生活用具予以埋藏，把牛羊、牲口全部赶进山林隐蔽，实行坚壁清野，袭扰敌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军事“围剿”，先后解放边区 10 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成百个据点，对建立红色革命政权和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起到重大作用。

总之，不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习仲勋都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他坚持认为革命是千百万民众的事业，只有深深地扎根于人民大众之中，才能够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他始终将群众工作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深入农村，密切联系群众，建立革命的群众组织，开展反对农村地主土豪剥削和压迫的群众斗争，唤醒人民群众求得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的革命斗志；他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运用于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之中，建立游击队，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在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为边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提供有力的保证；他始终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将群众的利益看成党的最高利益，最终赢得人民的爱戴和拥护。

作者：李特，女，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王宜成、孟彩凤、贺成利：《习仲勋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载《陇东报》2007 年 12 月 9 日第 4 版。

浅析习仲勋对陕甘边区的革命贡献

官丽珍

习仲勋是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党和国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一生有两个最大的闪光点：一是早年跟随刘志丹创建陕甘边根据地；二是带领广东在改革中“杀出一条血路”。从1978年4月始，他主政广东两年零8个月。期间，他坚持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精神，为广东改革开放事业和特区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2009年是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75周年，本文主要突出习仲勋早年的闪光点，即研讨习仲勋与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历史，展现习仲勋对陕甘边区的革命贡献，纪念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重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习仲勋。

一、以革命的武装创建陕甘边根据地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陕甘边革命斗争得以胜利的根本保证。在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历程中，形成了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首的领导集体，他们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陕甘边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紧紧依靠群众，坚决同“左”倾错误路线做斗争。在远离中共中央及至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立足实际，独立解决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制定和实施适合陕甘边实际的正确方针和政策，使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取得了胜利。

1932年秋，为了发展农民运动，扩大革命区域，习仲勋在渭北特委指派下，到耀县照金地区做群众工作，与当时曾在这一带活动的陕甘游击队领导人刘志丹、谢子长取得联系，后到达渭北苏区，被委任为渭北第二游击队政治指导员。习仲勋认为，渭北苏区以武字区为中心，东邻富平，西连淳化，北接耀县，南临三原，东西长不过40里，南北宽不过20里，地方太小；游击队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周围民团经常进行骚扰，既没地方躲藏又没回旋余地；地方小了，群众就少，兵源也就缺乏。所以，苏区一定要发展，要扩大。苏区发展壮大，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有了充足的兵源，反击敌人才有力量，革命根据地才能不断巩固壮大。因此他在当地的一部分乡村领导农民群众进行打土豪、分粮食的斗争，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习仲勋等人在工作实践中努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陕甘边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以革命的武装创建陕甘边根据地。

1933年4月5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照金召开，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兼党团书记）。边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很快在各村建立党团组织，苏维埃政府、农会、妇女会和赤卫队、游击队，制定土地法令，建起亭子沟集市，利用薛家寨险要地势，设立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后方医院、兵工厂（修械所）、被服厂、仓库等，使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同年7月，耀县游击队（以后命名为陕甘边耀县第三支队）组建，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展革命武装，建党建政而奋斗。8月，在中共陕甘边特委的支持下，有重要意义的党政军联席会议在陈家坡召开。会上，大多数同志主张采取集中行动，并主张建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这几支部队的行动。习仲勋是此次会议的执行主席，始终站在大多数同志一边，坚决主张集中统一领导，反对分散行动，为会议作出正确的决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实践证明，陈家坡会议的决定是正确的，它对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巩固和扩大陕甘边根据地具有重要的意义。

1933年10月，习仲勋协同特委和游击队指挥部的负责同志，一起奋起抗敌，坚持战斗。11月，习仲勋按照包家寨会议关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发展以南梁地区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决议精神，与已转入这一带的地方工作人员一同组织、领导群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2月下旬，在主力部队打击消灭敌人、不断取得胜利的新形势下，陕甘边区革命

委员会在南梁正式成立。选举习仲勋任主席，决定进一步组织群众，发展地方武装，开展游击战争，肃清反动势力，建立革命政权。在中共陕甘边特委的领导下，陕甘边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相继成立，扩大与巩固革命根据地。这是习仲勋坚持以革命的武装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成果。

二、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创建民主政权

在艰难的革命斗争中，习仲勋懂得“任何革命理论、原则的实行，都必须同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教条主义之所以错误，就因为不同实际情况，完全从本本出发，生搬硬套；政治路线错了，组织路线也必然是错的，政治上搞‘左’倾机会主义，必然在组织上搞宗派主义。”^①根据地该如何建设？中心究竟建立在哪儿好？创建陕甘边区民主政权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习仲勋等同志始终以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信念创建民主政权。

1933年11月3日，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明确任务。会议以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为指导，对陕甘边区党和红军面临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进行热烈讨论，会议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新根据地，创建陇东、陕北、关中三个军事游击区。包家寨会议是解决陕甘边区实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也是陕甘边革命斗争由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习仲勋按照包家寨会议精神，受命于创建南梁根据地政权。

习仲勋等同志为创建南梁根据地政权，东奔西走，夜以继日地工作，在红军的帮助下，先后在华池县、合水县等地建起农民联合会、贫农团等群众组织；组建起南梁、小河口、荔园堡、豹子川、东华池5个赤卫大队1000余人，担负着保卫根据地、保护群众等任务，积极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发展壮大南梁根据地。1934年初，南梁根据地已初具规模，2月25日，四十二师党委在小河口四合台村主持召开群众大会，恢复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等同志在陕甘边界进行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根据当地实际，以农民阶级为革命主体，把农民作为革命的主要

^① 《习仲勋文选》，第291页。

力量，以农民为土地革命的主体，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活动；以农民为革命武装的源泉，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与农民群众结为建设和捍卫革命根据地的铜墙铁壁。

1934年11月初，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荔园堡隆重召开，正式选举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工农兵代表大会一致通过《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经决议案》和《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健全了苏维埃政府的下设机构。随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法令，促进了苏区各项事业的发展。如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贫雇农民；开辟贸易市场，发行边区货币，活跃边区经济；实行志愿兵投制，严明纪律；设立了兵工厂、服装厂、医院；建立红军干部学校，在荔园堡创办第一所列宁小学，组织群众学习文化，扫除文盲；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革命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西北地区革命有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民主政权机关，标志着陕甘边区红军和特委的成熟和壮大。自此以后，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主席习仲勋的领导和组织下，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发布一系列政策和法令，组织群众生产支援前线，发行货币，活跃边区商贸市场，建立集市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培养军政干部保证红军和地方工作的需要，发展教育，扫除文盲，提高边区人民文化素质，使边区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这是习仲勋坚持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创建民主政权的又一突出贡献。

三、以坚强毅力做出的巨大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陕甘边区的党组织、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经历了长期而残酷的反革命“围剿”和来自党内“左”右倾错误的干扰，历遭险阻，成为王明“左”倾路线失败后硕果仅存的一块根据地，以后发展成为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抗日战争的出发点，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习仲勋等领导下的陕甘边根据地革命斗争，是全国革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全国各个根据地一样有着共同的发

展规律，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但是由于历史、地理和社会的具体环境不同，在斗争实践中这块根据地又形成自身的特点和具体经验，成为它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克服内外重重困难，战胜强大于自己好几倍的敌人的基本原因和历史条件。

习仲勋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为人忠厚，平易近人，作风扎实，才思敏捷，胸怀大志，意志坚定，是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革命危难关头他以坚强的革命毅力，发挥了决策性作用，为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其一是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陕甘边根据地有一个坚强、正确的领导核心。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涌现出以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为代表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克服“左”的右的干扰，经得住挫折和失败的考验；善于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的实际相结合，按照客观情况决定政策，创造性地处理重大问题，表现出政治上的成熟和独创，为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做出重大贡献。

其二是贯彻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十分坚决。大革命失败后，陕西党组织把主力及时转移到农村，主张党员到农村去，到兵营去，发动和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战争。先后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创建了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和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虽然当时“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使党组织在创建红军、开展土地革命、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影响，带来曲折和失败的教训。但是曲折和失败更加坚定了习仲勋等贯彻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思想，使革命的星星之火逐渐燃遍了陕甘。

其三是将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陕甘边根据地斗争史表明，军事运动不同农民运动，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就难以存在和坚持下去。只有把开展游击战争与分地、分粮、分财物，抗税、抗租、抗债、抗粮、抗款结合起来，把建立革命武装同开创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结合起来，在战略战术上，不打硬仗、不死守一地，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积小胜为大胜等，才能取得主动，打开斗争的局面。这证明了武装斗争是革命之本，枪杆子里面逼出政权。

其四是组织武装，开辟苏区，建立政权。在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建设中，习仲勋认为在确定中心区的基础上，要以主力红军为骨干，建立多处游击

区，扩大回旋余地，互相呼应配合，把革命力量的积聚和扩大统一起来。同时积极进行群众工作，一村一村做调查，一家一户做工作。只有组织武装，开辟苏区，才能建立政权，这是在斗争中得出的宝贵经验，也是习仲勋对陕甘边根据地建设的重要贡献。

习仲勋是一位久经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他与陕甘边根据地紧密相连，胸怀大志、襟怀坦荡、热情诚恳；工作积极主动、富有朝气；注重从实际出发，坚持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有错即纠，有意见就讲，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以党的利益为重，能上能下，顾全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开拓进取，不为困难挫折所动摇；艰苦奋斗，善于团结同志，与群众打成一片，为创建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建立革命政权、发展革命武装、进行党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官丽珍，女，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马文瑞在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活动

曹建平

1934年到1935年秋，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大发展时期。马文瑞是陕北特委的干部，长期在陕北工作，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来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留了下来，在这里工作了近一年时间。他以全部精力和热情投入工作，时间虽然不长，却为陕甘根据地的干部培养和根据地的发展扩大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也为他漫长的革命生涯写下了多彩的一笔。

“顺路到南梁看看”

1934年2月，时任团陕北特委书记的马文瑞，遵照北方代表的指示和陕北特委曹家坳会议的精神，去三边（定边、安边、靖边）做兵运工作。当时杨虎城的一个新编骑兵团驻在三边，团长谷连勋。陕北特委派了一批党员打进谷旅做兵运工作，他们多是安定人，马文瑞曾先后在安定担任过地下党的区委和县委书记，对他们大都认识，因而组织派他去指导兵运工作，伺机把队伍拉出来。

马文瑞到谷旅以找事做为名住了下来，与打入该旅的党员接上头。谷旅三个团，一团驻定边，二团驻安边，三团驻靖边的柠条梁。马文瑞指定王治岐、师发直、薛毓瑞分别负责一、二、三团的工作，把所有十几个党员编成两个支部，在他和支部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然而就在3月底4月初，杨虎城突然命令谷旅开赴西安整编，顿时打乱了马文瑞的兵运计划。要拉出队

伍，条件尚不成熟，他本可以回特委复命，但放弃做了半截的兵运工作，实在不甘心。他决定跟部队同行，以便见机行事。谷旅王治岐所在的第一团叛逃出走了，马文瑞从三团驻地行条梁出发，随旅部率领的二、三团南行。该部是骑兵，走的大多是沙漠和半沙漠地带，马文瑞靠两条腿，早走晚宿，紧跟不舍。脚上打起了血疱，走路疼痛难忍，路上，他难得喝上一口水，凭着一股信念，拼命咬牙坚持，一直跟到庆阳。马文瑞利用部队在庆阳休整的机会，化妆潜入薛毓瑞连，与薛毓瑞、师发直等商议。他提出沿途只有庆阳距陕甘边根据地中心南梁最近，约200里，可以把能拉出去的士兵秘密拉出去，送到南梁。否则到西安就更不好办了。师发直表示可以带一排人出来。于是在一个黑夜，师发直带着约20名士兵，10多支步枪，拽着绳子从庆阳城墙上溜下来，直奔南梁而去。这些人到南梁后被刘志丹编为合水游击队。以后师发直调安塞游击队任队长，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薛毓瑞考虑该连起事尚不成熟，到西安再说。一个排的出走引起了敌人的怀疑，马文瑞决定先赶到西安，等他们到后再联系。

马文瑞到西安住进了榆林宾馆，在这里见到了熟悉的陕北党员朱侠夫、常应晨等。马文瑞与6月来的骑兵旅的薛毓瑞等党员接上了关系。不料杨虎城把骑兵旅缩编成一个小团，把中共打进去的同志大部分编出来了。马文瑞在城东门外的八仙庵召开了部队党员会，提出让这些同志回家乡安定参加游击队，在谢子长领导下，在当地开展游击战争。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见。薛毓瑞等回去，后成为游击队的骨干。薛毓瑞在新成立的红27军84师任连指导员，以后又担任了营教导员、团政委等职，于1936年在西征战斗中壮烈牺牲。就在会后马文瑞回宾馆时，朱侠夫、常应晨等在外面等他，见到他就焦急地说：“你不能回去了，敌人把你的枪搜出来了，留了人正要抓你哩！”原来前几天有个同志在谷旅偷了把手枪，交给了马文瑞，被敌人发现查到了他的头上。马文瑞不敢回宾馆，跑到杜斌丞家躲了起来。

在杜斌丞及其家人的掩护下，马文瑞在杜家住了一个多月，躲过了风头，于是找熟人借了点路费，准备回陕北。当时回陕北有两条路：一条走咸榆公路，经延安到陕北；一条走陇东。走咸榆公路比较危险，陕北军阀井岳秀曾通缉过他。走陇东不仅相对安全，更重要的是离陕甘边根据地南梁很近，用他的话说，“可以顺路去南梁看看”。马文瑞从事地下工作多年，一直为创造条件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而不懈努力，现在，他的许多

熟识和不熟识的战友们已经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有此机会，当然要去看看，以了却萦绕他脑中多时的一桩心愿。于是他决定走陇东，先坐汽车到了宁县，然后通过熟人找到一个回家探亲的红军战士常冠英，由他带路，在荆棘丛生的小路上走了3天，终于到达陕甘边根据地。

任职军政干校

1934年秋，马文瑞来到东华池。最先见到的是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团团长王世泰。他们是初识，但都互相早有耳闻，并不陌生。王世泰热情接待了他，介绍了南梁根据地的情况，并说刘志丹任主席的陕甘军委驻寨子湾，习仲勋任主席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荔园堡。刘志丹、习仲勋听说马文瑞来了，很快会见了，表示了热情欢迎。马文瑞跟刘志丹很熟，早在1929年他参与领导绥德饥民斗争时，就曾得到过时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的刘志丹的当面指导。与习仲勋相见则是头一次。他们不仅向马文瑞介绍了陕甘根据地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而且讲了眼前的困难，主要是缺乏得力的干部，因而力劝他留下来，到他们创办的军政干校任教。刘志丹还邀马文瑞到他家里吃饭，习仲勋作陪，吃了刘志丹夫人同柱荣做的拿手的剔芥面。

马文瑞原只想到南梁看看便回陕北，见刘志丹一再挽留，便同意了。他给陕北特委写了封信，汇报了兵运工作的情况及暂留南梁的原因。恰逢高尚因军纪问题被撤掉第四十二师政委职务，要回陕北，马文瑞就托他捎信给陕北特委。

陕甘红军不断壮大，根据地不断发展，急需培养大批有一定军政素质的干部，以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刘志丹对办好军政干校十分重视，亲自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任军事主任，主持日常工作。教员有蔡子伟、高逢春等，都是兼职。军政干校共办了三期，共培养了约200人。第一期学员有30多人，校址在荔园堡。从第二期开始，学校迁到豹子川的张家岔。马文瑞去时，第二期学员刚报到，有70多人。他们主要来自部队中、下级干部，还有部分地方干部，陕北特委也送来了少数干部。学校相当简陋，住房全是土窑洞，有的还是学员自己动手挖的，睡的是土炕，门窗更是因陋就简，用木条、木棍做的。当时既没有正规教材，也没有正规教室。教材由教员自己编写，院子里挂块黑板就是教室。教员在院子里讲，黑板上

写，学员每人发根铅笔，一点儿麻纸，坐在自己垒的土台上记。学校的条件虽然简陋，但课程设置和教学要求却颇为正规。开设的课程有政治、军事、文化和政权建设。学校按军事化管理，每天一早，由吴岱峰带领，大家会集在沟底河滩上出操。出操时个个精神饱满，口号山响，在山谷间回荡。军事课主要是讲军事常识，包括军事基本动作和游击战术等。文化课主要是扫除文盲。政权建设课重点是讲如何做群众工作。刘志丹亲自讲军事课。他从寨子湾翻山穿林过来，讲完再徒步回去，来回要走 20 里崎岖山林地，有时讲完课，也留在校内过夜，与大家一起研究工作。

马文瑞负责的政治课，主要内容有“工农红军”、“共产党”、“土地革命”、“六大决议”等。没有教材，没有起码的参考书，就以不全的党内文件为基础，加上平时学习积累的政治理论知识，结合自己的革命实践经验，编成较为系统的实用教材。为了使内容充实丰富，他在备课上狠下工夫。熟知情况的吴岱峰回忆说：“马文瑞备课，那可叫认真，常常是晚上人睡静以后。有一回大约到了后半夜，我被冻醒了，一看拐窗里的灯还亮着，心想他一定受冻了，就披上衣服，把火盆给他端过去。走到窗前，从门缝里瞅见他正用毛笔在纸上写，写上几行，停下来，用手摸着脑门在想。我很感动，心想他真是闹革命顶真的人。”马文瑞的记性很好，加上他曾担任地下党的县委书记、团特委书记，时常要到基层开会、传达党的文件，路上携带文件不安全，就把文件内容记在脑子里，因而有些重要文件他几乎能背下来。晚年的吴岱峰曾回忆说：“我真佩服文瑞同志的记性。许多中央文件上的话，他能整段整段地背写出来。许多情况如江西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闽浙赣苏区、川陕苏区和各路红军的情况，他都清清楚楚。”马文瑞的课受到大家好评。

那时生活条件艰苦，但大家都很乐观，充满朝气，山谷里常常扬起歌声。马文瑞记得吴岱峰就“闲空时好唱陕北民歌，歌声里充满豪迈的激情，很是动人。”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我俩相处很友好。那时物质条件很艰苦，两个人洗脸用一条毛巾。有一时期，我害沙眼病，给他传染上了，两个人都成了红眼，相互一看，都忍不住笑了。岱峰同志说：“敌人宣传说咱‘共匪’是红眼睛、绿头发，看来也不完全是造谣。”两个人都笑得流出了眼泪。

第二期培训了两个多月，结业了，又招了第三期，约有 100 人。这时最

人汇集了5万多人，对陕甘和陕北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形势紧张，只学了一个半月，提前结业。这些学员通过培训，政治、军事和文化素质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被分配到红军、游击队和地方政府中去，成为革命斗争中的骨干力量。

开辟陕甘边东地区根据地

随着反“围剿”斗争的开展，1935年2月，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杨森为配合红军主力在陕北作战，率骑兵团到南梁苏区东边甘泉、宜川一带活动，打击敌人民团，拔除敌人堡垒据点，并向韩城、合阳一带进击。3月回到南梁，向陕甘边特委汇报，认为甘泉、宜川一带地理条件优越，群众革命积极性高涨，应派得力干部去创建政权，建成巩固的根据地。陕甘边特委决定派马文瑞去开辟东地区、建立地方政府的工作。临行前，刘志丹亲自找马文瑞谈话，讲了开辟东地区的重要意义，交代了任务和有关注意事项，并告诉他，杨森带骑兵团仍去那一带活动，配合他们开展工作。

马文瑞接受任务后，很快组织了一支精干的工作队，有呼志禄（陕甘边苏区经济部部长）、张彦福（原华池县赤卫队长）、许克昌（知识分子）以及军政干校的几个干部，还有一支30多人的警卫队，迅速开赴东区。走到延安南区三十里铺，发现有一个叫花子总跟着他们，抓来审问，原来是延安敌人派来的一个暗探，马文瑞下令就地处决。

马文瑞带队来到的东地区，属甘泉、宜川、洛川三县，这一带相对于南梁，人口密集，较为富庶，有10多万人口，当时还是游击区。马文瑞率工作队骑兵团的配合下，扎根串联，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建立赤卫军、游击队和游击小组，打击反动势力，摧毁保甲组织，建立党、团组织。在创造一定条件后，成立县、区、乡革命委员会，废除国民党政府的粮赋、税捐、地租和债务。在贫雇农充分发动的基础上，登记和分配农村土地。

马文瑞当时一身农民打扮，跑遍了几个县的乡村。他与农民打成一片，吃住在农民家里，调查研究，做细致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就地了解和解决政权建设及土地分配中的各种问题，每天工作到很晚。农民热情欢迎这些一心为群众办事的红军干部，马文瑞在工作中交了不少农民朋友。农民分得了土地和农具，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积极支持建立和保卫红色政权的各项工作，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经过一段紧张的工作，3月28日，在临镇成立了以马文瑞为书记的中共陕甘边东区工委。6月，成立了陕甘边东区革命委员会，新任陕甘边特委委员的马文瑞当选为主席。呼志禄、奚玉山、许克昌、张彦福分别担任土地、粮食、财政、肃反机构的部长或主任。甘泉、宜川两县除了县城和宜川南区，其他地方都成了红色根据地。为了突出红色政权的性质，经马文瑞提议，东区革委会批准，甘泉县改称红泉县，宜川县改称赤川县，各县、区、乡都陆续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在建立红色政权的过程中，斗争十分激烈。赤川县北洼子有一户地主，父子两人表面上拥护革命，背地里做宜川县城敌人的密探，上级革委会来人或有其他事情，他们就向敌人报信。敌人得到消息，时常出来偷袭，使我们受到损失。马文瑞得到报告，亲自带警卫队把这父子二人抓起来，就地正法。一些地方还有少数反动据点，他就想方设法予以拔除，使群众生活得到安定，红色政权得到巩固。宜川南原有个土寨子，附近许多土豪劣绅都往那里跑，里边有民团守把。他们仗着土寨子围墙高，易守难攻，时常出来骚扰、捣乱，祸害百姓，引起群众愤恨。马文瑞决心拔除这个土围子，他带领警卫队，发动附近区、乡赤卫队以及农民群众两千多人包围了寨子，许多人没有枪，就扛着红缨枪、老镢头、锄头来了。马文瑞让警卫队靠前，连夜发动进攻。民团开头还放了几枪，一看越来越多的人，吓得抱头鼠窜，顽抗的被打死，土豪劣绅见势头不妙，纷纷逃跑。马文瑞指挥大家举镐挥锄，把土寨墙刨平，填土填沟，彻底铲除了这个反动的土围子。在政权建设中，马文瑞高度重视发展东地区的地方武装，建立了有100多人枪的东地区游击队，宜川县也建立了100多人的游击队和30多人的保卫队。后来，在这三支武装的基础上合编的东地区独立营，成为一支正规的武装力量。

经过一番坚决斗争，甘泉、宜川两县广大农村地区的“钉子”陆续被拔除，根据地东至黄河，西至洛川，南至韩城，纵横百余公里，近10万人口，成为陕甘边区和以后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开辟东区根据地的过程中，马文瑞一头扎进群众当中，忘我地工作，同群众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与群众建立了密切的鱼水关系，得到群众的充分信任。因而他的工作卓有成效，在群众中威信很高，许多农民都知道“马主席”，有重要的事都愿意去找“马主席”。以后马文瑞在错误“肃反”中被抓，引起了群众的不安和外逃。中央到达陕北以后，马文瑞被释放，陕甘省委宣布马

文瑞被放出来了，群众仍没有打消顾虑，以致省委书记朱理治向周恩来汇报，建议让马文瑞回东地区“安民”。马文瑞按周恩来的指示，到东地区去看望群众，群众拉着他的手问这问那，亲热异常，连同行的西北保卫局干部刘子文看了，都感叹不已！

正当马文瑞在东地区干得热火朝天，准备在宜川和洛川之间再开辟一块新区，新建一个县的时候，因“左”倾错误执行者的错误“肃反”，马文瑞被抓走，结束了他在东地区的工作，也结束了他在陕甘边的工作。

马文瑞真正在陕甘边工作不满一年，但他还是为陕甘边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可观的贡献。他在去陕甘边根据地以前，从敌军中拉出一个小排，连人带武器，投奔南梁，支持了陕甘边根据地的武装斗争；在军政干校的任教，为培养陕甘边急需的人才，提高他们的素质，尽了他的最大力量；开辟东地区，建立了两个县的红色政权，使其与陕甘边连成一片，发展和扩大了陕甘和西北革命根据地。在陕甘边根据地，马文瑞第一次公开担任红色政权的领导工作，进一步取得了开展群众工作、领导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的经验，为以后担负更重要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作者：曹建平，全国政协办公厅秘书局原正局级秘书。

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历史背景 与社会文化意义

朱鸿召

抗日战争时期，依据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马锡五（1898—1962）受命担任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在主持陇东分区行政事务同时，负责分区民事和刑事案件的二审判决。其间，他坚持主动到群众中去，深入田间地头，按照合法、合情、合理的原则，灵活机智地审理了许多复杂案件，有效地缓释了民间积怨，化解了社会矛盾，创造性地将西方现代法律制度与中国农村社会文化融会贯通，探索出一套被称为“马锡五审判方式”的民事和刑事案件调解和审判机制，他因此被当地百姓称颂为“马青天”。

效率：合法、合情、合理

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农村环境下，司法工作在调解社会矛盾纠纷问题上创造的新式审判方式，有着极大的社会有效性。

1944年1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政府委员会议上作上一年工作总结和下一年工作安排时，特别强调“司法机关审判案件时，须切实照顾边区人民的实际生活，切实调查研究案情的具体情况，分别其是非轻重”。“诉讼手续必须力求简单轻便，提倡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以

便教育群众。”^①这是从改善司法工作，努力实现将现代司法制度与边区农村实际相结合，探索一套简明、高效、公正的司法审判程序的角度，充分肯定了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积极意义。

3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社论文章，通过具体审判案例，专门论述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形式和内容，指出其实质“就是充分的群众观点”。因此，他是真正民间的，而不是“衙门”的，真正替人民服务，而不是替人民制造麻烦。^②这些经典案例，已经成为后来法律教科书的必读内容。从司法效率的角度来剖析这些案例，我们可以看到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特殊价值和意义之所在。其中最著名的案例是“封捧儿婚姻案”。

陇东分区所属华池县农民封彦贵，早在1928年就将自己四岁女儿封捧儿许配给远房亲戚张金才之子张柏。^③两家订了“娃娃亲”。1942年5月，封彦贵因女儿长大成人，当地旧习“彩礼”行情大涨，为了能从女儿婚事上挣得更多的“彩礼”（实际上是一种变相买卖婚姻），一面教女儿以婚姻自主为由要求与张家解除婚约，一面暗地托人给女儿另找婆家。先是许给高家，因女儿坚决不同意，他也嫌高家给的“彩礼”少而悔约。随后，封彦贵又将女儿暗地许配给城壕川南塬的张克芝之子为妻，“彩礼”是法币2400元、硬币48元。^④女儿仍然不同意。此事被张金才知道后，便向华池县政府告发。县司法裁判部判处属于包办买卖婚姻，撤销上述婚约。

1943年2月，封捧儿到赵家洼子四奶奶家吃喜酒，碰巧张柏也去了，经人介绍两人正式见面，感觉良好，都表示愿意结婚。封捧儿告诉张柏回去赶紧想办法，说不定哪天爹又要把她卖了就难办了。果然，封彦贵在这年5月又以法币8000元、银圆20元、哗叽布4匹，将女儿许配给庆阳县新堡区财主朱寿昌续弦。朱寿昌年龄比封捧儿大11岁，封捧儿得知后坚决反对，并立即给张柏送信催其想办法。张家父子召集本家兄弟子侄商议，最后决定

①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1944年1月，载《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361页。

② 《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载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3月13日社论。

③ 封捧儿，1959年改用大名封芝琴，是后来文艺作品中刘巧儿的生活原型，一直居住在甘肃省华池县梁家河乡上堡子村张湾村组。这桩婚姻的牵线人是封捧儿的大姑，同时又是张柏的神婆。

④ 法币，是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1935年11月，国民政府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国家管理法定货币，禁止银圆流通。1948年8月，法币被金圆券替代。硬币，是当时陇东地区仍然流通的银圆。

“抢婚”。3月13日深夜，张家纠集20多人，手提棍棒，牵一头毛驴，从张湾村抄小路夜奔40里，闯入封家。待撞开院门和房门，未见封彦贵，只有封捧儿与奶奶、妈妈、妹妹在家。来人催促封捧儿快跟他们走，奶奶见状大骂张金才，并高喊“土匪抢人啦！”张金才叫张柏赶紧背起封捧儿跑，到崖背与其他人会合。次日天亮，封彦贵得知此事后，告到华池县司法处。司法处认为聚众抢亲是违法的，当即追捕抢亲人犯，将张金才、张金贵等人先后拘捕。张柏与封捧儿先躲起来，后又投案自首。县司法处就事论事以“抢亲罪”判处主犯张金才6个月徒刑，服劳役，宣布封捧儿与张柏婚姻无效。宣判后，封、张两家都不服判，附近群众也不满意。封彦贵要求上诉，封捧儿更是坚决反对。

这时，正好马锡五来华池县巡视工作。封捧儿在路上碰到马专员，拉住他，在一棵大树下口头告了状。

马锡五接案后，与推事石静山一起，深入温台区四乡封家院子，登门拜户，首先向当地乡干部和附近群众全面了解本案的真实情况和一般舆论倾向，接着询问封捧儿本人意见和要求，了解到她不愿嫁给朱家，“死也要与张柏结婚”；并将张柏放出，听取其意见。案情真相已全面掌握后，便协同县司法处裁判员，在村公所举行群众性的公开审判，将此案有关人员召集起来，当众问明封彦贵屡卖女儿、张金才等纠众抢亲皆为属实，封捧儿也当众表明愿与张柏结婚。然后又听取到场群众对本案的意见，群众一致认为：封彦贵屡次以女儿许配婚姻为由接受彩礼，变相卖女儿，违反婚姻条例，应受处罚；张金才黑夜聚众抢亲，既有伤风化，又妨碍社会治安，闹得四邻以为盗贼临门，惊恐不安，更应受到惩罚。特别是对封捧儿与张柏的婚事，群众极为关注，认为合理合法，不能拆散。在此基础上，陇东分庭于1943年7月1日宣布二审判决：

1. 原判决撤销。
2. 张金才犯聚众抢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
3. 张金贵实行抢婚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4. 张德耀附和抢婚罪，判处劳役三个月。
5. 张仲附和抢婚罪，判处劳役三个月。
6. 张老五附和抢婚罪，判处劳役三个月。
7. 封彦贵屡行出卖女儿，包办婚姻，判处劳役三个月。封彦贵出卖女

儿的法币没收。

8. 封捧儿与张柏婚姻为有效。

事后，张金才家属要求减轻处罚，经陇东分庭请示边区高等法院，同年7月26日高等法院批示：“张金才等率众黑夜抢婚，因属扰乱社会秩序，惟以乡民无知，出于一时情感冲动，婚姻既承认有效，而对其犯罪行为亦可从宽处理。”最后决定，对张金才等“提前假释或宣告缓刑”，并退还朱寿昌的部分财物，免使其损失过大。

这一判决，做到了合法、合情、合理，将聚众抢婚、买卖婚姻、自主婚姻三重复杂矛盾条分缕析，是非分明，惩罚了违法者，打击了买卖婚姻，保护了自主婚姻，非常有效率地化解了涉及多个家庭的矛盾冲突，并且受到当地群众一致拥护。受罚者也认为自己罪有应得，表示服判。一对新人封捧儿和张柏作为胜诉者，更是皆大欢喜。

现代司法审判制度，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讲究程序规范和证据文本。在西方近代工业化大生产和城市社会，这是社会法制发展进程的历史进步。中国现代革命以推翻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为任务，以建立主权独立、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目的。在这个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一切源自西方的思想理论和社会制度，都必须实现与中国社会历史传统和基本国情特别是乡村社会现实的交融整合，完成中国化改造，最终归结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按照一般司法程序处理“封捧儿婚姻案”，任何一次审判只能解决其中一组矛盾，其他矛盾只能另案处理。并且，在涉及法与情、理的关系时，现代法律以社会理性为基础，难免出现所谓“法律不承认良心，良心也不承认法律”的情理悖论。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律效能的充分发挥。

马锡五主持审判“封捧儿婚姻案”，是将现代司法制度融入中国农村社会乡绅裁决传统，灵活运用，创造性地实现了司法与民情、事理的结合，达到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无声地教育干部群众，凝聚人心，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作用。

有一百部法律，就会有一百零一种社会矛盾。法律是有限的，法律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我们只有清楚地知晓法律的有限性，才能更好地发挥法律的社会效能。

路径：到群众中去，从群众中来

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出现，离不开陇东地区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和共产党人深入细致的群众路线作风。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陇东分区经历着复杂而坎坷的武装斗争经验。地处鄂尔多斯盆地南缘的陇东地区，位于陕西、甘肃、宁夏数省交界，千百年雨雪风沙把黄土高原撕裂成残垣沟壑、梁峁交错。东有子午岭，西邻六盘山，北部丘陵连绵，只有南部地势相对平缓，整个地貌呈盘盘旋，沟梁辐辏，复杂的地理环境养有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也提供了各种不同社会力量瓜葛纠结的天然土壤。近代社会以来，这里的民族矛盾、阶级斗争，乡里纠纷、流寇盗贼滋生不断，地方民团武装、国民政府保安团队、土匪流寇散勇以及红军和八路军交错出现，形成纷繁往复，交错拉锯式的政治斗争格局。1939年4月，相继发生“镇原事件”、“宁县事件”，^①1940年1月又发生更大规模的“环县事件”，计有5个区自卫军被策反叛变，21个乡政府遭破坏，47名区乡级干部被杀害，许多群众被裹挟参加国民党保安大队副队长赵思忠（又名赵老五）为首的叛乱活动。这些相继发生的武装冲突，又称为“陇东事件”，是抗战以来陇东局势混乱的一个高潮点。事件发生后，国共双方都非常关注，并互派代表进行协商谈判，最终结果是在庆阳地区形成国共分治局面。

“陇东事件”稍事平息后，为了加强政权建设，1940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设立陇东分区行政专员公署，领导庆阳、合水、镇原3县工作。7月，又决定将庆环分区并入陇东分区，王维舟担任分区公署专员，马锡五担任副专员。此前，马锡五担任庆环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曲子县县长。^②马锡五新任伊始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主持“陇东事件”善后处理事宜。两个

① 镇原事件：1939年4月8日，驻守在陇东地区镇原县的国民政府保安队派兵在电子镇，南三镇绑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民运工作人员7人，缴夺步枪7支。八路军当即提出质问，并电告国民党甘肃省主席朱绍良，提出严正抗议。在抗议未果后，八路军三八五旅派兵将国民政府太平镇区署人员9人和南三镇保安队长以及马家镇十二保保长等扣押。随后，国民政府保安队在全县境内多处搜捕扣押共产党和八路军。双方调兵遣将，矛盾对峙。4月25日，八路军七七〇团三营发起反击；宁县事件：1939年4月26日，驻守在陇东地区宁县城郊的国民党领导的一六五师所属三个营兵连突然开进县城，配合保安队袭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七团一营，遭到激烈还击。经过一昼夜战斗，双方各有伤亡。

② 参见《陕甘宁边区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布告》，1940年8月。

政权纷争摩擦未已，流寇散匪时或猖獗，时间复杂，人心惶惑，马锡五选择工作开展的方法是先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的心声意愿。这在当时环境下，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因为争取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是处理善后的基础，也是政权存在的根本。经过大量走访，耐心细致地听取群众意见，他了解到真正的反动分子只是少数，参加哗变的大部分人都是不明真相、被裹挟的群众。根据当时陇东分区的客观政治局势和共产党的路线政策，马锡五确定处理善后工作的原则为：严惩匪首，教育胁从，释放不明真相的群众。同时，他通过分区公署指示各地政府和群众组织，不许歧视受编放归群众，要妥善安排给一部分生活困难者生活救济。这样，取得了绝大多数群众的拥护和信任，借以树立了共产党和边区政府讲道理、明是非的良好形象和崇高威信。

马锡五这种主动到群众中去，把工作中的难题当作调查研究的课题，倾听群众意见，再把群众意愿带上来，与党的路线方针相结合，从而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是对群众路线的灵活运用，是在危难环境下求生存图发展的智慧结晶，也是他后来创造性地发明“马锡五审判方式”的精神来源。

“一刻也不要离开群众。”1943年1月，马锡五参加边区政府召开的专员、县长联席会议，期间受到毛泽东的题词鼓励。^①

1942年12月，马锡五担任陇东分区公署专员，次年3月兼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长，开始从事司法工作，亲自参加案件审判。他秉持一贯的走群众路线工作作风，有计划地走乡串户，到田埂地头，与老乡们拉家常，简化审判手续，开展巡回审判，及时纠正了一些错案，解决了一些缠讼多年的疑难案件，使违法者受到制裁，无辜者及时释放，受到广大群众的热情拥护和交口称赞，并获得“马青天”的美誉。

马锡五总结自己的审判经验时说：“办案要走群众路线，如果离开群众，任何所谓‘天才家’也不可能把工作做好。因之，革命的司法工作者，必须面向群众，随时征询群众的意见，倾听群众的呼声，设身处地地体会群众的感情与要求。”^②

“我们的司法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不敢说有什么大的成就。我自己

^① 刘凤阁、李合娟：《马锡五》，载刘凤阁编：《陇东革命历史人物选》，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9年编印，第111—112页。

^② 马锡五：《关于司法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报告》，1949年3月。

更不是一个什么‘创造者’。如果我们有一点小的成就，那应归功于人民的力量，应归功于我们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同志常常号召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当人民的勤务员，就要虚心向群众学习，甘于当群众的小学生。至于我在陇东所做的一点，也不过是响应这个号召下一点极小的成就而已。”^①

这不是一般的谰词，而是实实在在的工作经验体会。在陇东地区至今还流传着这位马专员灵活机智判案的很多故事，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其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精神传统。

有一次，马专员到镇原县马渠乡寻访，碰到一位60多岁的老太婆拦路喊冤。马专员赶紧迎上前去，双手扶起老人，并按过老人手上的杈子。原来，这是一起家庭婆媳矛盾纠纷案。素来清官难断家务事，马锡五处理问题的方法是召集当地10位六七十岁的老年人，先把杈子内容念给他们听，然后听老人们发表意见。因为这些当地的老年人最熟悉当地的民情、民俗和民意，也最清楚这户告状人家的婆媳矛盾底细。老人们纷纷提供情况，发表意见，很快理清了是非曲直，调解了家庭矛盾。马锡五用道地的乡音说：“咱们这里风俗，大小事老年人最明了。我办啥事都要依靠群众，感谢大家帮这个忙！”

合水县五区丁、丑两家土地纠纷案，先后经过两个政权三次审判，最后由马锡五主持进行调解，双方尽释前嫌，重归于好。案情是六乡村民丑怀荣在丑家壕有山地一处，三乡村民丁万福在川子河及其附近有山地一片，约340亩，两家都企图扩大土地面积。于是，丁家从川子河山上向北发展，丑家从丑家壕山地向南发展，双方土地接壤后，冲突就发生了。1938年，这里还没有建立革命政权，丁、丑两家向国民党宁县政府告状。丑怀荣通过其侄女婿担任县保安队长的关系，从县政府领取一张“补契承业执照”，不仅丑家壕山地归其所有，而且丁家老业川子河及其附近山地，也归其所有。丁家不服判决，上诉到国民党平凉高等法院，并在当地杀猪请客，重金贿赂土绅法官，致使法院判决，丁家不仅收回川子河及其附近土地，而且连丑家壕山地和丑家坟地都一并归其所有。当地群众得悉后，议论纷纷，痛恨官府贪赃枉法，徇私舞弊，认为两家都属无理。

1940年，合水县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丑怀荣再次起诉。限于政权初设，

^① 马锡五：《答考察边区司法者问》，1946年。

司法制度尚未健全，两家纠纷没有得到妥善解决。1943年，马锡五受理此案，派陇东分庭石推事到当地召集四邻逐个调查询问，再召集干部群众多人进行实地考察。基本情况全部弄清楚后，组成以石推事、区长和群众参加的调解小组，根据《陕甘宁边区地权条例》的有关规定，裁决川子河及其附近山地归丁家，丑家塚山地归丑家，双方都愿意接受调解，正式划定地界，订立息讼契据。

如果说判决是一般司法审判程序，那么，调解就是群众路线下司法审判的新形式。“审判是强人服从，调解是自愿服从。审判得好，赢的，输的，都不能不自愿服从。审判与调解是一件事的两面。马锡五同志的审判方式，是与调解结合的。这是一个大原则——为群众又依靠群众的大原则。”^①司法路径的改变，带来审判方式和方法的变化。不同于刚性的判决，柔性的调解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对于乡村邻里矛盾的化解。“调解可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可使小事不闹成大事、无事不闹成有事。”调解的方式，主要是在政府主导下充分发挥乡村士绅、劳动模范、德高望重的长者作用。“因为他们对事情很清楚，利害关系很密切，谁也不能蒙哄谁。占便宜、让步，都在明处。”^②这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政党领导下的村民事务自治。

传统中国社会的国家政权组织机构只延伸到县，一位县太爷负责领域内行政司法、经济文化全部事务。县级以下乡村社会，则处于一种自为状态，主要依靠家族自治和乡绅调解。近代社会变革过程中，引进西方司法制度体系，推进中国社会法制化进程。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队伍长期坚持在农村地区进行阶级斗争，依靠群众，为了群众，促使其创造性地将西方近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社会治理经验相结合，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是对近代西方司法模式的一种创造性变革，是司法领域里的群众路线。边区司法工作的群众路线，就是使司法工作成为群众自己的工作，司法机关成为群众自己的机关，同群众打成一片，倾听群众的意见，尊重群众的良好习惯，公正负责地为群众解决问题，不拘形式的组织群众的审判，以减少群众的诉讼。^③减少诉讼，就是把乡村邻里的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

① 谢觉哉：《关于调解与审判》，1944年5月，载《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93页。

② 谢觉哉：《关于调解与审判》，1944年5月，载《谢觉哉文集》，第593页。

③ 雷经天：《改造司法工作的意见》，1943年12月。

态，这在陕甘宁边区 1943 年以后逐渐成为现实。

边区政府及时总结推广马锡五的审判方式，并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据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统计，全边区司法机关，1942 年调解结案的民事纠纷占全部民事案件的 18%，1943 年上升为 40%，1944 年达到 48%；轻微刑事案件经调解结案的，1942 年占全部刑事案件 0.4%，1943 年上升为 5.6%，1944 年达到 12%；与此同时，各级司法机关受理案件逐年减少，1942 年全边区民事和刑事案件共计 1832 件，1943 年下降为 1544 件，1944 年上半年为 622 件。

马锡五所在的陇东分庭调解力度更大，1943 年 5 月至 12 月，调解处理的占全部案件的 17%；1944 年 1 月至 10 月，调解结案的上升到 65.5%。^①

边区各地涌现出很多调解模范乡、村以及个人，基本上杜绝了群众上访、闹访等恶性事件，让群众在自我管理实现自我教育，提高自我文明素质。

立场：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

“马锡五审判方式”出现的深厚背景，是马锡五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品质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执政为民的立场。

在长期从事基层实际工作中，马锡五始终保持一种难能可贵的务实作风，不唯上，不唯书，从而创造性地完成一个又一个任务。当时，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在陕甘边境地区，近代社会以来的哥老会组织很普遍，会员众多，影响广泛。这种带有江湖社会特征的旧帮会组织，其核心人物社会属性复杂，但是其广大会员基本属于劳苦群众，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该组织，是乞求获得一种安全保护，免遭恶霸势力的欺侮。所以，这种行会组织既可以被敌人利用，也可能转化为革命的力量。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急剧上升，为贯彻落实瓦窑堡会议精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对哥老会宣言》，提出团结抗日主张。马锡五以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名义，于 1936 年 8 月 26 日在环县河连湾主持召开“哥老会大爷会议”，参加此次盛会的有来自环县、庆阳、西峰、三岔等地的哥老会大爷 80 多人。

^① 张希斌：《马锡五审判方式》，第 60 页；杨永华、方克勤：《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书记院政篇）》，法制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241 页。

马锡五以其亲民的工作作风，在会上传达《对哥老会宣言》精神，介绍当前抗日形势和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号召各地会众以实际行动响应之。“演词激昂，每个哥老会兄弟都均摩拳擦掌的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一致抗日救国。”^① 经过广泛的讨论交流，会议最后决定成立“中华江湖抗日救国委员会”，召集“山堂会”，设立陕甘宁省哥老会招待所，作为各地龙头大爷、江湖好汉前来聚会、共商抗日救国大计的联络中心。

这个特殊的会议，这个特殊的抗日救国组织，这个特殊的省级招待所的设置，都是需要非同寻常的胆识和勇气的。马锡五能够从容处之，大胆为之，其根本智慧来源于对陇东地区哥老会这个江湖社会组织的客观实际认识，来源于对劳苦群众生存状态的一种朴素感情。

在担任庆环分区公署专员兼曲子县县长期间，马锡五发现当地农民不重视积肥，卫生意识也比较马虎，村头街尾随处可见人马牛粪。为了引导群众养成积肥生产，讲究卫生的习惯，马锡五号召干部带头，发动群众一起参与，打扫院落，拾粪积肥。他以身作则，每天天刚亮就出现在曲子县的大街小巷，提着粪筐拾粪。在他的带领下，曲子县的街巷院落渐渐地变得清洁起来，改变了以前的脏臭面貌。农业生产技术也得到改善，施肥的庄稼长势普遍良好，收成自然也就有了大大的提高。

从事司法工作后，马锡五保持一贯的群众观点和为民服务立场。他介绍自己的司法调解经验时说：“作为法官，当你下乡找老百姓调查了解情况，恰好遇到他下地归来，这时候，你应该把他手中的牛绳接过来，帮他把牛拴好，让他在一旁喝喝水，抽抽烟，好生休息后，才跟他了解情况。”^② 这种温良的态度，只有坚定的执政为民的立场，才能做得那么自然，那么亲切。

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官员，官员行为背后往往隐藏着政府的历史文化属性。马锡五及其审判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实践中，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典型代表之一。

司法权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谁司法，如何司法，其实质是代表什么人执政，站在什么立场上执政。所以，任何司法审判形式的存在，都

① 《盛况空前的哥老会大会》，载保安《红色中华报》1936年9月18日第2版。

② 朱河堤，《司法为民的“马锡五审判方式”精神永不过时——访马锡五秘书、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张楚》，载北京《法制日报》2008年6月29日第2版。

是政权性质决定的。陕甘宁边区司法制度及其运作模式的选择，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艰难选择。

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1937年2月13日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司法部（简称“中央司法部”），同日发布第一号训令，加强司法组织建设，执行两级审判制度，倡导公审及巡回法庭，不准虐待犯人，等等。该训令未及实际施行，2月21日中央主席团对第一号训令进行修订和补充，改“两级审判制度”为“三级两审制度”。7月23日，中央司法部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苏维埃中央政府为了实行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首先将中央司法部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进行南京政府颁行之一切不妨碍统一战线的各种法令章程，工作人员仍本十年来苏维埃艰苦奋斗的精神，紧张耐劳的工作作风，一扫官僚主义，成为一旧的形式新的内容的司法机关。”^① 这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共将陕甘宁边区政府作为中华民国政府下属的一个特别行政区，相当于省级地方政权。这样，就形成陕甘宁边区早期司法审判模式：县级政权设裁判部，在地方法院尚未设立之前，由政府承审员主持第一级初审；边区政权设高等法院，主持第二级复审；中华民国中央政权设最高法院，主持第三级终审。

由于国共合作并非顺利，为了确保边区政权的相对独立性；同时，受边区司法专业人员严重稀缺的客观条件所限，在实际执行中，边区法院是受边区政府主席团的指示和领导，没有完全实现司法独立，形成所谓司法“半权”现象。与参议会立法权、边区政府行政权相对应，构成所谓“两权半”政权格局。边区司法审判实际执行的是两级两审制度，没有什么具体的案例上诉到南京或重庆的国民党中央政府最高法院。

边区司法执行的法律依据，前后也有较大变化。抗战初期，边区施行的法律，以适应于边区的环境及抗战的需要为标准，采用中央所颁布各种法律为原则，并参照地方的实际情形。因此，在边区处理任何的案件，一方面根据法律的条文，同时却特别根据事实，说明理由，而斟酌法律上所规定的刑罚加以判决。还有些特殊的革命的历史传统，如土地、婚姻等问题的解决，

① 《中央政府司法部改为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937年7月，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西北五省区编委编印小组、中央档案馆主编：《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则以革命的传统及边区政府所颁布的一切文告为依归。^①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严重恶化，边区司法转向以执行边区法律文告为主，强调据实审判。“司法机关的法律根据，必须是边区施政纲领及边区政府颁布的各种现行政策法令。边区现行法令不足，一方面应根据历年经验，将好的判例加以研究整理，发给各级司法机关参考；另一方面由主管机关起草符合于革命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的精神与边区实际的民刑法与诉讼程序。”^②从抽象的法律条文中解放出来，依据事实进行合法、合情、合理的司法审判，是司法实践中的群众路线，也是政权建设中的文化创新。

为了便于乡村群众诉讼，边区司法始终追求简化手续，接受口头申诉，免除所有诉讼费。“政府机关所需用的一切经费，既经由人民供给，当不借故额外征收。”特别要求法院不得“故意摆设庄严的法堂，使犯人发生恐惧”。积极倡导司法过程中采用矛盾调解手段，在边区，司法机关审问一切案件，完全采取说服解释的谈话方式，主要的是将案情审问清楚，寻求解决的途径，而不实行威吓。特别是对于民事案件的处理，首先是进行调解，使双方的意见接近，一直到自愿的解决，没有任何的强迫。我们以为唯有这样才能使双方心悦诚服。^③这种司法模式的真正实现，有待于1943年后马锡五的创造性发挥。但早在1938年，时任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的雷经天就提出希望，说明这是边区政权性质决定着司法路径走向。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屁股决定脑袋。“司法工作是人民政权中的一项重要建设，和其他行政工作一样，是替老百姓服务的。这样，就要一心一意老老实实把屁股在老百姓这一方面坐的端端的……我们的司法方针是和政治任务配合的，是要团结人民，教育人民，保护人民的正当利益。越是能使老百姓邻里和睦，守望相助，少打官司，不花钱，不误工，安心生产，这个司法工作就越算做得好。”^④这是一个很朴实的表述，形象地道出了边区司法工作的方式方法选择，是与其人民政权为人民服务的立场息息相关的，密不可分的。

当一个政权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其任何一位官员只有走出衙门，深入人民群众当中，及时发现并充分利用人民群众的聪明智慧，才能化解社

① 雷经天：《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制度》，载延安《解放》周刊第50期，1938年8月28日。

②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政府一年工作总结》，1944年1月，载《林伯渠文集》，第361页。

③ 雷经天：《陕甘宁边区的司法制度》，载延安《解放》周刊第50期，1938年8月28日。

④ 习仲勋：《贯彻司法工作正确方向》，载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11月5日第2版。

会矛盾。“千百事件整天发生在人民中，最适当的解决办法，也就在人民中。”^①只有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也只有解决了立场问题，才能及时发现民间的智慧创造，并将其总结、整理、提高，转化为最新的政策设计，从而化解不断出现的社会矛盾和危机。

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选举马锡五担任边区高等法院院长。1954年马锡五当选全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1962年4月因病去世。曾经在陕甘宁边区和马锡五共同致力于司法创新的谢觉哉题诗，称其是从群众泥土里长出一棵树^②，群众泥土是马锡五智慧的源泉。法律不是简单的逻辑关系，而是丰富的实践经验，法律的生命在于它在具体实践中的灵活应用。马锡五审判法是特殊时代环境下的历史创造，在边区农村发挥了极大的司法社会效率。社会发展，时事变迁，马锡五及其所代表的政权组织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宗旨是永远都不过时的。

作者：朱鸿召，曾任《解放日报》主任记者、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兼任延安大学中文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特约研究员、上海市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

① 习仲勋：《贯彻司法工作正确方向》，载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11月5日第2版。

② 谢觉哉：《锡五同志风采》，1962年4月。

黄子文与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

黄军政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原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习仲勋老前辈，在《回忆黄子文》的谈话中说：黄子文和我都是陕西关中人，他家在三原陵前乡，我家在高平渡村，仅一河之隔。从1930年开始，我们曾在一块工作战斗了好几段时间。因此，我对他是比较了解的。^①

黄子文领导的这支农民武装（指黄子文一九二八年创建的武字区农民游击队），像星星之火，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以后组建红二十六军的主要力量，为创建渭北和以后的照金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②

黄子文，字承章，1909年生，1947年在解放战争中牺牲。陕西三原陵前人。1926年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上海工人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和湖北的黄麻起义，八七会议之后，奉命回陕，在三原从事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是共产党在陕西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渭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30年10月，黄子文奉调中共北方局搞军事工作。1932年进入陕甘边区，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的创建发展做出了历史贡献。

本文重点论述黄子文在陕甘边苏区的革命活动。

^① 参见习仲勋：《回忆黄子文》，载中共三原县委组织部编，《黄子文》，第1页。

^② 参见习仲勋：《回忆黄子文》，载中共三原县委组织部编，《黄子文》，第1页。

一、黄子文、拓克宽等组建的晋西游击队，是后来组建陕甘游击队的骨干力量之一；黄子文创建领导的晋西游击队逐步发展壮大，改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团，是红二十六军的骨干力量

1931年夏天，黄子文在山西省委书记刘天章的指示下与拓克宽等同志，在山西孝义、中阳、汾阳三县交界的楼底村，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拓克宽任队长，黄子文任政委，阎红彦、白锡林、胡廷俊、杨重远任副大队长和副政委，吴岱峰任经济委员。

晋西游击队开展了游击活动，部队很快发展到100余人。之后，山西军阀徐永昌调集了万余重兵，对晋西游击队进行“围剿”。面对如此强大之敌，山西省委断然下达指示：“精简部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地区，继续开展游击战争。”7月上旬，黄子文等率晋西游击队，冲破封锁，西渡黄河，进入陕北。

中共山西省委对晋西游击队到达陕北之后的领导归属问题作出明确指示：“到陕北后在政治上军事上均接受陕北特委的领导和指挥。”黄子文几经奔波，终于在陕北特委秘书张鸿志家找到了特委书记赵伯平（化名康和熙），向赵伯平汇报了游击队的活动情况和山西特委的指示，还与他一同研究了游击队以后活动的方向和作战原则等问题，最后作出决定：一、活动区域定在井岳秀与杨虎城辖区的接合部，必要时可将队伍拉往陕甘交界的子午岭地区；二、在目前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攻打县城及防御设施较强的村寨，以减少不必要的伤亡；三、坚持红军游击战术的十六字方针，采取“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策略，开展游击战争；四、发展壮大游击队，动员革命群众参加游击队；五、动员身份已暴露的党团员参加游击队，加强游击队的政治领导力量。此决定由黄子文回部队传达执行。

就在此时，赵伯平接到了中共北方局通过山西省委转来的通知：“黄子文同志之妻李盛云在天津被捕后，转押北平，现行将分娩，让家属保外生孩子，通知子文同志速到北平照看。”赵伯平即急忙阻挡黄子文回部队传达执行决定，劝其立即前赴北平。

黄子文仍坚持先回游击队传达特委决定，将部队做好安排后，再去北

平。而赵伯平极力相劝：保外生产，是个出狱的机会，且盛云坐牢身虚，生孩子人命关天，游击队的事，特委会派人安排，你赶快上路。黄子文与赵伯平就游击队的人事安排交换了意见后，才急急赶往北平。^①

黄子文没有及时赶到北平，保释妻子出狱生产，李盛云在北平监狱中生下了儿子。黄子文到达北平时，李盛云已由同乡保释出狱，暂住关中会馆，后受到北平地下党和乔国桢^②的极大关怀和帮助，有了住所。因孩子在北平监狱中出生，黄子文为儿子取名“黄北平”。

晋西游击队后在阎红彦、杨重远率领下，转战陕北，改名为陕北游击支队，后奉陕北特委指示，于10月到达甘肃合水林锦庙，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1932年1月，在刘志丹、谢子长的领导下，于甘肃省正宁县柴桥子合编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任正副总指挥。1932年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锦章村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

1932年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镇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

1932年8月，黄子文将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武字区游击大队扩编成渭北游击队，12月，黄子文整顿了渭北游击队，任指挥，金天华任政委。后黄子文调进照金革命根据地工作。1933年春，黄子祥出任渭北游击队指挥部总指挥，部队迅速发展壮大，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1933年7月24日，中共陕西省委将渭北游击队第一大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团。8月，红四团拉进照金根据地。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黄子文、拓克宽等组建的晋西游击队为陕甘游击队的组建打下了基础，是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的一支重要骨干力量。黄子文组建的渭北游击队，以后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又是红二十六军的一支骨干力量，曾经转战陕甘，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立

① 中共三原县委组织部编：《黄子文》，第28页；中共陕西党史人物丛书《赵伯平》，陕西人民出版社，第21页；《赵伯平忆黄子文同志》，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三原县委员会：《三原文史资料》第21期，第64页。

② 乔国桢，化名高子香，陕北佳县人。1926年从毛泽东在广州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期结业回陕，到三原从事农运活动，是渭北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1930年在天津被捕，后被转入北平草厂子监狱关押，1931年保外租界时逃脱，在北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0年被党组织送往苏区治病，1942年在新疆从事第一战线工作。1945年病逝于盛世才的监狱中。

下了功勋。随晋西游击队过来的阎红彦、杨重远、杨琪、马佩勋、李维均、吴岱峰诸人，随红二十六第四团进入陕甘边的黄子祥、杨森、王伯栋、杨玉亭、王安民诸人，以后都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都是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负责干部。

二、黄子文随军转战，开展陕甘边的游击战争

1932年4月18日，陕甘游击队在旬邑马家堡改编为三、五两个支队，黄子文被任命为五支队政委，阎红彦任队长，杨重远任参谋长。21日，黄子文、阎红彦、杨重远率五支队南下，到达三原武字区，配合武字区游击队攻打马鬃王茂臣民团，第二天，武字区召开3000多人欢迎五支队的大会，群情激愤，五支队南下推动了渭北农民斗争的发展。

5月10日，陕甘游击队三、五两个支队在清水塬会合，恢复了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杨重远任参谋长。

此时期，黄子文起草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布告，阐明了红军的宗旨、主张和任务，由总指挥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联名颁布，产生了极大影响，使广大的劳苦群众，认识了红军，了解了红军，清楚地明白了红军“是贫苦工农自己的武装力量”，是自己的军队。红军分配豪绅的粮食、土地，取消高利贷、赋债的主张，“建立陕甘农工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的主张，更是受到广大贫苦群众的拥护。至今保存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陕甘游击队布告，已是极珍贵的革命文物。

5月15日，刘志丹指挥陕甘游击队奔袭马栏，战斗打响后，阎红彦、黄子文率五支队担任主攻，一举歼灭了敌五——团两个连及民团一部，缴枪200余支。17日，在刘志丹的正确指挥下，游击队一天之内连歼凤凰山守敌五——团及焦家坪民团、五里镇民团500余人，缴枪400余支。以后的半个月中，陕甘游击队挺进数百里，经过五县，九战八胜，歼敌1400余人，缴枪1200余支。

6月上旬，陕西省委指示部队东进韩城。由于平原地区不宜游击作战，又遭强敌袭击，战斗失利，陕甘游击队被迫退回宁县麻子掌休整。

7月，陕甘游击队编组为三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黄子文任第一大政委，大队长高山保，参谋长吴岱峰。

同时期，渭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风起云涌，蓬勃发展。中共陕西省委根据此形势，于当年7月底调黄子文回到渭北，筹备成立渭北革命委员会。9月22日，渭北革命委员会成立，黄子文任主席。

从此，因革命斗争的需要，黄子文经常奔波往返于陕甘边与渭北两块革命根据地之间，为革命武装的发展壮大和革命政权的建立发展巩固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

8月底，陕西省委派谢子长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他们率部队南下到达耀县地区，黄子文急返回陕甘游击队。9月12日，在照金攻滩歼灭了耀县、富平、同官三县民团400余人，击毙了三县民团总指挥党谢芳，活捉了耀县民团团总柴子发。

9月，游击队进攻保安失利，10月再战失利，刘志丹、谢子长决定部队分散活动，黄子文、杨森率领60余人回到武字区。

12月，陕甘游击队各部在合水县塔儿墩、黑慕墩地区汇合，随即南下。根据中共北方会议决定，陕西省委指示游击队开往宜君转角镇，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黄子文即通知他领导的渭北游击队康尚武、黄罗斌、邓子敬等率部北上，与陕甘游击队会合。24日，黄子文参加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大会，25日，他率渭北游击队20余名战士护送被杜衡撤职去上海受训的谢子长、陶红彦二人回到武字区。1933年1月5日，黄子文就二十六军的情况向省委写了报告。

1933年11月8日，根据包家寨会议精神，陕甘红军在莲花寺进行整编，恢复成立了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

在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转战陕甘边区开展游击战争时期，黄子文作为领导干部之一参加了军事活动，随军参战，参与指挥，参与了重大军事活动。

三、黄子文组建和整顿陕甘边各路游击队

1933年3月中旬，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在照金成立。

“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的建立，虽然有了编制序列和组织形式，但是很难对数十支游击队实行统一领导，特别是由于游击队发展很快，不少游

击队混进了坏人，组织严重不纯，屡次侵犯群众利益，遭到群众反对。游击队领导也出现过违犯群众纪律方面的问题，对游击队的军纪产生了消极影响。”^①

“一九三三年三月，侯家堡子战斗后，红二十六决定改组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任黄子文为总指挥，我为政委。我们整编了各县游击队，加强了党的领导。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发展。”^②

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坚决地遣散了一批纪律涣散、成分不纯的人员，开展了阶级教育和纪律教育，建立起政治工作制度，有效地提高了游击队的政治、军事素质”^③。

1934年2月，陕甘边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成立，张明善任总指挥，黄子文任政委。

第三路游击队包括平子、旬邑、淳化、照金及以后成立的宁县三支队、中宜游击队，活动在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中部、宜君一带。

三路游击队指挥部将平子游击队改编为第四支队，1934年冬，抽调四支队100余人编成红三团一连，1935年春，又抽调四支队大部分人员为红一团编了一个连。张策、郭秉坤曾任该游击队政治指导员。

三路游击队在1934年到1935年有很快发展，相继组建成立几十支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为开辟陕甘边南区打下基础，作出了贡献。

1934年5月，黄子文带领蔡子伟、张景文（女）、许国璠、蔡春堂诸人，到陕甘边区工作。途中，在三原武字区又集合了当地游击队10余人，携带枪支北上，在耀县东坪找到张仲良。此时，三路游击队第二任总指挥王安民刚在自家山战斗中阵亡。黄子文在关键时刻，建议张仲良集中兵力，待机消灭后沟民团。张仲良采纳了黄子文的建议，并推举黄子文为三路游击队总指挥，开展游击活动。^④

1935年2月，红一团成立，陈国栋任团长，张仲良任政委。红一团与三路游击队配合，活动在陕甘边南区一带。4月1日，瓦扇子战斗中，红一团失利，受了损失，团长陈国栋负伤，政委张仲良调离。陕甘边军委派黄子

① 《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第129页。

② 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载中共陕西党史人物丛书《刘志丹》，第4页。

③ 《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第129页。

④ 中共三原县委组织部编，《黄子文》，第49页。

文代理团长，张文华为政委。黄子文率红一团向礼泉彬县地区出击，在礼泉泾河畔的北平镇一举歼灭礼泉吃干镇民团，后挥师北上，配合中宣游击队袭击了柳林西峪民团，连战连胜，大大增强了指战员反“围剿”的信心，以后，红一团北上与杨森的骑兵部队会合，继续转战歼敌。

四、黄子文护送谢子长、阎红彦出潼关，寻找搭救刘志丹，为陕甘边区输送和培养了大批干部

1932年12月下旬，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一师第二团时，杜衡蛮横地撤销了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的一切职务，令其离开部队去上海党中央“受训”，刘志丹经广大官兵要求后留下任政治部主任，而谢子长、阎红彦二人则被杜衡强令立即离队前去上海。

24日，红二十六第二团正式成立，25日，黄子文率渭北游击队20余名战士护送谢子长、阎红彦到了三原武字区。此时，渭北革命根据地遭受国民党军队和六县民团武装“围剿”不久，武字区内还驻着白军两个连，与武字区相邻的富平地区，又有五六百白军刚刚开到，根据地内笼罩着白色恐怖，群众逃亡，党组织尚未完全恢复工作，又有国民党的许多便衣侦探到处活动。黄子文在此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寻找了安全可靠的地方，妥善地安置好谢子长和阎红彦，因武字区不能久住，黄子文去了渭南，1933年1月5日，黄子文在渭南给省委写了一份报告后又写了一封信，除汇报渭北特委的工作及成立改编红二十六军的情况而外，还专门向省委请示谢子长、阎红彦二人的问题。黄子文在给省委的信中写道：“谢、阎怎么办，因为他们不能在那里久住，我马上从这里回去，如能在那再候数天，将问题能解决了更好，如果那里严重，我便把他们送到渭南一带，你们再解决，你们给送报告人决定，再送报告人回来，路费由你们给他。”^①由此即可看出，黄子文对谢子长、阎红彦二人当时处境的关怀和同情，希望省委给予解决的焦急心情。此后，还是黄子文设法筹措路费，派人送谢子长、阎红彦两人东出潼关。阎红彦到上海后去苏联学习，谢子长辗转华北后回到

① 《陕西渭北子文报告》，1933年1月5日，载中共三原县委组织部编：《黄子文》，第304页；《陕西子文关于红二十六军的来信》，1933年1月5日，载中共铜川市委党史办公室编：《红二十六军在照金》，第79页。

陵北。

1933年6月17日,^①在照金北梁会议上,杜衡否决了刘志丹、习仲勋、金理科等人以桥山中段为依托,发展陕甘边根据地的正确意见,强行作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渭华地区的错误决定。6月21日,红二团由北梁出发南下,黄子文随军带路,于23日到达三原武字区。在此,杜衡以去向省委汇报为由,让汪峰代理政委,私自溜走。黄子文马上追赶杜衡至三原,在三原民众教育馆内,省委书记袁岳栋、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黄子文、杨声(刘映胜)、杜衡5人召开了紧急秘密会议。会议对杜衡未经省委同意私自强令红二团南下的错误进行了严肃地批判。决定立即通知高陵县县委阻拦红二团南下,并由黄子文追赶红二团传达停止南下返回照金的决定。但为时已晚,红二团已渡过渭河,去向不明。

杜衡错误的冒险决定,导致红二团在终南山的惨痛失败,造成极为痛心的损失。刘志丹等同志亦被困在秦岭山中。

以后,省委派黄子文前往渭华,寻找红二团,搭救刘志丹。

黄子文先到达渭南的程家乡、桥南乡一带,打探寻找,又到华县的高塘乡、东阳堡子底、郭家庄、龛峪口等地打探寻找,没有结果。在高塘大明寺小学,黄子文找到在此教书的薛毅,与薛毅商量寻找办法。薛毅给黄子文搞了一套木工工具,让他装扮成木匠,便于掩护寻找,并介绍他去找地下党员宋宗维帮助,费尽了周折。至今,黄子文装扮木匠时拿的木工工具鏊子(当地人称为平基),已作为革命文物陈列在渭华起义纪念馆。

后黄子文找到了党的地下渭华县委书记赵应魁,发动地下党组织动员党员分头寻找,黄子文为了搭救战友,进入秦岭深山,饿了烧玉米棒,烤洋芋,夜间山区寒冷,烧一堆火,用脚踩踏后,睡到尚有火星的热灰上,多日之后,终于找到了刘志丹、王世泰、曹士荣等同志。他们在地下党员王杰的帮助下出了山,先在群众家隐藏休息,后在王杰与地下党组织帮助下到达赤水。

后来,过渭河又颇费周折。国民党派军队已封锁沿渭河的所有渡口,严加盘查红二团在秦岭的失散人员。而其中的王世泰又不会泅水,只能搭乘渡

^① 据《王世泰回忆录》记,北梁会议是5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大事记》(1918-3—1949.10),陕西人民出版社,刘说在6月中旬;《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说是4月17日。

船过河，黄子文的妻子李盛云挺身而出，与王世泰假扮夫妻，提着祭品篮（祭品下还藏着4把手枪），抱着孩子，装成夫妻二人去河北给娘家母亲去做周年的模样，用编好的假话应付盘问，冒险过了渭河，与地下党组织派人护送过河已到达河北的刘志丹等人会合。

后来，他们又在渭河北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搞到了路费，装成货郎北上，到达了洛川。1933年的中秋节，刘志丹、黄子文、王世泰、曹士荣4人辗转回到照金，受到根据地干部军民的热烈欢迎。

1932年6月底，陕甘游击队东进韩城失利，退回甘肃宁县受章堡，人员减少。为了迅速恢复壮大游击队，给部队补充新战士，黄子文率谢宝涵和一班战士，南下三原武字区，紧急扩红。黄子文在渭北革命根据地有很高威望，更有广泛的影响，武字区的革命群众积极响应报名。中共武字区委和黄子祥等又大力支持、帮助和鼓动，3天之内即动员了100名青壮年北上，参加陕甘游击队。除此100名新战士外，黄子文还特别动员了渭北根据地的几名得力干部参加陕甘游击队。其中有渭北特委委员、武字区雇农工会主席顾先臣，武字区区委委员、武字区游击队中队指导员王瑞祺。顾先臣在狼牙滩战斗中负伤，回乡养伤时被敌逮捕杀害，王瑞祺于1936年曾担当执行了护送刘少奇的重大使命。^①

黄子文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搜罗输送了一批优秀人才、优良干部。1934年5月，他将杜宛、蔡子伟、张景文（女）、蔡春堂、张文华等干部从西安带进陕甘边区，交给刘志丹和习仲勋。

杜宛后任陕甘边南区党委组织部部长，开辟了正宁一带的工作。1935年在陕北肃反中遇难。蔡子伟后任陕甘苏维埃政府的秘书长，参加起草制定了陕甘苏维埃政府的多项政策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过农业部副部长。张景文后任陕甘边区妇女委员会委员长，也在陕北肃反中遇难。张文华继蔡子伟后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红一团政委等职。

1934年8月，陕甘边区军政学校在南梁成立，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黄子文和蔡子伟担任教员。

当时曾进该校学习的学员宋飞回忆说：学校只有两个教员，一个是黄子

^① 谈国祺口述：《刘少奇同志从瓦窑堡到临潼的点滴回忆》，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陕西文史资料选辑》，陕西人民出版社，第57页。

文同志，一个是蔡子伟同志，他俩都是知识份子，文化理论水平都很高，又有实践经验，黄子文同志讲马列主义，理论联系实际，又具体、又生动，我的文化很低也能听懂。^①

军政学校曾为陕甘边区培养了一批优秀干部。

黄子文在陕甘边区南区工作时，曾任用郭廷藩、杜宛等一批干部，还重点培养和扶持一批当地干部以及封正宝、宋飞、李尚勤等一批青年干部，这些同志都曾为陕甘边区作出贡献，都曾担任领导职务。

黄子文善于发现人才、任用人才。原警一旅副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二机部部长的牛书申，当初就是黄子文介绍入党的。

五、黄子文是陕甘边南区的主要开创人之一

1933年11月3日至5日，在包家寨召开的陕甘边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建立三路游击区。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三个根据地。

1934年5月，陕甘边特委和革命委员会派黄子文在正宁设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驻三路地区办事处，任办事处主任，代行政府职权。

9月，陕甘边特委将三路游击区划为陕甘边南区。同月，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在黄陵小石崖成立，黄子文任主席，张邦英任南区党委书记。

陕甘边南区，包括陕西的耀县、淳化、旬邑、彬县、宜君、中部、富县、甘泉和甘肃省的正宁、宁县的一部或大部分地区。山大林深，地势险要，人口稀少，交通不便。

在革命战争年代，陕甘边南部地区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的发展犹如一把尖刀，直插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的统治中心——西安，对甘肃的敌人威胁也很大。同时，这一根据地所处的位置，又使它成为拒守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南大门，对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②

黄子文这一时期在陕甘边南区所做的革命工作，习仲勋在《回忆黄子文》的谈话中，作出评价：1934年春，我调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这年冬，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在中部县成立，书记是张邦英，革委会主席是

① 宋飞：《我党忠诚的战士》，载中共三原县委组织部编：《黄子文》，第179页。

② 张邦英：《片断回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8页。

黄子文，是照金根据地党政负责人之一。在这一时期，黄子文等同志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政权，为建立照金革命根据地做了很多工作，是有贡献的。^①

1934年春夏，为了开辟陕甘南区的革命根据地，黄子文到中部、宜君、富县、甘泉、宁县等地，发动群众，成立农民协会，成立赤卫军，建立青年、妇女组织。同时，被派往淳耀地区的金理科、杜宛、宋飞，被派往正宁、彬县、宁县一带的李尚勤等人，都积极工作，大有成效。三路游击区组建成立十几支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歼灭许多敌人，拔掉各地的民团据点。恢复了原照金革命根据地，为建立陕甘边南区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黄子文、张邦英等同志，积极开展政权建设，对当时下辖的富西、富甘两个县级革命委员会加强领导，促使其更加巩固并有很大发展。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召开，黄子文作为南区代表出席大会，这次大会选举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当选为主席。

1935年秋，陕甘边南区在正宁设立南区革命委员会驻正宁办事处，派郭廷藩为主任，委派杜宛、封正宝协助郭廷藩筹建正旬彬革命委员会（即新正县前身）。在宁县设立南区革命委员会驻宁县办事处，派刘永培为主任，李尚勤为副主任，发动群众，开展农运，组织赤卫军，于1935年底成立新宁县苏维埃政府。

1934年冬，黄子文亲临旬邑、淳化一带，成立赤淳工委，金理科、宋飞为负责人。1935年2月，黄子文帮助宋飞建立赤淳苏维埃政府，宋飞任主席。

1935年11月，赤淳东区成立淳耀县苏维埃政府，姚殿新任主席，郭廷藩任县委书记。赤淳西区还成立赤水县，杜宛任县委书记，姚振华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此时期，正旬彬县革命委员会、永红县苏维埃政府、新宁县苏维埃政府、淳化县苏维埃政府等地方革命政权相继成立。并发展壮大了南区各地游击队武装，建立农会、赤卫队等革命群众组织。

^① 参见习仲勋：《回忆黄子文》，载中共三原县委组织部编：《黄子文》，第4页。

到1935年底，陕甘边南区革命根据地已扩展到正宁、宁县、旬邑、淳化、中部、富县、耀县、宜君及同官部分地区，游击队已活动在东达成榆公路，西临西兰公路的十几个县境内。

1935年2月，国民党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黄子文、张邦英率南区的机关干部与敌开展了游击战争。

4月1日，红一团在瓦房子战斗中失利，黄子文、张文华、张仲良将淳耀游击队编入红一团，黄子文任团长，张文华任政委，向礼泉、彬县地方出击，打击敌人，歼灭民团，开展了反“围剿”斗争。

1997年6月，习仲勋在致中共三原县委的信中写道：“子文同志是知识分子和工农结合的楷模，是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直到牺牲。”^①

习仲勋在《回忆黄子文》的谈话中最后说：黄子文的革命事迹是永垂不朽的，黄子文的高贵品质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②

作者：黄军政，三原县作家协会会员，黄子祥同志之孙。

① 《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第61—62页。

② 习仲勋：《回忆黄子文》，载中共三原县委组织部编：《黄子文》，第1页。

曹力如与陕甘边区革命斗争

曹东林 张孟钦

“革命事业艰苦奋斗廿载不懈忠贞堪为同志范，边区人民辛勤与共一旦长逝遗爱长存群众间。”这是原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刘景范、杨名轩为曹力如的题词。曹力如是刘志丹的亲密战友和同窗好友，他跟随刘志丹一起闹学潮，开展兵运，发展革命武装，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转战南北、驰骋疆场。历任志丹县委书记、陕甘省委秘书长、南路军总指挥、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中共西北局副秘书长、陕北行署主任等职。他一生对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追求真理，百折不挠，艰苦奋斗，为建立西北工农红军和发展西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

1902年，曹力如出生在陕北保安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当时的陕北地区荒凉落后，封建统治根深蒂固，加上反动军阀井岳秀横征暴敛，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民不聊生、卖儿鬻女、家破人亡。曹力如亲眼目睹老百姓的凄惨景象，对黑暗的封建统治极为不满。中学读书时，在共产党员魏野畴等老师的教育指导下接受了革命思想，懂得了无产阶级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道理。他跟刘志丹等同学组织革命团体，宣传新文化、新思想，领导学生运动，因矛头直指反动军阀井岳秀，被诬蔑为“八大罪魁”之一。1925年，魏野畴介绍曹力如到杨虎城在耀县创办的三民军官学校学习。1926年，曹力如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派他到杨虎城部任第十军代

理政治处长，开展兵运工作，建立党组织。他积极宣传党的主张，物色进步官兵，秘密发展党员，在杨虎城部队组建了中共党的组织，担任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这些部队中的党员在尔后的皖北暴动战斗中，起到了骨干带头作用。1928年1月，蒋介石派人监督第十军“清党”，曹力如说服当时主持军务的孙蔚如，以“明清暗保”方式，将南汉宸等百余名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秘密送出部队，保存了一大批革命力量。

中共八七会议后，根据党的指示，曹力如离开部队，任皖北特委秘书长，多次传递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并及时派人给陕西省委传递中央文件和指示，通报皖北革命斗争和建立武装农民自卫队的情况。在给陕西省委的信中指出：现在的策略是发动群众斗争，领导群众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①1928年初，他跟随魏野畴到阜阳积极进行革命暴动的各项准备工作，4月9日发动了著名的皖北暴动，曹力如任赤卫队大队长、皖北苏维埃政府秘书长，暴动失败后，他从战友尸体旁边爬起来，沿途讨饭返回陕北。刘志丹于5月组织了渭华起义，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回到甘泉县，正巧碰到刚到甘泉的曹力如，他们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分析了保安县的形势和地理环境以及人员状况，认为保安县地处陕甘交界，地方偏僻，地理环境熟悉，亲朋好友多，群众基础好，对开展革命工作十分有利，决定走井冈山道路，进行游击战争，重新燃起革命烈火，建立党组织，发展革命队伍，在陕甘边建立革命根据地。他们找到同学王子宜，秘密串连革命同志，在永宁山建立保安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刘志丹任书记，曹力如任组织委员，王子宜任宣传委员，积极开展工作，大力发展党团员，壮大革命组织。

1928年到1929年，陕甘发生了严重灾荒，保安人民生活非常困苦，挣扎在死亡线上，对反动民团团总路登高的封建统治极为不满，革命的愿望非常强烈。1929年初，谢子长发动渭渭暴动失败受伤后，在曹力如家养伤，刘志丹、谢子长、曹力如和王子宜4人经过仔细研究，决定利用群众不断高涨的反抗情绪以及地方绅士与路登高的矛盾，发动党内外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采用合法手段夺取保安县民团的领导权。他们一方面揭露

^① 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曹力如》，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民团团总路登高侵吞公款、贪赃枉法、鱼肉百姓、作威作福、横行乡里的罪行，发动群众签名，强烈要求罢免团总路登高，一方面做开明绅士的工作，团结争取各方面人士，鼓励他们出面上书县长，要求改选团总。并利用时任县长崔煥九是刘志丹和曹力如中学老师的关系，面见县长分析形势，要求县长顺从民意，使县长同意改选民团团总。刘志丹和曹力如深受群众拥护，得票最多，利用合法选举手段，刘志丹当上了县民团团总，曹力如为副团总，他们立即对民团进行整顿和改造，开除顽固不化分子，招募贫苦农民和进步学生，制定新团规，撤换各区的民团团总，在民团内部建立党团组织，将县民团变成革命的队伍，使之成为陕北进行革命斗争的骨干武装力量，民团所在地永宁山成为革命的可靠堡垒。1929年8月，刘志丹到陕甘交界开展兵运工作，在三道川进行建军活动，曹力如继任团总，他特地派人给刘志丹送去了经费、枪支弹药和马匹。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回到永宁山，曹力如派重兵保护，并亲自出面怒斥追兵，警告对方，我们民团不是好欺侮的，使其未敢贸然进寨搜查，随后秘密将刘志丹送下山，到绥德去找陕北特委。曹力如深知广大贫苦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早在1927年发动农民参加皖北暴动时，他就指出：农民在中国革命中力量最大，全中国农民有数万万之多，……咱们农民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就会产生伟大的力量。他经常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抗捐、抗税、抗粮、抗债、抗差、抗租等斗争，健全党组织，创办农会，组建地方游击队，建立苏维埃政权。1930年秋冬之交，刘志丹回到保安，传达了特委会议精神。其后，他带领民团中部分骨干到甘肃太白镇袭击了陇东民团军，转战到安塞、合水、甘泉一带，兵力扩大到200多人，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为建立陕甘苏区打下良好的基础。

1931年8月，曹力如因为游击队购买武器走漏消息，被捕入狱，敌人威胁利诱，给他坐老虎凳，打碎其手指，施尽各种酷刑，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他把敌人的监狱和法庭当作宣传革命的场所，经常鼓舞狱中同志的革命斗志，怒斥变节分子，揭露敌人的罪行，组织他们开展对敌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革命气节。1934年底，党组织营救曹力如出狱，当时保安县大部分地区已变成苏区，唯独金鼎山及附近的几个寨子还被金鼎山民团和土匪占据，红军游击队包围了金鼎山寨，为了争取金鼎山民团投降，减少部队伤亡，曹力如不顾出狱后身体虚弱，带着伤残多次到金鼎山

寨与民团谈判，阐明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陈述利弊，说服民团接受投降协议，使山寨和平解放。在全鼎山和平解放的影响下，周边的王家畔、李新庄等十几个寨子也相继和平解放，使苏区连成一片，扩大和巩固了苏区。1935年夏，他领导保安民团先后分两批加入红军，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刘志丹等同志领导下，按毛泽东的游击战争思想，坚持游击战，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红军队伍发展到5000多人，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先后建立了数十个县的苏维埃政权，成为土地革命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成为红军长征到陕北的落脚点，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正当陕甘和陕北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不断扩大巩固的时候，在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下，一场错误肃反降临到陕甘苏区，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大批西北红军和苏区主要领导人遭到逮捕，有的惨遭杀害。曹力如刚出狱，也未能幸免，被迫到陕甘边印刷厂工作。在陕北“左”倾错误肃反的非常时期，他“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博大胸怀，冒着受牵连、被怀疑，甚至坐牢、杀头的危险”^①，帮助、关心被迫害的战友及其家属，并力所能及地给予他们帮助。

1935年10月，毛泽东带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受到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曹力如积极参加筹备欢迎中央红军的工作，书写欢迎标语，为中央红军筹办物资。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干预下，陕北错误肃反的问题很快得到纠正，释放了全部被关押的同志，恢复了曹力如的党组织生活，他深有体会地说：“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挽救了陕北的党组织，挽救了陕北红军。”^②其后，曹力如被任命为陕甘省委秘书长。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初到陕北，存在不少困难，特别突出的是粮食问题，为此曹力如筹建了陕甘省委工作团，健全了陕甘苏区县乡民主政权，进行筹备粮食和征兵扩大红军工作。1936年5月，为了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红军主力开始进行西征，曹力如担任南路军总指挥，转战陕甘两省进行了几十次战斗，消灭国民党两个营及许多地方土匪武装，缴获大批轻重武器和装备，取得显

① 李景方主编：《李季伟纪念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

② 王震：《怀念老战友曹力如同志》，载《革命英烈》1984年第6期。

著战果，给进攻根据地的蒋介石部队以沉重打击，胜利地完成牵制敌人的任务，有力地支援了红军西征，并在甘洛成立4个游击支队，郡县成立3个游击队，还有些县成立游击小组等地方武装，扩大了革命队伍，巩固了陕甘边根据地。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曹力如与刘志丹等同志一起战斗，生死与共，他的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深受刘志丹和同志们的赞扬。

作者：曹东林，女，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信息研究中心干部，曹力如同志之女。

作者：张孟秋，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信息研究中心研究员。

试论王观澜对边区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工作的贡献

王秉福

王观澜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按照中共中央的安排，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创造性地开展边区统战工作。他在工作中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捍卫党的统一战线思想，有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王明的错误路线作坚决斗争，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丰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内涵，扩大统一战线组织，开创和巩固边区政权，推动党领导的民族抗日的伟大事业不断取得胜利做出了贡献。

一、用统一战线的思想指导农村工作，实事求是解决农民问题，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土地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和事实依据

所谓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革命斗争中，同其他阶级、阶层、党派以及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结成的政治联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理论和策略，使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武器。它被毛泽东确定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王观澜是浙江省临海市人，1906年7月出生于一贫困家庭。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先后在浙江台州、临海组织和领导学生运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到上海沪东区从事工人运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派他到苏联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在学习期间，他同王明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0年回国后，王观澜主要从事党与其他阶级、阶层的联系和互动工作。中央苏区时期，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开展查田运动，了解农村中农民及其他阶级、阶层的政治经济需求，参与制定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对于苏区农民运动的深入、红军的扩大、农业生产互助运动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深得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赞扬^①。是我党最早从事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的领导人之一^②，被誉为“党内最早的‘三农’问题专家”^③。

红军长征期间，王观澜担任红一、三军团地方工作部科长，军委干部地方工作团主任等职，不顾生死，机智勇敢地完成长征中扩大红军和筹集军粮的任务。^④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设立西北办事处，并设粮食、土地、国民经济、教育、劳动、内务及裁判部。王观澜被任命为土地部部长、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管理分配土地、发动与组织群众、组织劳动互助社，发展农业生产。

王观澜上任后，把机关工作稍作安排，就带上有关工作人员深入安定县中区的两个乡，走家串户，访问座谈，调查了解经过土地革命的贫雇农的生活状况和土地革命对地主、富农的打击情况，了解农民群众的生产准备和生产中存在的问题。针对有些地方出现的地主被“扫地出门”和富农只分给坏地的极左做法，王观澜用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教育村干部，及时纠正。

其后不久，王观澜参与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就做出相关规定，对富农只取消其封建剥削的部分，富农经营的其他土地，

① 林子加代表中共中央在王观澜追悼会上致的悼词。

② 林子加代表中共中央在王观澜追悼会上致的悼词。

③ 刘东平：《党内最早的“三农问题”专家》，载《人物杂志》2006年第11期。

④ 林子加代表中共中央在王观澜追悼会上致的悼词。

商业和财产不予没收；苏维埃保障富农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除统一的累进税外，苏维埃政府不能加富农以特别的捐税等。这些规定符合农村实际，有效纠正了陕北土地革命中对待富农问题的“左”倾做法。

在李家岔区一带调查时，王观澜发现把富裕中农错划为富农的问题，立即组织群众讨论，直接听取农民群众对土地问题的各种意见，有针对性地宣传和贯彻《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的正确政策和做法，很快使错划的成分得到改正。

通过调查研究，为解决土地革命在阶级成分划分中的混乱现象以及其他问题，在王观澜的主持下，西北办事处重新颁布《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陕甘苏区土地斗争中的一些问题的决议》，使土地斗争中一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进一步得到解决。

1936年2月，王观澜在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和总结土地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写了《纠正土地斗争中的极“左”错误》一文，发表在中共西北局中央机关报《斗争》第85期上。他在文章中论述了开展土地斗争满足农民土地需要的重要性，分析了极左错误在土地斗争中的严重危害，提出了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正确做法，强调指出：有些同志以为“左”的错误总比右的好，右的要不得，“左”的总是革命的。这种错误见解，看不到“左”倾错误的严重性，看不到把某些中农贫农当作豪绅、地主、流氓是削弱了自己的革命力量。他明确指出：集中力量，反对与纠正极“左”倾向，是目前土地斗争中的主要工作。

王观澜这种鲜明的观点和态度，对于纠正西北革命根据地斗争中的极左错误，在广大农村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起了有力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由于党和苏维埃政府正确的土地政策的实施，过去在极左错误影响下跑到白区的群众，甚至有些地主和富农，都一批批回来了，苏维埃政权得到巩固和加强。

就在党和政府坚决纠正“左”倾错误的时候，一些地方却又出现把真正的豪绅地主改为富农，把富农改为中农的错误；而一些地主富农则放出谣言，说“过去一切都错了”，歪曲党和政府的政策，企图反攻倒算。

针对这种情况，王观澜撰写了题为《为完成春耕运动的任务，严厉镇压豪绅地主的反攻》的文章，1936年3月16日以《红色中华》的社论发

表。文章强调：“正确决定各个不同的阶级成分，与正确地处理各个不同的阶级成分的土地财产，是苏维埃的重要工作，把贫苦工农当作豪绅地主富农处置，这是削弱革命力量，应该严格纠正，不许迟延，迟延就是等于帮助敌人。”同时，“严格防止豪绅地主的故意曲解党与苏维埃文件而乘机活动与反攻，贪吞土地革命的果实。如果模糊了这一点……而把某些豪绅地主改为贫苦工农，那就是大错特错。这个问题，同样严重地提到各级地方党与苏维埃面前。”^①

他还论述了纠正“左”倾错误和实行对富农新政策的出发点及其应有的正确态度和做法，从而正确区分了土地斗争中“左”与右的界限，引导斗争向正确方向发展。

1936年5月，东征红军回师河西。王观澜完成在安定一带筹粮供给任务后，随同中央机关迁往保安县（今志丹县），并奉命担任中央工作团团团长，协助整顿保安县的工作。

这期间，王观澜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势下农村的阶级关系又作了全面调查和研究，回机关后参与起草《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指示》明确指出，党的土地政策“不但是给占全国人民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群众解除封建的剥削，而且同时就是推动这百分之八十的人民积极参加民族解放，强大民族革命力量”^②。因此，土地政策的新规定，首先是没收一切汉奸卖国贼的土地财产，而一切抗日军人及一切献身抗日事业者的土地均不在没收之列，地主阶级的土地、房屋、粮食、财产没收后，仍给以耕种份地及必要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富农的土地拿出平时时，应该照一般农民得到同等土地。文件对其他各类人员的政策也都作了明确规定。

很明显，改变后的土地政策，具有更明确的人民性质与深刻的民族革命性质。这个文件下达时，王观澜给红军大学学员和中共中央机关干部作了宣讲报告。又在9月1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党的工作》上发表《关于土地政策中几个问题的答复》，对这一时期党的土地政策中若干问题作了具体而明确的阐述。

在领导陕甘宁边区农村土地革命斗争的同时，王观澜又根据毛泽东的指

① 《王观澜文集》，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

示，组织中央农民土地委员会，重点研究国民党统治区农民斗争的情况和土地问题，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农民运动。

二、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勇于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面对面的较量，善于在斗争中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这是双方各有政权、军队的合作，是具有广泛民族性、曲折复杂性的合作，是没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和协商一致的共同纲领的合作。这些特点，表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有共同的民族敌人，又存在着复杂的阶级矛盾。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在1937年8月25日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就科学地预见到：“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与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①

那时，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事件的重点地区。国民党派了19个步兵军和两个骑兵军，还有3个保安旅和17个保安队，对边区进行包围与封锁。还玩弄双重承认的手段，持续不断地将顽固反共的国民党人派进边区许多县当县长、做专员，造成了一县有两个县长的奇怪现象。毛泽东在一封电文中曾描述道：“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毁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②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和指挥下，八路军和边区各级党组针锋相对进行反摩擦斗争。当年担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的肖劲光在回忆录中说：“陕甘宁边区的整个反摩擦斗争，自始至终都是在党中央，特别是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对斗争情况了如指掌，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他善于把高度的原则性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善于从斗争实践中，及时发现和提出问题，及时归纳、总结经验，并及时提醒我们哪些事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325页。

^② 《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28页。

该做，哪些事不该做。”^①

在激烈的反摩擦斗争中，党内外也有一些人有些担心，生怕统一战线发生破裂。因此，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对党内的指示。指示强调：“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②

善于做地方工作的王观澜在指导统一战线区域的工作和斗争中，坚定地贯彻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把高度的原则性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面对面的较量，在斗争中维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深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任。

当时，任国民党绥德地区行政督察专员的何绍南，是一个专门搞反共摩擦的顽固分子，边区民众对其切齿痛恨，毛泽东当面斥之为“摩擦专员”。为打击何绍南的嚣张气焰，1937年10月，毛泽东让王观澜带上一封写给何绍南的亲笔信前往绥德，与何绍南谈判，以解决战争中的土地问题和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绥德地处中华民族的发祥地黄河中游地区，历史悠久，建置较早，在陕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通等诸方面具有重要地位。1935年，国民党在绥德县设立陕西省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绥德、清涧、吴堡、延川、延长、安塞、安定、保安、肤施9县。1935年1月12日，遵照中共陕北特委指示，绥德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国共两党合作后，双方协商确定，国统区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5县为警备区，在县城设立警备区司令部。1937年10月，八路军率部驻防绥德。

为了团结抗日，对一县有两个县长的奇怪现象，中共及边区军民采取忍

① 《肖冰光回忆录》，第23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12、713页。

让克制、协作友好的态度，允许何绍南等暂时留在边区境内，并力求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以便适当时机用协商、谈判的方法予以解决。何绍南表面大谈团结的高调，内心却把中国共产党宽容克制、顾全大局的态度视为软弱可欺，很快露出专事摩擦的反共面目。

王观澜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来到绥德。一到绥德，他就提出“消灭摩擦，一致抗日”的口号，深得绥德民众的拥护。接着，他在谈判中阐述了中共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迫使何绍南接受中共的提议，成立绥德抗日统一战线组织——绥德党政军民联合工作委员会，打破了国民党包办行政的局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保护了党在绥德区各地的合法工作，同时也维护了抗日群众团体的合法地位。

1938年5月，王观澜奉命从绥德返回延安，任陕甘宁边区党委副书记兼统战部部长，同时还担任中央统战委员会常委。另一方面，由于工作的发展与国民党摩擦的增多加剧，边区一切对外工作在行动上很有统一步骤的必要。3月的一天，毛泽东亲自参加并主持中央组织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为统一边区党政军的统战工作步骤，决定成立包括军政方面负责人在内的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王观澜任主任委员。

边区统战委员会成立后，及时给各级党政机关发出统战问题的指示，强调在反摩擦的斗争中，政治上要采取积极主动进攻的姿态。

1938年12月，国民党甘肃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钟竟成纵容国民党第一六五师一个团进入边区所辖之白马铺、赤城，破坏当地民众组织，封锁物资进入边区，抓去八路军战士和当地干部民众多人，扬言要“消灭陇东八路军”。1939年1月，国民党五中全会提出了“防共、溶共、反共”等一系列破坏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反动政策，增派中央陆军第九十七师驻防西峰，所属各团分驻镇原、宁县及西峰温泉，西峰反共气氛日益浓郁。国民党在西峰设立“防共线”，成立“中统局陇东包围区调查统计室”，封锁边区，矛头直指“八路军西峰办事处”，反共事件不断，中共组织接连遭到破坏。合水抗日后方援助委员会被强行改组，驛马关南沟自卫队、农会被强行解散。第三专署还派出便衣队到处劫杀边区工作人员。4月8日，第三八五旅第七七〇团江指导员带通信员两人在工作途中被保安队逮捕。12日，中共镇原县委书记吴志渊从驛马关返回途中遭国民党政府军袭击。18日，国民党甘肃省主席朱绍良电令驻防陇东的第一六五师、第

九十七师对镇原、宁县八路军武装进攻，两县县城被围，引发了国共两党高度重视的第一次“陇东摩擦事件”。

4月21日，国民党第一六五师第九八六团陈宗浚营3个骑兵连自焦村开抵宁县城附近，分驻庙坪、五里铺、春荣，合水县保安大队李鸿轩部进驻南义井，对宁县城形成包围之势。又以“受训”为名调数百名壮丁进驻县城，以图里应外合。八路军警七团一营提高警惕，于4月23日控制东山有利地形。

4月29日，国民党宁县县长方振武以一六五师为后盾，亲率保安队200余人，壮丁500余人，突袭驻宁县县城的八路军警七团一营，激战2天3夜。国民党顽固派被击溃，方振武等70余人被围困于城内一楼房之中。战斗中，八路军牺牲1人，负伤2人；国民党方面死亡6人，伤12人，被八路军俘虏400余人。

事件发生后，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分别致电蒋介石、朱绍良等，说明真相，要求双方派代表调查处理。5月6日，八路军代表王观澜以陕甘宁边区少将参议员的身份赶赴庆阳，7日在驿马关同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部代表谭季纯进行初次会谈。

谈判进行的5月中旬，又发生国民党部队在宁县炮轰八路军驻地的事件，致使谈判中断。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王观澜和八路军三八五旅旅长王维舟等，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而有节制的斗争，发动群众开展反内战万人和平签名运动，从政治上彻底揭露顽固派的罪恶勾当，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而顽固派则在政治上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同时，八路军在军事上加强防守，严阵以待，并抓住时机给予顽固派以有力的打击。

6月下旬，王观澜与谭季纯在庆阳城再次谈判，双方就停止军事行动、释放被捕人员、恢复原驻军范围等有关事宜进行了为期3天的谈判协商，于6月29日签订《镇、宁两县事件初步解决办法》。

7月1日，八路军交还缴获的武器，释放被俘人员，恢复县城昔日状态。方振武行使职权，策应宁县事件的其他国民党军队撤离县城周围。

三、在工作实践中贯彻关于统一战线独立性的方针，针锋相对同王明的投降主义作斗争

在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的重大转变时机，中共中央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的指示，总结抗战以来党以及全国抗战的经验教训，讨论决定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开始后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主要任务。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及《战争和战略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等结论。这次会议总结了16个月来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基本经验，分析了当时的抗战形势，规定了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阐明了党的基本方针政策。

会议根据抗战初期统一战线的发展以及党内在与国民党关系上出现的右倾投降主义倾向，强调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毛泽东在会议结论中明确批判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正确论述了抗日战争中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才是发展和巩固统一战线的前提。“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我们的正确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又联合又斗争，必须要同国民党的“限共”政策作斗争，而不应该用“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今后仍须继续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同时反对无条件合作和无原则地帮助国民党发展的右倾投降主义。^①

在这个会议上，王明被免除中共长江局书记职务，从武汉回到延安，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王明一向挟共产国际以自重，目无中共中央的领导，无视中共的组织原则。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他的右倾思想、确立了统一战线中党的独立自主原则之后，他仍然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状况，坚持自己的错误主张，自然遭到王观澜等党内坚持正确路线同志的坚决抵制。

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统战委员会常委第一次会议时，王观澜就在执行中共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7—540页。

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和王明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是由“边区”和“统战区”的区别引发的。

会上，王明武断地宣布：“边区”也是“统战区”，没有区分的必要。

王观澜坚持认为，“边区”主要是指共产党早就创建的革命根据地，而“统战区”虽有八路军驻防，但地方政权仍控制在国民党手中，两者有明显区别，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应因地制宜。

后来，王观澜在起草《巩固统一战线与保卫边区的报告提纲》时，明确主张，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要坚定地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这一主张，得到毛泽东的有力支持。

在桥儿沟召开的边区县委书记、统战部长会议上，王观澜为此作了3个小时的工作报告，王明也听了报告。

不久，王观澜到毛泽东那里，正好王明也在场，毛泽东问王明，桥儿沟报告怎么样？王明只好说：好是好，就是太长了。

毛泽东诙谐地说：长点好呀！我们有些同志，就得像老师给学生讲课那样，给他慢慢讲才行呢。

王明对王观澜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公然和他唱反调，心里很不舒服，他与当时担任社会调查部部长的康生一道，想找王观澜的岔子整他。他们调来中央档案，没找到什么借口，便再次提出“王观澜在莫斯科学习时反对支部局，有托派嫌疑”，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云云，向中央提出审查王观澜。

王观澜怒不可遏，当面找王明、康生对质。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直截了当地对王明、康生说：“王观澜经过了我十年的考验，这个同志如果不是好同志，我们党内就没有好同志了。”毛泽东的评语，让王明等人的阴谋没有得逞。

毛泽东在主持成立由王观澜任主任委员的陕甘宁边区统战委员会时就明确指出，边区统战工作中的一般问题由统战委员会解决，大事直接请示中央。这样，王明企图对边区统战工作进行干扰、施加错误影响，也就很困难了。^①

① 徐明强：《明涛岁月》。

四、善于用正确的理论指导实际工作，把实践经验和体会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为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党内，王观澜是个善于把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提高理论水平的行家。早在中央苏区时期，他就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倡导并运用报刊等舆论工具，作为总结经验、指导工作的有力武器。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份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的创办人和第一任主编，也是新华通讯社的创始人之一。

西安事变后，王观澜参与了中共中央对当时错综复杂政治形势的分析与研究。事变得以和平解决，东北军撤离延安。1936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派出以王观澜为首的工作团到达延安，接收并开辟延安地区的工作。

王观澜率中央工作团进入这座古老的城市后，立即展开紧张的工作，成立延安苏维埃政府和延安抗日救国会。1937年1月13日，在工作团的组织下，延安各界人民举行了热烈欢迎人民领袖毛泽东和红军入城仪式。毛泽东在仪式上号召军民团结一致，抗日救国；加紧生产，支援前线；加强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从此，延安这座历史上的边陲重镇，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日的中心，成为享誉国内外的中国革命的圣地。

王观澜根据西安事变后逐步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写了题为《新的形势，新的工作》的文章发表在1937年2月1日出版的《党的工作》第24期上。在文章中，王观澜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与当时西北广大地区的实际相结合，深刻领会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实质，提出既充分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又有较强的操作性、适合新的形势与新的环境需要的工作方针和方法。

“参考延安最近工作经验”，王观澜提出“我们在统一战线的区域里总的工作方针，应该是向着创造模范的抗日区域迈进”。“一切政治上与组织上的活动，一切行政上的设施与宣传教育工作，都应该显示出我们是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政治纲领的忠实执行者，显示出我们是最坚决地抗日并真正为

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拥护民众利益而奋斗的。”^①

在这一方针之下，王观澜提出应该首先做的三件大事，即广泛地发展抗日救亡运动，组织各种抗日救亡的民众团体，以增强民众的抗日力量；广泛地武装抗日民众创立义勇军；改善群众生活。

在发展抗日救亡运动，增强民众的抗日力量时，王观澜强调不要忘记群众切身利益问题，要求对许多大的政治问题的说明要从群众的日常生活着手，只有这样才能高度激发广大民众的抗日热情。

王观澜特别强调统一战线中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在统一战线区域工作中丝毫不许有忽视自己基本力量的培养与扩大，除强大党的组织，加强工人抗日会领导外，在各个抗日救国的群众团体中都必须建立支部或党团去加强领导，保证这些组织能够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工作，使他在群众中成为真正有实际权威的革命团体”。^②

对于武装抗日民众，创立义勇军，王观澜要求建立在群众真正觉悟的基础上，“我们武装群众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广泛，另一方面绝对保证这是抗日的武装组织”，把加强对武装队伍的领导作为“义勇军真正成为革命武装的重要保证”。

在改善群众生活方面，王观澜根据在延安取得的经验，要求“不但使群众了解我们是民族革命的领导者可敬可佩，而且要使他们懂得我们是他们的民主权利与生活改善的拥护者，是他们的代表，使他们觉得我们可亲可爱，而接近我们”。^③

最后他还严肃地指出，在统一战线区域工作特别要注意正确掌握和运用党的政策，“我们照顾到阶级的利益，同时也照顾到整个民族的利益，不要因为充分往视部分地区的工农利益去过急的发动阶级斗争，而吓跑在今天尚有可能和我们联合抗日的广大地区的上层分子；但也绝不应该为要迎合上层分子的要求，而忽视广大群众生活的改善或群众的斗争的发动。适应地推动阶级斗争，使之与民族斗争合拍前进，是目前争取革命运动胜利发展的重要关键。”^④

① 《王观澜文集》，第80页。

② 《王观澜文集》，第81页。

③ 《王观澜文集》，第82页。

④ 《王观澜文集》，第83页。

1938年2月1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会议听取王观澜关于绥米五县警备区工作的报告。毛泽东提出，在紧紧掌握抗日的总方针下可以考虑解决土地问题，实行减租；在扩兵、粮纳等问题上，要注意到统一战线各方面的关系。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王观澜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关于开展陕甘宁边区统一战线工作问题的《巩固统一战线与保卫边区的报告提纲》，得到毛泽东的支持。1939年3月，边区县委书记、县委以上统战部长会议在桥儿沟召开，王观澜作了长达3个小时的报告，分析了统战工作现状，对边区两年抗战工作作了总结，揭露了右倾机会主义口号的危害性，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周围制造摩擦的事实和统一战线的前途，系统地提出了反摩擦和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的对策，布置了巩固和发展边区的工作。

作者：王荣福，中共浙江省临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王维舟在庆阳老区的革命活动

王庆生

1937年秋，王维舟旅长奉命率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进驻陇东庆阳地区，任务是保卫陕甘宁边区西部边防，保卫中共中央和八路军的大后方。

当年的庆阳是个地广人稀的地区，部队碰到的第一问题是没有营房。旅党委向全体指战员提出“一把锄头一杆枪，自力更生保卫党中央”的战斗号召，并积极开展拥政爱民活动。部队在庆阳城外的山崖下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奋斗，打成了上百孔窑洞。生活上，在保证战备，军事训练的前提下，各连队开展生产活动，自己养猪、养羊、种菜，开各种作坊……同时帮助群众进行生产，从此使部队生活逐步得以改善，也使军队在陇东地区深深扎下了根！

1939年起，蒋介石在全国执行所谓《限制异党活动法》，对解放区加强军事活动，大搞摩擦，不断蚕食解放区，陕甘宁边区是胡宗南进攻的重点。

遵照中共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总方针，王维舟向全体指战员提出的斗争策略是：（1）大力宣传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2）对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必须坚决反击，绝不轻言让步；（3）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有理、有节、有利”的作战方针。

当时，胡宗南等部、地方的保安队和土匪从四面八方封锁和进犯陇东解放区。在八年全国抗战期间，几乎月月年年有战斗。小到一个排、一个连，

大到一个团至几个团的战斗规模。第三八五旅全体指战员在地方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支持下，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给国民党军队沉重的打击，灭了他们的嚣张气焰，保卫了边区和人民的安全，巩固了陕甘宁西北边防。

陇东地委书记马文瑞还与旅部领导王维舟、耿彪、甘渭汉等同志一起同国民党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谈判，在义正词严交涉的面前，国民党当局自觉理屈词穷，只好低头在《陇东纠纷第二步解决方案》的文件上签字，使陇东地区出现了一个相对缓和时期。但是国民党加紧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停止对八路军的一切物资供应。

1941年，毛泽东发出伟大号召：“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在全国解放区开展大生产运动。陇东根据地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在庆阳及时召开军民动员大会，王维舟旅长在会上慷慨陈词，他说：“现在我们庆阳地区和整个陕甘宁边区一样，都处在最困难时刻，特别是吃饭问题难以解决，我们是要革命？还是不革命？是打日本？还是不打日本侵略者？不革命、不打日本侵略者咱们就回家去，看来这样是不行的！要革命首先解决吃饭、穿衣问题，就应立即行动起来，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并号召全旅“扛枪上战场，耒耜到田间”，敌人在哪里进攻我们就在哪里消灭敌人，顽固派从哪个方面封锁，我们就要在这方面有所突破。王旅长率第七七〇团开进桥山地区开荒屯田，创办农场。桥山下有数百亩荒地，附近又有大片原始森林，是一座荒无人烟的地方。部队全体官兵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团结一致，克服种种困难，9个月的艰苦努力，使昔日的荒山野岭变成田园。旅直机关和警备第五团、第七团也在驻地开荒种菜、种粮、养猪等，开展各种副业。不但种的蔬菜品种多样，而且长势良好。同时不断帮助当地群众搞生产。王旅长不但是生产运动的指挥者、领导者，同时也是生产者。他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和广大群众同甘苦共患难，经常深入一线及时总结经验，把大生产运动推向前进。

在庆阳地区种棉花，更是在边区闻名遐迩。庆阳地区气候干燥，无霜期短，历史上就没有种过棉花，当时棉花棉线是从周边地区买来的。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棉花制品基本断绝。王旅长经过冷静思考，我们种粮、种菜都行，难道就不能种棉花？于是把全旅种过棉花的同志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实验组，在旅部的菜地开了一亩八分地，在最佳季节播下棉种，经过精心耕作，第一年就收获30多斤棉花，数量不大，可是意义重大。它宣告庆阳地

区不能生长棉花的历史结束了。

1942年，七七〇团、警五团和旅直机关共种棉花427亩，收棉花8500多斤，人均棉花2斤多，不但解决了部队的用棉问题，而且解决了棉纺工业急需的原料来源，为后来的发展开辟了美好前景。1943年，全旅共开荒31200多亩，农业生产全面丰收，大生产运动取得丰硕成果。收细粮2800多石，杂粮150多石，油料作物135石，各种蔬菜1224000多斤。畜牧业也取得发展，养猪1140头，养羊2190多只，养牛100多头。

王维舟还兼任陇东分区专员，在党的领导下与地方政府制定了财政经济分区实行自给自足的接收统支的方针。生产以农业为主，工业、商业、运输业同时发展，特货盐业等重要物资必须统一销售，繁荣市场，增加财政收入，保证部队和人民的需要方针。在庆阳地区开办团结纺织厂、新华制革厂、光华制药厂、贾桥化工厂、缝绉厂、黎明卷烟厂、铁工厂、木工厂及饲养厂、八一商店等多个工商企业。据联合工厂1943年3月至9月不完全统计，生产洋布120多匹，布542匹，毛毯543条，毛线274斤，羊毛毡窝7300多双，毛绒毡帽4000余顶，生产单衣10730多套，军帽4848顶，布鞋8952双，毛巾5235条，等等。全旅战士每人单衣2套，衬衣2套，单绒帽1顶，绑带1副，毛巾3条，草鞋2双，手套1副……财政收入也取得丰硕成果。据1943年不完全统计：共运盐882驮（合222800斤），收入边币4600多万元，收入法币475800多万元。据农牧业不完全统计，仅旅直机关共收资金（边币）16520万元，法币43.8万元。第七七〇团砍木材一项就收入210余万。

在大生产运动中，三八五旅全体指战员响应毛泽东的伟大号召，战胜了国民党对边区经济封锁，克服种种困难，逐步走上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道路，完成守备陇东的光荣使命。

王维舟在指挥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对庆阳地区的群众生活也很关心。除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外，还解决了逃往边区的1000多人的生活问题，帮助庆阳县办起了利民工厂、民办合作社等助民企业，使当地群众安居乐业，过上了好日子。边区的人民对八路军也交口称赞：“自从来了毛主席共产党的兵，我们陕甘宁边区也风调雨顺、农茂粮丰，这里也是咱边区的第二个南泥湾。”当地群众更是赞誉老旅长王维舟，大家赞他为“王善人”，还用陇东名歌编了后来家喻户晓的小曲：

说善人、道善人，
王旅长真是大善人，
做的好事数不清，
陇东人民人人敬！
唱善人、学善人，
王旅长是咱的好带头人，
爱民爱兵忠于党，
赤胆忠心干革命！

1943年1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到会做了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在会议结束前夕，对近年来领导国民经济建设和公营经济事业成绩显著而又克己奉公，在群众中有威望的干部予以表扬和奖励，在隆重的表彰大会上，毛泽东亲笔为王维舟书赠“忠心耿耿，为党为国”8个闪光大字。这是对王维舟的高度赞扬和评价，同时也激励革命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为中国的强大而奋勇前进！

作者：王庆生，空军军训器材研究所师级退休干部，王维舟同志长子。

贾拓夫与陕甘边

贾虹生

陕甘边和陕北的革命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开启了边区历史的新阶段；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作用和意义是全局性的。

土地革命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造性地实践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成功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它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它的伟大意义，不仅在于保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的宝贵火种，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而且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大本营与战略基地，终使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为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以及共和国的建立做出了无可替代的巨大贡献。这一伟大贡献足以使老区人民和全国人民永远铭记，并永远引以为自豪。

陕甘边的革命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它的发端、发展、挫折和胜利都与中国革命的历程息息相关。20世纪20年代中期，李子洲等就创建了陕西的党组织。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杀害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导致大革命失

败，中国共产党的八七会议决定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装的反革命。李子洲代表陕西党组织在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后回到陕北，开始了组织武装斗争的阶段。中国共产党派黄埔军校的唐谢、刘志丹以及谢子长等一批同志回到陕北开展武装起义、建立革命队伍的斗争。1927年10月，由唐谢、白明善、谢子长等人领导的清涧起义，打响了西北革命武装斗争的第一枪，拉开了西北地区建立工农武装，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序幕。1929年四五月间，根据陕西省委指示，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扩大会议，撤换了犯有右倾错误且作风恶劣的代理书记杨国栋，决定由刘志丹任特委军委书记，确定了搞武装斗争的三种形式，即白色的（争取白军）、灰色的（改造土匪）和红色的（建立工农武装）形式。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在陕北和陕甘边这片热土上，建立工农红军和武装割据的斗争烈火熊熊燃烧起来，此起彼伏，前赴后继，从未熄灭过。

贾拓夫是陕北神木人，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于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而加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的。1929年他参加了红石峡会议，结识了刘志丹。此后，他一直在省团委和陕西省委做地下工作。1932年8月后，他奉调到陕西省委，相继担任省委委员、常委，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1932年12月，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由于干部力量不足，部队领导人接二连三地向中共陕西省委告急求援。贾拓夫根据省委的意见，从各方面抽调了一批党、团员，派到红二十六军工作，加强了红军的骨干力量和战斗力，张秀山、杨声等就是其中的优秀分子。1933年3月和4月，中共陕西省委两次改组，贾拓夫改任省委委员，并先后担任秘书长和宣传委员。6月，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坚持推行王明的“左”倾错误，强令红二团南下渭华一带活动，贾拓夫曾奉命前往拦截部队，但未能追上。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在渭华地区遭到严重失败，几乎全军覆没。

1933年7月28日，陕西省委在西安骡马市福盛楼以吃饭为掩护召开会议，讨论红二团南下失败和加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的领导等问题。当时，王泰吉任团长的国民党十七路军骑兵团已于1933年7月21日在耀县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会议开始不久，即被特务发现，决定马上转移到另外的地方。时任省委书记的袁岳栋和杜衡一出去即被逮捕，同时参加会议的高岗和贾拓夫则乘乱得以逃脱。袁岳栋和杜衡被捕后随即叛变，供出了他们所知道的所有党团组织 and 党团员，敌人立即展开了大搜捕。

在这危急关头，贾拓夫不顾个人安危，迅速组织一系列的应变安排和工作布置，使陕西的党组织和红军避免了更大的破坏和损失。他立刻机智地跑到省委机关技术科通知人员马上离开，把文件寄放在荷芳（即谢和昉）掌握的一个地方。他自己带了一包重要材料转移。第二天又冒险到袁岳栋与军委接头的地点蹲守，见到负责军委的寅文德，通知他袁、杜被捕，并通过寅找到了团委书记刘宗沛，请他通过团的系统尽可能通知各地并上报中央。当时决定由贾拓夫、寅文德、刘宗沛处理一切事务，他们设法通知省军委负责人汪伟和其他人转移；让在杨虎城部的阎揆要等同志注意隐蔽；派人到三原给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送去纸条，用暗语写道：“掌柜的打官司去了，请你到舅舅家要些钱过日子”；还让省委工作人员陈子敬转告刚从甘肃回来的孙作宾，利用与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的关系，掩护好自己，先搞个临时组织，并将省委仅有的一架油印机和一些档案文件转交孙作宾保管。

8月7日前后，贾拓夫在白露湾召集部分党团活动分子会议，进一步做了部署，会议决定派贾拓夫去向中共中央汇报。在做了一系列安排后，贾拓夫于8月15日匆匆北上，到北平向北方局汇报情况，经北方局负责人高文华介绍，贾拓夫又辗转到了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同时还与河北省委取得联系，建议河北省委派谢子长、网红廖网红二十六军和陕北游击队做领导工作。在1933年11月25日写给中央的书面报告中还提到：“三原、边区我们通知杨声就近负责，代表省委解决一切工作问题〔杨声那时负责二十六（军）四团政委工作〕”。“渭华我们已与县委书记讨论过了。我们离开陕西时还在渭华留了一天，解决了些问题，并决定子丹（即刘志丹）、子文（即黄子文）、世泰（即王世泰）们的工作〔二十六（军）失败后，他们四五个人在渭华藏着〕。派子丹、世泰到四团去，子文到韩城策占魁部去工作，把梁组织在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二路旗帜之下。我找见高麻子，与他讨论了骑兵团工作后派他到那里去，这是以前省委就决定的。经过这次破坏后，省委只丢我与杨声二人了。杨声二十六（军）四团离不开，而且也不能回西安来。我在西安更无法立足，所以在党团活动分子会上才决定派我来中央，要求中央解决省委组织问题。”

他在报告中建议中央：“关于陕西工作区域的问题。我的意见是把汉南划归川陕省委，这在政治上与领导便利上都是必要。把陕北从河北方面划到陕西这一工作区域，这在政治上与工作发展上都便当的。那么就是关中、

陕北、甘肃、宁夏划为一个西北工作区域。假如绥远有可能时也可列入，形成一个西北工作区域，中心或者放到西安，或者放到陕北。”

“关于组织领导的问题，当我们走时，会议提出意见，至少要中央派两个以上最得力的干部到陕西去。在目前西北形势的发展上都要求中央用最大的注意加强西北工作的。现在我们还坚持这个意见，要求中央选择两个得力同志到西北去。这两个人一个负总的责任，一个负军事工作的指导，再配合当地一、两个好的同志，组织西北工作委员会来领导西北工作，这样在工作恢复的过程中再恢复与健全省委组织与领导。二十六军的问题，我在河北时，也曾与河北负责同志谈过，派浩如与鸿雁回去，鸿雁到二十六（军）去，浩如到陕北游击队去。”

这些情况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陕北与陕甘边武装割据的斗争与党的组织和领导的关系，这也是研究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时值得重视的一个重要材料。

二

笔者认为，陕北与陕甘边革命的斗争，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大致以1935年10月为分界。第一个阶段是党的领导下，这一地区自立斗争的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作为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和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发展阶段。这两个阶段相互联系，构成了陕北、陕甘边以及西北根据地的特殊历史地位。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在“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下失败了，中央苏区和全国各地绝大部分红色根据地先后沦陷，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开始长征。1935年9月12日，党中央在甘肃俄界（今甘肃迭部县境内）召开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决定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斗争，红军继续北上抗日，以游击战打通国际路线，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造一个新的根据地，并将部队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闯过天险腊子口，于9月20日到达甘南岷县哈达铺休整。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革命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9月23日，聂荣臻得到一张7月份的《晋阳日报》，上有一则消息称：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占领6座县城，拥有正规军5万多人……聂荣臻立即将此报专送司令部。叶剑英见到后，马上找到白军工作部部长贾拓夫，说：“刘志丹在陕北搞革命，他们

的根据地还不小，力量也可观……我们到他那里去，你看怎么样？”贾拓夫兴奋地说：“我们陕北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群众生活很苦，迫切要求革命，加上穷乡僻壤，可以和反革命势力周旋。”当天，叶剑英把报纸拿给彭德怀，彭德怀看后顾不上商量，就去找毛泽东。回来时，他兴奋地对叶剑英说：“老毛和中央其他同志已初步决定，到陕北去靠刘志丹。”^①

毛泽东得知情况后找来贾拓夫，贾拓夫将1933年7月陕西省委被破坏以前，陕甘游击队和红二十六军的活动以及陕西革命斗争的情况，向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建议中央到陕北立足扎根。毛泽东异常兴奋地说：“别说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他对身边的谢觉哉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随后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毛泽东说：“我们要抗日，首先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那里有我们的根据地……到陕北只有700里路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的前进阵地。”^②

1935年9月26日，红军陕甘支队挺进渭通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会议，贾拓夫列席了会议。榜罗会议正式决定：改变俄界会议所定路线方针，在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以陕北领导全国的革命。10月24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阐述了中央从沙窝会议、俄界会议到榜罗会议的决策过程。毛泽东说：“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决裂，那时的口号是打到陕甘去，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榜罗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和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扩大苏区。在俄界会议上，想在会合之后到接近苏联的地方去。那时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观念是没有的，现在我们应批准榜罗会议的改变，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会议通过毛泽东的报告，作出决议，宣告红军到达陕北的任务已胜利完成，正式宣布把陕北作为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③从此，包括陕甘边在内的西北根据地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1935年11月10日，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等率中央机关由下寺湾到达瓦窑堡，将中央机关设在此地。1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经安塞县到

① 《贾拓夫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

② 《贾拓夫传》，第26页。

③ 《贾拓夫传》，第29页。

达瓦窑堡。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中央局，张闻天任书记（兼），同时还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为西北苏区最高政权机关，主席是秦邦宪，财政部部长林伯渠，粮食部部长邓发，土地部部长王观澜，国民经济部部长崔田民，教育部部长徐特立，司法内务部部长蔡树藩，工农检查局局长罗梓铭，劳动部部长邓振询。^①

同一时期，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中共陕甘晋省委，设陕甘、陕北两个省委和关中、神府、三边三个特区。陕甘省委驻下寺湾，书记朱理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李富春，宣传部长李一氓，军事部长肖劲光，白区工作部长张策，秘书长曹力如，少共省委书记白治民，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王生玉；陕西省委驻地瓦窑堡，书记郭洪涛，组织部长王达成，宣传部长贾拓夫，军事部长戴季英，妇女部长白茜，秘书长兼白区工作部长马文瑞，省工会委员长高长久，少共省委书记慕纯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马明方；中共关中特委书记贾拓夫〔1936年6月，贾拓夫参加中央巡视团，在三边（定边、靖边、安边）巡视，关中特委书记由习仲勋担任，11月成立三边特委，贾拓夫任书记〕，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中共神府特委书记杨和亭，苏维埃政府主席乔钟灵；中共三边特委书记谢唯俊（后因其被匪徒杀害，三边特委暂未成立）。这两个省委和三个特区统归中共西北中央局和西北办事处领导。^②

回顾这段历史，不能不提到西北错误肃反的问题。就在贾拓夫向程子华、郭洪涛交接与中央联络电台之时，他了解到刘志丹、习仲勋、高岗、汪锋、张秀山等许多陕甘地区的负责干部，被执行王朝路线的中央代表团错误地关押起来。代表团搞肃反扩大化，并准备处死这些干部。他知道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必须尽快向中共中央报告，只有依靠中央才能解决问题。在他向中央复命时，紧急报告了情况，中央立即作出“刀下留人”的指示。之后，中央派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等去瓦窑堡，接管了陕甘边区保卫局，随后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党务委员会”，审查错误肃反事件。1935年11月底，由中央组织部召开平反大会，公布《西北中央局审定肃反工作的决定》，宣布刘志丹等无罪，立即释放，并给他们分配了工作。^③这件令人

①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501页。

②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第500—501页。

③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第500页。

痛心的事件的解决，也充分证明了中共中央所起的关键性作用。

三

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之际，隆重纪念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75周年，是有深远意义的。因为，陕甘边根据地、陕北根据地以及整个西北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斗争历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而且是无可替代的。首先，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建立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整个革命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更是土地革命后期几乎唯一保存下来的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万里长征提供了落脚点。

其次，西北这块根据地在中共中央落户后，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本营和战略基地，有力地支撑和指挥了长期抗战，为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以及在八年全国抗战中发展壮大革命力量，为夺取全国革命的最后胜利，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包括陕甘边在内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不仅是抗日战争的军事指挥中心，也是全国政治斗争的领导中心。在整个边区的发展中，有军事斗争，有政治斗争，有土地改革，有经济建设，有政权建设，有政党建设，有理论建设，有群众组织建设，有文化建设，有思想建设，有统战工作，有民族工作，有教育工作，有卫生防疫，甚至有外交工作，等等；边区有自己的农业、工业、贸易、财政、银行、货币，甚至还举办过自己的工农业展览会，几乎涉及一个政权所必须面对的所有领域和工作。虽然许多政策、指令是以西北局和边区政府的名义发出的，但实际上是中共中央做出的。可以说陕甘宁边区的实践，实际上是以后建立的全国政权的前期实验，为共和国的建立和运行探索、积累了一系列较完整的宝贵经验。因此，人们称它是革命的圣地，革命的摇篮。也因此，应该认定，陕甘宁边区的斗争实践，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具有的特殊作用和意义，是有全局性的。

作者：贾红生，中国华通物产集团公司总裁，总经济师，贾拓夫同志之子。

庆阳老区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贡献

耿 登

一、为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庆阳（旧称陇东）是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在甘肃最早活动地区之一，也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保留下来的唯一的根据地。它对西北革命根据地建设及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低潮。1932年春，中共陕西省委在平凉成立中共陇东军特委组织。刘杰三担任军特委书记，王杰、樊世荣任委员。军特委成立后，于1932年组织瓦店起义，并经谢子长授意，在刘志丹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指导配合下，由高鹏飞、曹胜勇、杨林、苏杰儒、郝维新等直接领导并成功举行合水县西华池等地武装起义。陇东军特委组织的这些起义，不仅扩大了党在西北的影响，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士气，更从战略上减轻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和红四方面军的军事压力，积极配合了陕甘边根据地的建立和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转移。

陇东军特委组织的几次起义虽然部分减轻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的军事压力，但是国民党军队过于庞大，对刚刚建立的照全根据地的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发动了大规模“围剿”，杀害了边区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王满堂、王万亮等。为了巩固起义取得的成果，促进陕甘边区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在华池县与合水县境内的南梁地区休整

并召开会议，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建制，开辟和巩固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并成立以南梁为中心的三路游击区，分别为以安定为中心的陕北第一路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的陇东第二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的关中第三路游击区。三路游击区各自为战，相互依托、相互策应，为巩固南梁革命根据地、维护南梁苏区周围的稳定做出重大贡献。

随着南梁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巩固发展壮大，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于1934年11月4日至6日，在南梁荔园堡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以习仲勋为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为副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相继建立华池县、庆北县、合水县、新正县、新宁县、永红县等苏维埃政权。并于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的1935年7月与陕北根据地统一，形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

南梁革命根据地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挥了重要作用。它的创建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了西北地区土地革命的开展，沉重打击了西北地区国民党反动派的有生力量，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的武装斗争。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它牵制了国民党胡宗南部20万大军，积极配合华北、东北战场，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卓越贡献。

二、为建设新民主主义模型起到模范作用

陇东作为新民主主义模型的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边区政府的新民主主义建设提供了安全保障、政治支持、经济支撑，而且作为全国革命指导中心的大后方，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成果的形成——毛泽东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1934年11月在南梁荔园堡选举产生的以习仲勋为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为副主席的陕甘边区政府，亦称“南梁政府”，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食粮、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土地、军事、财政、粮食等决议案，并创办党内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生活》和政府机关刊物《红色西北》，会议还选举成立了刘志丹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子清任赤卫军总指挥的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赤卫军总指挥部，同时还相应成立华池、赤安、庆北、合水、新正、新宁、永红等县级苏维埃政府和广大乡村苏维埃政权，为中国共产党以后的治党、治军、治军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三三制”建政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实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重要形式，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建设上的重大举措。它的实施不仅在边区彻底实现了民主政治，而且争取了广大党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军和建国的极大支持，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争取全国早日解放的积极性，同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人民民主制度、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奠定了基础。庆阳在边区政府实行“三三制”政权建设时，更是走在各地的前列。早在1934年“南梁政府”成立时，就开始实行边区苏维埃政府、县苏维埃政府、乡村苏维埃政权的选举制度，开创了选举产生领导的先河。在1941年“三三制”政权建设试点时，陇东分区6个县80%以上的选民参加选举，共选出乡市参议员5435名，并选举了乡市长，组成乡级政府。在这些选举产生的参议员中，民主党派及党外人士超过2/3，如庆阳县252名乡长和政府委员中，共产党员仅有72名，只占28.6%，这种选举产生的“三三制”政府，极大提高了党外人士参政、议政积极性。在边区政府实行“三三制”政权建设进行精兵简政过程中，陇东各县更是带头执行，大量精减县级机关干部，裁、减、并、合政府机构，充实区乡基层力量，加强领导区乡生产活动，为边区新民主主义建设起到模范作用。

三、为陕甘宁边区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

庆阳地处东经106°—108°、北纬35°—37°，平均海拔高度为1500米，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素有“陇东粮仓”之称，盛产粮、油、水果及中药材等，是陕甘宁边区的主要产粮区。抗日战争时期，就达到人均耕地8亩，亩产2斗，人均年消费8斗，富余5斗，其所属之庆阳、合水、镇原、宁县、正宁、环县均为八路军的募补区。由于当时国民党对边区的经济封锁及各种历史原因，边区的工业极度落后，只停留在传统的手工业之上，而具有传统手工业优势的庆阳为边区的工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庆阳传统的蚕丝业、纺织业、金属制造业、木制造业、皮革加工业、石制造业、制陶业、服装加工业、榨油、染布、酿酒业等不仅为边区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工业用品，而且为边区政府的各类工厂提供并培养了大量的工人。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银行建立过程中，陇东分行成为“三边”食盐出口换汇的最大通道。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停止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供给，并对进

出边区政府的道路实施封锁盘查，致使边区经济困难、物质匮乏，许多同志过冬没有棉衣，生病没有药吃，粮食严重不足。为此，毛泽东提出“减租减息、增开荒地、推广植棉、不违农时、调剂劳动力、增加农贷、提高技术、实行累进税”八项基本政策。陇东分区积极响应，带头执行。当时庆阳县6个乡、合水县6个乡、镇原县21个乡共有地主243户，对佃农1284户进行减租，共减免地租4465.87石，退租189.41石，退草1833斤；在调剂劳动、整合劳动力资源、增开荒地方面，合水县12天开荒13700亩，新正县一个村子两天即开18亩。在大生产运动中，陇东地区6个县3年垦荒40万亩，创办纺织、造纸、火柴、肥皂、火药、制毡等工厂数十家，恢复和开办商店140多处，区内数万名妇女参与纺纱织布。抗大七分校在东华池豹子川、平定川开荒6万多亩，产粮160多万公斤；第三八五旅第七七〇团选择了人迹罕至的华池县大风川实行垦田，两年之内开垦荒地34000亩，修筑营房490多间，筑路50多公里，还开办卷烟厂、酿酒厂、毛纺厂及制帽、纺织等10多种工副业生产基地。第三八五旅所属各部在开荒种粮的基础上，还积极开辟菜地种菜，上山打猎，在自足自给的基础上，将节余的蔬菜和上山打的野味等送给延安的中央首长。

在促进手工业和民营工业的发展、活跃边区的乡村商业方面，陇东分区更是做出积极贡献，民营企业庆阳纺织厂、民生纺织厂、庆兴纺织厂等为边区政府提供了大量的纺线、织布制品，而陇东分区40余处集贸市场更大大活跃了边区的商业；在边区商业贸易和边区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作用的食盐统销中，陇东占到半数以上。无论是边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还是传统制造业，陇东6县为边区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

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庆阳老区人民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同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创造了慷慨悲壮的英雄业绩，锤炼了勇于奉献、不怕牺牲、实事求是、敢闯新路的老区精神。今天在坚持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我们更应该发扬宝贵的老区精神，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贡献。

作者：耿莹，女，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理事长，耿飚同志之女。

庆阳老区对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贡献

刘秉义 袁志刚

庆阳老区亦称陇东老区，是甘肃唯一的革命老区。在土地革命时期，庆阳老区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为中共中央和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以后又是抗日战争的出发地和解放大西北的战略基地，为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经济发展、军事斗争和文化教育等方面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仅从中共军队沿革史的角度和侧面，探讨庆阳老区对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贡献。

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庆阳老区是西北红军的发祥地，为创建西北红军队伍做出了突出贡献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党的领导下，创造性地实践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成功地进行武装斗争，建立了西北红军。为此，庆阳老区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1. 为红二十六军的创建、发展、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红二十六军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支正规武装力量，其创建、发展和壮大都与庆阳老区密不可分。

的主要贡献是为红军队伍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有生力量。

一是组建红一团。1934年7月下旬，中共陕甘边特委作出《陕甘边特委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提出第二路游击队和第三游击队在两个月内各完成组建一个团红军的任务。在决议号召下，9月中旬，以第三路游击队为基础在正宁县鞏头^①组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一团。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红一团以三路游击指挥部所属特务连、正宁四支队为主，并从宁县三支队、正宁五支队抽调部分人员组编为两个连，共200余人。以后，红一团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又组建一个骑兵连和第四连。

二是重建红二团。1934年秋，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第二路游击队为基础，重新组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10月10日^②，红二团在南梁刘家洼子成立。团长刘景范，政委胡彦英，副团长孔令甫，参谋长王生荣，政治部主任朱奎。下辖两个步兵连队。兰州军区空军原司令员刘懋功将军回忆说：“第一连主要成员是我们庆阳游击队的老底子，当时队里挑选了60多个人（包括我在内），和原先在洛河川一带活动的安塞游击队的20余名同志合并，正式组编为红二团第一连……第二连是保安游击队和合水游击队各选调部分精干组成。”^③此外，还有一个少年先锋队，全团180余人，之后又发展了骑兵排。这里要特别指出，红二团是个英雄团，长期完整存在，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集团军某师某团，全军著名的十大猛虎团之一，被誉为“陕甘雄师”。这支从庆阳走出去的英雄团队在20多年的战争岁月里足迹西北、华北、华东、东北、华南20多个省区，参加了著名的东征、西征、三大红军会师、平型关大战，坚持豫皖苏抗日斗争，挥师东北，参加辽沈决战，打响出国第一仗，俘获美军黑人连等。他们把热血洒在了在半个中国和朝鲜3000里江山，谱写了一曲曲威武雄壮的战歌。这个英雄团，被军以上授予荣誉称号或记功的就有60多个单位，在团工作过后来成为将军和党政领导干部的有近百人，其中全军第一次授中将以上军衔的12人，如阎红彦、韩先楚、曾思玉、谭甫仁、康志强、姚喆、赵

① 一说“红一团于1933年2月在淳化马家山正式成立”，见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50页。

② 一说为11月初，见刘凤阁、任惠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45页。

③ 刘懋功，《梦回烽火连营——一个老战士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8页。

启民、张达志、许乐夫、马国文、崔田民等。^①该团不愧是“陕甘雄师”，值得庆阳人民骄傲！

三是加强红三团。红三团为红二十六军的主力团队，1933年11月8日成立于合水县莲花寺。以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三支队和原红4团少年先锋队合编而成，计200余人，王世泰任团长，李映南任政委，下设两个连队和一个少年先锋连。1934年秋，在正宁成立的平子游击队改编为正宁四支队，发展到200多人，当年冬季，抽调100余人编入红三团三连，另抽一些游击队员与彬县民团起义部队王富贵部一起，编为红三团四连，使红三团成为一个有四个连队建制的大部队。^②这就是说，红三团的组建与扩建都在庆阳老区，有近半数连队来自于庆阳大地，庆阳老区为红三团的建立发展付出了自己的力量。

总之，红二十六军是在党的领导下，由陕甘人民共同组建的西北第一支正规的人民武装力量。红二十六军的创建、发展与壮大，离不开庆阳这块红色的热土，离不开庆阳人民的积极支持和参与。庆阳老区为红二十六军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 为组建地方兵团投入了重要力量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庆阳老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红二十六军的支持、帮助下，纷纷成立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红色政权，这些游击队经过发展壮大，不仅把优秀子弟和游击队员送到主力红军，而且还整建制地编入地方兵团，壮大了地方武装。

(1) 组建关中地方兵团。红一团自组建编入红二十六军以来，英勇作战，为巩固、发展、保卫陕甘边南区做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到陕北组建十五军团时，红一团未编入，留在关中成了地方兵团，继续开展游击战争。^③1935年秋，为了进一步加强南区的革命武装和政权建设，第三路游击队指挥部奉命将新宁游击队的第三、四支队，新正游击队的第五、八支队，赤淳游击队的第六、十、十一、十三支队分别改编为

① 李新、陈旭远编，《十大猛虎团》，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页。

② 刘凤西、任惠生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上），第29页。

③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401页。

独立第一、二、三营。1936年春，关中特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三个独立营合编为红三团，与红一团一起命名为关中红军，由江华任司令员，贾拓夫任政委，张邦英任政治部主任，陈国栋和刘永培分别担任红三团团长和政委。^①

(2) 组建陕甘宁独立师。1936年7月，陕甘宁省委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在环县曲子镇成立陕甘宁独立师，下辖第一、二、三、四团。四个团都有陕东部队参加。第一团由红二十九军第二五七团改编，团长杨瑞林、政委刘禄昌。1936年11月该团将第一、二、三连缩编为第一连和第二连，将保安独立营（1935年5月成立，其前身是1935年初成立的保安一支队、庆阳骑兵队、洛河川游击队）编成第三连和第四连；三团由陕甘军事部独立第三团改编，其前身就是由陕甘边关中三个独立营，即新宁独立营、新正独立营和赤水独立营组建的关中红三团，团长陈国栋，政委刘永培；四团由东华池独立营改编，团长就是著名的战斗英雄黄克秀，政委任昌辉。

这些地方兵团部队的建立，为巩固发展和保卫陕甘边区、陕北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发展壮大，在解放战争中，大多数都升编为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主力部队，为解放大西北做出重要贡献。

3. 为步兵某师提供了三分之一的红军连队

新疆军区步兵某师是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西北红军现存的又一建制部队。它的前身浩繁复杂，囊括了陕北、陕甘边以及关中地区几十个红军游击队，加上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军部，几经整编合并，逐渐演变而成。现各步兵团和炮兵团都保留有红军连队，因而该师是全军红军连队比较多的红军师。现全师有红军连队××个，据考查，除1个是红四方面军的连队，其余都是来自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红军连队，其中有7个红军连队主要来自庆阳老区的英雄连队，分布在各团。其中：

某团一营一连，前身是1933年秋于甘肃新宁县组建的游击第一、二支队和1935年春在延安地区组建的延安东川、马四川游击队。

某团一营二连，前身是1934年初组建的赤水游击队，1934年8月组建

^① 张邦英：《关于陕甘边南区武装斗争和根据地的创建》（节选），载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庆东革命根据地的形成》，1989年，第274—275页。

的新正游击队第六、八支队和1937年初组建的新正保卫队。

某团二营四连，前身是1932年6月组建的葫芦河赤卫队（后扩大为东华池独立营）及1932年底组建的宜君游击队和1934年秋组建的富县张村驿、黑水寺、羊泉、道德塬等游击队。

某团二营五连，前身是1934年10月组建于南梁的保安游击队及甘泉游击队、富县游击队、华池游击队、甘泉下寺湾游击队、胡皮头游击队和1935年初组建的保安一支队、庆阳骑兵队、洛河川游击队。

某团三营七连，前身是1933年10月组建的庆北游击队、1934年2月组建的吴家河保安队和1935年初组建的合水义勇军。

某团特务连，前身是1933年5月组建的陕甘边游击队第一、三支队。

某团一营一连，前身是1933年7月组建的耀县游击队和同年9月组建的平子游击队。

这些红军连队作为红军的种子，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生长、发芽、开花、结果，为部队的发展壮大起到骨干带头作用。该师自建立至今已77载，经历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足迹遍及陕、甘、宁、青、川、藏、新等省区，南征北战，纵横驰骋，参加大小战役战斗2660余次，歼敌10余万，谱写了一部逐鹿西北、卫戍西南，雄风激昂，气势磅礴的战斗史诗，涌现出战斗英雄团2个，模范团1个，功臣团2个，战斗英雄营7个，模范营1个，功臣营1个，战斗英雄连23个，功臣模范连22个，军以上领导机关授予荣誉称号209个，涌现出英雄模范和一等功臣132个，这是该师广大指战员的光荣，也是陕甘宁边区特别是庆阳老区人民的光荣。

二、在抗日战争时期，庆阳老区是全军的一个重要军事教育基地，为抗日前线培养了近万名干部

抗日战争时期，庆阳老区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总后方陕甘宁边区之一部分，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之中。这一时期，陇东人民一方面积极支持留守的第三八五旅和地方武装保卫边区的斗争。同时，全力支持抗大、陕北公学等学校在陇东办学，庆阳老区成为全军的重要军事教育基地之一。

1. 庆阳抗大步校，为中共军队奔赴抗日前线，准备了上千名基层骨干

庆阳抗大前身为红军大学第三科即步兵科，又称中央红军步兵学校。学校办在陕北瓦窑堡（今子长县），后搬迁到保安县（今志丹县）。1936年夏，中央鉴于保安地方小，学员多，后勤供应有困难，同时为了开辟新区，命令红军大学三科单独行动，迁到陇东。同年六七月，红大三科迁到甘肃环县木林镇，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又迁到甘肃庆阳城内，同二、四方面军的两个步兵学校（随营学校）合并组成红大第二校，后改称抗大步兵学校。抗大步校共编四个营，十三个队，专门培养红军的班、排干部，学校设了几个兵部，如炮兵、步兵部，学员1400多人，周昆任校长，袁国平任政委，张际春担任政治部主任。^①

抗大步校是红军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之后开办的，因此，这期学员汇集了三个方面军和西北红军的许多优秀基层干部，相互交流了10年来各自斗争经验和传统作风。在校期间都参加了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错误行为的斗争，进一步分清了是非，提高了觉悟，加强了团结。抗大步校还积极配合陕甘宁省委工作团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反霸斗争并取得胜利，极大地激发了庆阳人民起来参加革命的积极性，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许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在庆阳的群众基础由此更加坚实。

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庆阳抗大步校奉命于8月毕业，并结束了抗大步校。多数学员随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另一部分于1938年5月调回陕北洛川，编为抗大第四期的第六大队，又称抗大洛川分校，后来合并于抗大一分校。抗大步校在庆阳虽然只有一年时间，但与庆阳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学校离开庆阳时，上千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干部排成长长的队伍，箪食壶浆，欢送亲人，军民难舍难分，这种激动人心的场面，从早到晚，整整持续了一天。^②

^① 马玉卿、白律：《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述略》，载《陕西文史资料》第10辑，第148页。

^② 《任质斌回忆陇东工作》，载《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形成》，1990年，第133页。

2. 陕北公学新正分校，为中共军队培养了大量抗战人才

陕北公学，简称“陕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日干部为目的的干部学校。该校最初是抗日军政大学附设的一个大队。抗日战争初期，大批进步青年学生从各地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为了适应培养抗战人才的需要，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创办陕北公学。学校于1937年9月成立，校址在延安，校长成仿吾。随着大量训练人才的需要，为适应大批青年到边区学习的要求，1938年7月7日又在新正县麻坡头区看花宫（现归陕西旬邑管辖）成立陕北公学新正分校，李维汉任分校校长。

陕北公学的教学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战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基本理论、领导武装斗争的基本知识及对目前时局的认识。学制分为普通班和高级班，普通班一般3个月为一期，高级班一年为一期。学校采取半军事性的编制，注重军事训练，提倡发扬“忠诚、团结、紧张、活泼”的校风。课程设置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主要内容有：社会科学概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众工作，游击战争与军事常识、时事演讲等。公学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经常举办球类比赛、军事演习，每周举办文娱晚会，此外还组织学员到附近的何家山开荒生产。

1939年1月，陕公总校迁至新正与分校合并。同年夏，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延安工人学校联合成立华北联合大学，校址迁至晋察冀根据地。成仿吾任华北联合大学校长。

陕公新正分校自1938年7月开办至1939年6月撤离，培养出上千名学员奔赴抗日前线。1939年初，为了到敌人后方开展工作，陕公曾动员1000名学员与抗大新学员同去晋东南根据地开办了两个“抗大”分校。1939年7月10日，抗大副校长罗瑞卿率领抗大总校和第一、二、三、四大队，还有陕北公学本校共5000多师生，共同组成代号为八路军第五纵队（陕公称“独立旅”，到晋察冀后纵队改称“野战军”）向华北敌后挺进。^① 陇东的党政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为陕北公学在新正办学、培养抗战人才又做出了新的贡献。

^① 马玉麟、白律，《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述略》，载《陕西文史资料》第10辑，第182页。

3. 抗大第七分校，为中共军队夺取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胜利，积蓄了一批重要力量

抗大第七分校，全名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七分校。

1938年底，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军队建设和根据地建设急需大批干部，中共中央号召到敌后办学，培养大量干部去发动和带领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建立根据地。中央军委决定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挺进敌后，并在各根据地建立分校。

1941年7月26日，中央军委决定，将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教导团和抗大总校一个大队组建为抗大第七分校。校址初设山西省兴县李家湾。1942年4月，通过“精兵简政”，晋西北军区将裁减下来的一部分干部和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送到抗大第七分校组成陆军中学。抗大第七分校及其陆军中学全部开赴陕甘宁边区接受任务。3月，第七分校到达陕西绥德县，归抗日军政大学领导。5月，中央军委决定，将在陕甘宁边区办的几所学校合并，以抗大总校、第三分校、第二分校和第七分校的营连干部队合并组成新的抗大总校，原第二分校附中与第七分校合并组成新的抗大七分校，校址定在甘肃省合水县（后迁至华池县东华池）。新抗大七分校由彭绍辉任校长，张启龙任政委，俞楚杰任副校长，方寓生任教育长，杨尚高任政治部主任。设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供给部、卫生部以及办公室、文工队等。以原第七分校陆军中学的9个学生队编为第一大队，原第二分校附中的8个男生队编为第二大队，两个女生队直属校部领导。1944年1月，山西临县克虎寨的新军教导大队到达合水，与第一大队合并成新的第一大队。4月，晋冀鲁豫太行陆军中学和太岳陆军中学共9个队先后到达合水，编入七分校，组成第三大队。至此，抗大七分校共有5200多人，其中教职员、干部800多人。主要开设政治、军事、文化、专业技术课程，按学员文化程度进行分类教学，学员还选修俄、英、日等外语。七分校自1943年6月1日开学，1946年4月结业，仅开办一期，历时近4年，学员一边生产，一边学习，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开荒种地、挖窑洞、烧木炭、纺纱织布、养猪放羊，经过艰苦劳动生产和教育训练，既改善了生活，学习了文化，又锻炼了思想和革命意志，得到全面发展和提高。抗日战争胜利后，大批学员陆续分赴东北、华北等解放区。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以后成为军队建设的骨干。这里要专门提到的

是，抗大第七分校，以后几经改编，多次更名，数易校址，发展为今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陆军学院，它是一所为兰州军区培养步兵排长和团、营属炮兵、高机排长，步兵指挥专业基础合训学员、政治指导员、司务长，轮训军区陆军部队营职军事干部和参谋人员，承训地方部分大学毕业生的指挥学院。西安陆军学院是从庆阳老区走出去，现仍完整保存的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现代化军事院校，值得老区人民骄傲与自豪。

以上几所院校在陇东办学，持续时间长达10年（1936—1946年），贯穿了全国抗日战争的整个历史过程，对老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为部队建设培养了近万名军政和技术干部，也为军队院校的自身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几所院校的培养目标虽然各有不同，但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教育工作密切为抗日战争服务，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教学内容紧密结合斗争实际，既有党的抗战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基本理论，又有斗争需要的军事技能和文化知识；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学员一边学习政治、军事和文化，一边参加实际工作、群众运动和生产运动，锻炼思想和革命意志，使学员得到全面发展和提高；在教学方法上，采取讲授、自学、讨论、辅导和选修课程等形式进行教学，充分发挥学员的学习积极性，为部队培养各种有用人才；提倡和发扬由毛泽东亲自制定的校风。抗大校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陕公校风：“忠诚、团结、紧张、活泼”等。这些办学的基本经验仍是今后军队院校所必须遵循的。抗大和陕北公学的光荣传统应当继续保持和发扬。

三、在解放战争时期，庆阳老区是西北野战军的战略后方，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重大贡献

庆阳老区是甘肃唯一的老区，从南梁游击队成立开始，老区人民便逐步培养了爱护人民军队、全力支持前线的优良传统。在解放战争中，庆阳老区作为解放大西北的战略后方，积极响应党和边区政府扩大武装的号召，为主力部队输送了大批兵员，积极发展地方武装，为保卫边区、解放大西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政权的巩固做出了重大贡献。

1. 青壮年踊跃报名，为主力部队输送大批兵员

在解放战争时期，陇东的青壮年踊跃报名参军，为西野主力部队输送了大批兵员。1946年全区在短期内报名参军者有1450名，为主力部队输送兵员800名。1947年5月27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参军动员令，要求全区动员2.6万人参军，在陇东扩兵5000人。从10月到年底，陇东除补充游击队和地方武装外，共为主力部队输送3000人。关中分区1947年共征兵3次，其中新宁、新正两县征兵300多人。1948年，华池县动员400人，新正县输送兵员410名。1949年，环县征兵500名，新正县又征兵120名。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战争时期，庆阳老区共为主力部队输送上万名子弟兵，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最为突出的是华池县，从土地革命战争到全国解放战争，共有3360名青年参军（相当于抗战后期全县总人口的10%，相当于男性青年总数的60%），其中有180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①

2. 不断发展地方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集团开始包围陕甘宁边区，内战阴影笼罩陇东。陇东地委遂于1945年12月15日发出《对目前形势和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陇东分区各县坚决贯彻地委指示，积极动员青壮年参加革命队伍，全力扩大和整治地方武装。全分区30万人，人人备战，掀起扩军备战的高潮。1945年至1946年，全分区扩大武装力量3109人，除输送主力部队800人外，其余均补充到各县独立营游击队。到1946年底，全区仅镇原、环县、曲子、庆阳4个县就有游击队、自卫军等地方武装7000人。在整训游击队、自卫军的同时，各县还加强民兵建设，到1946年底，仅华池县就组织1000余名民兵。1947年初，据陇东专署县长联席会通报，镇原、庆阳、华池、环县、曲子等5县，共有2万名基干民兵与普通自卫军进行整训与训练，有效地提高了战斗力，壮大了人民武装。1947年6月13日，地委又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各县游击队扩大到800—1000人，每乡有一游击小组，每区有一游击中队，每县有一游击大队。据不完全统计，到1947年底，陇东分区及新正、新宁两县共有8个游击大队（或独立营）、41个游击队，共3900人，另有民兵、自卫军队员5521

^①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庆阳人民与解放战争》，1990年，第24—27页。

人。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发展，这些地方武装不少被升编为陇东分区的正规团队。如，1946年10月陇东分区成立的独立团（后为独立第十三团），由分区原独立营和镇原县保安大队、合水、庆阳县保安大队合编；1948年2月陇东分区成立的独立二团（后为独立第十四团）由全区游击队抽调精锐整编而成；1949年9月陇东分区成立的独立第十五团由分区所辖8个游击大队合编而成。这些地方武装的建立，对配合西野主力部队作战、保卫边区政权、收复失地，乃至解放甘肃全境发挥了重要作用。^①

3. 充分发挥老区的作用，为组建甘肃军区部队和分区抽调了大批骨干力量

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向甘肃进军。为迎接甘肃全省解放，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甘肃军区，并下属10个军分区，6个警备团，1个回民骑兵团。在建立甘肃军区的过程中，陇东分区奉命抽调了所属4个团和大部分干部、战士，组建和参与组建6个军分区，为甘肃省军区的组建起了重大作用。

（1）为甘肃省军区组建3个警备团，1个骑兵团。1）警备第一团，原为陇东军分区独立第十三团。1949年8月，该团调往天水，归天水军分区领导，9月改称为甘肃军区警备第一团。2）警备第二团，原为陇东军分区独立第十四团。1949年8月，该团调往平凉，归平凉军分区领导。期间，补编1个营。10月，改称为甘肃军区警备第二团。1950年2月，庆阳军分区警备第三团第三营又调归该团。3）警备第三团，原为陇东军分区独立第十五团。1949年9月，改称为甘肃军区警备第三团。1951年6月，该团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榴弹重第四团，参加抗美援朝，脱离该分区建制。4）回民骑兵团，原为陇东回民抗日骑兵团，组建于1941年5月。1949年7月进驻西地区。1950年2月，改为甘肃军区回民骑兵团。

（2）组建和参与组建6个军分区。1）平凉军分区。1949年5月，陇东军分区抽调干部在甘肃华池县组建平凉军分区。8月，军分区机关进驻平凉城。陇东军分区独立第十四团亦进驻平凉地区，不久改称甘肃军区警备第二团，归平凉军分区指挥。2）庆阳军分区。前身是陇东军分区，组建于1941

^①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庆阳人民与解放战争》，第16—18页。

年1月。1949年7月，陇东地区全境解放。9月陇东军分区改称庆阳军分区，进驻西峰镇（今庆阳市区）。军分区所辖独立第十三、第十四团、国民骑兵团调赴新区，将庆阳、华池、合水、环县、曲子、正宁、宁县、镇原等8县游击大队编成独立第十五团，不久改称甘肃军区警备第三团。3）定西军分区。1949年7月，以晋绥军区属县军分区干部、战士为基础，组建会宁军分区，后改称定西军分区。8月，陇东分区的甘肃国民骑兵团进驻定西地区，归定西军分区指挥，骑兵团团长马思义升任定西军分区副司令员。4）天水军分区。1949年7月，由西北军政大学和三原、大荔、陇东军分区抽调的学员、干部在西安组建天水军分区。8月3日，天水市解放，军分区机关进驻天水市。陇东军分区所属独立十三团，调天水地区，该团后改称甘肃警备第一团，归天水军分区领导。5）武都军分区。1949年8月由晋绥军区干校部分人员和陇东军分区等单位抽调的干部组成。并将陇东军分区独立第十三团三营调归该军分区指挥。6）固原军分区。1953年，甘肃军区以原陇东军分区甘肃国民骑兵团为基础，组建甘肃省西海固原军分区和西海固回族自治区公安大队。^①

以上是陇东军分区为甘肃省军区抽调和组建的各警备团、骑兵团和各军分区。这些军事武装和机构的建立，为维持甘肃地方治安，剿匪肃特，保卫新生的各级人民政权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庆阳人民为甘肃各级地方武装的建立所做的重大贡献将永载中国革命的史册！

作者：刘秉义，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经济学教研室原主任，教授。

作者：袁志刚，兰州军区政治部编研室原副主任。

^① 兰州军区司令部编研室编，《兰州军区沿革史》，第436—437页，第446—449页，第468页。

庆阳老区人民拥军支前活动述评

王兰元

庆阳老区有着拥军支前的光荣传统，特别是在八年全国抗日战争和三年全国解放战争中，老区人民积极踊跃参军参战，倾其所有，无私奉献，谱写了一首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篇。

一、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时期的拥军支前活动概述

1. 土地革命的数年间，为保卫陕甘革命根据地，庆阳民众掀起了历史上第一次拥军支前热潮

(1) 广大青少年踊跃参加红军。华池县在1935年前，约有420人参加红军。1934年冬创建的红二十六军第二团二连战士多为华池籍士兵。从1932年至1936年仅新正、华池两县就有944人参加红军，578人参加地方游击队。^① 在新宁、新正县，1934年11月，原南区游击队所属四支队（即平子游击队）、特务队及宁县三支队、正宁五支队部分队员组建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一团，全团200余人。^② 1936年1月，关中特区以宁县三支队、十九支队和正宁四支队为基础，组建独立营（辖两个连110多人），连同新正县独立营、淳耀县独立营构成关中特区3个独立营序列，后合编

^① 《庆阳地区志·民政志》卷4，第808—809页。

^② 马兴文主编：《中共宁县大事记（1920—2004）》，第15页。

为红三团，开赴保安担任警戒。^①同年宁县第一支队发展壮大，扩编为3个中队200余人，西安事变后，改编为主力红军独立一团。^②1937年2月，新宁县再次组建独立营，辖3个连，9月在旬邑土桥镇编入关中二十一团。^③

(2) 军民配合，协同作战，积极开展反“围剿”，巩固革命根据地。1936年1月，山城堡战役打响，为消灭国民党军队胡宗南部，环县等地100多人为红军带路，向导曹拴娃在战斗中牺牲。^④当国民党反动军队“围剿”南梁革命根据地，张贴悬赏习仲勋、贺生秀的告示时，南梁一带人民坚壁清野，撤离村庄，积极协助红军作战，遭到敌人的疯狂报复，全部房屋、窑洞被毁，财物被洗劫一空，南梁人民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和牺牲。^⑤1936年春，国民党军队“清剿”陕甘革命根据地，进攻新宁县，新宁县游击队和红一团一部在苏区人民支持下，在湘乐莲花池消灭国民党东北军1个骑兵排，缴获战马30多匹，枪支30余支，战利品转送到中共中央驻地瓦窑堡，受到毛泽东的表彰。^⑥

(3) 广大民众积极捐献粮食物资，保障驻地部队给养。在环县，1936年11月，山城堡战役期间，甜水堡附近群众慰问红军作战部队粮食20多石，羊100只，银圆300块。曲子县八珠区赶运粮食50驮到元城川，以保证前线部队的供给。^⑦1937年春节之际，宁县四乡民众及官河（现归属正宁县）富户王立轩，盛张月桂、李天铎等家为驻宁红军筹粮数千石。新庄东门石怀甫一家，一次为援西军捐粮60石。^⑧同年镇原电子群众为红四军捐献粮食3000余石。同孟村的孟耀祖捐献小麦500石，并让出10亩耕地供部队作操场；白马村骨科医生段乾元主动为红军伤员疗伤，并捐献小麦50石；曙光开城张村张天和捐献小麦50石，生猪2头；上肖邢岭邢殿元捐献小麦30石，糜子10多石，麦草5万多斤，马1匹。^⑨西征战役后，遵照中

① 马兴文主编，《中共宁县大事记》（1920—2004），第18页。

② 马兴文主编，《中共宁县大事记》（1920—2004），第19页。

③ 马兴文主编，《中共宁县大事记》（1920—2004），第22页。

④ 《庆阳地区志·军事志》卷4，第375页。

⑤ 华池县志编写组，《华池县志》，第52页。

⑥ 马兴文主编，《中共宁县大事记》（1920—2004），第19页。

⑦ 《庆阳地区志·军事志》卷4，第375页。

⑧ 《宁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4页。

⑨ 《庆阳地区志·民政志》卷4，第806—808页。

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陕甘宁省于1936年9月向各县发出筹粮的通知，到11月中旬，就筹集粮食660万斤。^①西安事变后，及时组织了两个工作团，深入动员群众支援抗战，为抗日前线筹集了大批粮食、蔬菜、麦草等物资。为援西军、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等各路红军于1937年8月顺利集结，开赴抗日前线，提供了物资和兵源保障。

2. 抗日战争时期，庆阳民众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全民抗战”的号召，倾心支援民族解放战争，掀起历史上第二次支前高潮

(1) 踊跃参加八路军和抗日武装力量。1939年冬，陕甘宁边区开始征兵，华池县有120多人参军。元城区自卫军营长高文秀一个连48人集体参军，受到庆环分区的嘉奖。1942年至1945年，华池县共有1311人参军，按1945年全县30481人计，三年征兵占总人口的4.3%，占男性青壮年总数的30%左右。^②在宁县，1937年8月，当红一军团开赴抗日前线时，300多名青年参军，仅太昌新庄一带就有30多名青年参军，中村开明人士高振兴亲自送两个儿子给首华政委，他们坚决要求入伍，场面感人。同年5月，关中分区的新宁县整编各区游击队及自卫队，组建新宁县保安大队，1941年编为3个中队，1944年5月编入警三团。不足万人的新宁县苏区，1939年扩兵59名；1940年扩兵70名；1941年扩兵135名（有114名一说）；1944年扩兵550名。同属关中分区的新正县抗战期间共有1016名青年参军。环县共有828名青年应征入伍，单是由子县从1937年到1941年就有500名优秀青年奔赴抗日前线。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庆阳地区奔赴抗日前线的青年有3000多名。^③

(2) 勤恳俭朴，争交救国公粮、公草。庆环分区（缺华池）在1937年交纳救国公粮1638.74石，借给部队1800石；1939年仅环县就交纳“救国公粮”2243石。^④由子县从1937年到1941年就交公粮8000余石，同年华池县7天征粮1000石，受到边区政府表彰奖励。^⑤1942年陇东分区交公粮

① 魏虎德、刘秋萍：《庆阳近现代史》，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

② 庆阳地委党史办：《陇东革命斗争史料选辑》（二），第418页。

③ 魏虎德、刘秋萍：《庆阳近现代史》，第196页。

④ 魏虎德、刘秋萍：《庆阳近现代史》，第195页。

⑤ 《庆阳地区志·大事记》卷1，第38页。

4.34 万石，到 1945 年 9 月抗战胜利，陇东分区每年交粮平均 5 万石左右，粮食的持续运输，显示了“陇东粮仓”巨大优势，体现了勤恳俭朴的庆阳民众赤诚的爱国情怀。

(3) 捐赠物资，慰问将士。1937 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庆环分区捐献毛、毡袜子 2990 双，手套 2057 双，捐款 1046 元；关中分区捐献毛手套、袜子计 1872 双，款 1901 元；陇东统战区捐赠毛套袜子 1 万双。^① 在 1943 年 1 月至 9 月，陇东分区各县共捐现金 50 万元（边币），猪肉 755 公斤，羊 68 只，鸡 838 只，蔬菜 2313.5 公斤及其他物品，仅永丰原一个杂货铺就捐款现金 7000 元，商贩阎建成在西峰遭国民党军队的勒索、欺压，逃到边区后，一听到劳军，第一个带头捐款 1 万元。^② 1943 年到 1945 年，华池县共计慰问部队礼品：猪肉 1100 多斤，活羊 144 只，鸡 250 只；边币 330 多万元，硬柴 38 万斤，木炭 2 万斤，鞋 1300 多双，蔬菜 360 多斤等。^③ 全国抗战八年间，庆阳广大妇女共做军鞋 20 多万双，袜子 5000 双，为战士洗衣服 4000 多套，纺线 6000 多斤，织布 8 万多丈，捐粮 20 多万斤，捐牲口 3 头，猪、羊、鸡 5000 多只（头），蔬菜 2 万多斤，柴草 20 万斤。^④ 有效地改善了部队士兵的食宿给养。

(4) 战勤服务及时到位，高效有序。1939 年曲子县组织 500 头牲口为八路军驻华池部队运送被服。1940 年新正县组织长期担架队 37 副，往返延安、陕西一带运送伤员；出动临时担架 267 副，随关中驻军和游击队服务，并出动 4800 人、4747 头（匹）牲畜运送军用物资和粮草。1941 年至 1943 年，新正县先后投入 9997 人，出动担架 463 副，大车 1025 辆，驮畜 5134 头，为部队转运伤员、运送粮食，并派民工 2020 人修筑工事。^⑤ 1942 年环县动员 14617 人（次）帮助八路军修筑甜水堡、环城南堡碉堡，并组织 703 头牲口为八路军转运军粮、军火。1942 年曲子、环县又动员劳工 2148 人配合八路军修筑防御工事 1 个月，出动牲口 31199 头（次）为八路军运送物资。^⑥ 新宁县 1943 年 7 月，动员民兵帮助部队修筑工事，平毁城堡，投入

① 魏虎德、贺秋萍：《庆阳近现代史》，第 195 页。

② 《庆阳地区志·民政志》卷 4，第 806—808 页。

③ 庆阳地委党史办：《陇东革命斗争史料选编》（二），第 416 页。

④ 《庆阳地区志·社会团体志妇女工作》卷 4，第 1145 页。

⑤ 《庆阳地区志·民政志》卷 4，第 806—808 页。

⑥ 魏虎德、贺秋萍：《庆阳近现代史》，第 196 页。

人工 3800 多个。坚壁清野中，向龙坊、上珍子转运粮食 2400 多石。华池县从 1943 年到 1945 年共出人工 93886 个，畜力 58150 个，运输粮食 12404 石，饲料 4943 石，饲草 29.6229 万公斤。^① 有序的战勤服务，保障了前线部队和边区政权对军需物资的需要。

(5) 优抚抗属，互助生产，巩固后方。为促进根据地经济社会发展，陇东分区各县积极开展包工、代耕和帮工等多种方式，解决了军烈属和伤残军人劳动生产中的困难。最为突出的华池县，1945 年给抗属包耕 18 户，粮 60.5 石，柴 7.4 万多斤；代耕 4 户，地 128 亩；帮工 55 户，人工 176 个，畜力 102 个；给退伍伤残军人包耕 22 户，粮 13.8 石，代耕 53 户，地 675 亩；给工属包耕 23 户，粮 81.5 石，柴 3.19 万斤；代耕 4 户，地 280 亩，柴 4.3 万斤；帮工 44 户，人工 680 个，畜工 83 个。^② 拥军活动的开展巩固了后方。此外，人们还开展活泼新颖、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如戏剧秦腔、眉户、木偶、皮影。陇剧《兄妹开荒》、《白毛女》，社火表演舞龙、跑旱船等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丰富活跃了军队、民众的社会生活。军民文化活动，密切了军民关系，推动了积极向上的边区社会新风貌的形成。文化活动中，新正县汪庭有的《绣金匾》、环县农民诗人孙万福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新宁县刘志仁的新秧歌等传遍整个边区，传向全国各抗日根据地。

3. 解放战争时期，为保卫陕甘宁解放区，解放大西北，庆阳民众全力以赴，拥军支前

(1) 参军参战，保卫胜利成果。抗战胜利后，陇东分区征兵 1009 名，如期完成。1946 年陇东分区在短期内报名参军的有 1450 人，其中 800 名送往主力部队，其余补充编入地方游击队和自卫军。^③ 同年关中分区新宁县所属 5 个区选拔精干民兵 200 余人，重建新宁独立营，后来独立营编入警一旅第 21 团。1947 年陇东、关中分区共征兵 6500 名；1948 年仅华池县就有 400 多人参军，1949 年环县又有 500 多名青年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在参军入伍的热潮中，华池县林镇乡沟口村仅 8 户人家 30 余人，参军的就有 9 人，贫

① 庆阳地委党史办：《陇东革命斗争史料选编》（二），第 416 页。

② 庆阳地委党史办：《陇东革命斗争史料选编》（二），第 417 页。

③ 《庆阳地区志·民政志》卷 4，第 806—808 页。

农白大姆把自己的3个儿子都送上了前线。^①据有关资料粗略统计,从1946年到1949年7月,庆阳地区参军入伍的青年有1万多名,这些踊跃参军的优秀陇东儿女有许多血洒疆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环县和曲子,就有296人阵亡。^②宁县籍牺牲者有姓名记录在案的已过百人。老区华池县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共有2260名青年参军,占适龄男性青年人数的60%,其中180名光荣捐躯。^③

(2) 积极交纳公粮,全力保障部队与解放区物资需求。据现有资料统计:1946年陇东分区交纳公粮3.3万石,饲料3.5万石,饲草40万斤;1947年交纳公粮4.04万石,饲料10.1万石,饲草850万斤;1948年交纳公粮5.5万石,饲料5000石,饲草550万斤;1949年夏秋两季交公粮分别为24.9万石和28.8万石。这样,从1946年到1949年,庆阳解放区各县共交公粮计61.645万石(与分年数出入3万多石,每石计300斤),饲料20.968万石,饲草1440万斤,同时陇东分区完成边区下达的借粮任务共计23.3万石,保证了粮食的区内供给和区外调拨。^④

(3) 全面开展慰问捐助活动,鼓舞士气,改善部队生活。据不完全统计,在3年多的陕甘宁解放区保卫战中,陇东分区在本区内慰问子弟兵和支前粮食5万余石,饲料3万余斤,饲草6000公斤,黄米1万多斤,羊1500多只,猪肉5万斤,鸡5000只,鸡蛋1万多个,瓜果30万斤,蔬菜300多万斤,军鞋5000多双。其中在1946年澄王战斗中,新宁县组织群众集中40多万斤粮食,并准备大量熟食以备新四旅和归来的第三五九旅食用,当第三五九旅左翼到达富河时,新宁县慰劳军鞋1000双。^⑤1949年12月,全区开展“拥军月”活动,镇原、合水、宁县、西峰市的群众给当地驻军、游击队捐款2.1亿多元(边币),猪肉1750公斤,豆腐9750公斤,毛巾、肥皂1975条(块),鸡5200只,鸡蛋1.6万多个,蔬菜2.6万多斤。^⑥

(4) 战勤服务全面展开,救护伤员及时安全,送运粮草高效有序。1946年11月9日的《边区群众报》以《大家打,打的好——新宁县两千多

① 李仲立、曲西：《陇东老区政权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310页。

② 魏虎德、贾秋屏：《庆阳近现代史》，第255页。

③ 华池县志编写组：《华池县志》，第42页。

④ 李仲立、曲西：《陇东老区政权史》，第299—310页。

⑤ 《宁县志》，第124页。

⑥ 《庆阳地区志·民政志》卷4，第896—898页。

名农民前线助战》为题报道了新宁县组织的支援“迎王战斗”场面，新宁县2500多名农民上了前线，350副担架一夜赶到前线，队长胡振德背下3名伤员，白光福背一个捧一个，中医王宏宽主动参加担架队，亲自带6种特效药，在火线治疗11名伤员，运输队往来于前线后方，转送粮草、弹药和胜利品。^①1947年4月15日《边区群众报》又以《战场就是考场——新宁县小学生积极服务战争》为题，报道了新宁县民众全力支持西华池战役的场景：青壮年上前线抬担架，年老体弱的搞运输，妇女碾米、磨面、烙馍、做军鞋，昼夜不停。全县共出担架840副，运输牲口1200头，为军队送来2.2万斤，干粮万余斤。新宁完小的22名学生在医院、兵站和仓库服务达半月之久，为伤员换药、喂饭、洗衣服，由于劳累和药薰，有的学生晕倒在地，醒来后又继续服务，获得解放军的好评。^②在险恶的环境中，华池县林镇乡小河沟妇女董凤鸣冒着生命危险，护理伤病员17名，被誉为“伤员之母”。解放战争中全区妇女掩护干部、伤员计5000多名。^③庆阳广大妇女不计报酬、不辞辛劳，自1946年至1949年，共做军鞋25.24万双，为人民子弟兵快速行军作战提供了方便。由此可见，“庆阳老区妇女对革命战争的贡献丝毫不比男人少，他们不愧是子弟兵的好母亲，好姐妹”^④。送运军需，转运伤员，庆阳民众更是积极参加。据资料统计：从1946年内战开始至1949年西北解放，庆阳先后出动长短期担架11514副，人力58600人，牲畜13184头。^⑤其中1948年曲子、环县、华池组织3个中队的担架队1380多人、320副担架，跟随西野军作战，历时6个月，行程几千里，参加了荔北战役、永丰战役等战斗行动，他们在行军作战中，从未丢下一个伤员，受到部队首长的表扬。^⑥曲子县1948年至1949年出动696人、133副担架、400头牲畜随军服务长达8个月之久，行程5000里之外。^⑦1949年3月，新宁县支前担架队200多人、40副担架、50匹骡马随军转战5000余华里，当年11月才从临泽返回。在解放固关镇、兰州等战役中，共抢救伤员200余人，有11

① 马兴文主编：《中共宁夏大事记（1926—2004）》，第51页。

② 马兴文主编：《中共宁夏大事记（1926—2004）》，第55页。

③ 《庆阳地区志·社会团体志妇女工作》卷4，第1145页。

④ 李仲立、盛海：《陇东老区政权史》，第296—310页。

⑤ 李仲立、盛海：《陇东老区政权史》，第296—310页。

⑥ 魏虎德、贾秋萍：《庆阳近现代史》，第255页。

⑦ 《庆阳地区志·民政志》卷4，第806—808页。

人立功受奖。1947年华池县共组织随军担架685副，出动3483人；运输队300多个，参加1553人，牲畜2390头。这年支前共用人工67617人，畜工37260个，加上当年其他义务投工，共用人工183000个，畜工188000个，平均每劳力用工1月，每畜用工20天以上。^①为了转送军需，1949年7月中旬至9月上旬，环县出动所有的驴子，在50天内，完成了夏借粮运输任务，其中72石小米经瓦亭一直转关到固原、同心和豫旺一带前方。8月中旬又组织群众1606人，驴3113头，往返平凉11天，送来979石。9月上旬，给同心、豫旺的部队送去麦面27万多斤，米66石，饲料319石。1949年3月西野解放兰州后，陇东老区各县向瓦亭输送粮食3.34万石，饲料5000石。正宁、宁县还向平凉送小麦3万石，饲料5000石，镇原、环县向固原送小麦300万斤，饲料18万斤。^②正是庆阳人民的大力支援，保障了军粮的供给，西野部队全力对敌，顺利解放大西北。

庆阳民众的拥军支前活动，起始于土地革命，持续于抗日战争，延续高涨于解放战争，经历了三个时期，从应急性、个体化转变为小规模区域内自发活动，全方位、深层次、持续性、有序化、跨区域的群众社会运动，表明庆阳广大群众在近代民主革命斗争中，自觉地将本地区民众利益，融入全民族独立解放的宏伟大业，并为之勤恳劳作、全力支持，最终在实现民族独立的历史进程中，完成了庆阳社会性质的根本转变。

二、庆阳民众拥军支前持续高涨的原因

庆阳民众拥军支前持续发展近20年之久，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陇东地区悠久的革命斗争传统与浑厚、淳朴的民风相结合，形成相对鲜明的区域文化氛围，这是推动庆阳民众拥军支前活动的历史原因

我们知道，庆阳在历史上为多民族交错杂居地区，从秦汉王朝的汉匈争战到两宋时代的夏宋、金元战争，使这一区域经历了中原农业经济与北方游

^① 庆阳地委党史办：《陇东革命斗争史料选编》（二），第488页。

^② 魏成德、贾秋序：《庆阳近现代史》，第256页。

牧经济、中原农耕文化与西北游牧文化的持久交融、浸润，加之受黄土高原独特地理环境影响，形成较为明显的区域群体民风。《隋书·地理志》记载：“北地、安定、弘化三郡……于古为六郡之地，百姓性犹质直，崇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穡。”又《大清一统志》载：“好勇尚武，庆州，公刘所居，务本业，有先王之遗风”。于是“赋性勤俭，朴诚、淳厚，好勇尚武，重农轻商，讲求礼仪”，为庆阳民众承继循守。^①在农业时代的封建社会，遭受封建政权苛捐杂税、豪绅地主重租盘剥的庆阳人民，形成了外抗掠夺势力侵袭侵入，内反官府豪强压榨奴役的革命斗争传统。延及近代社会，列强入侵，军阀蜂起，自然经济环境恶化，农业生产方式凋弊破产，蔓延持续，严重破坏着庆阳民众生存生活的社会空间，仅在宁县，民国《重修宁县志》记述了当时民众生活场景：“自民国十五年以来，陇东溃军到境，黄得贵驻扎早胜，四乡摊派粮草，车载驴驮人担，日夜运送，川流不息。厥后军队所到之处，必先令民修理道路。及驻军换驻，动需牛车数十车辆，小车百余支，各里拉差，鞭打勒索，弊案突出，乡村骚然，鸡犬不宁。其有运至他乡，扣留大小车辆，民夫饥饿用逃归者。至于修筑桥梁，其可通徒行者尚易为力，人民犹不殫苦力。若泾河、马莲河通行汽车之巨桥，则各里轮流提土，经营数月，铺通数次，忽被洪水冲坏。如此随修随坏，随坏随修，木石漂没，其工程卒无告竣之期，人民痛苦未有苦于此者也”^②。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争自由、求解放的民主革命思想活动，促使庆阳广大民众觉醒和觉悟，点燃了庆阳广大民众潜在的尚武好勇的反抗意识，随着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影响及推动，这种反抗意识转化为巨大的拥军支前能量，释放宣泄。

2. 陕甘革命根据地较早开辟，巩固扩大与持续发展的革命态势对广大民众情绪产生了巨大的感染和激励作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全国反动统治建立，开始了白色恐怖统治。为有效开展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确立了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根据八七会议精神，毛泽东等人发动秋收起义，率领工农武装进军井冈山坚持斗争，从此“工农武装割据”如星火

① 《庆阳地区志·民情风俗志》卷3，第999页。

② 《宁县志》，第458页。

燎原之势遍及大江南北。此时活动战斗在西北地区的共产党人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远离中央，“从革命斗争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践于西北”，积极开展兵运，宣传革命思想，动员组织贫苦群众，创建红军，于1934年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在巩固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斗争中，紧紧依靠民众，取得了胜利。他们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使陕甘革命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①土地革命战争后期，这块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于1935年迎接了长征到达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根据地在全国抗日战争八年战火的洗礼中发展壮大，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转战陕北，领导指挥全国战事，近20年中国革命势力在西北地区从小到大，由弱到强，走向高潮，走向全国胜利的发展态势，坚定了庆阳民众拥军支前的积极性，成为庆阳民众拥军支前活动持续高涨的社会政治基础。

3. 中共中央民主革命大本营战略思想的确立与积极有效的战时组织动员机制，为庆阳民众拥军支前活动的有序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关注根据地建设，中共中央、中央红军1935年实现与西北红军会师后，发起直罗镇战役，奠定了西北（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地位。吸取大革命失败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中共中央核心经营陕甘宁边区，制定颁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巩固发展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制度措施，其中全国抗战时期先后颁行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939.4）、《陕甘宁边区义务耕田队条例》（1939）、《陕甘宁边区关于动员及代雇民夫牲口的决定》（1940.7）、《陕甘宁边区战时动员物资办法》（1941.5）、《陕甘宁边区战时动员壮丁牲口条例》（1942.1）、《陕甘宁边区抗日自卫军组织条例》（1942.4）、《陕甘宁边区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1942.10）、《陕甘宁边区三十二年度救国公粮公草征收条例》（1943.7）、《陕甘宁边区农业统一累进税试行细则》（1943.9）、《陕甘宁边

^① 李仲立、董海：《陕北老区红军史》，第29页。

区动员潜逃战士归队办法》(草案)、《陕甘宁边区政府关于护送伤员办法的规定》等制度法规,为当时乃至日后拥军支前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了积极的舆论引导和明确的法律依据。^①而后,陇东地委颁布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1945.12)、《关于配合主力争取陇东自卫战争胜利的指示第七号》(1947.6)、《关于坚持陇东全面游击战争中发动群众问题给各县的一封信》(1948.5)、《关于配合主力解放大西北的工作安排意见》(1949.6)等文件措施,直接推动了庆阳拥军支前活动的高涨。^②

4. 庆阳国统区经济社会的残破与解放区社会政治新景象的巨大反差,无疑成为广大民众支援革命战争的根本原因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地处陕甘宁三省交界的庆阳地区,逐渐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重要地区,自1934年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建立伊始,国民党重兵云集庆阳,“围剿”进攻陕甘革命根据地。1939年1月,国民党政府出策《防止异党活动》、《处理异党问题的实施意见》,宁县当局积极效从,县长方振武公开宣称“陇东的敌人不是日本人,而是共产党”,不断制造事端,破坏抗日活动。“纪律废弛,骄奢邪淫”的国民党军侵民活动屡起,1941年9月,驻守宁县的国民党军第191师一名排长竟公然在何家塄九条梁拦路抢劫,杀害定祥村羊贩王友明,劫走法币13670元。1943年9月,驻正宁县国民党军抢占新宁县一区二乡的杨家畔、巩家畔和宋家畔,经过3个月“安民”后,即不断派款、掠夺财物,逼得群众卖妻变财,不堪重负,该村原有驴、骡、牛156头,一年后剩下91头。1945年7月《解放日报》载文对这一惨状进行了揭露。1947年5月,国军飞机轰炸宁县城,炸死学生4人,伤1人。1948年军用飞机又扫射旱胜镇集市,死伤百姓30多人。军队横行不法,抢劫百姓,政府更是聚敛财物,鱼肉百姓。在宁县仅1930年至1933年摊派军粮17469石,年均4367.5石,是正赋的23倍,还有差役、杂税等。^③进入1940年代,反动派变本加厉,1944年宁县民众额外负担高达8990万元,为自治税实收数的100倍。1945年镇原县国民党一乡公所就命

^① 甘肃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陕甘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一),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 《庆阳地区志·粮油管理志》卷3,第1169页。

^③ 《庆阳地区志·陕甘宁边区史文选》卷3,第1182页。

令居民交纳牌照税，该税竟然包括每头牛 50 元，驴 30 元，骡、马 60 元，牛车 60 元，自行车 120 元，羊 2.5 元，小木车 2.5 元，油坊 100 元。另外还规定凡能驮东西的骡马，政府有半价收买权。据 1947 年 7 月以后的不完全统计，国统区所谓的正税有 26 种，额外税 20 种，临时摊派杂税 77 种，使得百姓“十室九空”，到了难以活命的地步。连国民党地方当局官员庆阳县县长谢世泉在一次报告中也说：本县最近半年来大军屯集，供应浩繁，民力匮乏，已无法为继。^①与此相反，陕甘宁边区政府不断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促使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制定颁布《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1939.8）、《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1939.4）及《修正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1944.3），促使妇女的解放，陇东华池解放区出现追求婚姻自由幸福的典范“刘巧儿”原型——封芝琴；《陕甘宁边区为充实“三三制”给各县的指示信》（1941.3），使“三三制”政权建设的新模式在这里最早试验；《关于保障人权财权条例》（草案 1942.1）保障维护了公民基本人权；《陕甘宁边区优待外来难民办法》（1944.7）妥善安置难民，树立了边区政府和中共政权的良好形象，稳定了边区社会局面。边区政府始终将改善民生放到首位，加速推动社会经济建设，抗战期间的 1940 年陇东实行“三七减租”，1942 年至 1944 年又按“二五减租”政策执行，1945 年复查。据资料显示，庆城、镇原、合水三县经过清算减租，地主共向 2240 户佃农清退土地 55900 亩，耕牛 54 头，羊 547 只，三县共减租粮食 900 多万石。^②宁县减租运动，迫使地主退还了 1941 年至 1943 年两年多收的 499 石租子。“减租”的同时，边区政府发起了大生产运动，切实减轻民众的负担。大生产运动中，仅陇东根据地军民从 1941 年到 1943 年共开荒 55 万亩，耕地面积增加 10%，人均增长耕地 1 亩多，增加粮食 5000 多万斤，^③显示了庆阳农业发展的潜在势力，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更为西北“陇东粮仓”经济地位的形成准备了条件。1944 年新宁县政府组织的调查组就社会状况、普法、减租、移民等 9 个方面做了区域调查，形成的报告《民主与团结——新宁（县）二区三乡（全村）政权调查之一》表明：建立政权以来，清除了兵灾匪患，人民安居乐业，生产发展很快。20 世纪 30 年代初全乡只

① 魏虎德、贾秋萍：《庆阳近现代史》，第 286 页。

② 李铁成主编：《庆阳农村经济》，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6 页。

③ 魏虎德、贾秋萍：《庆阳近现代史》，第 172 页。

有4头驴，生产生活全靠人力拉犁推磨，建立革命政权后，1942年全乡有大家畜168头，1943年发展到452头，比上年增长1.7倍，1944年发展到861头，又增长91%。^①转入解放战争后，中国共产党推行的“耕者有其田”土地纲领，更使翻身的农民获得了新生，倾其全力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大大加快了西北解放的进程。

三、庆阳民众拥军支前活动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庆阳民众的拥军支前活动，巩固发展了陕甘革命根据地，使其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成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和解放战争的全国战事指挥中枢区域。庆阳民众迎接了中共中央、中央红军，促进了中国红色武装力量的空前联合和团结，促进了革命进步力量的汇集、革命人才的培育与成长，推动了大西北的迅速解放和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进程。对此曾在庆阳战斗工作的耿飚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讲到：陇东老区作为陕甘宁边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不断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在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陇东老区人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②彭德怀曾深情地说：没有边区人民这样的支援，要取得今天的胜利是不可能的。^③2009年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甘肃庆阳考察调研时说：庆阳作为革命老区，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④

庆阳民众的拥军支前活动，积极踊跃，持续高涨，密切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实践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克敌制胜、不断发展壮大的思想法宝和力量之源，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庆阳民众的拥军支前活动，承继发展了陇东地区“重农俭朴、勤恳耕作、讲义修礼”的农耕文化思想。抗战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减租减息”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的号召推动下，庆阳民众奋力生产，勤恳耕植，物资盈余，成为陕甘宁边区主要后勤基地，为抗日战争大后方的巩固奠定了雄厚的物质

① 马兴文主编：《中共宁县大事记（1920—2004）》，第45页。

② 《庆阳地区志·陕甘宁边区史文选》卷5，第1182页。

③ 李仲立、唐涛：《陇东老区政权史》，第296—299页。

④ 《陇东报》2009年6月13日第1版。

基础。同时成就了庆阳“陇东粮仓”的美誉，增添了庆阳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生机和活力。

庆阳民众的拥军支前活动，持续长久，使庆阳老区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党的民主革命诸多重大制度、措施在这里诞生、尝试和创造，与广大民众的支前活动密不可分、完整结合，定格凝固在这块热土之上，同庆阳历史文化一起绵延、发酵，构建了庆阳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人文教育（如普法教育、婚育新风教育、拥军爱民教育）基地的重要地位。

作者：王兰元，甘肃省宁县第五中学历史高级教师。

在陕甘边根据地与中国革命 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

(2009年9月20日)

霍海丹

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和来宾：

经过一天紧张的议程，我们这次学术研讨会就要闭幕了。受研讨会主办方的委托，我作总结发言。下面，就这次研讨会的情况我讲三个问题。

一、本次研讨会的论文征集和评选

这次研讨会共收到应征论文 180 篇，经过初选，有 90 篇进入第二轮评选。随后经评审委员会认真讨论评议，有 59 篇论文确定为研讨会最后入选论文，其中 22 篇论文作者作大会交流发言。从论文征集和评选情况看，有以下几个特点：

1. 总体质量比较高。这次研讨会面向全国征文，得到广大专家、学者和有关研究人员的高度重视。不少应征论文视野开阔，在大的历史背景下，从多种角度探讨陕甘边根据地的历史经验、特点，论述其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提出了有见解的观点。入选论文不论题目大小，均言之有物，各具特色，体现了研究水平。

2. 选题面比较宽。这次研讨会的应征论文，选题涵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特点，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法制建设、

民族工作、人物研究，等等，对多方面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3. 作者面广。应征论文作者，来自中央有关部门、单位和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军队的不同岗位，既有资深专家、学者，也有中青年学术骨干，还有一些是进行业余研究的作者。当年在陕甘边根据地战斗过的一些老同志的后代也撰写了文章。

二、本次研讨会的主要成果

这次学术研讨会印发了入选论文集。综合入选论文的情况，从学术研究和探讨来看，研讨会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关于陕甘边根据地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关于陕甘边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及评价，是这次研讨会的热点。与会论文作者一致认为，由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组成的西北革命根据地（陕甘根据地）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和八路军抗日的出发地。可喜的是，大家在论述这些问题时，能够从不同的点切入，并且有新的角度。如有的作者从刘志丹、习仲勋等自觉地用各种方式给长征中的中共中央传递陕甘边根据地的信息，积极开展长征红军将要路过地区的群众工作，积极为各路长征红军筹备粮草，开展支前工作等方面，论述了陕甘边根据地党和红军为迎接各路长征红军所做的准备，认为这对于保证红军长征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的作者从陕甘根据地的良好革命基础、强大的革命力量、敌人统治力量的薄弱和内部矛盾、地理位置、北上抗日的政治需要、战胜危机、争取革命发展有利条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战略眼光等主客观原因，论述了中共中央以陕甘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历史必然性。有的作者则认为，包括陕甘边在内的陕甘根据地本来不是理想的落脚点，由于中共中央采取争夺时间、争夺空间、争夺力量的方针，使其由地理位置不利的态势转换为具有无可替代的战略地位的态势。有的作者从揭开游击战争序幕、支援陕北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创西北革命斗争新局面和陕甘边根据地武装力量、土地革命、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社会改造等方面的发展，论证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还有的作者从陕甘边根据地党的事业

培养出大量干部等方面，论述了其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二）关于陕甘边根据地特点的概括

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一大亮点，是一些专家、学者将陕甘边根据地放在一个更广阔视野下，透过它的特殊环境条件，探讨其创建和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模式，以此说明其创建和发展的历史经验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所起的作用。综合入选论文的观点，陕甘边根据地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1. 依靠积极开展兵运工作，为创建红色武装和建立革命根据地打下基础。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通过兵运工作，建立了陕甘边党领导下最初的武装，为陕甘边根据地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军事人才，为红军游击队的发展提供了兵源，并且兵运工作还是获取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2. 注意开展统战工作。在当时中共中央被“左”倾教条主义者统治的情况下，陕甘边根据地从实际出发，采取了灵活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如：对于同国民党政权有矛盾的地方武装，努力进行争取；凡是同情、倾向革命的力量一律热忱相待，对一些哥老会、民团、保安团、红枪会的首领，进行团结争取；等等。这些统一战线实践经验，丰富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3. 实行以南梁为中心建立三路游击区的发展战略。这个发展战略符合实际、思路清晰、方向明确、方式正确。在它的指导下，陕甘边主力红军在地方红军和游击队的配合下，很快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根据地。毛泽东对这个发展战略给予很高的评价。4. 顾全大局，始终坚持以党的利益为重，坚持团结、包容的原则。尽管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同时革命队伍内部存在分歧，刘志丹等一部分同志受到过严重打击，并且被降低职务，但他们始终顾全大局，以党的利益为重，积极工作，不搞小团体，不搞宗派，体现了共产党人宽阔的胸怀和高尚的情操，使革命队伍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和得到巩固。

（三）关于陕甘边根据地政权建设的论述

陕甘边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也是这次学术研讨会的重要关注点。有的作者认为，陕甘边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建设具有以下经验：1. 根据地政权建设离不开革命武装的发展和革命战争的胜利。只有不断发展和扩大红军的力

量,根据地的政权才能建设和巩固起来。2. 由于根据地政权是人民群众的政权,必须充分吸收群众代表参加政权建设和对各项事务的管理,并在政权中担任重要职务;必须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3. 根据地政权必须为民办事,切实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出发,进行各项决策,制定各项措施,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才能巩固和发展。有的作者认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历史功勋在于为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切实的物质保障,为党后来成功实现在全国的执政积累了经验。有的作者研究了寺村寨、照金建立的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和南梁建立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之间的继承发展关系。有的作者还介绍了1935年10月下旬至11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干部建制编入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的情况。这个方面的情况,过去鲜为人知。有的作者还对陕甘宁边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开发进行研究。

(四) 关于陕甘边根据地经济文化建设、民族和社会政策、群众工作的研究

与会的部分论文,对陕甘边根据地的经济政策进行了研究,认为其特点是:1. 借鉴和吸收了传统的反封建农民斗争建立政权后打土豪、分财物的经济政策。2. 把农业生产放在苏区经济建设的第一位。3. 重视商品经济的发展,有计划地组织根据地人民进行对外贸易。值得一提的是,有的作者对陕甘边根据地先后发行的4种货币加以评介,认为这些货币的发行,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促进了苏区集市贸易及苏区与白区间的物资交流,为活跃、繁荣根据地经济,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支援革命战争做出重大贡献。

有的论文对文化建设问题予以关注,指出陕甘边根据地的照金时期和南梁时期,都积极致力于宣传教育文化工作,用党的政策去教育引导群众,传播和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政治水平。这方面工作的大力开展,对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巩固和建设都发生了重要作用。对后来的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做了重要的群众动员。有的作者对产生于陇东的民歌《绣金匾》、《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和《军民大生产》进行研究,认为这三首民歌是中国革命民歌的代表作,具有多彩的艺术特色、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是艺术性、思想性的

完美结合，在中国革命音乐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的作者对陇东剧团进行研究，认为它是党的宣传队、战斗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积极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为建设、巩固和发展解放区发挥了重要作用。

陕甘边一些地方是回族居住地，有的作者认为，陕甘边根据地非常重视党的民族工作，帮助回族建立游击队和革命委员会，开展革命斗争，使回族人民真正走上正确的民族解放道路。虽然陕甘边的民族工作还谈不上丰富和全面，但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动员少数民族群众参加民族民主革命，发挥了开创性作用，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有的论文重点分析陕甘边根据地实行的社会政策，指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对哥老会等会道门采取争取政策；颁布禁烟、禁赌、放足等条例；对雇农进行适当补助；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寡、残疾人实行救济政策；成立雇农工会、贫农团；等等。这些政策，对于改革社会陋习，提倡新的社会风气，使根据地成为一个真正的新社会产生了重要作用，具有积极意义。

还有论文对陕甘边根据地群众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探讨，认为陕甘边根据地群众工作的成功经验是：保障群众的切身利益，凝聚群众的革命力量，采取有效的工作方法，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建立严格的纪律约束制度。其教训是：在思想政治上贯彻了一些脱离群众的极左政策，在军事路线上执行了“左”倾盲动主义的战略方针，在工作实践上进行了残酷斗争、错误肃反。陕甘边根据地群众工作的经验教训对现实的启示是，要时时刻刻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坚持科学的群众工作方式，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五）关于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以及其他同志与陕甘边根据地革命斗争的关系及其贡献

有的作者对刘志丹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军事贡献进行研究，认为刘志丹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指挥反“围剿”军事斗争，他的建军思想和杰出的军事指挥艺术，在中国革命史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的作者通过回顾谢子长创建陕甘红军和开辟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过程，认为他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立下了卓越功绩。有的作者对刘志丹、谢子长的兵运活动进行考察，认为刘志丹、谢子长的兵运实践尽管历尽挫折，但他们从中积

累了开展军事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为后来西北红军的成立锻炼和造就了一批重要军事骨干力量，打击了国民党的统治，扩大了共产党在陕甘边地区的影响。研讨会会有两篇入选论文，对习仲勋的革命活动和思想做专门研究。其中有作者评价，习仲勋一生有两个亮点，一是早年跟随刘志丹英勇转战，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一是改革开放初期带领广东的干部群众“杀出一条血路”，为广东改革开放事业和特区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习仲勋对陕甘边根据地的贡献是：1. 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同陕甘边的实际相结合。2. 贯彻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十分坚决。3. 将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和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4. 组织武装，开辟苏区，建立政权。另有作者关注习仲勋在陕甘边区的群众工作，认为他在领导边区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对群众工作尤其重视，主要体现在：深入农村，关心人民群众；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开展群众斗争；发展游击队伍，支持根据地的游击战争。作者认为，习仲勋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将群众的利益看成党的最高利益，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

这次研讨会，在人物研究方面，作者们不仅仅把眼光集中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身上，对其他一些党政军领导干部与陕甘边根据地创建发展的关系也进行了研究。有的作者认为，马文瑞在陕甘边陇东地区建立了两个县的红色政权，发展和扩大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为他后来担负更重要的工作打下了基础。有的作者对马锡五审判法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文化意义进行研究，认为马锡五审判法是特殊时代环境下的历史创造，在边区农村发挥了极大的司法效率。社会发展，时代变迁，马锡五及其所代表的人民政权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宗旨永远不会过时。此外，一些作者还对黄子文、黄罗斌、曹力如、贾拓夫、王维周、王观澜等同志，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进行研究，论述他们对陕甘边根据地的贡献。

除以上五个方面外，这次研讨会的入选论文和研究成果，在内容上还涉及其他若干方面，其中一些论文涉足新领域、新问题的研究，或者提出新的论点和见解，对课题研究的深化和推进也具有积极意义。如有论文认为，1936年春夏，毛泽东根据国内政治形势和当时战场形势变化，改变自己原来极力主张的军事战略主要方向，转向次要战略方向，指挥红军从东征转向西征，向西建立新的根据地，取得了预期效果。毛泽东关于西征战役的战略选择，充分反映了他高超的战略战术思想。有的论文对周恩来与西征战役进

行研究，认为周恩来积极协助毛泽东决策部署西征作战，并指挥东线红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保卫了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牵制了国民党军的行动，同时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有力配合了红一方面军主力的西征战役，充分表现出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应对艰险局面的政治韬略。还有论文认为，西安事变前后彭德怀、任弼时在庆阳，从军事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红军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中共中央及军委保持一致，为党以军事实力作后盾配合政治谈判，力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创造了条件；同时使红军同东北军、十七路军保持“三位一体”，有效地配合西安方面与南京政府、蒋介石的政治谈判。另有一些论文，对庆阳老区对中国革命的历史贡献、对人民军队建设的贡献，以及庆阳人民的拥军支前活动进行研究评述，史料丰富，议论得当，也达到了比较高的质量水平。

三、今后进一步加强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

这次学术研讨会成果丰硕，但陕甘边根据地研究是一个大课题，其中涉及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不是举办一两次大规模研讨会就能研究清楚的。就这次会议的应征论文来说，选题涉及方方面面，有不少文章研究比较深入，看得出来作者下了大功夫，但也有相当一部分文章显得空泛，缺乏新意。从入选论文来看，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1. 宏观方面研究比较多，微观研究比较少。2. 对政治方面的问题研究比较多，对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问题研究比较少。3. 新材料、新史料运用比较少。4. 人物研究的范围还比较窄。

针对以上不足之处，今后进一步加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课题研究，似应注意这么几个问题：1. 在继续开展宏观研究的同时，注重开展微观方面的研究，加强个案研究。这次研讨会关于马锡五审判方式的一篇文章，就是微观研究做得比较好的例子。这方面，其实有许多题目可以做。比如，可以选取根据地一个有代表性的村庄或者乡，作为“解剖”的“点”，展开研究；也可以选取根据地发展建设过程中一个方面有代表性的事件，加以分析论证，等等。2. 除研究政治问题外，要进一步加强对经济、文化、教育、法制、民族等方面问题的研究，并且在研究中推出一些学术专著。从经济、文化、教育、法制、民族等方面问题的研究来讲，下午大会发言中有代表提

到，陕甘边的土地政策、土地改革，与别的根据地有不同之处，民族工作也有鲜明的特点，那么，这些不同之处和特点是什么？还有，陕甘边的商业政策与其他根据地有什么异同，哪些是有自身特色的东西？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思考、研究，都有文章可以做，也值得去做。包括如何谋划发展陕甘边的红色旅游，也可以列出若干研究题目来。从推出学术专著来讲，这次开会前，我专门请陇东学院的曲涛教授对多年来关于陕甘边根据地的研究成果做过一个统计。根据这个统计，在陕甘边根据地研究领域，迄今为止所出版的，主要是从政治、军事着眼介绍根据地全面建设情况的学术著作，研究根据地经济、文化、教育、法制、民族等方面问题的专著一部也没有。显然，这是一个薄弱环节。我们在加强对陕甘边经济、文化、教育、法制、民族等方面问题研究的同时，花力气、下功夫撰写和推出一部分专著，非常需要，也是大有可为的。3. 进一步挖掘新材料、新史料。改革开放以来，陕甘两省的有关部门已经编纂出版大量关于陕甘边根据地的文献资料图书，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现在要进一步挖掘新材料、新史料，应该说难度确实比较大，但也并非无事可做。一是可以从老同志那里搜集、征集他们个人保存保留的文稿、史料；二是随着海峡两岸交往的扩大，可以想办法从台湾方面查阅搜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有关档案资料；三是可以从已经公布的档案资料中注意寻找有关史料。总之，多动脑筋，多想办法，一定会有相应的收获。4. 开阔视野，拓展人物研究的范围。多年来，对陕甘边根据地人物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发表和出版大量文章、著作。今后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我看有两件事情可以做。一是在继续深入对领袖人物研究的同时，注意开展对根据地各行各业有代表性的人物的研究。通过持续的努力，逐渐构成边区人物研究的“群像”，编写出版一部陕甘边区人物志或人物传。二是开展对高岗早年生平和思想的研究。高岗是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我们开展陕甘边根据地人物研究，没有理由回避这样一个重要人物。由于历史的原因，对高岗的研究，在国内基本上是空白点。随着陕甘边根据地人物研究的推进，我希望这种情况逐步有所改变。

同志们，陕甘边根据地与中国革命学术研讨会即将闭幕了。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次研讨会开得非常成功。在这里，我首先代表会议的主办单位，向到会的全体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这次研讨会筹备时间长，规格比较高，到会的代表多，会务工作头绪多，协调保障任务重，工作量很大。

由于庆阳市委、市政府的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研讨会得以圆满顺利地进行。同时，东道主还为大家安排了富有特色的文化活动，如参加农耕文化节、观赏红歌会演出等。为此，在会议闭幕之际，我也代表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向庆阳市委、市政府，向会议承办单位和所有会务人员、后勤服务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作者：霍海丹，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编审。

附：

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研究有关的 文献资料和著作目录

(除内部资料外,按出版、发表时间先后为序)

一、文献资料

1.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第一、二、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胜利到陕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3.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甘肃党史资料》第一、二、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 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上、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
5.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6. 陕西省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政府大事记》,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
7. 高文、洪世律编:《陇东老解放区通讯选》,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在陕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9.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 《陇东革命歌谣》,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1.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2.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
13.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

14. 陕西省志编辑委员会编：《陕西省志》第五十卷·政务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5. 庆阳地区志编纂委员会编：《庆阳地区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6.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
17. 甘肃省志编辑委员会编：《甘肃省志》第三卷·共产党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18. 中共庆阳地区组织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共产党庆阳地区组织史资料》；
19.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庆阳地区中共党史大事记》（内部资料）；
20.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建设》（内部资料）；
21.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陕甘宁边区陇东的经济建设》（内部资料）；
22.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军事斗争》（内部资料）；
23.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统战斗争》（内部资料）；
24.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陕甘宁边区陇东的群众运动》（内部资料）；
25.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陕甘宁边区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内部资料）；
26.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内部资料）；
27.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内部资料）；
28.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内部资料）；
29.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庆阳地区中共党史人物》（内部资料）；
30.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庆阳人民与解放战争》（内部资料）；
31. 中共耀县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编：《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内部资料）。

二、文集、传记、回忆录

1. 周红彦：《回忆刘志丹和谢子长》，陕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2.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
3.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4. 《陇原星火》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5. 杨成武：《忆长征》，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6. 《南梁曙光》，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7.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8. 白黎：《毛泽东在保安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
9. 董才千：《留守陇东》，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0. 中央档案馆编：《陕甘宁边区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上、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
11. 张宗逊《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
12. 白黎：《刘志丹传》，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13. 王世泰：《回忆我的红军生涯》，1993年；
14. 《峥嵘岁月》，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5. 张继：《谢子长》，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6. 朱开铨：《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8. 《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19. 忽培元：《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
20.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曹力如》，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1. 张策：《我的历史回忆》，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
22. 《贾拓夫》，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3. 刘力贞、张光编著：《人民英雄刘志丹》，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
24. 冯捷：《陕北红军征战纪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25. 《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
26. 刘志丹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27. 《马文瑞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28.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谢子长纪念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9.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

30. 《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
31. 耿飫：《耿飫回忆录》，中华书局 2009 年版；
32. 中共三原县委组织部编：《黄子文》（内部资料）；
33. 三原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渭北黄氏兄弟》（内部资料）；
34. 中共志丹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志丹县英模人物专辑》（内部资料）。

三、专著、论文集

1. 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党史研究室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2. 中共盐池县委党史办公室编：《陕甘宁边区概述》，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3. 宋金寿、李忠金主编：《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4. 房成祥、黄兆安主编：《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5. 吴志圃：《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湖南出版社 1991 年版；
6. 雷云峰编著：《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册，西安地图出版社 1993 年版；
7. 同树声、胡民新、李志全主编：《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中、下篇，西安地图出版社 1993 年版；
8. 朱凯、郭林、吴璋主编：《陕甘宁边区史》（解放战争时期），西安地图出版社 1993 年版；
9. 魏向军：《陇东民主革命简史》，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3 年版；
10. 刘宪普：《陕甘宁边区教育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11. 李仲立、曲涛：《陇东老区政权史》，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12.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 1995 年版；
13. 张克复主编：《甘肃老区概览》，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14. 曲涛、李仲立：《陇东老区红军史》，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15. 张宏志：《西北革命根据地史》，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16. 马西林、王利林：《陇东革命斗争史》，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17.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
18. 曲涛：《红色足迹——陇东老区重大事件述评》，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19. 郭林、李建社、李米存主编：《刘志丹与西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20. 郭文奎主编：《庆阳史话》，甘肃文史出版社 2004 年版；

21. 王晋林、秦生：《甘肃新民主主义革命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22. 郭文堂主编：《南梁烽火与中国革命》，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23. 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史（1937—1945）》，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24. 中共咸阳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咸阳历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25. 康民、秦生：《西北五四运动与大革命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
26. 秦生：《西北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
27. 陈永基、秦生：《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
28. 王晋林、秦生：《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
29. 秦生：《西北解放战争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
30. 梁星过、姚文琦主编：《建国以来刘志丹研究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31.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陕西历史》第一卷，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
32. 曲涛主编：《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9 年版；
33. 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 年版；
34. 王云、齐心主编：《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地区斗争简史（1919 年—1949 年）；
35. 中共庆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走进落脚点》（内部资料）。

陇东学院曲涛整理

后 记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领导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与陕北革命根据地共同发展为西北革命根据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建立最早的革命根据地。它的创建，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揭开了陕甘边地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序幕，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举国上下欢庆新中国成立60周年，恰逢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75周年之际，为了全方位、深层次地研究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光辉历史，深入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趋势和规律，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庆阳市委主办，中共庆阳市委宣传部分、中共庆阳市委党史研究室承办的“陕甘边根据地与中国革命学术研讨会”于2009年9月19日至9月20日在甘肃省庆阳市举行。来自中央、地方和军队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及老一代革命家亲属济济一堂，共话研究成果，进行理论探讨，交流实践经验。

会议由中共甘肃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励小捷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同志在会上作主旨讲话，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国防大学科研管理部原部长、少将苏希胜同志宣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李铁映同志发来的贺电。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总结以刘志丹等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西北地区开展革命斗争，领导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经验，深入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趋

势和规律。会议的宗旨是，通过学术研讨，交流研究成果，弘扬老区精神和优良革命传统，以历史经验启迪人、教育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蓬勃发展。

这次研讨会面向全国征文，共收到论文180余篇，作者遍及中央有关部门、单位、全国17个省（区、市）和军队有关部门。经过专家组三个阶段严格评审，最后确定入选论文59篇，入选会议交流论文22篇。入选论文涵盖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特点，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法制建设，民族工作，人物研究等若干方面。

这次学术盛会，集中展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献规律研究的丰硕理论成果，体现了历史研究者的新颖思路和敏锐智慧，入选论文总体上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和价值。为纪念学术研讨会的召开，进一步推进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研究，我们特于会后编辑出版这部论文集。

参加研讨会论文审核评选的人员有：霍海丹、董建镇、李群、王新生、杨青、王爱云、姚文琦、王晋林、雷涛、卢进勃、王利林、王勋贵、李占年。参加研讨会论文校对的人员有：雷涛、安世厚、赵杰、徐振伟、史文涛、白树军、赵萍、杨鹤靖。

编者
2011年4月